

人间地狱

『无人区』

日本侵华罪行实录

陈建辉◎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人间地狱

「无人区」

日本侵华罪行实录

陈建辉◎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地狱“无人区”/陈建辉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6
(经世文库)
ISBN 7-80211-124-2

Ⅰ.人...
Ⅱ.陈...
Ⅲ.日本-侵华事件-史料-华北地区
Ⅳ.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339 号

人间地狱“无人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010)66560272(编辑部)
(010)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445 千字
印　　张:24.25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50 元

人间地狱“无人区”
编纂委员会

主　编： 陈建辉

副主编： 张维民　赵胜军　宋学民

前 言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巩固其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长城沿线一带通过“集家并村”的手段将群众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群众称之为“人圈”),从而建立起来的“无住禁作地带”,是日军用血腥手段在华制造的又一重大侵略暴行。

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始于1939年,起初只是在局部地区实行集家并村。随着长城线上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日军将制造“无人区”提到战略高度认识并制定全面计划。到1944年,日军制造“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其范围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至赤城县的老丈坝,北自宁城、围场一带,南到迁安、遵化一线,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涉及今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5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县(区)。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8500平方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1.7万多个,共建“人圈”2506座,被驱赶集家的群众约140万人。

这里的“无人区”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无住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实行彻底“三光”政策的区域。二是“集团部落”,即在平地大川地域修建有围墙、有武装看守的“人圈”,虽有人居住,但没有行动自由。三是“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之间的“禁住不禁作”地带。

日军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将游击根据地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实行了“拔根断源式的摧毁”,灭绝一切生机,将“三光”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在对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摧残的同时,日军对于生活在“人圈”内的群众进行了无比残暴的法西斯统治,致使成千上万人被饥寒、瘟疫、酷刑夺去了生命,座座“人圈”尤如座座人间地狱。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屠杀和虐杀我35万人中国同胞中,大部分死于“无人区”。日军对“无人区”人民的屠杀和虐杀,其残暴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充分实践。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仅生存了下

来,还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坚持住了这块战略要地。在"无人区"的斗争中,抗日军民中涌现出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充分彰显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党政干部、战士中,有许多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长城线上的群众也作出了巨大牺牲,涌现的英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长城线上"无人区"的历史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本性,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胡绳同志生前曾指出"'无人区'是抗日战争中悲壮的特写镜头"。日本进步学者也提出"'无人区'是人类战争史中特殊的历史现象"。

相对南京大屠杀而言,日军在长城线上制造千里"无人区"这段历史知之者甚少,我们特将长城线上"无人区"有关资料奉献给读者。

编　者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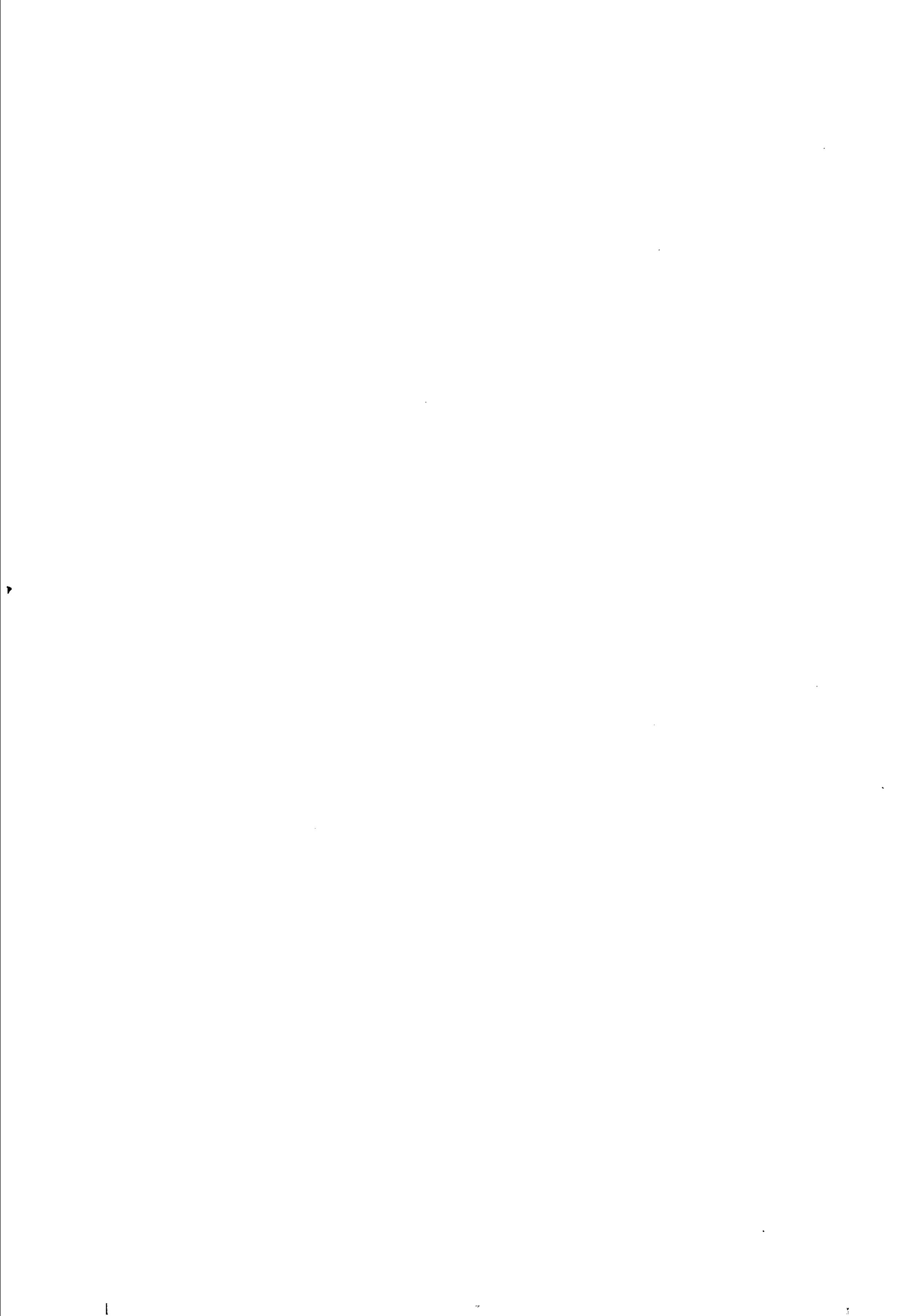
“无人区”

惨　案

证言与口供

日本人笔下的“无人区”

『无人区』



冀热辽行署关于热南、冀东集家并村(人圈)惨状的调查报告

敌寇对中国人民的残杀、统治是无奇不有,无所不为的,但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决不会因此而压制下去,相反的时刻打击着敌人,特别是分散在各个山沟的人民,凭借着山地的有利条件开展着对敌的周旋,因此敌人认为最美妙的也就是对中国人民最残暴的做法——制造“无人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春天,敌寇在我冀热辽区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长约700余里的长城两侧,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凌源等县,长城以北40里,以南20里,均不让有一个中国人存在,开始了残酷的集家并村办法:第一阶段,先把三家五家太分散的零散户,集中到村庄里。这是“命令”,不去就是烧杀抢。但老百姓不是那样温驯的,除开展“非法”斗争外,还利用一些“合法”的斗争,拖延时间。三十一年(1942年)开始了集家的第二期,不只零散户要集中,而且要把所有的小村子都集中在离长城40里以外山沟口较大村里名之曰“部落”,亦名“人圈”。但中国人民能够服从这个“命令”么?绝对不能,因此“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残暴的施行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敌寇的兽群每天在山沟里、山顶上进行“扫荡”与搜索,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就是一所茅草窝铺也难免灰烬的命运,牲口和财物抢掠一空,就是不通人事的鸡犬也难逃活命。这样的搜索“扫荡”一个村至少在几次以上,在马尾沟竟烧杀了14次。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第一次被烧了房子,他们又搭起茅屋来,但是狠心的敌人又来个二次放火。经过数次“搭”与“烧”的斗争,群众的力量使尽了,只得隐蔽在水[山]沟里、大树下、土谷里,以减少目标,略避风寒。但是敌人还有更残酷的办法,在每个山头上分布着碉堡,监视着人们的动静,只要发现人影,必追逐杀死而后已。因此,躲在山谷里的人们连火都不敢生,恐怕烟火暴露了消息。母亲抱着小孩,时刻不敢让他离开奶头,恐怕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引来。有的孩子在止不住哭泣时,可怜的让他母亲长久的用奶头塞死。马尾沟只4个小村,70户人家,竟被杀死50余人。好多村庄被杀在半数以上,全家被杀的也为数不少。有42 000平方里的土地上成为人烟罕见的一片凄凉了!

住在部落附近的人们不得已跑在“人圈”里,都过着非人类的生活(部落都在千户以上)。“人圈”里有严密的特务组织,规定有“思想犯”“政治犯”“运输犯”

"秘输犯"等犯罪条款,谁要表现任何一点活动,或是看见那个人不顺眼时,就加上[之]予某一罪名结束了他的生命。从到"人圈"的一天,再不能与外面发生任何关系,就是相隔咫尺的村庄也不准互相来往。10里以外的土地即不让种,凡是一个能拿动枪的男人,都要编为自卫团,每晚巡查不能睡觉,白天才能抽点时间休息,但是如何休息得下呢!因为他们又都是"勤劳奉公"队的队员,每月都要抽出15天到20天的工夫"勤劳奉公",不是修"人圈"外的壕沟就是修山头堡垒;不是修汽车路,就是修火车道;不是到附近县做工,就是到东北矿厂,他们的劳役没有服完的时候,以至于死。"人圈"里的生活完全是配给制,白面大米根本不让吃。其他用品的配给,着实可怜,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给,至多不过3尺;他们所打的粮食还不够交税,如住宿捐每户每年80元,军需捐每人每季7元,飞机献金每人7元,每人还得交"钢钝"5个,如没有交款,每个折5元,一年一次募捐每亩地17元,还有附加捐等等。这仅仅是所知的数种,总计每年每亩地至少负担80斤粮食,他们穿什么吃什么即可想而知了。"人圈"里的女人们,一般定有两种制度,一种是"跑人圈",在每天的早晨,所有的青年妇女,掷下她的可爱的小孩子先到"人圈"外跑一个圈,然后才能回家做饭奶孩子,不然就要犯罪。第二种是"跑山",每礼拜一次,把妇女们集中在一个山麓下,发号赛跑。但山头早已暗藏着一些丧尽良心的狗腿警察,在妇女快到山顶时,呼呼……的枪声,把女人们吓个抖擞而后快,这就是那[所]谓"锻炼",谁要不去,马上定个思想不良的罪名成为刀下鬼,"人圈"的妇女们被敌人的奸淫污辱已成为"公开合法",因为抗拒,被处通匪者不是少数。"人圈"的生活此仅一二,实难尽述。

在这块地区里,以9个县计,其中最重要者4县,有600万亩土地在敌人践踏下荒芜了,每亩以产粮3大斗计,以4年计算,共减收粮食720万大石。1000余村庄的房舍片瓦无存;牲畜不见一头,衣服不能遮体,目前有将近50万的人们受着衣食住无法解决而死亡的威胁,此种嗷嗷待哺的惨相,令人心寒!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存中央档案馆)

热河的血泪

仓 夷

在日寇统治热河期间,从河北要到热河去,都得经过数十里至百余里的"无住地带"。这地带里所有村庄都被毁灭了,土地不许耕种,真是凄凉满目。过了长城就到统治极严的部落区。每距五六里,就修建1个部落,围以土墙,所以又称"围子"或"人圈"。除了这"围子"以外,其他大小村庄全被毁掉,连在山沟里种地搭的小草棚,也被拆毁。这种部落要到宁城和赤峰以北,才渐渐减少。热河人民一提起"围子",就有诉不尽的怨恨。

敌人利用"围子"把人民圈管起来,使人民失去了一切的自由。串亲,走口,种地,出入非常的困难。大批的"讨伐队"和伪警察,把"围子"都层层封锁起来。在丰宁县茨营子一村,只269户,就住着"讨伐队"76人,在"联村"里还有30多个警察。"围子"里人民的劳役和捐税特别繁重。经常有3种地区需要劳役:一种是到热河东部背煤修铁路,每次服役半年。一种是到红堂寺煤矿,背煤,盖房,修路,一去也是半年。一种是在本村听差,修路。去热河东部的要21、22岁的青年,自带路费,到那里都穿军队的旧破衣。到红堂寺的要27、28、37、38岁4种年龄的人,到那里吃不饱,不给钱,衣服看见肉。留在本村服役的是30、40两种年龄的。其他年龄的有的当"围兵",有的当"自卫团",整天的出操、集合、站围墙。剩下能种地的,受苦的,尽是老弱的。所以有许多相当肥沃的土地,都荒芜着没有劳力耕种。在"围子"里的每家农户,种地喂家畜也不能自由,平地强迫种棉花。"官棉花"每亩要产100至150斤。交坏棉花还不行。市价棉花每斤10多元,而官价只给3毛。好的旱地又强迫种大烟,收了烟全用官价交了公,剩下种杂粮五谷的地也就较次了,就这样每亩地得交1斗至1斗半的粮税,有些地还得每亩多交20多斤柴火[禾]。地荒着也得纳粮,说是为了鼓励"增产"。打下粮食归"大堆"(大仓),[①]按期去领来吃,不让老百姓家里有存粮。在丰宁县的茨营子村,生产量比建"围子"以前要减少一半。有70%的人民每年都不够吃,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另外,每个人还折价100元,抽1/10的捐;100只羊抽30只归"组合",每只给2元;牛100头抽10

---

① 即"粮食组合"、"义仓"。

头归"组合",每头给二三十元。养牛、羊、鸡、驴等都得登记,警察按期来查,喂瘦了要受罚,死了得报销,不然到年头就向你要活的。因为捐税太重,喂家畜的人家也就少了。在"围子"里,人们没有闲的时候,天天有劳役;也没有饱的时候,粮食被搜刮尽了。这就是热河农村在敌寇统治下破产的写照。

在热河省会的承德,由于敌寇对商业的绝对统治,已变成一座非常冷落的城市。敌人说:"物资节约了!"于是连饭馆都找不到了,在承德街上买不到肉。来往的只有一些穿黄衣裳的人(敌伪军政人员),穿便衣的很少见到。坐火车路过一些城镇也看不见什么买卖。热河中部建平县一个小商人告诉记者:我们一村 300 多户,只有十几人做小买卖,不能明着做,卖布卖线比做贼还难,白天都得把布带到高粱地里蹲着。也没有新布,只能倒点估衣。到奉天去买估衣,黑夜里走,三宿才回来,一路就怕遇见狗腿汉奸,遇到就被没收。所以在热河,有钱人穿的也是破衣服,穷人不少赤身光膀子的。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得不到一件稍微完整的裤子来遮住她的身体。有许多穷苦的人家,一家七八口人,只有 1 条裤子,谁出门谁就穿着它,在家里就用被子或麻袋围着。一些富有的人家,留着明堂瓦房都不敢住,只好住破家烂屋,避免敌人注意。但是敌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们。敌人把火车站"卖"给地主,把赤峰北的大桥"卖"给地主,把承德街上日寇的"忠灵塔"也"卖"给了商家(据说"卖"了 170 余万元),伪警察署、县公署、分出[驻]所、兵营、学校,一切公物,都"卖"给热河的老百姓。老百姓自然是不得拒绝的,有的是有钱人出钱,有的是无钱人公摊。伪寇简直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吸老百姓身上的血!

所以当地的年轻人气愤地说:"咱一辈子算白混了,咱们一记事儿日本就来,吃没吃好,穿没穿好,挑国兵,当劳工,不能有出头的日子了,伪满洲国成立一天,我就是个黑人!"年老的人也含泪地摇摇头,双手抱着胸脯说:"我们人民的心,已经痛苦成铁疙疸,扒也扒不开了!"所以靠近我抗日根据地的地区,人民都想尽一切办法,逃出敌伪重重的监视,来到我根据地安家。据记者所知,逃到我赤城三区的有 10 户,逃到我延庆十区的有 30 户,在延庆二区就有 40 多个青年,因为不愿归"围子"而参加了我游击队的。热河沦亡已经 14[13]年了,这 14[13]年来,热河人民惟一的安慰者,恐怕也只有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了。八路军是最了解与最关心热河的同胞,在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长城各要口上,作了不知多少次的战。我 8 月初到长城边采访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已经进到热河中部围场一带作战。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了援助热河的同胞,曾经从辽[遥]远的冀东根据地里,募集了寒衣,给他们送去,募集了小米,去接济他们。曾经在这最残酷地带,坚持了 5 年的苦战。我们不少的勇敢的战士光荣地牺牲了。据记者所知,只热西某团 1 个团,5 年来牺牲团长以下官兵 600 多,而为了开辟丰宁一县的抗日工作,我们就牺牲了县区干部 200 多名! 从这牺牲的数目字里,就可知道这里和敌人是进行了多么残酷的(搏)斗;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八路军和民主

政府,是如何的为解放热河人民而不惜任何的牺牲!

现在热河全境解放了!敌寇汉奸留给热河人民心头的遗恨,虽然还深重地压在人民的心间。但是年老的人已经张开双手,摸着八路军战士的肩腰说:"想不到,我心上的疙疸,却被你们扒开了!谁把我们这铁疙疸扒开,我们就会永远心向谁!"

[选自民国34年(1945年)10月27日《晋察冀日报》第1913期]

人 圈

厂 民

"人圈"的来历

从1941年伪满洲国康德8年开始,敌人为了"明朗热河",为了防止八路军的积极活动,实行毒辣的集家并村政策,把山沟里和小村庄的老百姓,都强迫搬到公路两边,使所有的村庄都安置在公路控制之下,一旦有事,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调来大兵"确保治安"。

敌人把这并起来的村庄称为部落,老百姓却叫它"围子""人圈"。——是的,牛住的叫牛圈,猪住的叫猪圈,被当做牛马一样看待的奴隶们住的难道不是"人圈"吗?

在"部落区"以外,凡是八路军到过活动过的地方,都造成"无人区"。敌人称为"无住地带"。在那儿不许老百姓居住,不许种庄稼,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见庄稼就砍,要使八路军没法安顿。所谓伪满洲国"国境线"长城一带,长500里,宽20多里到50多里的地面,都属于"无住地带"。在敌人的地图上是用沙漠一样的符号来标明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人圈"是怎样修起来的吧!

这是滦平县边境的一个叫红果寺的"人圈",它完全是在白地上建起的。为了它,5个村庄,几百间房屋成了废墟,……为了它,12 000个劳动力浪费掉了。

那年秋天,庄稼快成熟的时候,黄澄澄的谷子穗,垂着它沉重的头,高粱红得发紫,棒子也绽裂开来。庄稼人正忙着准备收秋,忽然狗腿子特务、警察传下了一道命令:凡是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居民,不论男女,第二天一早集合,去修部落。

这像一盆凉水,浇得人凉了半截,眼看着庄稼丢在地里,眼看着一年的希望就此落空,怎么不难过。可是,特务的鞭子,警察的枪刺,没有道理可讲。庄稼人只得带着铁锅、扁担、筐子、带着一肚子委屈去了。一路上,人们哭的哭,号的号,孩子冻得嗷嗷叫。

"人圈"的范围经已经划定了,这儿原有的一片庄稼,赶不及收起,都被踩烂,挖的挖掉,有的扔在一边,让牲口吃着。人们看着像踩自己的庄稼一样难受。在警察监工的皮鞭和斥骂之下,百多个男女老少,忙得支应不及,搬石头的搬石头,挖泥土的挖泥土,打墙的打墙,没有一双手空闲一分钟,没有一张嘴敢随便讲一句话,要不然,一巴掌就打上脸来,一皮靴就踢到屁股上来。

快到50岁的陈淮南,因为他年老身体衰弱,支工迟慢,不就被警察拉出去,罚在石头上跪了半天吗?警察还提高嗓子,学着日本腔,以一儆百地教训:"你的调皮,不好好地办事!"

还有些人由于别的原因挨揍,比如做工时用手抹一下冻得挂下来的鼻涕;比如规定妇女每人一天交50块土坯,不曾够数;比如监工警察在你家吃饭有了大米白面却没有鸡肉;比如被看中的妇女没有懂得更多的顺从……

直到天黑,好容易放回了家,已经够累的了,妇女还得忙着做饭、喂猪。大家把肚子塞饱,再赶快摸黑下地抢着收割,要不然,就没有时间料理庄稼,下年没有吃的了。

人们实在支持不住,腰疼得挺不起来的时候,才躺在炕上休息,但一会儿天又发白,催命的哨子就吹开了。白天工作着,眼皮常常合拢来,如果被警察看见,又是一顿好揍。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操劳着,折磨着,化了两个多月的功夫,"人圈"算是修成了。

看吧!四四方方四道围墙,那是由远方搬来一块块石垒成,是用几百人的血汗和眼泪抹成的。墙厚三四尺,高一丈七八尺,顶上插着一排尖利刺手的酸枣枝。墙上每隔两丈留1个枪眼,墙里垒着站台,好叫老百姓日夜去守望,围墙的四角上,各有1个炮楼,坚固圆形的墙上密密麻麻的枪眼,窥视着远方。

"人圈"有两个门,刚好1辆卡车通过,大门的上面有守望的岗楼,形式是长方的,一样开有许多枪眼,大门前写着:

"××部落",两边是:"建设部落,自兴乡土",或是"王道乐土"之类的标语。

"人圈"围起来了,但是里面还是空空的,这时特务、警察又到各村去传达第二道命令:限本月底以前,所有居民都得离开原来的村庄,搬进部落居住,谁不去烧谁的房子,决不宽容。

于是家家户户起了一片哭声,一片叹息!

别了,你辛勤开恳[垦]的土地,亲手建造的房屋。虽然这儿每一样东西都非

常熟悉。这儿寄存着一切希望和梦想，现在却不得不被迫离开了。房子拆毁，只留下几堵残破的墙壁；土地荒芜起来，树木被砍伐，什么都破坏了，什么都毁灭了，敌人却偏偏说得好听，"建设部落"。

成群的人忍着气往"人圈"里搬，男子们扛着柱子，担着筐子、锅子，女人们抱着鸡雏，抱着烂席片，孩子们带着寒冷和啼唤。

部落里的房子，那所谓新的"家"，还不曾盖起，睡觉吃饭是最要紧的，那就首先搭起炕来再说。但新土炕是湿的，烧着劈柴，不时蒸发出白色的水汽。夜晚，寒风瑟瑟地吹来。几家子挤在一个炕上，还像浸在水里一样寒冷。因为这个家没有打墙，还没有来得及盖屋顶，又没有被子等任何挡寒风的东西，有时下起雨来，飘起雪来，就只得挺挺地淋着。

慢慢地等柱子竖起，把墙打起，屋顶上胡乱盖一层草，就算是家了。可是冬天土冻，没法抹墙，直到第二年春天，也许支差多，地里忙，心里又不愿长住这个家，那么房就不知那天才盖好了。

现在家"集"来了，让我们做一番巡礼吧！

房子像鸽子笼一样紧挤着，那么凌乱，那么肮脏，人和猪和鸡挤在一起。因为没有院子，没有空地，到处是粪便和垃圾，是恶心的臭气。炕上是臭虫，身上是虱子，墙上是这些小动物的血印子。在这儿，繁荣的不是人，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的家——这就是"人圈"。

在人民中间暗暗流传着一支歌：

……

四围修据点，外边围子圈，
邻近老百姓，一齐往里搬，
百姓无住处，四围搭草铺。
七家子八家子住在一个屋，
屋子也不大，住也住不下，
外边下小雨，屋里摸蛤蟆。

名目繁多的罪犯

老百姓搬进"人圈"以后，接着来的是血腥的大检举。

天还没有亮，成行的汽车，成队的宪兵，就把"人圈"密不通风地围住了。他们带着各种毒辣的刑具，各种该死的罪名："通匪""济匪""窝匪"，这是所谓"国事犯"的重罪。

一声哨子吹起，无论你在做什么，都立刻放下，赶去集合。枪尖把男女老少团团围住，然后指名点出，要你招供你是"通八路"，逼你说出八路军在哪里，逼你咬

出旁人。不招的话，等着你的是各种刑罚。起先是打，鞭子、棍子、劈柴，拿到什么是什么。其次是灌煤油或辣椒水。第三回把烧得滚烫的开水往身上浇，第四回，把木炭火烧红的铁筷子烙。第五回呢！忽然传你吃起烧饼来，声调也缓和了，劝诱你，要你说出。好家伙，你硬不说，那么最后是枪崩。自然，这次序并无一定，更不包括所有的刑罚，这只是一个名叫徐凤早的青年人所看到过的某一回事实经过而已。

牺牲在大检举里的老百姓太多了，随便举出个数目字吧！前年秋天，宽城一天杀七八十；李庄子被抓去了 80 多，杀了 55 名；彭庄子一气杀了 6 个；山嘴子一下抓走五六十。老百姓一提起来都汗毛直竖，说：“可了不得，汽车三天两天来，一起早谁也跑不出去，圈住了人，也不问青红皂白，拉出去就是毒刑拷打，顶不过刑罚，就胡说一阵，不说的活活打死。”一个小学教员谈虎色变地说：“国事犯这个官司谁也打不起，一抓去不死也得脱两层皮。”

国事犯以外，还有两个特别的罪名：“经济犯”“密输犯”。

“人圈”的老百姓，没有外出和买卖的自由，“人圈”和“人圈”相互间也不准来往，因此，当特务、警察看到什么人穿上一件新衣的时候，就会追问：“你的新衣是哪儿来的，布是哪儿来的？”看谁家吃点肉，就问：“这肉是哪里来的，是谁宰的猪？”而这些买卖布匹私自宰猪的都叫“经济犯”。另外，这个“人圈”里的粮食不准运往另一个“人圈”里去，当然更不准运出“国境”去。要不就成了“密输犯”。

“经济犯”和“密输犯”仅次于“国事犯”的罪。客气的，把你的布匹、粮食、牲口没收；不客气的，就得关上半年一年，教你花费很多的钱去赎出来。

靠了这些罪名，特务、警察也有了更多的敲诈、恐吓、敛钱的机会。

一次，特务卢之本去张栓子家检查，用刺刀挑开柜子，翻到里面一件新衣服，就得意而又假装善意地说：

“啊，这可不得了，穿着新的，日系人看见不好，还是卖给我吧！”

张栓子无话可说，似乎还得谢谢特务的好意呢！于是以原价一半的价钱卖出。以后没穿的，又得偷偷向特务去买布。老百姓就这么越过越穷。

滦平营坊村的村长陈士林，是日本副县长的干儿子。别人不敢贩牛，他在一边怂恿着：“去吧，到围场县去一趟，回来包赚大钱，有什么问题我去干爹那里一说，还有不成的。”

贩牛的商人赶了 20 多头牛，住在陈士林家里，正筹算着能赚多少钱的时候，那知陈士林早去县里报告，一大队“经济特务搜查班”的人来把所有的牛牵走，把贩牛的商人押去了。

从兴隆县的“人圈”逃出来的徐凤忠说：“我家的配给本掉了，出点钱请特务帮忙再补一本。一面设法买了 50 斤大米去送礼，打发他个欢喜，那知道配给本没补上，却又出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的大米是哪儿来的，这是密输犯，这还了得，我哪

儿少这点大米吃。'大米没退还,父亲却叫押起来,于是又是香烟,又是大烟,这儿送礼,那儿花钱,才把父亲放了出来。我们家3条牛就这样完蛋了。"

两 类 人

两类人,统治者,被统治者,剥削者,被剥削者,奴役者,被奴役者。

被压在地底里的是老百姓,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家伙却五花八门,一层一层数不清。

日系人,这是生死予夺的主宰。宪兵队也是叫人发抖的名词。满洲军——所谓国兵,这是伪满洲国的主力,全挑青壮年,也够吓人的。警察,他们是法律和权力的代表。(讨)伐队——瘟神,"扫荡"的先锋队。部落警或叫自卫团,这是地方武装。他们武器的好坏,决定于敌人的信任程度。信任的,发给大枪,七九、水联珠、套皮;不怎么信任的,发给几杆鸟枪、火炮、棍棒。最后还有一种特殊人物——特务,那穿便衣,藏着短枪的家伙,他本身就是法律,就是权威,谁见了不害怕。

县长、村长、部落长——或甲长,则是另一系列的权利者。

在这些奴隶主、奴隶总管、奴隶监督的一层层压抑之下,"人圈"里的老百姓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老百姓的奴役,所谓"勤劳奉公"是无穷无尽的。除了修"人圈",修炮楼,修公路以外,还要修村公所、警防所,修学校,修交易所……那些被"挑国兵"挑落选的,送东北各地下煤窑,开矿山,做苦工,直到把性命送在异乡。

那些吸血者的权利也是无限的。

汉奸高连璧,滦平动员股管劳工的,他经常到各个"人圈"去调查,谁去谁不去出工。照例是18岁到55岁的出劳工,可是只要使钱,都能免去;不出钱的也许60岁的都会派上。高连璧的派头也真大,调查时不说别的,提了根棍子,先就打人。老百姓说话声音低了,为着害怕他,人们特别低声下气。他说:"什么,听不到!"猛的当头一棍。第二回回答时提高一点,他却说:"我是聋子吗?你对谁说话,这么粗声大气的。"又是一棍子。请他吃饭,大米、白面是起码的了,而他老人家只有4个盘是不吃的,非得全席才行。他像蝗虫,到哪家哪家就一扫而光。

前年冬天,驻在大水峪的国兵要薪柴。老百姓从虎什哈送去,往返120里。百姓背来的是干柴,他就让你给担水、扫院子、扫厕所,直到太阳落,饿肚子回去。如果送的柴稍稍湿一点,就教你围在那儿跪庙,天黑了还不让回家。当时有一个老百姓不堪这样虐待跳井自杀了。老百姓愤慨地说:

"官家抓劳工还不算,连他妈的官们家眷的房子也要老百姓修,什么都抓到老百姓头上来了,就是娶媳妇入洞房不用老百姓。"

什么都不给　什么都要

敌人在伪满洲国的压榨剥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什么都不给,什么都要。

他们不让你好好住着,把你集家到"人圈"里。敌人特务、警察半夜三更可以随便跑到老百姓家里去,把丈夫孩子赶走,媳妇留下来。他们不让你种地,集家以后,有的老百姓得跑到二三十里外去种地,每天跑去跑回,就把时间磨掉了,还能干什么活?就是这样还有许多麻烦,太阳出来,"人圈"的门才打开,太阳落山以前,又得赶快回家去,否则"人圈"的门关了,只好住在地里过夜,挨冻受饿。如果特务到"人圈"里检查,见你不在,就得打自卫团团长4个嘴巴,等你回来,自卫团长再打你4个嘴巴。这不是玩笑,据说不成文法不打不行。如果检查时两个人不在,特务就打自卫团长8个嘴巴,然后自卫团长再向那两个人打还。

他们不给穿的,一年配给三四尺布,做啥也不够,原来有些旧衣服两三年也穿烂了,有衣服的怎么样呢?前面挂一道,背后挂一道,腰里一结就算了。更多的人是赤裸着,只在小肚子那儿缠一块碎的腰子。奇怪的是大热天有人穿皮袄,却是毛贴着肉,为的是怕皮板了透汗湿坏了。没有棉花,没有被子,用个麻袋片盖一下。有害病的,盖过出了汗,另外的人又盖,瘟疫病就这样传染开了。

他们不给吃的,稻田归公。种了大米都得交出,一般的粮食,除了自己留小部分外,全要送到仓库或交易场去。不准杀猪宰羊,不准买卖,一切全由配给。看看成为"人圈"以后红果寺老百姓配给到的东西吧!白面5两(老人孩子是黑面),豆油2两,洋火1包,盐3斤。这是一个人一年的配给量。糖2两,线10条,布5尺,这是4年来一户人家仅有过一次的配给。

而敌人呢!要你的一切。要你的门牌捐、牲口捐、飞机捐、储蓄金;要你的"仓粮出荷"、"大豆出荷"、"棉花出荷"、"油类出荷"、"报国出荷"、"民生出荷"、"部落出荷"。要你献纳铜铁、毛皮、血粉、牲口、鸡蛋、蔬菜、麻、杏仁、核桃,以及大烟。他们更异想天开,把要去的鸡蛋叫你孵出小鸡,给他们喂着,到时候要你交出鸡蛋。就在这样的勒索下,红果寺200头牛,只留下了50头,200只鸡只留下了20只。玻璃庙的3000只羊,两年间吃剩下11只,而征税时仍按3000多只计算。

他们要你服从,他们教读书的姑娘到老百姓家去宣传万国道德会,教你供佛、烧香,教你认命,她们说:"一辈子也得认命,以后日系人、特务、警察打了我们,也不要言语,他骂,咱们忍着,也不要反抗……"

敌人是狠毒的,他们不给你自由,不给你生存,不给你做人;他们要你驯顺,要你的血,要你的骨殖,要你绝灭。

我们永远不该忘记

八路军的活动并没有因"人圈"而受限制,敌人的残酷统治,却因八路军的英勇斗争给推翻了。这被奴役12年的国土,终于得到解放,应该是怎样值得欢欣的事!当我们看到昔日的"人圈",心里就不能不感到沉重。

这是冬天,在杨树底下村,一群褴褛的赤裸裸的孩子,靠着泥墙在晒太阳,用乞怜的眼光看着行人。一个名叫丫头的13岁女孩子,上身赤条条的,下面穿一条破烂的单裤子。8岁的黄口子,只有一件大人的单褂子,晃晃荡荡,风可以从任何一处吹进去,他蹲蜷在那儿,用衣角盖着发紫的小膝盖,而肚脐却毫无遮掩地露了出来。11岁的虎春子,披的是他爸爸的破羊皮袄,没有裤子。8岁的栓子则全身光光的。所有这些孩子,有着一张营养不良苍青的脸,蓬乱干枯的头发,冻得紫黑的皮肤,像鸡爪一样乌黑瘦嶙的小手小脚,颤抖着蜷缩着,像一条条肉虫。我不知道他们出世到现在曾否有过一次笑脸。

站在孩子旁边一个女人说:"伪满洲国来了,不让挣钱,也没挣处,日系人配给又没我们的份儿,哪儿来的穿的,盖的单被片,稀里哗啦都破了,孩子们溜溜光光都没有穿的,就只好成天躲在炕上号。"

这是敌人统治的结果,我们不会忘记!

在黄土梁子,有3个战士过路,跑得很累,很口渴,想到老百姓家烧开水。他们在一家外面叫门,里边两个女人坐在炕上,又急又羞地说:"别进来,别进来,我们给烧。"战士们不愿麻烦老百姓,说:"不,我们自己烧吧!"女人们还是不让,问她们为什么,才知道她们一个没有裤子,一个裤子是穿洞的,所以不便出门。这3位八路军战士听了都默默掉下泪来,没有迟疑,立即把自己的衬裤脱下来送给那两个女人。

某部队第一次走过三块石村的时候,给了一个孩子3件衣服,正好第二次又过那里,看到孩子依然赤身裸体的蹲在风地里,觉得奇怪,有人开始怀疑起来,是不是他们装腔呢!后来问那孩子,才知道他的父亲前年上山打柴冻死了,母亲外出讨饭也冻死了,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嫂子,全没穿的,上回3件衣服就是哥哥嫂子穿了,可以去打柴干活。战士们听了,又把好些衣服给了孩子。

这类故事太多,这样的战士也太多了。现在救济的棉花早已大批大批地运去,这些悲惨的现象将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土地已经解放,人民已经自由,生活将要幸福,然而这些惨痛的往事,这些惨痛造成的原因,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应该忘记!

(选自1946年2月《北方》)

日军在平北制造“无人区”的累累血债

王 亢 江 卓 何 光

敌人疯狂制造“无人区”，妄图确保伪满洲国统治

敌人企图沿长城线制造“无人区”，从古北口至大滩，构成一条宽大的战略封锁线，阻止八路军向东北挺进，以实现其“确保满洲”的目的。

1941年下半年，伪满洲国热河日本宪兵本部，制定了“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也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形成了在伪满边境制造“无人区”的全面规划。1941年夏，敌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所谓“肃正三年计划”，企图限定时间，“扩大、巩固治安地区”。提出修筑隔离壕沟或堡垒、“阻止共军入侵”。1942年1月初，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行第三次“施政跃进”运动，重点是强迫老百姓“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为此，伪察南政厅制订了“赤(城)龙(关)延(庆)东部三县特别工作计划”，对龙关，赤城，延庆三县实行特别“治安肃正”。说明三个伪政权，都在执行着同一战略部署。

1941年秋，伪满和伪华北的敌人，纠集万余日伪军，对平北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丰滦密地区则更为严重，以烧、杀、抢、捕等手段，企图摧毁平北抗日根据地，并开始制造“无人区”。

在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境内，敌伪从万人“扫荡”后期开始推行“集家并村”计划。1941年关东军在滦平于营子搞集家并村试验村。1942年春，滦平县伪县长张祥廉在吴栅子搞“模范部落”的样板。修成后，伪满洲国的一个“大臣”至此检阅，照相，还拍了无声纪录影片“安乐村”。接着首先在丰滦密的十二、十三、十六区，继而又在长城沿线的一、五、七、八区北部大搞集家并村，敌人胁迫群众到指定的村庄居住，四周修筑起一丈多高的围墙，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墙内四角建炮楼，驻有军警特务。敌人称这种用炮楼和高墙围起来的村庄为“部落”，当地群众进入“部落”便失去了生产、生活、言论、行动的一切自由，只能像牛马一样任敌役使和宰割，因此群众愤怒地称之为“人圈”、“围子”。到1942年3月底，敌人已在一、五、七、八、十二区修建了四合堂、于营子、大甸子、大峪、白庙子、

东西湾子、番字牌、司营子、榆树底下、大沟、牛圈子、上下西仓峪、大北沟门、东石门子、白马关、南化石岭、石湖根、黄梁根、上下窝铺、壮牛沟、火石岭等29个“部落”。并宣布每个“部落”外10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不许居住,耕作时间在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之内进行,10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居住也不许耕作;这些地区统称为“无人区”。

日伪的“集家并村”遭到了丰滦密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许多人逃到深山,誓死不进“人圈”。到了1942年,敌人又以6000兵力在丰、滦、密长城各口和山边要地广设据点,使丰、滦、密地区的敌伪据点增加到37个。然后以各主要据点为中心,把“无人区”划分成若干小块,指定一个或几个据点反复“扫荡”,并配备机动兵力在各块之间穿插配合,妄图进一步肃清抗日力量。这一年敌人对“无人区”较大规模的“扫荡”就有32次,全年累计“扫荡”时间长达8个月以上。有431名干部群众被杀,1111人被捕,损失粮食3634石,牲畜2124头。同时,敌人还派遣大批特务密探,侦察我军政机关和山里群众的隐蔽地,发现目标即调动军队长途奔袭。1942年敌人进行有目标的长途奔袭共达40次,给抗日力量造成很大损失,其中伪满讨伐队4月8日突然奔袭密云县臭水坑,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十团供给处长乔宇率部队与敌英勇战斗,30位同志牺牲,县财粮科长李昨非等45人被捕。这就是引起平北抗日军民公愤的臭水坑惨案。

华北方面敌人,从1942年4月开始,强征500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沿着山边挖掘“治安沟”(即封锁沟)。至4月底,封锁沟挖成。西起昌平县的桃峪口,途经丰滦密九区的平义分、北宅、白厂,四区的红螺镇、范各庄、流水庄,六区的康各庄、卸甲山、署地、坟庄,二区的北白岩、尖岩、庄户,三区的董各庄、燕落、不老屯、学各庄、石匣,东至潮河岸边的辛庄止,总长180华里,宽3丈6尺,深1丈6尺。沟边每隔三五里建一炮楼,炮楼由伪军和沿沟各村保甲棍团监守。为了扩沟,敌人还在沿沟重要村镇先后增建了大辛庄、坟庄、燕落等13个据点。接着敌人将大沟以北,长城以内地区宣布为“非治安区”,严禁居住耕作,把群众统统赶往沟南,沟北民房全部拆除或烧毁。为限制抗日军队在大沟两侧活动,还沿沟烧山并村,先后将沟北牛盆峪、东沟门、大关上、马营、河北、西峪、高家岭、沙峪里、秀才峪、柳树沟、转山子、庙沟梁等村的山林全数烧毁,又把沟南的一些丘陵小村,如二甲峪、恒河西山、穆家峪西沟等强行并入大村。在敌人疯狂破坏胁迫下,大部分群众移到沟南,少部分群众进入深山,封锁沟以北遂成为荒芜地带。这样,丰滦密联合县境内,一时间就形成了东自半成子,西至渤海所、南从白道峪,北到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约120华里的山地“无人区”。无人区范围,约占丰滦密地区面积的20%,原居住人口的10%。

在昌(平)延(庆)联合县境内,敌人为着巩固伪满洲国边界占领地,进一步控制我昌延中心区,于1941年开始,在千家店、花盆、沙梁子、红旗甸乡,强迫群众修建“部落”、炮楼,于1942年初,划定大庄科、小庄科、汉家川、台子沟、二道河,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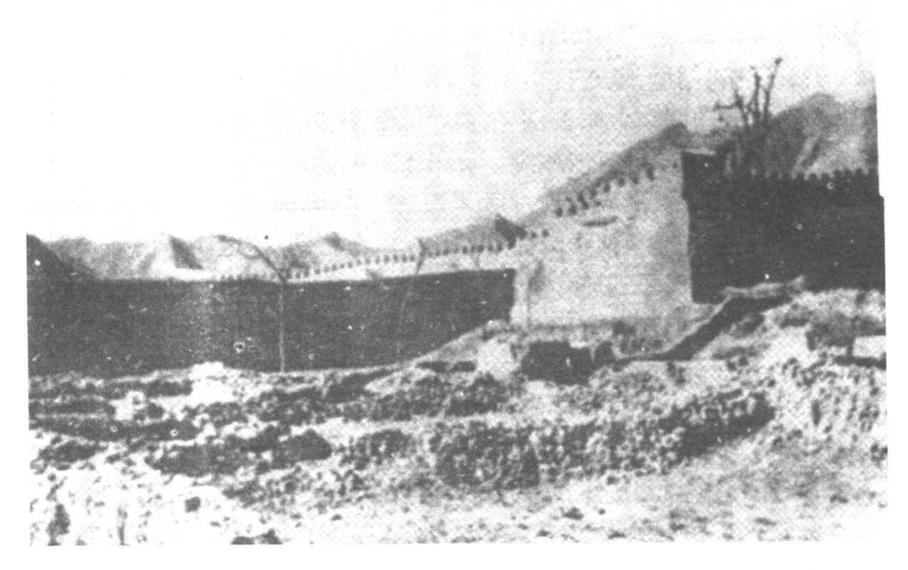
关、鸽子峪、杏树台、王家堡、二铺、营城、罗台子、狗铺共计 13 个"人圈"。强迫附近 45 个村庄的群众，搬进 13 个"部落"，并拆毁"部落"附近的村庄。1942 年 8 月，伪军到二铺附近的马蹄湾村，拆房 171 间，打伤群众 13 人，又到狗铺附近的河湾拆房 250 间。

从 1942 年 5 月底，平北根据地中心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日伪军连续不断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其中以对赤城以南大海陀附近的平北党政机关所在地之"扫荡"为最甚。抗日军民自己动手在山上盖的房子，不仅被日伪军烧毁，连房基石也被拆除扔到山谷中去了。每次反"扫荡"一结束，大家就重新盖房，未等房子盖好，敌人又来了，战士们拿起枪又开始了反"扫荡"斗争。主力部队伤四分之一，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损失近一半。平北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英勇战斗，根据地虽然缩小了，抗日斗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下来。在龙(关)赤(城)联合县境和伪满丰宁县边，有从北至南的古魏长城，长城东的山谷中，有黑河自北向南流，是为黑河川。黑河地区是伪满洲、华北、蒙疆的接合部，南控华北，西扼蒙疆，并在巴图营、茨营子、瓦房沟、大石窖、石泉寺、喜峰嵯、青羊沟设立了分驻所，在东卯、白草设立了警察署。1942 年敌人在毗邻长城的青羊沟和千松台一带，首先搞起"集家并村"，用刺刀和棍棒强迫群众搬进"部落"。1943 年初，整个黑河川全部施行"集家并村"。当时所建"人圈"为：三道川 8 个、青羊沟 9 个、白草 14 个、东万口 10 个、茨营子 12 个、东卯 6 个、万泉寺 4 个、合计 7 个乡和大滩共设 65 个"人圈"，有 200 多村庄的群众被迫搬入。在靠长城沿线，"人圈"外的"国界"处，被划为"无住地带"，插上木橛，不准逾越，发现有人通过，即开枪射杀。黑河川土地肥沃，自古是米粮川，日寇"集家并村"的"固边政策"，给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日寇在"无人区"欠下了难以偿还的累累血债

日寇为实现其罪恶目的，不管人民的死活。丰宁黑河川千松台子只有 30 户人家，硬逼附近的 30 多村 250 多户并入，没按时搬入的就将房物烧光。温卜寺沟村王小四、王老四、蒋得旺、韩老三在集家并村时留下几个窝棚，被特务告密，日本鬼子要将 4 人活埋，经营救获释精神失常死去。菜园沟刘永富，见自家房物被烧，无法生存，悬梁自尽。大南沟李红眼的儿子，往千松台并村时，见父年老，儿子又小，当天即上吊而死。李得瑞家中 8 口人，弟弟是抗日区干部，他感到被集家是屈辱，并村后又无法生活，服毒而死。1943 年，千松台的于二丑，为全家生计偷跑回住地大西背种地，被敌人发现，把窝棚与人一起烧掉。南沟安存义生活无着砍荆条，勒笸箩，悄悄到口里卖，碰上特务郑天元，以犯了偷越国境罪，被活活打死在石虎沟。范明照老人 60 多岁了到口里沟门准备换点布，返回时遇伪满洲军，被毒打后压到

石头下，老人凄惨呼号，不久死去。“部落”内实行“米谷统治、碾磨封锁”，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不许群众私留和买卖，否则即以“经济犯”“运输犯”“国事犯”罪名严加处罚。在丰滦密白庙子“部落”我原村长王金鼎，仅因摘了自家果树的一点果子就被判为“经济犯”惨遭杀害。生活上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年只配给少量混合面，一盒火柴，半斤盐和 3 尺布，经过层层克扣，到群众手中已所剩无几。有的“部落”每人每年仅得 9 寸布，许多成年人只在腰间围一块布，有的全家人仅有一条破裤子，谁出外谁穿，姑娘媳妇穿不上衣服，只好在家里墙角挖个深坑，有外人来时就蹲到坑里遮羞。“部落”卫生条件更为恶劣，多是几家人挤住在用柴草搭的“马架房”里，房外到处是粪便垃圾，夏日臭气熏天，瘟疫疾病流行，冬日缺衣少食，很多人冻饿而死。1942 年一年，丰滦密每个“部落”最少也有七八十人死亡。“白庙子部落”400 人中，1942 年就死了 160 余人。丰宁县黑河川张家营“人圈”，1943 年冬，一天就死了 28 口人。苏生一家 5 口，儿子被协和会打死，儿媳被汉奸霸去死掉，闺女死了，后来老两口也死了，一家成了绝户。千松台 280 户，集家后 63 户家破人亡，成了绝户。



1941 年秋，日军在平北、冀东长城内外驱百姓“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逼迫农民住进“人圈”。图为平北“人圈”的遗址。

与集家并村同时，是强迫群众修“人圈”。不分男女老幼，一齐出工，迟到一步，轻则挨打，重则丧命。在丰宁县黑河川的三道川修“人圈”，伪警施雪安监工，每天拿着棒子点名，赵德金由于给坐月子的女人熬粥，到的稍晚一点，他本已在架子上干活，监工上架就打，打完推下架子摔断了腰。千松台子高延甫、王英年仅 14

岁，伪警赵延喜嫌他们小，把他们用大石头压在河湾。

敌人还利用查户口，集合“军训”为借口，欺压群众，凌辱妇女。每个“人圈”每天都有许多年轻妇女被蹂躏糟践。黑河川黑达营子孙长山女人来凤子，几次被敌奸污，一次日本鬼子又要强奸她，她吓得精神失常，在雷雨交加的夜间死在罗家湾破庙里。千松台李长起家中 7 口人，集家后挤在一条炕上睡。他刚结婚，特务天天夜晚对着家中长幼奸污他的妻子，家中谁咳嗽一声也不行。女人婚后不到一年被折磨而死，李长起出走坝外。

敌人种种倒行逆施，遭到群众激烈的反抗。而敌人以更疯狂的镇压，制造了血债累累的惨案。在丰滦密联合县境内，敌人制造了快活峪、天桥沟、张家坟、下营、孟思郎峪等惨案。快活峪在滦平县城西南，距营盘 25 里的一个山沟里，八路军十团曾在这一带活动。敌人“集家并村”时，规定全乡只在营盘修一个“部落”（人圈），快活峪不准再有人家，不准种庄稼，不准打柴、放牧，若有人出入“无住禁作地带”，则“格杀勿论”。但快活峪群众大部分躲到亲戚家，或住在岩棚、山洞里，没有搬进“部落”。1941 年 9 月 5 日，于营子日军中队长上村带领日寇、伪警、讨伐队 200 人，闯进快活峪，从沟里到沟外把全村 280 多间房子全部烧毁，骡、马、驴 36 匹，羊 500 多只全部抢去，整个快活峪被洗劫一空。农民张福友，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园，住在马架子的岩棚里，鬼子搜山发现了，把他打死在山上。鬼子发现张福印夫妇和陈学分别住东沟两个岩棚里，把张福印的妻子和陈学打死在山洞里，张福印在向大山里逃跑时，手腕子被打成残废。贫民张家书住在一个岩棚里，他 9 岁的女儿张小冬正在山上拾柴，被敌人发现，打死在阳坡。农民孙怀清到自己玉米地掰几穗玉米吃，也被敌人打死在马架子窝铺里。敌人这次行动，惨遭杀害的无辜群众就有 14 人之多。1941 年 10 月 24 日，搬到古北口河西等地和附近山上住岩棚的群众，回来收庄稼打场。驻于营子的敌人由日军中队长上村校一和伪讨伐队长刘宗功，带领 200 多人，凌晨分两路围剿快活峪，敌人把卢文清、卢文亮、尚文德、尚文福、郭老秏子（14 岁）等 18 人胁迫到小庙前的土坎子上，小金井英一拿着洋刀，逼问群众：集家好不好？八路军在哪里？谁是村干部？这些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对敌人屠刀，坚强不屈，都说不知道。鬼子就用刺刀逼着群众往大坑里跳，跳一个打一枪，群众不往下跳，鬼子就用刺刀往下捅。敌人惟恐跳下的群众不死，又往人堆里扔了两颗手榴弹。身受重伤的尚文德，从血泊中挣扎起来，手指敌人破口大骂：“你们这伙豺狼，今天老子和你们拼了！”边骂边冲向敌人，撞的鬼子一溜趔趄。最后在敌人的枪声中倒在难友卢文亮身上。敌人又对倒下的人“过筛子”，刺刀透过尚文德的胸膛刺进卢文亮的后背，鬼子们看被杀的人都不动了，才在狞笑中滚出沟外。躲在山里的乡亲们在掩埋亲人尸体过程中，发现卢文亮、卢文清、高生印、尚文稿和张荣等 5 人没有死，赶紧把他们背到关里亲友家养伤。在 18 个人中除死里逃生 5 人外，其余 13 人，大的 50 多岁，小的只有 14 岁，都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天桥沟仅有6户人家，是滦平县七道河村的一个山庄。1941年10月28日，丰滦密长城游击队奔赴丰宁开辟工作，路过七道河村，被虎什哈伪警察署长刘汉和于营子日军上村校一、小金井英一率队围攻，长城游击队突围后，日伪军以窝藏“共匪”罪名，把天桥沟6户人家32口人，其中有我游击队为掩护群众而掉队的3名战士，外村来探亲的3人，外地放牲口的一人，胁迫到两间马架窝棚跟前，用机枪扫射，上至70多岁老人，下至临产孕妇、未满周岁的婴儿，全部死在血泊之中，日伪军又放火焚尸，并将天桥其余17间马架窝棚同时烧毁。

1942年4月，丰滦密中心区张家坟村的中共党员、村干部任宗玉、任宗芳、任永刚和自卫队员任宗山、任宗学、韩丙方、孙长瑞等7人，响应政府“回村搞春耕”的号召，由隐蔽地区回村种地，正赶上敌人到这一带“扫荡”，由于山头岗哨未及时发现，7人不幸被捕，被押往四合堂据点。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先是吊打，灌凉水、灌辣椒水、压杠子，四天四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第五天敌人又给送来好饭好菜。任宗玉等7同志大义凛然，不为所动，被捕第七天，被敌人带到栗树沟门早已挖好的7个大坑前，周围岗哨林立，戒备森严。7同志站到大坑前，面对敌人刺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就义。7烈士被日军杀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各地，丰滦密联合县政府追认7同志为抗日烈士，并将张家坟村改名为七烈营，为烈士们树立“不屈不挠”纪念碑，以慰英灵，并教育后来者。

1941年伪军万人对丰滦密的“扫荡”中，曾先后两次将被捕的抗日群众带到下营村集体屠杀，一次杀害群众31人，二次杀害47人。日军还把孟思郎峪17名老幼妇女驱赶到一个场院全部枪杀，并焚尸灭迹。

小西天惨案。小西天位于密云县西部云蒙山区，和冷风甸为一行政村。1944年1月27日早晨，滦平县后山铺伪满警察和棍团100多人，突然包围了小西天沟，将群众全部抓捕，押往后山铺据点。敌人严刑拷打，群众誓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于1月30日将群众押回小西天沟，集体杀害，当场惨死28人，所以，又称“二八”惨案。

在怀柔地区的西栅子、八道河、庄户、交界河、石片、官地一带，日伪宣布为“无住禁作地带”，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了石片惨案和龙潭惨案。1942年旧历正月十四，驻扎在怀柔北部大地据点的伪满军教导队纠集六七百人，向“无住地带”讨伐。从交界河搜捕了杜小漏、石成山、周朝福、石德洪、石天玉、石天才共6个无辜的群众，石片村商显生碰上日寇和伪警察，也没能逃脱厄运，数九寒天，北风刺骨，日寇剥光了商显生的衣服，将他五花大绑，连同交界河的6人一起，拉到石片村一个姓商的人家内，用机枪扫射无辜群众之后，又用火点着了房子，5人当场死亡，商显生身中七弹，石天才中了一弹，幸未致命，敌人离去后，他们从火海中逃出。

1945年3月27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日寇垂死挣扎，纠集了伪警、特务300余人，对八道河、交界河、石片等“无住地带”进行拉网式大搜捕。从山沟的窝棚里

搜捕无辜群众27人,带到龙潭沟的西坝根下,强迫群众站成两行,用机枪疯狂扫射后,大摇大摆地离去,敌人尚未走远,从倒下人群中传出了孩子的哭声,这是常宝林的妻子石氏怀抱一个刚满周岁的男孩,母亲怕孩子哭出声来连累了大家,用奶头堵住了孩子的嘴,憋得孩子透不过气,没等敌人走远,孩子就一下哭出声来,敌人听到哭声又咆哮着返回。又向倒下人群疯狂扫射,制造了龙潭惨案。27人当中当场惨死15人,伤重事后死亡3人。

敌伪强迫"集家并村",人民遭杀害死亡和损失财物是难以计算清楚的,仅以滦平县不完全统计为例:1943年底,全县总户数43 574户,集家的户数25 648户,占总户数的61%;人口245 410人,集家人口128 240人,占总人口的52%。从1940年到1945年,被敌人直接杀害和饿死、冻死、瘟疫病死、逃亡共伤亡20 700人。被拆毁房屋115 416间;抢走马、牛、骡、驴8895匹(头);羊71 765只;猪16 481头。累累的血债,罄竹难书,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难以偿还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千万不应该忘记。

(选自《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1990年第6期)

千古奇劫 一代恨史

——简介兴隆县"无人区"

佟靖功

1940年,日伪当局总务厅下达文件,指令试行"西南国境治安肃正政策"(即制造"无人区",推行"三光"政策)。日伪做了多方面准备,在锦州成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拟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并将在"东满"推行"治安肃正"的汉奸姜全我和日本要人岸谷隆一郎、皆川、户仓胜人等调到热河,充任伪省长、副省长、警务厅长、协和会会长等职。伪热河省警务厅保安科长葛蕒以警正衔充任了伪兴隆县长。葛蕒到兴隆后迅速充实、成立和调入15个县辖警察讨伐队,约5000人,与日伪军配合进行讨伐,烧毁深山区民房,强迫居民移住附近大村,宣布兴隆县进入"非常时期"。

日伪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进行多次搞小集家和局部大集家的尝试,深感兵力不足。1941年秋至1942年,除原驻的日军"八八一"部队(1000余人)外,又调来日

军"山田"队(300多人)。从热河第五军管区调来伪满军第三十四团、第十二团,由吉林第三军管区调来伪步兵第八团,由奉天第一军管区调来伪步兵第三团,由佳木斯第二军管区调来伪步兵第二十四团。伪军约8000人。又从伪通化省抽来围剿杨靖宇将军的省属警察讨伐大队10个,约4500人。加上兴隆县的警察,日伪共集中了2万余人。

1942年4月,伪满当局命令在兴隆推行"治安肃正"。为了"明朗""部落"地带,敌人于1942年1月下旬,即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以后,在大川各村,进行了第一次全县规模的"大检举"。几天之内,逮捕了2000多人。在各地就地屠杀了400多人,其中在兴隆街南土门山沟集体屠杀了200多人。其余均运至东北各地充当劳工,极少有活着回来的。正月二十四日,日伪又在茅山、果园、东峪、老营盘等地搜捕,就地用酷刑致死致残十几人,死在外地60人。茅山东坡20户,被抓去28人,成了"寡妇庄"。

1942年春,日伪秘密策划"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和"集团部落"(老乡叫"人圈")所在地。1942年秋,日伪军警进行了空前的"大扫荡",与八路军、游击队激烈战斗,并推行集家,强迫居民搬进大村。如若不搬,即烧毁房屋,并以"通八路"治罪。入冬后,日伪军多次到"无人区"扫荡,见着居民就杀光,见着房子就烧光,见着财物就抢光。前干涧村,有19名居民被围住,日寇将他们全身扒个精光,用木棍乱打,打得一个个血肉淋漓,然后又把他(她)们装进萝卜窖里,燃着干柴,将19人熏死。小黄崖川,仅小孩被刺刀扎死的就有48人。全县被惨杀的群众数千人。1942年,共牺牲抗日干部100多人,党员200多人,战士1000多人,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率部在沙坡峪长城两侧与敌人激战时英勇牺牲,西部地委书记田野(即赵观民)在石门台村突围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了掩护在小西天上被日伪军追堵的部队突围,八路军第十三团五连王强等三名战士弹尽跳崖,壮烈殉国。

1943年2月初,日伪军在大川各村进行了第二次全县规模的"大检举",逮捕约5000人。在县内屠杀数百名,其余全部送往东北各地充当劳工。2月7日(正月初三)夜,日伪军将潵河川的大莫峪村包围。大莫峪村67户,被逮捕73人,他们被捆到兰旗营"人圈"(警察讨伐队队部和警察分驻所所在地)过堂审讯,有的被火烧,有的被刀砍。农民司俊雨被吊打时挣断了绳子,抓起劈柴把敌记录官打蒙,在越墙时被日伪军赶上用刺刀挑死。日伪军用刑时,梁哑巴怒打敌人,曹清、靳志三人大骂日寇,当场都被刺死。2月12日,被集体屠杀30多人。大莫峪这次死在兰旗营及外地的计69人,也成了"寡妇庄"。揪木林是一个55户的小村庄,被杀死和抓走41人,又成了"寡妇庄"。高台子、灰窑峪是临近龙井关的两个小自然村。检举前,警察分驻所所长杨文宏来通知:某日,"皇军渡边队长来村训话,全村人开会准备欢迎。"届日,群众集合,日伪军突然包围了会场,两村的青壮男人70多人全部

被抓走,均未生还。

1943 年 4 月至 6 月,日伪军倾巢而出,疯狂地搞了四个月全县大集家。村村皆黄,无处不兵,杀人放火,烧房拆屋,白天百里烟,黑夜千山火。将全县 40% 以上的面积划为"无人区",16 万多亩耕地禁止耕种(全县耕地约 40 万亩),毁了 2000 多座村庄,将 111 825 人(占全县人口的 81%),赶进 199 个"人圈"。

日寇设置的"人圈",就是在公路旁的平地上,划上一个大圈子,强迫被扫荡下山的人民在指定的圈子里盖简易房子居住,也强迫平川的居民全部搬进"人圈",命令"人圈"里十岁以上的男女居民一律先修"人圈"墙和炮楼。"人圈"墙宽五尺,高一丈二。围墙设四门,有警察站岗放哨,白天开门,晚上关门。围墙四角设四座炮楼。围墙外设有大壕沟和铁丝网。围墙内,沿着围墙根有一圈巡逻道。"人圈"中有正街一条,纵横交错许多八尺宽的小胡同。每户居民均给三间小房的盖房处,房子宽不准超过 1.5 丈,院子宽只有 8 尺。家家都是厕所、猪圈紧挨着正屋窗棂。

每个"人圈"常驻 10 名至 50 名警察,还把"人圈"居民编成"自卫团"或叫"灭共义勇队",发给每个 18 岁至 35 岁的男子大枪 1 支、子弹 50 发,发给每个 36 岁至 50 岁的男子火枪 1 支、火药 2 斤,发给每个青壮妇女扎枪 1 支。在警察监督下,也让居民们站岗放哨,配合夜间巡逻。夜间,恐巡逻农民睡觉,让手敲木梆,此敲彼应,彻夜不绝。

"人圈"修成后,农民只能凭"居住证明书"在规定时间内出部落门,在租种附近地主、富农的土地上做活。如赶集、串亲迟归者,必须请假挂号。情况稍紧张,就几天不开大门。居民没有一点自由,连夜间都不准关门。警察、特务每夜都挨门清查户口,见着年轻妇女就强奸,见着财物就掠夺,见着猪鸡抓去吃掉。

"人圈"里居民的生活用品,日伪美其名曰"配给"。每年每户洋布 7 尺半,每年每人白面 1.8 斤,每人每月盐 7 两半,每户每月洋火 1 盒,每人每年豆油 4 两。此外,还配给不足挂齿的碱、糖、大米等。这些配给品,经过县、村、甲、牌层层剥皮,发到居民手里连塞牙缝也不够。后来,就这点配给还一减再减。农民没有火柴用,只好用火石打火和保存火种。没有灯油,就用松柴照明,叫油松明子,熏得人们鼻子、眼睛都成了黑窟窿。许多居民,全家只能穿一条裤子出门。抗日工作人员化装进入"人圈",见到妇女同胞常常是在炕上围被而坐或蹲在屋角的坑里,只有 1 个妇女给做饭烧水。原来是 9 口人只有一条裤子、一条被子。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好山河敌侵占,烧杀抢掠修"人圈",死走逃亡家破产,十七八的姑娘没裤穿!"

人们暗暗地从心底发出这样激愤的呼号:"人圈"里的穷人没法熬,租税重、利息高,苛捐赛牛毛,逼死穷人的三把刀!"日本侵略者无法解脱日益加重的经济危机,便残酷地压榨"人圈"里的农民。

首先,粮食租税,全年 6 项:

1. 粮谷出荷粮。每亩上地缴粮 1 斗,每亩下地缴粮 0.77 斗(每斗 30 斤);

2. 民生集谷粮。每亩地缴 1 斗,1943 年每亩缴 1.2 斗;
3. 义仓粮,每亩地缴 1 升;
4. 米谷株式会社粮,每亩地缴 2 升;
5. 地亩捐粮,每亩缴 2 斤;
6. 地亩附加粮,每亩缴 1 斤。

合计每亩地缴粮 78 斤。当时,贫农、中农生活无路,耕作粗放,又遭自然灾害,平均亩产粮食只 80 斤。缴了苛捐,就无隔夜粮了。为了求生,不得不向地主、富农借债。

其次,纳正项税:

1. 民生税,每亩地 2 角 4 分;
2. 地亩税,每亩地 5 角;
3. 地亩附加税,每亩地 2 角 5 分;
4. 门牌税,每户 1 元;
5. 协和会税,每个成年人 2 元;
6. 牲口费,每头驴 4 元,每只羊 7 角 5 分,牛马骡每头 5 元;
7. 出生费和死亡费各 2 角;
8. 宰杀费,每口猪 4 元,每只羊 2 元;
9. 材料费,每亩地 2 角;
10. 兴农合作社股金每户 1 元;
11. 义款每户 6 角。

再次,杂项税,主要是“慰劳”日伪军、伪官吏的:

1. 送菜,每甲三天一次,每次 50 斤至 100 斤;
2. 送柴,每甲三天一次,每次 500 斤;
3. 送猪,每甲每月 3 至 10 口,每口猪至少杀肉 80 斤;
4. 送鸡,每甲每月 5 至 20 只;
5. 送礼,宪兵队长结婚、寿辰,每甲 70 元;警察中队长以上官员,每甲 30 元;
6. 团员费,每甲经常派 2 名“自卫团员”到村公所听差,每月需 150 元至 200 元;
7. 棍团费,每甲抽 10 人专门受训,每月需 100 元;
8. 劳工费,每甲每月抽 10—300 人,需 200 元;
9. 村甲职员费,给每人每月 100—150 元。

“人圈”里的居民,很快出现了“四多”现象:即讨饭的多,病死的多,吃糠咽菜的多,披麻片、光肩膀、露乳房的多。

在“人圈”里,警察、特务时时监视居民,巧立罪名,任意抓人入狱。第一、见到两三人结伙闲谈或夜间点灯唠嗑、家中有茶缸、小铁锅、灰色和草绿色衣服、衣服超

过五个扣子、布鞋超过两双、出外做农活日落后归圈等现象,皆以"通八路"罪名列为思想犯抓去入狱;第二、家中存有中华民国书籍、书写的抗日语句、搜出无证明书的人、枪支弹药、八路军粮票等,皆以共产党员列为政治犯逮捕入狱;第三、家中存有大米、白面、纸烟、手电等物品,皆列为经济犯入狱。

抓进监狱,日伪制造出许多惨绝的酷刑:

①"断食空腹"。几天内不给饭吃;

②"倒栽莲花"。头朝下活埋"犯人",日伪军看着被埋人两腿露在外面乱挣乱踹,就拍手大笑;

③"军犬舞蹈"。让一群军犬一纵一跳地反复扑上去,将人活活咬死;

④"滚绣球"。把人衣服脱光塞进一个钉满钉子的木笼里,把人滚死;

⑤"电磨粉身"。用特制的一种电磨,把人磨成肉酱;

⑥"枪戳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叫新兵用刺刀扎,说是练武试胆;

⑦"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绑在一起蜷曲着,投河里或池里淹死;

⑧"开膛取心"。双庙据点的日军中川曾吃了50多个人心;

⑨"钢针绣骨"。用大铁丝往手指头上或头顶上扎,扎进5寸至1尺深。

此外,还有"皮鞭沾水"、"辣水涨肚"、"熏烧活人"等等毒刑。抗日政府做过一次统计,1942年1月至1943年12月,全县被日寇"检举"入狱死亡的达1.2万多人。1943年"人圈"里普遍发生了伤寒病等瘟疫,死亡6000多人。厂沟人圈700人,两年死亡265口人,占总人口的28%。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

1944年,德、意法西斯战争失利,日本侵略者在东方战场也陷入被动局面,于是加紧了对"满洲"的控制,首当其冲的是在西南国境线上彻底摧毁"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控制199座"人圈",半年内,日伪策划了两次"大检举"。

1944年2月,日寇嗅到在"人圈"内并未切断广大人民群众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兴隆日本宪兵队曾向锦州"西南防卫"司令官呈报情况说:澈河流域一带(即迁遵兴县八区)居民"完全当八路匪、通八路匪,没有好人"。因而,伪锦州军事特别法庭人员于旧历正月初二日,秘密到达澈河川。初二夜,大批日伪军警在全县"人圈"里逮捕2000多人。在县内各地屠杀几百人,其余全部被送往东北充当劳工。

1944年6月间,日伪军警将所有"人圈"内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干部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逮捕,据统计约500人左右。在野蛮拷打和污辱后,又全部运往东北充当劳工。

从1944年1月开始,日伪以1万多兵力"扫荡"五指山区、横河和驴儿叫根据地,又以5000兵力"扫荡"大、小黄崖根据地。日伪军带着帐篷,住在山上,搞"铁壁合围",扬言要把"无人区"的每块石头都翻过来。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虽然抗日军民英勇抗击,仍牺牲300多人、冻饿死亡1000多人。中田村被围攻11昼夜,被屠杀274人。1944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军率李国、朱盛林讨

伐队"围剿"成功村,将被围群众剥光衣服,有的剜心挖眼而死,有的剜去生殖器。李存隆妻被剖腹剥去胎儿,贾成富被一块一块地割去身上的皮肉,再让洋狗撕裂,活活地被折磨而死。全村被惨遭杀害31人。成功村人民化悲痛为力量,誓死为同胞们雪恨。他们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50多人,打死打伤60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18岁的共产党员傅春抢救了60多名乡亲的生命。当最后自己被敌人围住时,拉开手榴弹炸开自己的胸膛。黄土坡村孙连举妻,为了不暴露集体目标,将怀里哭叫的小儿毅然掐死。仅在三个区里就有11位母亲为了大义舍了儿女的生命。黑河川有一位怀孕的妇女,为了不影响集体行动自己躲进深山密林,在冰地上降生一个婴儿,自己接生后起名叫"冰儿",借以铭记奇苦浩劫,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日伪军围山时,如果捉到年轻妇女,即抓回去奸污,她们宁肯战斗而死,也不愿屈辱偷生,全县守节而死的青年妇女不下千人。

日寇在兴隆大肆制造"无人区"的3年里,共屠杀15 400人,抓走1.5万人,其中除在本县集体屠杀约1000人外,其余全部被送往东北和日本内地充当劳工,几乎全部死在外地。3年间,被烧毁民房7万多间,抢走大、小牲畜3万多头。全县1941年统计有16万余人,日寇投降后统计只剩10万余人,合计被杀害、抓走、监禁、疫病、冻饿等非正常死亡5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兴隆人民用热血撰写了一代非凡的历史,让我们后来人永远从中记取血的教训。

(选自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

承德县"集家并村"及"无人区"情况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按:这份材料是根据伪热河省总务科于伪满康德十一年(1944年)调制的承德县行政区划图和有关"集家并村"资料,经与现地名核对整理而成。

一、街村名称

全县共1街23村。

承德街(现承德市)。

全县23个村:两家村、汤泉村、二道河村、头沟村、高寺台村、三沟村、老爷庙村、双峰寺村、庄头营村、干柏河村、六沟村、野猪河村、砖瓦窑村、上板城村、新杖子村、安匠村、塘头沟村、下板城村、上谷村、小寺沟村、暖儿河村、全宝河村、车河口村。

二、警察署及其所属分驻所

头沟警察署下属:高寺台、两家、东三十家子、双峰寺分驻所。

三沟警察署下属:六沟、野猪河、五道河、老爷庙分驻所。

安匠警察署下属:小白旗、新杖子、刘杖子、砖瓦窑分驻所。

下板城警察署下属:上板城、上谷、小寺沟、大石庙、孟家院分驻所。

流河口警察署下属:八家、北台分驻所。

三、"部落"名称

全县共448个"部落"。

两家村21个"部落":刘家沟、西三十家子、杨树林、小庞家沟、上台子、碾子沟、庞家沟、横道子、小庙子、六全地、山嘴、东沟、鹰手营子、岗子、小杨树沟、郑栅子、齐家营、李家营、南沟、两家、四全地。

汤泉村19个"部落":湾子、营房、东三十家子、坡西沟、窑沟、南山、老爷庙、木匠沟门、平台子、陕西营、大营子、转角房、梁东、孤山、烧锅营、汤泉、朱家营、椴木沟、头道河子。

二道河子村27个"部落":十一道河子、十道河、九道河、石虎沟、金杖子、上五道河、仓子、石子沟、下五道河子、三道河、上二道河、二道河、三家、北杖子、山神庙、大山嘴、甲皮山、窑上、唐杖子、致和堂、榆树底、岗子、白庙子、下局子、下院、上院、荒地。

头沟村20个"部落":大营子、平房、头沟、三块地、瓦房、上仓子、上河北、下河南、兴隆山、东南荒、北台子、南沟、南梁、唐杖子、陕西营、郭杖子、下河口、张三营、东营子、乔杖子。

高寺台村24个"部落":北沟门、二块地、东双庙、西地、营房、头块地、高寺台、马家营、纪家营、龙潭、王营子、车家营、三岔口、兴隆街、南观音堂、北观音堂、东黄土坎、山湾子、甸子、西黄土坎、李家营、下南山、新房子、上窝铺。

双峰寺村8个"部落":大庙、老西营、三道河子、双峰寺、小东沟、干沟子、头道窝铺、贾家营。

老爷庙村23个"部落":梁底、平台、黑山沟、西二沟、西北沟、老烧锅、双庙、英

杖子、肖杖子、小南沟、黄杖子、老爷庙、新兴、南沟、仓子、大营子、平房沟门、曹碾沟、墩台、河南、三棵榆树，小河西、大店。

三沟村 11 个“部落”：解家营、拐子沟、大庙、岔沟门、西大道、房身沟、北杖子、三沟、东庄、朝梁沟、苏家营。

六沟村 31 个“部落”：北孤山、房身沟、屈家沟、梨树沟、北水泉、榆树沟、北沟、小老爷庙、平台、四沟、上坡子、西沟、河北、墩台、东山嘴、东水泉、东窑、阎家沟、牛旺沟、中六沟、六沟、后五沟、西窑、前五沟、南窑、旗杆沟、郭杖子、刘杖子、下杖子、河东、南沟。

野猪河村 22 个“部落”：七家、孟杖子、跳沟、帽灰石、大葛杖子、药王庙、毛兰沟、河西、六道河、南孤山、石灰窑、山湾子、野猪河、沙金沟、柳树营、小范杖子、梁杖子、大范杖子、西山、河东、磨石沟、二道河。

上板城村 18 个“部落”：卸营、边家沟、三家、西大窑、上台子、秦家沟、松树沟、周营子、小上沟（陈家沟）、西大庙、三道湾、山嘴、白河南、上板城、三道河、老爷庙、大槟榔沟、黄旗湾。

干柏河村 15 个“部落”：东平台子、西平台子、三清观、骆驼山、前片石、小房沟、刘家营、小北营、小南营、漫子沟、大营子、孟家院、前营子、毛杖子、扁担沟门。

庄头营村 10 个“部落”：焦家庄、陈家沟、双庙、袁家庄、马家庄、大石庙、大营子、太平庄、东营子、西营子。

砖瓦窑村 9 个“部落”：北地、冯家营、郭家营、横水流、砖瓦窑、秋窝、上栅子、三道湾、下栅子。

新杖子村 13 个“部落”：鹰手营子、和尚沟、涝洼、双庙、两益城、苇子峪、新杖子、小营、四方营、东营子、南台、二道营、孟家庄。

安匠村 19 个“部落”：四道河、下旗、安匠、双碾、黑沟门、两间房、大窝铺、河东、河南、湾子、北台、刘杖子、干湾子、胡家营、大甸子、小西营、金厂、山神庙、陈庄。

塘头沟村 9 个“部落”：一间房、新民庄（顺道地）、塘头沟、德惠堡（八道沟）、小白旗、三岔口、太平营（涝洼）、大谷道，康乐庄（榆树底）。

全宝河村 9 个“部落”：北台、三岔口、王家庄、梓椤树、北湾子、大营子、石恋子、南洼、北营子。

车河口 18 个“部落”：三岔口、三道河子、大坡、西洼、车河堡、乔木梁、东化鱼沟、大连坡、新道、天杖子、石佛、流河口、车河口、大杖子、王杖子、高杖子、邢杖子、新立屯。

暖儿河村 23 个“部落”：北杖子、杨树底、大营子、徐杖子、北湾子、何杖子、满杖子、西北沟、中杖子、二道河、柳树底、料北沟、深水河、梓椤台、朝梁根、叶杖子、三岔口、八家、东荒、前窝子、东炉、大彭杖子、西庄。

上谷村 31 个“部落”：屈家沟、赵家沟、西坎、阎杖子、郭杖子、马杖子、杨树沟

门、娘娘庙、上院、大杨树沟、小杨树沟、煤窑山、上谷、吴杖子、朱家营、河南、赵家院、西南庄、良杖子、榆树沟、柏窑、下杖子、干沟子、干沟门、兰窝、黄杖子、料北沟门、松挠沟、于家院、二道沟、后松树沟。

下板城村36个"部落":石洞子、赵家庄、王杖子、甲山沟门、上台子、吴家厂、河南、山嘴、张家店、南营子、小狼窝、大狼窝、头道沟、小郭杖子、积余庆、中磨、乌龙矶、西台、柳树底、北湾子、大杖子、瓦房、胡杖子、下板城、东庙、杨树林、大平台、杨家庄、朝梁子、路通沟门、干沟门、小平台、北圈、台坎、辛家庄、老梁沟门。

小寺沟村15个"部落":胡杖子、水泉、河沟子、雅图沟、大庙、后甸子、佟杖子、仓子、下杖子、南三家、姚杖子、小寺沟、大窑、单家店、袁家店。

承德街17个"部落":狮子岭庄、亲人庄、正义庄、宝喜庄、狮子园庄、罗汉堂、殊象寺庄、狮子沟、二道河、棒槌山庄、喇嘛寺、红石峦庄、雹神庙、康宁庄、太平庄、共荣庄、水泉庄。

四、"无住禁作地带"

在全县23个村内,有9个村内部分地区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

安匠村:分布于现安匠公社[①]的岭沟、黑沟、大窝铺沟里,金厂公社的陈庄、南大洼、金厂,小西营的一部分,窄道沟大部分,刘杖子公社的胡营、松挠沟、北台沟里,一间房公社的六道沟、后沟各一部分。

塘头沟村:分布于现滦平县涝洼公社的南三道沟、二道沟、五道沟、涝洼、大龙潭,两间房公社的大栅、大石门,承德县东小白旗公社的乱水河、八道沟里、榆树底、白旗沟里。

新杖子村:分布于现刘杖子公社的孟家庄、二道营南部,新杖子公社的苇子峪、两益城、新杖子沟里,老爷庙公社双庙沟里。

全宝河村:分布于现大营子公社的大营子、北营子、北湾子、椁椤树一部分和八卦岭全部,柳树底公社的王家庄、三岔口、北台、西台、柳树底、北湾子、瓦房沟里各一部分。

上板城村:分布于老爷庙公社大槟沟、房身沟,上板城公社白河南沟里。

车河口村:分布于现兴隆县车河堡、解放、大杖子、孙杖子等公社。

暖儿河村:分布于现满杖子公社料北沟、柳树底、满杖子、大梁根、徐杖子等南部山区,八家公社南北山区,现宽城县的小前坡峪、洪杖子、于杖子、塌山、化皮留子、缸窑沟等公社山区。

---

① 此文系于1982年调查整理,当时基层行政单位分村建制没有恢复,人民公社和大队建制尚有,故有公社之称。

下板城村:分布于乌龙矶公社老梁沟门,大平台公社小平台沟里,武场公社的狮子沟、石洞子。

二道河村:分布于现太平、下院、十一道河、五道河等公社东南部山区。

(选自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编委会编:《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1996 年)

日军在宁城制造的“无人区”

周凤玉　胡士秀

一

宁城的“集家并村”,是从 1942 年开始的,重点把黑里河、南北厂子深山中散住的居民驱赶到大村落里居住,群众称之为“小集家”。大规模的“集家并村”是在 1943 年春至 1944 年秋。“集家并村”的重点是:四道沟、大营子、西泉、八里罕南北厂子、热水、存金沟和三座店山里,这些地带都修建了围子;头道营子、甸子、石佛、五化、山头、榆树林子等地的山区也进行了“集家并村”,大部分“部落”没修建围子;马架子、巴素台等山区是 1944 年开始“集家并村”的,没来得及修围子。

据调查,宁城地区共修“部落”围子(当地人称“人圈”)75 个,没修围子的“集家”点 78 个,共“集家”7200 户,毁自然村 630 个。

“集家”地点一般选在大川靠近公路的地方,便于日伪统治。在推行“集家并村”政策时,首先做欺骗蒙蔽性的宣传,说什么共产党是“共匪”、“共产共妻”;说“集家并村”修筑部落是为了达到“民‘匪’隔离”、“王道乐土”之目的。

“集家”开始时,敌人采用先驱赶群众修“部落”然后搬家的做法;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他们便先驱赶群众搬家后修“部落”。在强迫群众进入“部落”时,日寇及其爪牙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有因抗日工作需要或家里有病人、怜惜财产不肯搬家者,敌人先是组织“镐头队”扒拆房屋,后来干脆以火焚之;有的在房屋被扒被烧后,仍不肯搬进“部落”,又在原房框子里或到深山里搭起马架房居住。敌人对这样的人除用打骂手段强迫他们搬入“人圈”外,则以“通匪”罪名将他们抓捕入狱或打死。

“部落”的围墙,一般 4 米多高、1 米多宽,也有 1.5 米宽的。围墙基础用石块,

上面有用泥和秫秸垛的,也有用土打的,也有下层用土打,上面用泥垛的,互不一致。围子门最多开4个,也有开1个的,也有开1个大门再开1个小轿门的,不尽一致。

围子门旁设岗楼(也称警卫室),四角设炮楼。在门口附近搭高架子设瞭望台,上面有鼓、钟之类的报警设备。围墙四周都有泄水的阳沟。最大的围子占地近百亩,一般的五六十亩,最小的也占地二三十亩。

二

"集家并村"后,敌人对"部落"的统治是非常严密和残酷的。一般的"部落"设警长一名、警察十四五名(部落警),负责"部落"内的治安。"部落"内重编甲牌,户口重新登记,15岁以上的人发给《证明书》(良民证)。《证明书》必须随身携带,对查无《证明书》的人,便拘留审查。围子的大门,整日有人站岗,日出开门,日落关门,不许早出和晚归。夜不归宿者,必须请假。未经批准,夜不归宿者以"通匪"论处。岗楼上日夜有人守卫,设有流动岗哨。还把"部落"内18—40岁的男女都组织起来,有的发给一根镐把(群众叫"棒子队"),有的什么也不发,只要一有情况,以敲鼓或打锣为号,都得持械而出,有镐把的拿镐把,没镐把的拿棍棒,还有的什么得劲拿什么,如烧火的拿掏火耙,捞饭的拿笊篱,切菜的拿菜刀等。按照部落警的指挥去围追八路军或抗日工作人员。为了检验群众是否听从指挥,敌人经常搞这样的演习,不出动者或不持械者,皆以反满抗日论处。有时,敌人假冒八路军去叫门,如果开了门,他们就说私通八路军,非抓即打。后来人们摸清了敌人的规律,敌人冒充八路军来,就狠狠地揍他们一顿,还会受到表扬。

在"部落"里,敌人安插很多特务秘密监视人民群众的行动。夜间,如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唠嗑就被逮捕审讯。在谁家里发现茶缸、手电筒、小铁锅、灰色或黄色衣服之类的东西,就按"嫌疑犯"论处。若在谁家发现枪支弹药、八路军的粮票等,均按"国事犯"严惩。八里罕南厂子辛家窝铺"部落",由于特务张凤山侦察报告,于1943年腊月三十夜间,我地下工作人员李华,伤员李万以及掩护他们的代云宽、朱俊德、张均、米俊富、李清河、二老吴、王老二、姜连朋的父亲等10人被押往承德,其中除有4人在途中侥幸逃跑外,其余6人全部被杀害了;又如四道沟姜廷怀、姜鹤令(姜廷怀长子)、杜永安、安彬、田士坤、于德明、于增、郐文合、朱德福等人于1944年正月初六早晨因与八路军有联系,被以"国事犯"罪名逮捕入狱;于增当场被打死。姜廷怀在阜新监狱被折磨致死,其余的人被判刑,刑满后释放;还有八里罕北厂子李文奎因给八路军送过信,在1943年9月被宪兵侦知,逮捕后即遭毒打,不到半月死去。

三

“集家并村”后，几个村甚至几十个村的群众搬进一个村子。少数有亲戚关系的可以寄人篱下；部分有条件的搭个马架棚居住；大部分，特别是那些房屋被烧掉的只能弄点榛柴围个圈栏住，不论男女老少，是病是娩都合住在一起。牛棚、碾房、场院屋、街头墙角都是住宿的地方。夏天，任凭雨淋日晒；冬天，任凭雪打风吹。

“部落”里的老百姓，不仅住处困难，而且更缺吃的。原来的大部分土地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不准耕种；租种点土地，打的粮食大部分要交给地主，即使这样，还要交“出荷粮”（粮干）。种大烟要交“烟干”（种大烟的交烟土除去水分，老百姓叫“烟干”）。有土地的交亩捐，有牲畜的交牲畜税，有车的要交车牌税，各家都要交门牌税。除此之外，地方上还摊派保甲费，供自卫团开支。生活必需品布、盐、火柴等奇缺，市上根本没有卖的，只靠官方“配给”，还多数被地方爪牙克扣，有的十八九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西泉哈拉卜荷沟的杨福及其母亲并到李家营子，因没房子住冻死在炮楼下；西泉土豹沟的李树才，也并到李家营子，因为衣食无着，父亲冻饿而死，后来把妻子卖掉，数九寒天趴在猪身上取暖；四道沟二道梁子路文明一家三口，妻子没衣穿，腰中只围条破麻袋片，全家一条被子也没有，一间破马架房，还被烧掉，只好用榛柴搭个小窝铺，铺点莜麦秸，乞讨度日。一天夜间，寒冷、饥饿、疾病就夺去了全家三口人的生命；八里罕南厂子一个姓张的给姓秦的富农扛活，1944 年秋由于劳累饥寒而染重病，一天晚上，秦家把他抬到围子外的炮台根丢下，还没断气，就被狼狗吞噬。当时他的儿子才 13 岁，也给秦家放羊，哭喊着要到围子外看他的父亲，自卫团不许，还毒打了他一顿；马架子北台子的贺功，并村到娘娘庙，住在徐瑞希的场院屋，他的大儿子叫大丫头，二儿子叫跟丫头，跟丫头傻点但能干活。因为生活无着，他们夫妻认为都活着也是一起受罪，死一个少个累赘。在全家痛哭声中，叫大丫头用石头将跟丫头砸死。后来，贺功饿死在家里，贺功老婆到四十家子乞讨，大丫头逃荒远去，不知下落……

夏季“部落”里遍地泥泞，污水粪便到处皆是。苍蝇、蚊子等害虫恣意肆虐，伤寒、霍乱、痢疾流行。每至传染病高发季节，“人圈”里天天都得往外抬死人。

当时的“人圈”，就是人间地狱。

四

日寇随着“集家并村”政策的实施，在我县黑里河山区、存金沟沟脑、八里罕南北厂子、马架子、巴素台等地划了“大伪满洲国无住禁作地带”——“无人区”，“无人区”一般是被“集家”者的土地和山林，这里以黑里河的“无人区”最为典型。南

至光头山，北到王营子沟里，东到西打鹿沟，西至承德围场境内，纵横百里之外。"无人区"内：一不准耕作；二不准放牧；三不准砍柴；四不准夜宿。日伪岗哨在瞭望台上日夜监视，还有大批日军和讨伐队巡逻。凡遇人畜进入打死勿论，凡有烟火升起之处，就是日伪军攻击的目标。

划归"无人区"后，所有的东西统统被视为违禁物，房子被烧掉，牲畜、粮食衣物被抢走，人遭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 1 万多间房屋被烧或扒掉；5 万多亩耕地荒芜；上万头大牲畜被敌人抢去杀死吃肉或死掉，粮食及其他物品的损失无法统计。"无人区"内，从"集家并村"到日寇投降共有 4000 多口人被打死、病死、冻死或饿死，其中有 200 多户死绝。西泉打鹿沟未"集家"前有 260 户、1600 口人、1100 间房子、2872 亩耕地、34 匹骡马、510 头牛、120 头驴、1400 只羊。1945 年日寇投降后，仅剩 183 户、720 口人、360 间房屋、75 亩耕地、44 头牛、18 头驴、200 只羊。减少的 107 户有 20 户死绝，减少的 879 口人有 420 口死掉，其余逃往他乡。据建国初期调查资料记载，大营子的道须沟、上拐、西泉的范杖子、东打鹿沟四个村烧毁或拆除的民房为 1127 间，被抢走或打死的牛 271 头、骡马 17 匹、羊 764 只、驴 41 头、小鸡 6 麻袋，杀、病、冻、饿死者 799 人。

八里罕南厂子辛长河一家 6 口人，辛长海一家 3 口人，赵宏岐一家 7 口人，齐五一家 3 口人，赵春祥一家两口人，辛长春一家 4 口人，齐六一家 1 口人，共 7 户 26 口人死绝。

大营子道须沟的任富有、郎福才因为誓死不进"人圈"被活活打死；大营子道须沟三道沟门刘金贵是"部落长"，因修不上围子被打死；巴素台长胜村孙占武，因一间房没拆掉被怀疑为"通匪"，被抓到宁城（小城子）警察署严刑拷打，释放后回家一看家里 3 口人死光。西泉郭杖子一天死过 32 人，打鹿沟门 1943 年一冬天就冻死 82 人。

（选自《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

青龙"无人区"考略

中共青龙县委党史研究室

侵华日军在青龙推行"无人区"政策的罪行罄竹难书，其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程度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一)野蛮的"三光"政策

当时,青龙全县共有 1686 个村庄,其中 1219 个村庄被确定为"无住"与"禁作"地带,勒令拆迁。对这些地方明确规定:不准住人,不准存放物资,房子必须彻底拆除,特别是其中 300 个村庄、1000 多平方公里面积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除不准住人外,还规定不准种庄稼,不准进人人畜,如发现人畜,格杀勿论。

日伪为推行这一惨无人道的政策,曾组建和派驻大批反动武装,其中日本守备队 750 多人,伪满军一个旅 2000 多人,日本宪兵队 30 多人,警察讨伐队 13 个大队 2000 多人。此外,还有协和会青年行动队、警察署、警察分驻所武装警察、武装自卫团等共 7000 余人。这些反动武装,根据日本关东军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命令,对"无住禁作地带",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用枪弹、刺刀、烈火强迫百姓迁居、拆房,清室空野,穷凶极恶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1. 烧光

当时全县共有各种房屋 96 096 间,其中绝大部分因为坐落于"无住禁作地带",被强令拆迁。然而,世代居住的家园,怎忍轻离!可是日本法西斯命令军政警宪统一行动,带着汽油与火种,分赴各地,进行全县性的大焚烧。凡是被划作"无住"与"禁作"的地方,村村火光起,处处浓烟滚,结果一个个美丽村庄,几天内变成了废墟,有的村庄一次没烧净,又烧第二次,有的烧了三四次、十多次。新城沟乡花果山村,不仅一次烧掉房屋 400 多间,还将数十户存放柜、缸、锅、杂物的一条山沟点燃,火光冲天,山石直响,大火一直着了数日,至今焦土可见。1943 年 9 月 18 日,日伪军纠集 5000 余人,分 10 路进入花厂峪扫荡,山头、谷口处处设卡,11 里长沟处处有兵,连续焚烧、扫荡 17 个昼夜,数百间房子烧得一间未剩,牲畜、物资多成灰烬,一位 60 多岁老人也丧身于火海。

1944 年 1 月 12 日,数百日伪军扑向沙河,驱赶群众,焚烧房屋。全村 3 个庄 600 多间房,一夜之间化为火光与青烟,其中损失驴 49 头、猪 200 多口、羊 300 多只、粮食 1.5 万多斤。从此,一条七八里的长沟变成荒沟,三个自然村变成了三片焦土。

据统计,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中,全县共拆烧房屋 87 096 间(占总房屋的 90%),烧掉粮食 1000 多万斤,烧掉其他物资无计其数。

2. 杀光

日本关东军曾明确规定:凡进入"无人区"者,不问任何理由,一律枪毙。所以吸血成性的日本侵略军在"无人区"讨伐时,更是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

1942 年冬,日伪军在二道沟讨伐时,就用刺刀挑死农民周起祥,用汽油烧死曾好。1943 年秋,日伪军数百人再次进入二道沟,刀挑潘玉清、潘玉来,枪杀张玉海、桑利、张万海,抓捕刘青云、李海、李贵于他处杀害。连年过八旬的赵云才老奶奶、柴印的老母,都做了日军远射的活靶子,当场毙命。

1943年初秋，日伪军400多人在崖丈子扫荡时，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在田里射杀农民崔景旺，刀砍李福全及不满10岁的儿子——秃头，用刺刀扎死崔连山的哑巴妻子，将农民崔胜荣、潘老二抓到北马道挑开胸膛。仅这一天，就在崖丈子杀了7人。

1943年夏季一天，日伪军数十人去花厂峪讨伐，在五道岭一个叫水泉洼的地方，发现农民吴永富父子在耪地，日伪军多人将其围住，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刺刀将吴永富的儿子刺死，当吴永富试图逃跑时，被日伪军的枪弹打中而丧命。在五道岭发现刘全友一家人藏在房克郎里，日军将全家1男4女皆抓走，除刘全友1人跳崖逃脱外，其余4人（全友妻、2个女儿、1个侄女）全遭杀害。

1943年夏，日伪军数百人到集家区杨丈子扫荡时，首先将群众包围起来，然后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用刺刀将农民陈学文挑死后，以火焚尸；将农民夏永生、陈海架在两火盆中间活活烤死；杨贵、杨启、郭来头钻进地窖，被日军用烟熏死；梁顺刚进门的妻子，被日军抬至避人处，遭到轮奸。

1943年8月，日伪军2000多人，在花果山扫荡，用刺刀挑死年近八旬的老人张堂和农民樊克增、樊和。将74岁的韩国清从一丈五尺多高的墙上推下活活摔死，将吴全伶兄弟5人抓到土胡同活埋。

据统计，全县在敌扫荡中被杀者达7200多人，仅花厂峪就死了83人。

3. 抢光

在"无人区"除了烧、杀之外，凡是有用之物一律被抢光，粮食、牲畜、衣被、木料、金银……都是被抢掠的对象。1943年，驻牛心坨的日伪军在讨伐时，从"无人区"抢掠大批牲畜、粮食、木材、鸡、猪与瓜菜等物资。牛心坨警察署竟将小蔡峪民房拆掉，用拆下的木料盖了警察署的营房，留下了日伪抢掠的铁证。

1943年秋，日伪军在花果山讨伐时，其中一次就抢走物资1000多驮，赶走绵羊1000多只。日伪军随意宰杀食用，瘦小的绵羊又以每只80元伪币出卖，中饱私囊。

除了粮食、衣被、牲畜之外，成熟的庄稼、瓜菜也大肆抢掠。据调查，1943年一年日伪军就从花果山割走庄稼1500余驮，仅农民蒋安一家一个山洼的谷子就能收10石。日伪当时的原则是：能拿则拿，不能拿则烧，不能烧的则砸。凡是在"无住禁作地带"发现的一切物资，如锅、缸、柜、柴草、木料，一点不留，甚至连碾子、磨、石槽等都要破坏掉，水井也要填进石头。

据统计，在日伪扫荡中，全县被抢走牲畜12.2万余头，抢走衣被等物资折小米5.4万多斤。

日军在青龙"无住禁作地带"不仅烧、杀、抢，而且蹂躏妇女、凌辱老少、践踏中华民族之文明传统，其罪行实在令人发指。

1943年秋，数千日伪军在花果山扫荡时，从山上搜出7名青年妇女和一些儿童，凶狠毒打之后，将他们的衣服扒得精光，其中一名19岁的妇女，仅有一兜肚遮

羞,还被扯下;一刚结婚的青年妇女,因脚上一只袜子未脱,就被打得翻滚。这些一丝不挂的妇女和孩子们,被数百日伪军围在中间,一会儿强迫站、一会儿强迫跪、一会儿强迫扭,百般凌辱,而这群野兽般的日伪军却在四周狂笑。

1943 年农历五月初四,日伪军在"无人区"石门子、下窝铺、荞麦岭一带农田里围住正在干活的 40 余名男女农民,先是将青年农民张兆顺、张全、张旭按在地上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将这 40 多名男女农民的衣服扒光,分男女两排相对站立,强迫他们做各种动作,稍有不从,即拳打脚踢,枪托击身。青年农民张兆祥的妻子将一盛饭的铁罐扣于怀前,竟被一日军用刺刀挑飞,男青年程玉宽用草帽遮挡,也被踢掉,日伪之兽行世所罕见。

(二)残酷的政治统治

日军在"无住禁作地带"和"部落"里的法西斯统治罪行罄竹难书。

1. 修"人圈"、造囚笼、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

日伪军用刺刀与棍棒将山沟小岔的居民赶到便于统治的指定地点,强迫修围墙、筑炮楼、建"部落"。围墙一般高一丈二三尺,宽三四尺,墙上留有垛口,四角有碉堡。群众称之为"人圈"。每个"人圈"留两三个大门,门上有岗楼,岗楼上有自卫团或警察站岗,严格盘查行人。一般是早上日出三竿放行,太阳西坠锁门,遇有"敌情",十天八天不开门。夜间不准出入,违者从严处罚。原王厂乡公厂部落农民刘春阳,因出围子没有请假,就被自卫团长打得死去活来,鼻口冒血。康丈子部落康自祥,出围子种地,因晚了没放回,第二天却以私通八路的嫌疑罪被打得三个月不能下炕。1943 年冬,木头凳大丈子部落贫困农民范庆有,白天外出讨饭,回来时门已上锁,虽经苦苦哀求,仍未开门放入,结果这位身上无衣,肚里无食的善良农民竟活活冻死在荒野。

2. 层层建立反动组织,严密监视、管制"人圈"里的人民

当时县、村、甲、牌、军、政、警、宪各种反动组织多如牛毛。村长、助理、司计、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以及每个自然区为一牌的牌长等各级伪职员比比皆是。在一些重镇、要地,都设有警察署、警察分驻所、警防所,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伪满军讨伐队、协合会青年行动队等,有的一部落设一机关,有的一部落设数机关,例如二道沟门部落就驻有警防所警察、特搜队、巡防队、讨伐队、武装自卫团等反动武装人员达 300 多人。另外,在部落内,凡 18—35 岁的男青年均编入基干自卫团,36—50 岁的编为一般自卫团,有的部落发枪,为武装自卫团;有的部落自备扎枪或棍棒,为普通自卫团。凡是被纳入自卫团的,即不能自由行动,不经批准不能外出,以此来控制青壮年。

3. 严格户籍,发放《证明书》,约束人民的活动

日伪下了很大力量登记调查户口,然后强迫群众将全家人按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等项写于木牌上,挂在门旁,以备随时查点。而日伪人员多借此出入良家,为

非作歹，勒索财物，奸污妇女。二道沟门部落，日伪军多人借机对一年青寡妇轮番凌辱，这个妇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含恨弃子，投奔他处。

更为恶毒的是，为了限制人民的正常活动，日伪强迫成年男子领取《证明书》。《证明书》上有姓名、年龄、职业，并按上本人指纹、贴上本人照片，串亲、赶集均要携带，就连下地也不能离身，否则就被说成是“八路匪”、“嫌疑犯”，轻者棍棒加身，重者坐牢丧生，因丢失或忘记携带《证明书》而挨打受刑者至今尚存许多。

4. 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

日伪用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来维持法西斯统治，哪里有抗日活动，哪里就有人惨遭屠杀。从1939年以来，长沟、二道沟一带燃起抗日烈火，日军就在这一带实行大规模逮捕和屠杀。1942年5月，驻华尖日军和牛心山伪军数百人一次从大转、二道沟、崖丈子抓捕了42人，这些人一部被杀于承德，一部被杀于丹东，幸存下来的仅有1人。1943年初，日伪军又扑向长沟，仅一个晚上就从刘丈子、郭丈子等地抓捕52人，其中杀害23人。

尤其恶毒的是，日伪在“人圈”里安插密探，发展特务，暗地监视群众的抗日活动，什么“思想不良”、“反满抗日”、“私通八路”、“行为不端”……都逐级上报，然后分期分批地逮捕、屠杀，这就是大检举。

检举，有局部小检举，也有全县统一行动的大检举，有一次抓人十个八个的，也有一次抓几十、几百的，常年不断。1942年以后，仅全县性的大检举就有三次：1943年8月13—15日，全县范围的大检举，一次抓1000多人，仅冷口警察署管区就抓捕了50多人。曾丈子一个部落抓走12人，丁丈子连续抓了三次，抓走27人。卧龙池除抓走9人外，还当场枪杀2人。被抓的人，经吊打、压板子、狗咬、筷子枷、烙铁烙、灌汽油、凉水、辣椒面等人间奇刑之后，一部分当即死，一部分送往承德杀害，余者送往东北供作细菌试验或服苦股。经考察，检举中被抓捕生还者，不过十之二三，据统计仅大检举中全县就有3000多人被杀害。

除了对参加抗日的群众实行抓捕外，对于抗日人员家属也进行了全县性的检举，不论男女，不管老少，一律抓捕、刑讯，有的直接杀害，有的送往外地监押，还有的妇女儿童被驱出“国境”。1944年夏，仅从双山子、龙王庙一带就抓捕了几百人，被赶到口里的妇婴多达200多人。

（三）全面的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对青龙人民的高压统治是极其全面、残酷的，特别是集家并村之后，更是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日军侵华后，日本政府曾明文规定：“当前对华经济政策，主要是着眼于进一步获取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此，要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并要积极获取敌方物资。”（《华北治安战》）所以，日军在青龙的一切活动，无不以掠夺为目标之一。

1. 掠夺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

据查,在日本占领时,青龙县有22.9万人,按全县粮食总产量计算,每人每年仅持有口粮300斤,已说明青龙是个缺粮县。可是大部分粮食是集中于地主、富农仓库中,农民手中粮食很少,有的是糠菜半年粮,有的只能吃一秋,绝大多数农民是终年以野菜、乞讨生活。然而日本占领后,还要用"义仓粮"、"民生积谷"、"出荷粮"进行掠夺,还要交"地亩附加粮"、"报县粮"、"捐献粮",每年每亩要交五六十斤乃至七八十斤之多。庄稼尚未成熟,日伪军政机关就派人到各地去核户,然后下达纳粮任务。庄稼刚见黄,伪县公署、兴农合作社就率武装警察到各部落督催,命令快收、快打、快交。等将粮交完,多数农户已是所剩无几了,尤其是集家区的人民更苦。被划作"无住"地带的土地,由于缺工少肥,大幅度减产,被划作"禁作"的土地颗粒无收,可缴粮时却以亩计征,不能少交一粒,否则就要挨打、坐牢。农民们无奈只好含泪向地主借贷交差。

日伪征粮是一大难,而交粮亦属一难关。在送粮时,起早贪黑,人背畜驮,行走十几里、几十里,却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在验质时,日伪又想着法的刁难百姓,不是说有沙子就是说秕子多,明明是一等打二等,明明是100斤称80斤。无奈只好忍气吞声叫几声"太君"(日人)、先生、大爷(伪职员),暗递贿赂,否则就要挨打、受罚。牛心坨部落里有一农民,就是在交粮验质时,被说成是故意掺沙子而吃了一顿棍棒。

除了征收粮食之外,还要以亩计征棉花、麻类、烟干(鸦片)。集家后,有的地方连谷草、秫秸也征收。牛、羊、猪、鸡、蛋都有征收任务。就连小学生也得交铜、铁、血干、人发等物,少交、迟交都要受罚,卧龙池部落徐安、邱振江二人交鸡蛋稍晚,就挨了日本人的打,还让二人相互掌嘴巴,名曰"协和嘴巴"。

2. 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侵华日军为了满足军费和行政费用开支,就千方百计地在人民身上揩油,其主要方法就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据查,在"集家并村"以后的几年里,仅摊给农户的捐款就有20多种,例如,地亩税、地亩附加税、民生税、门牌税、牧畜税、屠宰税;还有协和会费、村部职员费、自卫团训练费、劳工费、配给费、兴农会费、筑路费、义务奉公费、义款、国防献金、飞机献金……就连"慰劳"日伪军的猪、鸡、蛋、柴、菜,甚至给伪官吏婚丧之"礼物"都按土地摊派到农民身上。上述捐税,有的项目多些,有的项目少些,有的地方一年摊一次,有的地方一年摊几次,但加在一起,每亩地摊派二三十元以上。

3. 掠夺农村劳动力

日本占领东北后,就长期从农村掠夺劳动力开荒、筑路、采矿、修工事、伐木。其掠夺方法,一是按照伪《勤劳奉公法》在没有被排上国兵的"国兵漏"中抽调一大批劳动力经过训练,送往各地使用,名曰"勤劳奉公队";二是实行伪《劳动统制

法》,规定25—55岁的男子都有出工义务,从中挑选一部分人去工厂、矿山服役,即所谓"劳工";三是按照伪《治安维持法》搞"浮浪"检举,把那些无业者、烟民和所谓思想不良者抓捕起来,送往各工地由军警看守服役。上述三项,虽名称不同,但都是"劳工",都是从农村掠夺的劳动力。从1940年至日本投降,从青龙抓走劳工3500多人。据亲历者证实,这些人在日军的刺刀下吃的是猪狗食,干着牛马活。凡去者十有七八未能生还。

(四)毒辣的精神腐蚀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多次训导侵华日军:要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中国人的人心。所以,日军占领青龙后,即开始进行反动宣传,积极推行殖民文化,全面展开潜移默化的精神腐蚀攻势。

在日伪统治时期,从伪中央到省、县、村、部,层层建立协和会,规定年满16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加入协和会,在协和会受教育。协和会是搞"日满协和"、"日满亲善"的,是极其反动的政治工作机关,是精神文化的领导枢纽,县协合会经常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成立什么宣抚班,利用各种形式,到各部落搞反动宣传。宣传的内容,一是日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优等民族,是伪满洲国的祖先、父辈,要称日本为"亲邦",称侵华日军为"皇军",并挟制满洲供奉和祭祀日本天昭大神;二是宣扬日本侵华是对中国的支援、帮助,是来中国建设"王道乐土",是"经济提携"。溥仪的训民诏书曾明文:满洲的"帮基益固,帮运益兴……莫不倾赖天昭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所以,要尊"天皇"、敬"皇军",对于日军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要服服帖帖,绝对服从;三是宣传日满"同种同宗"、"日满一家"、"共存共荣"。满洲必须全力支援东亚圣战、出人出物,"满洲作日本于一翼"。

相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则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八路军祸国殃民","扰乱社会治安",甚至说,日军的杀人放火都是八路军造成的,发布告、出漫画、演皮影,利用各种形式搞反动宣传。

在社会上对群众的腐蚀极其全面和深入,在学校对少年儿童的腐蚀尤甚。

在集家前后,青龙全县有国民高等学校1所,国民优级学校6所,国民小学162所,而中等学校和城镇小学都要有一日本人掌实权,其他学校校长、主任也都安排亲日人员充任。学校里要挂日满两国国旗,学生要唱日满两国国歌。每天上课前要集体背诵"国民训",还要向"天皇"遥拜,向在侵华战争中残废的日军默哀,并由校长、主任大讲"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等鬼话。在教学上,大肆充斥奴化内容,大量增加日语授课时间。要求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在校内见老师、答问题、大部分政治活动都要讲日语,训练时完全按日本那一套进行,强调阶级服从,实行棍棒教育,还要统一衣服,统一鞋帽。在学校只许提满洲,不许说中国,否则会受到处罚。

(五)人民的悲惨生活

由于日伪血腥统治和敲骨吸髓的掠夺,被围进"人圈"的青龙人民,生活尚不如牛马。

1. 缺衣少食

多数人家冬无棉、夏无单,十多岁的孩子长年光屁股,十七八岁的姑娘尚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有的是夫妻一条裤,全家一床破被,还有的常年穿万能衣(冬当棉,夏作单,夜间盖身御严寒),数九寒冬,冻死人毫不新鲜。尤其在粮食上更为困难,二道沟部落,居民近300户,粮食能自给自足者不达十之二三,糠菜半年粮的也只有半数左右,不少人家是交完"出荷"之后,已是仓柜空空。全年只依靠野菜、柳叶生活,年过七旬的赵文株老两口,数月没摸到粮食,最后无病而终。农民赵文忠之妻吃树叶脸吃得铁青,死后嘴里还含着树叶。农民赵坤与七八岁的小儿子,数日不动烟火,老少皆饿死在炕上。崖丈子崔宽全家6口人饿死4口,小菜园周景春全家6口人全部饿死。

2. 居住条件十分恶劣

"集家并村"后,数百人、数千人挤在一个"人圈"里,住房面积有的部落每人平均只有一二平米。集家户的住室十分简陋,一般是一棚一门一室一炕,棚很矮,院极小,锅炕相连,多数是炕上住人、地下圈畜。居住十分拥挤。康丈子部落李顺家,一个两幢草棚挤了6家40多口人。宋自友家一家三代24口人挤在一个羊圈中。二道沟门部落里李文林、赵云宽是大伯与弟媳住一室,李安居与赵胜两家17口人住一棚,赵云平、崔善两家10口人睡一炕。许多户不仅人与畜、柴草共室,就连拉屎撒尿都没地方,卫生条件极差。此外,有些户连个棚子也盖不上,这家一宿,那家一夜串房檐,崔丈子李迎春因无处住,活活冻死了。郭丈子赵文之妻在秫秸垛里坐月子,康丈子宋自和妻在窝棚生孩子,于长江、唐顺长期夜宿街头。

3. 缺医少药,有病等死

由于居住条件差,所以瘟疫流行,而群众却毫无办法。有的地方一天就抬出十口八口死人,据座谈,牛心坨部落曾在1944年夏,一天就死了17口人,二道沟门部落1944年8月27日这天就有十家办丧事。木头凳大丈子部落李峰的孩子得病,伪警说是传染病不让治,硬是从围墙里扔到围墙外活活摔死。

据调查,自集家到日本投降,青龙冻、饿、病死两万多人。仅老李洞部落在1944年一年就死了200多人,二道沟门部落死了500多人,其中全家死绝的就有50户。康丈子部落仅1944年7月一个月就死了61人。崔丈子进围子时是370口人,到日本投降时仅剩230口人,赵丈子进围子时是68口人,到解放时才剩36口人。

(存中共青龙县委党史研究室)

平泉县"集家并村"及"无人区"调查

王振兴

平泉县"集家"情况

现在的平泉县境，在伪满时由喀喇沁中旗、青龙县、承德县三县(旗)管辖。

喀喇沁中旗辖：

平泉街(现平泉镇、西坝、城北乡)。

南坡村(现蒙合乌苏乡、平坊乡、白池沟乡)。

黄土梁子村(现黄土梁子乡、双河乡)。

茅兰沟村(现茅兰沟乡、长胜沟乡)。

柳溪村(现柳溪乡)。

平房村(现七家岱乡、双河乡的三家村、傅营子村)。

洼子店村(现卧龙岗乡、沙坨子乡、石拉哈沟乡、三十家子乡)。

杨树岭村(现许杖子乡、宋杖子乡、杨树岭乡、魏杖子乡)。

松树台村(现营子乡、松树台乡、古山子乡)。

七沟村(现七沟乡、凤凰岭乡、王土坊乡)。

荒地村(现西崖门子乡)。

大营子村(现刘家店乡、广兴店乡、双洞子乡、黑山口乡之黑山口、万杖子、大梁底、老窝铺等村、杨树岭乡之铅南沟、狮子庙)。

五十家子村(现五十家子乡、南岭乡之瀑河沿、康杖子、下店乡之干沟门)。

榆树林子村(现榆树林子乡、宋营子乡、范杖子乡)。

打鹿沟村(现台头山乡、打鹿沟乡、高杖子乡)。

承德县辖：

小寺沟村(包括现在小寺沟镇、水泉乡、黑山口之三家、姚杖子、边房沟、五十家子乡之后甸子)。

青龙县辖：

党坝村(包括现在党坝乡、永安乡、大吉口乡、山子后乡)。

郭杖子村(包括现在郭杖子乡、倪杖子乡、党坝乡之朴家院、窑上、南沟门、四家)。

平泉“集家”从 1942 年开始,先在孤山子、崖门子、大石湖等少数边沿地方进行,1943 年在我游击区全面实行,重点是青龙、承德县及以光头山为中心的广大游击区,即当时的柳溪、平房、七沟、荒地、小寺沟、党坝、郭杖子等村。1944 年又逐步往东部发展,直到 1945 年 8 月日寇投降才停止。

“集家”基本分三类地区:(1)“集团部落”;(2)“集家并村”;(3)“无住禁作地带”(“无人区”)。

(一)“集团部落”(即“人圈”)

把分散居住的农民驱赶到指定地点,四周修一丈二尺高的土围子,四角修炮楼子,有的还挖护城壕。全县修“集团部落”127 个,分布于日伪时的柳溪村、平房村、七沟村、荒地村、小寺沟村、党坝村、郭杖子村等 10 个村以及南坡村的蒙合乌苏川的单营子、南梁,黄土梁子村的龙潭沟川西山,洼子店村的石拉哈沟和红花沟,相当于现在 19 个乡,面积 1540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47.5%:

柳溪村:七家、大庙、下桥头、薛杖子、徐营子、马架子、老杖子、河南店、仓子、高杖子、大窝铺等 11 个(均是 1943 年修)。

平房村:杜岱营子、雹神庙、徐营子、九神庙等 4 个(均 1943 年修)。

南坡村:单营子(1943 年修)、南梁(1945 年修)。

黄土梁子村:西山(1943 年修)。

松树台村:老窝铺、中心村、杨树底、孤山子、大杖子、二道沟门、徐杖子等 7 个(1942 年“集家”,1943 年修围墙)。

七沟村:上平房、东沟门、头杖子、东六沟、榆树林、屈杖子、糖房沟、三岔口、大甸子、七沟、朴杖子、小山沟、圣佛庙、三家、东庄、毛兰沟、白庙子、于杖子、李台子、王土坊、老虎沟、单杖子、东北沟、乱石窑、马家营等 25 个(均 1943 年修)。

荒地村:三义庙、荒地、崖门子、杨树底、前杖子、新房子、南杖子、北杖子、杨树沟门(1942 年修)、下店、西杖子、于杖子、横墙子(1943 年修)等 13 个。

小寺沟村:胡杖子、水泉、河沟子、袁家店、佟杖子、桥东、桥西、雅图沟、西大窑、单家店、后甸子、仓子、姚杖子、南三家、边房沟、大庙(苏子沟)等 16 个(均 1943 年修)。

党坝村:党坝、北沟、河北、煤岭子、朴家院、大庙、山子后、二泉地、党杖子、大院(均 1942 年修)、暖泉、刘巴店、大石湖、西杖子、大吉口、秦家店、戴家沟、李杖子、北沟等 19 个(均 1943 年修)。

郭杖子村:窑上、南沟门、四家、西门杖子、倪杖子、八十亩地、郭杖子、于杖子、金杖子、营房、下营房、黄土梁、王杖子、郝杖子、高杖子、杨杖子等 16 个(均 1943 年修)。

大营子村:九神庙、道边、新安村、黑山口(均1943年修)。

洼子店村:崔杖子、莫林营子、陈杖子、安杖子、小碾、庄头营子、于营子等7个(均1943年修)。

杨树岭村:双庙、王营子(均1943年修)。

按年计算:

1942年修18个,1943年修107个,1944年修1个,1945年修1个。

(二)"集家并村"

平泉东部,即老哈河、瀑河以东地区,敌人曾认为是治安确保区。由于从1943年至1944年抗日斗争逐步向东发展,所以从1944年开始在平泉东部地区搞"集家并村",在这类地区是把山沟里的住户一律搬到大川村落,暂不修围墙,群众称之为"小集家"。这类地区涉及现在的平房、毛兰沟、白池沟、长胜沟、宋营子、卧龙岗、范杖子、广兴店、魏杖子、双洞子等乡,共搬迁225个自然村、800多户,占全县总面积的15%左右。

(三)"无住禁作地带"

敌人把深山老林和抗日部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划为"无人区"。这类地区不准住人,不准种地,不准放牲畜,不准打柴。在警戒线上埋上红桩子,对过界人、畜打死勿论。

"无人区"共涉及当时的11个村的部分地区:

南坡村蒙合乌苏川单营子"部落"刘杖子;黄土梁子村龙潭沟川西山"部落"双庙;柳溪村大窝铺、马架子、张营子;平房村七家岱川九神庙"部落"梨树沟门;洼子店村石拉哈沟安杖子、崔杖子;七沟村车轮窖川山湾子、大西天;荒地村曹碾沟、二道沟、孤山子;小寺沟村水泉沟胡杖子;党坝村西杖子川南山霍家村、大石湖、黄木沟一带,山子后川的于杖子,水泉沟;郭杖子村椁椤树川四家的陈家庄以里,毛家沟的周杖子、北洞子,东门杖子的李家庄;松树台村孤山子川头道沟。

总面积为29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9%。

残酷的法西斯统治

日伪在修"人圈"的过程中以及"人圈"修成以后,对这里的人民实行了一整套的法西斯统治。

(一)野蛮的驱赶

"集家"是先由伪旗警务科提出总方案,再由各警察署协同分驻所、村公所,到实地划定修"部落"的地点、规模、搬迁筑围等,然后通知各户限期搬完,到期不拆房的就派"镐头队"给刨毁,或点火烧掉。反复清查"扫荡",直到摧毁为止。

全县修"部落"大部分是1943年2月定点,4月开始修,限8月修完。日伪根

本不顾农事大忙，规定凡是修"部落"地区必须全力以赴，白天不准种地，否则，被抓住，轻者毒打、罚跪，甚至被打死。有的见到下地干活的就用枪打，群众只好白天修"人圈"，夜间收拾地，蒙合乌苏单营子修"部落"时，警察、讨伐队到处窜，见到种地的不仅把铧子砸了，罚跪石碴子，而且强迫人们互相打嘴巴，朱春等三人不服，被活活打死，七沟上平房修"部落"时，伪分驻所所长张大巴掌，骑着马抓种地的。把农民郑国祥抓住，毒打一顿，白天让干重活，夜间又罚跪石碴子，折磨得几次晕倒。对到期不搬的就给刨毁或烧掉，孤山子扁担梁 13 户 52 间房，全部被讨伐队烧光。柳溪村中马架子 30 多户，锅全被砸碎，房子全被放火烧掉；上马架子一个村就烧了 50 多户；徐营子"部落"130 多户，有 90 户房子被烧掉；蒙合乌苏单营子 180 户，有 140 多户房屋被烧；据不完全统计，原柳溪村被烧房子达 1623 间。长胜沟大庙张振铎等三户房被烧，张因无力盖房，被逼上吊而死。据统计全县 81 个"部落"，共烧房 5172 间，被强行拆毁 22 300 多间。伪军警为了保证按时修完"部落"，在暂时不修"部落"的地方强抓了一大批人（全县不下两万人），组成"镐头队"、打墙队，椁椤树川倪杖子是抗日游击区，群众反"集家"不进"部落"，伪军就从宽城一带抓了 500 多人，强迫去刨房、烧屋，不干就打；大营子村修"部落"时从道虎沟抓了 1000 多人，在伪军警看押下到新安村去刨房、修"部落"。荒地村西崖门子是抗日游击区，1942 年开始修"部落"，群众不搬，抗日游击队去了，把墙推倒两次。1943 年夏季又推倒两次。6 月份敌人从圣佛庙、西坝抓了 1000 多人，在三个连伪军和讨伐队看押下去抢修，看谁不使劲就打，几天时间打死 7 个人。王玉清的父亲 70 多岁了，有罗锅腰，干活累了坐一会儿被警察看见，施以毒刑折磨，叫老人仰卧在石碴子上，在头和腿部坐上人往下压，还狂笑着非要给他直直罗锅，结果把脊骨压折，当场被折磨死；永安大石湖 40 里长沟只准修 2 个"部落"，群众不搬，敌人"扫荡"3 次，把 40 多个村子摧毁了。全县"集家"地区共摧毁自然村 1139 个，把 14 600 多户、7.1 万多人赶进"人圈"。

（二）集中营式的统治

日伪对"部落"内的人民实行的是一整套集中营式的管理。

军、警、宪、讨看押：在"集团部落"地区，日伪派驻了大批军队、警察、宪兵、讨伐队。人民群众是在武装看押下生活，在日伪村公所所在地都有警察分驻所，开始十余人，后来增加到二三十人，边远地方还有警防所，各"部落"选拔青年自卫团（30 至 50 人）驻在分驻所。在抗日游击区和"无人区"边界上驻有伪军和讨伐队，各要路口还派驻日本宪兵队、日本守备队。以 1944 年底为例，在"集家"地区就设有警察署 2 个，分驻所 11 个、警防所 30 个，计 380 余人；自卫团 650 余人；伪国兵三十三团 9 个连计 1340 人。讨伐队有纪东阁队、韩全福队一部、李春队、张雪队、朱胜队、张云生队、夏九峰队、刘奇队等 8 个队，1200 余人。在党坝有日本宪兵队 30 多人，日本守备队 120 人，在柳溪、大石湖有日本守备队。在王土坊、七沟、郭杖子、

黄土梁子都有日本宪兵队。军、警、宪、讨共4000余人。

发展特务:日伪的特务组织是多渠道的。村协和分会有情报组,但很隐蔽,他们全面搜集我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以及民情等情报。军、警、宪还根据各自的需要发展特务,如柳溪、七家岱、孤山子等地就在他们抓走的人中发展了几名特务放回来,为他们搜集情报,所以在"人圈"里的人,说话、行动稍不注意就可能被抓走。

建立联防组织:在"部落"内把18岁至55岁的人都组成自卫团,轮流站岗,送情报。每个"部落"每天必须向警察分驻所送一次情报。青年还要专门受军训,每人一根木棒子,群众叫"棍儿团"。哪个"部落"有事,发出信号,邻近"部落"就必须出动。

联保组织:实行严格的村、甲、牌制。各"部落"设部落长。甲长管几个"部落"。10至30户为一牌,设牌长。十家连座,一家出事全牌牵连。成年人都发《居民证明书》,出门、上路都要受检查。来客要报告,走了要销号。"部落"有四门,日出开门,日落关门,出入检查,夜间经常搞宵禁。起早贪黑出去收拾地,放牲畜也不允许,不遵守的就要受体罚。

(三)血腥的镇压——大检举

在日寇的铁蹄下,人民忍无可忍,采取不同形式反抗,日寇则进行了血腥的镇压。1942年至1944年进行了三次"强化治安",也就是强化他们的各种统治办法,一次比一次残酷。群众一句话、一件事稍不注意,就会以"通匪"、"政治犯"、"思想犯"等罪名被抓进监狱,甚至杀掉。1943年1月抗日工作人员在孤山子和头道沟开群众会搞宣传,被特务张志告密,把王海、宋景德、田玉、田旺等4人抓走杀害了;倪杖子村温殿顺家雇了一名长工是外地人,被日本守备队抓起来,硬说他通八路,他不承认,被捆在树上活活烧死。这个村从1943年至1945年被抓走110多人,有的被杀,有的被关进监牢,有的到东北当劳工,共死在外边70多人。郭杖子乡王家沟在1944年春被日伪军包围,把全村老乡赶在一起,让大家检举谁通八路,没人说话,敌人就抓人毒打拷问,甲长张廷玉60多岁了,同情抗日。他说:"你们谁通不通八路我心中有数,可不能胡说……"敌人恼羞成怒,就一撮撮地往下薅他的胡子,胡子拔光了又按在地上毒打致残,这一次就抓走70多人;只有20多人被毒打后放回,其余的人都被投入监狱或当劳工。最残酷的是1943年1月,全面进行大检举,实际上是一次全面大搜捕,有的村一次被抓走几十人,绝大部分是无辜群众。柳溪乡徐营子村一次被抓走105人,凡是听过游击队开会的,管过饭的,带过路的,统统被抓走,进行严刑拷问,有5人被杀害,70多人被送去坐牢或当劳工。七家岱乡大地村150多户,由于特务孙振全的出卖,一次被抓走20多人,刘真、孟吉贤、张启荣、张启功、赵广喜、赵国栋、冯义等7人死在监狱。九神庙被抓走30多人,只有2人逃回,其余有的死了,有的无音信。石拉哈沟被抓走40多人,只5人被放回,其余的被送到平泉、承德、营口、锦州等监狱。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大检举全县22个

“部落”共计有621人被抓,其中被杀害50人,死在监狱25人,下落不明的389人,列表如下:

地　点	被抓人数	杀　害	死在监狱	下落不明
大　地	20	3	7	10
九神庙	30		3	25
崖门子	7	7		
干沟子	6			5
孤山子	4	4		
石拉哈沟	40	12	1	25
柳　溪	40			30
马架子	5	3		
徐营子	105	5		73
四　家	12	1		11
小寺沟	7		5	
倪杖子	110	1	4	70
山子后	2		2	
上平房	30			24
大石湖	120	8		72
长胜沟	60	4		30
茅兰沟	20	2		14
黑山口	3		3	
合　计	621	50	25	389

(注:此表仅根据部分受害者及知情人座谈回忆起来的,所以很不完全,但可见日伪血腥镇压之一斑)

(四)残酷的刑罚

日伪对“人圈”内人民的统治,手段凶残,方法毒辣,人民只能俯首贴耳,任敌人宰割,不准有半点反抗,否则就施以毒刑,罚站、夏天晒太阳、冬天扒光衣服冻、跪石砟子、互相打嘴巴子、打棍子等是家常便饭。中等刑罚是手指夹筷子,灌凉水、辣椒水,火油,有的还掺上头发茬子,被灌者非死即残。还有电刑。最残酷的是烙铁烙、背火炉,把人烤得冒黄油。打油锤,把人捆上装进麻袋,抬起来往地上摔;站木笼,木笼四周钉上钉子,人在里面站着,扎得遍身出血。“军犬狂舞”,把人捆上叫军犬咬,人痛得打滚,狗来回跳,日寇在一旁狂笑。各种刑罚30多种,总之,他们折磨人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五)人间地狱

“人圈”是人间地狱,里边的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从住房看,80%以上的户是从外村搬进来的,能盖起房的不到1/3,多数人家只能盖个小马架,或搭个窝棚,有的托亲靠友,一家住三四户。有不少户只能住在畜棚或碾道里,夏不遮雨,冬不

避寒,人畜共居,阴暗潮湿,蚊虫、蟑螂、跳蚤、虱子成群叮咬,大批人生疥疮,传染病盛行;从吃上看,70%以上户靠租种土地。进"人圈"后,大片土地不准耕种,种上的地产量也很低,除去交租、交"出荷粮"以及地方官勒索,人均口粮不足200斤,大半年只能吃糠、野菜、树皮度命。穿的更可怜,每人每年配给14尺麻布。小孩冬夏光腚,十七八岁的姑娘穿不上衣服,不在少数。不少人披麻袋片,或一件老羊皮筒,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没有炕席、没被子是普遍的,为了取暖只能靠烧热炕、烤火盆,小孩身上烤出了花,有些人钻到莜麦秸子里睡觉。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体瘦弱,加之冻饿,冬季路上经常有"倒卧"。1944年至1945年,伤寒病、"虎列拉"、急性肠胃炎等传染病大流行,有了病既无医疗条件,又无钱治,只有等死,两年中造成大批人死亡,有的人家死成"绝户"。柳溪乡是"集家"重点地区,288平方公里只修了11个"部落"。全乡5300多口人,两年死2100多口;马架子"部落"120户,死了260多口;王琢家14口人死的只剩1口;徐营子"部落"136户,1944年死大人180多口;于会宗在墙上划道道,死一口划一道,划到173道时,他和大儿子一天都死了。徐振说他在1944年6月一天抬出5个死人。有的"部落"死人时"报庙"要排队。老虎沟隋国安家14口人死剩3个小孩逃荒要饭走了。河南店"部落"老单家7户,算是中等户,共41口人死了16口;七家岱川4个"部落"700多户,死了260多口;九神庙"部落"160多户,600多人,死300多口,有13户死成绝户。朱其昌家8口全死在"部落"里。九神庙后山成了乱葬岗子。特别是儿童死亡更多。柳溪川徐营子"部落"136户,三年多死小孩220多个;蒙合乌苏单营子"部落"210户,死近400口,其中小孩240个;七家岱徐营子北沟因扔死孩多,改称"死孩子沟";荒地村(现崖门子乡)刘起家8口人死了7口,他感到无路可走也上吊而死;郭杖子村(现郭杖子、倪杖子乡)1100多户,两年死980多口,死了人还不敢哭,否则被伪军警听到,说是闹瘟疫,就给封门,全家都得病死或饿死。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修"部落"到1945年光复前,124个"部落"共病饿而死达12 266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无可抵赖的血债。

(六)敲骨吸髓的掠夺

日寇本着"以战养战"的原则,对侵占地区进行了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实行了一套极严厉的经济统制政策。

物资上大肆掠夺:群众叫"三干一储"(粮干、麻干、大烟干和强制储蓄)。当时粮产很低,亩均200斤左右,每亩要交粮干(即扣除水分的粮食)30斤,自然粮要35至40斤。日寇为了向南洋群岛贩运鸦片,强制农民每年要有10%左右的好耕地种大烟。每亩交烟干13—18两,还要交线麻干,这些都由专门的粮食组合和鸦片组合严格检质、检等低价收购,农民在这里还要受一层勒索。完不成就要挨毒打,拘留,甚至灌凉水、辣椒水、煤油等毒刑折磨。另外,牲畜、皮张、绒毛等都有强制任务。

沉重的税负:除伪政府规定的税捐外,地方还任意摊派各种费用,多达30余种,如地亩捐、房产税、人头税、猪头税、车辆税、村公所费、证明书费、甲长费、招待军警官吏费、电线费、修炮楼费、协和会费、飞机献纳金。除此之外,伪官吏还想尽办法勒索,迎来送往、婚丧嫁娶都要敛钱要物,一年到头敛不完的花销。这些花销是在农民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硬是敲骨吸髓榨取出来的。

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布、棉、线、盐、火柴、火油、肥皂……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每人每年配给布10至15尺,棉花4两,火油每月半两,盐三四两,根本不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这一点物资还经常断供,而且层层卡油,真正到农民手微乎其微。这些专卖品,群众不准买卖,谁贩运就被当做"密输犯"、"经济犯"抓起来,谁家吃顿大米、白面也是犯法的。

由于日伪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土地大面积荒废。一般的"部落"要荒地15%左右,被划为"无人区"的"部落"荒地30%左右,最多的达50%。据统计,124个"部落"有耕地34万亩,1943年荒废8.8万余亩,占总面积的26%,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畜禽大批死亡。柳溪乡是个山场较好的地区,但畜牧业也遭严重破坏。全乡1943年初有大牲畜1200多头,到1945年仅剩700多头;羊5000多只,仅剩不足2000只。徐营子"部落"原有大牲畜270头,剩百来头,羊1000多只,剩200多只。据1943年统计,124个"部落"有大牲畜1万头左右,死3600多头。有许多户连最低的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不少户完全破产,1944年至1945年就有4240多人外出逃荒。

(选自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编委会编:《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1996年)

日本侵略军在宽城制造"无人区"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宽城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其范围:东起青龙河西岸的双松汀,西抵滦河东岸的兰旗地,长约150公里;北自冷岭子(后延伸至锦承铁路南);南至长城,宽约100公里,遍及现今行政区划的25个乡镇、180个村。这块"无人区"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宽城的"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是同步进行的。大体分为局部试点和全面推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1年8月,伪青龙县政府在青龙国民优级学校

召开有全县各机关、各协和会、各警察署、各村公所头目参加的“集家并村动员大会”。大会由伪青龙县副县长西岛宽(日本人)宣读《青龙部落建设通告》及《集家并村命令》,而后县协和会本部、日本宪兵队头目讲述所谓“集家”工作意义和具体时间、方法、步骤。大会决定把大地村作为首批试点,并成立县集家工作指导部,主任由西岛宽兼任。大地“集家”试点组织机构是:集家工作五人小组,下设武装班、巡视班、拆房子队。另外命令大地警察署、警备队、县本部驻孤山子中队、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大地协和会分会、大地村伪自卫团共350人在集家工作组统一指挥下,所谓“协同作战”。集家工作组组长由伪民政科科长桑春担任,副组长由伪民政科街村股股长王子合担任,组员3名(其中1人是翻译)。动员大会后的第3天,大队人马窜赴大地。

集家工作组副组长王子合设计《大地标准部落方案》,大受主子赏识。此方案规定大地中心村公路沿线上建立3个武装防备“部落”,即大地、熊虎斗、木匠屯,需迁22个自然村。“部落”规格200米见方,四周修筑石墙,墙高3米,宽1米,四角设有炮楼,东西大门两个,墙上加设铁丝网,警戒线放在突出位置,墙外土壕围城。“部落”间隔5至20华里。据王子合在1984年供认:“那时山区部落建设以方形为原则,避免多角形,不要靠山依岗,以有利我方军政活动,不利共方出入。”

方案批准后,任务交付各班,武装班负责武力督迁,巡视班负责巡回检查,协和会搞欺骗舆论宣传,拆房子队负责拆烧,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敌人的主要措施是:不搬——烧,拒者——抓,逃者——杀。搬出搬入限定10天,违者以“反集家罪”论处。最惨的是松树沟8个自然村,瓦房沟3个自然村,120户、500多口人全部搬入大地。最远的是十几华里,700多间房子全部拆烧。被赶到“部落”的居民只好先露天居住。在“集家”中,枪杀刀挑、活活烧死13人,至于挨敌人棍棒的不计其数。当时敌人把老百姓赶入“人圈”后,紧接着划“无住禁作地带”。规定“部落”10华里以外全部是“无人区”,并埋上“无人区”界碑(1米见方的标准板石,松树沟、破城沟将此石保存到建国后,到“文革”期间被损坏),然后宣布“部落”法规,给自卫团配备武器。

敌人在这里折腾1个半月,宣布所谓试点(也叫实验区)圆满结束。强迫22个自然村的1800多口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进入“人圈”,在敌人刺刀尖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烧毁房屋800多间,毁地1600多亩,划为“无人区”面积40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0%以上。

试点结束后,伪青龙县政府组织各级要员到大地进行所谓参观学习。1942年3月在全县全面铺开,村村派驻集家工作队;到1943年3月,宽城境内修筑“部落”99个,“集家”自然村1382个,“集家”28 100户,占总户数82%,“集家”人口124 000人,占总人口的85%,“无人区”面积117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0%以上,毁地23万亩,损失房屋23 000间。

"治安肃正"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其残暴手段是:烧光、杀光、抢光,这是日伪军在"无人区"里的主要暴行。

烧光:就是彻底烧毁人民居住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条件,使游击根据地庐舍为墟,林木为灰。宽城"无人区"烧得最惨的是王厂沟、松树沟、大汉沟等三大川游击根据地。1942 年春,驻孟子岭日伪军在一个半月里,去王厂沟讨伐 7 次,烧了 7 次,全庄 230 多间房子被烧得片瓦无存,十几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在山上住的"猫山户",敌人更不放过,放火烧山,一片片山林化为灰烬,漫山焦土。元宝盖张兴华家被烧 8 次,最后没啥可烧的了,敌人一看院外碾子轴、井梁架是木头的,便倒上汽油给烧了,碾子给掀翻了,水井给填死了。那时节,村村户户碧血殷殷,烈焰腾腾。据冀东区抗战 8 年灾情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里烧房(不包括拆毁)9800 间,烧死牲畜 11 000 头。

杀光:就是敌人企图把反满抗日人员斩尽杀绝。他们采取"扫荡"屠杀、检举屠杀、狱中屠杀、秘密屠杀等多种形式,在宽城"无人区"境内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主要惨案有:

大屯惨案:1941 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敌人为搜捕周治国游击队,以报峪耳崖金矿、城子岭、三道关的惨败之根,伪青龙警务科长、绰号屠夫程野正(日本人)纠集喜峰口、董家口、三道关、孤山子等日伪军 300 多人,对大屯实行血腥大屠杀。一个 400 多户的村庄被杀害 187 口人,烧房 530 多间,杀绝了 14 户、50 多口人,有 19 户各剩下只有 1 口人。刘振久一家 10 口人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挑死 5 口。当时仅 13 岁的幸存者侯永会,被敌人一连捅了 7 刺刀,至今背上仍留 7 处伤疤。这场惨案中还烧死毛驴 10 头、猪 120 口、羊 350 只,烧毁粮食 30 万斤。

暖河塘惨案:1941 年 4 月 26 日,驻承德 70 多名日军武装护送 3 只军用货船,从滦河直下。到宽城贾家安被何子桥抗日部队阻击,敌人气急败坏,下午 4 点多钟,敌人疯狂扑向暖河塘,刀砍火炼 15 人,17 户人家有 15 户死去了男人,成了"寡妇庄"。

王厂沟惨案:1943 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敌人为彻底摧毁王厂沟这块抗日游击区,伪热河省警务厅纠集承德上谷宪兵队、于友三讨伐队和孟子岭、喜峰口等日本守备队近 5000 人,对王厂沟 9 个自然村实行灭绝人性的 8 天大屠杀、毁青。庄稼逐块割,山林逐座烧,猫山守土抗战的居民被逐洞杀,8 天毁庄稼 700 多亩、屠杀百姓 112 人,其中杀绝 45 户、90 多口人。王厂沟的关界村有 31 口人,只剩下关贞瑞 1 人。当时关贞瑞 7 岁,全家 6 口,被杀 5 口。爷爷为保护 3 个孙子,被敌人割掉舌头,挖掉双眼,父亲被枪杀,11 岁的哥哥被鬼子一刀劈死,4 岁的弟弟被摔死在山崖,母亲被敌人蹂躏后开胸剖腹悲惨死去。

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是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实行"梳篦山林"、"断臂绝瘤",几乎哪天都有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1943 年 9 月 13 日,张雪涛讨伐队去

井家庄讨伐,将1名抗日人员抓捕,绑在苇子沟西河套木桩上,给150多日伪军打了活人靶。据参加打活人靶先开第一枪的张雪队队员宁永满在1966年12月29日审讯中供认:“那次讨伐烧了井家庄11户,55间房子,抢走毛驴7头。‘人圈’外连人带物一齐搜查,那个抗日人员骨头还挺硬,我头枪没打心口窝上,他还骂我狗娘养的,熊种一个。”据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讨伐“扫荡”制造大小惨案153起,其中屠杀20人以上的就有85起。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组织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7次,1942年伪青龙经费总开支5 087 627元,其中“讨伐”、“治安”费为2 350 003元,占总经费的44%。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屠杀和镇压“无人区”人民的暴行,不仅发生在“人圈”外,而且也见于“人圈”内,在“人圈”内也实行检举、屠杀。伪满制定的《时局特别刑法》规定内乱罪、背叛罪、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50多种,尤其是规定“预防拘禁”、“保护监察”等条款,给日伪军警特提供任意捕人的无限特权。

1942年3月9日,伪青龙宪兵队、警务科对大地、熊虎斗、榆木岭、椅子圈、唐杖子等24个村庄实行一次大检举,抓捕420人,惨杀340人,其余判刑。仅唐杖子一处就杀害100多人。1942年5月、10月、11月,敌人在宽城搞了三次大检举、大屠杀,伪热河省高等法院派人坐镇判决,抓捕213人,在宽城街南山根杀死164人,其余送往承德、鞍山。1943年1月,伪热河省警务厅特高科长高石(日本人)亲临宽城坐镇指挥检举,抓捕1500人,杀死410人,当劳工630人。

有的检举纯属拿着中国人民生命当儿戏。1943年1月13日,宽城日本宪兵队带着相面先生到洪杖子检举,把全庄人集中到东沟门,让相面先生相面认定哪个是八路军,哪个是共产党,结果当场胡乱点名,抓走27人,杀害8人,其余判刑。更为荒唐透顶的是1942年春,驻亮甲台日伪军在亮甲台街搞检举,把全庄人围在一起,让所有人都张着嘴,敌人逐个检查,谁牙白就抓谁。敌人的理由是:凡是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1942年冬,徐家店有一家娶媳妇,亲朋好友前去道喜,宽城特搜班闻讯赶到,从新郎、抬轿人、贺喜人中检举10多名送往宽城。

从1943年至1945年初,敌人搞检举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大,杀人之多极为惊人。1943年12月30日,敌人在全县99个“部落”里搞大型检举,残杀2000余人。仅塌山一带就杀害800多人。山家湾子两个“部落”,从1943年到1945年检举46次,被检举341人,被杀79人。

1943年夏,伪青龙日伪机关别出心裁实行“防范月”,在特务股长赤种(日本人)指挥下,在宽城境内抓“浮浪”300多人,押了1个月。

敌人的屠杀,凶狠残暴,花样翻新,亘古少闻。什么“断食空腹”(不给饭吃,强迫招供)、“倒栽莲花”(倒头活埋)、“军犬舞蹈”(让狼犬扑身乱咬)、“内滚绣球”(把人脱光衣服放进钉满钢针的木箱里,盖上盖顺地乱滚)、“电磨粉身”(把人放在电磨里碾成肉酱)、“枪刺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敌人练习刺杀)、“钢针刺骨”(用

钢针扎入致命处)、“火烧活人”(往人身上倒汽油,点燃烧死)、“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捆在一起,像虾一样投入水里淹死)、“木桩勒马”(把人绑在木桩上活活勒死)、“电动绞死”、“开膛取心”等等。1944 年 5 月 8 日,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吉尾带领大地特搜班去南沟门讨伐检举,将青山口村抗日干部王福、邢金堂抓捕,带到大地小西沟门,毒刑追问八路军情况,王、邢二人至死不说,破口大骂。敌人恼羞成怒,将二人开膛把心肝取出。当场,叛徒马君捧着两位烈士血淋淋的心肝对其主子说:“食人心脑聪,吃人肝眼明。”日本鬼子吉尾当场吃掉心肝,并赏马君 10 块银元。至于灌煤油、辣椒水、凉水,压杠子,砍头,刀铡,那是到处可见的刑法。据冀东区抗战 8 年灾情损失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检举抓捕 21 750 人,其中杀害 13 400 人。

抢光:就是抢空游击根据地一切财物,不让抗日人员立脚生存。敌人每次讨伐“扫荡”,除杀人,抢财、抢物、抢牲畜外,还要抢人。1943 年初,姜大讨伐队去县西野鸡峪、椁椤台、蘑菇峪一带讨伐,抢来 20 多名青年妇女,威逼嫁给手下官兵。据《日本法西斯八年来在边区暴行》一书中记载:八年抗战时期,宽城“无人区”被抢走大牲畜 250 头、猪羊 6.8 万只,抓丁要夫 75 万人次,抢走衣服 14 万件。

“人圈”是人间地狱,吃、穿、住、行无法言状。

吃无粮:由于天灾敌祸,土地荒芜,有许多“部落”连年颗粒不收,只好夏吃野菜冬吃糠,树皮扒尽山菜吃光。王厂沟刘殿阳全家5 口人,有一角子(折合一市斤)小米吃了半个月,小米没了,没办法把枕头糠倒出来吃掉了。那时,富人过年肉山酒海,穷人吃糠咽菜。有的户到过年用柴禾换点豆腐渣就算过好年了。

穿无衣: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见人躲在“避羞坑”里的事不足为奇。一年四季换不上衣服,几件衣服全家人轮换穿的比比皆是。

住无房:有的住碾道棚、门洞子、破庙,即使有个住处的户也是马架子房,拥挤不堪。隆冬满屋飞雪,炎夏臭气熏天。晚上睡觉能盖上破麻袋片、破簸箕就算将就户。蔡家峪“部落”周占尧妻大雨季节生孩子没处生,只好把孩子生在水没膝盖的碾道里,起名叫“水生”。

行不让:“人圈”实际上是个“集中营”,人们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检举、查户口家常便饭,一天出入身带“许可证”,通过岗楼如过鬼门关,浑身上下搜个遍。1942 年腊月,王厂沟刘殿甫因外出超过规定时间,岗哨不让进“部落”,结果冻死在碾盘上。1943 年6 月,破城沟肖印发因下地种萝卜误了时间,被敌人活活打死。当时流传这样的民谣:

“早上菜,晌午汤,晚上糠粥照月亮。

“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天上雪花飘,身上没衣裳。

“借债、上吊、坐监牢。”

这就是日寇制造的"人圈"里中国人的悲惨生活。不仅这样,"人圈"一到夏季,污泥浊水满地,苍蝇臭虫成灾,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疥疮广为流行,每天冻、饿、病死屡见不鲜。1942 年夏季,大地"部落"传染疥疮,死了 30 多口人。当时人们说:"生疥先由手上行,腰里转三转,屁股扎老营,毒气归一就丧命。"蔡家峪"部落"800 多人,平均每年疫病而死 100 多人,从 1942 年到 1945 年,死了 300 多人。家家陈尸,户户嚎啕,人死无人抬,就地房中埋。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建设部落,自兴乡土"的"人圈"生活。据统计,八年抗战时期,全县冻、饿、病死在"部落"的有 8500 人。

(选自《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平北丰滦密的"无人区"

曹友林　鲍星时

平北东部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自 1940 年 6 月创建后,像一把尖刀深插在伪满洲国和伪华北统治区的接合部上,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因此,在日本华北方面军 1941 年秋抛出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计划》中,把"扫荡"丰滦密根据地作为实施该计划的开端。同年秋,伪满也在其以制造"无人区"为中心内容的《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中,将丰滦密长城沿线山地列为实施"肃正计划"的重点区域之一。于是,1941 年 10 月 4 日(农历八月十四),伪满和伪华北统治区纠集了万余日伪军联合对丰滦密根据地发动了为时两个月的毁灭性大"扫荡",开始制造"无人区"。

敌人采取"分进合击"、"纵横扫荡"、"梳篦清剿"等多种新战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对八路军十团和抗日政府曾经驻扎活动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交插反复地"清剿",甚至连当地百姓也不常去的险僻山沟都不放过。"扫荡"中施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把百姓的粮食、牲畜、衣物全数掠走,家什用具捣毁殆尽,房屋草棚一概烧光,连百姓在逃避时丢到河里的物品也捞上来烧掉。尤其残忍的是疯狂捕杀抗日干部群众,以骇人听闻的残暴手段制造了一系列血腥惨案,日军曾先后两次将"扫荡"中捕到的抗日群众带到下营村集体屠杀,第一次杀害群众 31 人,第二次又杀害了 47 人。日军还把孟思郎峪村 27 名老幼妇女驱赶到一个场院全部枪杀,并焚尸灭迹。10 月 28 日,日军又将在井儿峪抓到的 8

名群众押到双窝铺，推入地窖内用手榴弹炸死。据不完全统计，敌人仅在“扫荡”的两个月里就屠杀干部群众300余人，抓走近500人。

日伪为实现其“民匪隔离”、彻底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从万人“扫荡”后期开始推行“集家并村”计划。首先在我十二、十三、十六区，继而又在长城沿线的一、五、七、八区北部大搞集家并村。在这些地区敌人驱赶百姓到指定的村庄居住，四周修筑起一丈多高的围墙，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墙内四角建炮楼，驻有军警特务。他们称这种用炮楼和高墙围起来的村庄为“部落”，百姓进入“部落”便失去了生产、生活、言论、行动的一切自由，只能像牛马一样任敌役使和宰割，因此，百姓又愤怒地称之为“人圈”。到1942年3月底，仅5个月时间敌人就在我一、五、七、八、十二区修建了四合堂、对营子、大甸子、大峪、白庙子、东西湾子、番字牌、司营子、榆树底下、大沟、牛圈子、上下西仓峪、大北沟门、东石门子、白马关、南化石岭、石湖根、黄梁根、上下窝铺、佛牛沟、火石岭等29个“部落”，并宣布每个“部落”外十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只许耕作不许居住，耕作限制在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之内进行；十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居住也不许耕作，这些地区统称为“无人区”。

日伪的“集家并村”遭到了丰滦密人民的激烈反抗，许多人逃进深山誓死不进“人圈”，有的村庄原来是两面村，这时也断绝了与敌人的来往成了抗日一面村庄。于是在1942年，日伪又以6000兵力在丰滦密长城各口和山边山内要地广设据点，使丰滦密地区敌伪据点总数增到了37个。然后以各主要据点为中心，把“无人区”划分成若干小块，指定一个或几个据点反复“扫荡”一块地区，并配备机动兵力在各块之间穿插配合，以进一步“肃清”抗日力量。这一年日伪对“无人区”较大规模的“扫荡”就有32次，中小规模的“扫荡”有1554次之多，全年累计“扫荡”时间长达8个月以上。又有431名抗日干部群众被杀害，1111人被捕，损失粮食3634石、牲畜2124头(只)。同时，日伪还派遣大批特务、密探侦察中共军政机关和山里群众的隐蔽地，发现目标即秘密调动军队长途奔袭。1942年日伪进行有目标的长途奔袭共达40次，造成很大损失，其中伪满讨伐队4月8日突然奔袭密云臭水坑，使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八路军十团供给处长乔宇等30人牺牲，县财粮科长李昨非等45人被捕，制造了震惊平北的臭水坑惨案。以后敌人又利用臭水坑事件进行欺骗宣传，胡说什么“丰滦密彻底肃清了”、“县政府被消灭，县长被打死了，科长全部抓获了”等等。在敌人的欺骗宣传下，部分群众抗日信心发生动摇，离开山区迁入口里口外的敌占区，甚至连抗日工作基础最好的五区张家坟一带也有一些群众走出山沟，领取“良民证”归入了敌人指定的“部落”，一些党员和村干部也进“部落”向敌自首。

伪华北方面敌人还从1942年4月开始，强征5000多青壮劳动力，沿着山边突击挖掘“治安沟”(即“封锁沟”)。10月底，“治安沟”挖成，西起昌平的桃峪口，途

经丰滦密九区的平义分、北宅、白厂，四区的红螺镇、范各庄、流水庄，六区的康各庄、卸甲山、署地、坟庄，二区的北白岩、尖岩、庄户，三区的董各庄、燕落、不老屯、学各庄、石匣，东至潮河岸边的辛庄止，总长180华里，宽3丈6尺，深1丈6尺。沟边每隔一里建一炮楼，大炮楼驻日伪军，小炮楼由沿沟各村保甲棍团监守。接着，敌人将大沟以北、长城以内地区宣布为“非治安区”，严禁居住耕作，把百姓统统赶往沟南，沟北民房全部拆除或烧毁。为限制八路军在大沟两侧活动，还沿沟烧山并村，先后将沟北牛盆峪、东沟门、大关上、马营、河北、西峪、高家岭、沙峪里、秀才峪、柳树沟、转山子、庙沟梁等村的山林全数烧毁，又把沟南的一些丘陵小村，如二甲峪、恒河西山、穆家峪西沟等强行并入了大村。在敌人的淫威下，沟北大部分群众不得不搬往沟南，另有少部分群众躲进了深山，“治安沟”以北遂成为荒芜地带。这样，在丰滦密联合县内就形成了东自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从白道峪、北到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约120华里的山地“无人区”。

“部落”群众的生活处境非常凄惨，他们不但终日受监视，服苦役，而且经常遭受敌人的打骂凌辱，稍有反抗便会招来杀身之祸。“部落”内实行“米谷统治、碾磨封锁”，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不许群众私留和买卖，否则即以“经济犯”、“运输犯”、“国事犯”等罪名严加处罚。白庙子“部落”原村长王金鼎，仅因摘了自家果树的一点果子，就被判为“经济犯”惨遭杀害。部落在生活上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年只配给少量混合面、1盒火柴、半斤盐和3尺布，经过层层克扣，到百姓手里已所剩无几，有的“部落”每人每年仅实得9寸布。百姓长年吃野菜，穿衣更困难，许多成年人只在腰间围一块布，有的全家仅有一条裤子，谁外出谁穿，姑娘、媳妇穿不上衣服，只好在家里墙角挖个深坑，有外人来时就蹲到坑里遮羞。“部落”卫生条件更为恶劣，多是几家人挤住在一种用柴草搭的“马架房”里，房外到处是粪便垃圾，夏天臭气熏天，瘟疫疾病流行，成批群众染病身亡；冬天身上缺衣，腹内无食，很多人冻饿而死，据1942年资料记载，这一年每个“部落”最少也有七八十人死亡，白庙子“部落”仅400口人，这一年就死了160余口。

日伪为了彻底断绝“无人区”军民的生路，除了在“扫荡”中大肆烧杀掠抢外，还从1942年开始连续三年对丰滦密“无人区”施行“割青”政策。每当庄稼吐穗灌浆的时候，日伪军就进行“割青扫荡”，驱赶大批敌占区百姓手持镰刀进入“无人区”割青苗。仅1942年7月，敌人一次就割毁了地处“无人区”内的二区、五区、七区三分之一的青苗，其中莲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黄峪口、孟思郎峪等村的庄稼被全数割光。

秋收季节，日伪军又进行抢秋“扫荡”，驱赶大批百姓进入“无人区”抢割庄稼。为保住即将到手的粮食，抗日军民一面突击抢收，一面开展游击战打击抢秋之敌。群众在护秋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机智勇敢，1942年秋收时，日伪军到张家坟抢割庄稼，把割下的谷穗堆放在一起，然后又到别处去割。隐蔽在附近山上的张家坟村群

众见敌人离去，马上冲下来把谷穗全搬到山上藏了起来。日伪军返回运庄稼，见大堆谷穗不翼而飞，气得往山上胡乱打枪，毫无办法。秋收以后，日伪军又疯狂地下乡"扫荡"抢粮。1942 年 12 月初，石匣据点百余名日军到"无人区"内古石峪村抢粮。

（选自中共密云县委宣传部编：《潮白风云》）

遵化山区的"无人区"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遵化地处冀东，北靠长城，与兴隆县相邻，东与迁安（今迁西）相接。日本侵略者为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割断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行了所谓"民匪隔离"。从 1942 年秋季开始，日本华北驻屯军与东北的关东军协同，在长城沿线及其他山区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在遵化东北部的洪山口和西端的新立村，分别建了两个部落（即"人圈"），日伪军对无人区的人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统治。

一、集家并村

遵化县境内长城沿线共 61 公里，日伪除把清东陵所在地马兰峪 10 公里地段划为"特区"由伪满洲国直接管辖外，下剩 51 公里长城沿线，几乎全都划为"无住禁作地带"。日伪军抓来大批民夫在长城沿线以南 5 公里处挖一条横贯东西的"防共沟"。沟宽、深各一丈左右。沟的北沿夹上树枝寨子。隔一公里修炮楼 1 个，重要山头、道口都有伪治安军据守据点。整个"防共沟"共筑大碉堡 27 个，日伪约派了 4 个兵团的兵力驻扎。"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分为三种情况：最惨的是成立"部落"，人们称"人圈"。长城沿线东端 17 个村居民被赶进洪山口"人圈"，西端的 9 个村被赶进新立"人圈"，把老百姓世代居住的房屋统统拆掉或烧毁，使大批无辜百姓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非人的生活，第二种是强迫毁掉住房，赶走居民，这类村有 93 个；第三种是"集家并村"，对地处纯山区的 32 个村，人被撵走，房子被封。

据统计,遵化县境内"无人区"总面积28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19%,包括6680户、31 000多口人,其中落入"人圈"的计950户、4600口人。

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日伪疯狂推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夹击、包剿外,还专门组织快速部队,普遍检查他们所到之处,不论沟谷川道,还是丛山峻岭,都反复搜索,经过之地,草木过刀,房舍过火。挖洞、推墙、填死水井,把群众掩藏的最后一点粮食和财物也给抢光。日伪军实行"集家并村",强迫群众进入"人圈",稍有迟缓不搬的见一个杀一个,甚至把砍下的人头悬挂在街头示众。家在"无人区"的群众惨遭杀害1200多人。仅马蹄峪、沙坡峪、冷嘴头、北下营等10个重点村,就杀害647人。盆楼峪的农民廖振富在"集家并村"时,实在没处投奔,急得一家老小抱头痛哭,为求活路,不得不让妻子领着两个男孩向南走,他领着闺女往北走,他妻子讨饭流落外乡,廖振富爷儿四个活活饿死在口外;冷嘴头农民张森、张斌哥儿俩,多年口挪肚攒刚盖上三间房,日伪硬逼他们搬家,故土难离,恋家不走结果到了期限,日军放火烧了房屋,哥儿俩也被打死。寨主沟180多间民房全被烧毁,但群众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舍不得离开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前后烧过19次,他们翻盖了19次。连马架子窝棚都不放过,最后一次被日军抢走牛羊200多头,驴36头,掠夺的财物用160盘驮子运了6天。两年光景,遵化县长城沿线有112个村变为废墟。前杖子村罗圈峪处在偏僻的深山沟,由于日军军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只有那里一度保存了21间住房,但后来,有本村坏人告密,日军快速部队得到消息,即行大规模搜山,说这地方是"八路军的老窝",还是给烧光了。

日伪规定的"禁作地带",一律不准种庄稼,每当春夏之交,日军使出最恶毒的一招——割青。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种出的庄稼苗,竟给连割三次,就连栽的萝卜、蔓菁、南瓜等矮株作物也都给铲掉。秋季敌人没有搜到的地段庄稼成熟了,日军又乘机大肆抢掠,辛苦一年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眼睁睁地落入日伪军的手中。头道城子的陈谋义、方平、方占相等7人,正在抢收玉米,伪讨伐队围上来,当场枪杀了方平、方占相,抓走了其余的5人,一直下落不明。

由于"三光"政策的摧残破坏,"无人区"人民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有的没有房子,不得不跟牲口挤在一块儿住。起初,马架子窝棚还用石块垒上围墙,多次被烧垒不起了,只好在四面透风,夏不挡雨,冬不避寒的窝棚苦挨,往往一个山洞子里竟有几家同住。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百姓无出路,拆房盖草庐,七家子、八家子,同住一个屋……"这样穴居野外一直挨到日本投降。衣着方面更是苦不堪言,有的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有的一家子抻盖一条破被,轮穿一件老羊皮筒,夏天毛朝外,冬天毛朝里,有的为了御寒,不得不钻柴堆取暖,拢火烤身,许多人大腿上烤出硬皮茧。吃饭是当时的一大问题,常年填肚子的只有野菜、野果、树叶、树皮、胡绿豆,秋黄季节才能找出青玉米、老南瓜之类进口。吃饭没碗,只好用碎石板、菠萝叶、窝瓜皮代之。做饭没锅,只好用残锅底、破洋铁桶、破钢盔代替。日伪

黑夜观火，白日看烟，一缕青烟暴露出去，就可能招致清剿。老百姓想出办法，让炊烟通过山洞或地窖散开。如果突然发生敌情，便把“锅”、“碗”背上转移或者就地埋藏。最紧急时，有的群众隐蔽在洞子里竟然三四天不食不动，冷嘴头一位农民何荣，年岁大，身体有病，家里人进了口外水泉“人圈”，他留在家里没走，临走时给他做了一笼筐树芽饽饽充作干粮，原想过几天来人看他，可是饽饽没吃完，何荣已死。

二、“人圈”内的生活

被赶进“人圈”者，如同陷入人间地狱。遵化西部的新立村“人圈”集中了9个自然村及散居山民530户、2400口人，1942年秋季成立了“部落”，四周筑起高大的墙围，围墙四角和大门设有岗楼。凡成年的男子除老残者外，统统编入保甲自卫团(棍儿团)，昼夜轮流巡查。青壮年还得去修公路、筑碉堡、开矿、挖沟，打死累死无人管。

日伪对“人圈”控制极严。每10户为一甲，30户为一保，全“圈”为一乡。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只证明身份，禁止与“圈”外发生联系。汉奸、特务在圈内横行霸道，时常通过“检举”，把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输运犯之类罪名强加给无辜百姓头上，随意捕杀。报国队员王雅如、张文奎被特务盯上，日伪军包围了他们的家，两人以“政治犯”论罪。1942年大“扫荡”，伪军把新立村“人圈”的百姓圈到太后陵附近的广场上，抓出5名所谓“可疑分子”，当众杀害。又有汉奸告密说陈敏、段文龙“私通八路”，被绑上扔进火堆。日伪本意抓劳工，却说什么抓被“检举”的政治犯，把许多青壮年抓到外地做苦工，一次将新立村“人圈”的谢振邦、金连喜等31人押送东北服劳役，一去未归。

兵劫、病疫紧相连，传染病给“无人区”带来更大灾难。“无人区”的百姓衣食住全没保障。“人圈”内污水溢流，粪便遍地，蚊蝇随处孳生，几乎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有病无医无药，造成各种传染病蔓延。1943年夏季，鸡鸣村一带“无人区”流行瘟疫，这个村病倒100多人，仅数日内，死亡人数竟有50口之多。1943年5月到8月，新立村“人圈”闹霍乱、痢疾，刘福贵一家4口3天之内全家病死。这个“人圈”因传染病死亡达530多人。那时候，“人圈”里几乎家家送葬，户户号哭，十分凄惨。

(选自《遵化县革命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迁安县境内的"无人区"

吴振强　尹成清

当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迁安县辖区与邻县接壤地区先后成立了丰滦迁、迁青平、迁卢抚昌联合县抗日政府,迁安至建昌营公路以西的长城沿线地区属迁青平联合县所辖。早在1940年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党的组织,抗日活动异常活跃,加之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军将其划为"非治安区",视为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之一。

1942年8月中旬,日军驻迁安守备队队长滕川协同伪警备队队长汤鹏举,指挥迁安县城、建昌营、罗家屯等据点伪治安军1000多人,在迁安长城沿线百余村庄反复"扫荡",疯狂抢掠、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并强行逼迫数以万计的民夫挖壕沟、修筑炮楼。首先完成了东起刘家营(今卢龙境内),西至刘皮庄一线的深1丈2尺、宽1丈的封锁沟,并沿途修筑了徐流营、朱家店、草场、郑庄、建昌营(据点)、雷庄、东密坞、西密坞、三岭(村南、北山各1座)、张庄子、黄金寨、大何庄、小何庄、万宝沟、曹古庄、沙涧(今属迁西)、刘皮庄等18座炮楼。炮楼分别以班或排为单位进驻日伪军把守。

这条封锁沟东西长近百华里,北至长城约8至20华里。内部地区72个村庄,即为"无人区",长城南侧8华里内,为"无住地带"。并在封锁沟沿线南部沙河庄、王古庄、刘皮庄、五重安、三岭、黄金寨、大崔庄、小崔庄、大新店、平林镇、后窝子、前窝子、曲河、小套等十几个村庄修筑了"人圈",即沿每个村庄周围挖成深宽各约1丈的壕沟,或打上木桩织成铁丝网,村口设一吊桥,限制出入(多数村庄没有建成),形同长城外伪满地区"集家并村"的"部落",因此当地人也称之为"人圈"。

日本侵略军还将迁安西部地区的王家湾子、水峪、白龙港一带宣布为"无人区"(敌人称之为"暂时无人村"),用于封锁丰滦迁抗日根据地(尽管多次烧毁王家湾子、水峪、龙湾、金龙口、混屯峪、黄槐峪、白龙港等十几个村庄,企图"集家并村",但是遭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坚决抵制和沉重打击,"无人区"的设置始终没有成功)。

壕沟、炮楼完成后,1942年底,日本侵略者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更加疯狂地推行"三光"政策。长城沿线迁安"无人区"内70多个村庄数千名群众

被强行赶入“人圈”,野蛮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400余人,摧残无辜群众近千人,烧毁房屋6400余间。仅在1943年1月15日(1942年农历腊月初十)这一天,就放火烧了小关、白洋峪、大庄、小庄、抬头岭、商庄子、娄子山、大洼、装货沟、石梯子沟、五道沟、四道沟、大沟、石门、新开岭、马井子、杏山、铜洞子等18个村庄,几千间民房和未来得及转移的大部分物品俱葬火海化为灰烬。当时有200户的小关村就被烧毁房屋近千间,使这村成为一片废墟。更加残酷的是地处伪满“国境”线关卡的白洋峪村竟先后被烧8次之多,就连一个窝棚也不能存在。大庄村农民刘开山宁死不进“人圈”,毅然扑向火堆,发出阵阵撕肝裂胆的呼喊:“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你们就烧吧,宁可烧死也不给王八蛋挖沟!”大火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以生命和血的代价控诉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暴行。白洋峪村杨义、宫占友、宫桂荣也因不愿“集家”被日军当场打死。

“无人区”大部分群众,誓死不进“人圈”。栖息山上住窑洞,冬不能御寒,夏不能防暑且非常潮湿,近千名群众染病而死。当时有800口人的小关村就死去300余人,仅郭印忠一家就死去8口人,李权福一家老小6口人也先后染病而死。腥风血雨笼罩着的“无人区”,噩耗频传,尸骨遍地,惨不忍睹。

“人圈”里的生活则更是苦不堪言。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夜不关门,以待日伪军随时搜查,许多妇女被乘机奸淫,就连十一二岁的小女孩、60岁的老太太也不能幸免。“人圈”里的群众啼饥号寒,多以野菜、树皮、草根、白薯秧叶充饥。过着“衣不遮体,糠菜半肚”的生活,冻饿而死的群众难以数计。“人圈”里的男性群众均被强迫去挖沟、修筑炮楼。小关村郑印宝不满14岁就被抓去做苦役,稍稍怠工就遭到毒打。一次郑印宝等7个小孩只因迟到不足一分钟,便遭到了日军迫其跪石子、晒太阳的惩罚。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几个可怜的小孩脸上滚落下颗颗豆大的汗珠,稚嫩的小腿跪破了,血染红了石子。即使这样,也没有免却日伪军劈头盖脑的皮鞭、枪托的毒打。

在日伪军规定的“无人区”内,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并在“无人区”边缘地界标有“无住禁作地带”的木牌。农民不种粮食何以为生,“人圈”里的百姓,只能乘夜间偷偷逃出,摸黑耕作。但是,灭绝人性的敌人企图断绝抗日群众一切生存条件,地即便种上,却仍然遭到敌人的毁坏。驻黄金寨塔山炮楼伪治安军一个姓史的班长恶毒地对出逃耕作的群众唱起小调:“我们当兵的到处有饭吃,南京不收,北平收,南京、北平都不收,河沟两岸种中秋。你们这里不种芝麻我们吃香油。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你们是天生的短命鬼,荞麦也不让你们种。”群众强压着内心的怒火,眼瞅着已过芒种时节,地种不上,心急如焚,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了。

日本侵略军还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恶毒手段。实行联乡保甲制,十户为一甲,五户联座,一村为一保,数保为一乡。并强令各村组织建立“反共自卫团”(亦称“反

共会")。当时迁安范围内普遍建立了伪大乡。北部"无人区",以播鼓台为中心,从于家坎、坎辛庄西至罗屯、沙洞、曹古庄、刘皮庄这块地区有 30 多个村子建立了"反共会"组织。一部分投敌叛国的民族败类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铁杆汉奸,成为敌人镇压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傀儡"政权和御用工具。日军特别注意利用"汉奸"的特务活动来监视、威胁人民,宣传"大东亚新秩序"、"日华亲善共存共荣"等欺骗口号来腐蚀"无人区"人民的民族精神,从而加强其殖民统治。

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即"无人区"范围内)高玉芝、魏东风、司营、任宝合 4 个民族败类相继叛变,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抗日工作受到严重威胁,斗争环境异常恶劣。这些汉奸,为讨好主子,不遗余力地"刺探情报",并带领日军拼命"清乡"搜查,频繁"扫荡"。北部"无人区"的敌人仅 1942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27 日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彭家洼、东密坞、西密坞、大崔庄、小崔庄、三岭、芝草坞、大庄、提岭寨、白洋峪、商庄子等北部地区十几个村庄"扫荡"十多次,抓捕抗日干部群众 200 余人,杀害干部群众 100 余人,烧毁房屋 600 余间。1943 年底,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抓捕并杀害了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报国会主任李光和建东、建委三名区委主要负责人。更残暴的是日军于 1942 年 9 月 10 日,举行集体大屠杀,将 300 余名干部群众杀害在大杨官营的老牛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人圈"里的群众一切活动都要在日伪军严格控制下进行,出门要出示"良民证",否则以"通匪"论处。敌人还强迫村民为其看护电线杆,并落实到人头,以性命担保。

侵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疯狂"扫荡"、"蚕食",制造"无人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最残酷的阶段。迁安大部分地区被"蚕食",地方武装被迫撤出,八路军主力部队十二团,为避敌锋芒也曾一度转移到外线活动。抗日政府在异常恶劣的斗争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顽强地坚持"无人区"的斗争:组织群众乘夜间去"人圈"、炮楼喊话,争取伪军弃暗投明。还在伪军和伪大乡中开展"良心大检查"。通过抗日力量的工作,黄金寨、姜庄子、雷庄、高古庄、大庄以及青龙河东岸 18 座炮楼 200 余名伪军相继起义,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政府组织群众破坏"人圈"和"遮断壕",采取了"磨洋工"或"白天挖,晚上平"等办法,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对"无人区"的设置。小关村青年农民郭明奇曾多次组织黄金寨"人圈"里的群众平沟,并放火烧掉了黄金寨"人圈"出入口的吊桥。大庄村报国会主任刘存本动员本村 200 多名青壮年一夜间将三岭"人圈"木桩全部拆掉,并放火烧毁。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负责人周青还带领白道子村 20 名民兵,深入口外张杖子俘虏 5 名监修"人圈"的伪警察。郭明奇等民兵骨干还经常活动在"无人区",埋地雷袭扰、消灭敌人。敌伪试图在长城沿线东部地区东、西密坞以东建昌营附近建立"人圈",遭到抗日群众的抵制和打击,始终未能建成。西部地区建立起来的"人圈"也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随着滦东新区的开辟,"人圈"相继被摧毁。

“无人区”的群众，采取“敌来我走，敌走我来”的办法在田间耕作，通过顽强的斗争，仍然取得了一些收获，尚能保障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军需给养。大庄村报国会主任将一缸小米藏在地窖里，被敌人烧焦，即便是糊小米，也全部贡献出来，以解决抗日政府工作人员“无米之炊”的危难。抗日政府与八路军主力部队密切配合，遵照党中央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和“敌进我退”的作战方针，破坏交通，割电线，开展地雷战，主动出击，歼灭日伪军。

八路军第十二团，长期驰骋于长城内外的冀东战场，有着强大的威慑力。为恢复基本区，1942 年 12 月，十二团再度返回迁安，在大贤庄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山本中队 50 余人，沉重打击了日伪制造“无人区”的嚣张气焰。十二团灵活机动，出其不意，不断向敌人进攻，为基本区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不完全统计，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底，八路军主力第十二团和县地方武装在迁安境内、进行大小战斗 15 次，毙伤日伪军 1036 人，俘 78 人，缴获炮 5 门、轻重机枪 13 挺、长短枪 500 余支，击毁汽车两辆、摩托车 1 辆，缴获马 2 匹。

抗日军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到 1943 年底，全部摧毁了“人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推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制造“无人区”的阴谋，沉重打击了它的残暴的血腥统治，基本区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从而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最艰难阶段。

（选自中共迁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烽火漫天》）

我所见到的热河省“无人区”

春 风

我堕身于伪满 13 年，在热河省境达 10 年。前七年职位是在伪省公署，任务是经常下乡调查宗教寺庙、古寺古物、学校教育等事，所以省政乡情大都耳闻目睹。后三年任伪热河省隆化县长，直到解放。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毒政暴行，多是身受亲尝，其中最残忍、最凶恶的就是在热河省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抚今思昔，令人不寒而栗！

“无人区化”的开端

日伪的“无人区化”政策，一般人都以为是在热河省开始实行的，其实来源于

通化。由于通化省在"九·一八"事变后,有爱国志士杨靖宇、邓铁梅等义勇军,风起云涌,越来越盛,致使日伪满军讨不胜讨,一时计穷智竭,无可奈何。适有伪通化省警务所长岸谷隆一郎(后任通化省次长),是一个满洲通(会说中国话,对满洲事情比较熟悉)。他诡计多端,具有一副假仁义真狠恶的嘴脸。他一方面组织伪警察讨伐队,进行讨伐,一方面利用地痞流氓,悬赏缉捕,终于把杨靖宇部下的程斌诱降到手。程斌曾充任义勇军参谋、师长等职,深知义勇军的底细,心肠非常毒狠,竟将义勇军食粮接应情况、隐身屯处所,一一暴露,并向岸谷献策"清乡断粮就可制义勇军于死命"。此计正对岸谷心头,就在这一带开始了"无人区化"政策:十家连坐,百户同科,一人犯法,各户均受牵连;清理人口,合屯并户,限制谷物出入,禁止人畜上山……岗哨林立,昼夜巡视,无辜居民,每遭诛戮!义勇军见此情况,遂转移阵地。日本鬼子认为得计,喜气洋洋,提升岸谷为伪满国务院地方处长,让他企划整个伪满洲国的坚壁清野政策。当时热河省情况紧急,他们不得不把这条诡计先搬到热河去了。

当时的热河省情况怎样?他们在通化的简单的坚壁清野能否用得上?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当时的伪热河省西部有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向热河省内进攻。因为是人民的军队,到处可以为家,反对侵略的战争,人人都愿相助。人民军队巧妙地实行了蜂蝶战术,这个战术是聚散无常,变化多端,说聚则遍地飞来,说散则踪影不见。明明是锄地农夫,紧急就变成战士;眼看是放羊童子,扬鞭举手都是通讯的暗号;追之于前,忽然出现于后;围之于中,转眼反被包围于内。在伪康德五年(1938 年,下同)春,伪滦平县红梅寺警察署,买了一车烧柴由一个村妪赶车,一进院就由车内钻出八路军数名,全警察署都被缴械。同年秋季,日本鬼子听说八路军攻打兴隆,动员全省伪军警都去"围剿",赶到兴隆一看,只见驻守兴隆的鬼子死尸在地,标语满墙。正在撕标语开追悼会的时候,距此 300 多里的青龙又被攻下。待到青龙,而西北部的丰宁、滦平等县(青龙西北 400 多里)都告紧急。东突西奔,不知所以。南瞻北望,草木皆兵,欲退不得,欲罢不能,遂使日本鬼子数万军警部队疲于奔命。但是帝国主义者向来不会甘心死亡的,每到穷途末路就向百姓张牙舞爪,这是他们的本性使然。约在伪康德五年(1938 年),这个万恶的"无人区化"政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在热河实行了。

"无人区化"具体内容

伪热河省的坚壁清野政策,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进行的,共分 4 个步骤。第一是清乡,第二是划定"无人区"(也叫"无住地带"),第三是"集家",第四是"三光"政策。在形式上看,有时各自为政,从本质来看,浑然连成一体,是步步紧,步步狠,狼狈为奸,相互为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1. 严格的清乡制度

首先是整理街村机构，重新规定村界，按照地形人口、情势险要程度等，规定每个县旗（旗是蒙民、旗公署相当于县公署），为10—20个村，每村设有村长、助理员、司计（会计）、行政（管户籍等）、烟政、弘报（类似特务）等股，村内职员大约不下20多人，小村也有十几个人，重要地带的村公所还设置1—2名日本人，名为村副，实为掌握全村大权。凡事都得通过他，否则就是藐视皇军，违背王道。村长多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有财有势的人，其他办公人员，或由县旗公署委派，或由本村推选，大都是认为政治可靠、家道殷实，有线索牵连具备牢固联系的人。每村公所内都暗设监视人1名（形同特务），村公所处还有专门对该村公所监视的一二人，定期向县旗公署弘报股和警务科汇报，情节较重的还得直接送交日满当地宪兵队。至于村长和村副惟一的职责，就是定期向上级汇报村民的动向。有书面汇报，定期汇报，紧急汇报，临时口头汇报，各有指定时期，逾期或漏报，即按西南防卫司令部的军法处罚，有功的也按规定行赏。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口调查（也叫村势调查），这个工作不仅是一般地把户数、人口数、年龄、住址、职业等项了解清楚，还要把每个人都划定类型。第一类是良民，多数是地主富农，守财如命，不能逃跑，恐怕八路军闹革命的人；第二类是次良民，所谓殷实人家，随着地主一边倒的人；第三类是“要视查人”，这一类人包括很广，一般无产业、光棍汉、旧军人、旧职员（指旧中国或伪满退辞的）、部分村长和个别警察等都划为这一类；第四类是由关内或远处新迁来的住户，或临时寄居的人；第五类是形迹可疑，或家中有在关内工作长期不归的住户。分门别类，登记在暗中的簿册，由伪警察或日满宪兵特务保管，逐区（按特务特殊定的区域，经常变换，外人摸不清）、逐户都有专职监视人员，一举一动都得汇报。

此外，各村还有协和分会的设置，名目是日满协和，伪装着一副慈善面孔，实际上是最阴险最毒辣、杀人不见血的特务机关。在“无人区化”政策上，专搞村民思想工作，他们和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专找穷人的破绽、机关单位行政部门的漏洞、各个阶层的底细，暗中向特务机关汇报，但是表面上却处处要显示出同情群众的样子，如张罗救济粮，发放救济衣，帮助医疗疾病，有时还出头保释犯人等装腔作势地假仁假义，无非借以掩人耳目而已，骗取群众的信任和好感，如此等等。鬼子以为是在政治清乡的基本工作上，作了万全的准备，有了必胜把握了，于是就开始坚壁清野第一步的屠杀政策，进行镇压。约在伪康德五年（1938年）秋季，就在承德大抓通匪嫌疑犯（指和八路军有联系的人），把伪省公署的张实科长、王股长、科员以及伪税务监督署科股长、警察、司法、工业、商业、一般住户等四五十人，都抓进监狱。轻的长期监禁，重的就地枪杀，弄得人心惶惶，惊恐万状！接着各县旗乡村，也进行同样的逮捕，凡是他们爪牙认为有嫌疑者，都难幸免。每日有大小车辆或成帮成伙地向承德押送。那时承德有3个大杀人场，是承德有名的3个大杀人窟。第一是鬼子的西南防卫司令部（承德离宫），凡是百人左右的大型集体屠杀，都在这

里执行。因为这个地区是旧日离宫,周围城墙2丈来高,方圆40多里,无论如何烧杀,外人都难看见,免露王道主义的丑态,并且有日军把守,不易遭到意外的袭击。第二个是承德监狱,能关押千余人,备有刑台、绞架、枪杀室、炼人炉,电烙室等,极尽其残,天天都有一二十人的生命葬送在这里。第三为日本宪兵队部,是个专门逼罪问供的地方。他们的刑具颇多,据说有百余种。按抓来人的年龄、性别、犯罪情节使用刑具。一人受刑众人陪场,弄得人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一经吐露真情,承认罪状,立即烧杀,尸骨无存,恐怕泄露底细。这就是"王道",这就是"皇道",这就是王道、皇道结合而成的坚壁清野政策一端。

鬼子认为这样做他们所谓的坏人就都能斩尽杀绝,高枕无忧了。谁知,越杀八路军的攻势越猛,越清八路军的耳目越多。各地此起彼伏,八路军日见增多。于是,日寇又布置了警察密网,张大爪子,凡是大一点的村庄,几乎都有伪警察署和分驻所。这些豺狼的毒辣更非言语可以形容,人民自然遭到了很大的涂炭。可是,他们对于八路军的行动仍然是无法弄清的。不但如此,他们这些伪警察署却遭到八路军的袭击和消灭。如在兴隆、滦平等县活动的八路军王亢部队,是专能打伪警察的,好像是接取伪警察枪械的别动队,每攻一处大都是满载而归,伪警察机构倒成了八路军的供应站,使日本鬼子狼狈不堪。于是,就开始了第二个"无人区"步骤。

2. 残酷划定"无人区"

啥叫"无人区"?"无人区"也叫"无住地带",就是把八路军时常出入地带或比较难于防守的地方,指定不准有人,名为"无人区域"。将原有住民,用扫荡方式撵走,房屋不自己拆除就被烧毁,鸡犬不留。设置监视哨所和扫荡部队,经常巡视。原则是见人就杀,见树必毁,蒿草没人头者都得焚烧,几乎使这里成为一片焦土!当然他们是挡不住八路军游击队的。可是这一带的人民就遭到了难以形容的灾难,有家不能归,有房不能住,几辈子血汗积累的庄园,就被这个坚壁清野的政策化为灰烬!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腿快的逃走了,老弱病残、恋恋不舍的,大都尽被杀戮!从热河的西南起,沿长城附近的山区,即凌南、兴隆、滦平、丰宁等县的西部,直至大西北和察哈尔宁县接壤的四海野(俗称樊梨花城)等地方,长约五六百里,宽有一二十里,人口不下十余万,就这样悲惨地葬送在刽子手的手里了。

这一时刻,我们考查古迹古物一行,经常去到长城附近一带无人地区的地方。大的部落如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白马关、樊梨花城、辽时的兴州城、韩昌府,辽皇肖银宗的梳妆楼、大阁镇,宋时的八郎村、令公庙,孟良盗骨的红阳洞、白草山,传说的李陵碑、苏武庙等处,无人地带的惨事悲音常常催下人们的酸心泪水。一般的古迹古物,也都在这"无人区"的政策中被摧毁了,如苏武庙中的碑文、姜女庙中的记载、玄阳洞的栈道、红梅寺的红莲遗迹等等,虽属传称,也是足资验证的珍贵材料,也都同归于尽了。

有一次,我去到热河最西北部的一个接近"无人区"的地方——樊梨花庙,在

这接近"无人区"的田间里,锄地拔草的人,都是一些老弱不堪的女人,全不穿衣裤,多数腰中围一块破布或麻袋,好像是不顾羞耻似的。我向当地领我去的人问,她们为什么裸腿露胸呢?天气热吗?他说:不是。他们没有衣服吗?他说:也不是。这是当地的规矩。谁定的这规矩呢?他说既不是前唐定的,也不是大清国定的。说完这些话他向四下望一望说:"先生你不知道,这是接近无人区的地带啦,从去年扫荡队来到这里发现耕地的人身藏武器、干粮袋,暗结八路以后,就给我们下个禁令,不许男人到这里种地,女人种地也不许穿衣服,经大家要求才允许围在腰间一块布,这可就笑话了……"我追问再三,他才说:"不但这样,有时鬼子来了,还让她们将围布扯掉,任意耍笑、调戏,那些样子可就难说了。年轻女子有的疯了,有的跑了,所以就剩这些老弱锄地拔草了。唉,前几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还被他们拉去了呢。先生,你知道咱这仅是接近无人区,那无人区比这还惨呢!唉!哪说哪了罢,先生!"

在兴隆县的水场,有一位受苦最深的老大爷说:"哎呀,你来了,你再晚来两天连我也看不见了。我一家11口人,全变成鬼了,给你讲修长城的那个老太太,被火烧死了。我的大儿子被吊在树上点天灯了。我3个儿子1个被枪杀,2个被扔在火坑里,最可怜的是我那两个年轻媳妇、3个小孙子,1个将近14岁的老闺女!都活活的被鬼子拉走弄死了。我,我还能活着吗?我的祖先是修长城时死的,我的父亲是直奉战争给军队拉道(引路)被枪打死的。我的母亲不是前两年你来时被鬼子搜家时吓死了吗?我还活着干啥?这次是鬼子有意让我看这些情景,好宣传皇军的厉害,所以没把我绑在树上弄死。咳!家家有死人,户户遭火烧。还用我说吗?谁不害怕呀!我过几天就跳长城找我们祖先去……"这是伪康德五年(1938年)日军扫荡热河西部的情况。这不过是悲惨中的一点点。沿着长城这一带,人家星散的山沟里,多数是这样。时常尸横遍野,臭味相闻五六里,哀号声音响彻云霄,令人毛骨悚然!

3. 凄惨的"集家"

"无人区"是日本鬼子对付八路军的第二道挡箭牌,既能坚壁,尤可清野,似乎是一个得意的阴谋,可是事实恰得其反,不但未挡住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攻入热河省的内地,不但未减少八路军的力量,反倒壮大了八路军的队伍。"无人区"的青壮年除死者外,大部都成了八路军的坚强战士。地理熟悉,人情透彻,不仅到处可以为家,还能得知敌人的底细。白日隐避,夜间行军。在伪康德五年(1938年)末,部分八路军已攻到热河中部,直到东部的平泉县、凌源县、喀刺沁旗等处。连承德街的伪西南防卫司令部、日满宪兵队、伪省公署、警察等机关门口,都被贴了反满抗日的标语。有时岗哨丢枪,有时手榴弹炸到院内,甚至有时伪军失踪和丢失密件等,层出不穷。把一些鬼头鬼脑的家伙们,都弄得昏头昏脑了。于是,又想出了集家的政策。按照地理环境,把全省各地人民都集中在各个指定的村、屯,用围墙圈

起,设置门岗警卫,检查来往行人,以断绝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

"集家"政策的规定:

(1)为实行王道主义,"保护"人民利益,便于皇军"剿匪"工作,进行全省集家。

(2)凡不满10户或稍多一点的"通匪"地区住民,一律迁移指定部落或地点,不准有任何留恋。

(3)一经被指定迁移的人民,不拘远近,一律限期搬净,过期即有意"通匪",尽行烧除。

(4)不向指定地点迁移,逃亡山野者,均为不法,枪毙不贷。

(5)所遗田园,须按驻在警防机关指定时期耕种,如有违犯,即行严加法办。

(6)所有指定的集居部落周围,都得修1.2丈以上的高墙,开2门或3门,最多不超过4个门,每门修炮台1所,守卫室2间,昼夜设置岗哨,遇有外来串亲等人,均须验证登记,否则不准入内。

(7)为锻炼国民道德,遵守"爱国"思想,凡出入卡门时,须向日"满"国旗和门卫人员敬礼,必要时得会背国民训。夜间禁止出入,遇有特殊事故,必经保甲长证明事实,门卫批准方可放行。

(8)门卫有检查盘问搜身权限,无论何人,不分男女老幼均不得拒绝。

……

诸如以上20余条规定,形同监狱,没有两样。根据这些规定,由伪康德六年(1939年)起,就开始了严格的集家工作。散居的山乡农民都得向指定地点搬家。祖祖辈辈燕子垒窝一样的一砖、一瓦修盖起来的房屋,眼看着被拆除,被焚毁!爷爷奶奶所栽培的果树,眼看着被砍伐,被烧掉(特别是热河西南果树最多,人多依以为生)。多年血汗化成泡影!有的性急投河跳井,有的悬梁自尽!差不多哪个村庄都有这样惨状,若以全省来说,死者更不知多少了!

"集家"后的部落,都得严格执行保甲制度(伪满除热河外其他都是街村制)。十家连坐为一保,十保相邻为一甲,甲上为村,村属于县。每村设一警察署或分驻所,要塞地方,布置军警讨伐队,或固定的监视据点,备有各村攻守设施,层层节制,步步森严,不异天罗地网。

整个热河全省,到1945年止,除隆化县外(隆化只集家一部分)全部集家,也就是把全省人民都圈在这样的人圈里了。财产的损失,人命的牺牲,真是一个不可估计的数目!至于对人民侮辱的情况,更是不堪设想。每个部落都有一至二三个警卫室,备有刑讯看押的屋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押,夜夜有人被侮辱。就以围墙的卡门来说,那种非人性的搜查,一般妇女都认为是一个鬼门关,天天必须经过,经常受到警卫人员的耍戏。偶一触犯这些豺狼,就被提到关押室内,百般侮辱,莫可言状!被关押的有人被折磨死,有的人忍辱自绝,但这些兽类还不以为足,有时插圈弄套,夺人妻女。试看警卫人员或讨伐队的头头脑脑,谁不是三妻两妾呢?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越这样做同人民的结怨越深，而八路军的行动就越得劲。结果，把集家变成了给八路军的让路工作，遍野无人可以任意出人，集中攻击的目标非常好找。用粮即到部落攻取，用枪械弹药即向警察署、所提拿。今天这里陷落，明天那处被包围，致使鬼子顾不了头脚。不得已，他们就在各部落大量屯驻日“满”军警。殊不知，进时容易退时难，多数都被八路军困在部落的核心，周围埋伏许多地雷炸药。仅用少数人提防，他们就不敢越围墙一步，如此圈人竟成了“圈”己。

4. 血腥的“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是日本鬼子穷途末路的一着，也是热河省坚壁清野中最后的丑态。他们的目的是，宁可把热河省人民杀绝，也不让八路军进犯雷池一步。决心是很大的，殊不知历史的发展规律，早已注定了帝国主义者必亡的命运，这些垂死挣扎又何济于事呢？

约在伪康德七、八年以后，尤其是伪满末年，驻在热河省的西南防卫司令部和伪热河省军政当局，曾一再奉行日本关东军的命令、伪满国务院的指示，必须把热河省的八路军斩草除根，否则就以军法处置。这一严格的要求，就冲起了魑魅魍魉——日伪军的凶恶分子挥起无恶不作的屠刀，推行“三光”政策，对群众实施暴行。何谓“三光”？就是使热河全省境地，无八路军的踪影，无通匪的人员，无资匪的财物……有则杀光、烧光，抢光，所以，人们管这叫“三光”政策。日伪为完成这一政策，把在东边道大显凶相的岸谷隆一郎由伪国务院地方处长，调任伪热河省次长。又把他豢养的爪牙警察讨伐队程斌部队、范文部队、鹏飞部队、徐景部队、陈天部队等调到热河。再加上日伪军，不下十来万人，组成西南防卫的攻势，他们的分工是以行政警宪深入各村搜根摸底，洗清思想，以日伪军讨伐队，展开扫荡，烧光山野；以司法特务，毒刑论罪，洗净“匪源”。进一部落，清一部落，见一“坏人”杀一“坏人”。何谓坏人？凡财产少，以劳动为生，光棍汉，或捎带民族气节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见着这些人，就得追踪问底决不放松，偶有破绽，即行烧杀。宁可错杀、错烧、错抢，不可不杀、不烧、不抢。少杀、少烧、少抢者无功；不杀、不烧、不抢者有罪。什么罪呢？不是通匪，就是思想需要矫正，要送法院关押或关在矫正院。一经触犯伪条令就不赦免。各地配有日本宪兵队，从侧面监视。无论哪个讨伐队，都得走这条杀人放火的道路。特别凶狠残暴的是刽子手程斌伪警察讨伐队，不但尽可能地杀人放火，还借机大肆抢掠，每人都发了一笔横财。有一日本鬼子名叫“阿部军副”的，是指挥官，别号“大鬼头”，曾以卖棉被絮钱向本国邮寄。他还有个兽性嗜好，专门搜集妇女花枕、衬衣、裤衩、小娃用物之类的东西，所以人们又都暗地称他为猪八戒。他又是一个极凶恶、极残忍的野兽，他在滦平县烟筒梁一带讨伐时，吃过人心，喝过人血。如是形色不止阿部一个人，一般日本鬼子和丧心病狂的伪警察多数是这样。至于大型屠杀的情形，更是有甚于无人区的扫荡和集家工作的凶

残，天天以汽车、大车络绎不绝地向承德三大杀人窟送人，日日可闻烧杀不绝的哀音！如宽城县峪耳崖南边一个部落，据特务腿子报告，曾住过几次八路军，这些屠夫就大发雷霆之怒。在一个早晨，鬼子就把这个部落围住，假称集合训话，把全部落的30余户200多口人，不论男女老幼，都驱逐到街头，用机枪射杀，接着就纵火焚烧，哀号震天。正在这时，他们又拉来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孩，用枪挑到火堆里去了。他们还说：“老八路、小八路统统的死了的好……”其他如汤河口、盘道梁、玄阳洞、茨榆沟、三义岭等沿着长城附近的山沟里劳动人家，更可想见杀了多少，烧了几何！抢去若干！原来鸡犬相闻，人烟在望，这时30里、40里找不到一个人家，到处是烧杀遗迹，破户残梁。草木半生半死，山野尽变焦黑，形成一片阴森凄凉景象！

八路军为减少人民的灾难，一时暂避收兵，不大出动。鬼子们以为得计，喜上眉头，庆祝成功。没想到仅过两个月，东部、北部的八路军就纷纷出动，部落据点时闻陷落，伪警、伪军节节败北。鬼子大慌其神，调兵遣将，昼夜奔忙。正忙于东北的堵击，突然八路军肖克、王亢率领大军，分两路攻来，西部情势又呈紧急。弄得鬼子仓皇失措，慌作一团，垂头丧气。据说，西南防卫司令官稻田降职调转。永幡僚二大队长由于在围场御道口全军被歼，破腹自杀。

这时，推行“无人区化”的元凶——岸谷隆一郎竟提出悬赏缉拿八路军首领的口号。拿获肖克为10万元，李运昌为5万元，王亢为3万元，连级以上干部由2000元至20 000元。有私报住处因以捕获者，各赏该金的十分之一。穷途末路的日伪军，丑态毕现。

总之，政策之毒辣，莫过于伪满的“无人区化”；受害最深，莫甚于伪满统治下的劳苦大众。日本鬼子真算是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的劣迹。他们凶恶狠毒，残暴绝伦。我虽在热河亲尝目睹10年之久，恐怕是穷我毕生之力，亦难罄其万一。惟仅撮其梗概，亦可窥见伪满王道政策的本质。

（选自周金生等编：《承德文史文库》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承德宪兵队及其暴行

傅大中

“西南治安肃正”在1942—1944年达到了高潮，其中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3年最为残酷。当时受害最重的是承德、滦平、丰宁、青龙、兴隆5个靠近长城的

县。这场大规模的武装镇压的最高指挥者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军司令官。主要参加者有日伪军、警、宪、政、协和会五部分，人数在 30 万以上。这场讨伐中，日伪方面搬用了对通化地区讨伐的经验，并把参与策划通化地区讨伐的主要罪魁都调到这一地区指挥讨伐。在通化大讨伐中，罪恶累累的程斌、唐振东等 8 个通化警察大队全部被调到热河，改编成热河警察大队，伪满宪兵总团也临时从各地抽调宪兵编成“西南特务宪兵队”。

承德宪兵队也根据讨伐的需要，改变了机构。除原设的各分队、分遣队继续保留外，1943 年 1 月，又从作战部队抽调数百名“补助宪兵”，与宪补、宪兵补编成 3 个宪兵游击队，每队 120 余人，下设 3 个小队、9 个分队。从全伪满挑选政治镇压经验丰富的宪兵干部出任队长、分队长。当时第一游击队长是“闻名”全伪满的日本宪兵中尉长岛玉次郎，他以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身份指挥第一游击队在承德、滦平、兴隆等县活动，主要目标是镇压中共承滦兴县委；第二游击队以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为首，活动在承兴两县交界的半壁山地区，以镇压中共迁遵兴县委为主要任务；第三游击队以喜峰口分队长三井秀夫为首，重点活动在青龙县内，以镇压中共迁青平县委为主要活动目标。

1944 年 3 月，日军调整了热河的兵力部署。从华北调来一个师团，接替热河独立守备队，进热河地区进行讨伐。该师团长接任西南防卫军司令官后，根据热河地区的特殊情况，把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组织活动方式移入到热河，重新改组了热河的宪兵组织。

首先，他将承德宪兵队原有的承德、青龙、喜峰口、赤峰、平泉、古北口 6 个分队的兵力压缩，使其专门担当军事警察任务。在交通要道，“治安不良”地区的茶棚、宽城、双山、峪耳崖、琉璃庙、白城子、马兰峪、叶柏寿、上谷、凌源等地设立了宪兵分遣队，由承德宪兵队本部统一指挥，配合宪兵特别警备小队活动，这些宪兵派遣队以后都改编成宪兵分遣队。

同时，又将 3 个宪兵游击队编成 8 个特别警备小队，每队 50 人，下设 3 个分队 9 个组，全部改成轻装，专门对付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和中共地下县委的干部。1944 年改编后的宪兵特别警备小队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小队：队长，承德分队长笠井神夫中尉兼，主要活动在喀左旗和凌源地区。

第二小队：队长，古北口分队长长岛玉次郎中尉兼，主要在喀中黄土梁子一带活动。

第三小队：队长，赤峰分队长百岛少尉兼，主要在青龙、宽城地区活动。

第四小队：队长，青龙（喜峰口）宪兵分队长佐佐木宪兵少尉兼，在青龙地区活动。

第五小队：队长，青龙宪兵队附高山准尉兼，在青龙县双山子一带活动。

第六小队：队长，平泉宪兵分遣队木下宪兵准尉兼，在喀左、宁城地区活动。

第七小队：队长，承德宪兵分队副仓岗准尉兼，在承德地区活动。

第八小队：队长，不清楚。

1943年6月，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还与伪西南防卫军参谋、伪热河省警备厅特高课长、伪协和会长等人共同策划了对"家理教"的收买活动。历史上由于热河地区是蒙汉民族杂居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导致"家理教"、"红枪会"一类宗教团体在这一地区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承德宪兵队为利用这些宗教团体配合讨伐镇压活动，决定对其进行收买。结果，承德宪兵队将"家理教"的20余名头目都收买成特务班长，责令伪热河省协和会和警务厅为其提供经费，指挥他们大力发展教徒，以此搜集八路军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日伪警宪配合军事讨伐，在这一地区疯狂地进行搜捕、抓人，制造了无数起血案，承德宪兵队便是其元凶罪魁。现列举承德宪兵队直接参与指挥的重大血案两例：

半壁山地区的三次大逮捕

半壁山地区位于兴隆县东南部，是八路军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在冀热边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9年，这一地区就是敌后游击区。1940年3月，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成立后，领导该地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一地区，村村都有中共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两面政权，少数村庄还建立了抗日武装。抗日民众配合敌后政权征粮、征物，转储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破坏日伪的交通，传递情报，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这一地区也成了"西南治安肃正"中的重点。在1942年、1943年、1944年3个春节，承德宪兵队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利用中国人民在家过春节的民族风俗，连续进行了3次大逮捕，据统计，有1890名群众被捕，数百人被处死。

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开始的第一次大逮捕，是喜峰口宪兵分队直接指挥的。在此之前，喜峰口宪兵分队指挥伪半壁山警察署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潜入到这一地区，对抗日家属、区村干部、进步人士、接近八路军者、积极交公粮的人等进行调查。之后，在大批伪军警的配合下，将这一地区的各个村庄包围，宪兵按名单抓人，然后送兴隆特别治安庭审判。这次镇压相当残酷，共有五六百人被捕，近百人被处死，余者多被课以重刑，押到东北各地做劳工。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943年旧历腊月二十九日至正月初六进行的，逮捕的方式和第一次相同。由于这一年是"西南治安肃正"最残酷的一年，因此，这次在半壁山地区的逮捕也最为残酷，有约900多人被捕。锦州特别治安庭派出人员在当地设置"临时治安庭"，随抓随开庭审判。不出数日，即有百余人被一审判处死刑，由宪兵和警察就地进行集体屠杀。第三次大逮捕是在1944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到正月初四进行的。在这次大逮捕中，

敌人采用了和前两次完全不同的作法,见到中国人就抓,尤其是在靠近长城的靳杖子、冷嘴头、赵杖子等村最为残酷。其中,仅靳杖子一村就有100多人被捕。这次大逮捕,半壁山地区数十个村庄无一幸免,共有1300余人被捕。

据当地调查证实,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屠杀暴行令人发指,被杀绝斩尽的不下几十户,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幼儿,以至于哑巴、残疾人都无一幸免。由于屠杀,在蓝旗营村造成了“万人坑”,在大莫峪等村造成了“寡妇庄”。1944年以后,这一地区成了“无人区”。

九虎岭的劫难

九虎岭村位于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抗日根据地内。1941年以后,中共冀东党分委领导下的迁青平联合县委经常在这地区活动。在九虎岭村中有一个仅有30来户的小庄叫九虎岭庄,1942年7月和1943年1月,曾两次受到日寇的血洗,数次遭到劫难,其中1943年1月的一次最为悲惨。

这年1月,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委正在九虎岭村开会,承德宪兵队长得到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的报告后,鉴于这一带抗日武装的强大,遂立即从承德、古北口两地调集了100余名宪兵,加之喜峰口分队的60余名宪兵,联合组成搜索队,在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的带领下,连夜便将九虎岭庄包围。由于县委干部撤走,宪兵遂对民众采取了残忍的报复手段,抓捕了19人,将14人当场杀害。其残害的手段令人发指:有的被打碎下颌致死;有的被按在地上挖去双眼;有的被挖去心;有的被塞进冰窟窿;有的用三角尖木棍穿透胸膛钉在地上钉死。宪兵在过堂审讯时,使用的手段更加残酷: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烙掉了鼻子,有的被烙得露出了天灵盖骨。不仅对成年人如此,对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村民刘文振8个月的小孩,被日本宪兵从其母亲的怀里夺去,活活摔死。由于日寇的残暴杀戮,这个仅30来户的小村庄就绝户了7家。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承德宪兵队除直接参与制造了上述几起大惨案外,在最残酷的1943年,还指挥了全热河的日伪警察,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团体进行了大逮捕,敌人将这两次活动称之为“剔抉”工作。据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向伪警务总局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第一次大逮捕是在9月11日到9月27日进行,主要对象是承德东南部和兴隆县东部的迁遵兴联合县委;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联合县委;青龙东南部的凌青绥联合县委和平泉西南部的承平宁联合县委。由承德、古北口、喜峰口分队和平泉分遣队分别指挥上述4个地区的伪满警察、伪满宪兵、铁警在日伪军的配合下进行的。第一次“剔抉”总共逮捕了958人,其中456人被送伪法院判刑。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0月6日到10月19日进行,这次除继续在第一次逮捕的地区重新逮捕外,喜峰口分队还将逮捕范围扩展到了长城以

南的迁安县滦阳、铁门关和碾子岭等地区。第二次"剔抉"总共逮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伪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军、警、宪、特、行、政、司法、协和会等机构联合镇压的办法。伪锦州高等检察厅和高等法院配合讨伐,在热河很多地方设立了"临时特别治安庭",对逮捕的抗日军民随时起诉,随时开庭,一审判决。当时,伪锦州高等法院在讨伐最残酷的青龙、宽城、喜峰口、平泉、半壁山、鹰手营子等地,都开设过"临时特别治安庭",审判后将判处死刑的人,随时交给当地日本宪兵就地屠杀。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法西斯为彻底割断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血肉联系,疯狂地推行了"集团部落"政策,热河的广大地区被划成"无人区",严禁老百姓进入。1943年以后,承德宪兵队还编成了宪兵游击队,在长城两侧的"无人区"进行游动搜捕,发现有人脱离"集团部落"进入"无人区"活动,就当即杀死。下面是日本和歌县人岛津西二郎于1954年8月16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1942年来到中国,1943年时是承德宪兵队所属长岛玉次郎部下的第一宪兵游击队宪兵伍长,他说:"1943年11月15日,我们长岛游击队第一小队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西北方活动,逮捕了1名被怀疑是八路军联络员的行商,我对其进行了审问。该商闭口不答,小野曹长当即命令我等7人对其刑讯拷打,我将这名行商打倒后,用他自带的扁担压在他脖子上,用脚踩着两头,一直把这个人压死。"

"1944年2月20日,我们在密云县东南地区活动,夜12点左右,见有一农民在耕田,长岛队长认为此人在夜间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故命令将其逮捕杀死,当我持刀去砍杀时,该人已被别人砍倒,正在痛苦挣扎,我又连砍了几刀,将该人杀死。"

"1945年6月,我们在遵化县马兰峪南搜索时,发现了一对新婚夫妇。我指挥部下将他们逮捕,先打成半死状态,然后将男的拉到田中用军刀杀死,女的交给新兵练刺杀。但女的用手抓住刺刀不放,新兵不能刺中。于是,我上前将这个女人摔倒,用军刀砍了她的脖子,将她斩杀。"

在这个宪兵头目血淋淋的供述中,就可想而知宪兵在热河地区的残忍凶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按计划承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要被改编成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第6大队,准备配合关东军第四方面军阻击从外蒙和中苏西部国境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为关东军主力撤至通化、朝鲜一线后,在苏军占领地开展游击战。但由于苏军迅速进入东北,承德宪兵队还未来得及改编完,就随日本投降而被解除了武装。

(选自周金生等编:《承德文史文库》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调查报告

彭明生

一

承德是一座历史名城，它曾经起过清朝前期第二政治中心的作用，成为清王朝的陪都。承德也由此而闻名中外。

日本侵略者1933年3月4日占领承德。为尽快扑灭当时热河各地燃起的抗日烽火，日军在承德街（日伪统治时期，承德被称为承德街），设置了许多统治机构，其中主要的有热河省公署、承德县公署、驻守锦州省热河省兴安西省南部的日本关东军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日本承德宪兵队、日本承德宪兵分队、满洲第五宪兵团、热河省协和会等军政警宪特首脑机关。日本侵略者不仅把承德作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的政治、军事中心，还作为镇压反满抗日的司法审判中心。伪“满洲国司法审判制度是四级三审”。伪满洲国在承德街设置了锦州高等法院承德分庭（承担热河省境内的三审业务），承德地方法院（承担承德、兴隆、青龙、丰宁、隆化、围场六个区法院的二审业务）和承德区法院（承担承德、滦平两县的一审业务）以及与法院相对应的检察机构。这些机构设置，使得从各地抓来的人都可以在承德街终审判决。

按照审判机构与监禁行刑机构的配置规定，热河省内只在承德和赤峰两个地方法院所在地设置监狱，其他各县旗的区法院所在地只设留置场（临时拘留所）。他们把始建于民国初年的承德监狱，作为热河省监禁行刑的中心监狱。并将容纳800人的承德监狱迅速扩建成监禁2000多人的热河省最大监狱。正是经过这些机构，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伪满洲国西南边界最大的“万人坑”就产生在当时的承德街水泉沟。

水泉沟是承德市市区头道牌楼外西边一条山沟，走向自北而南、东西宽八九百米、长约1500米，因有一眼泉水沿沟流淌而得名。沟东为避暑山庄西宫墙，距市中心约2.5公里。在清朝初期，此沟古树参天，草木茂盛，自然风光十分优美，被康熙皇帝钦定为三十六景中第九景“四面云山”景观区。

随着清朝的衰落,皇封禁地不断遭到破坏。经过多年乱砍滥伐之后,水泉沟的自然植被逐渐剥光,至军阀汤玉麟统治时期,沿沟山坡已经变成光山秃岭,只剩下39户100多口农民分住在沟沟岔岔,种地为生。

日本侵略者为了将抓到承德监狱的抗日人士迅速杀害,他们选定水泉沟作为承德监狱之外的杀人场。日本侵略军在设置杀人场地时还赋予其殖民统治者的寓意,把水泉沟东边的几个山头从沟口往沟里编为"天、地、元、皇、宇、宙、宏"七处,每个山头都圈为公墓,其中第四个山头老阳坡(约30多亩)占皇字,就将这个土层很厚的黄土坡划归承德监狱墓地,意示在这里杀人是"为日本天皇收回不良臣民"。从此,水泉沟老阳坡变成了日本侵略者屠杀抗日民众的刑场。

1933年春天,最初在老阳坡砍人,先挖一个坑,给被害者蒙上眼睛,令其跪在坑边用刀砍头,把尸首踹入坑里,这就是水泉沟万人坑的起源。万人坑的形成,与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不同,它不是一地一时一事造成的大惨案,而是日本侵略者在盘踞热河12年多的时间里,将从伪锦州省、伪热河省和长城以南各地抓到承德的抗日人民,或者直接杀害在老阳坡,或者在承德监狱虐杀或刑杀后再把尸体弃于老阳坡形成的。几项累计,被日军残害而置尸于水泉沟的总人数达3万多,水泉沟万人坑因此而得名。

二

水泉沟万人坑的形成,有其地理位置的因素,尤其与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直接相关。当时的伪热河省,南部以长城为界,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北平市为邻;西边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辖的察南自治政府接壤;东跟伪锦州省挨肩,本土属伪满洲国的西南边疆国防省。地形特征是丘陵构成的山地,其中有雾灵山、五指山、都山等大山区,这些为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提供了很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在战略地位上,承德地区既是日本侵略者巩固满洲、妄图称霸亚洲的后方基地,又处于共产党、八路军决心开辟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区域。这个被敌对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奋力争夺的地区,常常处于拉锯状态,这就产生了许多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情况。兵家相争,既争地盘,又争在日伪严密统治下的老百姓,这一特殊情况既鲜明地表现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形成的艰难,又说明了承德万人坑的成因。

1933年初,日伪军就开始在热河"讨伐"抗日武装。

1934年秋冬两季,在热河省进行了1190次"讨伐",打死民众抗日志士1452人,俘获民众抗日军2579人,带到承德监狱238人,其中一部分被杀后将尸体扔到水泉沟老阳坡。

伪满洲国民政部康德三年(1935年)第二次统计年报(仅统计当年)记载热河

省“讨伐”民众抗日军2245次，俘获人狱人数2347人。

1936年度，伪热河省军警“讨伐”反满抗日事件2940余次，俘获人员4414名。

1937年2月在凌南县“讨伐”“抗日救国军”射杀司令李树桢等7名，俘获4名。同一年度中，在伪锦州省内“讨伐”抗日游击队俘获2412人，杀死135人。以上两省[1]讨伐共俘获7060人，杀害157人，其中119人被杀害在承德。

1937年8月18日至29日，锦州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须乡季三率宪兵和警察奔义县，将事先探明在王凤林家开会的东北暂编仁义军总司令张广田等97名干部一齐“逮捕”。军长王凤林因当时受刑，心脏麻痹死去。11月11日，将总司令张广田，第一地区司令官、军需处长张文波，军医处长王子权，旅长张香甫、曹庆洪、刘子权、孟广忠及旅秘书处长佟吉祥等人送交承德第五军管区军法处，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

1937年至1938年春，日本承德宪兵队率领热河省警察讨伐队先后5次到上板城一带“讨伐”，俘获140多名抗日爱国者，在承德监狱押些日子之后分批拉到水泉沟杀害。

1938年10月中旬冀东大暴动受挫后，暴动队伍随八路军第四纵队向平西转移途中，一部分人在遵化县南部宫里遭到进关的热河日伪军讨伐队包围，在战斗中，有300多名暴动队员被俘获，押到遵化县城第一中学，然后用绳子捆着，装上汽车，用喷雾器喷洒药，使人昏迷，上面罩上网子和炕席，运到承德，杀害一部分，狱中折磨死大部分，没有生还者。同年11月29日，驻喜峰口日伪军200多人外出“讨伐”，包围迁安县苇子峪村，在战斗中将中共迁安县县委委员、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刘永丰及刘珍等多人俘获，转押承德监狱后杀害。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热河时，第三十一大队派出政治处主任孔祥卿、参谋长陈坊仁带领刘德才连队袭击承德上板城火车站。当时八路军没有进承德街，而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热河人民反满抗日情绪，由日籍特务文履谦受命谎报侦探情况，制造了轰动伪满洲国的承德“救国勇士团”案。由日本承德宪兵队准尉板田毋雄为头子，抽调日本承德宪兵分队、承德警察厅、承德县警务科、伪满承德第五宪兵团、日本承德领事馆警察署人员组成特别搜查班，承德警察厅童瑞九当翻译，以搜捕剿灭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与共产党八路军勾结建立承德“救国勇士团”组织为由，于1938年(康德五年)11月17日进行大“逮捕”，将承德街比较有名望的人“逮捕”130多人，经过刑讯筛捕入狱104名；又从赤峰、建平、滦平、隆化等县“逮捕”同案犯押到承德200多人，在承德监狱折磨死37人。

1939年2月，日本承德宪兵分队长谷川少佐在承德县下板城一带“讨伐”，俘获中国抗日爱国者200余名，其中18人送承德监狱折磨死。同月，在古北口日本

① 指伪热河省、锦州省。

宪兵分队长斋藤中尉指挥下，于滦平县汤河口一带"讨伐"，俘获40余名抗日爱国者，当场用棍棒刑讯打死2名，10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28名判有期徒刑。8月中旬，在斋藤中尉指挥下到滦平县汤河口东北方10公里一带地区"讨伐"，又俘获100余名抗日爱国者，在汤河口拘留所折磨死4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20名，其余判5年以上徒刑。11月，由驻兴隆日军881部队组成的军警宪联合作战讨伐队，在长城一带"讨伐"，俘获中国抗日爱国者300余名，经上大挂棍棒殴打刑讯致死5名，砍2名，40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160名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同年冬季，驻丰宁日本宪兵派遣队带领军警联合讨伐队几百人将丰宁县西部国境天河立沟、千松台两个区30多个行政村包围，把两个区的抗日爱国武装和区村干部全部俘获，在当地杀死9人，押解承德70名，内中15人送去东北当劳工，其余在承德杀害。同年冬季，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军进关"讨伐"，把遵化县新立村包围，在战斗中将王玉田等25名民兵俘获，押到承德，在狱中折磨死。同年冬季，日本承德宪兵队带领讨伐队300多人去密云县新城子乡一带"讨伐"，将大树洼村抗日爱国者李宝昌、李庆云、蔡润普、杨玉山4人俘获至承德杀害。

1939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在长城线上实施集家并村制造千里"无人区"，企图用拔根断源之法，隔断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将一部分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划人"无人区"，对无住禁作地带经常搞"扫荡"。扫荡队见着妇女便野兽般地强奸蹂躏，然后无论老人和儿童一律杀光，将被害人的耳朵割下串在铁丝上，作为请功领赏的凭证，见东西抢光，带不走的烧光。

在集家区进行罪名繁多的大"检举"，如"清匪大检举"、"投匪家族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清乡大检举"、"反集家大检举"、"破交大检举"等。"检举"的方法，多在清晨或农历的年节日，乘人不防备之时，由日伪军或讨伐队将部落围住，把村民集中到一起，由警察或宪兵查验年满15岁至60岁男人的户口、指纹和证明书，三者中有一项不符合的，就按嫌疑犯抓起来。凡是给八路军、游击队带过路、送过信、管过饭、做过鞋、留过宿的一律按"通匪"对待，全部"检举"或杀害。亲朋中有参加八路军或游击队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按"投匪家族""检举"。对参加破坏交通活动的人，砍一根电线杆子要一个脑袋。

1940年秋，承德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小山内义雄带着县讨伐队去车河一带"检举"，抓进承德500来人，先关在承德街警察署留置场，不几天又押到监狱去，全是老百姓，都死在了承德。

从1940年8月至1944年底，仅"北边镇护"和"西南肃正"两个区域"逮捕"抗日军民100 700余人，判刑关押47 000余人，判刑杀害11 000余人。

1941年2月，日本关东军去密云、烟路、挂甲峪一带搞"检举"，被抓群众200多人，关进承德监狱，分8次刑讯，在夜间拉到水泉沟杀害。8月22日在伪锦州铁道警护队队长佐古龙裕指挥下，在滦平县火斗山、张家沟门等五村，"逮捕"丰滦密

抗日县政府政治工作员郑廷兰等60名爱国者,其中40名送承德监狱,郑廷兰等2人被杀害在水泉沟。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二十一师团步兵第八十三联队和驻密云的柿本大队、伪华北治安军第一〇二团一个营、密云和怀柔两县伪警备大队及驻热河的日本关东军174部队独立大队和守备大队、伪满军第八旅、伪满6个警察讨伐大队,总兵力达万人,在长城线山地丰滦密区域"围剿"60多天。八路军山地游击区损失严重,300余名干部、战士和群众遇害,近500人被俘,全押到承德,其中八路军丰滦密联合县七区区委书记李斐然、十三区小队队长窦中和、第十团排长李连元、县大队侦察员王国珍等同志均被杀害在承德。10月中旬,日伪在兴隆县茅山村"逮捕"30多名抗日农民,在南土门杀害20多,其余被投入承德监狱折磨死。同月16至20日日本古北口宪兵分队在日军协助下,在滦平县的汤河口、琉璃庙、大水峪等5个村抓走救国会成员和抗日群众340多人,被押送承德监狱,其中杨全、姜尔康、姜自强等50多人死于承德监狱和被杀害在水泉沟。

1942年1月,日伪军在兴隆全县进行"检举",一次抓走村民2000多人,其中,400多人被就地屠杀,200多人被杀害在兴隆街头南土门,其余被押往承德判刑,一部分被害死在承德。2月初,日本承德宪兵队在仅有50多户人家的承德县南双庙村"检举",抓走110人,当场杀死5人,其余解送承德监狱后杀害、折磨死74人。当月农历年除夕,日本承德宪兵队在承德县上板城一带"检举",抓走抗日干部、积极分子47人,全部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2至3月,日本宪兵队和刘其昌讨伐队在兴隆县小东区、大灰窑搞"检举",抓走100多人,在该县枪杀17人,其余杀死在承德。3月9日(正月二十三日)夜,日伪军在宽城大地一带进行全面"检举",抓走800多人,其中315人被押往承德杀害(内有共产党员17人)。同月,头沟警察署长刘振荣"检举"几个叫"九江八河"的抗日组织成员,抓到承德县警务科过堂,然后将其中4人杀死在承德街水泉沟。4月,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八路军抗日力量,在宽城境内进行一次大"检举",敌人从榆木岭、椅子圈、篆子台、车道子、龙凤沟、艾峪口、北大岭、大庙沟、双洞子、熊虎斗、唐杖子等24个村庄抓走422人,押送承德街后惨杀342人,其余判刑。4月7日,伪滦平县警务科长日本人关直雄率该县刘、姜、胡、董四个讨伐队合并编成1000多人的大队,乘夜"围剿"丰滦密抗日县政府和八路军第十团驻地臭水坑,8日拂晓开战,由于敌人事先探明情况,三面围攻,一面绝壁,将八路军党政军200多人困在当中。在进退无路的危急情况下,八路军干部战士毫无惧色,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丰滦密县长沈爽、第十团供给处长乔宇等为国捐躯,县财粮科长李昨非等49名被俘,被押到承德杀害。1至6月,日本承德宪兵队"逮捕"1292人,其中承德县25人,喀喇沁中旗13人,青龙县186人,兴隆县496人,滦平县31人,迁安县99人,遵化县120人,蓟县179人,平谷县87人,密云县53人,三河县1人。上述被捕人员,被立案解送承德处刑511人。7月

4 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日本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带队在青龙县九虎岭一带"讨伐",俘游击队、民兵及逃难的老百姓 100 多人,经在宽城灌凉水、殴打拷问后送承德加以迫害,其中孙广和、王胜惠、孙永林等 12 人死在承德监狱。农历八月十三日,驻热河的日伪军去长城里"无人区""扫荡",将赤城县南尹家沟共产党员侯何锁、村干部萧树方、侯明功等 30 多人抓到承德杀害在水泉沟。在承德被害的还有赤城县姚家湾副村长尤万录、村公安员任明等 6 人。同年下半年,日伪调集 6000 兵力在丰滦密的长城各口和山边通道区域采取分区"扫荡"办法,有 431 人遭屠杀,1100 多人被抓到承德,有的被送往东北当劳工,有的在承德被害死。同年秋季,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军在长城里的遵化"无人区""扫荡",将马蹄峪村办事员韩荣久、武装班长王顺成等 7 人抓到承德折磨死在监狱。同年冬季,驻承德日军调集第一〇八师团主力,伪满军 10 个旅,伪热河省属 20 个讨伐队及县属讨伐队共 10 万余人,在热河全省进行大"扫荡",仅宽城地区就抓 1500 多人,杀害 400 多人,其余的人有的押去东北当劳工,有 170 多人在承德监狱折磨死。10 月至 11 月,日伪在青龙全县搞了三次"破交大检举",在宽城镇进行过三次血腥大屠杀。其中 10 月的一次,日伪当局组织平泉特高队、宽城日本宪兵派遣队、宽城日本中根守备队、冷口日本宪兵派遣队、宽城特务班、峪耳崖安如一宪兵派遣队、青龙宪兵派遣队以及承德地方法院等联合行动,由喜峰口宪兵派遣队队长水川少尉任总指挥分片进行"检举"。在下板城、小前坡峪、骆驼厂、双洞子、丁家沟、药王庙、石佛、王家店等十几个村"检举"抓走群众 100 多人。驻青龙、峪耳崖、冷口等地敌人到大转岭、长沟、峪耳崖等地抓走 100 多名百姓。以上所抓的 300 多人全部被押送宽城。经过刑讯,有 80 多人被判死刑,由中根守备队在宽城南关东山根枪杀。除跑出一部分,其余 215 人被押到承德监狱陆陆续续折磨死。同年秋至年末,日本古北口宪兵分队,在伪警察讨伐队援助下,"检举"破坏警备路的抗日分子 1330 名,释放 420 名,解送承德处刑 910 名。腊月二十八日,日本驻喜峰口宪兵分队带领警察讨伐队从宽城出来一过暖泉河进西沟沿路就搞"检举",抓走 60 多人,押到宽城警察署,刑讯后有放回的,有用酷刑折磨死的,有在宽城枪杀的,还有一部分转押到承德,许贵珍、杨廷秀、刘文洲等人被杀害在水泉沟。同年冬,承德县新杖子苇子峪牌长马洪斌的儿子马春荣(18 岁)被捕,从兜里搜出给八路军做鞋袜的人员名单,敌人按名单"逮捕"很多人,其中 46 人被砍杀在承德水泉沟。同年腊月三十夜晚,日军大崎部队到光头山地区按密探侦知的情况进行大"逮捕",将樊林、樊树、韩炳钧、王树林等 300 多人抓到黄土梁子警察署刑讯,翌年正月十一,将一大部分人送往平泉再次刑讯,正月十九日又将 100 多人从平泉送往承德监狱,二月初二将其中 48 人拉到承德水泉沟砍杀。

据曾经参加过 1942 年腊月二十七日伪热河省警务厅组织的全省大"检举"的伪特搜队队员时志祥(当时任伪承德街头道牌楼派出所所长)讲:"从康德八年

(1941年)以后,年年搞全省大'检举',时间不定准,春天秋季年底都搞过,修部落那几年搞得更凶,抓人很多。"

据《满洲新闻》载,"本年(1942)开始以来至12月中旬期间,热河省讨伐队交战196回(只是主要战斗)","由本年1月至12月,担任维持西南国境线治安工作的第五军管区讨伐部队,由1月起共10个月间,交战330回,其中包括日满军几万人在热北搞的规模较大的'围剿'八路军承平宁游击根据地光头山"。光头山战斗,游击区损失严重,八路军部队在行军和作战中被冻坏手脚的30多名伤病员,被敌人搜山时从掩护的老乡家搜出,押解到承德监狱全部牺牲。

全省大"检举",多数由伪热河省警务厅牵头组织,军警宪特联合动作,分工分片进行。仅以1943年春节前后全省大"检举"和秋季全省大"检举"为例,足以证明之。1月13日到宽城洪杖子"检举"报国会会员,抓27人,在当地杀害8人,另19人被押送承德监狱判刑后折磨死。25日在山家弯子搞"检举",抓走26人,被押解承德杀害24人。原日本承德宪兵队宪兵石田一雄在1月受命带宪兵在青龙、兴隆、迁安一带"检举"破坏道路、电讯的农民693人,刑讯后提出判刑意见送交承德190人。同月,日本喜峰口宪兵分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政府工作人员在青龙县九虎岭村开会,由木村光明电话命令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长岛玉次郎带队协助喜峰口宪兵分队对九虎岭地区进行大"逮捕",共抓了150多名居民,刑讯后将70多名送承德处理,其中61名被特别治安庭判处死刑杀害在水泉沟。同年农历正月初八,日本承德宪兵队和伪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王家营和五家村大"逮捕"抓走12人,后转送承德监狱关押,于当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将张忠、贾文圭二人砍杀在水泉沟,王芝被害死在承德监狱。2月1日,日本承德宪兵队在承德县鹰手营子、新杖子、牤牛窖等14个村和下板城一带"检举"1000余人,其中下板城村的姜海亭、胡启凤等71人,白河村贾文义等6人,南双庙村罗万成等49人,鹰手营子村刘占海、罗万桂等15人,连同上板城、新杖子、胖和尚沟、两益城等村254人被抓到承德,分批砍杀在水泉沟和在承德监狱折磨死。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三村变成了"寡妇村"。2月2日,日本宪兵队带领平泉伪警察讨伐队在八路军承平宁四区区长张健光活动的崖门子、水泉、七沟一带18村进行"检举",621人被抓到承德,将干沟子村干部侯文彬、赵武连等判处死刑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将上平房村办事员崔振阁等折磨死在承德监狱。2月5日,日伪军在兴隆进行大"检举",五天抓走男性群众5000多人(仅半壁山伪警察署所辖各村就抓走2000多人),10日惨杀400多人,其余人被投入承德监狱和锦州监狱,投入承德监狱的绝大部分被折磨死。大莫峪是个42户的小村,被抓73人,被杀72人,8户被杀绝,30户杀没了男人,成了"寡妇村"。2月,在宽城西北方16里地区,在日本战务课长木村光明大尉指挥下,"检举"青平抗日救国会员破路分子150名。经刑讯后,释放100多人,送交承德特别治安庭处死刑的15名,判徒刑25名押入承德监狱。在喜峰口"检举"

抗日救国会干部和破路积极分子61名，刑讯后全部送往承德特别治安庭处死刑。日本承德宪兵队队长、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桥本岬于1943年在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光头山地区搞了四次大"逮捕"。按密探侦知的情况，2月在光头山南侧地区"逮捕"抗日人员520名；3月在青龙至平泉公路两侧村庄"逮捕"抗日人员130名；6月在光头山东侧黄土梁子、八里罕地区"逮捕"抗日人员120名；7月在光头山西侧三家等村"逮捕"人员140多名。日军对以上900多人进行刑讯后，将其中的580余名送交承德监狱，并判死刑杀害50多人。同年5月中旬，日本承德宪兵队派遣特高系特务太田秀清在承德街"逮捕"10人，以共产党承滦密联合县地下工作员罪名进行殴打拷问，然后秘密处死。7月，日本军在承德街遗失了军用电报密码，用两个营的兵力在各个路口设卡断绝通行四天，对成年街民严格搜身盘查，将600多被怀疑者"逮捕"，关进留置场和监狱，严刑拷问，打死7人，直至找到军用电报密码才把众人释放。9月13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伪青龙县驻曾杖子特高队参加全省秋季大"检举"，将丁杖子村武装中队长丁九功、丁奎元、丁九奎等7人，平方子村栾成旭、杜景兴、杨恩波，乱泥沟村勾凤文、杨玉林、张玉安等380多人抓到青龙，经过多次刑讯，最后从青龙转押到承德监狱，其中平方子村栾成旭、杜景兴等80多人被判了死刑，有的被在监狱绞死，有的被拉到水泉沟砍杀。16日（农历八月十六日），日本承德宪兵分队带着伪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搞大"检举"，将安匠、塘头沟等柴河川一些村子，小白旗上下五个部落，上板城、南双庙、应营子、老爷庙、西大庙，胖和尚沟、新杖子一带一共有400多人被抓走，经过在当地伪警察署刑讯后，用汽车拉到承德刑讯判刑，活着回去的50多人，有100多人被弄到东北当劳工，其余200多人全部被害在承德。同月，日伪军警在喀喇沁中旗推行"剔抉"计划，共抓走抗日人员和平民1200余人，在当地杀害30多人，抓到承德监狱400多人，在狱中折磨死一部分，在水泉沟杀害80多人。10月8日，日本喜峰口宪兵分队在青龙县汤杖子五道河等十几个部落"检举"为八路军办事的牌甲长54人，汤志远等43人被押到承德，杀害在水泉沟。同月，迁青平联合县七区组织委员张维政失掉地下党员花名表，落入敌手，日本喜峰口宪兵分队按名单逐个"逮捕"，仅柏木塘、王厂沟就逮捕94人，其中38人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12月30日，伪青龙县警务科奉令纠集县内各地日伪军警特及搜捕队，逐部落进行大"检举"，残害致死2000余人，仅塌山一带就杀害800多人，押到承德街杀害300多人。

兴隆县，敌人在用武力推行集家计划期间（1942—1943年），全县被"检举"入狱死亡12 000多人。这期间内几次被检举出的7000多人死在承德监狱或被杀害在水泉沟。

日伪宪兵、警察、特务和铁路警护队依"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等法律采取个别"逮捕"和一齐"逮捕"方式，在热河制造的白色恐怖十分厉害。据《伪满洲国史》记述，1935年4月至1943年11月，日伪在热河进行一齐逮捕11次，逮人

18 000 多，其中杀害 2000 余人，转送 1500 多人。这当然不是全部数字，而且不包括最后一个时期的情况。

1944 年 2 月上旬，日军和伪讨伐队在兴隆县澈河川各人圈“检举”，抓 2000 多人，在当地集体屠杀 120 多人，其余押解承德监狱，大部分送东北当劳工，少部分判刑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3 月，上万名日伪军在兴隆进行春季大“扫荡”，持续 10 多天，全县被抓 3000 多人（仅中田村就被杀 197 人），除在当地刑讯释放、杀害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送往东北各地当劳工，其中 470 多名押入承德监狱，被陆续折磨死。同月，日本赤峰宪兵分队长百鸟伴次郎以下宪兵 200 多名，在喀喇沁中旗黄土梁子地区“检举”承平宁抗日县政府组织农民破路分子 200 名，用殴打、灌凉水、吊起来等方法刑讯，其中 70 名送承德入狱杀害。6 月，日伪在兴隆进行“投匪家庭大检举”，凡八路军军属、干属、亲友，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抓走，全县共抓 500 余人，在兴隆刑讯后，一部分直接送往东北当劳工，一部分押解到承德判刑，其中杨树正等 104 人先后被杀害在水泉沟。10 月 1 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日本宪兵队在青龙县搞“检举”，从汤杖子等村抓走 54 人，押到承德，翌年 2 月 15 日（正月初三）全部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

据滦平县党史办统计：由于日伪在滦平县强迫老百姓集家并屯，迁入“部落”而造成的逃亡、饿死、冻死、瘟疫病死和被敌人检举杀害的，共伤亡 20 700 人，其中被日伪杀害在承德一大部分。

青龙县集家并屯前后被敌人“检举”杀害 7234 人，全部死在承德。

从青龙、兴隆、宽城、承德、平泉、遵化、赤城等十几个县调查证实，日伪搞“反集家大检举”、“清匪大检举”、“投匪家族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清乡大检举”等陆续抓到承德杀害（含在承德监狱折磨死）10 000 多人（不完全的数字）。

搞破交检举，在承德杀害 1300 多人。

笔者仅从承德县、宽城、凌源、围场、平谷等县的局部调查统计，日伪从 1935 年至 1944 年 7 月，进行若干次不同规模的“逮捕”，其中抓到承德街杀害的 1000 多人。

笔者依据遵化、宽城、密云、赤城、青龙、滦平等县的部分调查数字，日伪军从 1941 年 10 月（农历八月）至 1944 年冬，对“无人区”的多次“扫荡”，抓到承德杀害的 1000 多人。

日伪对冀热辽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频繁“围剿”，从 1938 年 11 月以后的战例中初步统计，俘八路军党政干部、战士和民兵，押解到承德残害的有 2100 多人，内有冀东军分区十三团副政委（红军）廖峰，迁遵兴联合县第一任县长姚铁民、同县十一区区长王一民、县委组织部干事温秀之、县武装总队队长张惠、县情报交通队队长张兴国、六区干部依林，蓟遵兴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委书记李光、六区区长张连涛以及村办事员韩荣久、贾子臣、葛子林、马台，县游击

队侦察员宋占青等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他们坚贞不屈地牺牲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1945 年夏,日本侵略者在承德监狱一次电刑杀害 300 多名政治犯。

日本侵略者在热河盘踞 12 年多,仅从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不完全统计,他们杀害了 65 000 多人,制造了 30 多个惨案村。其中兴隆县的大莫峪、楸木林、兰旗营,宽城县的暖河塘,青龙县的化沟,承德县的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等村的已婚男人被杀绝,变成了寡妇村。

这些村庄被检举逮捕的抗日群众和无辜百姓,除了在当地被杀的,大部分被害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三

承德监狱不仅是热河省的最大监狱,也是伪满洲国的最大监狱之一。狱内设置戒护科(后更名为监理科、监护科)、需用科、文书科、会计科等科室。狱中分设已决监(已判刑,含女犯)、未决监(未判刑,含女犯)。监内又分国事犯(政治犯)、刑事犯、经济犯等监房,另还有外国人监。囚禁人判刑,除一部分在南营子三官庙三级法院的法庭室,大多数在监狱。将未决犯集中到院子,由检察官和法官按照日本宪兵队送审裁定意见书进行判决。判 15 年以下的,判完转送东北各监狱服苦役,判无期徒刑的就地关押或杀害。判死刑的,人数少的在监狱西南角绞死,人数多的在监狱电死或者在夜间或白天拉到水泉沟砍杀。监狱内的直接杀人手段也由原来的绞刑桩(人工勒死)发展到滑轮组制动的绞人翻板。狱中设置专事杀人的刽子手四至六人。"行刑於密行主义",采用各种花样翻新的野蛮手段,达到致人死地的目的。承德监狱造成死人最多的手段就是生活虐杀。从 1939 年以后,这是一种主要屠杀法。用生活虐杀,以病死为由,既可掩人耳目,又能达到置被囚者于死地的目的。

伪满洲国司法部规定"在监收容费食粮费一人当一日六钱五厘(伪满洲币)。每天只给两顿饭,一顿稀一顿干,在夏天给点青菜汤,平时既无菜又不管饱,天天吃发了霉又苦又涩的红高粱,邪味熏人,难以下咽。监狱里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染病的,没有一个不患疥疮的。监狱也有医疗室,名义上给犯人治病,只叫病号多按手印,不给药,贪污药费。监狱还成立"故衣组合",扒卖死犯衣服。尤其对国事犯更加惨无人道,80% 人带着刑具。不服苦役时,白天都让脸朝外坐着,后一个看着前一个后脑勺,稍微一动就遭皮鞭抽、铁棍打。夜里一个号睡 70 多人,挤的没法翻身,病号也不隔离,有的死了没经看守允许,两旁的人也不准移动。冬天室内生火墙,有其名无其实,经常灭火,屋中冰冷,睡板铺睡凉炕,衣单被薄,很多人冻饿而死。春夏秋季屋内臭气熏人,重病号在室内大小便,监号的卫生与厕所差不多。患

病不给治,刑伤加饥饿,使很多人死在监号里。监狱里死人比在水泉沟老阳坡砍杀的多好几倍,从监狱往老阳坡抬死尸,天天有,少时一拨,多时三四拨,每拨两三个,有时十几个,全是在监狱里绞死的、病死的、电死的或用别的方法折磨死的。看守押着,活犯人抬死犯人,刚开始的时候,放在事先挖好的坑里,铲几锹土一盖就拉倒,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一个小坑放好几个,几锹土也遮不严,狼吃狗拽到处是死人烂尸。

住在水泉沟小潘家沟口北边平台上,门窗正对杀人场与老阳坡相距不过半里地的农民高树芝(女,1987 年 73 岁,潘德山之妻)讲:“日本鬼子进承德街那年正月初十我嫁到老潘家,春天开犁种地的时候鬼子就在老阳坡砍人。鬼子白天在老阳坡砍人我没少看,有时站在山头看,有时站在院子看,有时坐在炕上看。有一次砍 48 个,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我老头子用我们家水桶从河沟里挑上一挑水,放到老阳坡杀人坑旁边。鬼子把犯人从汽车上拽下来放在北坡躺下,用布蒙上眼睛,然后由两个日本兵架着胳膊拖到坡旁大坑边跪下,刽子手用大战刀砍。有的一刀就把脑袋砍掉了,头和身子都滚进坑里。有的两三刀也砍不掉,就一脚踹进坑里。砍掉脑袋时,一腔子血喷出老高,腥味刮出挺远,熏得好几天吃不下饭。鬼子砍一个人,把刀放进水桶里沾一沾,砍的多了,刀也热了,不沾水就砍不动。挨砍的人也真有不怕死的,一个小伙子是承德县三家的,特别有骨气,唱着歌下的汽车。日本兵要搀他,他不让搀,他说,我今年才十八,再过十八年还跟你们对立。他至死不跪,不跪没法砍,用枪打死的。”

当时的水泉沟尸横遍地,处处白骨堆,满目凄惨荒凉,啄食腐尸的老鹰、乌鸦等飞起来遮天蔽日,呱呱乱叫震耳欲聋。高庙、头道沟、鹿棚子沟、柳树底、罗汉堂、狮子园、残像寺、狮子沟等十几个自然屯和村的二三百条狗,长年在杀人场吃死尸,眼睛全是红的。大天白日,狼群在杀人场附近撕拖尸体。农民下地干活,要持护身用具结伴而行,不敢单独外出。杀人场附近住户,经常从屋里和院中往外捡狗叼回来的人头、手、脚、腿或五脏。一到夏天,又腥又咸又臭的气味熏得人头疼。小南沟口(现在的水泉沟乡卫生院墙外东南角)有眼两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把骨头冲进井里淤死,为了吃水,还得经常掏井。有时候杀人多了连河沟里的流水也是红的。遍地尸体,处处白骨。日本投降后,承德市政府组织群众到水泉沟收拾散在露天的烈士遗骨,花了五天时间,净人头骨堆成小山似的三大堆,挖三个大间屋子那么大的坑,像垒墙那样干插缝把这 7000 多烈士的头骨安放在坑内掩埋。因为被狼、狗和鹰叼拽遗的散碎尸骨太多,到处都是,当时没有捡净,直至今日在老阳坡还能见到裸露的遗骨。人们步入墓区,只要蹴蹴脚,就能见到掩埋 50 多年的烈士骨骸。土质松软的老阳坡,从雨水冲刷形成的许多龟裂断层中,由地面至数十公分深的地方,可以看到斜突出来的东西,那有的像大腿骨、肋骨或者是头盖骨的顶部,遗骨残骸到处可见。

日本侵略者在承德杀害中国人的准确数字无法弄清楚，主要原因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6、17日两天，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受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指示，亲自监视将机要档案搬到热河省公署院内全部烧毁，毁灭了罪证。但是，当时留在承德人民心目中的3万多的数字至今记忆犹新，是永远毁不掉的。

四

水泉沟万人坑，解放后一直成为承德市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每年清明节，市里很多单位组织人们到墓区祭扫，献花圈，凭吊先烈，继承遗志。1945年11月，著名音乐家李劫夫随同热河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万人坑掩埋烈士遗骨，触景生情，愤恨长久难平。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极大的仇恨，对革命先烈无限缅怀之情，于1946年春谱写了一首歌曲《忘不了》，这首歌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篇章，一直传唱至今。

水泉沟万人坑已经名传中外，受到中日两国人民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中国社会报》都曾登过照片和文章，进行过专题报导。石家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唐山冀东烈士陵园等单位来承拍过万人坑录像片。海军政治部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壮士行》电视艺术片第四集“不屈的山川”中，根据承德市党史资料通讯第五十八期提供的宝贵资料，将万人坑摄入十几个镜头向全国播放。日本国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先生专程来这里考察，他于1989年出版发行的《三光作战》一书第一部第二章专文记述了“水泉沟万人坑”，向日本人民介绍了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990年8月，日本国家放送局《万里长城》摄制组来承德拍摄万人坑墓区场景。1991年8月11日，日本福冈县和平之旅教职工访华团一行52人到承德考察万人坑情况。1992年7月1日将在中国考察资料汇集成册，题为《日本军侵略中国》写真集，由学术出版社在日本公开发行，7月4日，《读卖新闻》、《西日本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以史实驳斥了主张修改教科书的谬论。

万人坑已经成为一块历史记录碑，它不仅镌刻了抗日人民的爱国功绩，也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后人应该永远记住：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

（选自彭明生主编：《罪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日伪时期兴隆监狱的酷刑

朱呈云

兴隆县地处长城北侧，是一个峰峦起伏、沟壑纵横的深山区。原隶属于遵化县。日本侵略者于1933年4月21日攻占兴隆县城后，即以长城为界，将其划归伪满洲国的版图。由伪热河第五军管区牵头，抽调日本关东军1个团、满洲军4个团、14个武装警察讨伐大队，共2万余众，开赴兴隆县境，实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他们毁掉村庄2千多个，烧毁房屋7万多间，抢走牲畜2.5万多头，粮物无法计算，制造"无人区"面积1301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1.7%。直接杀害无辜群众1.5万多人，其中一次枪杀10人以上惨案28起，有大磨峪、楸木林、黄花峪成为"寡妇村"。抓捕入狱而致死1.5万人，因冻饿和疾病而死的2.5万多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34%以上。有11万多人被赶进218个"人圈"里，惨遭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兴隆血债累累，罄竹难书，这里将其利用监狱残害无辜群众的野蛮酷刑记述如下：

兴隆县日伪机关授权给各警察署和日伪军，在讨伐地的各大村镇设置临时治安法庭，运用一审的终审权力，将抓捕群众就地宣判，就地处决。这样，日伪统治者从1938年始，即利用"清匪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投匪家庭大检举"、"清乡大检举"、"反集家大检举"、"破交大检举"等繁多的名目，频繁"扫荡"，反复"围剿"。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抓捕无辜群众入狱者2万多人。在狱中，敌人施用的酷刑主要有：

断肠空腹。不给被关押入狱者饭吃，施以吊打手法，强迫招供。如兴特区区长任和被捕后关进兴隆特号监，多次审讯，被打得血肉淋漓。敌人不给饭吃，活活被饿死了。

倒栽莲花。也叫倒头活埋。强迫被捕入狱的人自己挖坑，然后把人的双手用绳索捆绑，头朝地，脚朝上，放在坑内，用土活埋。兴隆县监狱曾在南土门杀人场，把抓到的无辜群众这样活埋。

军犬狂舞。将被关押入狱之人双腿用绳索捆紧，然后呼来驯养的狼犬，一纵一跳地扑到人们身上乱咬。1943年夏季，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在大河西、槐木林

抓捕群众60多人,关押在临时法庭,指使被训练的几十条军犬将人咬得血肉模糊,直至死亡。

肉滚绣球。把被捕的人衣服扒光,塞进一个内部钉满钢钉的大木箱内,然后盖上盖子,把人在钉笼中活活滚死。

电磨粉身。专门在河边设置一种磨人的电磨,把被捕的无辜群众放在电磨里,磨成肉酱致死。

枪刺布袋。把被捕的人装进布袋内,让新兵用刺刀练习刺杀,称之为试胆量。日本宪兵队队长植松猶数就多次用步枪刺杀布袋以壮胆,后来直接持刀杀人。

虾公见龙王。把被捕之人手脚捆在一起,像弯曲之虾,投入河内,将人淹死。日伪曾在滦河、瀑河,用此法残害无辜群众。

开膛取心。把被抓捕的人,用战刀或刺刀挑开腹腔,取出人心。双庙据点的日本兵中川吃活人心达50多个。宪兵股长黑烟悦二也多次杀人取心煮食。

钢针刺骨。敌人审讯时,因被捕入狱的无辜群众不认罪,则用钢针或竹签往人的头顶、咽喉、手指、胸口和致命处乱刺。兴隆监狱经常施用此法把人活活扎死。

木桩勒人。就是把被抓捕的群众捆绑在木桩子上,用绳索活活将人勒死。

电动绞死。把被抓捕的人放在绞刑架台上,扳动电钮,脚下铁板一翻,掉到陷阱内,绞索勒紧死去。

皮鞭沾水。在审讯时,用皮鞭沾凉水把被抓捕之人抽打而死。

灌辣椒水。在审讯时,强行将辣椒水或石油,灌入被抓捕人腹内。灌入后压杠子逼供,活活将人灌死。这种刑法,在临时法庭和监狱里,到处可见。

活剥人皮。1943年夏,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区干部依林,被敌抓捕后在特号监。敌人活剥其皮,将他们致死。

坐老虎凳。在审讯被抓捕群众时,在凳子上安装铁钉子,或通上电,强行让人去坐致死。

梁上悬人。把被抓捕之人悬吊在木梁上追问,以至窒息而死。

背炭火炉。在审讯时,让被审之人身背烧得火红的炭炉跑步,活活把人烧死。

铁器烙人。敌人审讯被抓捕之人,用烧红的烙铁、火钩子烫人肉体,强迫招供。

此外,敌人在审讯时,拳打脚踢,用木棒打,更是司空见惯之事。

(选自周金生编:《承德文史文库》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兴隆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兴隆罪行的调查

自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兴隆,历经十三年的种种罪行是述之不尽的。最残酷的是由一九四〇年日寇的"西南国境治安肃正"的杀人政策施行以后,日本派遣了关东军八八一部队一两千个鬼子常驻兴隆;扩充了警察,建立了十五个警察分驻所,四个警察署,六七个警防所,在集镇上设有派出所,每个部落分派部落警;近万人的伪军讨伐队分布在兴隆各地;日宪、特务到处有;村村设有协和会实践集家队①。这些组织,由日本人统一指挥,进行灭绝人性的"大集家"、"修人圈"、"下山"、"自首"的囚笼政策;"大检举"、"投匪家族检举"(抗日人员家属)、制造"无人区"、"围剿"、"扫荡"及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锦州日本高等法院又成立所谓"西南国境特别军事法庭",并立了"国事犯"、"思想犯"等罪名,用残酷的法西斯手段杀害我无辜人民。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三年的春节前后,日寇进行了三次大检举,被捕的一万二千余无辜人民中,被判决枪杀、刀砍、监押、赶入工矿者就达一万一千四百余人。我县五区一个七十来户的大莫峪村,在一九四三年正月一次就被"检举"去七十二口,上至七十多岁的老头,下到十四岁的小孩,连哑巴等一个也未剩,全部捕去,在当地就屠杀了四十二口,送承德判死刑十五口,其余被分送东北各地当劳工,大部也都死去。七区茅山村,一九四三年被日本一次捕去六十六名无辜人民,除跑出两名外,其余全部被送承德杀害了。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三日,鬼子在我四区荞麦岭,一次杀死了二十三名群众。一九四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六区小水泉被日寇抓去九十三口群众,当时就地给杀死了六十一口,剩下三十二口带到倒流水后,一个未留也全部杀害。

兴隆县人民被迫集家赶入人圈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五户,十一万一千八百多口人。据七个区的大略统计,因日寇修"人圈",整天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得不到星点自由,被摧残而死者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余人。在集家并村时,被日寇烧毁的民房二万三千四百多间,拆毁民房三万八千三百多间。

① 原文如此。

在兴隆的南土门设有“万人坑”(距兴隆街三四华里远),被“检举”之人,凡在兴隆,由锦州高等法院派出特别治安庭前来判处的,均押赴该地执行。仅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就被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判死刑五十四名无辜群众,全部是绑到南土门执行的。一九四三年冬,在兴隆被特别治安庭判死刑的三十八名无辜群众,全由驻在兴隆的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大胡子,不知其名)一人用日本刀,一刀一个砍死的。这就是被迫进入“人圈”的人民受日本残害的铁证。

我县有二千三百九十多户,一千三百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的地区,被划为“无人区”。有一万一千六百多口坚贞不屈的中国人民,坚持在“无人区”守卫自己的家乡。日本对这些人民,对这片“无人区”,实行了残暴的“三光”政策。经常发兵围剿扫荡,见青苗割掉,见房子烧光,见东西就抢光,见人就杀光。据二十七个“无人区”行政村的统计,被扫荡打死我“无人区”人民达四千余口。二区小河西一个村,就被日本围剿打死了五百二十三口。三区青水湖,被扎死、摔死的小孩就有四十八个。五区暖和堂,胥景合一家十三口人,全部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死后还把尸体用火炼了。七区前乾涧,被日本捕去十九名男女群众,将衣服全部剥光,用乱棍打至不能动的时候,又将这十九个人装在菜窖内,活活的用火熏死。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鬼子集中了二万多兵力,围剿我各地“无人区”,十五天的时间,仅中田一个村,在这次围剿中就被打死群众一百七十九口。坚持“无人区”的张凤彦的妻子,抱着小孩跑到石砬洞内,被日本搜出,一刺刀扎透了她娘俩心窝、肠肚。日本鬼子们走后,剩下的同乡们去看时,她娘俩流出来的鲜血已被冻结在一起了。可是妈妈还紧紧地抱着她可爱的孩子。小黄木沟一个窑洞内藏着十七名群众,被日本鬼子活活的用火熏死在窑洞里十六名。

有的“无人区”人民逃出了枪杀、刀砍,但却被日寇的“三光”政策摧残而死去大半,如中田一个村就无吃无穿无住冻饿而死者四百余人。

我们的抗日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在兴隆“无人区”内牺牲的,据这次调查统计就有二百多名,如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在七区,日寇一次打死我军和抗日工作人员三十余名。一九四一年在四区拨子村,打死我县长新华。

日寇“抢光”的罪恶更是不胜枚举。在“无人区”就抢去骡子一百九十七头,马六十多匹,驴一千三百多头,牛一千八百多头,羊近三万只,猪一万余口;抢去衣服四五万件,被褥六七千床,布两万匹;砸毁锅、缸二三万口;其他器具是无法数计。“无人区”碾磨一盘不剩,全部被砸毁。

日寇就以此兽行摧残兴隆人民,把人民的美好家园变成了父兄被杀、母被砍、家破产的境地,把肥沃的良田变成了荒芜的草原,把整齐的住宅变成了颓垣断壁和焦土,使人民处于无以为生的绝境。

兴隆县的广大人民对日本这一笔血债,清清楚楚地记在心内,一时一刻也没有忘掉,纷纷控诉日本关东军第八八一部队、夏道队、小彬队、山下队、渡边队、导田

队、塚纲队、黑严队、一田队、日本宪兵队;控诉日本伪兴隆县长田正四三男、村上荣信、石川;控诉日本伪兴隆警务科长池尾、前田利一、深内坚一;控诉日本伪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及一切日本战犯的罪行。

(1954年8月6日)

承德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承德县罪行的调查

伪司法部策划组织在承德县所进行的血腥罪行有:

日寇于一九三一年进攻承德县,为了镇压我抗日军民,摧残百姓,全县设有警察署五处,宪兵队四处,国兵、讨伐队、协和会各六处,村公所十一处,分驻所十八处,均设于我县人口集中的集镇,为法西斯统治人民的工具。最严重的是在一九四二年,非法的划定无人区,修人圈,大抓国事犯(即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办事员),到无人区扫荡,残酷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等"三光"政策,奸淫妇女,逼得农民妻离子散。

仅在日伪统治的十三年内,据不完全统计,被抓去曾给我军送过信的、做过鞋的、听过我地方工作人员会议的劳苦农民,就有二万零二百七十七名,如康德四年和九年这两次逮捕,共抓去八百余名。仅康德九年十二月在四区砖瓦窑子村,一次就抓去农民六十余人,送承德市治安庭处理后只放回五六人,其余被判徒刑送至东安等地,至今一人未回,全押死在监狱。其中抓去下板城附近村子的农民计有四百余人,如下板城胡起旭等十余人,被杀死在承德市水泉沟内,有的被判徒刑后释放,有的被关在监牢内。杀死我抗日干部九十三名,战士二百九十六名,村干部二百三十四名,抓农民去阜新等地做劳工的一万四千九百七十三人,其中因在做劳工被打骂,食不饱,穿不暖,在工地冻饿而死的约三千一百八十六人。

此外,在集家并村时,因有的人房屋、粮食被日寇烧光、抢光,甚至一家劳动力要去做劳工或被杀死,只剩下妇女、小孩,老的老,小的小,全集到人圈里,没有一粒粮,没有房子住,地方很小,人特别多,每天还得受严刑拷打,这样致死的有二万零九百一十八名。如常峪沟村,在一个很小的野地里修了一个人圈,把附近百姓赶到那里的有百余户,还驻有国兵、讨伐队一百五十余人,每天翻箱倒柜,奸淫妇女,叫百姓训练、修炮垒等,因被打骂冻饿而死的就有一百五十余人,如陈荣等十余户因男人死去,妻离子散。最毒辣的是,我县有百余个村被划为无人区,在这些村实行

“杀、抢、烧”三光政策,并不许农民去这些村子种地。这时有警察局日本人黑岩股长领警察讨伐队百余人,专门到“无人区”扫荡,杀、烧、抢掠,奸淫妇女等,光“无人区”就杀我基本群众一千一百六十六名。如一九四二年,在一区西化于沟扫荡,逮捕农民李树林、杨和等二十九人(全是各家家长)带到一个小院内,排成队跪下,用机枪点射,打完后,又用刺刀挨个儿的挑,最后又用柴火烧,这二十九个农民,在被机枪打、刺刀挑、火烧等,活活死去二十六人,其中因有三人在那些人身底下,刺刀未有挑着,才留了条活命归乡;又如十一区贾家曲村,一九四二年四月间,一次就被日寇围剿住群众二十四名,弄在一起活活用刺刀给挑死,死后并把尸体用火烧了。如胥景春、胥景见、赵廷增等户,一九四二年以前一家有八九口人,被残害只剩两口人。

最惨无人道的是,“无人区”赶下来的姑娘、媳妇,配给那些匪兵成妾等就有十余名。如坚持山地的农民李存龙一家三口人,其中被杀害两口,只剩下个十六岁的女孩配给匪兵(解放后才被找回)。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日本鬼子在承德县内实行前述惨无人道的血腥罪行,均属实。

(1954 年 7 月 23 日)

日军在承德制造的“国事犯”事件

高滋安

无辜遭罪

我叫高滋安,今年(1984 年)80 岁,家住下二道河子村,伪康德五年(1938 年),日本在承德制造一起株连 300 余人,波及热河省,轰动伪满洲国的国事犯“救国勇士团”假案。给我定的“救国勇士团”团长罪名,冤狱 4 年多,判处死刑。我是死里逃生,才活到今天。提起日本侵略者,我就气恨难消。

我 20 岁中学毕业后,靠父亲高占元(他是老中华民国热河省惟一的参议员)的关系,在汤玉麟的热河省财政厅当科员,25 岁调承德县当财政局长,一直干到民国 22 年(1933 年)3 月 4 日,日本侵占承德。日本进承德后,我加入协和会,当了会

长。伪康德五年(1938 年)六月,辞去协和会会长,当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于 11 月中旬,我去新京(长春)经济部办理统一配给面粉手续,回来下火车,在承德车站被两个日本特务抓捕。他们两个押着我用马车拉到承德警察厅(伪康德六年后改为承德警察署),搜我身,然后把我关在警察厅留置场(就是拘留所,现在西大街小榛子沟口橡胶厂办公楼后院处,容纳 100 人)。承德警察厅警务科(伪康德六年后改为警务系)科长迟松岩雄(日本人)在留置场问我:"有个叫苏士纲的你认识不?"我说不认识。他说你不说实话该受罪了。半夜,承德警察厅司法科长松(日本人)把我带到审讯室,也问我认识苏士纲不?我说不认识。他命令手下人把我捆在板凳上,手和脚拴在凳子腿上,捆得结结实实,一顿狠打,边打边问。我不说,灌一大壶凉水,又打。实在受不住只好承认说认识苏士纲,这才把我解开送回留置场。又过十几天,警务科长迟松岩雄又提审,问我年龄多大,我说 34 岁。问我干啥的,我说是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他又问:你为啥做出反满抗日的事?我说没有。他命令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一顿毒打。有一个日本人叫水野的打人特别狠,把我打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憋死。朝我脸上泼些冷水,我才慢慢缓过气来。迟松岩雄又继续问,我仍然说没有。他让人把我衣服扒光,用烧红的火钩子烙我。一边烙一边问。我不说,他们就烙个不停,连打带烙,浑身没好地方,剜心地疼。我实在受不了,就说:你们问啥我说啥。翻译孙阳生按着迟松岩雄的旨意一边问一边写。问我认识苏士纲、张实(又叫张自凡)、黄德太、苏华等 20 多人不?我怕再用刑,不管认识不认识,就说全认识。孙阳生用日语说给迟松岩雄,迟松岩雄点点头,又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成立反满抗日组织,多少人参加,叫啥名,在哪儿跟八路见的面,在哪儿开的会,谁是主持人。我都不知道。又打又烙。我受不住,就对孙阳生说:"孙翻译官,你们知道啥告诉我,我全承认。"孙阳生说,你们成立的救国勇士团,皇军全掌握,你说实话吧。我就按着迟松岩雄的引供全承认了。我说,孙阳生记。最后我签名按上指纹,才把我拖回留置场。

事后,我才知道抓我的原因。"七七"事变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全民起来抗日,日本在伪满洲国境内到处抓反满抗日的国事犯。我在新京时,就看到东北各报纸刊登的"沈阳事件"中遭杀害的反满抗日人员的照片和消息,其中判死刑者 6 男 1 女。日本驻承德"清水部队"的消息传到外边,说承德街有通八路的间谍,热河省总务厅长远藤(日本人)命令承德警察厅搜捕国事犯。厅长陈景起、副厅长迟雄(日本人)、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按照清水部队和总务厅长的要求,开始在承德抓人。特务科的特务文履谦(日籍朝鲜人,外号文高丽)是副厅长迟雄的心腹,他伙同本科的特务陈书阁、王作孚在承德到处侦探通八路的人。当时西村名次郎和陕西营街长苏华(阴阳仙)关系甚密。苏华想娶大佟沟陈二老爷的女儿做妾,陈二老爷不干,把女儿嫁给热河税务监督署雇员苏士纲的弟弟苏士英为妻。苏华对苏士纲和陈二老爷两家产生仇恨,要伺机报复。苏士纲的外甥黄德太从北平来承探亲,

苏华乘机向西村名次郎报告,说苏士纲家从国外(指长城里)来了八路探子。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奉副厅长迟雄的命令带特务文履谦、陈书阁、王作孚将黄德太抓到警察厅进行严刑审讯。黄德太只认识他外祖父苏勤茂、舅舅苏士昌、苏士荣、苏士纲、苏士英,别人不认识。特务文履谦按着副厅长迟雄的指令事先设计一个反满抗日组织表,一边用刑一边引供。黄德太受刑不过,只得按引供的线索招认。特务将苏勤茂父子5人抓捕,同样严刑审讯,受刑不过,也招认了引供材料。这就是日本制造的轰动伪满洲国的"承德救国勇士团"假案的起因。

残酷毒刑

特务把黄德太抓到警察厅后,硬说他是八路探子,他根本不是,更没有反满抗日活动,特务提出的事,他一概不招认。然后特务给他用酷刑,先是用皮鞭子蘸凉水抽,不招认;灌火油、辣椒水,用杠子压肚子,还不招认;就用烧红的火钩烫脸,烫身上。黄德太受刑不过,就按特务引供的事全招认了,并在供词上按了指纹。承德警察厅把黄德太的供词上报伪热河省总务厅和驻承日本关东军。在伪热河省总务厅厅长远藤指令下,成立一个特别搜查班,由日本承德宪兵队准尉板田毋雄任班长,办公地点在宪兵队(现在市公安局院里二层旧楼),特别搜查班员由承德警察厅抽3人,负责承德街,由童瑞九当翻译,承德县警察局(伪康德六年后改为警务科)抽3人,管承德县范围;日本和伪满宪兵队各3人,管伪满洲军队;日本领事馆3人,管日籍公职人员和侨民。用日产黑色牌100号的轿车做刑车,在特别搜查班长毋雄的领导下,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一月十七日为期开始了大搜捕"国事犯"。边抓人边严刑审讯,不断扩大线索。凡是被抓的国事犯都施严刑拷问,由于受刑不过,都将自己认识的人咬出来。承德街开始抓人时,我正在新京出差,别人把我咬出来,回来在火车站(18日)被抓。承德"四才子"王逸如、张庸安、乾允修、孟仲芹被抓捕。当时抓了300余人,赤峰100名,建平70多名,承德130多名,下板城30多名,滦平30多名,隆化20多名。最大的70多岁,是原姜桂题部退役中将曲中义(别名曲海臣),家住二道街子,在家闲呆,也被抓捕受酷刑。最小的15岁,是一个在上板城街头讨饭的男孩,也被当八路探子抓捕来受刑。当时日本鬼子抓人简直红了眼,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一律抓。被抓的人先是关在承德警察厅留置场,那里只装百十来人,后来容纳不下,全关进承德监狱,重点人砸上手铐、脚镣子。监狱外面用草袋子装上沙子堆成掩体,由日本宪兵架上机枪日夜站岗。抓捕结束,伪热河省警务厅、承德县警察局、承德警察厅、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承德区检察厅、承德地方检察厅和锦州高等法院承德分院、承德区法院、承德地方法院等联合在南营子三官庙院内,将东西配房各隔断7间,在配房南端又盖两间,一共16个房间作为临时留置场。把被审留的人从监狱用汽车拉到三官庙圈在新隔

断的临时监号内。当时给我定的罪名是“救国勇士团”团长,给苏士纲定为副团长。“救国勇士团”是承德警察厅日本人给起的名字。把我和苏士纲关在南面的两间监号内,每人一间。当时集中了伪满全国高等检察官和高等法官二三十人,设立好几个刑讯室。一开始就是刑讯我和苏士纲。因为我们这些被抓的300余人纯属假案,根本没有这个组织,全是屈打成招。从监号把我押到审讯室,打开手铐和脚镣,我心想,高等检察官可能说理,下决心在公堂翻供。审讯室,除了翻译官和书记官全是日本人。审讯开始,检察官问我几个事,我全说不知道,检察官生气地问,供词不是你招认的吗?我说全是受刑不过胡说的。检察官骂道:“狡猾狡猾的。”又上来四五个日本警官,将我按倒在地一阵毒打,我还是不招认。接着,将我十个手指用签子夹住两个人拽,同时用烧红的火钩子烫身上,一边夹一边烫一边问,我受刑不过,只得将原来引供的供词又全招认了。从那以后,再没有审讯我。我一直不服,可也没有办法。把我审讯完,就审苏士纲,让我出庭陪审作证。苏士纲不承认,先给他灌火油掺辣椒水,然后用烧红的钩子烫,把他打折好几根肋条,最后受刑不过也招认了。审讯完我们两个后,开始审讯别人,都让我们俩出庭陪审作证,不作证就施酷刑折磨。凡是受审讯的人,没有不受刑的,个个被折磨得胡说八道,打得体无完肤。当审讯到伪满热河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科长张实(30来岁)时,他有骨气。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伪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供职,对离宫外八庙的文物尽职尽责,设法保护,能耐不小,平时在省公署就看不起日本人,表现很傲慢,所以抓国事犯时,说他是救国勇士团的秘书,把他抓起来用刑。他对汉奸特别仇恨,他看到翻译孙阳生、特务王作孚、陈书阁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的丑态就骂,特务对他更加残酷折磨,灌凉水,跪刺木头,滚雪地,压杠子,坐老虎凳,上电刑,手心钉钉子,火钩烫,灌火油掺辣椒水,割肉撒盐面,竹签子夹手指,由于受刑不过,最后他按着检察官的引供招认了。他日语讲得很好,完全用日语回答检察官的问话。检察官问他你都发展谁加入救国勇士团,他为了除奸,当堂把翻译孙阳生、特务陈书阁、王作孚、日籍文履谦和在伪实业厅的日本人咬出好几个。检察官当即下令就把在公堂的孙阳生抓起来,随后把张实咬出的几人全都抓了起来。就这样,起初为制造“救国勇士团”假案卖命的苏华、孙阳生、王作孚、陈书阁、文履谦和几个作恶多端的日本人全成了囚犯。原先他们给别人用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自己也全受用了,被打得体无完肤,成了重铐重镣在身的囚犯。在审讯苏勤茂、宏达堂掌柜孙洞臣、还有傅南云、滦平商工公会会长高农山时,在堂上被活活打死了。当审讯文履谦时,让我、苏士纲、张实出庭陪审作证,张实端起放在地上烧火钩子的炭火盆朝检察官砸去,把几个检察官砸伤烧伤了。张实又遭一顿酷刑折磨,拖回监号,他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在监号上吊死了。日本在三官庙审讯时,全在夜间。从监狱往外提人,由留置场往监狱送人,也在夜间。日本法西斯的毒刑惨无人道。我们这些无辜人在毒刑折磨下做了无罪囚犯。

花钱买命

经过几次过筛子刑讯,陆续放出不少人,到康德六年(1939 年)初,还剩 108 人,有人称一百单八将,关在监狱内。根据"罪行"轻重,分别戴上不同的刑具。这些人,全是承德街和各县有名望的人物,酷刑下招供,刑后翻供,对刑讯不服,弄得伪检察厅很头疼。我们在承德监狱关押半年多,又陆续释放了一部分。最后剩下 72 名(有人称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于伪康德六年(1939 年)六月押转到锦州监狱。我们离开承德那天情景最惨,阴阴的天,早晨掉几个雨点,吃完早饭,看守叫放茅(上厕所),不大会儿放茅时间到,又赶紧回监号。有的进监号还没坐稳,看守又叫到院里集合。顿时,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把我们包围起来,端着刺刀,个个如狼似虎嗷嗷乱叫,把我们这些囚犯两人一个手铐一对一铐起来,又 4 个一根绳,一串一串地捆起来。大家都以为要进行集体屠杀。然后由警察拖上汽车,一共几辆汽车我说不清,不叫随便看。汽车上的宪兵架着机枪,上车后,都让低着头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出监狱门,我从车厢板空隙看到,路两旁站着很多人,有的放声大哭,尽管警察宪兵像疯狗似的狂吠乱咬驱赶人群,人群就像潮水般地随着汽车流动,哭声越来越大,逐渐连成片。我们这些车上的"囚犯"都预感到这是送葬的队伍。汽车开出监狱大门一直向东走。汽车开到二道街子附近,车上有几个"囚犯"也放声哭起来。当时我也以为是集体屠杀,心中觉得特别冤枉特别凄惨。有的家属在街上叫着名字哭,囚犯没有不落泪的。那种悲惨景况真像杜甫《兵车行》诗中写的那样:"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汽车直向河神庙杀人场(今市教育局后勤那地方,原先有个河神庙,是民国时期的杀人场)开去,有的人就想跳车。当汽车开到小南门回民杨家院门口时又朝南拐下去,顺武列路直奔火车站。这时,我的心才掉了肚。路旁几乎没人了,汽车也开得快了。到了火车站,又是一片人群。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人群隔在场外,囚车一直开到站台上。警察和日本兵在四周站岗,高处支着机枪,把我们推下车面向北山低头坐着,不许左顾右盼。只听站台外一片哭喊声,非常揪心,面临生离死别,真是"……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无论是站外的家属,还是站台上的囚犯,皆知此一分,是今生难会面的诀别。我们在车站呆一个多时辰,然后坐票(火)车拉走。夜间到了锦州监狱,砸上脚镣入监房,我的心中才平静下来。康德七年(1940 年)初,伪锦州高等法院依据检察厅在承德刑讯形成的起诉材料开庭进行一审,将我和苏士纲判死刑,其他人分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法庭一审没有用刑,绝大多数人都不服判,我当庭就申明不服判决要向最高法院上诉。判后,把我和苏士纲砸上重铐重镣关进死囚牢,等待新京训示。

监狱看守把犯人当成摇钱树，对囚犯敲骨吸髓。本来监狱生活特别苦，早晨一碗粥，中午一碗饭，晚上一碗粥，有时给一碗菜汤，有时啥菜也没有。犯人有病不给治，医官下监巡诊，也是一看了事。就这样，看守还经常打骂虐待。师范音乐教员倪治仁和陈永孝、苏士昌、苏华、张贵山、白子厚、孟彦博和殊像寺喇嘛络凤桐等人均被看守打死。不想受罪的人就得给家人写信要钱，家中把钱寄到会计科，个人说明理由，领出一点，暗中送给看守，才能免灾。在锦州监狱3年多时间，我零星送给看守几百元。我的上诉书呈上之后，锦州高等法院通知可以聘请律师。当时无论法官和检察官全是日本人充任，聘请律师也必须是日本的，我花两万块满洲票，聘请一个原在日本高等法院当院长，后因年老当律师的名叫上山的法学家。他看了我的上诉书，又到监狱听了我的陈述，他对案中定我带领队伍在滦平县某地进行操练的时间和我去日本观光的时间（1937年3月，伪锦州铁路局组织的锦热两省半费旅日观光团）有出入，产生了质疑。上山律师根据我提供的出国证据，他又回国进行了调查。先后经过1年多时间，将我出国护照、照片、指纹等文字证据拿到锦州高等法院。康德九年（1942年）八月立秋前夕，经新京伪最高法院院长批准，最高法院在锦州高等法院组织合议庭，进行二审判决，上山律师在法庭与法官展开了争辩，当庭出示了证据，证明案中定我带队在滦平进行操练是假的，否决了我当"救国勇士团团长"的认定罪。团长没有人，救国勇士团组织也就不存在了。伪最高法院日本人审判长元林通过翻译说："你们这些人虽然少有犯罪证据，但是对满洲帝国心怀不满，可是经长期（4年）教育，脑筋总是有改变的，国家对你们特别宽大，今天放你们回家，要做忠于帝国的顺民……"就这样，日本法官羞羞答答地当庭宣布无罪释放了我们这些坐了4年冤狱的"囚犯"。有37人先后在刑讯室和狱中被折磨死，有不少人被蹂躏成为终身残废。

（选自周金生等编：《承德文史文库》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惨

案



潘家峪惨案

佟德敏　冯伯英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农历春节的前一天)侵华日军调集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1000多名日伪军,对冀东地区丰(润)滦(滦)迁(安)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枢——潘家峪村进行血洗,杀戮爱国同胞1237人,烧毁房屋1100间,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

一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坐落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在丰润县城东北60华里处。该村始建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世代繁衍,至惨案发生前,全村有220户人家,1700口人。这里群山环抱,溪水长流,松青柏翠,果木成林,盛产龙眼葡萄,是个美丽富饶的村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冀东先后沦陷。丰润县潘家峪,因之也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然而,潘家峪人民没有屈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抗日斗争。这里比较早地发展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7年底,共产党派红军团政委李润民、营长孔庆同到冀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武装暴动训练军事干部。1938年春,孔庆同来到潘家峪,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斗争。

同年7月,冀东爆发了有10万工农武装参加的抗日大暴动,潘家峪正处于暴动的中心地带。教师潘巨川、潘润之以及潘作新、潘振东等30多名青壮年,首先投入这一斗争,并动员出本村地主、富农的20多枝长短枪支,发动群众为暴动队伍筹集粮款。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支援抗日斗争。

1938年秋,冀东抗日大暴动因西撤受挫,整个冀东斗争形势一度转入低潮。但是,潘家峪人民没有消沉。他们和西撤受挫回来的抗联战士共同坚持分散隐蔽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冬至1939年间,是冀东恢复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潘家峪一直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堡垒村,这里设有八路军的军事修械所和被服厂,后方机关和军队常驻在这儿,部队也常来这里休息和整训。

日军为摧毁潘家峪一带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潘家峪周围二三十里范围内设有王官营、下水路、徐庄子、兴城、火石营等多处日伪军据点，经常到潘家峪等村进行"清乡"和骚扰。

在此期间，日军为"强化治安"，普遍建立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订"门牌"，实行"五家连坐"。潘家峪人民公开抵制，把王官营伪警察所发来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烧掉。日伪据点向各村征粮、要柴，潘家峪坚持不交一粒粮，不交一根柴。

从1940年春开始，潘家峪便已建成抗日一面政权村，成为冀东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丰滦迁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给予日军以愈来愈沉重的打击。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在日记中记载："从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〇年底二三年时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一百三十多次，然而潘家峪的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五十多次。"当时日伪人员提起潘家峪，往往谈虎色变，胆战心惊，这更激起日军对潘家峪的仇视。

1941年1月25日潘家峪大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

日军血洗潘家峪，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据伪丰润县县长凌以忠（兼伪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供认，并从伪丰润县政府翻译、惨案参加者田宝文交待材料中得到证实：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接日本军部扫荡潘家峪的命令，于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是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开的，参加会议的有：

佐佐木二郎（日军驻丰润县公署顾问）；

凌以忠（伪丰润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

田中忠男（驻丰润县日军指导官）；

秃田（日本人，丰润县新民会成员）；

森本（日本人，驻丰润县宪兵队长）；

董蓬林（伪丰润县公署顾问室外事秘书、合作社翻译）；

田宝文（伪丰润县公署翻译）；

李继贵（伪丰润县警备队副大队长）；

王治国（伪丰润县警察所所长）；

赫孝鹏（伪丰润县警察所督察长）；

李连生（伪丰润县警察所特务系系长）。

陆心醒（伪丰润县公署秘书）。

会议中途还把伪县公署建设科长汤连荣、财政科员钱桂唐找来，询查道路破坏与安全情况，以及筹措所需钱粮等事宜。

会上，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讲了扫荡潘家峪的目的、任务和军令要求。

据合作社翻译董蓬林在证词中供认："……佐佐木得意地说：'这次讨伐是唐山道顾问给我的命令，这是三县（丰、玉、遵）联合讨伐，本县我是总指挥。'"

据惨案参加者——迁安县伪警备队副大队长汤鹏举供称："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还有驻滦县和迁安县的日伪军。"另据丰润县伪县长凌以忠供称："驻唐山的日伪军也参加了潘家峪大屠杀事件，丰润县有一部分日伪人员就是搭乘唐山日军汽车去潘家峪的。"

以上供词证实，参加潘家峪大屠杀事件的除丰润、玉田、遵化县外，还有驻唐山、滦县、迁安县等地的日伪军。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显然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阴谋策划的。

另据事件参加者——伪丰润县公署翻译田宝文供认："惨案发生后，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省政府，请求办理。佐佐木二郎也写了汇报材料，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这次大屠杀不是"临时动议"的偶然事件。据罪犯凌以忠供称：在预谋会上，先由顾问佐佐木二郎传达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姓。""日本军就要出发到潘家峪去围剿，你们的警备队必须要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便调遣。同时，军部已命令遵化、玉田等县也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可以同时出发，必须将潘家峪团团围住，不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并警诫我们，任何人不得走漏这个军情，如果泄漏了这个消息，都有杀头之罪。"

讲得何等明确，就是要"惩罚老百姓"，而且要彻底，不许有一个人逃跑。这是一场意欲灭绝一切的大血洗。

三

1941年1月25日拂晓前，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的日伪军，分别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面八方包围了潘家峪。

大约早晨七八点钟，日军进庄挨门挨户地搜查，不论男女老幼、残疾病人，都强逼到村头集合，有不去的，当即被杀害。潘风柱七十八岁的老母亲走不动，被一棒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军搜出，一战刀把她砍成两截，肠子、血流了一地。村里人们被驱赶到村西一个长约十丈、宽约三丈，不足一人深的坑里集中，坑边架设着机枪，四周围站满了日军。日军官开始训话，宣扬"中日亲善"、"王道乐土"……

进而逼问群众，村子里谁是八路军？粮食藏在哪里？人们都沉默着，没有一个人言声。

此刻，日军从人群中拽出30多个男人和妇女，说是让他（她）们去给做饭。有不愿去的，即用刺刀威逼。

与此同时，日军在布置杀人场。

合作社翻译董蓬林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指他随顾问佐佐木二郎等人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即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聚集，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力，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

日本兵和特务们把村里的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里铺垫了很厚的一层。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军，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军端着刺刀排列在由西大坑到潘家大院的通道两旁，然后强逼人们由西大坑走向潘家大院。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说：“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一声，院大门关上了。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3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愤怒，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的冲进来，在人群中照准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冀里，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军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机枪、步枪子弹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裹进了浓烟烈火和枪弹包围之中。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围了上来，在刺刀下潘国生壮烈牺牲。

日军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拚！只有拚！

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箩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其他人没被吓退，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她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在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林、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左右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粮仓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惟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人们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潘善祐十来岁的小儿子，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得幸逃出大院，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在南崖子。

大屠杀的同时，从西大坑被拉去的30多名年轻妇女遭到更为残忍的蹂躏。据一位被挑去做饭而逃生的青年农民向我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诉说："鬼子把她们推下白薯窖，随后，只听到窖里在怒骂、嚷叫、哭嚎，过了一会，女人的声音慢慢地低哑了，又过一会儿，突然是女人的惨叫，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见鬼子爬出窖来，随后又点着几捆玉蜀秸往窖里扔，窖口冒出了黑烟。"日军企图把里面的30多具女尸焚毁，由于柴少火不猛烈，女尸烧成半焦半黑。她们的下身被刺刀挑破，肠胃外流，头上、身上沾满了血污……

潘成74岁的老母亲，也是被挑去给日军做饭的。饭做熟后，日军用战刀把老人的脑袋一劈两半，点着一堆玉蜀秸焚烧尸体。日军又举起老人7岁的小孙女，扔入火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他们身处烈火的包围之中，又遭坍塌物的重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去后多数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4岁的潘张氏等六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机枪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

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原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煎烧,忙从压在身上的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 32 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 32 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墙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纵火烧房。全庄燃烧起一片大火,浓烟里蹿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为一片焦土。

四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 1237 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 276 人。

日军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却又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丰润县长凌以忠供认:“日本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准往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血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雷烨随同丁振军(冀东办事处主任)、赵尚全(区长)、吴玉山(区长)等来到潘家峪。先是到潘家峪周围村庄慰问遇难受伤的乡亲,1 月 31 日午后,他们进入现场。雷烨在惨杀现场拍下了许多幅照片,并写了《惨杀场视察记》。文中写道:

> ……
>
> 石桥边就是潘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进院门,眼前尽是人尸,恶腥的气味迎面扑过来。
>
> 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手右槽上一个女尸,她赤身裸体,有半个脑壳被炸得血脑殷红,右手搭着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贴着砖墙,据来认尸的人们说:‘这是潘正东家里的孕妇’。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得崩裂,那一定是被鬼子用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
> ……小小的尸体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很难以将孩子

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扭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

大院北面平房墙根，有一堆还算完整的儿童尸体。这许多已经集中，无人来认暴露到现在的死孩子，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经过春雪、严霜的寒冻，经过水泼，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弯曲焦炭形状……弯曲、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面目已很难辨认，只是累累弹痕和刺刀的戳伤清晰可见……

不仅是我们的孩子被鬼子毁灭，还有孩子们的母亲、长辈和姐妹。

惨死了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从许多母亲的尸身旁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可以看出：母亲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

事隔四十多年，读着这血淋淋的文字，仍然使人的心灵强烈震颤，使我们永远不能淡忘，更不容任何篡改和抹煞。

五

惨案发生后，丁振军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来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陈群团长带领指战员也从远道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潘家峪幸存活命的人们，大多住到邻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受伤的乡亲们被安置到邻近的马庄户村。派去的医生，到马庄户村给他们换药治疗。地方和军队领导逐村挨户地进行慰问，看望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乡亲，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复仇的呼声。

2 月 5 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上“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一堆四肢、焦肉、肚肠，一堆骨殖，一堆人头。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个到两个尸体，包了 128 个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送葬的队伍从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放在松柏长青的南山脚下。没有唱一支挽歌，也没有鲜花、供果、清酒做祭品，有的是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 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 7 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 120 多人。五月初五，冀东党政领导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

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八路军十二团活动。1942 年 8 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 150 多次，歼俘日伪军 1021 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血腥的大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潘家峪这个抗日根据地，以后更加巩固，后方支前工作更加活跃，人民抗日斗争更加坚决了，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人民，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唐山人民从 1952 年始，又先后重修了四座坟墓，立墓碑四座，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个，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人们还编写了一首叙述潘家峪惨案的深沉、哀怨而又悲愤的潘家峪惨案歌曲，在潘家峪一带广为传唱。沧海可以变为桑田，用血写就的历史却永远不能改变！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

大杨官营惨案

刘绍友

1942 年，侵华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进行得极为残酷。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迁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人民子弟兵进行反“扫荡”斗争。1942 年 7 月中旬，迁安抗日军民先于迁安干河草村（现属滦县）全歼制造潘家峪惨案的刽子手佐佐木二郎以下日伪军 300 余人，后于大杨官营的岚山西麓伏击了来迁安视察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一七师团长原田熊吉和驻唐山第二十七步兵团长铃木启久等，敌伤亡惨重。战斗的胜利，使群众深受鼓舞，日军却大为震惊。敌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急忙于 8 月上旬在北平召开兵团长会议，指出：“目前南方正在广大海域作战，我们必须尽可能以少数兵力确保大陆，不使南方战线有后顾之忧。然而作为后方基地的本方面军管区内，特别是冀东方面的治安，处于极其令人忧虑的境况，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目前形势所不许的，必须迅速肃正……”经冈村宁次亲自策划，当即部署了：一方面在冀东长城沿线的迁安、遵化山区大规模制造“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的“无人区”，并关照要“与关东军接壤驻地

的警备部队密切联系实行之”，妄图彻底摧毁冀热边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在冀东基本区大规模地构筑“遮断壕”（封锁沟），企图把抗日游击根据地分割封锁起来，实行反复“扫荡剔抉”，以实现破坏基层抗日组织，维持他们长期血腥统治的狂妄野心。铃木启久根据冈村的部署，命令驻迁安沙河驿镇的日军第三联队长小野修，负责迁安上述任务的实施。

日军驻迁安守备队及星加部队（三十一大队）接到命令后，立即纠集日伪军2000余人兵分南北两路倾巢出动。北路以驻迁安守备队长滕川（外号疤瘌脖子）为首，协同伪警备队长汤鹏举，指挥迁安县城、建昌营、罗屯等据点敌伪军1000余人，沿长城线，对建昌营以西迁青平联合县抗日根据地“扫荡”制造“无人区”。南路星加部队和伪军1000余人沿滦河西、南岸，对抗日迁滦丰联合县根据地进攻“扫荡”，并用刺刀驱赶着数以万计的民夫，强迫构筑从都树店通往大杨官营南北走向的长达近百华里的“遮断壕”。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次进攻“扫荡”之疯狂，摧残手段之凶狠，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兽蹄所至，财物被抢光，村庄被烧光，人民群众被任意抓捕、杀戮。

正当敌人蠢蠢欲动的时候，8月8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抗日军民于长城南侧的彭家洼村（属无人区边缘），取得了全歼从冷口进入迁安境内进行“扫荡”的日军关东军原田东两中队75人及满军一部的胜利，给了日军制造“无人区”的行动当头一棒。滕川、汤鹏举疯狂至极，8月9日凌晨，带领县城日伪军300余人，气势汹汹直扑彭家洼村，妄图进行报复。可是，抗日军民早已转移，留给敌人的只是日伪军的尸体。滕川气得暴跳如雷，向日伪军命令：统统地鸡犬不留！这天，惨无人道的敌人，杀死了没来得及转移的农民裘玉书和赵玉丰70多岁的老母亲及彭志两岁的小儿子。然后，拆毁全村的门窗和部分梁檩，运到村头烧炼日军的尸体。村里财物、牲畜被搜掠一空，部分民房被烧毁。滕川在彭家洼村洗劫了两天后，继续带领日伪军向北“扫荡”。

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三）包围了东密坞村。敌人用刺刀将全村没来得及转移的男女老幼约400余人驱赶到街上，滕川通过翻译对群众说：“只要说出谁是八路，谁给八路办事，就可以放回家。”群众怒目而视。敌人一无所获，当场抓走男性农民28人，关押到建昌营据点里。8月18日，滕川、汤鹏举带领日伪军再次包围东密坞村。日伪军把群众圈到一起，为逼迫他们交出八路军和共产党员，当场将农民孙宝柱、刘喜廷、司殿文等五人打得半死致残，又抓走了60人。敌人为了收买人心，由建昌营放回18名年龄较大的农民，在县城强迫4名青年充当伪军（后均跑回），其余72人被日军杀害于大杨官营。

8月16日，敌人扫荡西密坞村，当场枪杀群众1人，抓走群众28人，后来，全部杀害于大杨官营。

8月19日，敌人从芝草坞村抓捕群众50人。其中11人中途跑回，7人因年龄

较大被释,5 名青年被强迫充当伪军,27 人死于大杨官营。同日,敌抓捕孙家店村干部、群众 13 人,其中妇女 2 人由县放回,1 人被赎回,1 人被强迫充当伪军,余下 9 人死于大杨官营。

8 月 20 日,敌人从提岭寨村抓走群众 9 人,其中 7 名妇女在迁安受尽摧残折磨后放回,其余 1 人死于县城,1 人死于大杨官营。

8 月 27 日,敌人包围了小崔庄,抓走干部群众 40 多人,中途跑回一部分,36 人被监押于县城,村里花钱赎回 18 人,死于县城 2 人,死于大杨官营 16 人。被赎回的青年王汝林、王旭二人,在县城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径,并身受其害,回家的当天晚上就投奔了八路军,在临别亲人时说:“只有拿起枪,把鬼子赶出中国,才能有我们的活路。”敌人抓捕坎辛庄村武装班长李作安扑空,将其父李洛子、叔父李义、二弟李作书、三弟李作德和家里雇佣的染布师傅 5 人抓走,除其叔父李义中途跳汽车逃跑外,其余 4 人均死于大杨官营。此外,死于大杨官营惨案中的还有西峡口村 8 人,大杨官营村 3 人,五重安村 2 人,隔滦河村 2 人……

日军在迁安长城沿线的山区制造“无人区”期间,实行反复疯狂“扫荡”,“梳篦剔抉”。大规模地烧毁村庄,使长城沿线的上空,浓烟弥漫,火光四起,共烧毁房屋 6400 余间。紧靠长城的当时有 251 户的大庄村,就被烧毁房屋 662 间,使这个山村变成一片废墟。白洋峪村先后被敌人焚烧八次之多。

在此期间,敌人还杀害抗日区村干部、群众 100 余人,其手段极其残暴,有刺死、打死、砍杀、烧死、洋狗撕尸等等。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罄竹难书。

血洗杨官营　野蛮报复

大杨官营村位于迁安县城南约 30 华里处,它西靠岚山,东傍迁安通往滦县的公路。党在这里开辟工作较早,1941 年就有了党的组织,群众基础较好。村抗日游击小组经常挖公路,埋地雷,破坏敌人的运输线,给敌人造成威胁。1941 年底,沙河驿据点的一个姓刘的特务秘密潜入大杨官营村,妄图刺探抗日情报,时间不长就被抗日游击小组抓获镇压。因此,敌人视大杨官营为眼中钉、肉中刺,仅在 1942 年上半年,就先后两次“扫荡”大杨官营村。敌人为了逼迫群众供出共产党员和村干部,将农民朱安塞进白薯窖内用烟火活活熏死。村粮秣委员郭树田被敌人追得无路可走,抱着账本跳井而死。敌人杀害了干部群众后,又在村子里放了一把火,烧毁房屋 140 余间,粮食衣物被抢劫一空,使大杨官营村变成一片废墟,群众无家可归。

镇压愈凶,反抗愈烈。英雄的大杨官营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野蛮行径所吓倒。他们继续坚持斗争。同年 7 月上旬,抗日游击小组又于村头抓获迁安县城敌人派来的 5 名密探,当即被他们镇压了 4 名,跑掉了 1 名,这更激怒了敌人。所以南路

"扫荡"的日军星加部队(三十一大队)把大杨官营村作为"扫荡"的中心目标。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三),敌伪军1000余人,从滦河南岸拉开20余里宽的大网兜向西南方向"扫荡",最后把包围圈收缩到大杨官营村。这天日军在村里又枪杀了青年农民徐春头,捕住没能转移出去的党员、干部、群众37人,拆毁了新搭起的窝棚,抢走了牲畜财物,砸烂了群众的锅碗坛罐。傍晚,日军把抓捕的人们押到木厂口村,先对他们一个个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八路军动向,但他们坚强不屈,只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丧心病狂的敌人当场打死5名农民(均是小杨官营村人),然后将大杨官营村的徐仲年、徐庆年、张欢喜、黄永富等18人,用绳子6人一串地绑着,拉到村内的一眼水井旁,用布蒙上双眼,推进水井,而后又投石下井,致使18人全部身亡。另外14名群众除1人被放,其余全部被敌人杀害于滦县的偏凉汀大桥和油榨村等地。

敌人在大杨官营、木厂口村一带洗劫撤走后,8月16日晚,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将从木厂口村水井中捞出来的18位遇难群众的尸体抬回村,停放在街心。乡亲们目睹此惨景,无不悲痛至极。村办事员、共产党员王海亭激愤地对乡亲们说:"敌人惨杀了我们的亲人,我们怎么办?""参加八路军,向鬼子讨还血债,为死难的亲人报仇!"人们愤怒地回答着。当夜,在共产党员田增等带动下,全村182名青壮年报名参军,组成一支复仇队,编入了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十二团。

集体大屠杀　惨绝人寰

刽子手滕川带领日伪军在迁安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对所有的村庄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疯狂"扫荡"之后,将抓捕的200余名村干部、群众押解到迁安县城。当时,伪县政府的一所容纳180余人的监狱里已塞满了"犯人"。所以,敌人把这次抓捕来的人连同以前扣押的县城附近各伪乡、保"情报员"20余人,分别羁押在县城内的昊天观和圣人庙(日军宪兵队部)里。

凶残的滕川妄图捞到冀东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在昊天观里对被关押的人们夜以继日地进行审讯,摧残杀害。审讯开始,滕川命令日本兵拉出小崔庄农民崔成路和五重安村年仅十六岁的赵盈儿,敌人剥光他们的衣服,反绑上双手,滕川假惺惺地对他们说:"说出谁是共产党和八路,大大的有赏,不说,统统的杀头!"满怀民族深仇大恨的崔成路、赵盈儿沉默不语。滕川凶相毕露,命令日本兵用刺刀将他俩活活扎死。接着,滕川对西峡口村青年农民张贺动了酷刑。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先放出狼狗将张贺咬个半死,然后再往他身上泼洒煤油放火焚烧,张贺的皮肉被烧焦,但他咬紧牙,什么也没有吐露,五重安村农民宫恒被敌人灌凉水活活折磨致死。野河峪伪大乡"情报员"梁秀山,虽然几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当敌人逼问他时,他始终重复着"野河峪乡平安无事"那句话。当敌人又非刑拷打西密坞村

农民韩凤彩时,小崔庄村办事员王保生目睹乡亲们惨遭毒手,怒不可遏,挺身而出,厉声喝道:"住手! 我是干部,什么都知道!"滕川一听忙说:"你的知道? 统统的说,大大的有赏!"王保生怒目圆睁,对滕川骂道:"我知道你们是群专门杀人放火的强盗……"滕川气急败坏,命令对王保生施以酷刑。王保生的双腿被敌人用杠子压断,但他强忍着剧痛,仍是骂不绝口。滕川在被押的男人们中间没有得到什么,就命令日本兵将在押的十几名年轻妇女带进审讯室。首先一个个进行审问,接着就让看受刑人的惨景,然后将被折磨得半死躺在地上的提岭寨村青年农民大桥拉进来,一刀将他的脑袋砍下来,把血淋淋的人头摆在妇女们的面前,进行威逼恐吓。妇女们一个个怒目而视,没有说出一个字。孙家店村青年农民刘祥、赵玉芹夫妇同时被抓进县城后未能见面。阴险的滕川企图利用这一关系捞到东西,他命令伪军将赵玉芹押审讯室去认丈夫,并对她说,如果说出谁是村干部,谁给八路军做事,就放她回去。赵玉芹说:"我一个妇道人家能知道什么?"她走到审讯室,看到房梁上被吊打得鲜血淋漓的、地上躺着被折磨得半死的人里,都没有自己的丈夫刘祥。她心里十分着急,最后,在房檐前看到了丈夫被倒绑在梯子上,已经被折磨得血肉模糊,昏迷不醒,不成人样。顿时,她怒火满腔,痛斥敌人的暴行。

凶恶残暴的滕川对被抓捕来的干部、群众,用尽了各种酷刑,但仅仅摧残了人们的肉体,并不能征服他们的爱国意志。他毫无所得,恼羞成怒,最后,谋划进行集体大屠杀。

9 月 10 日(农历八月初一)清晨,滕川命令日伪军将关押在监狱、昊天观和圣人庙三处的村干部、群众 300 多人,全部 4 人一串地绑起来,都驱赶到昊天观里。滕川对即将惨遭屠杀的群众欺骗道:"这里八路活动的厉害,皇军为保护中国良民准备把你们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他命令将被折磨得不能行动的张贺等 6 人活埋在昊天观院内。然后,把 300 多人编成四路纵队,前后由乘着汽车全副武装的敌伪军监押着,出城东门向南走去。当人们走到大杨官营村北时,有 4 名群众因遭折磨行走艰难,滕川便命令日军当场用刺刀挑死。

天近中午,敌人驱赶着 300 多名群众在大杨官营村东公路边上停了下来。滕川立即命令敌伪军一面包围村庄,搜捕抗日干部群众,一面在杀人的场地——大杨官营村西岚山脚下的老牛圈那里做大屠杀的准备。老牛圈是三个相连的大水坑,敌人除在这里的周围架起数挺机枪外,并从村里抬来几个大缸摆在每个水坑前。首先将从大杨官营村抓捕到的农民徐雨年、徐乐年、杨福来 3 人杀死,留下张永成、丘宽 2 人,强迫他们往水缸里挑水。布置就绪,刽子手滕川为防备被驱赶的群众的反抗和逃跑,采取了分拨屠杀的手段,把 300 多人分成三拨。当他们屠杀第一拨人的时候,第二三拨人由少数敌伪军在原地监管着。因从这里到老牛圈相距约有 2 华里,又有村庄做屏障,使同胞们看不见日军是在那里杀人。

中午,日本侵略军用刺刀驱赶着第一拨 100 余人来到老牛圈。这时,十几个凶

神恶煞般的日军，举着洋刀"嗷嗷"怪叫，强迫人们跪下，可是，同胞们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当儿，杀人不眨眼的滕川，将战刀在水里一蘸，嚎叫一声，挥刀将一名群众的头砍掉，跟着，其余的敌人也都下了毒手。顷刻，四五十名同胞的人头和尸体滚入水坑，鲜血染红了坑水。这时，东密坞村青年司浩人眼见乡亲们惨遭杀害，怒气冲天，挣断绳子，踢倒身边的日军，撒腿就向南奔跑，边跑边喊："乡亲们快跑，不要等死！"当他跑出老牛圈，将要跑进兴福寺前的一条大沟时，不幸遭敌枪击，中弹身亡。司浩人的英勇行为，点燃了人们的反抗怒火，当剩下的五六十名同胞刚要四处奔跑时，万恶的日军刀枪齐下，很快将第一拨人杀死。时间不大，敌人又驱赶着第二拨人登上了兴福寺前的高坎。这时，一位抗日政府女干部和一位抱着未满周岁小孩的妇女，看见同胞被日军残杀于老牛圈里的尸体时，就停步不走了，并大声说："乡亲们，鬼子在杀人，我们不要再往前走去送死……"穷凶极恶的日军朝两位女同胞身上猛刺数刀，她们怒目切齿，破口痛骂日本强盗，最后英勇地倒下了。就连那位妇女怀抱的未满周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被一个凶狠的日本兵拎起双腿劈成两半。

野河峪伪大乡"情报员"粱秀山被分在第三拨里，在日军驱赶着这拨人向老牛圈走去时，他想，不能这样白白送死，跑还有生的希望。于是，他边走边悄悄地弄松绑在手腕上的绳子，当走到村西头一群众院墙外的茅厕时，趁敌人不备，捋掉绳套，钻进茅厕，免遭杀戮，成为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张永成、丘宽因给敌人挑水，也免于一死。据他俩回忆，他们目睹滕川在这次惨案中一气砍杀了群众 18 人，死于滕川刀下的共有三十余人。

万恶的日本强盗杀完人回城后，大杨官营村的乡亲们回来了，他们目睹老牛圈的惨景，一个个涕泪交加悲伤万分。亲人的尸体填满了水坑，尸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有的身首异处，有的断臂缺腿，有的肝肠外露，有的血肉模糊。水坑内的尸体都已浮肿腐烂，无法打捞，更无法辨认。乡亲们只好在水坑上面铺了层玉米秸，然后用土简单的掩埋了。老牛圈的血水溢出坑外，穿过大杨官营村街心，向南流出 16 华里，汇入滦县商家林村的北泡（小湖），真是血流漂杵。

翌年夏季，山洪暴发，老牛圈里的人头骨被冲出，有的被冲入街心，有的漂泊在庄稼地里，汛期过后，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拾头骨，共拾到头骨 312 颗，重新掩埋在兴福寺东侧。

面对敌人无比疯狂的"扫荡"和残酷野蛮的杀戮镇压，英雄的迁安人民，没有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他们掩埋好死难同胞的尸体，满怀民族深仇大恨，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敌人殊死决斗，与抗日根据地共存亡。广大民兵同敌人展开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配合主力部队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1945 年，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把侵略者押到了历史审判台上。1959 年，参与制造杨官营惨案的凶手之一、原迁安县伪警备大队长汤鹏举，被我人民法院

判处死刑。

在铁蹄蹂躏下的迁安，遍地狼烟，村村喋血，家家戴孝，巍巍岚山低垂下泪，绵绵滦河哽咽哀鸣；而今群山起舞，滦河欢笑，到处呈现出文明盛世的景象，但侵略者在这里的罪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选自中共迁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烽火漫天》第4辑）

马家峪惨案

李永春

四面环山的马家峪，在遵化县城南60里。村西越过山岭10里就是遵（化）唐（山）公路，南面绕出山口前的屏障是丰润县北山，北面和东面都是高耸入云的高大山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村西山沟里建有炸弹厂；村东山洞里贮存着冀东军分区供给部的军用物资，并住着八路军的伤病员。八路军和民兵还经常从马家峪出发，去破坏遵唐公路和日军的物资运输。日伪军在马家峪一带不断受到袭击。于是，日军蓄意对这一带进行报复。

1942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二日），驻丰润县左家坞的200多名日伪军，由日军佐佐木率领，在马家峪村北面的大屯官村屠杀无辜群众，马家峪人民闻讯，当晚纷纷跑到深山躲避。留在庄里的多数是妇女和老年人。他们打算等天明再去山里躲避。没想到翌日（20日）凌晨，日伪军就包围了马家峪。天一亮，端着刺刀的日伪军把50多名老人和200多名妇女逼到村中心五道庙坎下听"训话"。五道庙坎下是一条30多米宽的大壕沟。老人们蹲在壕沟北面，妇女们坐在南面，四周架着机枪。日军还在人群前点起一堆大火，把从各户抢来的门板、饭桌子、农具等架起来焚烧。

"训话"开始，日军头目佐佐木先嘟噜了几句，翻译官翻译说："这里是'匪区'，今天皇军来，是找八路，找八路的伤病员，找八路的东西，交出来没事，如果不交出"，他顺手一指会场西北面挖好的一个1丈2尺长宽、4尺多深的大坑说："统统死了死了的！听清楚没有？嗯！"群众鄙夷地注视着他。

突然日军将从会场外面抓来的一个叫徐浩林的老人推到人群前面。日军扯下他的棉袄，问他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里，徐浩林不说话。日军抽出东洋刀，用刀背试砍他的脖子。徐浩林还是不吱声。日军翻转刀背，猛地一刀，将徐浩林的脑袋砍

落在地。孩子们吓得哇哇地哭着往母亲的怀抱里钻。翻译官吼叫着:"不许哭!"日军又让保长徐兆光提着徐浩林的头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翻译官威胁着说:"看见了没有,如果不说,都这样! ……"人们还是一声不吭。日军走进人群,把50多岁的徐从林拽了出来,逼问谁是八路,哪里有八路的东西,徐从林摇摇头,没有回答。日军一刀把他砍死。接着又从人群中拉出王合奎,推到沟西坎上的院子里,边问边打。王合奎破口大骂,直到打昏过去,骂声才停止(傍晚,日军走后他才苏醒过来。鼻梁骨被打塌,至今落残)。日军又从人群里拉出徐兆灿等八九个人继续打,徐兆灿也骂不绝口,也被打得昏死过去。

时到中午,日伪军们杀猪宰鸡,在村里吃午饭。吃饭时留下部分人员监视着群众。饭后,日军干脆不再问了。把搜庄时抓来的徐兆喜、徐兆明、徐兆清和徐兆耕4个老人驱赶到会场西北角的柴草垛上,然后将柴草垛点燃。徐兆喜等被烧得疼痛难忍,喊叫着往回跑。日伪军用棍棒把他们打回去。4个人衣服都着了火,身上冒着油。只有徐兆耕忍着剧痛冲过火堆,东倒西歪地倒在坎子根下佯死不动,幸免于难。其他3人被打昏后,倒在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日军见没有人说出八路军的去向,也没有人交出八路军的东西,就用镐头、木棒四处乱打。会场里的男人们被打得来回挤动。当挤到一块时,日军就从高坎上往下扔大檩条砸。马玉如老人突然站起来喊:"跑吧! 不能等死!"说着他便沿着农坎根向南跑。跑出十几米,被日军开枪打死。徐景顺正患病,也被日军从家里赶了出来。他拄着棍子,蹲在人群的北边。日军从他背后猛砍一刀,头被砍落,尚连着一层皮,垂挂在胸前。鲜血染红了壕沟,尸体和被打昏的人倒了一地。

太阳偏西,日军将还没有被折腾死的30位老人,由两个日本人各拽一个,拽到会场西面干水沟的沟沿上。另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逐个地把他们杀死,尸体扔在沟里。对已昏死过去的徐兆兴、王贵云等5人,也拖来扔在沟里,用土埋上。

日伪军走了,躲在深山里的群众陆续回村,赶紧扒开土,抢救亲人。经抢救,徐兆兴、王贵云、王敬仁等5人被救活,会场东面几户人家的院子里,还发现了被烧死的王景福、马文成和被凉水灌死的王景明。这次日军"扫荡",马家峪共有43人被杀害(其中1人系丰润县胡各庄来马家峪住闺女家的)。这43人,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自此,马家峪人们,把老年人遇难的地方叫"老人坑"。

当时马家峪被围的200多人中,有不少人知道西山里有八路军的炸弹厂,东山藏有八路军伤病员的岩洞。日军那样血腥屠杀,始终没有人告密。刚围庄时,马玉福的妻子正在洒水,准备扫地。日军要赶她出去。她将手里的水盆朝日军砸去,当下被日军打得死去活来,但她始终没向日军求饶。等日军一走,她把儿子王守孝(后来改的名)叫到跟前,嘱咐他和王树柏、王树荣等10名青年报名参加八路军,为乡亲们报仇。1943年2月中旬,冀东军分区李运昌的队伍在马家峪北面大山(即芦各寨南山)被日军围困。马家峪人民,依然冒着枪林弹雨上山给八路军送水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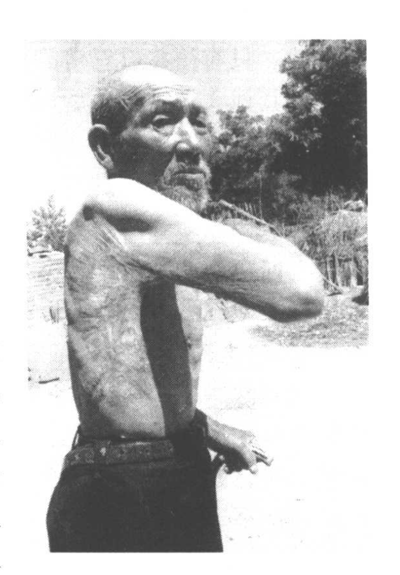
饭,夜里给部队带路,下山突围。马家峪人民前仆后继,支前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

潘家戴庄惨案

田益廷　刘作云　王树增

潘家戴庄现属河北省滦南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八路军北宁路南(下简称路南)游击区中的一个拥有371户、1765口人的大村。北距张各庄8公里,南距倴城8公里,是倴(城)、张(各庄)公路的必经之处。1942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驻张各庄、司各庄的日伪军250余人,在日军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千人坑"大惨案。屠杀群众1110人,烧毁民房1030间,财物抢劫一空,美丽富饶的村庄变成一片焦土。杀人现场惨不忍睹:30名婴幼儿被杀人强盗摔死在碌碡上,60名孕妇身遭杀戮,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惨案虽已过去43年,但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潘家戴庄人民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



潘家戴庄幸存者周树恩

一

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规定"自十二月二日至八日期间,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高潮"。

日军先是以路北为重点,沿长城各县制造"无人区",驱赶路南地区16岁至60岁的男人去路北挖沟筑垒。尔后,在路南"挖遮断壕",搞"清水摸鱼"。日伪军驾着大板车大肆抓捕男性青壮年去做劳工,违者遭枪决、刀砍或就地活埋。对于没有

"良民证"的外乡客商、走亲访友和赶集上店的农民,则视为"通共"、"通八路"分子,枪挑、刀砍于"杀人坑",并下令不准收尸,收尸者也以"通共"治罪。

为了配合路南地区群众的抗日活动,八路军迁滦卢县抗日基干队大队长张鹤鸣率二连、新三连和地方游击队一部,挺进路南,经常活动于唐官营、川林和潘家戴庄一带,寻隙打击敌人。12 月 4 日下午 4 点时分,当抗日部队由唐官营经潘家戴庄向程庄转移时,日军派出一个骑毛驴的密探,尾随在抗日部队的后边,探清我部队的人员、装备后,从潘家戴庄折回张各庄据点。晚饭前抗日部队刚到程庄,准备在该村宿营,铁杆汉奸、伪保长程殿栋同伪办事员程为平,偷偷溜进倴城据点,向伪警察分局长王星寿报告。王星寿这个汉奸,为献媚请赏,马上通电他的主子——驻张各庄日本骑兵队队长铃木信。在此之前,负责在冀东执行"五次治安强化"的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少将兵团长铃木启久(后升为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曾指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迅速对该村进行'剔抉',彻底消灭该地的祸根"。所以,铃木信得到王星寿和密探的报告后,如获至宝。当夜就招集张各庄、司各庄两处日军、特务、伪警备队 250 余人,深夜 12 点出发,在柱王庄会合后,直扑程庄,去执行"剔抉"计划。

人称铁腿、夜眼的神八路——迁滦卢基干队,得知程庄伪保长程殿栋逃跑的消息后,即刻撤离该村。午夜 12 点,从店子村迂回到潘家戴庄。天将拂晓,从村西传来了稀疏的马蹄声,隐隐约约的人影也凝眸可见。隐蔽在村西高坡、岭地上的哨兵,断定是敌人摸上来了,即刻向敌射击,走在前面的两个日军尖兵,应着枪声栽下马来,一个当即毙命,一个捂着伤口嚎叫不止。一心想到程庄围歼"土八路"的铃木信,万万没有想到会在潘家戴庄挨打。骤然不知所措,慌忙拨马败逃。特务和伪警备队也犹如丧家之犬,尾随着掉头西窜。失魂落魄的日军、特务逃至皂户村,按兵未动,伺机反扑;被吓得胆战心惊的伪警备队,趴在潘家戴庄村西的沙岗子下边,等待"皇军"命令。

八路军迁滦卢基干队,为保存实力,决定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迅速转移。部队行动前,怕老百姓身遭不测,动员他们一同转移。村东头的几家群众随着转移出去了,但多数群众受了伪保长戴老四什么"'中日亲善','皇军'来了不跑不溜,就会不杀不砍"的欺骗宣传,没有转移。善良的人们哪会知道,一场浩劫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二

12 月 5 日天亮后,日军派出的密探回报:"八路军已经跑了"。铃木信声嘶力竭地喝令部下,重新整队杀回潘家戴庄。250 多名日军、特务把潘家戴庄包围后,端枪、持棒挨门挨户喝令男女老少统统到村东南角的大场里听"皇军"训话。慢者

棍棒打，违者杀头！多数群众还没吃早饭，就被赶出家门。全村老老少少，不管盲人、残废还是病人都被驱赶到庄东南“会场”上。这里刀枪林立，戒备森严，东、北两面的房子上站满了端着刺刀的伪警备队，场南的围墙上和路口中间，架着好几挺机枪。日军和特务头目们，齐聚“会场”中央，他们是：

铃木信，日本驻张各庄骑兵队长；

郭成信，日本骑兵队翻译官；

张占鳌，张各庄伪清乡办事处主任；

间　岛，日本驻伪清乡办事处顾问；

安　田，日本驻张各庄骑兵小队长；

曾广昭，伪清乡自卫队队长；

牛　田，日本驻司各庄骑兵小队长；

程凌阁，驻司各庄的伪警备队小队长；

杨××，驻司各庄日本骑兵队翻译。

铃木信面对群众虎视眈眈，阵阵狂笑；特务爪牙横眉立目，拎着棍棒，端着步枪，围着群众晃来晃去。场上的百姓们预感到一场灾祸就要临头。

9点时分，心狠手毒的日军、特务，从人群中抓出了教师马文焕，厉声问道：“八路的有多少？都往哪里去了？”马文焕刚说出“不知道！”一群特务蜂拥而上，朝他一阵乱棒，打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一个特务对准他的脑袋又狠狠一棒，殷红的血浆立即从他耳朵里喷了出来，马文焕惨死在血泊中。几个日军、特务盯着喷血的耳朵，跺脚狂笑。接着，一个特务又从人群中拽出了齐盘成，先用凶狠的目光扫视一遍人群，然后回过头来，大声喝道：“要不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同样下场！”齐盘成未及答话，就被打死在地上。此刻，一个日军又从人群里拉出青年李庆发，随后扒去他的棉袄，另外4个日军端着刺刀，对着他的前胸后背，连声逼问：“八路军的哪里去了？”李庆发回答：“不知道！”日军再次逼问，他还是回答：“不知道！”这时，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一刺刀扎在李庆发的肚子上，热血喷了一地，肠子流出肚外，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潘恩田，因躲避鬼子藏在自家的幔子上，被特务发觉后，赶进杀人场。他刚走进人群，就被日军、特务抓出来一阵苦打。潘恩田的母亲见到日军、特务打自己的儿子，心如刀绞，急忙从人群里挤出来，一面用双手搂住儿子，一面对日军、特务说：“他，他是我儿子……”“死了死了的！统统的八路！”日军哇啦哇啦地叫着，伸手把潘恩田的母亲抓起来，推入人群。随后在潘恩田身上又是一阵乱棒。潘恩田的肩胛骨被打碎了，耳朵被打烂了，他昏死过去。日军、特务惟恐他不死，又从左腿上扎了他一刺刀。随后日军、特务又杀了潘恩田的母亲，活埋了他的妻子、妹妹，摔死了他那刚满四岁的儿子。数小时后潘恩田死而复苏，强忍着伤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逃出了虎口。

时近中午，日军、特务按照铃木信的指令，窜入人群，一起抓出了李忠海、潘恩

和、戴运成、戈振久等十几名群众，用刀枪棍棒打死，仍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气急败坏的日军、特务，一看问不出八路军的去向，便对全村人狠下毒手；从人群中挑选出20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枪逼着他们将地主潘俊章紧靠场北挡车霸道的老沟，加深加宽，挖成了一条长10丈、宽7尺、深6尺的大坑。大坑挖好后，日军、特务从挖坑人手中夺过锹、镐，驱赶群众进坑。群众面对死亡，挣扎外闯。敌人手持刀枪、棍棒、锹镐，在人群中狂刺乱打。棒起刀落、锹劈镐砸，善良的百姓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万恶的日军、特务，把打死打伤的人们，扯着双腿扔进大坑。周树全誓死不进杀人坑，被日军一镐刨死在坑沿上。戴昌田被日军推进坑里后，他奋力挣扎着往外爬，又被鬼子一镐砸碎了脑袋。日军把人们投入坑内，然后在上边堆上柴草纵火焚烧。这时，未死的群众发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声，活着的拼命挣扎着往外爬。周树清刚从坑里爬出，又被两个特务扔进火堆。周树恩刚给日军装完车，就被特务押入杀人场，打入烈火熊熊的大坑。他乘敌一时不备，从火坑里滚爬出来，随手扒下着火的衣服，赤身爬出了杀人场。

时过正午，敌人用过午饭，又把杀人魔爪伸向妇女。开始，敌人用刺刀、棍棒、锹镐驱赶妇女进坑。女同胞们驻步不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就用绳子拉、扁担赶将她们推进了坑。大坑里堆满了死人和活人，拥挤不下了，鬼子、特务逼着人们又挖了一个长2丈、宽1.5丈、深5尺的大方坑将妇女们继续往下赶。齐安居的妻子，从坑里往外爬，一个日军朝她前胸狠狠刺了一刀，齐妻躺在血泊中。她的两个女孩子，一个叫菊勾，一个叫白勾，见到妈妈被敌人扎死了，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万恶的日军又用刺刀把两个孩子挑进坑中。周树昌的妻子正顺着坑沿往上爬，被日军一刺刀挑开肚子，立刻肠胃落地，胎婴流出。

在妇女们惨遭毒手之前，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斜挎腰刀的日军军官，在坑边上大喊一声："花姑娘的，这边来！"张占鳌等一伙特务，立刻心领神会，窜入人群，拽出十几个年轻的姑娘、媳妇，拖进地主潘俊章家的大院，随后日军、特务跟进一大帮。这群野兽，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们轮番奸污之后，又把她们拖回杀人场，枪挑、活埋了。

孩子的妈妈们，只知道自己的惨死，哪里知道她们的亲生骨肉比自己死得更惨！丧尽天良的强盗们，把嗷嗷待哺的孩子抓起来就往大坑里扔，或顺手一刀砍掉脑袋，或一脚踢进火坑。特务张占鳌是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他凶狠地拎着孩子们的小腿往碌碡上摔，把孩子们摔得脑浆迸溅，血肉横飞。一群特务也学着张占鳌的办法杀人，30多名天真活泼的幼童被活活摔死在碌碡上。

这群吃人的豺狼，一心要把潘家戴庄人斩尽杀绝，最后把20多名挖坑的青年也枪挑、锹铲于杀人坑。

血洗之后，250多名日军、特务从杀人场窜回村里，他们先砸门落锁，翻箱倒

柜,抢劫财物,后纵火烧房。顿时,火光冲天,浓烟蔽日。第二天又遇西北大风,风助火势,愈燃愈烈。熊熊烈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柴草木灰随风飘出30多里。潘家戴庄变成一片焦土。

日军血洗、焚烧潘家戴庄的野蛮暴行,很快传遍路南大地。各村群众遥望着大火,焦虑不安,愤恨不已;与潘家戴庄有亲属关系的人们,无不牵肠挂肚,甚至失声痛哭;虎口余生的人们,特别是趁给敌人抱草而逃出杀人场的学生们,虽得到邻村乡亲们的热情照料,但因思念亲人,却终日哭泣不止。被日军征去路北(杏山、干河草和长城一线)挖沟、服劳役的150多名青壮年,听到自己的家乡被烧、亲人被杀,心急如焚,他们扔掉锹镐,闯过敌人的数道哨卡,甩掉敌人的追击,星夜跑回潘家戴庄。去他乡走亲访友的潘恩普老大爷回村后,一见全家(9口)亲人被杀,房子被烧,立刻昏倒在地。他想亲人想疯了,一连几夜不离杀人场,呼天唤地,哭儿叫女,后来,含恨离开人世。

在抗日政府的组织发动下,活下来的潘家戴庄人,三四天后陆续回村,附近村庄的群众和亲友也都先后赶来。五天头上开始收殓亲人尸体。众亲人一进杀人场,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哭声震天撼地,十里以外可闻。

人们滚动着泪水,从坑里往外挖亲人,可是大坑里被烧、杀的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发臭。一具具尸体,有的缺肢断臂,尸首分离,有的手足成灰,额烂头焦。孩子们的小小身躯,已经蜷缩一团。被埋在大坑最上层的人们,已被野犬撕得残缺不全。“千人坑”里惨状奇凄。齐广礼被烧得全身焦黑,腿已成灰。戴文秀的闺女,是被日军头朝下活埋的,双脚烧焦,眼和舌头全被挤压出来。60多名孕妇肚子都已开裂,胎婴流出体外。

乡亲们尽管小心谨慎地挖,但是,拉胳膊,胳膊断;拽腿,腿掉下来。无奈,用绳子拴在死者腰上往下拽,把抠出来的尸体摆了一场。亲属们凭着带血的“良民证”和残存的衣着特征辨认亲人。最后,有200多具尸体,实在无法辨认只好合葬成一个肉丘坟。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

承德县“二·一”惨案

1943年2月1日，日本侵略军驻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调集承德日本宪兵分队、下板城日本军田野大队和伪满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鹰手营子、东涝洼、胖和尚沟、南双庙、三道河子、黄旗湾、西大庙、松树沟、牤牛窖、胡杖子、大杖子、两益城、苇子峪、小营14个村庄，抓捕了上千名无辜群众，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二·一”惨案。

鹰手营子等14个村庄，地处万里长城的北侧，燕山主峰雾灵山的东侧，山庄重镇承德的西南，水陆交通要塞下板城的西北。自1938年始，这里就是八路军的抗日游击区。

鹰手营子等14个村庄的人民为抵御外侮，他们积极为八路军筹粮、做鞋、送信、站岗，主动配合武装部队抓特务，除汉奸，破交通，切割通讯线路，袭击日伪据点。1942年8月，承滦兴县大队在顺地道村凉水泉处，击毙伪承德县副县长米泽四郎和鞍匠警察署长曹振方等日伪军警十余人。10月，西大庙、南双庙、西益城等几个村的群众，配合八路军攻克上板城车站，毁坏了其铁路设施。11月，这里的群众又配合八路军攻克并焚毁新杖子伪警察分驻所。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经久不息。

同年，承德宪兵队为扑灭抗日烈火，频繁地对抗日游击区进行“扫荡”，大搞“人圈”、“集家并村”，实行所谓的“治安肃正”。1943年初，迁遵第十三区干部在胖和尚沟村的水泉沟开会，被讨伐队包围。突围中区文书高云峰不幸牺牲，他身上携带的各村干部花名册被敌搜去。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见到花名册，如获至宝。于是，一场镇压承德县人民的残酷的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1943年1月3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晚，木村光明指挥承德宪兵分队、下板城日本军田野大队和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分成三股，在承德县鹰手营子等十四个村庄实行大检举、大逮捕。

第一股，承德日本宪兵分队600多人。当晚，闯进鹰手营子村。他们将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到姚兴院里看押起来。数九隆冬，人们挤在一起，坐待天明。第二天清晨，日军宪兵用绳索将所有男人绑在一起，朝新杖子村押送。

2月1日，天色未明，承德日本宪兵分队，又分别包围了胖和尚沟、东涝洼、南双庙、苇子峪、两益城、小营村，挨家挨户地抓人。胖和尚沟村李久功被宪兵从屋里搜出，宪兵寻搜院落时，李又钻进了宪兵搜查过的菜窖。日本宪兵又从菜窖里把他

搜了出来，刺杀在菜窖旁。李小仓被抓后躲藏起来，第二次搜出后被宪兵用棍棒活活打死。陈老爷儿（绰号）逃跑未成，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动弹，不久便含恨死去。李万广走在路上，碰到日本宪兵，躲闪不及，也被抓住。胖和尚沟村被抓 70 多人，只有李景贵 1 人半路借机滚坡逃跑，其余全被押送到新杖子村。

东涝洼村与鹰手营子村相隔 3 华里。全村有 129 人被抓捕，日本宪兵用绳索把他们捆绑起来，押送新杖子村。其中孙甫半路解脱绳索，蹲藏在看电线杆的坑子里，得以脱逃。其余全被押到新杖子村，就连出家老道阎士龙也未能幸免。

同日（2 月 1 日）被抓捕押送到新杖子村的还有南双庙村 110 余人，苇子峪 80 人，两益城 87 人，小营 45 人。

日本宪兵将被抓捕的人关押在新杖子村东的于家店大院（原是“中信和”商号的店铺）内，店内临街的 5 间房和院内 5 个存放货物的土圆仓挤满了被抓来的人。还有几个实在挤不进去，日本宪兵就用枪托打着强让往里挤。南双庙村李朋是个驼背，被挤得晕死过去。宪兵将他拖到院子里，冻醒了还叫往里挤。还有一个姓张的，人们叫他傻禹，也被挤得晕死过去，拖出来冻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气来。后来，硬是在棍棒强逼之下才挤进了屋。花名册上的村干部，被关进土圆仓（这种仓是荆条编的，里外抹一层薄泥，系当地农家存粮、放东西用的小库房）。大院里架着两挺机枪，门口四外有日本宪兵把守。一片杀气，阴森恐怖。

2 月 1 日晚，被关押的人们纷纷议论。东涝洼村武装委员马洪祥说：“坐着等死，不如和他们拼了！”同村宣传委员刘永芳说：“先下手为强，跑出几个算几个。”……马洪祥和刘永芳等村干部悄声对张和稳说：“你以借火抽烟为名，去把日本宪兵捉住，弄到屋里，用破棉花套子堵住他的嘴……”那天晚上，日本宪兵增加了岗哨和看守，“虎口脱险”计划未能实现。

2 月 2 日，日本宪兵在院内西厢房里设立了“公堂”。公堂里摆下棍棒、皮鞭，屋梁上悬吊着绳索，地上燃着炭火，火盆里烧着铁锹、铁棍和火筷子。残暴的日本宪兵在所谓过堂中，采用了“敲山震虎”的战术，妄图杀一儆百。他们每次刑讯都提几个人，挑选其中一个在花名册的村干部或是看来是胆小的，严刑逼供，借以恐吓其他人。南双庙村党员干部刘树被拉进屋扒下棉袄，日本宪兵要他交出村里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办事员的名单。连问几次，刘不予理睬。日本宪兵气急败坏，从火堆里抽出烧红的铁条向他脊背烙去，刘被烙昏过去。日本宪兵把他拖出屋外，用凉水泼醒，又拽进屋里审问烫烙，刘全身的肉都被烙烫烂了。同村干部肖汉存、罗万贵和东涝洼村干部刘永芳等都先后惨遭上述毒刑。两益城村干部邢俊伶，被日本宪兵绑在一头高一头低的板凳上灌凉水。肚子灌胀了，就被拖到外边，拴住两脚拇指倒吊起来，用擀面杖从肚子里往外擀水，擀完了再灌。一直灌了五桶凉水。日本宪兵将其折磨得奄奄一息，才又拖回土圆仓。南双庙村刘永伶、刘永明哥俩被拉到屋里，宪兵几次声色俱厉地审问，哥俩一声不吭，宪兵们恼羞成怒，撮了一撮炭火，

倒进了刘永伶的裤兜里。东涝洼村齐礼、苇子峪村关振祥、小营村房广廉和房广顺,都在刑讯时被日本宪兵活活打死。

2月3日,马洪祥和谭凤被拉去刑讯。日本宪兵在火盆上翻烤着馒头,边吃边对他俩进行审讯。日军宪兵见马洪祥怒目以对,便起身拿起木棍向马劈头打去。马往后一躲,瞅见门旮旯里有一把二齿镐。他乘机挨近门旮旯。趁打他的宪兵又去翻馒头,抄起二齿镐,向宪兵的脑袋搂去,二齿镐搂进了那日军的脑袋。接着,马洪祥又向坐在炕上的另一个宪兵头顶砸去。屋内挂毛巾用的横杆挡住了镐头,没有砸中。马洪祥没等炕上两个宪兵从懵懂中明白过来,扔下二齿镐,撒腿就跑,被守门的宪兵抓住,将其绑在窗户框上。晚上,与马洪祥同村的刘福廷和李景云见马洪祥的胳膊被绳子勒进了几道深沟,便背着看守给马洪祥松了松绳子。马洪祥缓一会儿,对杨万明和张和信等人说:"你们不能等死,能跑就想法跑吧!这些日本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并示意墙脚有烟囱眼。杨万明、张和信明白了马洪祥的意思,从地下破大板上拔下一根铁钉,一点一点地抠那烟囱的砖缝。这时候马洪祥他也解脱了绑绳,便和杨万明用脚蹬掉了已经活动的砖块,带领孙仓、王义、赵凤瑞、张洪瑞、谭修、张恩廷、张和信、杨万明等陆续钻了出来。马洪祥钻出去以后,又返回来寻找他的父亲马兴,打算一起逃走。正在这时候,日本看守发现了墙窟窿,立即堵死了。马洪祥没来得及再跑出去,被堵在了屋里。

2月4日(农历腊月三十日),是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大检举、大抓捕夺去了人们大年三十的幸福和欢乐,寒冷、饥饿、酷刑之后的伤痛折磨着每一个被抓捕的人。

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有的妇女和老人冒着风雪给被抓捕后已经四天没有吃喝的亲人送饭。残暴的日本宪兵用枪托殴打送饭的人,把他们打倒在地,把送来的饭菜统统泼洒在地上。

2月6日,日本宪兵将多数人用汽车陆续押运到承德监狱;马洪祥、刘永方和与八路军有联系的伪新杖子警察分驻所代理所长陈继祥等人被押到新杖子村东头残遭杀害。

第二股,下板城日军田野大队200多人,在胡杖子、大杖子、牤牛窖村和附近几个小庄,抓捕了280多人。

1月31日下半夜,日军即包围了村庄,并在山头、村口设立了岗哨。2月1日天刚亮,日军进村,挨家挨户搜查,将花名册上的人捆起来带走。花名册上的人不在家,就将其亲人抓住带走。大杖子村任连永被抓,过滦河时跳河逃跑。胡杖子村郭廷龙、郭东阁父子在册,因给八路军送粮未归,幸免于难。有几个走路的也被抓捕,一齐押到下板城日军田野大队部。

日军田野大队部,设在下板城村东侧,原来是"庄元恒"商号的外栈(存货处)。牤牛窖、大杖子、胡杖子等地被抓来的人,都关在院子东侧的3间房子里,门口窗外

有日军看守,院门口炮楼上还有岗哨,警戒森严。第二天,日本宪兵们把被抓来的人按十来个一拨,提出刑讯。他们首先刑讯花名册上有名字的干部,然后挨个审问另外的人。谁只要承认给八路军办过事,不论是站过岗,还是送过信,管过饭,就连给八路军交过粮的,刑讯后一律不予释放。胡杖子张国普、大杖子姜海廷、牤牛窖村谢永宽、曲梦铎等村干部,在吊打、烫烙酷刑下,毫不屈服。日本宪兵就在凉水里掺上煤油、头发茬子等物,挨个地灌。灌胀了就用杠子在肚子上压。昏过去的抬到屋外冻。冻醒了再灌,再压。人们虽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谁也没有吐露八路军的秘密和村中办事员的情况。牤牛窖村赵山、关元献,胡杖子村窦岚贵、赵永等十几个人,被日本宪兵敲打骨节后,扒光衣服,排列在营房院内的水井旁。日本宪兵从井里往上提水,泼在这些人身上,三九严寒,滴水成冰,这些人身上结满了冰渣。胡杖子村窦岚之,被日本宪兵用通红的火钩子烙,拖到井旁泼水冻,用开水烫,灌凉水、压杠子,百般折磨,他宁死不屈。

第三股,承德县警备科警察讨伐队、日伪警察200多人,在警防股长黑烟(日军)指挥下,2月1日凌晨,分别窜进黄旗湾、三道河、松树沟、西大庙村,抓捕了村干部及为八路军办事的伪牌甲长和普通群众250多人。他们把抓来的人押到上板城村,分别关在上板城村西烧锅院内和烧锅西院的4间房子里。

第二天,黑烟股长组织日军和伪满警察,在两个院内分别对抓捕来的人进行刑讯逼供,残酷地折磨。西大庙村十家牌长李祥和其弟李洪,还有知文邦、杨俊武在刑讯时,前胸后背全让日本警察用成捆的香火烫焦了。暴徒们管这种刑罚叫"穿火背心"。松树沟村杨万全在棍棒下不招供,日本警察让他张开嘴,夹起一块火炭擩进他的嘴里。三道河村杨喜恩,西大庙村李福屡遭刑讯,也不吱声,日本警察扒下他们的衣服,摁倒在地,将燃烧的炭火扣在他们的脊背上。三道河子村王枝,被严刑拷打,王枝拒不招供,并怒斥日军警察。日本警察兽性大发,将烧红的铁丝捅进了他的生殖器。王枝一声惨叫,昏死过去。

2月7日,下板城、上板城两处释放了一些人后,把刑讯逼供后定为有"罪"的人和在花名册的村干部,分别捆绑,用火车押运承德监狱。

全县被押送到承德监狱的共有376人,其中新杖子284人,下板城48人,上板城44人。

承德监狱,如同传说中的十八层阎罗殿,阴森恐怖。被押进监狱的人,有的戴着手铐,有的拖着脚镣,南双庙村刘树等主要村干部拖着两副铁镣,脚腕子磨出的血滴流不止,上百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对面大板铺,一面铺上排坐三行,除了吃饭,大小便也不让出屋,白天黑夜的坐着,不许晃动,不许歪斜,不许说话。板铺上下到处是吮吸人血的大虱子,任其叮咬,不许抓打。看守在监房外面看着,谁违犯了,就被叫到监外一顿毒打。南双庙村李自洪,坐得时间太长了,有些支持不住,刚一歪,被看守发现,叫出去打了五板子。手掌被打得半个月肿胀不消。每个监房里

每天都有被毒打致死或被疾病刑伤夺去性命的。两益城村邢俊伶,向看守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宪兵队撤销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坐罚,给予室内活动的自由。为此,刑俊伶被叫到监外,棍棒加身。他面对凶残的看守,毫不畏惧,越打越骂,最后英勇地死在敌人的棍棒之下。在牢里,每天给两顿饭,一顿一勺红高粱米粥,稀得照见人。日本宪兵在这里继续对被监押的人非刑吊打,残酷折磨。有口供的送交"法庭"。没有口供的继续刑讯。刑讯的手段比在新杖子、上板城、下板城更残忍、更狠毒。黄旗湾村孙连举、李景全和南双庙村李香,先后被电刑和吊刑夺去了生命。

3月6日,承德特别治安刑事法庭(法官、翻译、录师等全是日本人)经过一个月的刑讯,便根据花名册的记载把姜海廷、肖汉存、刘树、杨俊武、贾文义、张永恒等28名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残杀在承德西郊水泉沟"万人坑"内。

同日,还有318人被定"罪"判刑。其中一批被押送到东北下煤窑、开矿山等充当苦役;一批留在承德监狱,重新分配监房,每天也被拉到工厂干苦活。不论是下煤窑、上矿山,还是蹲监狱的,都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很多人因饥饿、劳累、疾病和看守的无情折磨,惨死在煤窑、矿山或机器旁。有的挣扎着回到牢里,倒在板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每到此,看守就用木匣子将死尸装上拉出,倒在荒郊野地里。送进监狱的318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竟有216人被夺去了生命。

日军在承德县制造的"二·一"惨案,先后共有254人惨遭杀害。因主要劳力被抓走残害致死,剩下孤寡病残生活无着,病、冻、饿、愁死者竟达600人之多。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3个大庄变成了"寡妇村"。

1956年,制造"二·一"惨案的日本战犯木村光明被押上了被告席,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犯罪事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大血债。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日军侵华暴行录》)

鲁家峪惨案

李永春　陈庆平

鲁家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城西南,在遵(化)、玉(田)、丰(润)三县接壤地带。

早在1927年,共产党员张明远、杨春林曾在鲁家峪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协会,同年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成为冀东中部抗日领导中心。鲁家峪人民在党和政

府的教育下，踊跃参军支前，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鲁家峪抗日军民的革命行动，使日伪军惶恐不安。日伪军的小股敌特，经常在此失踪匿迹，这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注视。日军调动兵力，到鲁家峪"清乡"，又被八路军和民兵击败。于是日军恼羞成怒，逞"强化治安"之淫威，对鲁家峪多次进行重点围剿，制造了鲁家峪大惨案。

火烧鲁家峪

194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九日），驻唐山日军副司令米左，纠集了驻遵化县城、王各庄，驻玉田县的孟四庄、朱官屯和驻丰润县三女河、沙流河等处据点的日伪军1000多人围剿鲁家峪。当时八路军各机关单位，设在鲁家峪大庄里边的东峪、北峪和龙宝峪等村里，并在山洞或地洞可供隐蔽。为了保密，还制订了军民共同遵守的规定：凡外人到鲁家峪办事探亲，只能到鲁家峪大庄。就连运送伤员，也得换成鲁家峪村的报国队（民兵组织的前身）员转送。不明身份的人严禁入内。所以，日军到鲁家峪一带多次"围剿"，也没摸着鲁家峪根据地的底细。这次日军包围鲁家峪的企图：一是寻找八路军主力进行报复；二是摧毁鲁家峪根据地的一切设施；三是找村干部，破坏村政权。



鲁家峪惨案遗址：上图的碾子是鲁家峪大庄日军砍杀群众之前捆绑他们的地方。

2月14日，天刚蒙蒙亮，鲁家峪东南面大刀山和西南面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是报国队岗哨发出的"有敌情"的讯号。村武装班长巩玉然、高万盛立即通知八路军和群众转移进山。

日军包围了鲁家峪大庄，逐家搜查抓人。没来得及转移的七八百群众被日军

驱赶到该村虫王庙前的干河沟里。四周架起机枪,日伪军端着刺刀包围着人们。日军先将男青壮年集中到一处,把他们的衣服扒光,逐个儿查看。数九寒天,人们赤身裸体地站在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有的人冻僵了跌倒在地。

日军对青壮年进行赤身检查,认定他们不是八路军,又逐个儿地审问。米左带着翻译来到人们的面前,先装出一副“文明和善”的样子,向群众表示:皇军是“帮助”老百姓“消灭”八路的,将华北建设成幸福的“乐土”,说出八路和村干部,皇军有赏……人们听了,个个横眉冷对,没人搭腔。米左见人们不听他那一套,凶相毕露,指挥日军和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刘志顺等30多人,棒打石砸。有的四肢被打伤,有的头被砸破流血,刘志顺当场昏死过去。还逼两个农民躺在雪地上,日军穿着皮鞋踩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说出八路军和村干部。尽管百般折磨,没有一个群众屈服。

日军的企图失败了,米左恶狠狠地抽出大洋刀,向群众宣布:“不交出八路和干部,统统烧掉你们的房子。”群众仍不理茬。一群日军即举着火把,分头放火。霎时,鲁家峪大庄成为一片火海。65岁的老人刘思等藏在柴草里,柴草着火,他跑了出来,被日军逮住,捆在门板上,将其扔进火堆,被烧成糊炭。李贵祥的老母亲,没有爬出屋门即被烧死。李自如老人把他那不满一周岁的小孙女裹上衣服,藏了起来。日军放火时,听见孩子哭声,即把点着火的柴草放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活活烧死。没有挣脱缰绳的大牲口,也都被烧成黑炭。人们眼望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没,一个个心如油煎。

浓烟大火整整烧了半天。傍黑,日伪军才离开鲁家峪。日军这次进剿鲁家峪,李自树、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等9人被烧死。李贵灿的母亲等6人被烧伤,刘志顺等30人被打伤;烧死大牲畜26头,烧毁房屋1931间,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除被抢走以外,焚烧一尽。

同年7月16日(农历六月二十日),驻遵化县王各庄日军中队长南木和警备队大队长王大胡子(王熙武)率领日伪军150多人,再次进剿鲁家峪。对鲁家峪大庄残存的房子和新搭起来的窝铺又纵火焚烧,东峪和东峪村的部分房子也被烧毁。日军把没有跑脱的三十多名群众赶到虫王庙前,施放毒瓦斯。刘继真、李自荣等20多人,被毒瓦斯熏得在地上翻滚,继而昏厥过去。70多岁的老人刘继顺当场被毒死。日头偏西了,日伪军才走。

时隔三天(7月19日),驻沙流河的日伪军100多人,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的带领下,又窜到鲁家峪。日军得知该庄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的脸上有麻子;后街的武装班长李有凡正在给死去的母亲戴孝。因此一进村,在烧杀抢掠的同时,到处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鞋上蒙的白布(戴孝)可以扯掉,出了天花脸上落的麻子无法改变。日军把从各处圈来的高万盛、李自省、刘景春、吕洪德等7个脸上有麻子的从人群中拽了出来。刘季仲是个煤窑工人,刚来家探亲。他脸上没有麻子,因嘴里镶着金牙,日军说他不是好人,也被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日军对高万盛、刘

季仲等8个人严刑拷打,逼问谁是高万盛。高万盛就在其中,人们谁也不说。高被抓住,就装哑巴。无论日军怎样打,他只是哇啦。日军用纸沾上煤油点火烧他,他还是哇啦,没说一句话。后来带着他到山上找藏着八路军的岩洞。高见哪个洞口有蜘蛛网就往哪个洞钻(他知道那样的洞内无人)。闹腾了半天,日军没辨认出高万盛,也没找到八路军,即把高和李自省、刘景春3个脸上有麻子的枪杀在东峪庄头。日军在临走时,又在鲁家峪大庄头上将吕洪德、吕恒泉、高景瑞、高老大和刘季仲5人枪杀。

这4天里,日伪军的两次烧杀、施放毒瓦斯,仍没从鲁家峪人民的口中得到鲁家峪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由于鲁家峪人民接受了前几次日军"扫荡"的教训,大多数人转移进山,坚壁清野的方式方法也改进了,所以这次遭受的损失较小。

这一年2至7月,日军3次进剿鲁家峪,烧毁房屋1973间;18人惨遭杀害。

日军见摧不毁鲁家峪根据地,便在第四次"强化治安"以后,把鲁家峪(大庄)划为"无人区",不准有人居住,妄想以此杜绝老百姓和八路军的来往。然而抗日烽火在鲁家峪越烧越旺。

1942年4月16日至5月1日(农历三月初二至十七日),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当时的职务)卷土重来。他调集了唐山、丰润、玉田、遵化等地的日伪军4000余人,对鲁家峪进行了历时半个月之久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掠、大烧毁,使鲁家峪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灾难。

鸡冠山烈士洞

东峪村的东北沟底部有一座大山叫鸡冠山。鸡冠山半山腰有几十个火石洞,其中有一个大洞原来叫狐仙洞。狐仙洞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从洞口进去约一里地段,内有大、小7个洞。大洞能容300人。小洞能容几十人。大小洞之间有窄道相连,能容一人直立或侧身通过。狐仙洞很深,且又隐蔽。平日洞内住着八路军伤病员和卫生部保卫班战士30多人。

1942年4月16日,日军扫荡鲁家峪,100多名日伪军在叛徒马成金的带领下,从鲁家峪直奔鸡冠山。他们见山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断定洞里藏着八路军和军需物资,就在鸡冠山安营扎寨,住了下来。还在狐仙洞口和东大岭上加放岗哨,安上了电话机。

部分日伪军在狐仙洞前,困守3天,一无所得。就逼使一个从别处抓来的群众进洞探听虚实。洞里人误认为是日伪军进洞,就开了枪。洞外的日伪军听见枪声,就往洞里施放毒瓦斯。又将地雷和炸药塞进洞内轰炸。到了第5天(4月20日)天亮后,日伪军才撤走回东峪村。洞内30多人全部遇难。

在围困狐仙洞的同时,另一部分伪军还在附近别的山洞进行搜索。狐仙洞下

边有个洞，叫水洞。日军见洞口有水，问叛徒马成金说："水的有，人的没有？"马成金回答说："水的有，人的大大的有。"日军叫马成金进去。马成金壮了壮胆，边喊边慢慢地往洞里蹭。进洞内不深，被八路军司令部通信员叶奎一枪打伤胳膊。马即退出洞口。日军见状，先是大声嚎叫，让人们出来。接着就往洞内施放毒瓦斯。在洞内藏身的后勤部干部靠山河、行署秘书王洪文、东峪村武装班长梁志民等8人，用喝人尿、湿手巾或湿衣服捂嘴等办法防御毒瓦斯。在第7天夜里，扒开洞口，越过东山岭脱险。

在狐仙洞附近的小火石洞躲避的群众，因洞浅又无泉水，日军施放毒瓦斯，群众大多被熏死在洞内。有的出洞时被日军打死。被服厂厂长王振远等工作人员14人和军分区干部7人，钻出洞后，惨遭杀害。群众刘玉书一家5口，刘思功一家3口，刘树安的妻女3人，都被熏死在洞里。刘庭发、李树全等人从洞里出来，让日军用刺刀挑死；青年刘小七被日军扔进土洞活埋。当时山洞内外都有死尸。

日伪军在鸡冠山驻剿5天，据统计有95人遇难（其中八路军伤病员和干部72人）。解放后，为了纪念这些坚强不屈的死难烈士，当地政府将狐仙洞修复立碑，并改名为"烈士洞"。

影壁山前的残杀

影壁山在鲁家峪北面，把北峪村分成东西两部分。它好像一道影壁，故名影壁山。影壁山的周围山腰里有无数的火石洞或岩石洞。抗日战争前期，军分区的后勤工厂、仓库、报社和电台，大多设在那里。抗日军政人员有的就在洞里工作。

1942年4月17日，日军包围了北峪村。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六），日军在北峪村附近搜山时，杀害了15名群众。又将从北峪村东面的单阴背（山名）各山洞搜出的群众70多人，赶到北峪村张景深家的院子里。日军中队长佐佐木亲自严刑拷问，通过翻译说："谁是八路？谁是干部？兵工厂在哪儿？说出来没你们的事。如果不说，别怪皇军不客气。"

人们沉默着，谁也不作声。其实，在被捕的人当中，就有李有凡、于品丰、刘恕、刘保和等村干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拉出刘保和问："你的村干部？"刘保和说："我是教书的。"翻译转问群众："他是村干部？"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日军仍不相信，毒打刘保和，最后用刺刀挑死。

4月21日（农历三月七日），龙宝峪村26岁的共产党员李友章，也是从单阴背山被日军抓来的。日军让他带路上山找洞。他领着日军转悠，哪儿没有藏着人和物资，他往哪儿领，日军气坏了。押回村去毒打。于是他欺骗日伪军说："想起来了，我藏着手榴弹呢，给我松松绑，我好亲自去挖。"日军上了圈套，给他松了松拴在胳膊上的绳子，让他带路去挖。当他走到堂屋，见锅台上放着一把宰猪的砍刀，猛

地抄起那刀,照押着他的日军砍去。日军一晃动,只砍了半个脸。他撒腿就跑。在门口又砍伤了站岗的那个日军肩膀。吓得那个日军不敢阻拦,他直向西山跑去。跑出不到200米,遇一石坎,没容他上坎,被尾追的日军开枪打死。铮铮铁骨的李友章,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佐佐木见追问不出八路军,部下又被砍伤,气得发疯,他挥起战刀,劈死张永林、张俊臣、李左文、李友毛等9人。李庆宽的母亲被绑在树上,倒上煤油,活活烧死。日军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4名十二三岁的女孩。于常河和刘庆龙两人的妻子,怀孕临产,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挑出婴儿取乐。刘灿的妻子被轮奸后,又一刀砍死。人们对日军的兽行,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同日,日军把从单阴背山被抓来的70多名群众押在东厢房里。4月21日晚上,日翻译官对厢房里的人说:"皇军说了,你们这里是'匪区',今天还有人砍皇军,皇军非常恼火。你们这里不能再住人,让你们到玉田去种菜,有吃有喝,还发给钱,谁愿意去快出来!"在日军的诈骗下,王景同、张小四等24人(其中有4个小孩)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日军将他们绑押到张永存的白薯井前,大人用刀砍,小孩用铡刀铡。全都杀害,将尸体扔进白薯井里。

第二天(4月22日)早晨,那日军翻译又来到东厢房,对剩下的42人说:"昨天走的已到了玉田,今天你们都走!"日军将这42人串绑在一起,押着走到鲁家峪大庄刘万的房子西面白薯井旁。先砍死一个叫张小二的,将尸体扔在白薯井里。又拉出张俊金。张见事不好,撒腿就跑。刚跑出几步,被日军抓回来。日军将他按在凳子上,蒙上他的眼睛。张俊金使劲挣扎,也未能逃脱。日军要杀害他,给他掖衣领时,他一口咬住那个日军的手指。旁边的日军见状,一脚把张俊金踢下白薯井,又向井内打了两枪。打中张的背部,张当下昏厥过去。井上日军又一连砍死9人。日军走后,张苏醒过来,被赵林等人救起幸存。

日军这次扫荡,共有63人惨遭杀害。

血染馒头山

鲁家峪南山出口处,有一座不高的圆形孤山,名叫馒头山。馒头山腰也有许多火石洞。

1942年4月,日伪军围剿鲁家峪时,馒头山也遭血洗。当时冀东区武装科长王文龙、行署干部王松、丰润县政府干部轩敬宜等十多人以及义王庄、鲁家峪等村的群众二百多人,在馒头山大小火石洞隐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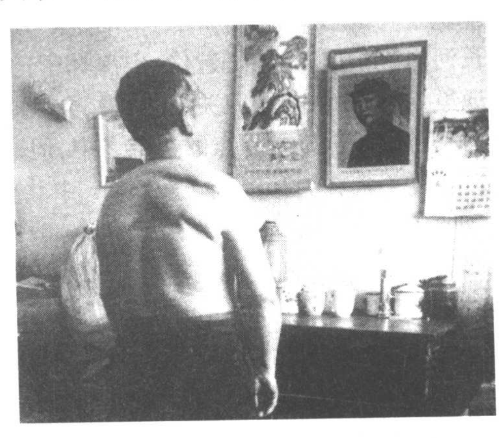
4月24日早晨,日军大队长渡边带领200余名日伪军,封锁了馒头山上的各个洞口。一个挎洋刀的日本军官在馒头山进行搜查时,踩响了报国队员埋的地雷,被炸掉半截身子。日军上山时,从义王庄抓来两位老人,一个叫梁德普,一个叫庞永

海。逼着他俩去挖堵在一个洞口的石块。两位老人怒骂日军，宁死不挖，被日军挑死在洞前。

日军不敢进洞，一面在洞前死守，一面往洞内施放毒瓦斯。毒气窒息得洞里的人们难以忍受。冀东行署秘书长林峰，冒险突围，刚出洞口，中弹牺牲。王文龙、王松、轩敬宜、李云等八九名党政干部，见突围没有希望，在洞内饮弹殉国。该日下午，日军见有一部分人从洞里出来，随着人群出来的区队长杨德山，向敌人扔出一支枪，假意投降，当敌人正高兴得失去警惕时，他用藏着的橹子打死了一名日军，顺山坡向山下滚去。不幸被酸枣棵子挡住，中弹牺牲。和杨德山一起出洞的义王庄任习仙、任彦博、张树旺等 15 人，还有鲁家峪村刘振坤和附近村的 19 人全被日军押到丘家屯北沟枪杀。坚持到日伪军走后才爬出洞来的屈平、朱文厚和王兴华的妹妹 3 人，除屈平经过治疗死里逃生，其余 2 人活了半天就停止了呼吸。



鲁家峪惨案受害幸存者
张俊金生前最后的照片



日军的子弹在张俊金背上留下的伤疤

1941 年至 1942 年，日军对鲁家峪曾先后进行了 5 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共杀害抗日军民 225 人（其中有外村避难的 34 名，军政人员 61 名）；烧毁房屋 3900 余间；损失物资难以计数。

1956 年初，中国特别军事法庭通知鲁家峪村的张俊金，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6 月 10 日（农历五月初二），他前往沈阳工人俱乐部——审判日本战犯的临时法庭作证。他用大量的事实和身上的伤疤，控诉了日军的暴行。制造鲁家峪惨案的日军侵华战犯铃木启久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

长河川惨案

付文和　张书明　杜志成

1943年10月7日至27日(农历九月初九至二十九日),日军在迁西县的长河川三角地区(当时为我迁青平抗日联合县政府所辖)进行了历时21天的残酷"扫荡",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长河川惨案"。

长河川三角地区,峰峦起伏,山深林密;人民笃厚,勤劳勇敢。在抗战时期,这片山地虽处于喜峰口、铁门关、三道关、金厂峪、罗家屯、青山口、兴城,三屯营、漖河桥等大小二十几个日伪据点的包围之中,但这里却建立了抗日的一面政权,成为冀东党政军机关常驻的基本区。1943年,中共冀热边特委(7月前称第十三地委)、行署(7月前称第十三专署)和军分区司令部,以及迁青平县委、县政府等领导机关,就驻在化名"天津"的东水峪等村;其所属的党校、教导队、报社、尖兵剧社、卫生所、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等单位,则如众星捧月,隐蔽分设在"天津"周围数十个山村和密洞里。在这儿,军民情同鱼水,军政亲如一家。冀东子弟兵打仗归来,可安然休整,养精蓄锐;抗日干部只要进村,就会受到热情招待。这里还保存了大量的抗战物资,随时准备送往前线。在众多日军的眼皮底下,冀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曾组织召开了两次隆重的大会:一是在龙湾(化名"水晶宫")召开的"五一"大会;二是在东水峪召开的"七七"大会。会上,军民联欢,载歌载舞,充分显示了抗日根据地的强大声威,极大地振奋了冀热边人民的斗争精神,这也是对日伪在冀东统治势力的英勇宣战和沉重打击。于是,日军便拟以百倍的疯狂,对长河川三角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剔抉"。

7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8个大队和特种宪兵4个大队从太行山区调来冀东,接替第二十七师团防务,9月7日,竹内安寺(少将)接替吉田峰太郎为该旅团旅团长。从9月16日起,竹内安寺便开始推行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的"冀东地区的秋、冬季肃正作战"计划。独八旅团以彻底摧毁党、政、军抗日根据地为重点,特别是"扫荡剔抉"抗日地下组织,破坏各种设施,通过抢光毁尽抗日根据地内的物资,以期达到使抗日"势力枯竭"之目的,在华北特警的协助与关东军的策应下,并纠集大批伪满军和治安军,首先对喜峰口南部的长河川地区进行了所谓的"肃正作战"。

10月6日(农历九月初八),驻迁安日军第三十大队、金厂峪日军,驻罗家屯伪治安军第二十团、伪治安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团和第十三团,滦河桥第六团,以及伪满喜峰口和董家口等地的日伪军共5000余人,夹杂大批驮夫和车辆,洪水猛兽般地从四面进逼长河川三角地带,把东水峪、西水峪、黄槐峪、三家湾、十八盘、大牛峪、总府、湾子崖、金龙口、龙湾、瓦房庄、塔子山、鹿过寨等13个行政村(含40余自然村)团团围住,妄图将冀热边党政军领导机关一网打尽,将抗日根据地彻底摧毁。对敌人的狂妄计划,冀东党政军领导早有察觉,根据地军民坚壁清野,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是日晨,南线之敌最先接近东水峪,司令部遂派出两个连阻击于绢子山头,打退强敌十数次进攻,赢得了特委、行署、军分区司令部等领导机关安全东撤的时间。傍晚,阻击断后部队撤下高地,分头转移:三区队一连北撤,迂迴前进,越铁门关出口;迁青平县支队向北转东,次日与北线之敌激战于窟窿山,击毙日军旗语兵两名,弃敌而去,绕道赶至兰城沟,与李运昌司令员等率领的各路队伍会合。至此,冀热边党政军机关干部和部队已全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随即东越长城,转至口外山地。

7日晨(初九)日军以机枪开路,摸进"天津",扑了大空;其他各路日伪军扑进村庄,亦一无所获。日军阴谋化为泡影,便恼羞成怒,向抗日根据地人民大施淫威——长河川大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杀人如狂　惨绝人寰

日军进村后,先逐家逐户地进行搜索,继而搜山。他们像篦头发一样,一沟一岔、一坡一梁都不放过。穷凶极恶,杀人如麻,其景象惨不忍睹。

在东水峪村,特委领导的堡垒户刘高氏因有病在身,落到日军手里。日军逼问抗日党干部的去处和密室地点,刘高氏一口咬定"不知道"。日军大怒,抄起院中木耙,劈头盖脑地打来。34岁的刘高氏一声惨叫,脑浆迸裂,含恨身亡。刘福满被抓住后,宁死不招八路军密洞地点,竟被日军仰面捆在板凳上,用煤油掺辣椒水活活地灌死。共产党员韩生、韩富等6人,在小生长峪山林被日军搜出后,怒目对敌,严守机密。日军气得呀呀乱叫,当场把6人挑死。韩顺合妻重孕在身,行路艰难,在手拉4岁男孩逃难时,与刘俊奎一起被抓住。日军把他们赶到二架(自然村)坡顶两棵古松树下,推进烈火堆焚烧。刘俊奎奋力逃命,韩顺合妻儿却被活活烧成焦团。

西水峪村的李香元,一家3口,藏在苇塘中被服厂存放的布疋附近。被日军搜出后,夫妇守口如瓶。日军发现布疋,遂将李香元推上高坎,以白布缠身,汽油烧头,点火烧死,妻子见状,扔下孩子,嘶叫着、咒骂着向日军撞去,被日军踢倒在地。日军见她身怀有孕,顿起杀机,以刺刀剖腹,将胎儿挑出刺杀。又往李妻身上倒上

汽油,点火烧死,坎上坎下,烈焰腾腾,浓烟弥漫,孩儿哭爹喊娘,凄厉之声催人泪下,撕裂人心。山上的乡亲们望着这般惨景,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当时在场的一名伪军动了恻隐之心,铤而走险,将李香元仅存的四岁孩子,抱上马驮走了(那孩子后来落户到喜峰口村,改姓栾,至今幸存)。

与此同时,闯进三家湾的日军也在如狼似虎地追杀群众。15 岁的腊五,奔逃时被日军枪弹穿透腹腔,肠子流出肚外。顽强的腊五捧着肠子,挣扎着跑到南山,倒地身亡。8 日晨,搜山日军抓住刘德林老汉,拷问他八路军的下落。老汉佯装不知,日军抡起枪托猛打,刘老汉怒不可遏,破口大骂,与日军扭打在一起。一大群日军蜂拥而上,许多把刺刀同时扎进刘德林老汉的胸部,那老汉翻滚着,鲜血染红了大片柴草,死后还双拳紧握,瞪眼怒视。

混屯峪高希功叔嫂,两人被日军捆在松树上,任日军毒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双双被刺刀豁死。被服厂的老阎,见日军进庄,奔跑出院,中弹身亡,血溅石墙。

龙湾村办事员刘怡,在日军进村前组织群众,把 30 名八路军伤病员平安转移,又亲自护送一区干部脱险。归途中被日军枪杀。

日军这次"扫荡"期间,每天集合日伪军训话,然后分兵清剿。大屠杀步步升级,愈演愈烈。

黄槐峪村外西塔沟门一地,横尸 26 具,均系日军一日内枪杀。

吉里峪沟里一岔,8 名八路军卫生员遇难,被日军用刺刀挑死。

小牛峪是一个仅有 11 户、38 口人的小自然村,7 日,为掩护女伤员雷明,该村群众被圈到后沟审讯,无一吐露真情,日军当场杀死 11 人,打伤 3 人。

同日午前,日军将塔子山 300 余群众圈住,以杀死 6 人相威胁,仍未能得到我方任何秘密。傍晚,日军卷土重来,大肆烧杀。又将 28 人葬身火海(为了给死难的亲人报仇,次日,该村报国队员埋设地雷于道口,炸死日军 12 名)。

8 日午前,湾子崖 11 名群众(多为妇女、儿童)被两股日军堵在吊车峪沟口,任凭威逼利诱,无一泄露抗日机密。日军气急败坏,当即用机枪扫射,将 11 名无辜群众全部杀害。一天之内,这村就有 30 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混屯峪(自然村)的党员、群众,凭借茂密山林与日军周旋多日。10 月 19 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日军改变常规,下午出动,并声东击西,把部分群众骗回村里。下午四五点钟,日军又饿虎扑食,从后山包抄,群众慌乱中蜂拥前山。突然,后山机枪吼叫,眨眼之间,前山上我 20 多名群众从陡坡上滚了下来,被日军枪杀。

同日,在高印振家炕上,5 个妇女正把回村养伤的高印怀围在炕里。不料,敌人从后窗口开枪射击,6 个人顿时被打得血肉横飞。炕头成了一片血泊。混屯峪这个只有 27 户、120 口人的村子,那天下午一个小时内就被日军屠杀 29 人。

"扫荡"期间,日军指挥部驻扎在龙湾。撤走时,日军将刘沛和刘母等 6 位老弱

妇,赶到刘贺家后院。架好机枪,逼问村里谁是八路军,谁是党员,谁是干部,刘沛等人谁也不说,日军即用机枪扫射,刘沛等7人无一幸免。随后,日军又在院内布满干柴,倒上汽油,纵火焚尸。其中刘贺妻怀有身孕,腹腔爆裂,临产的胎儿崩离母体。

据不完全统计,从10月7日至27日,日伪军"扫荡"21天,共屠杀长河川13村抗日村民245人。当时驻罗家屯伪治安军第二十团团长高首三在供词中说,"一九四三年九、十月间,协助日寇"向抗日根据地进攻时,"见到我同胞被日寇惨杀的很多……有一年轻妇女最惨,头快被劈掉了,还有小孩(趴在身上)吃奶"。

奸淫妇女　禽兽不如

"长河川惨案"之惨还在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妇女恣意蹂躏和凌辱,其情形不宜详述,受害人数更难以统计。这里仅举几例:

东水峪村一年仅16岁的少女,被一群日军按倒在厢房里,轮奸达三个小时之久,其祖母跪地求饶,惨遭毒打。日军走后,那个少女被糟踏得瘫卧不起,含恨死去。

湾子崔20多岁的李××妻,被一班日军搜出后,见日军欲行奸污,李妻破口大骂,拼命反抗。日军将其按倒轮奸,后又在她身上扎了七刺刀。

西水峪村30多岁的彭××,惨遭8个日军轮奸后,日军又将一根木棍扎入其阴道。在日军的狂笑声中,彭××惨叫翻滚,痛极死去。

该村一年仅14岁的幼女,被搜山日军从其母身边拽走,强行轮奸。声声惨叫传来,其母心如刀扎,牙齿咬破嘴唇,泪水湿透衣衫……

存头夫妇抱着孩子爬上西水峪东山梁,被日军堵截,进退不能。存头见日军欲奸污其妻,奋力与一日军扭打。日军从存妻怀中夺走婴儿,抛入悬崖,摔成肉泥。存头愤怒而起,举起一块大石头朝日军砸去,无奈日军人多,他们用大洋刀削尖一棵松树的树桩,架起存头,坐插到树桩上,然后像推磨一般,硬是把存头活活穿死。日军还不罢休,又在存头身上浇上汽油,点了"天灯"!日军在残害存头的同时,又对其妻惨加蹂躏。

西水峪的孙士英,因照顾婆母未得脱身,当一个日军上前扒她衣服时,孙士英狠狠地打了那日军两个嘴巴,随手又抄起剪刀向日军胸部刺去。那日军疼得嗷嗷直叫,遂将孙拖到院里,一刀将其头颅砍掉!

金龙口村妇救会主任张乐,为了使分散坚壁的被服厂的军衣不落到日军手里,抱着军衣藏进山林。被搜山之敌发现抓回村里,日军上前扒她的衣服,张乐愤怒反抗,与日军摔打起来。日军一人抓住她一条胳臂,跑着,嗥叫着,悠荡起她的身子,向院子里的石磨猛撞。把张乐折磨到奄奄一息,最后拉至南山枪杀。……

妇女同胞们的悲惨遭遇,说不完,道不尽。时至今日,一提起日军侵略军的残暴行径,一个个还恨得咬牙切齿。

烧房焚粮　鸡犬不留

日军在长河川21天的"扫荡"中,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不仅屠杀残害无辜群众,还烧房毁粮。当时地里多半谷物未收割。日军在放火烧房的同时,将地里大片大片的谷物点火烧毁,日军一边烧房,一边抢东西。无论是骡马牛羊,还是猪犬鸡鸭,只要被他们看见,就在劫难逃。日军所到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鸡飞犬叫,驴踢马咬。21天里,长河川村村燃烈火,处处冒黑烟,一条长达30华里的火龙,吞噬了40余个抗日堡垒村。

日军野蛮的烧杀和抢掠,使长河川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企图毁灭群众一切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把抗日军民困死、饿死。仅从西水峪一村的财产损失,便可看出日军对整个长河川的摧残。

当时,西水峪只有170多户人家,700多口人。这次"扫荡"中被日军烧毁房屋500多间;被屠宰和掠走牛200多头、驴80多头、骡马10匹、羊400多只、猪400多头、鸡600多只;损失粮食15万余斤、栗子13万余斤。当时,全村只剩了两头猪,还被日军追进深山老峪,不见踪影。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伪历时21天的大"扫荡"中,长河川13个行政村被烧毁房屋2800余间;杀掉、掠走骡马牛驴羊猪鸡11 000多头(只);烧毁和被骡马糟踏掉的粮食140余万斤;被日军吃掉、抱走栗子73万余斤;水果近百万斤。其他财产,如各村各户的缸柜被褥家什等,也被烧光毁净,其损失难以数计。

日军21天的烧杀抢掠,使长河川人民遭受了一场千古罕见的劫难。惨案过后,长河川13个村子,村里村外、街道两旁躺满了血肉模糊、扭曲变形的尸体,到处是血迹,到处是一堆堆的牛头、驴架、羊皮、鸡毛。好端端的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焦土。

血腥的大屠杀,使长河川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许多老人失去了儿女,许多家庭灭门绝户。幸存下来的人无家可归,人们颠沛流离,风餐露宿,流落山林、野地。就在这年冬天,饥饿和寒冷又夺走了数以百计人的生命!劫过难来,祸不单行。1944年春,这一带又闹瘟疫,又有大批群众丧生。东水峪刘占利一家,一天内就死了两口!该村死于瘟疫的就达60多人。龙湾村也有39人死于瘟疫。其他各村也不例外。这场瘟疫是日军制造的长河川大惨案而引起的。如若冤魂有灵,必当同声共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

小西天惨案

阎秉哲

小西天位于北京市密云西部，云蒙山东北侧的一个山洼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和冷风甸为一个行政村，化名燕山堡。

1941年冬季，日军将长城线以北广大地区，划为“无人区”，并广建“人圈”，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从此，小西天的房子被烧光，东西被抢光，许多人惨遭杀害。但是，小西天的人民至死不进“人圈”，在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为了躲避日军的“围剿”，他们藏到深山沟树林内，搭草棚、住炭窑、蹲山洞，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

由于村民董春荣当了特务，向敌人告密，敌人才得知小西天的群众躲藏进了山沟。1944年1月27日早晨，天刚刚发亮，后山铺的伪警察和棍团100多人，在伪警察所长牛长（牛犊子）的带领下，由特务董春荣、刘九贵引路，从后山铺出发，踏着积雪悄悄钻进小西天西面的七道沟。这条沟，悬崖峭壁，树木丛杂，很少有人进入。小西天的群众认为这条沟很难出入，敌人不会从这里上来，所以麻痹大意未设岗哨监视，而敌人却攀藤而上，突然到达了小西天南边的南天门。躲藏在南天门的王庆德、王庆海、王庆田、王庆堂和王庆顺等户来不及转移，便全部被敌人逮捕。接着敌人又到达小西天下沟，躲藏在这里的群众也未及转移，因此孙桂荣等男女老少被抓。三道沟的张连顺到小西天走亲戚、冷风甸的郭振友和郭振兴家的长工贾三到小西天挖土豆也同时被捕。敌人在小西天整整折腾了大半天，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兵分两路，返回后山铺。一路走原路，另一路走旱道峪沟，途经旱道峪沟的敌人又在青峰山抓捕了从“人圈”里逃出来藏到这里的李生一家5口。

回到后山铺以后，敌人将男人关进了炮楼下面的地下室里，妇女和孩子关进了靠近炮楼的一栋房子内。两天两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被捕那天夜晚，除小孩之外，敌人对被捕群众一个个地进行审问，审问中又打又骂。特别是男人，敌人把他们吊起来拷打。然而，经过战争锻炼的小西天群众，在敌人的法西斯暴行面前，宁死不屈，抗日斗争情况只字未露。王庆田是燕山堡村自卫军分队长，共产党员，经过他的手存放了不知多少粮食，尽管他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咬紧牙关，誓死不吐露情况，使敌人一无所得。曾经带领游击队攻打过后山铺据点的李洪满、李洪

祖兄弟俩,在审问中也坚决不讲八路军半点情况,当即被押送到琉璃庙杀害。小西天群众被抓去后,百姓叫伪甲长李洪春出面保释,但李洪春已暗中参加了敌人的特务组织,他不但不出保,反而讨好伪警察,强迫年轻妇女李素华、邓芝兰等与伪警察结婚。这些妇女在敌人的淫威下只得假意应允,以后才借机逃出了虎口。

第三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大雾弥漫笼罩大地,后山铺的伪警察一个个手持上着刺刀的大枪,分成两路,押着小西天被捕群众向村外走去,男的用绳子捆绑着,妇女和孩子跟在后边,进入后山铺东南的一里多路的偏僻山沟。这时,小西天被捕群众一看被押到这里,心想他们就要被枪杀,便一家一户的互相靠拢在一起,"要死,全家也死在一块儿"。然而,凶恶的敌人,用刺刀拨,用枪托砸,强迫男女老少分开。孙桂荣的老伴觉得不妙,紧紧地抱住了两个女儿,用被子蒙上头。就在这时,架在南面山包上的机枪,哒!哒!哒!一阵扫射,闪电般的子弹射向了人群,小西天被捕群众纷纷倒卧在血泊之中。王庆海的老伴和两个儿子、王庆田夫妇、王庆道的儿子王瑞华、王庆堂的妻子、李生一家 4 口等全部被杀害。王庆海不满周岁的儿子,中弹未死,哇哇哭着,爬在妈妈的尸体上,被凶恶的敌人一刺刀挑开肚子,扔进坑里带着气埋了。李洪满的童养媳在逃跑的路上,踩响了敌人埋设的地雷也被炸死。这场屠杀前后死了 28 人,所以,小西天惨案又称为"二八惨案"。在枪杀中,有些伪警察目睹了敌人的残暴,特别是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残杀,非常不满。在执行命令过程中不那么坚决,因此,有些未被捆绑的妇女、儿童得以乘机逃进了山沟密林,才幸免于难,计有李洪兰及女儿王桂云、王桂芬,任宗兰和儿子李福华、王金华及女儿王桂春,孙桂荣的大女儿孙淑云,以及邓芝兰等。另外,还有王荣华、孙秀珍、李振江 3 个孩子,由于年幼体小,在大人的尸体掩护下,未被打死,事后被人们抱走抚养,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家里人找回。

(选自中共密云县委宣传部编:《潮白风云》)

白马川惨案

张春生　何连仲

白马川在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北 120 多华里处。白马川伪警察分驻所有个警长叫刘贵才,他倚仗日本主子的势力,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大家说:"不怕枪刀火烧,就怕刘贵才走一遭。"

1940年8月中旬，八路军游击队队长沈荣久，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带领战士在鞍子岭将刘贵才捕获，同时被抓捕的还有8个伪警察。所俘伪警察经教育释放，只把刘贵才押至迷子地的十八盘就地处决。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白马川伪警察分驻所日警申春、滕田听到这个消息后，即从兴隆县警察署调来大批伪警，配合日军包围了白马川。他们用刺刀把群众驱赶到伪分驻所门前的广场上，四周架起铁丝网。一个青灰脸矮胖墩儿日军站在高桌上嚎叫了一阵，翻译说："皇军说了，要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要不，把你们的脑袋都切下来。"场上鸦雀无声。这个日本人恼羞成怒，一招手叫过来两个伪警察，从会场上把王立福、张奎林、张凤、贾成兰、孙贺禹、李永玉和一个被刘贵才凌辱过的妇女捆了起来。一个日本人一把夺过伪警察手中的一把刚刚烧红的烙铁，照着王立福的头上就是一下，"吱啦"一声，一股白烟升起，王立福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又是一烙铁，王立福头上出现两道深沟，昏迷过去。一桶凉水浇过后，王立福睁开双眼，立即又被架起来。日本人又接过烧红的铁筷子，在王立福头上"吱啦吱啦"的烙着。张奎林、张凤、贾成兰、孙贺禹、李永玉也都被打翻在地，往嘴和鼻子里灌煤油、凉水。7个人受尽严刑拷打后，一个个被拉到东边大坑旁处死。

数日后，这伙日军和伪警察，又把三四百名群众圈到广场上，命令他们列队站好。伪警长赵玉璞，手拿一根藤条，藤条头上结了个大疙瘩，一排一排地打。群众管得清躲避不及，脑袋被打了一个窟窿，躺倒在地；一个姓张的群众的头，也被打得鲜血直流。群众怒目而视。广场前边停放着棺材，刘贵才的妻子披麻戴孝，哭哭咧咧，硬要群众一个个来给刘贵才磕头烧纸，而且还要念叨："×××给爸爸烧纸来了。"群众杨永德怒火万丈，第一个大步向前，大声念道："花钱了，花钱了，爸爸给你烧纸来了。"日军将他当场砍倒。第二个姓万的群众，死也不肯向前，也被日军砍了一洋刀。群众缪从善、葛成春被抓上来，他们立而不跪，昂首挺胸，怒目而视。两个日军嗷嗷怪叫，端着刺刀上来，又把他俩当场挑死。这时，狠心的日本人双鸟，立即拔出战刀，对准葛成春的胸膛就是一刀，刀落膛开，不多时摘出了他的心脏，挑在战刀上，然后，架起锅灶煮熟，被双鸟、来国两个强盗吞掉。

尽管敌人如此凶残，可是，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有的投奔八路军游击队，有的积极为游击队递送情报。1940年底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游击队奇袭白马川伪警察分驻所，激烈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夜。游击队冲过两道铁丝网，由于寡不敌众，不得不暂时撤出战斗。伪警察分驻所虽没拿下，但却把警长赵玉璞的脖子打了一个透眼，留下了"纪念"。后来，游击队在田家庄附近设下伏击圈，打死了日伪军40多人，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

大屯惨案

李炳山　杜清怀

抗战时期,大屯村原属迁青平第五区。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对这一地区的武力镇压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日益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开始进入这一地区,群众抗日活动非常活跃。

1941年正月初三,在大屯人民的配合下,激击队长周治国率领游击队一举拿掉了三道关据点,击毙日伪官兵4人,生俘30多人,缴获三八枪20支、手枪2支、机枪1挺,子弹2000多发。

三道关警察分驻所被八路军游击队拔掉的消息传到青龙县警务科长日本人铃木耳朵里时,他立时气了个半死。随即,铃木打电话通知喜峰口国境警察署,把日本人署长松岛臭骂了一顿,并命令他立即带队出发"扫荡"。松岛遂派便衣特务彭守玉、沈恩福、李国顺等4人到大屯去刺探情况。

1941年旧历正月十五日,沈恩福、彭守玉、李国顺等4名特务身穿长袍大褂,头戴毡帽,化装成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悄悄地窜入了大屯。沈恩福等人在庄头碰上一个叫田贵的拾粪老头,就问他:"周治国来过没有?"田贵说:"没有!"随后他们就进了村,在庄里遇到一个小孩儿,沈恩福就说:"你们庄来八路军了吗?"小孩害怕,回答说:"来八路军吃饭着。"后又遇到牌长刘文山,刘又领着他们到刘廷付(中共地下党员)家。特务假惺惺地向刘廷付说:"我们是周治国队的,丢到这里两袋子子弹。"刘廷付说:"周治国根本就没到这里来。"特务就说刘廷付不说实话,将刘廷付毒打一顿,又把刘廷付带到地主才海峰家。用井绳绑到才家的梯子上,严刑拷打,灌凉水、煤油,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有人把宽甸子警察分驻所的警士田广树(当时有病,请病假在家休养)找来。田广树认识这几个特务,于是就上前为刘廷付求情,在场的几个牌长也都纷纷上前为刘廷付求情说好话。彭守玉、沈恩福等特务见身份暴露,也就顺坎儿下驴,住了手。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免得全村人受连累,几个牌长把沈恩福、彭守玉等4名特务请到才海峰的屋里,上炕点上大烟灯,抽大烟(鸦片)。几个特务抽足大烟,又被请到伪甲长地主才国田家吃了个酒足饭饱。

下午,4名特务呆够了,临走时,为了让几个特务给说好活,答应给他们150元

伪币（田广树和几个甲牌长早已识破了他们一是刺探军情，二是勒索民财的来意），但是因手里没有现成钱，当时交不出，经商定正月十六日下午给他们把钱送到喜峰口警察署，交到他们手里。就这样，临走时还把副甲长翁桂臣（贫苦农民）带走做人质，去向他们的主子日寇铃木交账去了。

然而，这4名特务回到董家口警察分驻所，除了把副甲长翁桂臣交给铃木外，还向铃木汇报说："大屯有八路，问小孩子说有，问大人说没有，大屯无论男女老幼都通八路，给八路办事，家家户户都管八路饭。"铃木听完汇报后，就把翁桂臣带回青龙去了。

正月十六，铃木来到了董家口鬼子据点，随即给喜峰口伪满警察署署长松岛打电话，让他带人迅速赶到了董家口。紧接着，伪青龙县警务科送来两汽车日本宪兵和警察。铃木又从喜峰口据点调来伪满洲国军一个连、警察20多人，还有不少日本宪兵。同时，孤山子、大地、牛心山、董家口以及姜大祥讨伐队等300多日伪军纷纷赶来董家口集结。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就要开始了，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屯。

朴实善良的大屯人民哪能想象到敌人就要向他们开刀啊！天黑以后，家家户户关门闭户，人们陆续进入梦乡，全村一片宁静。这时候，田成福家却还亮着灯，原来是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张永宝、张万明等同大屯党支部成员田成福、吴景荣、田保林、李金才等人正在开会，研究工作，部署任务，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也就在这个时候，铃木却在指挥集结在董家口据点里的300多名日伪军从四面八方鬼鬼祟祟地向大屯逼进，大屯被敌人包围了。敌人指挥所就设在大屯庄前长河南岸的山头下边，警务科长铃木亲自坐镇指挥，两门小炮就架在指挥所旁边的山头上，炮口对准了大屯。夜间11点多钟，3声炮响，顿时枪声四起，响成一片，机枪、步枪一齐向大屯开火，村子里立刻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夜风卷着大火，火乘风势，从东西两头向村中扑来，村里顷刻大乱。人们的哭喊声、牲畜的嘶叫声、房倒屋塌声混在一起，响成一片，乱作一团。

敌人进村以后，荷枪实弹，挨家逐户地搜查屠杀手无寸铁的人们，碰到没有着火的房屋倒上汽油就点，遇人就杀，大屯成了一片火海，成了一片血腥的世界。

富有革命传统的大屯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愤怒的人们随手抓起一件什么东西，扑向敌人，同敌人展开厮杀格斗。他们有的抄起菜刀、举起斧头、拿起镐把、抓起铁锹……

几个穷凶极恶的鬼子端着刺刀闯进了田庆兴的院子里，17岁的田三友面对敌人明晃晃的刺刀，怒火中烧，立刻抄起一把镐头冲出屋外，并对全家人说："咱们豁出去了，跟狗日的拼！"于是，全家老小跟敌人厮打成一团，有的咬住敌人的手指，有的掐住敌人的脖子，有的抱住敌人的双腿。但是，终因寡不敌众全家9口人全部壮烈牺牲。

陈永海一家15口人，被敌人杀害了8口，面对杀人的魔鬼，陈永海仇恨满腔直奔鬼子扑去，和敌人扭打在一起。不料，从后面上来一个鬼子，举起刺刀从陈永海的后背猛刺下去，陈永海昏倒在血泊里。至今他的身上还留下两块仇恨的伤疤。

当敌人的血腥屠杀开始后，刘凤兰的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刘凤兰冲出村子跑到长河岸边，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含恨死去。刘凤兰被甩出去很远。第二天早晨，当乡亲们发现她时，她那幼小的身躯把那长河的冰雪融化了一个大窟窿。见她还有一口气，乡亲们就把她抱回家，放在炕头儿上，蒙上被子，小凤兰慢慢苏醒得救了，成为大屯的一名幸存者。这笔血海深仇，刘凤兰至今还牢记心头。

13岁的侯永会被敌人从背后一刀刺中，趴在地上，他父亲一见急得直喊，他父亲叫一声，鬼子就刺一刀，一连捅了7刀，直到侯永会叫不出声来。随后，鬼子又回身一刺刀刺中他父亲的咽喉，他父亲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敌人扬长而去。然而，身负重伤的侯永会却幸存下来，至今背上仍留有7处伤痕。

刘凤鸣家被敌人屠杀了4口人，刘凤鸣的叔叔刘老窝（乳名）同他哥哥冲出村庄，来到长河套里，被一颗子弹击中，刘老窝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并说：“狗日的，打吧！不痛，枪子冰凉的！”又一颗子弹射来，夺去了他那年轻的生命。哥哥扑过去要背弟弟一起跑，见弟弟已经停止了呼吸，才不得不擦一把眼泪，离开弟弟逃出了虎口。

当敌人来到陈阳家时，陈阳家的几间瓦房尚未烧着，敌人爬上房，倒上汽油正准备点火，陈阳几步扑过去，拽住敌人的双腿，从房上拽下来，扭打在一起。

当敌人进村后，住在村东头的秦永厚一家7口人，来不及跑就躲进了地窖里，敌人发现后，把柴禾点着扔进地窖，全家人都被活活烧死了。

王贵的妻子身怀有孕，被敌人抓住后挑腹惨死。七八个月的胎儿从娘肚子里被挑出来后还“哇哇”哭叫呢，也被敌人残杀了。

在宽甸子警察分驻所当伪警察的田广树，当时因病正在家休养。鬼子闯进他家，田广树的妻子对敌人说：“我们家的也在外边干那个（即当警察）呢。”话没说完就被鬼子一刺刀捅死了。他父亲见敌人进来了，就急忙跑出屋，上了当院的棚子，打算跳出去逃命，也被敌人开枪打死，滚落到猪圈里。田广树什么也顾不得了，急急忙忙从屋里往外跑，刚一出门，敌人又“叭”的一枪打在他左脚根下，他扭身回屋，跑到后院，翻过后院墙跑了出去。从此，田广树再也不去给日本鬼子卖命了。

万恶的日本强盗来到地主才海峰家，首先杀死了长工、伙计、奶妈子，仍不罢休，还是见人就捅，遇人就杀，一连杀死了才海峰家18口人，仅有1人侥幸未死。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张永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沉着地组织大屯群众突围。不屈不挠的大屯人民举起扁担、铁锹、棍棒……勇敢地向敌人冲杀。不幸，张永宝中弹牺牲。为了大屯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跟上来。大屯党支部成员吴景荣、田

成福等立即挺身而出，继续带领群众向敌人冲去。终于，从村西北角冲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冲出村外的人们，眼睁睁望着村里的滚滚浓烟，房倒屋塌。杀人成性的刽子手还在继续残杀无辜的亲人，耳听着亲人们一阵阵惨叫声、牲畜的哀鸣声，拳头攥得嘎巴嘎巴直响。

300 多名敌人在大屯杀人、放火、烧房、抢掠，整整折腾了 5 个小时，于次日黎明 4 点多钟滚蛋了。

敌人走了，天渐渐亮了，跑出去的群众陆陆续续地赶回来了，庄里，除了伪甲长地主才国田一户的房屋完好无损（敌人进村后派人在才国田院子四周站岗保护）外，其余房屋几乎全部被敌人焚烧殆尽。残墙断壁到处都是，庄里庄外尸横遍地。其惨状目不忍睹，令人发指。

这次惨案，田庆兴、田庆堂、孙振东等 14 户、50 多口人全部被烧死杀绝。侯永清、王春、刘万成等 19 户被烧杀死得每户只剩了 1 口人；刘凤兰一家老小 11 口，只剩下了爷爷、二叔、二婶、哥哥和她 5 口，父亲、母亲、奶奶、四叔等 6 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刘廷付一家 12 口人被敌人杀害了 6 口；田庆发一家 4 口人被敌人杀死 3 口，仅有 1 人幸免；刘振久全家 10 口被敌人用刺刀挑死 5 口。仅这 4 户 37 口人，就被敌人残杀了 20 口，占半数以上。

大屯，这个仅有 140 户、460 口人的村庄里，仅这一次日寇血腥屠杀，就死了 187 口人。其中，大屯 173 人，来大屯串亲访友留宿的、路过大屯而借宿的 9 人；地下工作者 2 人；地下党员 5 人。这些遇难的亲人，有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有即将临产的孕妇和即将问世的胎儿。年迈的老人丧失了惟一的儿子，没过满月的婴儿失去了妈妈。多少人无家可归，多少人无依无靠！

满村尸骨满村恨，满街血水满街仇。幸存下来的大屯人民，目睹着化为灰烬、冒着浓烟、满目凄凉的村庄，整理着一具具亲人残缺不全的尸体，在附近各村群众帮助下，含着悲愤的泪水，怀着与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掩埋了亲人的尸骨。

这次惨案给劫后余生的大屯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烧毁房屋 535 间，其中瓦房 75 间、草房 460 间；烧死毛驴 10 头、猪 120 口、羊 350 只；损失粮食 30 万斤，猪肉 1500 多斤；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全都没有了。这是日寇推行“三光”政策的铁证。这次惨案致使大屯人民在以后的 10 余年中，也一直未能恢复原状。

（选自《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暖河塘惨案

李炳山　杜清怀

暖河塘是河北省宽城县西部一个小村，抗日战争初期仅有 17 户人家、90 多口人。它坐落在滦河岸边，前有滦河，后靠大山，原属迁青平联合县七区，现属承德宽城县独石沟乡。

1933 年日军占领宽城之后，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就经常在长城沿线一带活动，寻机打击日伪军。这就是何子桥独立大队。这支队伍约有 200 多人，队长是何子桥。

1941 年 4 月 26 日（农历四月初六），何子桥部队接到情报，说是驻扎在兴隆县柳河川的日军约有 80 多人，押送 5 只货船，走滦河途经暖河塘，到迁西县的撒河桥（地名）去。部队决定在暖河塘上游 3 里地处的贾家安村截歼这股敌人。

当天晚上，部队到达伏击地点。第二天天一亮，部队就动员暖河塘村及附近的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民兵们主动要求留下协助部队作战。部队沿贾永安村北的山梁布置了三四华里长的埋伏线，做好了战斗准备。

时近中午，敌船果真从滦河上游开来了，待敌船全部进入伏击圈，机枪、步枪一齐开了火。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埋伏打懵了，乱作一团，纷纷跳人水中。一阵慌乱之后，日军重新整顿好队伍，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向八路军阵地反扑。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八路军未能阻止住敌人的进攻，为避免伤亡过重，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

日军遭到八路军阻击后，恼羞成怒，便疯狂扑向暖河塘村，抓住了协助部队作战没来得及转移的胥景印、胥景堂、胥景孝、胥景文、胥景贵、胥景存、胥景全、胥俊起、胥俊海、胥殿安、胥殿中、胥殿赢、胥殿有、胥殿付、张振太、李永朝 16 名群众，把他们带到庄里一个空场上。日军强迫他们排成两行，又逼着胥俊海从河里挑来凉水，放在人群旁边，四周架起了机枪，有荷枪实弹的日军包围着。一切准备好后，上来两个日军，首先把胥景孝拉出来，吼叫道：“八路哪里去了？说！”胥景孝瞪了他一眼，扭过头去说：“不知道！”一个日军端着枪，朝他的后背猛刺过来。当时，胥景孝只有 30 多岁，身强力壮，他强忍着剧痛，转身抓住了日军的刺刀，同日军夺起枪来，双手被拉得鲜血淋淋。几个日军一起上来，连捅几刺刀，胥景孝呻吟着倒在了

地上。

胥景孝被杀害后，日军继续追问八路军去向。人们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死，怒火满腔，以沉默回答敌人。一阵沉默之后，又齐声喊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日军恼羞成怒，端着沾过凉水的刺刀，饿狼般地扑向人群。霎时，前排的七八名群众，随着一声声惨叫，一个个倒在血泊里。紧接着一阵枪响，后排的群众也倒下了。日军惟恐群众不死，又在倒在地上的人堆里一阵乱刺。然后，把附近的一堆柴禾搬来，堆放在人堆上放火焚尸。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当时，胥俊海、胥殿有、胥殿付、李永朝 4 人并没有死，只是身负重伤，倒在死人堆里。他们忍受着伤痛，一声不响，打算等敌人走后再爬出来。但是，敌人放火焚尸后，被烈火灼烤得难以忍受。他们瞅见靠河一边没有日军，浓烟向东边刮去，东边的日军也都躲开了。于是，他们从火堆里爬出来，胥俊海、胥殿有顺着烟雾向东边跑去，胥殿付、李永朝二人朝河边跑去。由于浓重的烟雾掩护，等到日军发现，他们已经跑出很远了，日军朝他们一阵猛烈的扫射，但并未打中。胥俊海和李永朝跳入水中，拼命游到对岸，脱离险境。

日军在屠杀群众之后，又对全村的禽畜进行捕捉残害。一时间，鸡飞猪叫，牛羊东奔西逃。临走前，又把全村的房子点着。鬼子一直闹腾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拖上几具死尸，带着伤兵爬到船上，奔漖河桥方向而去。

次日天明，转移出去的群众陆续返回了村庄。庄里房屋大部分被烧毁，到处是残垣断壁、牲畜尸体。被烧毁的衣服、被褥的碎片处处可见；烧焦的粮食这里一堆，那里一摊；锅碗缸盆全被砸毁；禽畜、什物烧焦后发出的煳腥味儿，更使人难以忍受。在空场上，被鬼子杀死的群众尸体横躺竖卧，焦煳难辨，其状惨不忍睹。失去亲人的老人、妇女、孩子，扑倒在还冒着黑烟的尸堆里放声大哭，拼命地往外扒着尸体，辨认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哭干了眼泪。贾家安的群众闻讯赶来，帮忙把尸体抬出去掩埋了。抗日政府的七区区长程书堂也赶来慰问遇难群众的家属，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并表示：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仇一定要报！

跑出去的胥俊海等 4 名群众，虽然逃出了虎口，但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除胥殿付幸存下来之外，其他 3 人在三五天内也都相继死去了。

这样，一个仅有 17 户人家、90 多口人的小村庄，日军在这次血腥屠杀中，乡亲们就失去了 15 位亲人，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寡妇庄"。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

艾峪口惨案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办公室

河北省宽城县的艾峪口，地处长城脚下，与关内董家口一水之隔，是共产党抗日人员出入关内关外、展开抗日工作的必经之地。

1941 年 6 月，日伪在这里制造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惨案。

“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政府区干部赵祝华、赵明月、诸成万、陈国昌等的亲自组织下，艾峪口村的党小组、报国会、武委会等抗日组织相继建立，群众的抗日活动很活跃。所以，敌人对这一地区倍加注视。

艾峪口村恶霸乡绅刘茂林，人称“刘四疯子”。他依仗其子在日伪青龙警务科干事儿的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尤其让人切齿的是他充当了青龙、董家口、喜峰口一带的密探，经常搜集抗日活动情报，人们对他恨之入骨。

1941 年 1 月 29 日（农历正月初三）夜，“刘四疯子”终于被我攻打三道关敌据点的抗日部队捉住镇压，其子刘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一天，报国会成员开会，研究破坏敌人的交通和支援前线等问题，被地痞叶德顺看见，于是他就鬼鬼祟祟地到处传播。

刘爽探知此情后，立即将叶德顺叫到家中，酒宴招待，问个究竟。这个有奶便是娘的哈巴狗，将所知情况向刘爽报告了一番，刘爽如获至宝，立即报告了青龙宪兵队。

一场灾难降临了。

1941 年 5 月 25 日（农历六月初一）的深夜，满载 5 辆汽车约 150 余名荷枪实弹的日伪军，包围了艾峪口、河西、东沟等 5 个自然村，会同艾峪口的敌人，如狼似虎地闯入各户，抓捕了诸成平、诸清林、刘成海、沈福棠、赵振明、赵振生、赵振香、赵振方、刘桐、刘永昌、关长青、刘明、刘广、吴增海、周玉泽、诸贺林、赵连举、吴庆林等 18 人，当夜被五花大绑，关在艾峪口日本宪兵班。拂晓，押往青龙日本宪兵队。

3 天后，日本高级法官佐藤正一、青龙警务科警防股长松崎、宪兵队小头目于家等，对被抓捕人员进行刑讯。刑讯室周围架起了 4 挺机枪，室内皮鞭、木棒、烙铁、绞索、竹签摆布遍地。20 多个刮亮头皮的日军刽子手，动用了压杠子、灌煤油、灌凉水、猪鬃通小便、烙铁烙小腹、十指钉竹签等酷刑，将刘桐、刘明、赵振明、刘广、

周玉泽、诸成平等折磨得死去活来。

用刑过后，松崎、于冢和汉奸苏警佐等开始审讯。

敌人问刘明："你愿意当良民吗？"

刘明回答："你们的良民和我要做的良民是两码事，你们的良民是汉奸、走狗，我绝不会做你们的良民。"刘明坚强有力的答话，气得敌人站起来咆哮："给我住嘴，你要知道，你是和大皇军为敌，破坏东亚共荣的'国事犯'，不好好招供，死了死了的有。"刘明圆睁怒目，昂起满是血污的头说："既被你们抓来，我也没想活着出去，什么大皇军、小皇军的，你们只是一群杀人的强盗，你们的'东亚共荣'就是抢夺、放火、杀人，见你妈的鬼去吧！"

敌人强忍怒气，哑口无言。这时，汉奸苏警佐看着狼狈不堪的松崎、于冢的脸，赶忙为其主子解围，歇斯底里地狂叫："把这个'通匪'分子给我押下去！"

刘明昂首凛然走出了刑讯室。

狡猾的佐藤正一，一言未发，在一旁眨着两只猩红的眼睛，无可奈何。

然后，又把赵振明押上堂来。

于冢问："你都干了哪些对不起皇军的事？"

赵振明说："我要问你们干了哪些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

于冢又问："打三道关据点，你知道都是什么人干的？"

赵振明说："都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干的。老实说打三道关，是我给八路军探的路，是我放的跳板。"

于冢气得狂叫："上大刑，压杠子！"赵振明的双腿被压断了，食物从口中涌出，昏死了过去。喷过凉水后，赵振明大骂："我日你那个祖奶奶，你们的日子长不了啦，中国人民早晚会收拾你们的……"接着，又昏死过去。

在3天的刑讯中，被捕的18名群众，个个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一把烧红的烙铁烙在刘明小腹的一刹那，他猛劲一蹬，将烙铁蹬到一个日本鬼子的脸上，"吱"的一声，冒出了难闻的气味，敌人嚎叫了一声，四脚朝天躺倒在炭火盆上。刘明放声大笑，敌人惊恐万状。

敌人在压杠子、烙小腹之后，刘明的十指被钉上了竹签。这位铮铮的铁汉，被敌人的酷刑折磨后死在刑讯室内。

敌人软硬兼施，没达到目的，便在残害了刘明之后，将其余人全部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

敌人黔驴技穷，原形毕露。在7月24日（农历闰六月初一）下午4时，由青龙警务科、日本宪兵队，满载着8辆汽车日军和警察，再次开到艾峪口西地警察分驻所。稍停了一会儿之后，很快向董家口开去，佯称到关里"扫荡"，以麻痹善良的人民。哪知，深夜10点，敌人突然把艾峪口、西地、东沟几个村庄团团围住，挨户搜查，再次进行了疯狂的大逮捕。

这次被抓走的有刘振祥、刘贺祥、沈福和、沈福万、张立、刘永录、刘恩、赵成友、刘宽、吴永栋、周俊、秦桂等40余人。

艾峪口5个自然村，18岁至45岁的男人，除极个别在外的侥幸脱身以外，其余无一幸免。

在被抓捕的人群即将被押往青龙警务科之际，艾峪口村的众乡亲，顶着凄风苦雨，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向着敌人涌去。这时，敌人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鸣哇怪叫：“八路匪的闪开，不闪开死了死了的。”人们无一恐惧，也无一人哀求，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不管敌人怎样把枪栓拉得山响，人流仍继续前进着、包围着。不多时，把敌人团团围住。敌人看到如此众多人群，再次嚎叫：“不闪开死了死了的！”愤怒的人群中毅然发出“我们都是八路军，向我们开枪吧！”的喊声。车上被押人员也高喊：“乡亲们，东洋鬼子长不了啦，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面对不畏强暴的人们，敌人慌了手脚，伺机仓皇逃脱。

7月25日(闰六月初三)上午，敌人开始审讯。审讯室布置得阴森恐怖，杀气腾腾。刑讯开始后，刘贺祥、刘广、诸清林、沈福堂、吴永栋、周俊等脚带镣铐被拖出大狱。佐藤正一、于冢、苏警佐等出庭审讯。

于冢问：“你们谁是共产党，谁是报国会主任？”于冢又指着吴永栋说：“你愿意当良民吗？你说谁是共产党，谁是报国会主任？说了让你妻子儿女团聚，中国人不是很孝顺父母的吗？”

刘贺祥回答：“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报国会主任。”

吴永栋气得眼睛圆睁，咧愣了两眼说：“我日你个祖奶奶，你还知道有父母，我看你正是一个缺爹少娘的野种。”

这时，苏警佐一看吴永栋这样粗野的大骂其日本主子，大声喊道：“胆大的穷光蛋、土八路，竟敢辱骂皇军，拉出去枪毙！”这时，刑讯室内外的30多名群众，个个怒不可遏，齐声怒斥：“你这个汉奸、走狗，中国人的败类，要杀就杀吧，中国人民早晚会算总账的！”

众人骂不绝口，整个警务科、刑讯室，人声怒吼，吓得日寇目瞪口呆，苏警佐也被骂得面红耳赤。他像恶狼一样咆哮着：“把这些八路匪统统枪毙！”

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汉奸狗特务！”的愤怒呼喊声中，杀人的枪声响了，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刘贺祥、周俊等3人的生命。

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几只狼狗的配合下，把这些所谓“国事犯”拖进监狱。7月30日(农历闰六月初七)，他们就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押至承德、沈阳、丹东、抚顺等地。

不到一个月时间，艾峪口先后共被抓去58人，除放回5人外，其余53人都被杀害在承德、沈阳、丹东等地。

在两次逮捕和屠杀中，刘桐、刘明、赵振方、赵振明、秦贵、张立、刘万、刘海全、

赵连举等9户人家,就死了60余口。

诸成宽、吴永栋、刘贺祥、刘广林等20余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全村先后惨死在敌人屠刀下210多人。

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在宽城艾峪口制造的大逮捕、大屠杀惨案。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

火斗山惨案

卢　福　张思卿[①]

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后,为巩固其在中国的长期统治,对八路军和爱国人民,施行了疯狂的搜捕和围剿,尤其对热河省滦平县的所谓"边防",进行了大肆逮捕和残酷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1年3月,八路军积极进行抗日活动,袭击了热河省滦平县火斗山日寇车站,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焚烧了车站,打死了日本鬼子,缴获了日寇武器和物资。当八路军袭击车站时,附近各村群众热烈予以支援。事后,大家给八路军送粮、送鞋、送袜,为争取早日摆脱日寇的铁蹄蹂躏和黑暗统治,不惜一切地进行了斗争。

同年4月,日寇锦州铁路警护本队长佐古龙裕遂下令古北口铁路警护队,进行严密侦查。数月后,发现火斗山车站附近各村有抗日工作人员和爱国群众的活动。于是,于同年旧历七月初一日拂晓,有日寇古北口、火斗山铁路警护队及宪兵队等30多人,分赴南石门、张家沟、上三岔口、下三岔口、火斗山、三道沟、巴克什营、四道梁子、大苇子峪等村,以"国事犯"为罪名,将抗日工作人员郑廷兰、傅振国及抗日爱国群众杨海、李朝俊、司文轩、呼振亭等40余人逮捕后,由火斗山站送往古北口警护队关押。当日进行审问,利用逼供、引供、诱供等方法,若不供认即施以惨无人道的暴刑,所用刑罚有过电、灌凉水、跪铁丝网子、装麻袋里摔、竹片毒打等。是凡被捕者,都难逃此种种酷刑。如杨海控诉说:"日本鬼子过我堂时,我一说不知道,就将我装在麻袋里往水泥地上摔,硬摔折我3条肋骨,当即昏死。后转去警护队过我堂,刑罚更毒辣。灌凉水,肚子被灌鼓起来,刽子手们一踩肚子,水就从嘴里、肛门、小便往外流。还给我上电刑,我马上又昏死过去了,就这样昏死过7次之

---

① 卢福、张思卿是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人员。

多。"又如王永库控诉说:"我共过了 11 次堂,让我跪在铁丝网子上,严刑拷打。灌凉水怕灌不进去,给嘴里含块木头,灌满肚子,又给压出来。还用电刑,电死过去,又用凉水给喷醒过来。将我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被害人蔡仲控诉说:"日本鬼子队长大道西武和汉奸翻译徐建修过我堂时,用竹片恶狠狠地打,将身体打得变成了黑色。"高印等人控诉说:"用木棍戳肋条骨,把我们疼昏迷了,他们就写下假口供,又用凉水喷醒过来问,是你招的吧?说个不是,又有毒刑。有的人竟这样昏死过 5 次之多。"日寇就是这样酷刑逼问 40 多个被捕者,历经 10 余天,送往承德检察厅 13 名,其中判死刑 1 人、无期徒刑 4 人(送锦州监狱后死去 3 人)、20 年徒刑 1 人(仅查明的),其余不详。

另外,释放 30 余名中,因受暴刑成疾,回家不久死去 3 人,成残废不能干活者 2 人,严重影响健康者多人。

(选自《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快活峪惨案

吴殿信

1938 年 6 月,八路军宋邓纵队为策应冀东大暴动,挺进冀东以后,革命火种也撒到快活峪沟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曾到这里,向群众宣传抗日、建立交通站、组建了基层组织。1941 年五六月份,八路军挺进十团三营营长翟飞、副营长师军、教导员王波带领第七、第八连 500 多人,夜袭巴克什营伪警察署,往返都在快活峪集结,在那里开动员会和庆功会。同年 8 月 13 日,挺进军十团又在距快活峪不远的一撮毛山上,把驻西驼古日军铃木部队朱狩中队 70 来人围歼。10 月底,日本关东军独立大队、日军华北派遣军柿木大队纠集万人兵力,对丰滦密长城沿线抗日根据地进行持续 78 天的大"扫荡",实行所谓《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要纲》,把滦平列入"肃正"的重点,并在古北口设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因快活峪一带经常有八路军活动,敌人认为是延安的触角伸向伪满洲国,便规定在快活峪首先实施"肃正要纲"。在这里,"无住禁作"与"集家并村"同时实行,并提出先搬迁,后修"圈"。营盘乡只在营盘修一个"部落",让全乡许多村的群众在那里集中。快活峪距离营盘 25 里,村民们不愿弃家舍业住进"人圈",便投奔古北口、河西和田庄的亲戚家去住,有的就在碰棚岩洞、山洞里住。敌人明令公布:快活峪不准再有人家,不准种庄

稼、不准打柴、不准放牧，凡敢有出入"无住禁作"地带者，格杀勿论。群众对此不予理睬，仍坚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驻古北口日本关东军第一七四指挥部，指使于营子铃木部队上村校一中队和伪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加紧对快活峪一带"扫荡"。

1941年9月5日（农历七月十四日），于营子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和驻于营子日军中队长上村校一，带领日军、伪警察、讨伐队近200人闯进快活峪，从沟里到沟外将全村280多间房子全部烧毁，抢走了全部牲畜，把整个快活峪洗劫一空。在"扫荡"中，住在马架子一个岩棚里的农民陈老太太，被日军搜山发现活活打死在山上。贫苦农民张家书住在快活峪一个岩棚里，他的9岁女儿张小冬正在山上拾柴，被日军发现，当靶子打死在阳坡。农民孙怀清到自己的地里掰玉米，被敌人打死在马架子上窝铺。据不完全统计，像这样惨遭日军杀害的群众有14人。

10月下旬，地里的庄稼成熟了，搬到古北口、河西等地和附近山上住岩棚的群众，回来收打庄稼。驻在于营子的敌人得知消息，于10月24日凌晨由所长小金井英一、日军中队长上村和伪讨伐队长刘宗功带领200多日伪军，分兵两路包围了快活峪沟。日伪军把卢文清、卢文亮、尚文德、尚文福、郭老耗子（乳名，14岁）等18名群众赶到马架子小庙前的土坎子上，强迫他们列队跪在一起。小金井英一手持洋刀，逼问群众："集家好不好？八路军在哪里？谁是村干部？"这些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对敌人的屠刀，坚强不屈，都说不知道。即将晌午了，天下起蒙蒙细雨，日军用刺刀逼着群众往坎子下的大坑里跳，跳一个开枪打一个。群众不往下跳，日军就用刺刀往下捅。他们惟恐跳下的群众不死，又往人堆里扔了两颗手榴弹，身受重伤的尚文德，从血泊中挣扎起来大骂道："今天老子和你们拼了！"边骂边冲向敌人，撞得鬼子一溜趔趄。日军的枪声又响了，他又倒在难友卢文亮的身上。日寇又对倒下的人一一"过筛子"，刺刀穿透尚文德的胸膛扎进卢文亮的后背。日寇走后，躲在山里的乡亲们才回来掩埋亲人尸体，卢文亮、卢文清、高生印、尚文福和张荣等5人没有死，被乡亲们救起，抬到关里亲友家养伤。被日军围杀的18名群众中，除死里逃生5人外，其余13人都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惨案发生后，快活峪群众的日子更难过了。贫农尚文才一家7口人，两个伯父被日本侵略者杀死，父亲尚福瑞饿死，母亲带着姐姐和8岁的弟弟讨饭，姐姐还被古北口特务吴仲三霸占为妾，小弟弟到山上找酸枣吃，饿死在山上。贫苦农民赵荣的妻子怀孕，因无家可归，到处讨饭，在去于营子讨饭回来的路上，把孩子生在牡丹春沟的一个破窝棚里，直到第二年2月才被人们找到，但这个可怜的母亲和怀中的婴儿早已死去了。

日寇在快活峪凶残地屠杀无辜村民31人，激起了民众的抗日怒火。幸存下来的卢文亮带着日本侵略者留在背上的伤疤，带头参加了抗日队伍——白河游击队。

快活峪惨案，是中国人民遭受日军残害的铁证，也是日军在滦平县“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罪行的缩影。

（选自《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天桥沟惨案

张国良

1941 年 10 月，丰滦密抗日联合县地方武装——长城游击队，由队长张宝仁率领 30 多人从密云县吊马峪出发，沿着潮河川，翻山越岭，穿过日军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古北口分部、于营子、傅家店据点的封锁线，10 月 30 日晚来到虎什哈据点南面的小黑沟村宿营，寻机穿过虎什哈封锁网，奔赴丰宁上方营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游击队在小黑沟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并安排了食宿。伪甲长杨永富和牌长张福山发现情况后，连夜到虎什哈伪警察署向日警尉补大竹告密。驻虎什哈伪讨伐队长兼警察署长刘汉卿获此情报后，用电话串通驻于营子的日军铃木中队和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密谋南北两路合围游击队。10 月 31 日凌晨，刘汉卿带领 100 多名讨伐队出发，在姚家湾子吃过早饭后，随即奔向游击队驻地。游击队闻讯后，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便避开正面敌人，急往南折，返回七道河村的天桥沟。刘汉卿讨伐队赶到小黑沟扑空，即向群众追问游击队的去向，群众谎称“奔丰宁（在小黑沟北面）方向去了。”刘汉卿惟恐游击队抄虎什哈警察署的老巢，便急忙返回虎什哈。

与此同时（10 月 31 日上午），于营子日军上村校一和小金井英一带领 60 多人却奔向了天桥沟。日军刚爬到天桥沟的西梁股上，在加心梁上放哨的抗日游击队员鸣枪报警，游击队迅速机智地突出包围圈，返回口里，使这伙敌人也扑了空。这伙日军闯进天桥沟后，逐户搜查，把牛长清、牛长华、牛长顺等 6 人成串绑起来，强迫他们带路，向天桥沟的东大山追击游击队。6 名群众为使游击队顺利转移，拖着敌人绕道前进。日军追到东大山梁顶，看不到游击队的踪影，便吼叫起来，对 6 名群众拷打逼问：“现在哪边八路的有？”牛长清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小金井英一命令一个日本兵向牛长清的后背连捅两刺刀，又把他踢倒滚下山去。接着，又用柴棍抽打其他 5 人，继续拷问八路军的去向，还是一无所得。于是，敌人押着 5 个群众，又返回天桥沟。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日军抓来的驮夫，迎面碰上了探听被

抓6个人下落的高永贵。驮夫轻声告诉高说："鬼子又回来了，快回去送信，再不跑就都没命了。"高永贵抬头一看，日军队伍跟上来了，回去送信已来不及，便钻进深山的密林中躲藏起来。

日军返回天桥沟以后，把天桥沟6户人家的25口人（当时全村共有27人），还有游击队为掩护群众而掉队的3名战士以及外村来探亲的3人、外地来放牧牲口的1人，共32人，全部赶到高永富的两间马架窝棚附近。日军和伪警察把群众包围起来，架起歪把子轻机枪。敌人上村校一在一旁咆哮，小金井英一在一旁逼问："八路的多少的有？谁是八路的干活？不说的统统的枪毙！"被围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小金井英一举起指挥刀大声嚎叫着："统统死了死了的！"日军和伪警察用枪托打、刺刀扎，把群众赶进马架屋里。民兵中队长牛长华赤手空拳，与敌人展开交手仗。敌人把他抬起来从窗户扔进屋里。牛长华仍然骂不绝口。日伪军用机枪堵住马架窝棚的窗户和门，屋里群众仍继续怒骂。小金井英一挥起战刀，嚎叫一声："开枪！"敌人的机枪便吼叫起来。霎时，32名无辜群众，上至70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婴儿，还有临产的孕妇，都倒在血泊之中。10多名日军又进屋用刺刀向尸体乱捅一阵，然后抱来柴草，堆在屋的四周放火焚尸。一息尚存的陈宽媳妇，挣扎着冲出来，又被打死在屋门外。另一些日伪军分别把天桥沟其余的17间马架窝棚点着。顷刻间，黑烟四起，火光冲天。一阵烧杀之后，日伪军又大肆抢劫，有的抓鸡，有的撵猪，直到下午1点左右才返回于营子据点。村民高振铎、陈宽没被烧死，带着满身刀伤，挣扎着爬出来，可是因伤势太重，没活几天也悲惨地死去。被日军抓到山上用刺刀扎伤踢滚到山下的牛长清苏醒过来爬回家去，也仅活了10天就死了。至此，天桥沟的房子被烧光了，天桥沟在家的人死绝了，天桥沟被日本法西斯毁灭了！只有在深山中躲避的高永贵、牛长清在北甸子给地主放牛的一个10岁孩子牛才成了传下这段悲惨历史的人。

天桥沟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七道河村的乡亲们来天桥沟埋葬尸体，抢救亲人，目睹惨状，无不泪湿衣襟、泣不成声。被杀之后，又被焚烧的尸体，已残缺不全，无法辨认，只好在原地址集体埋葬。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

小东区惨案

朱素清　云　清

小东区位于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北 8 华里处，是兴隆县城通往土城头北马圈子、鹰手营子一线的必经之路。1942 年日本侵略者实行"集家并村"后，把周围村庄的零散住户都驱赶到这里，因它处在县城之东故称小东区。小东区有东、西两甲，共 1200 多口人。

随着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抗日活动逐步由深山区扩展到日伪统治严密的大川据点和城镇周围。1942 年 1 月 29 日（农历腊月十三日），小东区"跑会"（给甲长送信、跑腿的）马祥瑞，奉命带领武装班长王力之子小沉头和李永富等 13 人，给驻在榆沟的八路军某部运送给养（鞋、袜、小米等），马祥瑞带收条回来。次日，他到小东区出售茶叶时，遇到 10 多个特务拦路搜查。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他便绕道向东北河套跑去，但这也并未能避开特务们的视线，几个特务立即随后赶来。在追赶不及时，开枪射击，把他腿部打伤后逮捕。敌人从马祥瑞身上搜出收条，因此就认定是抓到了八路军密探，押解他去了兴隆县城。同日，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八路军 1 名工作人员住在朱湖沟（属小东区管）宋连仲家，突然被进沟搜捕的特务抓住。宋母胆小怕事，又怕受连累，再三央求，特务们把工作人员释放，却把群众张富抓走，押往县城。

伪兴隆县日本县长西山得知这两条消息后，立即决定对小东区进行大检举。2 月 1 日（农历腊月十六）凌晨，在西山的指令下，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会同伪兴隆县警察署长张福庄，率日本宪兵和刘其昌讨伐队 100 多人，将小东区村包围起来，进行了大搜捕。敌人进村后，逐户搜查，见男人就抓，几个小时就抓捕了上至 70 多岁老人，下至十几岁儿童，120 多人。敌人把抓来的群众集中到李稳、吴玉满、李振远三家的院里，用绳子捆绑起来，穿成长串。随后又押送到兴隆县警察署留置场（即拘留所）。敌人妄想从这些人嘴里捞到什么，对他们施以种种酷刑，诸如拳打脚踢、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手指插竹签等。但是，被捕的群众却无一人屈服。十几天以后，敌人不得不把年过花甲的老人和十几岁的儿童放回。

2 月 20 日（农历正月初六），被捕群众 50 多人被枪杀在南土门东山坡"万人坑"，其中包括小东区 17 人。

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三日),小东区群众王惠林正在槟榔沟八路军办事员杨守仁家躲避。刘其昌讨伐队100多人,由特务潘洪章带路,再次进行大搜捕。先后到槟榔沟杨守仁家把王惠林和一个姓岳的群众抓走,然后去荞麦岭抓人。有个抗日武装班长见到讨伐队来抓人,刚要从后门逃走,就被讨伐队发现,当即开枪打死。随后讨伐队又到大台子,抓了几个赶驮子的人。接着,又到红石坑、大灰窑等地抓人,这次共抓捕20多名群众。从大灰窑出来,转回小东区,送至兴隆警察署留置场拘押。几天之后,被抓的人们被分批带到县城聚仙楼饭馆刑讯。

3月下旬,敌人把从小东区和从其他地方抓捕来的群众,除已就地处死的以外,下余150多人,用汽车押往承德监狱。这批人经过敌人的多次审讯,又有17人被处以死刑,在承德水泉沟被枪杀;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0多人被处以1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余人被送往东北当劳工。

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后,小东区人民重见天日。但到这时,这个村被押送承德和解往东北的80多人,绝大多数都已被处死或折磨致死,生还的只有刘思荣、于云才、高东田、王惠林等4人,若再加上当时被处死的11人,前后一共有近百人丧生。小东区在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搜捕、大屠杀中,群众所受的折磨、死亡十分惨重。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

大帽峪、兰旗营惨案

何连仲

大帽峪、兰旗营惨案是1943年春节期间,日寇在兴隆县潵河川的50个"人圈"中实行"大检举"的案中案。

1942年秋冬至1943年初,日寇在兴隆县实行了惨绝人寰的"集家并村",妄图切断抗日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但他们这一目的并未达到。因此,日寇于1942年在潵河川搞成50个"人圈"以后,驻兴隆县日本宪兵队向其驻锦州的西南防卫司令官仍这样报告:"兴隆县潵河一带居民都通八路匪。"于是他们在对"无人区"进行大讨伐、大"扫荡"同时,又在"人圈"内实行了"大检举"。

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日伪锦州军事法庭人员秘密来到兴隆县潵河川进行部署。2月7日(正月初三)夜,日伪军警宪特同时出动,在50个"人圈"

中逮捕居民2000多人。除在兰旗营集体屠杀外，其余均押送到兴隆，再转送到东北各地充当劳工。后来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被日寇迫害致死，只有极少人生还。兰旗营惨案是日寇制造的这次大惨案中就地屠杀中国居民的一例。

兰旗营(人圈)位于兴隆县东南65公里处，是五指山抗日根据地通往冀东基本区的一条秘密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伪孙德英讨伐大队的队部设在这里，这里驻扎着一个中队(100多人)伪警察。2月7日夜，日本宪兵队指挥着孙德英讨伐大队(300多人)在佟家沟以东三道河以西一带10余个"人圈"中逮捕了几百名居民。其中，仅大帽峪一个仅有67户人家的小"人圈"，就被逮捕73人。这些人被集中关押在兰旗营的一个大院里。

大帽峪虽然位居兰旗营以西3华里的山弯里，但是因为群众抗日觉悟高，经常掩护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从该地过路，对此敌人已经有所察觉。1943年2月7日(正月初三)下午4时许，八路军部队一个排来到大帽峪，准备在天黑后穿过公路，越过澈河进关。天刚擦黑，大路上两个特务向部落奔来，正与去换岗的民兵曹万章相遇。特务抓住曹万章问部落中有无八路，曹万章说没有，特务打了曹万章一记耳光继续逼问。这时，在部落大门里警戒的八路军部队侦察员杨采章向特务开了枪，特务高占英被击毙，特务王贵山逃跑，八路军部队当即向北撤回。为防止敌人报复，12名村干部、民兵随部队北去，其他群众也隐藏起来。不长时间，日本宪兵和孙德英讨伐队200多人将大帽峪包围。他们先将山坡上的柴禾垛燃着，映得部落里通亮。藏身的群众以为房子被烧着，纷纷回家往外抢东西。日寇讨伐队乘机窜进村挨门挨户抓人，当即有73个男人被绑走。

日寇讨伐队把从大帽峪、马圈子、南沟、青杏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大石门等10余处"人圈"绑来的几百人集中关押在兰旗营部落中的一所大院中，并且不允许被绑着的人们站着，强令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蹲着，不许动，谁蹲得高了就用棍棒打。第二天，日寇在大帽峪人的脸上划上红杠，左臂系上布条。对所有被抓去的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第三天，人们饥渴得喝院里泔水缸的泔水，随后进行刑讯。日本人审问，有人翻译，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部落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公粮存在哪里？说不知道的就用火烤、凉水灌。然而，在日寇的淫威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马永兴的父亲被火烤得身上流油，棉衣都被油透了，可他什么也不说。大帽峪的司俊雨视死如归，拿劈柴把敌记录官打懵，最后被日寇用刺刀挑死。日寇审问大帽峪的一个姓梁的哑巴，哑巴当然不能说话，鬼子施用酷刑，哑巴拾起劈柴向敌人打去，被敌人拉出用刺刀挑死。日寇对大帽峪的曹清，一边用刑，一边逼问，曹清总是愤怒地回答一句话："我说你妈×呀！"大帽峪的靳志三对日寇的审问大骂不绝，敌人用刺刀挑了他，夜里他苏醒后爬回村，第二天死去。马圈子被捕的抗日地下干部赵福成腿上挨了一刺刀，仍然跑了出去。

日寇在4天中，对被捕的居民轮番审讯二三次，用尽了所有的酷刑，但最终仍

是一无所得。

2月12日(正月初八)早晨,敌人大声地喊起来:“别的村的每人给一碗粥喝,大帽峪的每人给两碗粥喝,他们要回老家了。”至晚上,敌人把大帽峪被捕居民中的30多人用汽车押去兴隆。剩下的30多人被赶到3个新挖的大坑边沿,面朝里背朝外跪下。尔后,日寇将事先准备的五六垛玉米秸燃着,大火冲天,映得地面通明。日寇用刺刀蘸着事先准备好的凉水,扑上来照着30多个被捕居民的背部连刺。顿时,热血迸溅,腹破尸横,惨不忍睹!接着,日寇又在此地惨杀青杏沟、马圈子南沟等地同胞30多人。一夜间,日寇杀害70多人。在日寇的屠杀之下,只有杨茂林一人死里逃生,那是在众人出部落西大门下土坎时,杨茂林乘敌人去北道站岗之机,猛地向南跑去。一个特务紧追,向他头上打了两棍子,又放了一枪,他左肩中弹,仍跑上南山,从而获得重生。次日,日寇将在兰旗营关押的群众全部送往兴隆,或继续杀害或送往东北。

大帽峪部落的居民,这次死在兰旗营和外地的计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死去男人,因此成了“寡妇庄”。惨案后,日寇和特务到该部落刑讯逼供致死8人,由于惨案造成该部落居民患病和冻饿而死的又有62人。从这次惨案至日寇投降的两年多时间,大帽峪共死亡139人,占该村原来总人口的57.7%。幸存者只有老弱病残102人。“寡妇庄”一词,不仅铭刻着42年前大帽峪、兰旗营这篇血泪斑斑的历史,也记载着兴隆县人民蒙受13年之久的千古奇劫!

(选自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

楸木林惨案

白恩潮　何连仲　张春生

我叫白恩潮,今年76岁,我亲眼目睹了楸木林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事情虽已过去42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码事,就怒火满腔,仿佛当年一幕幕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

我们楸木林子村,处在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南110多里,是一个喇叭状的山沟。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这块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沟门子附近的群众,用刺刀驱赶到一起,因这附近的山上长满了楸树,于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从1938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抓

汉奸、捉特务,给敌人以很大威胁,被圈入"人圈"后,还经常夜晚出没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交通,坚持抗日斗争。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2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爷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责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他们3人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被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顿时,村子里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里,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成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狼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他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绑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人招供。

敌人红眼了,拿出了他们"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该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个人之后就给下一个人松绑,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是在这样的毒刑下,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对

着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在这伙恶狼一样敌人的面前，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其余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有的哥俩全死了，然而敌人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我们。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派区长王佐民及张友德等连夜赶来慰问我们，召开追悼大会，控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别无出路，于是纷纷投奔了八路军游击队。从此，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一次，在我村北部山区，敌人遭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团一部分部队的伏击，战士们把仇恨集中在枪上，枪口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只用半个多小时，就毙敌80多个，为乡亲们报了血海深仇。

何连仲　张春生整理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

南双庙惨案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办公室

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之后，又把魔爪伸向四乡，他们清乡、讨伐、修"部落"、建"人圈"，大搞"无人区"，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蹂躏我山河，残害我人民。南双庙曾是"扫荡"中受害最惨重的村庄之一。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宋（时轮）邓（华）纵队出关，深入承德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纵队转移后，留下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敌人。那时，杨雨民和高振东率领的武工队，经常活动于南双庙及其附近一带山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南双庙人民也经常配合八路军

部队活动,他们扒铁路、断交通、割电线、砍线杆,切断敌人通讯联络,同时还配合部队袭击警察分驻所、村公所。为了镇压南双庙人民,日本侵略者曾派遣特务四处活动,搜索情报,曾调动宪兵队、讨伐队,巡回"扫荡",实行大清查、大检举、大屠杀。

1943 年 2 月 1 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这天深夜,日本宪兵队 100 多人偷偷地从承德来到南双庙。进村后,他们挨门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病残体弱,把人们全部驱赶到村南庙前的空地上。尔后,他们通过翻译开始对人们进行审讯:"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办过事?""谁是村干部?"……对日本侵略者的审讯,人们只以沉默作答。敌人恼怒了,一伙汉奸特务蜂拥而上,霎时,110 人被抓捕。敌人又拳打脚踢,棍棒打,刺刀逼,不让被抓捕者的亲属接近。最后,被捕者被用绳子一个个联起来拉走。

当日,被抓捕的人们被押到离南双庙 10 里远的新杖子。在这里,日本侵略者对人们施以酷刑:烙铁烙、灌辣椒水、压杆子、刺指甲、吊大柁,人们惨遭折磨,但仍坚贞不屈。一个姓靳的小伙子,怀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乘放哨的日本宪兵不注意,抄起镐头砸去,砸得这个侵略者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最后他也被侵略者枪杀。

日本侵略者的严刑拷打一无所获,他们又施诡计,假惺惺地释放 20 人,但余下的 85 人却于正月初二被拉到承德,押入承德监狱。以后这 85 人中,有 5 人被砍头,69 人被折磨致死,11 人被送往安东(今丹东)、抚顺、阜新充当劳工。

日本侵略者在南双庙抓走人后,又放起一把火,把房屋烧毁,把粮食焚光,把牲畜烧尽。经这一劫难,南双庙村成了废墟,400 多口人死去了一半,并且有 10 余户死绝,多数户死去男人,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 年)



证言与口供

长城线上“无人区”的证言

小林实

陈平先生就长城附近的“无人区”,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发表了证言。而我确实是参加了作战并干出了残暴行为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作如下报告。我在华北派遣军第108师团第242联队第1中队,曾与陈平先生直接交战。

我在1942、1943、1944、1945年间,以陆军伍长、军曹、曹长、分队长、指挥班长的身分在长城线附近的“无人区”参加作战,现为残暴的非人道行为作证。

我所在的部队是在长城线一带与八路军(后来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战斗的部队,是以搞掉八路军根据地和战斗活动地区为目的,是为破坏万里长城两侧的村庄,使村民无法生活而作战。

“无人区”是把15—20间房的小村庄一间房不留的全部烧毁,把村民迁入由日军警备地域内的集团部落之中。为了制造“无人区”,预先划出指定的区域,发出布告说:“在村庄居住者要迁到指定的地区”,强制迁移。在居民全部迁出后,进行烧光作战,对此,居民当然也有反抗,而对抵抗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进行逮捕射杀或抛入贮藏蔬菜的地窖,再放上藁子等点火进行烧杀。

青年农民则辗转各处进行反抗,被抓捕后则迫使他们挖深坑,在坑前站着许多农民,在这些农民面前,命刚入伍的士兵锻炼胆量用枪刺进行刺杀,那些年青人落入身后的坑中,迫使农民用土埋掉。

这其中也有母子同时被斩杀的。孩子在临死时叫“妈妈”的声音至今仍在耳边回荡。还有,部队的军医把孕妇仰面绑在门板上,连麻醉都不进行,声称进行“医学研究”而剖腹将母子一同杀害了。

干出这种非人道的勾当,干出极为残暴的行径,还认为这是为了“东洋和平”,为“天皇陛下”,为“孝敬父母”,因此,中国人把我们叫做“东洋鬼子。”

我作为中队的指挥班长,忠实地实行了彻底消灭八路军的作战。当地居民和八路军总是一起对日军的占领政策进行不断的抵抗,有时进行反攻。为了把当地居民与八路军分离开,捕捉没有民众掩护的八路军并予以歼灭,便在万里长城线上制造了广大的“无人区”地带,干出了难以言喻的罪恶。刚才,在休息中与陈平先生谈话时,听说,在先生的史料中有小林实军曹的名字。

这样现在还保存有部队名和我的名字,我一个人杀过许多八路军,还笃信这是为国家利益、为天皇陛下,而且是为了乡土,是孝敬父母,其实,这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军队就是由身心凝聚着军国主义的士兵而组成的魔鬼集团。在无人区干出了烧、杀、抢掠的"三光作战"的勾当。

这种"三光作战"不仅我所在的中队实行过,而在占领长城线一带的第108师团等大部队也都实行过。

因此,了解日军这种行为的居民家庭便弃家,相继逃往远处。居民逃走是困难的,部队出动去追捕逃走的居民,用枪刺威胁捕回,为使不再出现逃跑的情况,将数人连串绑着抓回,将首谋者在居民面前杀死。当时,被日军刚刚砍下的二三十个人头并排挂在长城的墙壁上示众。对在黑夜取走人头的居民不容分说进行射杀。人头长时间放置已经腐烂,日军对腐烂的人头不进行处理,而是让遗族领回。而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倒霉的事情是在诸位所居住的地方或者诸位所熟悉的人身上发生,那该怎么想呢?这种事情日本报纸上并不刊登。报纸上只是写着"××部队在河北的长城线取××的战果",而"把割下的人头挂在城墙上"的这种事大概是不会向大本营报告的吧!而大本营命令"要确保长城线"的结果就是实行这样的"三光作战"。执行命令的人"有必要向中国人们表示诚心的谢罪"。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全家进行抵抗的家族,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和姑娘、小孩子都对日军进行抵抗。日军就把这个家族的人都抓捕起来,把手绑着押入地沟。这家人们相互保护,把小孩子围在中间,表现出战栗与恐怖。中队长命令把手榴弹拉出引信投入沟,五六发手榴弹喷喷冒着烟在这家人脚下转,一齐爆炸,炸成七零八落的尸体在硝烟中与许多肉片一齐散落下来。

干出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即使日军忘记了这种行为,而被害者是永远不能忘的。

李茂杰译

(选自[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向前向前》第45号)

制造“无人地带”

铃木启久[①]

一

这里一带的道路旁，排列着整齐的青青的杨柳，几层高高的烟囱吐出黑色的浓烟。3架卷扬机不断地发出一阵阵运转声响。离开卷扬机不远的地方，有两三座金字塔型的高耸的煤山。煤块中冒起的自然发火的火烟升向天空。山下，是一片葱茏的树林。广阔的树林中间，有一幢精巧的豪华的房屋，那是开滦煤矿所有人的宅邸。

这里是开滦煤矿的中心地——唐山。

开滦煤矿公司的大门前，站着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察，这是“开滦矿特别警备队”派出的警卫。

根据日军步兵团司令部的命令，开滦煤矿必须每天产煤11万吨(原文如此，数字有误——编者)。为了完成日军的任务，煤矿当局下令全矿日夜三班制不停开工采煤，名义上每班是8小时工作时间，实际上由于强迫规定的采煤数量太大，每个矿工每班要在坑道内连续做10小时以上的苦工。矿工们仅仅有很微量的粗麦面果腹，日夜受到敲骨吸髓般的剥削。矿工穿的衣服积满了煤炭、脏物和尘垢，变成了纯黑色，闪闪发光，仅仅是腋下和膝盖极小部分还看到一点点原来的蓝布颜色。在衣服的屁股和膝盖部分，缝满了大大小小的补丁，仍然难免露出了肌肤。矿工们一年四季也无法洗澡，脸、手都积满一片片黑色的污垢。只有牙齿是白色的。他们用眼睛瞟着矿警，小声地说：“今年中秋节听说又不放假啦！”

一眼能望到这些情景的，是从步兵团司令部的一幢砖造的两层楼房屋，从这里的窗户外望，令人心胸豁达。

在这间房间中，我(铃木)和冈村方面军司令官面对面坐着。冈村是在街上一

---

① 前日军第127师团师团长、中将。铃木于1942年1月至1943年7月间，任日本第二十七师团少将步兵师团长和“北部防区”司令官，驻在冀东地区(伪冀东道)，司令部设在唐山市。

切行人都禁止通行的严密戒备中来到这里开会的。只见他悠然地吸着香烟,坐在沙发中沉思。步兵团司令部的周围显现出异常的气氛,大量的上了刺刀的日本兵在周围警戒。

冈村有他的一套使用人的本领,有统驭人的能力,轻易不得罪人,但是总是把部队的功绩归于他自己。这时冈村对我说:

"今年4月的扫荡战,你的部队粉碎了鲁家峪的八路军秘密阵地,获得了很大的战果。这个地区的治安大大改良。你辛苦了,希望你进一步奋斗,好好地干。"

"不,这不过是偶然的机会罢了。"当时受到冈村的奖励,我心里也不禁有点高兴。

"这个地区的治安确实是好起来了。"

"只是表面上好,实际上恐怕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体上鲁家峪的阵地是八路军冀东地区重大的根据地,这个地区的阵地若有损失,就对根据地有影响吧!"

"我军占领鲁家峪,使八路军确受到巨大打击,但是他们放弃这处阵地,并不表明八路军减弱了。他们往往放弃一处阵地,又进入另一处山区。另一方面他们对地下工作非常努力,可以说这是增加他们的实力。前几天,从丰润到唐山的重要公路上,1辆日军的联络军车白昼被袭击,1名联络兵被打死,军用联络书信也被抢走了。玉田到丰润的公路上,也发生同样事故。在汽车公路上还发现埋了不少地雷。虽然这个地区表面上看来,八路军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像是一处白色的地区,但是只要剥开一层表皮就发现红色的土地。那么八路军的根据地在什么地方呢。我只能回答说,在'山区',因此我们必须对'山区'彻底的打击不可。"我向冈村司令官说出了心底里的本意。

"那么说,你对此事有什么打算呢?"冈村问。

"在我的兵力掩护下,可以进行一次彻底的清剿,首先把凡是与八路军有任何关系的人一律杀无赦,彻底破坏他们的地下组织;第二,要使治安区居民同八路军完全隔开,这是绝对必要的。"

"你的意见可以作为一个方案加以考虑。"冈村的话似乎不是十分赞成我的意见。不过他又说:

"总而言之,这个冀东地区对于日本大陆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必须进一步在治安上加强不可。"

"在这长城附近的山地,有相当多的中国居民,这里虽然不完全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但他们隐藏八路军确是事实。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干一下。"我继续发表了我的意见。

经过大约1小时的会谈之后,冈村回到宿舍休息去了。

这一天的黄昏,各条十字路口和小路、要冲附近都有武装士兵严密警戒。不一

会，两辆车头架着机关枪，满载日军武装士兵的军用卡车一前一后护送着一辆小汽车驶到了K饭店的门前，冈村司令官从车上下来，后边跟着的是副官。冈村把帽子和军刀交给副官，在艺妓们的引导下进入一间精致的房间。在房间里，受今天晚上冈村邀宴的高级将校已经到场并开始闹哄哄的高谈阔论了。

不久，有大量艺妓陪酒的酒宴开始。随着酒过数巡，场面也越来越乱，许多军官轮流跑到冈村处敬酒。每一次冈村都夸奖这些将校的功劳，勉励他们。每一个将校也都大事阿谀吹捧这个长官一番。冈村说："男人在外面胡闹不算什么坏事"，他首先就乘酒兴对艺妓们胡闹起来。

这时突然有个电话找我听，我离席一会儿回来，向冈村报告：

"刚才接到丰润打来的电话，日军一小队在走出某村时被八路军伏击。我方损失为战死1人，轻伤1人，没有什么大事。"

冈村镇静地说："哦！是吗？"像是若无其事地走开，经过两三个军官的酒席后来到我面前，说："来，再干一杯！"

接着他又说：

"近来治安军（日军走卒伪华北自治政府军）怎么样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中国人，要充分了解利用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这点非常重要。好好利用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如不能好好利用，即使花尽了气力也是达不到效果的。这方面的诀窍你要好好注意。"

冈村讲完这番话后，又同艺妓、酒女们胡闹去了。在饭馆的外面，荷枪实弹的士兵严密地警戒，"保护"长官们在酒馆里狂欢。

二

这里是天津的所谓"日本租界"。在一幢二层楼的房屋门前，两名日本兵在守卫。屋里是西洋式和日本式的混合布置。这是日军的一个师团长的住处。在宽敞的客厅里，壁上挂着西洋式的风景和花卉的大油画。天花板上吊着3盏西洋式的大吊灯，把室内照耀得灯火辉煌。

原田师团长坐在沙发里面，装模作样地吸着香烟，他叫侍者拿一杯咖啡在我面前。

"今天请你来，实际上是听听你的意见，又向你传达一些做法，昨天冈村方面军司令官找我去北平谈了谈。据军司令官说，你管辖的地区，八路军的势力表面上似乎看来平静，实际上一揭开表皮就露出红色的实质，是吗？如果照你的意见，这个地区是不能任其自然发展的。因此，你再说说今后要怎样做才好？"

"一个办法是，把八路军的地下组织从根本上加以破坏。要做到这点，必须全面的，特别是对山区方面进行彻底的搜查和清剿，凡是和八路军有丝毫联系的，统

统要处决掉,不能赦免。"

"噢! 据方面军的想法是,为了彻底粉碎八路军,从长城起2至4公里内划为'无人地带',在这块地区内,不准有人居住,不准耕作,一切人的活动统统禁止,交通限制也要大大加强。我们师团准备执行这一计划,你的意下如何?"

"方面军和师部有这样的意图,我是一定赞同的。不过,我想执行这个计划时,如果在两公里之内划为'无人地带',恐怕极不容易做得彻底,因为长城线两公里以内,大体上没有居民。居民少的地方,作为八路军根据地的价值也少。4公里以内,有相当多的村庄,那是相当有潜力的根据地,如果只划2公里,那么2公里之外仍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这就恐怕做得不够。"

"那么就4公里吧!"

"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一任务?"

"最迟到下月半,因为南方战事相当激烈。说不定什么时候要调军队到南方去,所以要快点。"

三

在步兵师团司令部一间宽敞的会客室中,桌上放着上等香烟、点心、水果、咖啡等。我在听取部下联队长(相当于团长)田浦和小野的报告,接着我对他们说:"听到你们的报告,你们每天都在各方面加强搜查,今天说逮捕了多少八路军通讯员,明天又说处分了多少为八路军工作的人员,好像八路军的组织一个一个都被破坏了,各个部队都建立了治安区。但是,有些部队刚刚说肃清了敌人,几天后又说发现了八路军,照理说那些联络站已被破坏,可是许多地区连地雷、通讯器材也被运了进来。"

"依我的判断,可以说治安情形比过去更坏了。我查了查我的管区内的实际情况,第一联队方面,不久前发生了在丰润县日本军车被伏击事件。这里是治安最好的地区,它接近铁路线林西的北侧,换句话说,是日军警备部队的耳目之前的地带,居然发生了军车被袭击,死伤日军各1名。又在玉田街,一夜之间公路被挖成寸断。在遵化县的山区,日军不止一次中地雷埋伏,不仅小分队的日军,甚至整个中队的日军也受到骚扰性射击。第三联队方面,第三中队在抚宁以南遭受伏击,接着又在东昌附近的某村,日军一小队遭受袭击,都受到相当的损害。4月下旬日军在丰润地区的扫荡战,最近对王官营和鲁家峪都展开扫荡,确实取得了战果。但是仅仅两个月后的7月,在同一丰润地区,出现了比4月扫荡时更多的八路军和游击队。为了追剿这股部队,日军先后在玉田遭受伏击,损害不轻。"

我对部下说:"从7月以后,八路军的大部队一直难以发现,综合军管区的情况看来,你们认为治安已趋好转的判断是错误的。特别是最近八路军的大部队一直

未能找到,是由于你们的粗心和麻痹造成的。因此你们各部队进行的搜剿,几乎是形式上的。"

"另一方面,你们只是放纵下级去干,自己对工作不检查,不到第一线严格地监督。这样多的被袭事故,怎能使日军获得战果!照这样的情形下去,将使日本的'大陆政策'规定我们所负担的重要任务地区不能达成目的。过去我们干的方法证明都没有收到效果。这次我们要用最厉害的方法彻底消灭八路军。当然,现在不能说到处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但是近长城线的山区,却是危险的地方。这一带同满洲方面有联络,有居民就有八路。遵化、迁安两县接近长城。我们决定从长城线起将4公里以内的居民统统赶走。你们快点回去通知县顾问,把这个决定贯彻下去。"

我说完了这番话,就直接传达了步兵师团的命令。这道命令就是命部属从9月某日开始,在20天内将这一带居民赶出去。在限期内所有中国居民的房屋一律焚毁。20天之后不论任何理由,绝对不准中国居民在"无人地带"进出和耕作。凡在禁区内通过的一律须持有军部发的特别许可证,如果有人反抗,定予严惩不贷。

听我下达命令之后,两个联队长急忙回队去了,我立刻将县的日本顾问叫来,把命令递交给他,并且要他将步兵团的命令向伪政权仔细传达,并强调"这一命令将严格执行"。

四

数天之后我把田浦和小野两个联队长召来,问他们关于"无人地带"的工作情况。两个联队长报告说:"山里面居民比想象的要多,工作大体上做完。"

小野报告说:

"在我的管区内,有一座娘娘庙,因为拜佛的人非常多,庙主又说:'这里绝对没有八路军。'我就允许他们不拆了。"

"正是这样的建筑物,游击队才会利用,你快点把它放火烧掉。你们今后工作更加要仔细,这样粗心是不行的。你们事后去检查了没有?"我怒气冲冲地教训他们。

"还没有去检查!"

"你们太糊涂了,做事情样样都要命令,不命令就做得不彻底。不彻底的事情等于没有做,有时反而有害。你们马上给我去检查,检查一遍还不行,以后要继续不断地搜查有没有逃回来的人。那天,我到第一线去视察,看到大路小路满是背着行李的人群,一眼望去连续不断,没有想到山里面住着这么多的人。把那个地方彻底整顿一下,八路军就无法作根据地。今年7月玉田遭袭击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你们马上回去给我仔细检查,一个老百姓也不准居住,统统将他们赶走。"

几天之后,第一线的部属把检查报告交了上来,这些报告是:

“农民1名偷偷回来拾取割剩下的粟米和高粱,将他赶走后,放火烧掉了高粱和粟米田。”

“某某村山谷中发现炊烟,前往检查时发现一家5口人并未撤出‘无人地带’。立刻将其房屋烧毁,1名青年男子反抗,立予枪杀,其他4人被赶走。”

“同村以北的山谷有3幢房屋,疑有人居住,经向各方面搜索不见人影,将3幢房屋烧光。”

“马兰峪的南方,发现1名青年男子没有通行证,经扣留刑讯,据称什么也不知道,因形迹可疑,已将他带到迁安继续审查。”

“某村附近发现三四人向山上逃跑,经开枪后,确信击毙1人;其他3人经追缉后不见踪影,决定明天在这一带继续全面搜查。”

……

我见到这样多的报告,认为执行这个赶尽杀绝的制造无人区的计划已经发生效果,心中窃然自喜。第二天,又接到来自第一线各联队的报告,这些报告越来越多,不断向我这个步兵师团司令部送呈。但是这些报告都和以前的报告大同小异,即这里赶绝了村民后,那里又发现了小茅屋重新搭盖起来。我发现有些村民仍然分布在这一带。照这样下去,设置“无人地带”的目的是达不成的。

我亲自向各个联队长下令,命他们在各地区务必严密的搜查。

之后,每一天都有一大叠的报告送上来。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这样的报告。我读了这些杀人放火的报告,很满足于自己的“功绩”。但是实际上,这些报告每一份都加深了我的侵略罪行。报告书堆得像一座小山,我的罪孽也就像是一座大山。

五

我以各个联队长的报告为基础,将实施制造‘无人地带’的情况向原田师团长交了一份报告书,我并且当面向原田推荐我的经验:

“为了彻底制造‘无人地带’,不仅要从地面上视察,还要从空中视察,如发现有不彻底处随时纠正。我建议给我飞机去‘无人地带’上空去看看。”

“对,这办法很好,我同你一起去看看。”原田师团长马上表示欣赏我的建议。

第二天,我就同原田一起坐飞机从天津出发向唐山的方面飞去。途中飞机向偏南飞行,从塘沽上空向下俯瞰,只见无数的白色小丘陵散在各处。

“那是塘沽的盐,每年大约有600万吨运日本作为日本的工业原料。”原田告诉我这些白色山丘的来由。

我一面听他说,一面俯瞰飞机沿着地面的铁路线向北飞行。地面上的汽车看

来就像是火柴匣子一般，频繁地不断向北和向南驶行。机头稍稍向东转去，看见了浩渺的渤海海岸。这一带附近是一片非常广袤的碱地。

“这一带地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中心，大陆政策一旦实施，日本的移民将大量地移居到这里来。”

原田以露骨的侵略者的心情说出这番话。

飞机向北飞行，眼睛下面出现了极其广大、肥沃的农田，大小农村散处其间，这里便是著名的冀东平原。平原的偏东面，看到了发源自热河群山之中，蕴藏有丰富的水力和电力资源的滦河，河流一会儿广阔，一会又细如游丝，向东蜿蜒曲折流去，宛如一条条的白布，伸向渤海。

飞机从山海关上空附近起机首折向西边，进入大片森林和山岳的地带。山顶上的万里长城有如一条巨大白色的百足虫，蜿蜒盘旋在群山之上。飞机沿着长城线向西飞行再折向南边，不久就飞到迁安县北部地区上空。这里原来青色的森林出现了一块块的红色和黑色的烧毁和烧焦的痕迹。我想：“到了，从这里起就是我所制造的‘无人地带’了。”我打开地图察看时，飞机已到了遵化县的上空。

看看下方，只见森林中出现无数个烧成红色和黑色的大火后的灾迹。许多处显然是整个村庄焚烧后，大火蔓延烧向山林形成更大的山火，这些灾迹有的呈长方形，有的呈椭圆形，非常之多。一根根光秃秃的烧成黑色的树干，杂乱地林立在山头。

“这里原来有许多的村庄，但现在只剩下烧光的残迹，一户完整的房屋也看不到，证明计划成功！”我一面这样想一面仔细观察地面，突然从森林中看到有些淡紫色和白色的烟雾冒了出来。我想：“还是有人，搜查得还是不够严密。”我参照地图确定了它的位置，划下了记号。

机头转向南面，沿着冀东平原中央南下，很快就掠过开滦煤矿的上空。

“‘无人地带’大体上是成功的。只要这一带无法住人，无法生存，八路军就不能建立根据地。”

原田师团长用满意的语调说出这番话。我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阵的喜悦。不久飞机又回到天津降陆了。

第二天，我立刻将各联队长召集到我的办公室，对他们说：

“昨天我同原田师团长坐飞机到‘无人地带’上空视察过了。大致上已成为‘无人地带’，但是你们的搜查还是不充分，我就看到还有人残留在无人区。”

我把地图上的位置告诉联队长，然后下令说：

“你们务必要加强严厉地斩根烧绝，彻底地清出一条无人地区。”

我下命令时，表情严肃，声色俱厉。联队长们连声唯唯退下去了。

之后，各个联队更加每一天都严密地执行搜查和烧光、杀绝、赶绝的政策，把所有遗留的家宅村庄，一栋不剩地烧光毁光，反抗者一律屠杀，把不能反抗的老百姓

一律押送到满洲，让他们供给关东军充当劳役和做苦工。

六

原来是一片葱茏翠绿的森林、田畴，现在是一片焦土和荒凉、恐怖的无人秃山，没有一点生机和人的气息，到处是焦黑的枯木，杂乱的散处在山间。原来有成群的飞鸟现在消失了，悦耳的雀鸟的鸣声再也听不到了。

农家一户也不剩了。原来是和平、宁静，一片美丽风光的村落，如今找不到一户完整的人家。到处是烧焦的木头，变黑的断垣和颓壁。它们像是满怀仇恨，寂寞地孤立在荒芜的山野。

每个村庄的中间和周围的池塘小河中，飘满了烧焦的木头、破衣、碎片、破烂的家具杂物和枯木碎叶，废物堵塞了溪流。和平的村镇变成了鬼蜮。溪流的声音似乎也在喃喃地诅咒着日本鬼子的罪行。

那些年年开花结果的大量果树，都成了一株株的焦炭，其中残存的少数果树，本能地保卫着自己的生命，被薰成黑色的树叶和幼枝在秋风中摇摇曳曳。

在田地里，到底〔处〕是被烧毁的高粱，粟子散乱在地面。一丈多高的高粱，结满了红色的果实折断倒伏在田地上，被弃置不顾。

老百姓一个也没有，整片土地变成寂无人声的地狱。原来那样多的家畜，连一头小猪也寻找不到。天亮时的鸡叫声也听不到了。

这片沉寂无声的土地，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

这是步兵师团下令制造"无人地带"以来，仅仅 20 天就把冀东地区糟蹋成这种样子。

在这个期间内，日军强夺了约 640 平方公里的中国老百姓的土地。十几万中国老百姓被迫挨着冻饿流走到他处。一万数千户老百姓的房屋被日军烧成了灰烬，约 200 多名中国农民仅仅因为用愤怒的眼光投向日军而被枪杀。

我的一纸命令就忠实地执行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仅仅在 20 天内制造了一大片地狱。是啊！仅仅是 20 天。

我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犯下了极其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一个通讯员被逮捕，两个通讯员马上递补。两个抗日工作人员被日军处决，四个新的工作人员又出现。日军在这里镇压，反抗就在那里出现。日军到那里镇压，反抗就在这里出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我感到非常的头痛。我用加倍的、更彻底的残酷的镇压，更加加倍的反抗必然会跟踵而来。

日军制造"无人地带"原来是要扑灭八路军的根据地，抑制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但是我们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促使以八路军为中心的中国人民的抗日组织和它的力量更加增强。

我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却很能感觉到中国人民无法阻挠的强大的威力，正在加强抵抗着日军的残暴镇压。这一股强大的威力，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任何力量也不能抑止的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它是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八路军的伟大的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不论使用任何手段和方法，不仅不能扭转历史进展的方向，甚至连一瞬间停止历史的进展也办不到。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无论采用什么残酷的手段破坏中国人民抗日组织，但是在中国人民的力量面前，是不发生什么效果的，相反，被破坏的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组织。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力图消灭八路军的根据地，但是被消灭的不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盘踞地。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不能制造中国人民的“无人地带”，中国人民反而建起了充满和平、更加幸福和容纳更多人安居乐业的乐土。今天的山岭又恢复了翠绿的青春，美丽的小河和溪流重新奏出和平的乐曲。但是不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却永远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的力量，使帝国主义者无处可以安身。

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连影子也不见了。当年帝国主义者制造的“无人地带”，现在成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乐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选自《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

无 人 区[①]

船生退助

1941 年 12 月 21 日，我们中队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从河北省密云县西驼骨村转移到该县白马关，在这个村庄里整整驻扎了一年。白马关在密云县和热河省司营子相交界。这里，背靠长城，山峰连着山峰，地势极其险要，是个四五十户的村庄。周围有五米高的坚固城墙围着。在距离约百米的东面高地上，有几百年前用砖修建的一个大瞭望楼，瞭望着四周，像个大望远镜似的，是一个重要的据点。这里群山环抱，壁垒森严，对防备八路军的袭击来说，和以前在西驼骨相比简直是安

① 本文译自日文《侵略》一书，作者为当年的侵华日军。

全的场所了。因为我们把城圈里的中国人一个不剩地赶到城外,每天晚上可以安心地睡觉。为了执行新的任务,这里又是中心地点,所以,我们修了汽车路,交通也很方便了。

我们改修宿舍和对附近村庄的治安工作告一段落后,就已经到了1942年3月下旬。一天,中队长大野中尉,把中队仅有的14名下士官(班长)集合在中队事务室。当时,我睡意正浓。

“咚、咚!”我被敲门声惊醒了。

“谁? 进来!”我在被窝里大声叫嚷。

“分队长,队长叫你!”

“什么事情?”

“不知道,让你到事务室去!”传令的中村一等兵说完就回去了。

唉,刚刚搞了两天行军,昨晚上还说:“明天好好休息!”可是现在又来叫,我觉得很意外。恐怕是因为前天浅田小子把武器损坏了,要训斥我。前天浅田把步枪的撞针搞断了,害怕报告了挨我的打,就藏起来了,但被青柳上等兵发现。现在从小队长到队长都知道了,我丢了丑。想起这个事情,我就气得鼓鼓的,想跑过去狠狠揍浅田一顿。

我把军毯踢开站起来,从背包里抽出铅笔和信纸,朝事务室走去。快10点钟了,春天的阳光照耀着无云的晴空,天气已经有些暖和了,东面高地哨班的哨兵,已经换上战斗帽了。

走进事务室,三波中士和武田分队长正在看着墙上挂着的地图,好像有什么重大新闻似的,我也站到了他们旁边去看。只见图上是:以长城线为中心,两侧用粗红线分别画出几个圆圈,再用细线把其中的圆圈斜引出来;在上角印着两个红色大字:“机密”,下边写着“西南防司令作战命令(关东军西南防御司令部作战命令)第×号副图第×号”。指挥班长间濑准尉进来说:“队长有话,从现在开始,今后的作战行动。”……他这么一说我才察觉到,队长叫我和我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开始有些茫然了。

先任军官北里少尉,看到大家都来了,对刚提升的见习军官若僧生硬地说:

“喂,让间濑向队长报告去!”

间濑也没有回答就进了队长室。间濑从队长室回来,好像夹着作战命令和各种治安规定。大野抚摸着胡子也出来了,边坐下边点烟。

“这个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对中队来说是非常有干头的!”大野这些话既像是他很有抱负的自言自语,又像对我们嘱咐的口气。此时此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所说的这个新任务,是土匪越过长城线侵入滦平县,治安情况非常不好。为了使共产匪徒不能进行军事行动,消灭敌人的根据地,所以把这个地域搞成完整的无人区;同时还要对共产匪区的居民防止赤化,要完全切断他们和共产党、八路军的

联系。办法就是,长城以北这个地域的零散房屋,一间也不留,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指定地点,周围修起高墙,组织训练自卫团,发枪,防止八路军进村。关于这些任务,是根据伪满洲国政府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对司营子警察署直接下达的命令制定的。协和会也要为这个任务进行宣传,我中队有指导这个任务的责任。长城线以南和这个地域一样,一间房子也不留,全部烧掉,不允许种任何庄稼,就是一个中国人也不准住。如果发现情况,当做敌人枪毙……这个方法叫清室空野。这样做让土匪得不到粮食和无法宿营,我们可以建立起完整的治安。这是西南防御司令长官安藤忠一阁下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梅津阁下的命令交给我大队、中队的一个新的任务。

大野把墙上挂的无人区构成图,用桌上的尺量着说:"从明天开始,中队执行这个作战命令规定的方针:为了建立无人区,我们要进行扫荡讨伐,把所有房屋统统烧掉,追赶射击中国人。""布告:严禁从这里进入南边无人区,进入者不问任何理由枪毙!"这是司营子警察署立的牌子,已经过了半年,写着字的木牌都黑了,可是布告的内容还是清清楚楚的。已是9月下旬了,各分队长站在长城线上,冒着晚秋刺骨的晨风,围着这个布告牌在山上休息,等待着中队长的前进命令。

这是在白马关西南10公里处,是附近最高的山。山上处处露出浅黄色的岩石。山下几十条水流从长城线向东南淌去。这些大小水流,通过几道山谷,向司营子流去,经过白马关到密云,在一个大山谷里汇合。我们中队总是以这里的一个山谷为中心分三队前进。我们把这一带峡谷叫西百莲峪。当然所说的西百莲峪是一个村庄的名子,可是从清室空野以来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什么西百莲峪,连一个村庄的痕迹也没有了。要不是因为只剩下烧塌的残墙断壁,更无法辨认了。我是机枪分队长,和中队的指挥班一起下到这个峡谷。

"喂!那不是人嘛!"中队长指着南面说着。全班骑上马立刻前进。他拿着望远镜,盯着南边山上。我也停住脚拿起望远镜看,距离约300米处,有个留辫子的大男孩,在前面稍高的山顶上,利用杂乱东西掩藏着身体,只露出头向四外张望着。他那个老百姓模样,清清楚楚的映在望远镜里。"队长!是老百姓吧?可是有些奇怪,也许是八路军的瞭望哨!"我这么一说,大野命令:"开枪!"我平时以名射手自居,这时正是在部下跟前露一手的好机会,就拿起勤务兵的步枪,准备射击。这个老百姓好像发觉了什么似的,急忙向侧翼山谷逃去,一下子看不见影儿了。

"喂!畜生,看你还是怕死,逃跑啦!"我失望地把枪还给了勤务兵

"喂!指挥班,下面谷里有一间房子!和左侧高地的第二小队联络!"大野命令着。

"喂!吉泽少尉,和第二小队取得联络,命令卫生班长立即烧房子。"大野又说:"中队在那边地里休息!"

小队长吉泽少尉接受了命令,给我们作了指示。我带着斋藤上等兵及松田新兵,和第二小队联络,下到沟里100米处,我们见到有用丁字形围着的一间农屋。

按照那个作战命令开始行动以来，我们中队不断地到过这一带，附近连个小猫仔儿也看不到了，只有这间房子原样不动地剩下来，感到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又感到这是违背司令官的命令的。虽说到这里来过几次，也许因为地形复杂没有发现。但到底是队长作战有方，一眼就看见了这里还有房子；前天本部的松原中士来说，第一中队在全大队是成绩最突出的，现在又是队长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房子，今天把这间房子烧掉，中队又有成绩了，那我们分队……我边走边想。我对别人有成绩，或者觉得心里不痛快的时候，都怨恨队长，就好像自己部下挨揍，生一肚子气似的。“分队长，你在外边吧！”斋藤上等兵说着先进去了，在味道难闻的房门口，身体依托着左边的门框，把刺刀伸进院里；一面注意屋里动静一面向我报告。听斋藤那么一说，我怕万一有问题，赶快拿出十四年式手枪，把挎肩上的背带转到左手前边，一面作射击的准备，一面跑过去，提心吊胆地走进屋里。

“你——小孩吗？快走！”我拿手枪指着一个孩子大声嚷着。孩子后边炕上有个年龄很大的老人“哼、哼”地躺着。一个大孩子有 7 岁，估计是哥哥，还有一个孩子是弟弟，恐怕只有四五岁。小孩一边注视我，一边对老人说话，说些什么，我不明白。两个孩子都是长着红褐色的头发，乱蓬蓬的，穿的衣服只是破烂布挂在肩上，缠来缠去也没遮住一半肚子，脸上露有骨头，从下颚到脖子以及大腿上，覆盖着很厚的泥垢，好像黑漆一样。脸上有肿，没有血色，一看就知道是营养不良，脚和膝盖很大，很显然是大骨节病。脚和膝盖咯嗒咯嗒地颤动着，可是眼里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你这小子，还很神气呢，快走！”小孩像等着爷爷给指示的样子，又注意看着我，不断地向爷爷使眼神儿。在旁边站着的斋藤上等兵到他跟前说：“小孩子，快走！”他害怕地用脚蹭着地面。这时爷爷一使眼神儿，他好像带着爷爷的力量，拔起腿来，摇摇晃晃地躲开我们往外逃跑了。我们走近一看，这个“哼、哼”的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啊！这个老头是孩子的爷爷吧！”我心里估计着。他穿着破烂衣衫，炕上铺着谷草，在上边躺着，腰上扎着一条布带，胡子黑白相间，脸色发青，非常瘦弱，眼睛塌陷，有些慌张，身子不动，只是脑袋伸向这边，瞪着眼睛看着我们，使人感到害怕。他两臂无力地放在胸上，可是手却握得紧紧的。“哼、哼”的声音越来越大，震我的耳根。“这老头，耍花招，喂，有没有八路军？”这是我们抓到中国人时的习惯问法。我用左手的姆指和食指作成“八”字形质问，可是老人什么也不回答。

“喂，船生分队长，干什么呢？”吉泽小队长来这里检查情况，在屋前边吆喝起来。

“是！小队长，有个老糊涂躺着不起来！”

“点火，点火他就出来啦！”吉泽一边说一边只是把脸伸进房门看看，立即回到指挥班的位置去了。

“唉，我们是同年兵，给你点面子，何必这么啰嗦！这不是用手比划比划那么容

易的。”我这样嘟哝着。“这个犟老头，快走，这里一点吃的也没有，在这里干什么？若是不听日本军的命令，我们会不辞辛苦地每天都要来的！喂，斋藤、松田，把那边堆的高粱秸什么的都抱过来，堆好！”我指着站在锅台旁边的两个士兵下达了命令。

“是，斋藤以下两名去抱高粱秸！”斋藤复述着命令带着松田出去了。那时我开始想到老人是否把什么东西都藏起来啦！看看屋里，四壁徒空，没有任何一件家具，只是锅上有个用高粱秸编的锅盖，上边有一个白色茶碗，好像锅里有汤，还在冒着热气。打开锅盖一看，煮着半锅树叶和野草，黑乎乎地沉在汤下。“这家伙吃这些东西啊，住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他们什么也没有，只是每天采些树叶晒干后留着冬天吃。那么刚才在山上看到的那个人是这家的男人喽！我肯定这两个小孩和老头做不了什么事情；但从那个男的在山上监视我们的情况来看，还是和八路军有联系的，留下这口锅会给八路军利用。砸碎了事。”我一边想，一边把手枪装进套里，门口有块大石头，两手抓起来对准锅灶砸去，一声巨响，锅碎了，汤流进灶坑的火里，发出吱吱的声音，白烟和灰混在一起，冒到上边飞散。我觉得有些恶心。

斋藤和松田把步枪背带挂在肩上，把抱来的高粱秸、谷草和木柴堆好了，恰好堆了有齐胸高，老人觉察到祸事临头了，但仍躺着不动，只是脸朝着这边儿仇恨地注意着我们的行动。

“斋藤，够了！”说着我从上衣兜里拿出火柴。“喳喳”，把点着的火柴放在柴堆下边易燃的谷草里，一面看着老人态度的变化。可是他还没有起来。烟开始从堆积很厚的草里滚滚升起，一冲到天棚，就突然扩散了。

“喂，在天棚上点火！”我一面命令斋藤和松田，一面用燃烧的谷草照亮，从炕上往天棚点火。几条火柱爬到干透了的天棚，集中到中间梁上钻进屋脊里边。

“喂，出来老头！”我叫着。这时，斋藤和松田脸上表现出：“老人若是早出来就好啦，可他就是不想从屋里出来。”他俩已退到外边，我的脚却放在门槛上，窥视着里边的情况。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手枪取出来放在身后，上半身仍伸进屋里。

“哎呀！哎呀！”烟已把老人的身体遮盖住，他嘴里说着：“妈的！”突然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右手支撑着上身坐了起来，他的半个肚子都是灰黑的，两眼直直地盯着我。“你们侵占我们几千年悠久美丽的山河和长城共荣的故乡，还要夺去我的生命吗？”老人好像这样叫喊着，他用支起的两手抓着谷草，紧紧地闭着嘴，抽搐起来，下颏的胡子微微颤动着。

“妈的，叫你们杀吧！”看出来是对我们强烈的反抗。老人拼命地挣扎起来，半个身子离开炕面，“咚”的一声两手扑到坍塌的锅台上，滚落到燃烧着的大火旁，火几乎把他的全身盖上啦。浓烟在翻滚，烈火在燃烧，可是却听不到老人的动静了。“弄成这个样子，叫你出去你为什么不出去！”可是我心跳、头晕，想克制自己，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火已经把这个屋子完全吞噬了。

我跑了出去。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藏着的两个小孩，也跑出来了。

"着火啦,爷爷!"他们叫着,大声喊着,像乞求神仙帮助他们以的,两眼朝天哭喊着。他们跑进屋里,想解救老人,但是火从天棚上落下来把老人和孩子隔开了,火把孩子的身体完全盖住。

"哎呀,畜生,要烧死的,快到屋外来!"可是两个孩子谁也不听,哥哥进去了,弟弟也进去了。两个人轮换着进进出出。"唉,把那个老头杀了,小孩子留下不合适。"我又想起刚才在山上逃跑的男人来。"不,为了确立治安,应该搞得更彻底些;为了中队的成绩……我们今天是有功绩的。"这些想法给了我决心。"喂,斋藤,给我打!""班长! 打吗?"

"嗯! 队长说过,在无人区的人都要枪毙!"我又那样命令着。斋藤无法反问。也许他在想:"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眼前又有新兵松田,执行命令就是了。"于是他把枪架在土墙角上瞄准小孩。是哥哥的那个小孩走到锅灶前又往回走去。

"砰"的一声,小孩躺在了灶旁,用右手抓住锅台……

"松田,这回该你啦!"松田有些动摇不定,也许他提心吊胆地想:不叫自己干多好。可是,我训斥他:"快干!"他慌忙端起步枪,连保险也没有打开,枪栓咯嗒咯嗒地左右转了两三遍,就是拉不开。

"混蛋,往左扭,快干!"像是弟弟的那个小孩看见哥哥倒下,要跨过门槛跑过去。我想:"那个小孩不知道害怕吗?"他靠近哥哥身边,刚刚弯下腰的时候,房梁突然掉下来,把他掀了个脚朝天,正当他拼命挣扎的时候,"砰"的一声,就倒在哥哥的身旁……

1942 年 9 月 24 日,船生分队的成绩:"消灭山里农民一个,烧毁房屋一间,遗弃通匪嫌疑者尸体 3 具。"这是由户日中士亲手记载在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第十七大队第十中队的军中日记里的。

佟顶力译　李运亨校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

木村光明笔供

(1956 年 6 月 15 日)

被害人赵奎等七人和被害人亲属杨保玉等七人的控诉书及当地居民王盛德、王盛君等十二人的书面证词和查问笔录十四份,通过翻译读给我听了。没有差错,

全部都是事实。

我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旧历五月二十一日]在承德宪兵队本部任特高课长时,正如上述材料所载,捕杀中国人民,命令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的同时,我也亲自到当地指挥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派遣宪兵队、宽城警察讨伐队、满军宪兵和协同宽城日本军讨伐队,在青龙县九虎岭村抓捕了中国抗日工作人员和中国和平居民刘殿福等百余人,带到宽城派遣宪兵分队扣押,经灌凉水、灌煤油、殴打等拷问后送承德法院加以迫害。此事实,我负全部责任。

关于我以上所犯罪行,请被害人给我予严厉的处分。

木村光明笔供

(1956年6月4日)

一九四三年一月,喜峰口宪兵分队所属宽城宪兵分遣队(又称临时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在青龙县的九虎岭村,有八路军迁青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举行会议,组织当地居民进行抗日救国工作。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笠井向承德宪兵报告了上述情况。于是,宪兵队长和我即由承德前往宽城。当时关东宪兵司令部的长发大佐也来到承德地区巡视,了解宪兵活动情况及对付共产党的策略等,他也同我们一起到了宽城。由于抗日力量强大,队长命令我统一领导指挥进行镇压。我打电话将承德宪兵分队调来分队长生田和宪兵六十名,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长岛玉次郎及部下宪兵四十名,加上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笠井及其部下宪兵六十名,共一百六十名宪兵,分批前往九虎岭地区。我和笠井分队长率部下由西方前进,南方是长岛分队,东方是生田分队,都伪装成去捕鱼的样子。第二天拂晓到达目的地,因天未亮,我用电筒指挥包围了居民房屋,按计划进行抓捕,共抓了一百五十名左右的当地居民。在搜捕时,八路军工作人员逃跑,被枪杀了五名,是在九虎岭的北方。当天晚上,我在宽城命令笠井分队长负责领导拷问,我就回到喜峰口。这些被捕的人全部押在宽城进行拷问。事后据笠井报告,因严刑拷问致死十一人,我告部下,以“战斗中射杀”名义报告上去。一个月后,被捕的人大约七十名左右被送到伪承德检察厅,交法院审理判决,结果不详。

以上是由我亲自指挥或参加指挥所犯下的罪行。

桥本岬口供

（1954年5月21日）

问：现在你讲一讲，你在伪满西南地区、热河讨伐中，特务宪兵队破坏抗日地下组织，逮捕、刑讯、杀害和平居民及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的罪行。

答：在热河省的西南和南部地区，抗日地下组织很多，所以当时我命令指挥各特务宪兵工作队，把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当成特务宪兵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我任职期间，对承平宁县等抗日地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与和平居民进行了4次大逮捕，共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990余人。经过审讯后，将其中580余名送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特别治安庭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的名义判决了。其中判处死刑者50余人，判处徒刑者530余人。

我命令部下逮捕、杀害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事件的具体罪行是：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对光头山八路军高桥部队、武光部队、包部队进行包围袭击之后，在一九四二年农历腊月三十日深夜，我与混成第八旅的参谋，计划消灭光头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但当时来不及做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的侦察工作，就命令永井工作队的特务宪兵与黄土梁子地方警察共60名，在伪满洲国军大崎部队协助下，把光头山南侧附近地区所有成年男子全部逮捕起来送到黄土梁子警察署。这次共逮捕了当地和平居民与抗日地下工作人员520名，由宪兵警察严刑审问了10天，将其中210名送至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同时在光头山西南地区，我命令滨内宪兵工作队依照事前已侦察好的情报，在当地警察及伪满洲国军白井部队的协助下，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80名，刑讯4天后，将其中60名送至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命令驻青龙的白工作队，在日本宪兵分队指挥的伪满洲国警察讨伐队的协助下，逮捕了青龙至平泉公路两侧的青平凌县抗日地下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共130名。在日本宪兵队审问后，将其中110名送至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命令永井工作队在平泉日本宪兵分遣队指挥下，在当地警察、伪满洲国军队协助下，对黄土梁子、八里罕等地光头山东侧地区承平宁抗日县

政府的地下组织的工作人员与和平居民共120名予以逮捕,经严刑审问后,将其中80名送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命令滨内工作队在当地警察、伪满洲国军协助下,在光头山西侧三家等村逮捕了承平宁县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与其有联系的和平居民共140名,经刑讯后,将其中120名送至伪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伪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问:你把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破坏和平居民生活的罪行和你的责任讲一讲。

答: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我以特务宪兵队长及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会议,参与集体策划和亲自命令指挥部下执行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的罪恶计划。同年十月,在沿长城线的北侧,由山海关至独石口的约400公里长、5公里至20公里宽的地区内执行了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的罪恶计划,毁灭了数百个和平乡村,毁灭了10 000余户和平居民的房屋和土地,约有50 000余名和平居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旬,我和丰宁伪满洲国军警备司令等人亲赴设置的"无住禁作"地区视察,并口头命令我部下滦平长谷川工作队、丰宁佐佐木小祝工作队积极执行设置"无住禁作"地带计划。仅滦平、丰宁两县被毁灭的和平居民房屋和土地约有2000余户。在丰宁白草村一带村庄设置"无住禁作"地带时,拆烧和平居民房屋2000余间。

我作为伪满洲国西南地区的特务宪兵队长和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同意并支持了实施"无住禁作"地带的罪恶计划,会后又命令指挥我的部下在丰宁、滦平长城沿线积极地执行了这一计划,致使和平居民失去了房屋和土地,遭到了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残害。对这惨无人道的罪行,我应负参与集体策划和亲自命令指挥与执行的责任。

问:你讲一讲,你对逮捕的抗日人员、和平居民用过什么刑讯逼供?

答:我确认,我命令指挥特务宪兵队确实用过绳捆、脚踢、木棍打、灌凉水、灌辣椒水、灌煤油、香烟头烧、铁火钩烙、四马倒蹄等刑讯手段。在刑讯时被当场打死、打伤之后不久死在家里或者死在狱中的人也不少,但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在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中有很多是当地和平居民,而在刑讯中不得已而招认为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的。

问:你讲清楚,你的特务宪兵队怎样进行活动及与伪满军、警察的关系?

答:当时特务宪兵队各工作队为了搜集情报,"扫荡"攻击八路军,镇压、逮捕、屠杀抗日人员与和平居民,经常化装便衣出去,进行秘密的罪恶活动。经常和伪满洲国军及警察取得联系,配合监督他们行动,听取他们的报告。特务宪兵队的情报是指导伪满洲国军队及警察行动的决策依据。至于特务宪兵对和平居民任意抢劫、敲诈、逮捕、拷问等非法行为,具体事件我虽记不清楚,但从人民的反映中,我相

信是很多的。

问:你任伪满西南地区特务宪兵队长及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的整个时期的罪行,你应负什么责任呢?

答:我以特务宪兵队长及西南防卫委员的身份命令指挥部下对八路军搜集情报,并指导配合伪满洲国军与警察讨伐部队对八路军袭击、扫荡了100余次,给八路军损失甚大。同时又命令、指挥部下积极参加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破坏了和平居民的生活。并在伪满洲国军队的协力之下,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大肆逮捕、杀害的罪恶行为,我是应该负命令、指挥并亲自参与的全部责任罪行的。

高木贞次郎等20人笔述①

(1954年12月27日)

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南地区进行治安肃正的各机关:

西南地区是伪锦州省的锦古线以西地区,伪兴安西省以西地区的一部,是关东军在热河省及河北省的行动地区。我们所供述的,就是以最大规模进行的以治安肃正为名的三光政策,它遍及长城沿线的热河省和河北省的抚宁、迁安、蓟县、平谷、密云、永宁等与热河省邻界的所谓关东军的行动地区。

实施治安肃正的期间,大约是一九四〇年四月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战败为止。

在西南地区进行治安肃正的目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对中国的东北的殖民统治,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丰富的资源,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战争利润,大肆镇压、屠杀成为在西南地区进行活动障碍的中共党军政各机关、部队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抗日人民群众,摧毁人民解放据点,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力量。

西南地区治安肃正方针是,将关东防卫军及伪满军、行政、警察等的主力集中于热河省内,以讨伐、制造无人区、集家、镇压人民、经济封锁等手段,切断八路军的

① 参加笔述的20人是:宪兵准尉高木贞次郎、宪兵大尉长岛玉次郎、宪兵军曹植松猶数、宪兵曹长太田秀清、宪兵曹长石田一雄、宪兵曹长具沼一郎、宪兵军曹原田左中、宪兵准尉木下万寿一、宪兵军曹大岛光、步兵军曹高桥正三、步兵曹长小林实、步兵曹长船生退助、步兵伍长西尾克己、步兵曹长阿部清二、步兵上等兵齐藤良雄、执行警尉板垣友吉、监督警尉元山胜美、警尉远藤清重、宪兵少佐木村光明、监督警尉小林芳郎。

供应线，摧毁据点和领导机关。为此，在西南地区统一了各种镇压机关，设立了阴谋策划和实施治安肃正的伪西南防卫委员会。

一、在西南地区实施治安肃正的机关：

1. 西南防卫委员会

（一）西南防卫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战败为止。

（二）西南防卫委员会是为实施三光政策获得成果而成立的，统辖西南地区的各镇压机关。

（三）西南防卫委员会的组织系统、委员姓名，如附表一。

（四）西南防卫委员会，受西南防卫司令官监督，是热河地区有关治安肃正重要事项的审议机关。

（五）任务：

（1）适应西南地区军的防卫计划，制定警护计划，调整治安肃正工作中需要统制之事项；（2）关于配合西南地区及军的防卫，进行警护训练或检阅，联系和调整有关事项；（3）宣布西南地区防卫令和临时实施的防卫布告，根据布告调整必要的警护事项；（4）其他有关防卫法的运用、联络及调整所需事项；（5）关于军事警察情报和治安情报搜集、联络事项；（6）有关防谍（包括共产党、思想对策）情报和资料研究的联络事项；（7）关于警卫、警戒，日、满机关（警务机关）共同服务所必须的警察事务的联系、调整事项。

二、基于以上任务，由西南防卫委员会审议的“关于治安维持或紧急状态下统制调整之重要事项”是：

1. 三光政策的重点地区，实施方针、要领、以后的对策；
2. 无人区的划定、实施要领、规定禁止通行标志；
3. 拟定集家部落实施要领、移民计划、建立武装防卫部落；
4. 河北省境长城沿线的经济封锁；
5. 宣传、报导计划；
6. 规定禁止耕作区域；
7. 兵营修建计划；
8. 修筑警备道路、电话网的计划；
9. 强制征用劳动力计划；
10. 物资统制，粮秣、家畜的强制征用；
11. 掠夺民间武器计划；
12. 鸦片耕作区的种植计划；
13. 不在地主的土地处理计划。

防卫委员会主要审议和决定以上各种事项的原则。

西南防卫司令官根据其决议，分配给委员所属各个镇压机关适合其性质的任

务。各镇压机关拟出具体计划,命令属下各机关实行,并进行监督。然后,防卫委员会再总结研究其结果,拟定处理对策。

西南防卫委员会的议案由各委员提出,也有的是西南防卫委员长根据中央防卫委员长的命令提出的。

议案由防卫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再由西南防卫司令官作为命令下达给军、行政、警察、铁路警护队等机关,由其执行。

西南防卫委员会下分委员会和干事会。委员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如有紧急重要问题时,临时召开会议;如属秘密事项,则仅限有关镇压机关的委员、干事参加,不让中国人委员参加会议,这是惯例。

干事会议大致每月召开一次。

军、行政、警察、铁路警护队各机关的组织、人员、任务等,如附表二。

以上是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西南防卫委员会列席委员宪兵大尉木村光明参加委员会,和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长岛玉次郎宪兵少尉、古北口宪兵分队长列席一次会议听到的事实。

佐古龙裕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任伪锦州铁路警护本队长期间,以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策划西南地区治安肃正活动,木村光明也列席防卫委员会。

三、西南防卫委员会召开日期、地点、出席人员、主持者、决议事项: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热河省承德防卫司令部,召开西南防卫委员会。

出席者:如附表一,除全体委员、干事外,列席者共约六十余名,包括长岛玉次郎。

主持者:西南防卫军司令官、西南防卫委员长陆军少将安藤忠一郎。

决议事项:

1. 制造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重点地区:青龙县都山、五指山,兴隆县五龙山,喀喇沁中旗,长城沿线宽六公里至八公里,青龙县中心山、梁花山、瀑河口,承德县鞍匠、小白旗、两家,滦平县长山峪至四海峪交通线。

2. 重要施策:以分离军民、摧毁根据地为目的,制造无人区和集家并村。

对审议各项目的执行原则和方法:

日军、伪满军、警察队,讨伐镇压地区内的八路军、游击队等武装势力。宪兵、伪警察、铁路警护队、特别治安庭等镇压机关,对中共党政机关、组织和群众进行镇压。伪行政机关、协和会,要伴随讨伐、镇压,进行欺骗宣传,强制集家移民。

根据一九四一年春决议,滦平、丰宁、青龙、承德等各县境的长城沿线地区,已按上述方法实行,在会上由伪热河省次长报告了滦平、丰宁各县的完成情况。日、伪满军讨伐队长报告了随着集家、制造无人区所进行的讨伐情况。宪兵队长、警务科长、铁路警护本队长报告了镇压人民的情况。

如上所述，佐古龙裕以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伪锦州警护本队长身份，于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每次召开西南防卫委员会时，亲自或派部下出席，参与讨论策划有关西南地区治安肃正的问题。西南防卫司令官根据会议决议，命令热河地区内日、伪军、行政、警察、宪兵、铁路警护队、特别治安庭等镇压机关执行，结果如下：

（一）军事讨伐的罪行

1. 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河北省北京北方青柳桥，由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三十名，同八路军约一百名作战，打死八路军战士约十四名，和平农民一名。

2. 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河北省北京北方青柳桥，由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三十名，包围了八路军六名，打死二名。

3.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在河北省遵化县撒河桥，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第一中队等一百名，同八路军作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一名，农民两名。

4.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青龙县峪耳崖，伪警察队马大队一百五十名和于警察队四十名，同八路军约五十名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五名。

5. 一九四一年四月，在兴隆县茅山，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下道中队五十名，同八路军十三团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十二名。

6. 一九四一年四月，在兴隆县倒子峪地区，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下道中队长等一百名，同八路军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九名。

7. 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八月，在河北省曹家峪地区，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中山中队长等八十名，同八路军交战二次，打死八路军战士约二十五名，农民七名。

8. 一九四一年六月，在兴隆县半壁山地区，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下道队、伪警察约有三百名，同八路军十三团三百名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二十四名。

9. 一九四一年八月，兴隆县倒流水地区，十三大队下道中队长等一百名，同八路军交战，打死八路军二十二名。

10.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滦平县境琉璃庙，伪警察队马、姜大队三百名，将八路军六十名包围攻击，俘虏八路军十名，送交汤河口日本军。

11.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滦平县琉璃庙，伪警察队马、姜大队约三百名，同八路军六十名交战，打死五名八路军。

12.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河北省密云县转山会，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长中川中尉等二百名，同八路军约六十名交战，将其全部打死。

13.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河北省蓟县刘家河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约七十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约三百名交战，打死约二十名及农民三名。

14.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密云县唐道甸子，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四中队长等七十名，和八路军约一百名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约五十名。

15.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兴隆县半壁山下杖子，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中川中尉等二百名，同八路军二百名交战，打死八路军十二名。

16.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河北省密云县曹家店，独守守备队十八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同八路军约五十名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二名，农民三名。

17.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丰宁县乌尼河子村，大滩特别警察队马队五十名，同八路军五十名交战，打死战士一名。

18. 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兴隆县徒子峪罗家口，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一中队、四中队约二百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约六百名交战，打死二十名（当时听说单团长负伤）。

19.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兴隆县茅山村杨家窝铺，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等六十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约二百名交战，打死战士四名。

20.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丰宁县大滩驻扎的伪军骑兵四四团约五百名，于内蒙古独石口南方五公里，同八路军约三百名交战，打死战士约三十名。

21. 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在兴隆县茅山村屯子沟，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约九十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约一千名交战，打死战士约二十名，农民一名。

22. 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青龙县九虎岭，日本军土屋部队二百名、宪兵第三游击队笠井中尉等一百二十名，合力攻击中共迁青平基干队约三十名，杀害了迁青平县长张某等十五名。

23.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河北省蓟县黑水湾，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约有七十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基干队约一百名交战，打死战士十二名。

24. 一九四三年四月，在喀喇沁中旗七沟村，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三中队一小队铃木少尉等六十名和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等一百名进攻黄枪会，打死约四十名。

25. 一九四三年五月，在青龙县党俱村荞麦庄，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约一百名，同八路军约三百名交战，打死战士五名。

26. 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兴隆县板城村，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三中队中根队八十名，同八路军约二十名交战，打死一名。

27. 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在青龙县果花山地区，由金井塚部队一百二十名、伪警察队一百二十名，对八路军第十二团约二百名攻击，打死战士十一名。

28. 一九四三年五月，在滦平县长山峪，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三中队一百名，同八路军约三百名交战，打死战士约三十名。

以上二十八次战斗，共打死八路军战士四百五十二名；俘虏八路军十名，以后全部杀害；打死和平农民十七名。

（二）镇压中国人民的罪行

1. 一九四一年八月，在滦平县汤河口，由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齐藤中尉等六十

名、日本军独立守备队八十名、伪滦平县警察一百名,对大峪地进行大逮捕,逮捕了中共丰滦密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一百四十名,其中一百二十五名送至承德伪法院,进行刑讯,杀害五名。

2.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河北省蓟县黑豆峪靠山集,由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等八十名,打死一名八路军工作员,逮捕和平农民六人,交配属宪兵审讯,结果不详。

3.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察哈尔省赤城县,由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长宫崎大佐等约三百名,配属宪兵关口准尉等八名,逮捕中国抗日农民约二百名,送伪法院约一百名,投狱。

4.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兴隆县徒子峪村、塔洼、金山,由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等约七十名,逮捕矿工十六名,全部屠杀了。

5.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河北省密云县马营,由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烧杀中国和平农民一名,又在唐道甸子烧杀小孩一名,活埋中国人一名。

6.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滦平县琉璃庙地区,由伪警察队马队长等五十名,逮捕枪杀八路军工作员一名,村长一名。

7.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二月,在兴隆县五龙山,由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中山大尉等一百二十名,逮捕八路军工作员二名;在密云县曹家路逮捕八路军九名;在青龙县冷口逮捕八路军工作员一名,在当地斩首或枪杀。

8. 一九四二年四月,在兴隆县大道河,由承德宪兵分队长永山中尉等六十名,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八十名,伪兴隆警察队一百名,逮捕滦承兴县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约一百五十名,其中拷问致死二名,将一百三十名送承德特别治安庭,其中四十三名处死刑,八十七名判处徒刑投狱。

9.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兴隆县八品岭,由承德宪兵分队兴隆派遣宪兵十一名、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长原队八十名,逮捕中国农民两名。又在河北省遵化县野户山逮捕中国农民三十名,均系中共蓟遵兴县政府领导的抗日人民。将其中二十二名送伪热河省承德法院,五名处死刑,十七名判处徒刑投狱。

10. 一九四二年七月,在河北省密云县燕乐庄地区,由独立守备队七大队长等三百名,协助古北口宪兵分队长等三十名,逮捕中共丰滦密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一百六十名,其中二名被刑讯致死,约三十名送交伪承德治安庭。

11. 一九四二年六月,在青龙县潘家口,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等五十名、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逮捕中共迁青平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七十名,其中约有五十名被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

12.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古北口的热河第一游击队长等约八十名,以中共丰滦密县政府领导抗日为由,在河北省密云县新城子村马厂北方一公里的村庄,逮捕中国农民五名。又在兵马营地区逮捕二十名、新城子村逮捕六

名,共逮捕农民三十一名,送承德特别治安庭,其中处死刑七名,处十五年至二十年徒刑十九名,十年徒刑五名。

13. 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喀喇沁中旗光头山东边地区,黄土梁子至五化,由伪满特务宪兵队长桥本岬等六十名,及混成步兵八旅约五百名,逮捕了中共承平宁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五百名,其中二百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

14. 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承德县新杖子地区,由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大尉等一百二十名,逮捕中共滦承兴县政府领导的中国人民十五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

15. 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承德县承德街南方滦河流域村庄,由古北口第一游击队长等一百名,以镇压抗日组织为目的,逮捕中国农民约一百六十名,其中二十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六名被处死刑,十四名判徒刑投狱。

以上镇压中国人民共十五次,逮捕一千四百九十八名,其中在当地残杀的三十四名,刑讯致死九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的七百二十三名,其中处死刑的六十一名,一百四十二名投狱。

上述事实是我们直接参加的,也是我们全部罪行的一部分。

(三)集家及制造无人区的罪行:

1. 一九四一年九月,日本军一八六部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在滦平县对大峪,为制造无人区,烧毁中国人民房屋十五栋。

2. 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二月间,日本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在河北省密云县西驼骨至马营附近,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三十六栋。

3. 一九四一年十月,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以下七十名,在蓟县长城沿线地区,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十六栋。

4. 一九四一年二月,在兴隆县徒子峪,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约四十名,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三栋。

5.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兴隆县半壁山下杖子,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长等二百名,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一百五十栋。

6.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附近,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一百五十栋。

7. 一九四二年三月至十月,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天野中尉等一百名,为设置十一个集团部落,在滦平县司营子村长城沿线地区,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一百五十栋。

8. 一九四二年一月,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天野中尉等一百名,在滦平县司营子至白马关地区,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二十三栋。

9. 一九四二年四月,在兴隆县地区,由承德宪兵队长等六十名,放火烧毁了中国人民房屋约一百栋。

10.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兴隆县猫儿屯,由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长谷川准

尉等二十名,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五栋。

11. 一九四二年十月,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二百一十栋。

12. 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等约一百名、兴隆县伪警察队约六百名、伪热河省协和会青年游动宣传队十名,在兴隆县徒子峪村至四座楼、塔洼、茅山村至前干涧、三六盘、瑞昌山,三拨子村至张帽子山、五指山地区,烧毁中国人民房屋约五百栋,造成无人区。

13.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长等一百名,在承德县鞍匠村小白旗地区,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约四百栋。

14.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二中队等一百二十名,在青龙县都山南方地区,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四百三十四栋。

15.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由独立守备队七大队长小川大佐等三百名,伪军步兵八旅约三千名,在喀喇沁中旗光头山周围地区,烧毁中国人民房屋约五百栋。

16. 一九四三年五月,承德宪兵团第二游击队长生田大尉等一百五十名,在喀喇沁中旗光头山南侧南榆树林子地区,烧毁中国人民房屋约二百五十栋。

17. 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九月间,丰宁县警察队约三百名,在丰宁县内,将中国人民四万五千人的九千余栋房屋毁弃,在八十处强行集家并村。

18. 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十月间,将滦平县汤河口村至大峪公路沿线十个村庄房屋约五百栋毁弃,强行到四个地方集家,使中国人民五千名受到损害。实施者为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笠井中队约二百名,伪滦平县警务科及协和会。

上述为制造无人区和强行集家,共放火十八次,烧毁中国人民房屋计二千九百四十二栋,破坏九千五百栋。这是执行西南防卫委员会决议的结果。

(一) 119—2,25,2,第9号

太田秀清口供

(1954年10月14日)

问:你志愿转入宪兵后,在承德地区犯有什么罪行?

答:我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于新京关东宪兵队教习队毕业后,就在承德宪兵分队大阁镇派遣队、兴隆派遣队当上等兵、伍长、军曹。在这个期间,我根据上级命令犯了如下罪行: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当承德宪兵分队警务系上等兵时，为了逮捕中国抗日爱国者，受承德宪兵分队长谷川少佐的命令，同宪兵、警察、日本军队在承德下板城一带逮捕中国抗日爱国者二百余名，经审讯后将其中之十八名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庭判刑下狱，其他全部释放。在这一集体罪行上，我亲自指挥十名警察逮捕了十五名中国抗日爱国者，捕后加以监禁、看守，并押送判刑之十八名到承德监狱。十月间为了逮捕违反治安法的中国人，奉警务系班长的命令，于热河承德街迎宾胡同，将一名二十岁左右的中国青年逮捕审讯三十多分钟，之后，承德分队长命令分队其他宪兵送承德地方检察厅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一九四一年八月，我任大阁镇派遣宪兵伍长时，奉命将拘押之三名中国抗日地下工作员，绑缚交给派遣宪兵长关口准尉。当时由于派遣队转移，关口准尉就在丰宁县大阁镇街东北方约三百米处开枪射杀，但未死亡，我又用十四年式手枪将这三名中国抗日人员打死。八月上旬，为了逮捕中国抗日爱国者，我以大阁镇派遣宪兵伍长的身份，增援汤河口派遣队，当时在古北口分队长齐藤中尉指挥下，于汤河口一带参加逮捕四十余名中国抗日爱国者，逮捕后利用灌凉水、上大挂、棍棒殴打等进行刑讯，当场我用棍棒打死两名，十名送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二十八名判处有期徒刑。八月中旬，在汤河口东北方十公里的一带地区，在齐藤中尉的指挥下，又逮捕了一百余名中国抗日爱国者，押在汤河口警察署内。在刑讯中，由于我使用棍棒殴打施行过重，在拘留所内死亡三名，余者经过刑讯后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二十余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六十余名，其他的押有两个星期释放回家。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任兴隆派遣队伍长时，由盘踞于兴隆一带的日军第八八一部队组成之军警宪联合作战游击队，在兴隆县长城线一带讨伐中，逮捕了三十岁到五十五岁的中国抗日爱国者三百余名，押在兴隆县警察署内。当时，我受派遣宪兵长内田准尉的命令，同西泽、岩冈军曹对这些人进行了上大挂、棍棒殴打等刑讯。结果，有五名由于严刑逼供而死，两名被砍杀，四十名送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一百六十名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在这一罪行上，以审讯员的身份，亲自刑讯了七十五名被捕者，其中虐死五名，受命用军刀砍杀一名，经我提出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书面意见十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四十名。

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我以兴隆派遣队宪兵军曹的身份，在承德宪兵分队长永山中尉指挥下，同宪兵四十名、警察一个中队、日本军一个中队，根据兴隆派遣宪兵、兴隆县警务科的侦察情报，在热河省兴隆县六道河子村一带逮捕了中国抗日爱国者一百五十名，关押在兴隆警察署内，在派遣宪兵长关口准尉的指挥下，我和西泽军曹、山住伍长对被捕的全部人员进行上大挂、棍棒殴打的刑讯。在刑讯中，我殴打致死二名。其他的经审讯后有四十三名送交热河特别治安庭兴隆法庭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八十七名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十八名释放回家。

问:你把充任协力宪兵长时期的任务讲一讲。

答:我在充任兴隆派遣宪兵军曹期间,曾三次临时配属在部队当宪兵长。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一月,配属在日本关东军小川队第四中队,历时十五天;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上旬配属在关东军第八八一部队长原中队,历时一个月;第三次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仍配属在第八八一部队长原中队,一个多月。在这三次的将近三个月期间中,我的任务主要是配属于部队在河北省的密云、遵化,热河省的兴隆县牛圈子等地和部队共同搜集抗日军的情报,以便必要时,宪兵和部队联合镇压中国抗日爱国者。

问:你在上述期间都犯了哪些罪行?

答: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小川部队第四中队当配属宪兵长时,于河北省密云县华山庄,我和盘踞在华山庄的日本军于华山庄南方前北官村讨伐中,亲自逮捕了中国抗日地下联络员三名,用棍棒殴打两小时后,附上判处死刑一名,十年以上徒刑二名的意见书,送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处理。

一九四二年五月,我配属在第八八一部队长原中队时,我和长原中队的一个小队一起在兴隆县牛圈子村南方六公里的村庄内,进行了五天的讨伐,在这期间,以我个人的意愿,在小队的协助下逮捕了河北省遵化县野户山村抗日救国会的中国抗日爱国者三十余名,捕后押至牛圈子村,我亲自用电刑讯,并对抗日救国会会长、武装委员、办事员等三名提出判处死刑的意见书,对其他十七名提出判处徒刑的意见书,送交热河特别治安庭杀害和入狱,其余十名关押一个礼拜释放回家。

问:你继续讲在承德地区任职中所犯罪恶事实。

答:一九四三年四月上旬,我任日本关东军承德分队特高系特务军曹时,承德监狱扣押之四十五名中国抗日爱国者被命令进行集体屠杀。当时我受内田准尉的指挥和其他二十名宪兵一起赶赴承德小西街承德火葬场南二百米之地点参加了这一集体屠杀,屠杀后将这四十五具尸体埋在现地。我在这一集体屠杀中,亲手砍杀了两名。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奉承德分队长生田大尉的命令,以承德宪兵军曹的身份,和其他九名宪兵增援平泉宪兵分遣队,在平泉分遣队长远藤准尉的指挥下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参加逮捕了中国抗日爱国者一百三十余名。逮捕后,我就回到承德分队,处理结果不详。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我当平泉宪兵分遣队警务系军曹时,为了大逮捕中国抗日爱国者,受赤峰宪兵分队长、平泉宪兵分遣队长的命令,我和野崎军曹与平泉警察署取得联系拟定了逮捕计划,因而在分队长、分遣队长的率领下于热河喀喇沁中旗黄土梁子及洼子店地区逮捕了承平宁联合政府抗日爱国者二百余名。逮捕后在分遣队长木下万寿一的指挥下进行严刑拷问,审讯后将抗日爱国组织领导干部阚凤株等十二名送平泉特别治安庭判处死刑,五十三名判处有期徒

刑,余者全部释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当青龙宪兵分队建昌营派遣宪兵长时,为了逮捕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亲自指挥部下二十余名于河北省迁安县建昌营镇东南方五公里,命河野军曹逮捕了一名三十五六岁的和平居民,当经殴打刑讯后命河野军曹将其虐杀,尸体放在原地。

问:你在承德地区任职期间,除刚才所供述之罪行外还犯有什么罪行?

答:除刚才所供的主要罪行外,我在承德地区军事讨伐中,为了防止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于滦平、赤城、遵化、兴隆、迁安等地还犯有放火烧毁民房四十九所和掠夺价值九万五千三百七十五元的中国人民财产。除此,检查盘问了中国人民五千四百二十余人,殴打了四百八十余人。

(一) 119—2,435,1,第4号

植松猶数笔供

(1954年8月1日)

罪行

一、杀人。

1.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黄昏前后,于热河省承德街东侧武烈川下游河畔,我以日本关东军承德宪兵队兵长的身份,奉分队长永山中尉的命令,将在伪承德监狱中的八路军冀察热军区第十三团某连二十五岁左右战士七名,由牢房提出,用载重汽车运到武烈河畔,然后命被害者一个个跪在已经准备好的坑前,几名宪兵按照次序,用日本刀砍头,杀害了这七名八路军战士。跪在第三坑前的一名战士,被我用日本刀由背后砍头杀害,我并用脚把被害者的尸首踢进坑里。

2.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六时许,于热河省兴隆县兴隆街西南长城线茅山至黄崖关中间疏散的村庄道路上,日军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宪兵一百四十名,按特高课长木村光明指示"在赤化地区,必须彻底的扫荡肃清,不留一草一木"的方针,将未及躲避宪兵偷袭,仍留在村里的病人、老人三十五名和吃奶孩子四名,共三十九名中国人全部屠杀。为消灭罪证,烧毁了被害者的尸体。我奉生田队长的命令,分队长水野军曹、高桥兵长、田中兵长、尾崎和我(兵长)五人,将村中星散房屋里的卧病老人和怀抱幼儿的妇女,强制拖出,领到山里狭窄道路上,将他们两手用绳子绑上,命他们就地坐下,我用日本十四式手枪两支,枪杀了

年四十五岁至六十岁的妇女九名、六十岁左右的老翁五名、两岁左右的小女孩一名,共十五名解放区抗日人民。其余二十四名,被同伙宪兵全部枪杀,并用附近的高粱秸和蒿草盖在被害者的尸体上,洒上油类,放火烧毁,然后逃离现场。在这次罪行中,我主动屠杀了十五名无辜的和平人民和吃奶的孩子,并亲自动手将尚未死的被害者两、三名烧死,犯了超过魔鬼野兽的惨无人道的屠杀罪行。

3. 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前后,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东方——三道河子中间的山里,发现有中国人的零星房屋,我以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扫荡系伍长的身份,不等派遣队长山田恒雄的命令,主动亲自跳进房屋,用日本马枪射击正在休息的两名二十岁左右的冀察热军区第十一团八路军侦察战士,一名在腹部,另一名在大腿关节上,受了贯通重伤。还逮捕了惊慌欲逃的户主,他是六十岁左右的老翁。我用劈柴的斧子砍他的背部,使他受了重伤,陷于濒死状态。然后,我和增援的同伙冲野伍长、竹田伍长等一起,按派遣队长山田恒雄的命令,把濒临死亡的战士和老翁共三名,拖到屋里,让他们躺在炕上,用易燃的家具压在被害者的身上,随后用高粱秸放火烧房子,将他们一并烧死。当时,被害老翁的十八岁和二十岁左右的女儿和一个婴儿共三名,被我的同伙捆绑,失掉自由。因为我和其他宪兵烧了房屋,杀了人,她姐妹俩在燃烧着的房子前,哭泣着反抗宪兵。我想把这两名妇女和小孩也杀害掉,当用手枪正要射击时,因派遣队长的命令而未遂,遂将一名妇女(妹妹)衣服剥去,让其裸体,用棍棒殴打。对抱小孩的妇女(姐姐)也拳打和脚踢,且大声说:“对靠近八路军的,就这样处分!”强制把这两名妇女由现场赶走,使她们失掉了房屋和生活中的一切。我们便逃离现场,还从两名侦察战士身上,掠夺了抗日传单五十张左右、信件、手榴弹数十个和布提包一个。

4.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前后,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三岔口村入口,当时我是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扫荡系伍长系员,奉派遣队长山田恒雄的命令,将上一天即八月十八日夜间被我们宪兵逮捕的居住在三岔口的两名中国抗日农民(三十五岁左右)拉到该村入口,在二百余名的村民面前,威吓说:“你们看,这是援助八路军者的结局!”我用日本刀,将两名抗日爱国农民杀害了,并强迫村民把尸首埋在村前的田地里。我为了想试验自己日本刀的利钝,主动向派遣队长请求,亲自砍杀这两名被害者,犯下了罪行。

5.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前后,于热河省七沟村东南承德县和喀喇沁中旗的县、旗境界山峪,我以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游击扫荡中在山麓岩石角发现脚上负伤的八路军战士一名(年二十五岁左右),向派遣队长山田恒雄报告,在还未下来命令的情况下,我便用日本马枪,对该八路军战士射击两发子弹,被害者的头部被子弹贯穿,当场死亡。将尸体遗弃,逃离现场。

6.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前后,于热河省平泉街关东军热河特别警备队平泉派遣队后院马厩前,我以代理派遣队长军曹的身份,对部下逮捕的抗日爱国农民刘

贵(四十岁左右,住热河省喀喇沁左旗三十家子村)使用灌水、过电和殴打等刑讯。被害者顽强地抗拒供述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我又施以非刑,审讯到一小时半左右时,由于我的残酷刑讯,被害者气绝身亡。

二、参加和执行集体屠杀。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至同年五月一日前后,于热河省兴隆县茅山村西南长城线附近,游击进攻中的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宪兵约七十名,在永山茂通指挥下,(1)四月二十日前后,于兴隆县茅山西南长城线山峪,和八路军部队遭遇,进行攻击,用轻机枪和步枪一齐乱射,枪杀了八路军战士三十余名和抗日爱国农民十余名。我以步枪手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并用步枪枪杀抗日农民三四名。(2)四月二十九日偷袭兴隆县茅山西北某村零散的房屋,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射击,枪杀了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抗日农民二十名。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六月上旬,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周围的半解放区村庄,由承德宪兵队第二游击队生田大尉指挥的宪兵约一百五十名的游击行动如下:

1. 五月十五日拂晓,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北方五公里的山峪村庄,偷袭抗日爱国农民的房屋,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射击,枪杀了正躲避枪弹的抗日农民十五名(年龄三十岁至五十岁)。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2. 五月十八日前后,于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热水汤附近,偷袭零散的中国农民的房屋,用步枪射击,枪杀了试图逃难的抗日农民六至七名,并逮捕了六名,刑讯后杀害了。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协助扫荡分队长池田军曹,主动对被捕者灌水、殴打刑讯,将其杀害。

一九四三年七月下旬,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宪兵队山田曹长等约二十五名,行动如下:

1. 九月下旬,于七沟村以东承德县和喀喇沁中旗的县旗境界,以夜间潜伏的方法,逮捕八路军战士,袭击了通过县境的八路军第十一团某连战士约四十名,战斗约两小时,打死八路军战士三名,逮捕八名,约一星期后,送交伪承德热河特别治安庭杀害了。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2. 十月中旬,偷袭七沟村三盆口村以东零散村庄的抗日农民房屋,将正准备逃难的农民十余名,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全部杀害。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3. 十一月上旬前后,于七沟村西南三岔口附近,偷袭抗日农民的房屋,逮捕了农民三名,用殴打和灌水等刑罚杀害了。还逮捕了正在该房屋休息的中共承平宁县政府宣传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白玉林,当日送交伪承德热河特别治安庭,处以死刑。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三、逮捕。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三十日，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队准尉内田一平等约三十名：

1. 四月十七日，偷袭兴隆县兴隆街西南五公里的农民房屋，逮捕了抗日农民约八十余名，殴打、灌水刑讯后，将二十余名送交伪兴隆法院下狱，余者经刑讯释放。我以扫荡系员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2. 四月二十日，偷袭搜查了热河省兴隆县茅山村附近零散村庄的农民房屋，逮捕了一百余名中国农民和抗日救国会员，押解到兴隆街，进行殴打、灌水、过电等刑讯后，将三十余名送交伪兴隆法院下狱。其余的被害者经刑讯释放。我以扫荡系员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前后，于热河省兴隆县西南茅家村至黄崖关间，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等约一百五十名，为了分离八路军和抗日农民，补充建设对苏军事基地、构筑阵地所需要的劳动力，逮捕解放区的农民。采取守候、偷袭和盘查等办法，将在房屋里的、行路的或正进行耕作的农民，一律逮捕。继续进行一个星期，共逮捕二百余名，大部是青年农民。他们被押解到兴隆，后经由承德送往东北满某地。我以扫荡系员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六月，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的宪兵一百五十名，对中共承平宁县政府属下的抗日农民，用潜伏偷袭和其他方法，逮捕了居住在南榆树林子周围村庄有组织的农民约三百五十名（男子，年龄二十五岁至五十岁），经殴打、灌水和过电等刑讯后，将与抗日救国会有关的五十余名，送交伪承德特别治安庭。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一九四三年十月至十一月下旬，驻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的承德日本宪兵队七沟派遣队，山田曹长等约二十五名，在伪军约二百名的增援下，对事先已经查明的七沟村周围村庄抗日救国会会员，连续进行了大逮捕，共逮捕约二百名，其中七十名送交了伪平泉热河特别治安庭下狱。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担任伪军（约二十五名）的指挥班长，亲自逮捕了二十名。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于热河省喀喇沁右旗五家村和七家村，承德宪兵队坂元中佐指挥宪兵七十名和伪警察三十名，逮捕了中共地下抗日组织的农民约一百五十名，在当地就进行了殴打和灌水等刑讯。在百鸟伴治郎中尉指挥下，将抗日救国会员约二十名送交了伪赤峰热河特别治安庭，其余被害者命五家村和七家村的伪村长取保后释放。

四、放火。

1.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于热河省兴隆县兴隆街西南五公里零散的村庄，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队内田准尉指挥的宪兵约三十名，在该地区游击侵略，以八路军部队宿营地为由，放火烧毁了零散的房屋约七十余户。我以扫荡增援宪兵兵长

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2.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前后,在热河省兴隆县西南茅山、黄崖关附近,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队内田准尉率领宪兵约三十名,在该地区游击侵略,将认为有被八路军利用危险的农民零散房屋约五十余户(由于强制并村工作,被害农民的房产),放火烧毁。我以扫荡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3.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游击侵犯热河省兴隆县西南长城线山峪的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宪兵一百五十名,偷袭了上述长城线山峪零散的解放区农民房屋,先逮捕杀害其家人,随即放火烧毁其房屋,共烧毁了约有四十户。我以扫荡系员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4.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六月,驻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的宪兵一百五十名,根据承德宪兵队长坂元正"对赤化地区须彻底扫荡"的命令,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一带,对因农耕不便和反对强制并村而未搬家的抗日农民的房屋,放火烧毁,使一百余户的房屋化为灰烬。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5. 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一月,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山田曹长率领宪兵二十五名,奉承德宪兵队长坂元正的"将七沟村一带不向并村地迁移的抗日农民的零散房屋放火烧毁"的命令,在两个月期间内,将七沟村四周的抗日农民约二百余户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毁。我以扫荡分队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五、强奸。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旬,我以承德宪兵队八里罕派遣宪兵队长伍长的身份,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八里罕村,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命部下宪补汉奸黄希圣,以欺骗和金钱诱惑手段,将居住八里罕村的年三十岁左右的某中国妇女,领到八里罕派遣宪兵队,我进行了强奸。

六、情报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至一九四四年二月,我以热河省喀喇沁中旗承德宪兵队八里罕派遣宪兵队长的身份,指挥部下六名,对中共承平宁县政府八里罕地区抗日的中国农民,进行户口调查和抗日活动情况调查,并搜集其他一切有关的情报,报告给平泉宪兵分遣队长木下万寿一,木下万寿一分遣队长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八里罕地区逮捕了抗日中国农民约二百五十名,其中十五名被处死刑和杀害、病死于狱中。

七、掠夺。

1. 一九四三年十月中旬,我当时是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宪兵队扫荡分队长伍长,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东南某村庄,用手枪鸣枪威吓,逼迫两名放牧的农民逃走,掠夺了留在该地村庄前丘陵上的约五十只山羊,送交派遣队长山田曹长。

2. 一九四四年三月下旬,我任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系伍长,与本部特高系主

任原曹长等几名宪兵一起,以逮捕八路军工作员为目的,夜间潜伏在热河省承德县下板城村入口处,鸣枪威吓,将从河北赶着二百头耕牛从事贸易到承德县下板城来的中国农民逼走,掠夺了全部耕牛,并委托下板城村某伪村长将牛卖掉。此事向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藤忠一郎做了报告。

3.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六月,驻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的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等宪兵一百五十名,从上述村庄的农民手中,掠夺了可供一百五十人食用一个月的副食品——肉、蛋、蔬菜,掠夺的东西很多。我当时是扫荡系伍长,参加了抢劫行动。

(一) 119—2,932,1,第5号

长岛玉次郎等22人[1]检举书

(1954年12月10日)

我们是自一九四三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间,在西南地区热河省内,以热河治安肃正为名,杀人、放火、掠夺的所谓"三光"政策的具体实行者及参加者。我们通过当时自己的罪行检举原弘志,但这仅是亲身经历的一部分。

[中略]

一、原弘志任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期间参加的历次会议,及因其结果所产生的犯罪行为:

原弘志,一九四三年七月任伪锦州铁路警护本队长,还担任西南防卫委员会的委员,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为止。

(一)一九四四年一月,在热河省承德伪官吏会馆,召开了西南防卫委员会。

出席者:除委员、干事外,约六十名列席者。

主持者:西南防卫委员长、西南防卫军司令官、陆军少将安藤忠一郎。

决议事项:1. 重点肃正地区;2. 防止八里罕地区八路军进入的对策;3. 确保热河、河北省境五县(丰宁、滦平、承德、兴隆、青龙等)的无人地带及集团部落。

会上由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总结了到一九四三年一二月为止的热河省建

---

① 22名检举者是:长岛玉次郎、高木贞次、岛津酉二良、齐藤常三、植松猶数、太田秀清、本田博英、石田一雄、具沼一郎、原田左中、木下万寿一、大岛光、高桥正三、小林实、船生退助、西尾克巳、阿部清二、板桥润、板垣友吉、元山胜美、远藤清重、木村光明。

立无人地带及集团部落的情况：丰宁、滦平完成90%；兴隆、青龙、承德完成80%；喀喇沁中旗完成一部分。并报告称，当年重点地区放在热河中心部，封锁正在活动中的八路军的行动。

关于西南防卫委员会决议各项目的执行原则及方法。

第一项决议：

1. 配合日伪军警讨伐队的讨伐，各伪县长、协和会，进行欺骗宣传，和威胁驱使中国农民为讨伐服务。

2. 宪兵、警察、铁路警护队、法院配合讨伐，搜索镇压铁路沿线村庄中和八路军有关系的抗日爱国人民。

第二项决议：

伪县长、警务科长，受其县内驻在的日伪军部队长的指挥和区处。

第三项决议：

在进行讨伐和镇压人民的同时，由伪行政、协和会或伪民间团体等进行欺骗宣传，强迫参加抗日群众组织的农民自首，以瓦解其组织。

第一项，为了歼灭在热河中心地区行动的八路军高乔[桥]部队，和镇压承平宁县政府，以热河中心部和铁路沿线地区为重点，日伪军警察讨伐队担任讨伐，宪兵、警察、铁路警护队、法院等，镇压抗日群众组织，伪协和会等进行集家，制造无人区，收集情报。

第二项是，宪兵、伪警察、铁路警护队，为了消灭进入八里罕地区的八路军，先镇压当地人民。伪行政、协和会进行欺骗宣传和收集情报。

第三项是，日伪军警讨伐队以河北省境长城沿线作为第一线，加强讨伐行动；对热河省内部的八路军进行讨伐，同时在集团部落配置警备力，宪兵、警察、铁路警护队、法院等镇压群众组织。伪行政、协和会通过欺骗宣传、宣抚配合讨伐镇压，搜索援助八路军者。

（二）一九四四年九月，在热河省承德伪官吏会馆，召开西南防卫委员会。

出席者：除委员干事外，约六十名列席者。

主持者：西南防卫委员长、西南防卫司令官、陆军少将安藤忠一郎。

决议事项：保护无人区、集团部落的对策。

议事内容：1. 由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报告完成热河地区集家计划问题；2. 由各日伪满军讨伐队长报告讨伐情况；3. 由宪兵队长大佐板元正报告搜索八里罕地区的情况；4. 由其他各机关负责人报告执行任务的成果。

关于执行决议的原则及方法：

1. 讨伐队加强讨伐行动，为了搜捕处置无人地带内的居民，不能让八路军接近集团部落。

2. 各县长、旗长、副旗长、参事官采取彻底措施，严禁居民出入无人地带。鉴

于因设立无人区和集家而搬迁人多数回归的情况，处理归还的移民。宪兵、警察严密警戒八路军工作员进入集团部落。

原弘志带着松尾中校出席了此次会议。

关东军西南防卫军对共调查班组长、宪兵大尉木村光明也列席参加。

基于上述西南防卫委员会的决议，西南防卫司令官命令西南地区的军、行政、警察、宪兵、铁路警护队、协和会、热河特别治安庭检察官，按分担的任务实施，结果如下：

1. 一九四三年八月，在承德县亮甲台地区，日本军第八〇四部队中根队长等八十名，同八路军约二十名交战，打死战士二名。

2. 一九四三年八月，在青龙县西部地区，由第八〇四部队中根队，打死中国农民五名。

3. 一九四三年八月，在喀喇沁中旗七沟村，日本宪兵二十五名、伪军三十名，同八路军约四十名交战，打死战士一名，俘虏七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

4. 一九四三年八月，在兴隆县大道河地区，日本军第八八一部队山下中队长等约一百二十名，同八路军约一百名交战，打死战士六名。

5.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青龙县亮甲台地区，日本军第八〇四部队一、三中队约二百名，逮捕八路军战士约四十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

6.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河北省迁安县青山口地区，日本军第八〇四部队第一中队，同八路军三十名交战，打死六名战士。

7. 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河北省密云县葡萄园转山会地区，第一游击队一百二十名、滦平伪警察队约三百名、伪热河省警察队约五百名、华北军柿本部队二个中队约二百五十名，共同和八路军第十三团主力一千五百名交战二日，打死战士约四十六名。

8. 一九四四年一月，日本军小川部队、伪热河省警察部队约一千名、伪军第八旅共同在喀喇沁中旗光头山地方宁城地区，进攻八路军高乔[桥]部队一百五十名，俘虏六名。

9. 一九四四年五月，在河北省蓟县北部长城线山区，日本军第八八一部队长松吉中佐等三百名、伪满军约五百名、伪警察队约六百名，同八路军第十一团约五百名，其中包括蓟遵兴县政府、冀察热边区等工作员交战，打死约一百二十名，俘虏七十名（被害者中有六连政治指导员一名），送西南防卫军。

10.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兴隆县半壁山地区，伪军第三十一团约四百名，同八路军十一团约一百五十名交战，打死战士十二名，俘虏二名。

11. 一九四四年八月，在遵化县长城线地区，日本军第八八一部队松吉中佐以下三百名、伪警察队约八百名、伪军四百名，打死八路军第十一团战士约四十二名，和平农民约三十九名。

12. 一九四四年七月,在遵化县秦家峪地区,第八八一部队松吉部队第四中队约九十名,同八路军约四百名交战,打死十名。

总共进行了约二十次战斗,计杀害八路军高桥部队长等约五百八十名,俘虏革命战士约有二百名,打死和平农民约六十四名。

镇压人民的罪行:

1. 一九四三年八月,在喀喇沁中旗五化山头,平泉宪兵分队长远藤准尉等三十名、伪军约一百名,共同逮捕中共承平宁县政府组织的中国农民一百三十名,送热河伪特别治安庭。

2.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喀喇沁左旗七家、五家地区,由承德宪兵队长坂元正中佐指挥赤峰宪兵分队长百鸟少尉等四十名、伪警察约一百五十名,逮捕了中共承平宁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一百五十名,送热河伪特别治安庭后,只释放五名。

总共镇压二十九次,被捕者计达一千九百八十八名,就地杀害约三十八名,送热河伪特别治安庭约五百余名。

制造无人区和集家的罪行:

在此期间,喀喇沁中旗实行了集家,这是在西南防卫军司令官监督下由西南防卫委员会执行的。原弘志以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应负参与审议、策划的责任。

二、原弘志以铁路警护本队长身份执行西南防卫委员会各项决议所产生的罪行:

为贯彻西南防卫委员会的决议,一九四三年九月上旬,在伪热河省公署内,有承德宪兵队长大佐坂元正、特高课长吉田少佐、伪热河省警务厅长武藤喜一郎、特务科长江岛福马、伪锦州高等法院次长横山光彦、检察厅次长等举行了关于镇压会议。他命令伪承德警护队长山元新九郎列席,参加策划决定在热河省内第一次、第二次镇压中国人民的计划[即两次所谓"剔抉"]。实行结果如下:

1.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九日,在热河省喀喇沁左旗七沟村,平泉宪兵分队七沟派遣宪兵山田曹长等二十五名、伪军深津少校等三十名、日军小川部队二十名,计七十五名,逮捕中共承平宁县政府领导组织的中国农民约四十五名,将其中三十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

2.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间,在热河省兴隆县,由热河第一游击队长等一百二十名,在半壁山逮捕八路军承滦兴联合县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爱国农民三十名,在万岭屯捕七名,在大小水泉捕三十名,在王寿喷捕十三名,在鹰手营子捕十八名,共计逮捕九十八名,将其中三十一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处死刑十名,二十一名处徒刑,投狱。

3.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在热河省承德县内,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大尉等

约一百二十名、铁路警护队约八十名、伪警察队约二百五十名、小川部队约二百名、伪军约一百名，在塘头沟逮捕中共承平宁联合县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约十八名，在车河口捕五十四名，在鞍匠屯逮捕约二十四名，在上下板城逮捕一百五十五名，在小寺沟捕三十六名。将其中二百零七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

4.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在青龙县内，日本青龙宪兵分队长等约一百二十名，和伪县警务科、日本军须贝部队配合，在龙须门逮捕中共迁青平联合县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爱国者六十名，在峪耳崖捕四十一名，在九虎岭约捕一百零一名，在杨树窝堡捕二十五名，在双山子捕四十名，在冷口捕五十五名，在牛心山捕五十七名，将其中二百三十四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

5.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兴隆县内，第一游击队长等一百二十名，在北双洞逮捕中共滦承兴联合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四名，在六道河逮捕中共滦承兴联合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三十四名，在滦平县长哨子，由滦平县伪警务科逮捕中共丰滦密联合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十八名，将其中约二十九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

6.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承德县内，承德日本宪兵分队长等约一百二十名、承德伪铁路警护队八十名，在上板城逮捕中共承平宁联合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四十一名，在小寺沟逮捕十四名，在喀喇沁中旗七沟逮捕十六名，将其中九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

7.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青龙县，青龙宪兵队分队长等约一百二十名，和伪青龙县警务科在碾子峪逮捕中共迁青平联合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五名，在南杖子西城峪逮捕二十名，在铁门关逮捕五名，在大屯逮捕九名，在河上滦阳逮捕二十名，将其中三十一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

原弘志以伪锦州铁路警护本队长身份，在热河省内指挥部下古北口、承德、叶柏寿、赤峰等各警护队长，加强镇压锦古线地区的人民，和在列车内进行搜查逮捕八路军工作员的罪行：

1. 一九四三年八月，在热河省承德县小寺沟、大寺沟、棚杖子、宋杖子地区，由承德、叶柏寿两警护队长逮捕了中共迁青平、承平宁各联合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三十六名，将三十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

2. 一九四四年一月，在河北省密云县冷口司马台地区，由伪古北口铁路警护队长胜谷一六，逮捕中共丰滦密联合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十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

3. 一九四四年一月中旬，平泉伪警护队、平泉日本宪兵分遣队，共同在喀喇沁中旗逮捕中共承平宁联合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五十名，其中二十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

4. 一九四四年二月间，在河北省密云县下会地区，伪古北口铁路警护队长胜谷一六等约六十名，攻击了八路军第十三团，打死战士三名。

5. 一九四四年三月，在喀喇沁中旗黄土梁子、洼子店地区，伪承德警护队长，逮捕中共承平宁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二百名，将其中约六十五名送热河特别治安庭，约有十二名处死刑、五十三名投狱。

（一） 119－2,26,5,第10号

田井久二郎口供

（1954年8月21日）

问：讲一下你在任伪满热河省警务厅特务科附时，进行所谓肃正的罪行。

答：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下旬，在伪满热河省警务厅任特务科附警正时，逮捕杀害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中国抗日爱国者的重大罪恶行为是：

一、直接指挥侦搜队（通称特搜班）的罪行。

一九四三年五月末，根据武藤警务厅长所拟计划，我和特务科长亲自组织了警务厅直辖侦搜队，即以我任队长，佟某警佐、有村警佐为核心，由四十余名组成的特务暴力团。五名左右为一组，分成六个组，各组分配一名日本人为指挥员，全体人员均着便衣活动，目的是在热河省各地进行所谓治安肃正工作。当时确定以喀喇沁左、中、右旗和青龙县北部地区为侦搜队活动的重点地区。为了逮捕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在武装警察的援助下，盘踞农村，进行谍报工作。每次用两三个月时间，以暴力破坏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组织，逮捕地下组织人员以及爱国者，施以吊打、灌水、毒打及其他暴行，并根据伪满《治安维持法》送交检察厅判刑。第一次是一九四三年秋天至一九四四年春天，在兴隆、青龙、喀喇沁右旗、滦平、承德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当时我是热河省警务厅特务科附兼侦搜队长，这个期间，约一半时间出差到当地指挥和指导喀喇沁右旗及青龙县的谍报工作。直到同年十月以后，由于有了武装警察队的援助，才停止扩大侦搜队的计划，但我仍在警务厅指挥。

1. 从一九四三年六月起，侦搜队盘踞在喀喇沁右旗西南部地区。我出差到当地，指挥谍报工作，从便衣侦搜班在乡下搜集的情报里，知道有抗日人民的活动，我便指挥有村警佐做逮捕计划，并告他尽量多逮捕和多搜集情报，在侦搜过程中，随时做好逮捕名单，准备进行一齐逮捕。有村队附从各侦搜组上报的侦搜日记中，将每天侦搜出来的对象名单、住所、嫌疑事项集中起来，拟出逮捕名单，并在主要逮捕者名字上划上一个红圈，我同意批准后，每十天向警务厅报告一次。必要时用无

线电下达逮捕命令，接到命令后，回电报告拟逮捕的约数，然后各组分头逮捕。我集中部下拟逮捕的名单，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的名义，指挥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爱国者一百五十三名，进行刑讯后，将其中四十名以违犯伪满《治安维持法》，送交承德检察厅，当时枪杀了抗日工作人员两名。

2. 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九月，约一个月间，在我直接指挥下，于青龙县东北部地区，进行了关于迁青平县政府地下组织的谍报活动。我记得，在同年十二月，对喀喇沁左旗南部青龙县境地区进行逮捕的同时，还逮捕了迁青平县抗日政府某村政府的组织、联络、武装、教育、卫生、会计等委员和抗日爱国者一百名，将其中十五名以违犯伪满《治安维持法》，送交在青龙县当地的检察官。

3. 一九四三年十月，我在青龙县进行罪恶活动时，奉武藤警务厅长的命令，支援有村警佐的指挥，在兴隆县进行了两次秋季武力镇压。

4. 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同年十二月，约两个月时间，在有村警佐的指挥下，分两队盘踞在喀喇沁左旗南部和青龙县边境地区，进行谍报活动。十二月中旬，逮捕了迁青平县政府人员和援助八路军物资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约一百五十名。经刑讯后，将其中二十名以违犯伪满《治安维持法》，送交检察厅。

5. 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四月，在有村警佐指挥下，先后盘踞于喀喇沁中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进行谍报活动。这次被捕人数已记不清楚，但估计逮捕迁青平县抗日政府地下组织人员及其他爱国者约为二百名。刑讯后，将其中二十五名以违犯伪满《治安维持法》，送交平泉检察厅。

以上被捕的六百名爱国者中，杀害十七名，从检察厅送到特别治安庭的，大多数被处无期徒刑和死刑。

二、指挥伪热河省内县、旗特搜班的罪行。

各县、旗警务科特务股股长，大多数兼特搜班长，指挥特搜班。班员人数，在接近长城沿线的所谓第一线地区，如兴隆、青龙等县，有三十名左右；第二线地区有二十名左右；第三线地区约有十名，合计组成人员约有二百五十名。该特搜班也和省特搜班一样，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组织及爱国运动，进行谍报活动，经常逮捕镇压抗日爱国者。我曾以厅长或承德检察厅的命令，进行指导和督励。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我任职期间，省内各县旗特搜班的罪恶，据我所记忆的，以暴力逮捕中国爱国者的总数约为四千名，其中被杀害六十四名。这些被逮捕的人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迁青平、丰滦密、密兴承各县政府的地下组织人员和援助八路军物资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而以所谓案件送交有关各地检察厅的约二百五十名，这些被害者都以违犯伪满《治安维持法》，被判死刑和徒刑。

我在职期间，指挥督促各县、旗特务股长，搜集抗日爱国运动的各种情报约五

千件，其中有九百六十件通报到伪满军、宪兵对共调查班和各县、旗警务科特务股，作为镇压抗日爱国者的资料。

从一九四三年夏起，在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的指示下，由宪兵金泽中佐、木村光明大尉的具体策划组成了对共调查班，热河省警务厅卫藤特务科长为其中之一员，搜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情报，向各有关机关通报，进行“灭共”宣传。其中包括中共的各种宣传文献、地下组织和八路军行动的综合情报和其他讨伐、逮捕等情报资料，作为特务活动的所需资料，印发给管内各县、旗。

三、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伪满热河省警察讨伐队的罪恶。

前任警务厅长武藤喜一郎，后任皆川富之亟（一九四三年十月以后任职）、警务科长龟山、富森、西岛宽，警防科长山口鹈池，特务科长卫藤福马等，按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安藤少将的命令进行所谓治安肃正。

省直辖警察讨伐队，以警务厅长为总指挥，警务、警防、特务各科长为幕僚，在当地直接指挥。编成以兼石重太郎、绪方忠雄、川口实各警正等有战斗经验的警察官为骨干的武装警察讨伐队四至五队，每队二百人，共有人员约八百至一千名，本部设于兴隆县，曾一度移到平泉。这些讨伐队由警防科长山口鹈池和警正兼石、绪方、川口等，在现场指挥讨伐。一九四三年三四月，将原在兴隆地区活动的警察讨伐队调到喀喇沁中旗活动，当时从各省调来热河省地区的警察有五千名，都配属到各县讨伐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皆川厅长调来之后，在兴隆地区活动的讨伐队改为县领导，他亲自带来的约六百名讨伐队由省领导。省讨伐队在我任职期间，杀害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及抗日武装人员约五百名，杀害和平居民约一百名。

省内各县、旗长及警务科长指挥的县、旗武装警察队（当时称警察讨伐队），每队由一百至二百名编成，全省各地共约有五千名以上，以武力镇压八路军、中国抗日武装人员和居民。我所记忆的，杀害八路军及抗日武装人员约有六百名，杀害和平居民约二百名。一九四四年四月，警察讨伐队还曾杀害了八路军高乔[桥]将军。于一九四三年冬天，兴隆县警察讨伐队逮捕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者，二十七岁左右，送到承德检察厅。我奉特务科长的命令和须藤检察官的许可，讯问了两天，以了解中共情况。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版）

横山光彦检举证明书

（1954 年 12 月 4 日）

我从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任锦州高等法院次长。原弘志，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其前任者佐古龙裕离任之后，我离锦州为止，任锦州铁道警护本队长（后改称锦州铁道警护军旅长）和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委员。在以上任职期间，我和原弘志，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根据承德驻屯日本军防卫司令官的指令，出席在承德伪热河省公署召开的热河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委员会（它在治安工作上和防卫委员会是互为表里的组织）。在会上协议决定，同年九月及十月拟进行大镇压的方针，我们和其他委员一起参与了策划。因治安肃正委员会决定的方针，而引起的各次逮捕事件，锦州高等检察厅的起诉，锦州高等法院的审判，和在检察厅的指挥下锦州、承德等监狱的处刑等全部罪行如下：

1. 按照所谓热河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委员会决定而进行的第一次逮捕事件。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青龙县西郊及西南地区，由伪满洲国热河省喜峰口宪兵队、满军逮捕了三百二十四名进行反满抗日爱国运动的革命志士和爱国人民；在兴隆县东部地区，由古北口宪兵队逮捕了九十八名爱国人民；在承德县南部地区，由承德宪兵队，该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逮捕了五百三十六名，总共逮捕了九百五十八名爱国人民，其中，青龙一百八十五名，兴隆四十一名，承德二百三十名，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检察官随时赴各地起诉到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该特别治安庭在青龙、兴隆接到起诉，随时开庭审判，在承德的特别治安庭和第二次逮捕的合在一起，同年十月至十一月份，在承德地方法院公判庭进行审判，结果：青龙，死刑四名，无期或有期徒刑十年以上者约有一百二十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下者约有六十一名；兴隆，判死刑一名，无期或有期徒刑十年以上者约三十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下者约十名（在承德审判部分，在第二次逮捕事件中叙述）。

2. 第二次逮捕事件。

一九四三年十月六日至十九日，伪满洲国热河省承德宪兵队及该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在承德东南地区，古北口宪兵队在古北口地区，喜峰口宪兵队在喜峰口地区，总共逮捕二百五十四名［应为二百九十二名］革命志士和爱国人民，其中三十名在承德，十二名在平泉，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检察官随时在以上各

地起诉到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特别治安庭在平泉、古北口接受起诉,随时开庭公审。在承德的特别治安庭,是和第一次检举的合计二百六十名,除一名送锦州高等法院外,同年十月至十一月,在承德地方法院经数十次公审,进行审判。关于送到锦州高等法院的一名,是在该法院治安庭(我和江上、畠山组成),同年十二月公审的。结果在平泉、古北口,判处死刑两名,无期或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二十五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下的十一名;在锦州,判死刑一名;在承德判死刑的有三十名,无期徒刑三十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有一百三十名,有期徒刑十年以下的有六十九名。

以上总括起来,逮捕总数约为一千二百一十二名[应为一千二百五十],其中起诉的五百二十四名,判处死刑三十八名,无期徒刑三十名,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三百零五名,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二百五十一名。被宣告判决的革命志士及爱国人民,由锦州高等检察厅指挥,在锦州、承德等地投狱服刑。

郝席菴[①]笔供

(1954年8月13日)

一、半壁山一带大检举

半壁山一带大检举,其地区包括现在兴隆县二区、五区及六区与九区之一部,是瀓河和恒河流域。时间是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与一九四四年,每年实行一次,共计三次。在这三次大检举中,西迄八品业村,东至龙井关口,以及恒河之大窪、宝地、无头牛、大小水泉、迷子地、双庙、靳杖子一带,除蓝旗营村未全部波及外,其余数十村中,无一处幸免。这三次大检举,是在全县普遍实行的,即半壁山一带被检举之村民,就不下一千八九百名,而死亡者,当时即约有数百名,其余之人彼时虽未被枪杀,但以汽车载运他处,亦鲜有生还回家者。在三次大检举中,第一次与第二次经过情况略同,但在第三次实行中,则与前二次情况不同了。在每次大检举中,是以日本军宪兵队为中心的。在执行时,由日本军在瀓河之塚纲队、渡边队,配合伪满兴隆县警察讨伐队刘其队、王汇队等,及半壁山警察署、各村分驻所一同进行。在未检举前,由日本军宪兵队驻半壁山分遣队,与半壁山警察署特务系,曾做多日之准备工作,因此在前两次大检举中,凡被调查列入名单之人,鲜有逃脱幸免

① 郝席菴,是原伪满协和会兴隆县本部本谷青年武装行动队队附。

者。因敌人利用中国人民过春节之风俗习惯，在旧历年节前后进行大规模的大检举工作。而在每次施行以前，伪满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大批司法工作人员来到本县，准备处理一切工作。由此可见，在大规模检举工作中，敌人是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

第一次半壁山大检举，是在一九四二年[应为一九四三年]（伪满康德九年）旧历腊月二十日以后进行的。在未执行前，日本宪兵队驻半壁山分遣队，即加强工作人员，并与当时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特务系主任警尉松山义雄（朝鲜人，又名李仁善）等，在半壁山各处进行多日之调查。凡抗日家属、地方区村干部以及地方进步人士平时接近八路军并积极支援八路军抗日活动而率先缴纳公粮者，统在被调查之列。俟调查工作完毕，于是年旧历腊月二十五日以后又调来大批警察讨伐队，与日本军、警察署、分驻所等，有计划地分别在各村中同时举行检举。在五区三道河子、龙井、关口一带，以日本军宪兵队，配合日本军渡边队，并三道河子分驻所长杨文宏等进行的。在蓝旗营村、青杏沟、榆树沟一带，是以日本军宪兵队、日本军渡边队为中心，配合兴隆县讨伐队刘文队而进行的。在半壁山一带，是以日本军宪兵队，配合日本军塚纲队，并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特务系主任松山义雄等进行的。在庙岭沟、大洼、宝地、大小水泉一带，系以日本军宪兵队，配合驻在石庙子伪兴隆县警察讨伐队孙德队（队长孙德英）进行的。在这次大检举中，以大洼、宝地、大小水泉、北台子、车道峪、秋木林子、靳杖子、阎杖子、二唐、大山子、龙井、关口等村为最残酷。被检举之人用绳绑，日本军宪兵队手持名单，按调查所列姓名呼唤，当时即有被刀棍打昏不省人事者。共计这次大检举者约五六百名，当时即拘禁于警察署或分驻所内，在二三日后用汽车载运兴隆本街，而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大批司法人员早已来到县街，即住于县法院内，由特别治安法庭，配合日本军、宪兵队、警务科司法股、特务股等联合昼夜刑讯。凡被检举之人，皆被刑讯一次二次不等，在半个月后即行宣判，计判处死刑者约一二百名，由日本宪兵队长（大胡子，不知其名）并警察等，在县街南山沟内集体屠杀，未判死刑者，用汽车多辆载运东北各地后，亦鲜有生还返家者。

第二次半壁山一带大检举，是在一九四三年（伪满康德十年）旧历春节前腊月二十八九日与正月初进行的。这次大检举经过情况与第一次相同，但在执行中比前一次更为残酷。事前各重点地区，日本军宪兵队即增加人数，协同当地警察做准备调查工作，而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司法人员亦早已来到县里。在半壁山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协同日本军塚纲队，并半壁山警察署长李振起、特务系主任松山义雄等联合进行的。在蓝旗营、榆树沟一带，由日本军宪兵队，协同兴隆县警察讨伐队刘其队（队长刘其昌）等联合进行的。在三道河子、龙井、关口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协同日本军驻在三道河子渡边队，并三道河子分驻所长杨文宏等联合进行的。在庙岭沟、大洼、宝地、大小水泉一带，由日本军、宪兵队，协同驻在石庙子兴隆县警察讨

伐队王汇队(队长王汇东)等联合进行的。在这次大检举中,以宝地、迷子地、双庙、大水泉、庙岭、牛唦子、八仙沟、小鹿铜钩、鱼台、西窝铺、榆树沟、洪山口、瀔河南二堂、偏岭子、龙井、关口、沙波峪一带最为残酷。计当时被检举之人不下九百余名,而日本军、宪兵队手持名单,按名呼唤。当时指挥洋狗向人咬噬,在三道河子,当时就将被检举之人咬死一名,后统用汽车载运到县里,而锦州之特别治安法庭司法工作人员早已来到县公署,会合日本军宪兵队、警务科司法股、特务股等联合日夜刑讯。凡被检举之人,每人刑讯二三次不等,在三星期后集体宣判,当时判处死刑者约一百余名,即在县街南小山沟内,由日本军、宪兵队及警察等执行集体屠杀,其余用汽车载运东北各处,据闻去本溪、鞍山一带充当苦工,但后来很少有生还回家者。

第三次半壁山一带大检举,是在一九四四年(伪满康德十一年)腊月二十八日至正月初四日内进行的,这次大检举,与前二次情况是稍有不同的,是事前由日本宪兵队,并日本军与兴隆县警务科、警察署警察讨伐队、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等重要机关负责人开秘密会议,并按计划以各地区配布之军警武力,作大规模之检举。计在半壁山一带,以日本宪兵队、日本军塚纲队、半壁山警察署长刘伟、特务系主任松山义雄等联合组成而进行的。在蓝旗营子一带,以日本军、宪兵队,配合兴隆县警察讨伐队刘其队等进行的。在三道河子一带,以日本军宪兵队、日本军渡边队并三道河子分驻所长杨文宏等联合进行的。在庙岭、大小水泉一带以日本军、宪兵队配合兴隆县警察讨伐队王汇队、吴泰队等联合进行的。这次大检举是逢人便捕,遇人就抓,不分好坏何人,凡是中国人当时遇见日、满军警,就被检举,彼时以牛唦子、靳杖子、冷嘴头、赵杖子、西窝铺、车道峪、高板河、大石门以及沿长城一带为最残酷。其中尤以靳杖子更为厉害,计在该村中被检举的村民约有一百人。在这次大检举中,半壁山一带数十村中,除蓝旗营村,当时未检举一名,其余各村或多或少是无一村幸免的。这次被检举的村民计约有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分别寄押于当地警察分驻所内,一二日后用汽车多辆载运县署,即由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协同日本宪兵队、警务科司法股、特务股等昼夜刑讯,忙碌不休。在三星期后统被判决,而判死刑者不知确实数目,因这次大检举在全县各村普遍进行,当时已成混乱状态,其未被判死刑者,用汽车载运东北而去,但鲜有逃脱或生还返家者。

二、高台子、灰窑峪大检举

高台子、灰窑峪大检举,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季实行的(高台子、灰窑峪是在本县五区龙井关口外北山沟中的自然村)。在事前,由三道河子警察分驻所长杨文宏、警尉补马春登等去该村向居民说,某日驻三道河子日本军渡边队长亲来讲话,令准备欢迎。该村居民信以为真,急忙派人去瀔河桥购备烟酒点心食物以作欢迎。是日,由日本宪兵队,协同日本军渡边队及驻在龙井关口之日本军本上队(渡边队之一部,队长本上日本少尉),并三道河子分驻所长杨文宏等前往,将村民包围逮捕,

用麻绳绑捆解送三道河子分驻所押禁。这次检举,计高台子村人四十余名,灰窑峪村人三十余名(这两村户数根本不多,只两条小山沟)。在三道河子寄押二日,即用汽车载运兴隆县,经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司法人员会合日本军宪兵队、警务科司法股、特务股等,经两周间之刑讯,据闻判死刑者约十余名,即在县街附近执行了。其余约五十余名,押解东北而去,后亦无生还者(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在伪满协和会兴隆县本部充本谷青年武装行动队队附,曾亲身去该两村工作,当时见到该两村中竟无一青壮年男子,是年伪满实行大集家,在六七月间集家工作基本完成,而八九月间该两村集家尚未完竣,土地亦荒芜抛弃了,据居民说,所有被检举之人,至今亦无一人返家者,只有老少妇孺维持生活,并准备拆房并村,其惨状真使人不堪回忆)。

三、"投匪家族"大检举

"投匪家族"大检举,是在一九四四年(伪满康德十一年)六七月间实行的。这次大检举是因为当时本县一带革命形势空前发展,参军人数日益增多,因而使伪满政权当局极端仇视;又因实行治安肃正工作,本县农民坚持山地,不去部落,以示反抗到底,而伪满当局遂施用这惨无人道的毒策,以镇压全县人民。在未执行前,即由驻兴隆县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军夏道部队长、伪兴隆县长于文英、警务科长于沛山、兴隆县协和会事务长佐佐木小春,并各警察讨伐队长、副队长,并本县十九村村长等,在县街开秘密会议,商讨事前准备工作。当时,负各村调查工作的,是各村分驻所、部落警察防卫所、各村村长等,他们联合秘密进行,将各村各部落参加八路军及革命工作的干部家属,详细调查清楚,呈报县方当局。然后在各村内重要据点,大批增加警察讨伐队武力,准备工作妥当后,即在各村各部落内同时举行。当时,执行的以日本宪兵队为中心,配合警察讨伐队,将全县参加八路军及革命工作干部家属,不分男女老少完全逮捕无遗(以前历次大检举无老少妇女,多系青壮年男子)。这次"投匪家族"大检举,在全县十九个村中,被检举之男女老幼妇孺,据不完全统计,人数约在五百名左右(我当时在兴隆县庙岭村伪满协和会工作,见到该村十五个部落检举之家属约三十余名)。这些被检举之家属,由警察押解用汽车载运兴隆县街后,亦未判刑,这次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司法人员亦未来县处理。由日本军宪兵队、警务科司法股、特务股、伪满兴隆县法院等联合会审刑讯。在审讯中,日本宪兵及伪满司法工作者,任意拷打,并侮辱青年妇女。计在县街二星期后,用汽车多辆载运东北各省充当苦工。这次检举运走之人有秘密逃回的,但亦不敢在家居住。俟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被检举之家属,多有陆续返家者,但死亡在外之男女老幼妇孺甚多。其能返家者,亦沿途讨饭,形如乞丐,真人间之惨事。

在伪满政权统治下,兴隆县的大检举,是由一九四〇年即开始进行的。但彼时之检举,只限于本县某地区、某一村落,而未普遍实行。俟于一九四二年后,情况就

与前不同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中，每次在旧历年节前后，实行全县普遍性大检举一次，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残酷的。至于在以前本县个别地区实行局部检举，尚未述及。而此次敌人实行"投匪家族"大检举，是与当时时局发展分不开的，敌人用尽毒策，用尽方法以对付革命力量，以镇压广大人民。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半壁山一带的大检举情况，只不过是滦河流域一带，而这三次大检举是全县普遍实行的。半壁山一带三次大检举的人数、面积，按本县来讲，只不过是当时所遭受苦难的五分之一而已，其余地区，因不详细故未述及。但以半壁山一带大检举之经过情况，即可推知全县的一般情况了。在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由兴隆县警务科内之"非常持出"[紧急时搬出]卷柜中文件载，是年冬日本仍拟实行大检举，包括男子八岁至六十岁者，甚至在伪满政权各机关之官吏、职员、思想"不良者"，亦以"思想犯"列入在被检举之内，可见伪满当局所施政策之毒辣与残酷了。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版）

坂桥润口供

（1954年9月10日）

问：将你在锦州高等检察厅任职时的活动情况讲一讲。

答：从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开始，我任锦州高等检察厅书记官，这时正是所谓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工作时期，日、满军队、宪兵、警察联合对抗日武装部队进行讨伐，使抗日武装部队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当时检察厅受理的案件，也多是从肃正地区内逮捕的抗日人员的有关案件。从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以书记官身份，辅助检察审理了抗日工作人员约五百六十名，分别送交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承德地方法院特别治安庭等审判，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以及各种有期徒刑。其中被处以死刑者有刘某等五十九名。详情我记得的有：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以书记官身份，曾积极协助思想检察官龟冈忠彰对抗日人员刘某等三十四名进行审讯工作，整理了审讯笔录等材料，并拟定了执行死刑批示书等文件，送交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处理，最

后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罪名，判处了死刑。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我和检察官龟冈忠彰等到伪平泉区检察厅，对中国爱国农民王某（男，四十多岁，平宁区政府屯长）等四十五名，进行审讯工作。在审讯中，我和其他二人曾对被害者王某进行刑讯，令其跪下，绑在桌腿上用蜡烛火烧他的鼻尖。因其反抗，又用火烧他的头发，使他感到生命危险，遂招供。之后，把这四十五名送交承德地方法院特别治安庭处理，结果王某等十名被处以死刑，余者分别处以各种徒刑。

一九四三年二月上旬，在热河省高等检察厅承德办事处，我协助检察官审理了二十多名抗日人员。在审讯中，我曾亲自拷问了四名被害者，对他们进行殴打、踢踏，并整理了审讯笔录等材料。之后，把这些人送交承德地方法院特别治安庭处理，其中被处以死刑者有五名，余者被处以各种徒刑。

一九四三年六月上旬，我以书记官身份，和另外二人，在锦州高等检察厅审讯室，把在伪锦州监狱拘押的中国爱国者杨某（男，四十多岁）进行灌水等拷问。由于我的残酷刑讯，该人死于监狱中。

一九四三年九月中旬，伪锦州高等检察厅派检察官龟冈忠彰、翻译官植田幸一和我，到热河省青龙县城青龙宪兵分队，受理了前青龙宪兵分队及青龙特务股案送的中国农民爱国者二百名（内有八路军三名）。我以书记官身份，积极辅佐检察官，对被害者进行审讯。在审讯中，我曾和其他二人，对约二十名被害者用竹剑不顾头脚地进行殴打，其中我亲自拷打了五名。此外，我还协助检察官整理了审讯笔录，拟定了执行死刑批示书等文件。之后，把他们送交热河省青龙县青龙区法院临时特别治安庭处理，结果郑某（迁青平区政府办事员）等四人被处死刑，其余均被处以无期徒刑及各种有期徒刑，其中有抗日军人一名被青龙宪兵分队利用。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至十日，检察官须藤长八郎和我，在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办事处，受理了由伪承德宪兵分队和伪兴隆县特务股案送的中国农民爱国者三十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我以书记官身份，积极辅助检察官进行审讯工作。审讯中，我曾亲自对四名被害者加以踢踏、拷打，并且协助检察官整理了审讯笔录等材料。之后，把这些人送交承德地方法院特别治安庭处理，结果宋某（承平宁区政府助理员）等五名被处以死刑，其余的分别被处以无期徒刑及各种有期徒刑。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我奉检察官龟冈忠彰的命令，和其他五人，于锦州监狱，把锦州高等法院依据《治安维持法》判处死刑的中国人申某绞死。

日伪捕杀中国人民犯罪行为档案摘录

1939 年

根据“热警特秘第七三六号”：自 1939 年 1 月至 4 月，逮捕 343 名。

根据“热警特秘第八八九号思想月报”：自 1939 年 1 月至 6 月，共逮捕 424 名。

1940 年

根据“热警 9 月报告”：1940 年 1 月至同年 7 月，共讨伐 290 次，杀死抗日军 292 人，伤 194 人，捕 40 人。

1940 年 10 月至 12 月，在讨伐中杀死 79 人，伤 24 人，捕 11 人。

1941 年

根据“关宪作命第二六四号”：自昭和十六年（1941 年）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实施“西南地区特别肃正”。……“特别肃正”预计进行 6 个月。根据“关防作命第二八号”关东防卫军命令，自 1941 年 9 月中旬开始施行：“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两个月。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一齐检举”事件：

一、根据“承宪作命第二五号”：喜峰口宪兵队于 8 月 23 日，在喜峰口附近逮捕中共领导的迁遵兴联合政府及地下组织人员 48 名。

二、根据“承宪作命第二一号”：承德宪兵队自 8 月 22 日至 28 日，在滦平县西南部之汤河口、古洞沟、金家台子及大峪附近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及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 84 名。

三、根据“承宪作命第三七号”：承德宪兵队自 10 月 14 日配合日军在密云县北部的“扫荡”，对中共地下组织实施“一齐检举”4 天。

四、根据“承宪作命第三九号”：古北口宪兵分队于 10 月 8 日在滦平县大水峪地区逮捕抗日政府关系人员 204 名。

五、根据“承宪作命第四二号”:兴隆县马兰峪宪兵派遣队于10月23日在马兰峪逮捕中共地下组织人员40名。

六、根据“承宪作命第四七号”:喜峰口宪兵队于10月24日在迁安县“国境地区”逮捕抗日政府及地下组织人员53名,其中包括妇女及2名12岁幼童。

另:根据“承宪高第三九号思想对策半月报”: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讨伐324次,杀死八路军1405名,伤197名,俘179名。

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施行一齐逮捕73次,共逮捕1942人,其中有14次大逮捕,共捕1099人。

又:根据伪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思想月报第五一号”:锦州高检自1941年1月至同年11月,共处理“思想犯罪”(应用《背叛法》)988件,1169人(全满1515件,2093人),其中不起诉者仅87人。

1942年

根据“承宪高第三九九号”:“西南部国境地区前半年(自昭和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六月末)肃正工作中宪兵服务成果”称,半年中施行“一齐检举”154次,共逮捕1293名(其中送石井部队4名)。

根据“关宪高第三八八号”(昭和十七年〈1942年〉五月):西南地区肃正工作第一期(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一日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四月末),宪兵服务成果。

检举次数85次;

检举人数956人(包括特别输送移交其他机关“估计送石井部队”5名)。

1943年

一、根据“热警宪特秘第二九号四之一”康德十年(1943年)八月十八日:喀喇右旗于七月十日,一齐逮捕中共领导之地下组织人员刘振德以下153名(地点喀喇右旗七家、五家、旺业甸)……

二、根据“热警宪特秘第五一号十之四六”(1943年8月24日):至6月份,“侦谍班成果”累计:逮捕抗日人员3053名。

三、根据“热警特秘第五一号百——五七”(1943年9月28日):7、8两月射杀11名,逮捕33名抗日人员、捕一般刑事犯15名。

四、根据“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二六九——四”(1943年11月5日):根据承宪作命在省内实施第一次“剔抉工作”,自9月中旬至下旬,兴隆县东部、承德县东南地区(迁遵兴政府)、青龙县西部(迁青平县政府)及东南部(青绥凌县政府)平泉西部

地区（承平宁县府），共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958名……

五、根据“热警特秘第五一号百——七三”：9、10月份对抗日人员，杀害4，逮捕198，诱扣27（根据本统计累计：射杀64，逮捕1535，诱扣197，总计1796），逮捕一般刑事犯22（累计386）。

六、根据“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三六九——七”（1943年11月12日）：自10月6日至10月19日，施行第二次“剔抉工作”，在兴隆、青龙、承德、滦平各县及喀喇沁中旗七沟一带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292名……

又：“档案摘要”：

一、1943年1月至2月，锦州省检举47次，检举人数95……

二、1943年1月至10月，锦州省检举4501件，6450人，事件送致5275人，释放894人，审讯中282人。

（选自《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日本人笔下的『无人区』

又一个“三光作战”(节选)

(日)姬田光义 著

和平的冀东丘陵地带的伤痕

——对鲁家峪、马兰峪的实地调查

鲁家峪由西峪、北峪等6个自然村组成。据说周围南北10公里,东西9.6公里。我们先去的是乡政府,汽车通过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停在了地势稍平整的乡政府门前。在那里,我们受到了乡长和乡干部们的迎接。随后,他们引领着我们去了北峪的一家农户,这家的主人便是“鲁家峪惨案”的幸存者、大难中存活下来的张俊金老人。张老先生的家住在山里,路两旁和山谷间种着葡萄、柿子、栗子等果树。看到茂密的树林和复杂的地形,便可断定,这里完全具备了抗日游击队根据地的天然条件。顺便说说,中国人对大难不死的人称为幸存者,意在庆幸死里逃生。据说当时村里幸存者寥寥无几。为此,我们特意访问了这几位幸存者。

“鲁家峪惨案” 1939年冬季,部分八路军进驻鲁家峪后,这里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竟发展成了冀东中部的重要抗日堡垒。不久,这里又相继设立了兵工厂、火药厂、被服厂。我们走进一家农户,据说这里曾经设置过八路军的指挥部。房舍仍然保持着原样,稍有不同的是,周围的树林里又新盖起几间房子。但是,当我们站在院中,体会当年八路军战士(当然他们都是农民出身的)和村中男女老幼谈笑风生的情景时,就会想到这个抗日村必然会引起日军的注意,因而也就成了日军激烈扫荡讨伐的对象。

日军对这个村第一次大规模扫荡讨伐,发生在前面讲述过的潘家峪惨案之后不久的1941年2月中旬。那天,集结在县城的约一千多名日本军和伪军,将鲁家峪团团围住。其中一部分人闯进了村中,八路军闻讯后立即撤往山里,未逃出去的七八百名村民,被用枪押到了村广场,广场四周架起了4挺机枪。日军和傀儡军令所有的青年男子裸身坐在雪地上,审讯后没有发现八路军,便又强迫人们揭发八路军和村干部的人名和下落。在此过程中,一个村民被杀死了。见仍没有告发的,随

即在村内放起了火。两个老人和其中一个老人的不足1岁的小孙女等共9人被烧死,焚毁房屋1931间。

第二次讨伐是在同年7月中旬至下旬期间。由两个方向来的日军和伪军,首先烧了上次扫荡残留下来的住房及此后村民重新修的房子,然后又杀了9人。不知日军从哪里获得的情报,非说村干部中有个麻子脸的人,便从村民中拉出8个有麻子的人,审问谁是那个村干部?但无人回答。在辨别不明之下,日军又从8人之中挑出3人枪杀,其中包括那名村干部。

到1942年,日军的讨伐、扫荡行动更加激烈。据日军记录,该年2月,华北方面军对属下兵团下达了当年的肃正大纲,指出:"首先把肃正的重点指向河北省北部,同时努力完成日军总兵站基地之建设。"根据此计划,由4月1日始,日军展开了冀东作战(一号作战)。此前的3月30日,日军就开展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国方面认为,冀东作战完全是此前"治安强化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设置"无人区"的开始。

鲁家峪是日军冀东作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据说作战开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亲自赴唐山督战,参战的是第二十七步兵团长、北部防卫队长铃木启久少将麾下的讨伐队。后据铃木的回忆:"日野原大队于4月22日及5月4日,挖开了鲁家峪附近的洞窟,缴获了大量的军需品,但仍受到了八路军的顽强抵抗。虽然到5月末作战大体顺利,但到6月末,八路军又开始了破坏道路、切断电线、埋设地雷等行动。尤其是7月4日和8月4日,八路军又在遵化县内分别全歼日军的一个中队和两个小队。因此,我军不得不又发动了一号二期作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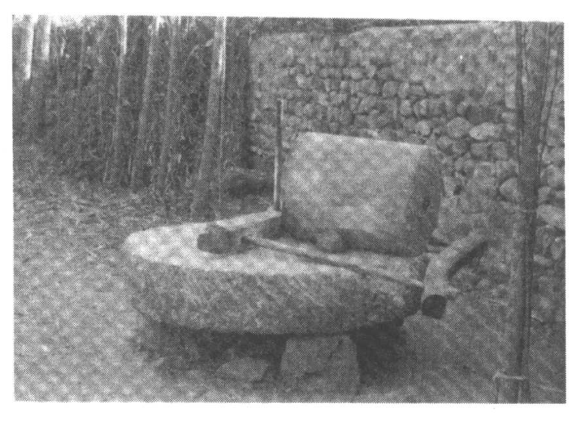
此外,中国方面也对日野原大队的作战行动做了如下记录:"在4月16日至5月1日的约半个月时间内,由于日军采取了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劫、大放火的军事行动,从而给鲁家峪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张俊金老人的证言 张老先生的家位于我们上山途中的左侧,临道,院子约有二三十坪(一坪36平方尺)。院前建有砖木结构的瓦顶门房,门房里铺着三合土,穿过此房便是里院。门房间的两侧是住屋,右侧住的是张先生夫妻,屋子里约有比双人床稍大一点的用土坯垒起的火炕。我们这10个男人就挤坐在这仅有3坪面积的阴暗小屋里,倾听着张老先生的叙述。

他说:"……4月20日,日军闯入了北峪。一听说日军来了,我和村里的17个人便迅速跑到山洞里去躲避。第二天,有个汉奸闯了进来,我无意中喊了声:'谁呀?'但那人没回声。我猜想这下可能暴露了藏身之地,为了不被敌人抓去,我们又向洞内挪了约15丈深的地方躲了起来。藏了一整天之后,大家饥饿难忍,便想法

① 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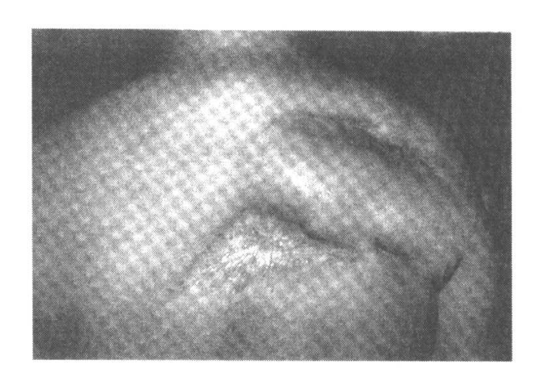
逃出去。岂知洞口被堵死了，好容易将其推开，逃出去了3个人，轮到我刚一探头，就被守候在洞口的敌人发现了。当他用刺刀捅我时，吓得我立即又缩回了洞里。过了好半天，我又悄悄地推开了堵住洞口的岩石，出去时未被敌人发现，便一口气跑到一个村子里，要了点饭吃，然后又爬到东边的山上藏了起来。但不知怎地，又被敌人发现了，遂跳下山崖逃跑，不料却迎面碰上了押送货物的敌人。原来他们和被抓来的200多个货驮子走在一起。逃跑之中也没看清，走近了便被特务抓住了。他们逼问我：‘你是鲁家峪人吗？’我假称是马兰峪的人，接着我就匆匆忙忙地混进了货驮的队伍中。这时敌人又对货驮的人一一进行盘问。当向其中的一个人问道：‘你是鲁家峪的人吧？知道军工厂在哪儿吗？’那个人刚说出‘不知道’三个字，敌人立刻举刀砍下了他的头。



这是当年曾让10人站立过的大石碾



张俊金



张俊金背上的枪伤疤痕

行进途中，我感觉肚子还是很饿，便悄悄地从货驮中抓了两个枣儿。正在吃的时候，被汉奸特务看见了，立刻打了我一顿。我一狠心咬住了那家伙的耳朵，在一旁观看的日本人都拍手大笑。

天黑之时，我们进了北峪村，敌人将我双手反绑着推到了一个屋子里。进屋后才知道，里面还关押着70多个村民。

第二天，敌人带来了一个姓李的游击队员，让他一同上山去寻找洞穴。他以漫不经心的样子佯装同意，带着敌人在山上转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因此敌人恼羞成怒，决定把他带回村子继续审讯。当他被推进屋路过灶间时，冷不丁地顺手

抓起一把菜刀,猛地向一个日本兵的脸上砍去,随后冲出屋外,接着又举刀砍在了另一个日本兵的肩膀上。他连刀也没拔,就飞也似的冲出大门外。没想到,他跑出不到200米远,就被敌人用枪射杀了。

那天晚上7时许,进来了一个姓金的翻译。他对我们说:皇军说啦,你们是匪区的,今天又把皇军砍了,皇军很生气,说这个村今后不许住人了,都把你们送到玉田县种地去,那里有吃有喝,还给工钱,有愿去的吗?在姓金的翻译欺骗下,有28个人(包括4个小孩在内)跟着他出了屋。在院里这些人又被绑了起来,然后被押到了约200米远的张景存家的白薯井前。就在此地,敌人对大人用刀、对小孩用铡刀,将他们都砍死了。然后将尸体都扔到薯井里了。

第二天早晨,还是那个金翻译来了,对剩下的40余人说:'昨日走了的人已全部到达玉田了,今天你们全都去。'说完,分别将5至10人拴在一起,带到现在的公社(全称是人民公社,如今人民公社解散了,但当地人都习惯这么称呼)前的广场上。当了炊事员的张景存看见我和他的二儿子绑在一起,便悄悄地说:'小二注意,薯窖里杀了好多人,你要多加小心!'

我们被带到刘万家的房前,敌人让大伙儿坐在这家的井前。这时有个像日本军官模样的人,先讲了一通话,然后用军刀向人群指了一下。一群日本兵便从人群里揪出10个人来,喝令他们站到大石磨盘上,同时又在井的旁边摆了一个长凳子,并让赵三提来一满桶水。稍后上来两个日本兵,先把小二拉出来,让他面向井坐在长凳子上,并蒙上眼睛。然后,日本兵把刀拔出蘸上水,挥刀就把小二的头砍掉了,跟着一脚将尸体踢入井中。下一个便挨上我了,还是蒙住眼,坐在长凳子上。就在杀我的瞬间,我把头缩了一下,躲开了屠刀。随后站起来就跑,但又被追来的日本兵抓住了,重新捆绑结实后,再次被拉到井的旁边。因我穿的棉衣领子高,一个日本兵在用手把我的衣领折下去时,我想必死无疑,也就豁出去了,一下子将他的手指咬住,那家伙痛得直叫唤。这时,又一个日本兵慌忙将我踢落到井中,接着从井上打了两枪。你们看,现在背上和眉头上的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

说到这里,张先生脱下了无领衬衫,裸露着上半身。我们看到他那魁梧的背部,确实残留着红黑色、轮廓清楚的伤痕。接着他又继续说道:"当时在我的身上又扔下9具尸体,也有未死呻吟的,压得我无论怎么挣扎,也动弹不了。敌人走后不久,赵三来取水桶的时候,我连叫了几声'救命',随后就失去了知觉。不知什么时候赵三找来人将我救了出去。同时也把其他尸体拖了上来,有两具尸体的头和身子还连在一起,其他的都被砍断了。"

看来写文章是很长的,但张先生的谈话仅有一个多小时。光顾交谈了,他拿出来的西瓜也忘了吃。只见他一边擦着滴滴答答的汗水,一边用手比划着表示,并把衬衣脱了又穿上,样子显得很激动。虽听不懂话里的细节,但当时的情景却紧紧吸引着我(我核对了翻译祁先生录的磁带内容,它与1956年张先生在沈阳对铃木启

久原日军少将战犯的审判证言是相同的)。

鸡冠山的洞穴 张先生的家属于东峪,房后的山叫鸡冠山。听了张先生的叙述后,我们顺便去看了那个山洞。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这一带的山脉,大都是石灰岩构成的。山上岩石的轮廓线流畅柔和,宛如婀娜少女的肩膀。表土流失部分已露出了白色的石灰岩,其样子很像规整的网格一般。岩石下边有很多自然形成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山洞,这就是令铃木少将头痛不已的抗日游击队或八路军的藏身洞。

其中,那个大山洞叫狐仙洞,大人可在洞里站立行走。据当地人说洞里可容纳300余人,而且还和别的小洞穴相连。我们前去参观时,见到洞穴的入口处及里面的洞顶已塌陷下来,不能进去。不过,在半山腰的附近有个入口,由此可知这个山洞从前确实住过人,但现在则无法进去了。

该山洞口已坍塌了一半,都长满了草。洞前竖立着一块写有“烈士洞”的石碑,上面碑文记载着建碑的由来。但石碑也倒塌了一半,看样子也没有很好地保护过。通过当地人以及陈平等先生的介绍,再参考一些文献资料可以证实,日军于1942年4月对鲁家峪讨伐时,曾在此地杀害八路军。

当时,狐仙洞住进了八路军(十三团)的伤病员和卫生兵约30余人。袭击鲁家峪的日军和治安军(傀儡军)约100余人包围了这个山头,并支起了帐篷,架起了电话,洞前还有一部分士兵站岗。因为洞里没有什么声音,日军遂将由别处抓来的农民驱赶进山洞里,让其了解情况。这时,洞里的八路军误以为是日军摸进了山洞,便向洞外开了枪。日军一看洞内有人,便向洞内发射了毒气弹,然后引爆地雷和炸药将洞炸毁。日军还在洞外监视了两天,见洞内已无动静,才下令撤退。后来得知,洞内的人全部被杀害了。狐仙洞附近的几个山洞也遭到同样的残害。据中国方面的文献记录,在一般情况下,日军先发射毒气弹,然后用炸药炸毁山洞。对从洞内逃出来的人,或在出口处击毙,或用刺刀挑死。在此次5天的讨伐中,日军在鸡冠山杀害八路军战士72人,伤病员23人,计95人。包括上述的事件,仅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日军在鲁家峪就杀害了225人。

马兰峪的“集团部落” 在鲁家峪的实地调查一结束,我等一行立即转往马兰峪。马兰峪距遵化县城西北约25公里,是低丘陵地带。它是由4个自然村组成的一处极为平凡的村庄。只因清东陵在此,故而闻名于世。马兰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偏西数公里处就是清东陵,它恰好位于丘陵与平原区的结合部。陵区内分别建有顺治、康熙等几位皇帝及他们的皇后、贵妃的陵寝。近代史上曾辉煌一时、阴险狡诈的西太后也葬在此地。清东陵西南125公里处便是北京。近年来,这里已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观光旅游地。

当然,我们不是来观光的。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实地调查一下,当年日军推行"无人区"政策下的"集家并村"或称"集团部落"的真实情况。

据日方的文献记载:设立"无人区"的目的,是为了封锁伪满洲国边境。为此,特在长城线内侧马兰峪至建昌(迁安北 20 公里)附近,划定了宽 46 公里,长约 100 公里的带状区域,作为"无人区",并将"无人区"中所在的村落全部移出。① 为此,日军从 1942 年 9 月实施了"冀东(一号作战)终期作战"行动。此次行动的重点之一,便是设立"无人区"。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封锁抗日根据地,还构筑了 200 多公里长的封锁沟。马兰峪恰好处于"无人区"的最西侧。不仅如此,在实施"一号作战"行动的前后,日军已将"无人区"向长城线的南北两方扩展开来。



马兰峪的幸存者闰子金(右、满族)和萧广(左)

我们在乡长的带领下,来到乡政府的一间屋子里,拜访了两位当年的幸存者。他们是闰子金先生(75 岁)和萧广先生(74 岁)。闰子金先生红脸堂,留着长胡须,看样子像是满族人。与同席的乡长谈话中,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因这里有清东陵,越过长城便是旧日满洲地带,故而此地满族人居多。他们两位相继给我们讲了下述情况。

"这一带的村庄分散得七零八落的,"闰说,"1941 年旧历六月,那年我 9 岁,日军便在此搞起了'集家并村',当时的'集团部落'在六合村,人们都被集中到了那里。那一年雨水很多,我清楚地记得,刚搬进'集团部落'不久,那间新搭的小屋便倒塌了。为了重建小屋,又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到了 1942 年的时候,日军又下令在'集团部落'周围用土和木料筑起了围墙。墙高约 1 丈至 1.5 丈左右,一个围子内,只有一个门。在接到搬入'集团部落'的通知后,谁要是磨磨蹭蹭的,他的家当即就被点着。原来的房子都被烧光了。凡到'无人区'打柴的,都要被杀死,种地也是在围子附近。另外,敌人还让村民在马兰峪村的周围转着圈挖了宽 8 尺、深

① 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 2 卷第 232 页。

1.5 丈的封锁沟，并由青壮年轮流站岗放哨。如果八路军来了，就得大声吆喝。封锁沟每隔一段还设置了瞭望塔。”

这里所说的“集团部落”就是前面所说的“人圈”。日军为了切断当地居民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便强令那些居住在山间僻壤的百姓离开家园，并将不愿搬迁的百姓家的住房、食物、家畜及其他生活用具全部毁坏、烧光。然后，把那些百姓驱赶进“人圈”，以便于日军的监视和集中管理。

但日军也清楚，他们把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赶出家园，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强烈反抗。曾任当地最高指挥官的铃木启久少将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用武力强制居民撤离，引起了他们的怨恨，八路军则借用‘三光’政策来进行反宣传活动。”

另外，据直接参与“无人区化”和“集团部落”建设的日军部队的《联队史》记载：在 52 天内，参与劳动的人员为 1957 万人次。在长城一带“无人区”建起了 76 个“集团部落”，可容纳 123 户村民 6454 人。同时还建起了临时性“集团部落”28 个，可容纳 2342 户，计 12 063 人。由此看来，日军对“无人区化”的实施规模之大、决心之彻底，就可想而知了。但它与中国方面的调查、研究后所发表的数字仍有很大差距。[①]

结束了在乡政府的采访，主人带我们来到乡政府后面的小山坡上，指着远处的一座建筑说：当年那里是东陵办事处，通称为“东府”，住着日军，现已改为医院了。我站在高处眺望了一下马兰峪的全景，这时主人又告诉我，前面左边那条路直通遵化县城，而右边那条弯弯曲曲的路则通往东陵。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比划着当年封锁沟的地点和范围。

我站在那里，眼前仿佛出现了从丘陵和山区中被驱赶出来的大批中国农民走进“人圈”的情景。

初听“集团部落”一词的人，或许会联想起清晨，人们随着日出而到墙外去耕作农田；日落后，又返回围墙内歇息，那种宛如田园牧歌一般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在严密的监视和命令下，“人圈”中的百姓，必须无偿地完成日军规定的生产任务，而过的却是非人道的奴隶生活；住的是小窝棚，铺的是破草席。缺吃少穿又无药，饿死、冻死、病死的现象时有发生。关于这些情况将在第二部陈平的论文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水泉沟的“万人坑”

——夏之离宫，承德的悲痛

水泉沟的“万人坑” 第二次实地调查是在 1988 年 11 月中旬，地点：承德市。

---

① 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 2 卷第 223、243 页。

同行者仍是陈、姬田、祁3个人。

虽然是11月中旬,但承德已披上了冬装,充满取暖煤烟的气味,而且煤烟像浓雾似的包围了整个城市夜空。到了白天,在冷空气的作用下,烟雾散去,这个山城的真实面目才显露出来。当初冬的夕阳西斜时,晚霞洒在周围的群山、市区的草木及家家户户的房子上,放出熠熠的光辉,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夜幕再降临时,整个城市又笼罩在充满煤烟味儿的夜雾中。

承德是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尤其是避暑山庄和点缀周围的寺庙群,更是闻名遐迩。尽管如此,据说这里的夏季也并非那么热闹非凡。这反而愈加凸显出这一夏日行宫的肃穆与壮观,不禁使人感到它确实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杰作。然而,令前来参观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座壮观的夏宫背后,竟有一处“万人坑”。它记录了承德人民的一段血泪史。



表土被雨水冲刷后露出了白骨,此现象在水泉沟万人坑一带随处可见(蹲下用手指着白骨的为笔者)

避暑山庄宫墙的背后,即市区西北角,有个叫水泉沟的小村子。现在已变成了郊外住宅区,区内建有老人俱乐部。而在日中战争期间,这里也仅有30户人家,极为荒凉。此地虽称做水泉沟,但它的周围却涵括了两边的数道小山梁和谷地,约1.5公里长。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坡上走去(水泉沟东边共有7道小山梁,日军占领时,从沟口往里依次编为“天、地、元、皇、宇、宙、宏”,其中第四道小山梁为“皇”字,俗名老阳坡,约30多亩,是承德监狱的刑场兼墓地,意为在这里杀人是“为天皇收回不良臣民”。姬田先生考察的即是这个地方——主编校),路两边荆棘丛生,狂风吹过不时卷起阵阵黄土。在较平坦之处,似人骨的东西随处可见。仔细环视四周,整个斜坡上,到处都是七零八落的人骨头。尤其是被雨水冲刷出的水沟旁,离地面十多公分的松软新层面上,显露出很多似大腿骨、肋骨及头盖骨之类的东西。这就是现在称为“万人坑”的地方,也就是当年日中战争期间的抛尸场。

1933年3月4日,日本军占领了承德。其后,在当地设立了伪满洲国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1935年时,又设立了承德宪兵司令部。此后又设置了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后改为总务厅警察总局)和保安局等机构,同时还扩建了承德监狱。凡军、警、宪部门抓来的中国人,都被关进了这所监狱。这些中国人或被当即处决,或让他们在狱中痛苦地死去,然后再将这些尸体用卡车拉走扔到水泉沟。另外,监狱方也将活着的中国人用卡车拉到这个叫老阳坡的地方,日军就像屠宰场宰杀温顺的羊一样,将这些人的头颅砍掉后抛尸在那里。据中方统计,1933年至1945年日

军战败期间,抛弃在"万人坑"的尸体约4.6万具,而当地人传说的数字大体在3~4万之间。遗弃尸体的数字不准确毫不奇怪,因日方也未留下当年的统计数字。据一位中国证人说:"日本人在战败投降时,已焚毁了大量的证据和文件。"由此,中方的统计数字不完全准确也在所难免。

但是说有了3~4万,或者说约有4.6万具尸骨,我认为还是有一定根据的。日本战败投降后,接收这里的中国共产党地方政府,一次性从地表上收集到的遗骸就有7000多具,后分别埋葬在20个大坟墓中。当地居民随时收集后掩埋的,也不低于上述的数字。此外,多年来还有一些零零散散裸露出的遗骨,也被当地居民陆续掩埋了。加之这里水土流失严重,有的遗骨被埋了,而有的则被大水冲走(当地村民潘树德等证实:小南沟口有眼两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冲进的死人骨头淤死,为了吃水还得经常淘井。有时候杀人多了,连河沟里的流水都是红的——主编校)。尤其是解放前,这一带十分荒凉,野兽经常出没,最多时竟有300至400多只狼和野狗前来觅食。

原承德监狱看守的证言 承德市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们请来了三位当地的知情者,其中两位是原承德监狱的看守,另一位是女性,曾是水泉沟的老住户。潘景荣,66岁,原为承德监狱的看守主任。他来到我们下榻之处,给我们讲了当年的一些情况,并亲自带我们到水泉沟的"万人坑"做了实地解说。他喃喃地说道:"我家住在水泉沟,小学还未毕业,就在监狱里做勤杂工,从那以后又被录用当看守,到1944年的3年里,曾先后任看守助理、看守及看守主任等职务。这个监狱在1942~1943年是接收监禁者最多的时期,记得在12个狱舍内,最多时竟关了2000人以上。"



日伪时期承德监狱的原看守潘景荣(右)与潘振魁(左)

"监狱内营养及卫生状况极其恶劣,每天都有病死、饿死、冻死的事发生。在监狱里受刑讯的事较少,因为这些人来监狱之前,已在宪兵队和警察署受到了拷问,所以监狱很少再过问。收监者中有小偷、杀人犯、经济犯和政治犯,而且是混在一起的。1942年以后私通八路军的政治犯多了起来。正所长虽是中国人,但任副所长的日本人却握有实权。全所约有十多个日本人,现在还记着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他举出好多姓名,但未记录),其中有个叫稻村的日本人,还亲自跟着行刑队去了

水泉沟,并带头杀了一名中国人。"

"当时看守中的中国人约有四五十人,在做看守期间,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水泉沟了。这里自日军占领承德起,便成了抛尸场。监狱里死的人用卡车运到老阳坡,然后便扔到山坡的西侧。我曾两次在老阳坡看过杀中国人的场面,第一次是枪杀了7个人,第二次是砍死了19个人。大家都说,扔在水泉沟的死尸大概有3~4万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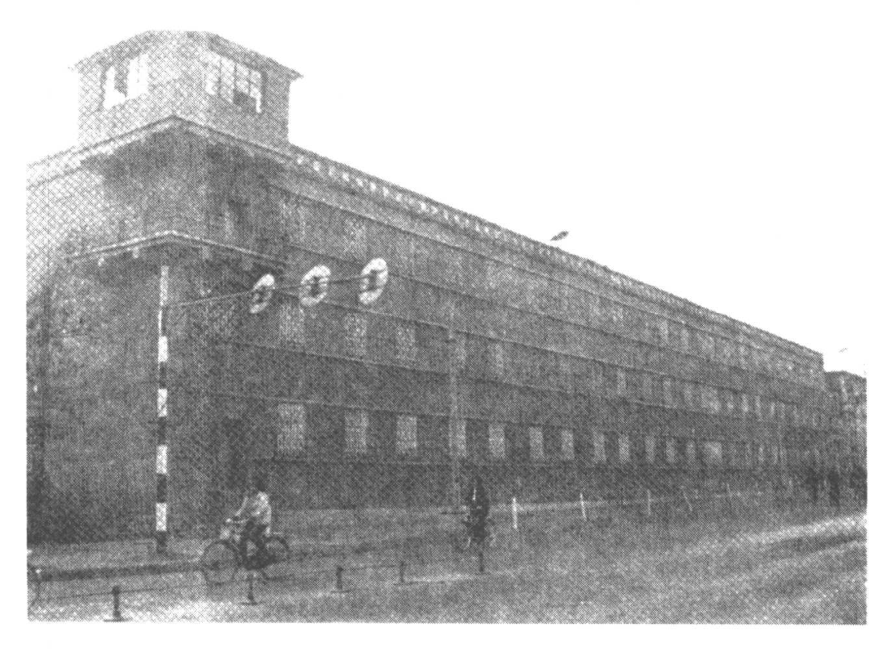
另一个原看守叫潘振魁(65岁)。他说:"我是康德8年(1941年)开始当看守的。"一个65岁的老人还能用当时的旧年号来叙述往事,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他记忆最清楚的依然是水泉沟的事。

他说:"当看守那年的冬天,在山坡上挖了3个坑,埋了47具尸体。那是'大检举'时的事。那天,大卡车拉来的人都用链子锁住头,其中46人是被砍杀的,另外一个人已经死了,所以尸体一共是47具(另一监狱看守潘振林证实,他曾经两次跟着去水泉沟杀人,一次杀41人,一次杀49人。第二次是两个叫木村和小木村的日本人砍的——主编校)。"

即使在现场解说时,这两个原看守说话的神态也显得很淡漠。我觉得他们如此平静地叙述往事,可能是经历的事太多了吧。也说不定他们偶尔还跟着日本人一起拷问和杀害过自己的同胞。因此,他们才作证说在监狱很少有拷问之事。不过,其他的中国人却悄悄地告诉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狱中拷问之事太普遍了,你看他们说话的样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此,我十分理解。凡给日本人当过监狱看守的中国人,都会在良心上受到谴责,他们想尽早忘却那段痛苦的经历。其实采访之初,陪同的中方领导已预先说明,请他们来的目的,只是了解一下当年狱中的一些情况,并非是追究他们的责任。但话题的本身却如炼狱般的痛苦,令他们不堪重负。除原看守外,陪同来的中国人几乎都是抗日游击队战士,现在又都是共产党的中坚干部。我感到这两种类型的中国人,都在互相揣测着对方的心理,谈话气氛较为拘束。同时,我还感觉到,他们双方似乎都对我们日本人保持着某种戒心。每个作证的人都不时地望着陈平他们,似乎在征询对方的意见。当看到陈先生微微点头后,便如释重负似地继续谈了下去。尽管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但听到自己的同胞在过去所犯的罪行时,仍有一种炼狱般的难熬感。不过,三者持三种不同看法的人还是说到了一块儿。那么,究竟此地有多少中国人被杀害呢?看来在场的几位中国人也众说纷纭,口径不一。见此情况,承德市委党史办公室陈桐先生作了如下的讲述,可以说是正式的结论吧。

日军为了维护承德周围的治安,并彻底切断中国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实施了"无人区化"政策,并为此在这个地区多次进行了"大检举"、"大逮捕"、"大扫荡"、"大讨伐"行动。在此过程中,除屠杀当地人之外,还把从外县抓捕的人带到承德,



现在的承德监狱仍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屠杀后将尸体扔到水泉沟。据1945年的正式统计，死难者约为4.6万人。

“大讨伐”是以关东军为主，辅以警察讨伐大队进行的扫荡行为。自1933年至1934年期间就进行了1190多次，杀了1452人，带到承德239人。其中一部分人被杀后扔到了“万人坑”。这种“大讨伐”在1944年、1945年时，达到了空前规模。

“大检举”发生在1935年至1943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承德县就采取了11次行动，共逮捕了1.8万余人。其中1600余人被押往外地做劳工。此后，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回来。在兴隆县，自1942年至1945年期间，共进行了12次“大检举”，第一次就逮捕了2000余人，其中200余人被杀害，40余人被送往承德，其余的都被送到东北做劳工去了。临近的青龙县，自1942年至1943年期间，进行了3次，有7230人被杀害，另有927人被送到承德后杀害。而宽城县仅在1942年就逮捕927人，也被送到承德后杀害了。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各地都在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但统计出来的数字未必准确无误。正如陈桐先生最后说的那样，日军战败时，在热河省政府的院子里，已将档案文件等全部焚毁了（现在的承德市档案馆里还存有极少数未烧毁而被抢救出来的档案资料，焚烧的痕迹仍在——主编校）。据说，大火持续烧了两昼夜，几乎任何统计资料都没留下来，但当年大屠杀的情景和死难者的人数却永远留在当地人们的心中，并将世世代代传递下去。不论是官方统计的4.6万人，还是人们传说的三四万人，真正持怀疑态度的，也只是那些否定日本制造大屠杀的少数人吧。

在中国人看来，刻在心中的印象比数字更有意义。我认为，在官方公布统计数字之前，当地的百姓已经心中有数了，而且还要将这一数字代代相传下去，这无疑对日本人是个沉重的负担。

"小新媳妇"的证言　小时候就住在水泉沟的徐桂英，60岁，精神很好，很健谈。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显得很激动。她说："我15岁结婚，就住到了水泉沟，在水泉沟碰到两次刽子手行凶，有一次刽子手押来了中国人，奶奶对我说：快去看看吧。可我害怕，说啥也不敢出去，所以这次什么也没看见。另一次是在阴历新年之前，我去街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见卡车上拉着一些中国人，都是背靠背地绑在木杠上。我还清楚地记得，过了新年，那些被处死者的家属们，连饭也不吃，都拥到山岗脚下来哭泣。"



曾居住在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

"夜里寂静得可怕，我更是不敢出去。他们把在监狱里杀害的尸体扔到山冈上，因此，招来了许多狼和野狗在此打转转，吃死尸，或把尸体叼到别的地方去。那时一下过雨后，到处可见鬼火似的东西在闪动。被运到这里的尸体和在此地被杀害的人，都是讨伐队捉来的老百姓，并非八路军。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吓得都不敢出门。有时顺着风飘来哭爹喊娘或'快让我死了算了'的痛哭声。"

虽然徐女士回忆起当时的恐怖情景时有些浑身颤抖，但她对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她说，这里是一片丘陵峡谷地带，共有30户人家，她家附近只有7户邻居。一位年轻的妇女刚嫁到这个荒凉的地方，看到的就是刽子手、数不清的尸体、成群的狼和野狗以及鬼火乱窜的可怕情景。她说一位邻居去抱柴禾，柴里竟夹杂着狼或野狗叼来的死人手腕子，把那个人吓得瘫倒在地，呆住了。不难想象，一个刚进门的小新媳妇怎么会不害怕呢？

徐女士的话使我想起童年时代，在盛夏的夜晚，人们都把床搬到外面去睡觉，大人、小孩在一起谈狐说鬼好不热闹。虽说现实中并没有妖怪之类的东西，当时也吓得我不敢一人上厕所。水泉沟的居民亲眼看到的是刽子手残杀中国人恐怖情景，而那些被处死的中国人的尸体的胳膊或大腿，又被狼和野狗叼得到处都有，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连门也不敢出"这句话，使人想到那位年轻的小媳妇，在门里屏着气，一动不动地倾听着外面的狼嚎鬼叫声，吓得浑身发抖的样子。

徐女士和原看守们还给我们讲了有的全村男人都被杀害，随后又被点燃，用汽油焚尸的情景。由此该村也变成了"寡妇村"。他们说，战后挖坑掩埋尸体的坟墓又被大雨冲毁了，尸骨裸露在外面，真吓人！

采访过程中,中方给我写了一个"黑烟"的日本人名字。我想这应是音译,正确的写法可能是"黑岩"吧。此人曾任承德县警务科警防股长,人们都说他最坏。当时对这个人的名字,大家都模仿发音叫"黑暗"。尤其是孩子们叫不好时,就说"黑暗来了"!以此来吓唬别人(黑岩,确有其人,警佐衔。他成立的临时讨伐队有400多人,非常凶狠残暴。我在老家承德县的东河川[现归兴隆县管辖],小时候就知道黑岩这个名字,我们那一带常用黑岩的名字来吓唬哭闹的孩子,一说"黑岩来了"!小孩就不哭了。他的翻译叫贾庆功,辽宁省大连人,也十分残忍,是黑岩的帮凶——主编校)。关于他干的坏事,办公室的人给我拿来了证人李钢写的证词。李曾亲眼看见过黑岩杀害中国人的场面。"有一天,一个怀疑是向八路军通风报信的男人,被黑岩抓去,遂将其带到水泉沟,开膛杀死后,又挖出心脏吃掉了。此外,他还杀过无数的中国人。日本战败时,黑岩在某村被村民抓住,送到承德后被处决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无论是中国人被残杀,还是日本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些都是历史银幕中的短暂残酷场面。我作为日本人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场景。我想有些情景可能夸张了些,把所有日本人干的坏事都安在黑岩的身上,使他成了心狠手毒的代表人物而遗臭万年。与此同时,在听了这些介绍后,不由得又使我联想起战败时日本人在遵化县的下场。总之,不管怎么说,侵略者是日本人,黑岩之类就是侵略者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处决他们,是因为中国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正当采访之际,我在中国的土地上获悉了昭和天皇驾崩的消息。此时我想到的是,国民在悼念天皇的同时,将如何看待那些以"皇军"的名义,去侵略他国而死去的日本人呢?

来自承德宪兵队的资料 如果说水泉沟"万人坑"受害者究竟有多少搞不清的话,那么制造这一惨案的元凶之一是日军驻承德宪兵队,则是确定无疑的了。在有关宪兵队的众多资料中,中方让我看了一份证明该宪兵队当年活动的资料。执笔者是战犯管理所的犯人木村(原材料具实名,考虑到本人的名誉,特删名留姓)。收容后,他写下了这份检举书和自供状。因此资料尚未对外公开,陈平先生也只是弄到一份复印件。现摘录如下:

"木村××,鸟取县人,192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不久入伍。1942年第二次出征中国大陆时,就任关东军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大尉),一直任职至1944年9月,后转任第三特别警备队队副(少校),不久日军战败投降。1945年8月17日于辽宁省横道河子被苏联军队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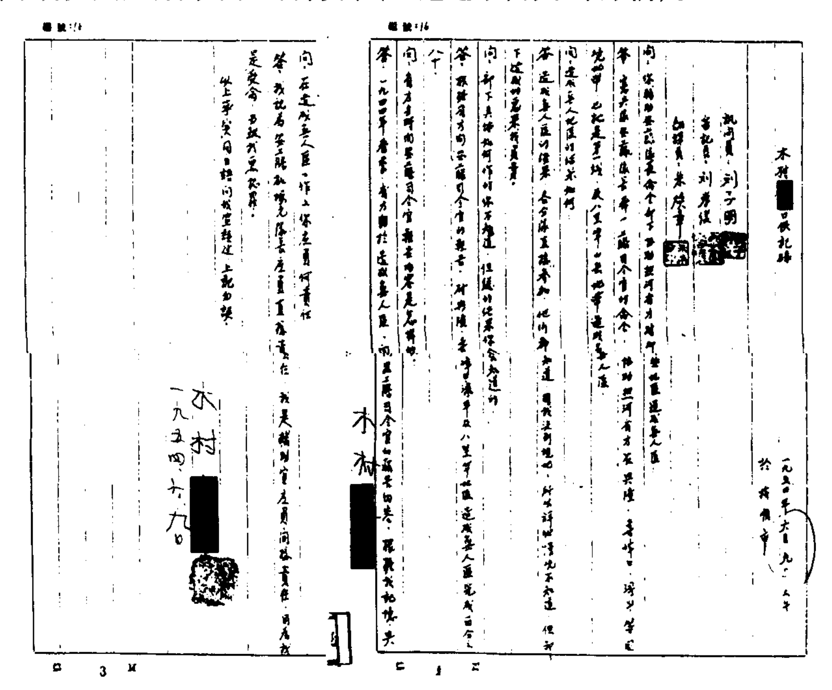
以上简历出自中国方面的检举材料和木村本人的自供书。中国检察机关的起诉事实,主要是根据木村在任特高课长时期所犯的罪行。木村本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说:"以上的综合意见书,翻译已用日语读给我听了。这里所载之事实,是我在侵略中国期间所犯的罪行。这些材料是我被讯问时亲自供述过的,并且

对此的一切证据我直接看过,或经翻译用日语读给我听了,我确认这些罪行都是事实。我对此负全部责任,并向中国人民认罪。我已在这个意见书的每一页上都签了名。”

被告人:木村××(签名)

1954 年 12 月 17 日于抚顺

附木村宪兵队特高课长的自供书(口述记录,有影印原稿)。



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的认罪记录

以上的文件是木村本人所写的手书,有汉语译文,并写有“于抚顺”的地名。木村在其口述中说是受宪兵队安藤队长的命令所为,但最终还是果断地承担了全部罪责。从审判记录的时间来看,是 1954 年 5 月至 1956 年 6 月,但是最终判决的时间则不清楚。

笔者在天津遇到过一位中国老人,他曾参与过当年有关抚顺战犯收容所的审理工作。据他说,政府对原满洲皇帝溥仪及其弟弟等的收监者都进行过政治教育改造,可他却不记得有个叫木村的人。据说,管理收容的都是罪行较重的犯人,但经政治教育后可以释放。

看来,被中国方面所摘引的木村综合意见书中,对木村个人的罪状论述也不止于此,因为对当时承德宪兵队所作所为的具体内容仅显示了一部分,兹将全文译载(但姓名仍以××隐讳)如下。

《木村××审理综合意见书》

(前略)

经侦讯结果,根据供认与调查证实,其在对我国侵略期间,所犯罪行如下:

一、策划、命令和参与指挥,大肆逮捕屠杀我抗日志士及和平居民。

该犯于1941年8月至1944年10月期间,指挥其部下在我热河省的承德县、青龙县、滦平县及河北省的密云县、迁安县等地方,逮捕村镇干部、和平居民2882人(不包括滦平地区的统计),用法西斯手段,对这些人进行了种种迫害,使用了拷问、殴打、吊打、灌凉水、灌汽油、电休克等酷刑。在严刑拷问下,杀害了1100余人,在监禁中死了48人。其中喜峰口宪兵分队在宽城一次就杀了80人。承德宪兵分队在承德西郊水泉沟一次就杀了100余人。更为残忍的是,将青龙县九虎岭村的赵相阁活活剜眼挖心,令其当场死去。其它的经伪法院判决后被强制送往东北的阜新、北票、安东等地做劳工,其人数为700余人。另外,1945年该犯在勃力县任宪兵分队长时,逮捕我抗日地下工作人员7人,根据东安宪兵队长上坪铁一的命令,将其中两名送至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七三一部队),作为实验品而被杀害。

二、参与策划造成无人地区会议,并命令部下执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罪。

该犯于1943年6月以特高课长身份,参加了西南地区防卫军植山大佐召集的造成无人地区会议。会议决定在热河省国境线地区实行"集家并村"。会后该犯执行了宪兵队长安藤次郎之命令,命令其管辖下的各宪兵分队执行了"集家并村"的罪恶活动,惨无人道地强迫群众建造"人圈",并将圈起来的群众设置警察岗哨加以看管。仅据青龙县九虎岭、石柱子、塌山、河西沟等村的统计,在"集家并村"期间被杀害的、病死的、饿死的村干部和一般老百姓就达300余人,其中有47户被杀绝了门户。烧毁民房600余间,拆毁民房200余间,抢走大牲畜100余头,羊300余只,猪150余头。其次将所谓"禁止居住区"的农作物全部毁坏。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在我热河省内所造成的残暴罪行是何等严重。

三、从事政治、军事情报工作以供日本侵略者镇压、屠杀人民罪。

该犯在任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兼对共产党调查班班长期间,积极地从事情报工作,采取各种手段大量窃取我党、政、军及抗日地下组织的情报、文件资料,以使日本侵略者对我热河抗日人民进行残酷镇压。该犯曾搜集了我党、政、军及地下组织的情报资料达370至400件之多,这些情报资料包括我党在热河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部门的组织机构、军事方面的作战计划、命令及我军在热河活动情况等。由于该犯提供的情报,致使我部队和机关人员经常遭受袭击、抓捕、杀害,实为残忍。为了搜集我方情报,该犯于1943年6月,组织利用平泉县、喀喇沁等地的家礼教(青、红帮)头子20名,并指示这些汉奸对我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及实行残酷镇压与统治。同时又于1943年6月参与决定对我热河省承德市人民的信件进行秘密检

查。又于1942年以该犯为首组织了特别思想工作班,利用李振山等5名汉奸作密探,伪装商人携带鸦片等物,潜入我抗日根据地窃取情报,致使我党在热河的工作遭受极大的损失。

四、奴役我国和平居民及逮捕镇压朝鲜、日本革命志士罪。

该犯由1939年3月至1945年期间,相继在我河北省邯郸和东北勃力,征用和平居民190人进行奴役劳动,并逮捕我和平居民两名送交宪兵队处理。1944年5月至1945年5月,曾相继逮捕了两名朝鲜抗日志士,分别送交朝鲜伪总督府警察部和牡丹江检察厅处理。又于1944年8月逮捕1名日本共产党员,审讯后送交关东军宪兵队处理。

询问者:刘子明
书记员:林栢芳
翻　译:田龙兴
1954年8月18日于抚顺

以上是"综合意见书"全文,后附木村的认罪态度及署名,日期是1954年12月17日。由此可知,从当年8月18日至12月17日期间,木村本人在仔细阅读了日文本的《综合意见书》后,终于具名认罪了。

承德"二·一"惨案　更有甚者,在此《综合意见书》所列罪状以外,还有一份有关承德"二·一"惨案事件的材料,检察机关认为木村应对此负有完全责任。在意见书制定约二年后,即1956年6月14日又附上了该材料。

事件发生于1943年2月1日。由前一天晚上开始,日本宪兵队分三组待命,从深夜至拂晓,日本宪兵队和承德县警察讨伐队同时对县以下11个村(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应为14个村——主编校)进行了突袭逮捕。由木村直接指挥的宪兵第一组,将鹰手营子村的男子全部捕捉,押送至新杖子村,在此地杀害了35人;在胖和尚沟村逮捕了70余个男人,亦押送至新杖子村,包括在逮捕途中杀害3人,共杀害22人;东涝洼村杀害52人,逮捕129人;南双庙村同样也是杀害52人,逮捕110人;苇子峪村杀害12人,逮捕80人;两益城村杀害16人,逮捕87人;小营村逮捕45人,后都押送至新杖子村。第一组被害者的人数达189人,其中有极少数逃跑者,在逮捕者之中有284人被送进承德监狱。

第二组是以田野大队为主力,袭击了胡杖子村、牦牛叫村和附近的一些小村。逮捕的人被押送至大队本部所在地的下板城,各地都分别杀了10人,有48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此次共逮捕280人——主编校)。

第三组是日本人"黑烟"(理应是前述的黑岩)所指挥的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袭击了三道河、黄旗湾、西大庙等村,共逮捕了250多人,押送至上板城村。其中,按村名的顺序有10人、13人、11人被杀害,44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

党史部门调查,参加此次大逮捕行动的日军和讨伐队共1000余人,其中第一股600人,第二、三股各200人——主编校)。

这三个组合计杀害243人,376人被送进监狱。而且被送到监狱之中的28人于一个月后在水泉沟处死。318人被定罪收监,216人在狱中及在东北强制劳动中死亡。总之,"二·一"惨案中死亡者达487人。

以上所述"二·一"惨案的起因,是日军获得了这些村庄已成为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根据地的情报。以前尽管经过反复多次的扫荡、讨伐和"集家并村"等治安肃正运动,但效果不佳。此次是因为承德宪兵队得到一份村干部的名单,便采取行动以图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但这个名单上有几个人的名字记得不清楚,村里的男人又不可能完全造册登记,而且姓名和相貌也未必与名单相符,再加上村民们也不愿意出卖名单上的人,所以日军只好将被抓的男人全部押往承德去审讯。而在他们的家属中,因病、冻、饿以及惊吓致死者又有150余人。"二·一"惨案后,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3个村竟成为"寡妇村"。据中方检察机关认定,木村身为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对"二·一"惨案的杀害、拷问及其他迫害事实供认不讳,应负全部责任。

在长城北麓沿线村庄制造"无人区"的记录

——旧热河省兴隆县

长城北麓历来是军事战略重地 清晨7点,我们乘汽车由承德市出发。太阳还没出山,整个城市笼罩在晨曦与烟雾之中,显得有些暗。当车驶出城内,一轮红日终于从东方升起,映照着四周环绕的群山。我们的车往西向与承德邻界的滦平县驶去。滦平县在承德市的西南部。我们来到长城关隘——古北口,这里是通往北京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承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而这一次的目的是进一步查证日军在兴隆县全面制造"无人区"的情况。然而由于有些情况出乎预料之外,致使此次调查未能成行。原来,长城线北部山区是北京军区管辖的军事重地,严禁外国人进入。这件事不但普通老百姓不了解,就连管理外国人行动的公安部门也一无所知。或许是以前没有什么旅游者和商人愿意去那种偏僻山区的缘故吧。因有天津市公安局给我们办的许可证(去未开放地区需持有公安局签发的旅行证),所以,我们以为此行必是一路畅通,还把此次调查日程安排了两至三天的时间。但是,管辖长城线北部几个县的承德地区外事办公室却突然通知我们:暂停兴隆的实地调查。我们只好改变了原定的日程和调查要点。对此,我深感震惊和失望。同时又为我们所调查、研究之目的涉及到了中国的不同情况而感到高兴。我由此想到,自古以来长城线就是历代政府最关注的地方,因它直接维系着领土、政

权的安危,所以长城线一直是战略防卫的前沿。其实当初构筑长城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在日中战争时期,长城不但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而且还是中国华北地区进行防卫的最前沿。

如今,早已进入了以导弹、核武器来掌控国家命运的时代。从中苏对峙(戈尔巴乔夫访华前)的国际政治漩涡中,中国政府似乎已认识到,以往的战略防御系统早已过时,长城充其量也只是一道阻挡苏军进攻的最后防线。尽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建国后的40多年中,中国人却一直墨守成规地视长城为御敌防线。这时,一位中国人悄悄地对我说:现在这个地区是河北省的,因此,按理应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不过,由于长城线的重要性,这一带又在省军区的上级北京军区(中国八大军区之一)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这两个不同级别的军区之间,希望长城线开放,吸引旅游者,有的则对旅游不感兴趣。这位中国人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论,不过,最近才允许外国旅游者去古北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以往说的长城其实就是指"八达岭"、"居庸关"。但与之相比,古北口的长城要更雄伟气魄得多。若能开放,一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并增加收入。总之,从历史书中已知古北口就是当年日中战争时期的战场之一。尽管此次不能去兴隆县,但我仍提出要求,同时希望乘车通过未开放的兴隆县和相邻的滦平县时,顺便看看山区的村庄。

可是,我们乘车走的是承德—滦平—古北口的柏油马路。其实,此路原是一条简易铁路,它是在日中战争时期,日本军队从满洲占领承德后,再进攻北平(北京)时,为确保运输才铺设的。因历史文献中未记载此事,听了主人的介绍后,还特意看了看。的确,在离公路不远的半山腰的杂草丛中露出一个黑洞,想必这就是当年隧道的遗址吧。据介绍,日军败退后,这条铁路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一个焦点。八路军首先控制了此地,其后内战全面爆发。八路军在撤离此地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利用它补充物资,便彻底破坏了这条铁路。由此可知,在日军战败的前后几年中,这条铁路也与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原日军修建的铁路轨迹,现已基本变成了北京至承德间的主要道路。

承德至滦平约65公里,滦平至古北口约50公里,是一条平坦而又宽阔的柏油路。我们的车跑在缓坡的丘陵地带和滦河之畔,窗外阳光明媚,滦河水清澈透底,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可是,当我们一行在滦平县委党史办公室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介绍后,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再也不像沐浴着初冬温暖的阳光和流淌着清澈的滦河水那样轻松愉快了。

长城北麓的山岳战——兴隆县 我们本应由承德去兴隆县,兴隆县在由承德向西行至滦平的大道再向左,即往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地方。整个县几乎都地处燕山山脉之中,到处是高山峡谷,一千二三百米高的雾灵山(应为2116米——主

编校）和五指山等高峰一目了然。坐落在这些群山山脚下及半山腰的座座村庄，虽然在日军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曾遭到了极严重的摧残，但它们始终是顽强抵抗日军的根据地之一。

虽然我们没能到兴隆县进行实地调查，但我们乘坐的京承线列车途经兴隆县境时，我也对它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些初步了解。

从北京到承德是普通列车，大约运行 6 小时。起初列车单调地奔驰在华北北部平原上，不久就进入了燕山山脉的密云县。从这里起，列车缓慢地在丘陵地带爬行，大约 3 个半小时后，如留神一下，可从车窗看到铁路两侧的部分古老长城。

这条铁路横贯燕山山脉，跨过万里长城，是一条新铺设的铁路。它代替了前面提到的古北口至滦平再至承德的那条老线路。列车一过了长城就是旧伪满洲国热河省境内——现在的河北省兴隆县。因不能进入兴隆县实地采访，我只好聚精会神地观察着窗外的风景。铁路的右侧即东面有五指山，左侧即西面有雾灵山。列车缓慢地行驶着，甚至下车方便一下也能追得上。我在列车里看到了准备作为候补考察的几个村名，它们都是山谷中的村落和沿小河两岸的山乡小镇。此时，我为不能去实地调查而感到扫兴，同时也越发疑惑：将这一带作为军事禁区是否有必要呢？且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当年日本官兵费尽千辛万苦，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徒步穿过燕山山脉，趟过溪流，来到这里的情景。大概他们以为只要把居民和游击队赶走，就可以永远确保伪满洲国的安全了吧。

列车从兴隆车站启动后，窗外出现了一条穿过燕山山脉通往承德的平坦大道。因兴隆之行受阻，地区党史办公室的领导又在承德接待了我们。作为补偿，他们安排我们去了滦平、古北口和北京的密云县进行实地调查。在密云县，陈平先生与我们告辞后，独自一人从兴隆经青龙县返回唐山。

本章刊登的照片，几乎都是陈平在沿线拍照的。现将陈平先生的谈话和他提供的资料整理后，来概述一下当年兴隆县的实际情况。

兴隆县的被害概况　长城横穿兴隆县界，是连接冀东各县和热河南部的要冲地区，因此，关东军很重视其战略位置。1933 年日军占领承德后，将长城设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特派遣一支大队在此防守。另外，八路军方面也把承德视为战略要地。1938 年以后，也派遣了一支分队来此建立并扩大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到 1941 年底，兴隆县境内的三分之二地区已是所谓的“两面政权”（白天是日军统治，夜间则是八路军的天下）。具体地讲，日军方面为了彻底实施“治安肃正”，决心在兴隆县内推行“无人区化”政策，实行“集家并村”，建立“集团部落”；而八路军方面则是要保卫和扩大这里的抗日根据地。两种不同方针的直接对立和冲突，使兴隆县发生了数不胜数的悲剧。

1942 年 1 月下旬，日军在兴隆县搞了第一次“大检举”。几天之中，就有 2000

多人被逮捕。同时，日军还在各地当场杀害400多人。除此之外，另有一部分人被强行带到中国东北。1942年秋，日军又进行了“大扫荡”、“大讨伐”，杀害了数千人。仅在这一年之中，就牺牲了八路军干部、党员、普通士兵1300多人。其中有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著名的指挥员包森，西部地区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田野等人。

第三年(1943年)2月初的春节之际，日军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检举”，除在各地枪杀了几百人外，其余的全部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时，在1943年4月至6月，日军实施了全县范围的“集家并村”——“人圈”，并在全县40%以上的地方制造了“无人区”，还把16万多亩(旧制计算一亩为61平方米)耕地定为“无住禁作地带”(禁止居住和耕作——译者)。这样，有2000多个村庄被破坏，多达11.2万的村民(当时是全县人口的81%)被关进199所“人圈”里。关于“人圈”的情况，陈平已写在第二部论文里。这里说的仅在1943年的一年中，被关进“人圈”的人就有6000多因疾病、饥饿和寒冷而死去。

由于抗日活动日趋深入，1944年2月，时值春节，日军在“人圈”内又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在这次“大检举”中，有2000多人被捕，各地当场被杀的有数百人，剩下的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年6月，日军进行了第四次“大检举”，又有500人左右被捕后，被强制带到中国东北。

1944年1月，日军展开对抗日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扫荡中，日军杀害了3000多八路军和老百姓，另有1000多人在逃难中冻死、饿死。

此后大规模的“检举”、“扫荡”虽未记载，但是各种名目的讨伐、搜查、策反等行动从未停止过，每次都有一些牺牲者。

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4年的3年间，在日军实施“无人区”的过程中，有1.54万人被杀(这里不包括冻死、饿死、病死的人)，1.5万人被带到中国东北去当劳工。7万多间民房被烧，3万余头家畜被抢走。1941年统计全县有人口16万，日本战败后，减少到10万人。以上情况来自于兴隆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调查、研究资料，中国方面已将此调查材料汇编成书。总而言之，日军(也应包括伪军——主编校)仅在兴隆县内就杀害和迫害致死了11万人。这难道就是日本宣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明”吗？

汉奸特务郝席菴的供词　我这里有一份手稿，是用中文写的，近1万字，但这仅是原文的一部分。此手稿是陈平提供给我的复印件，只复印了有关兴隆县“无人区”的一部分。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郝席菴，日军占领时，他曾是兴隆县警务科、协和会(协助日军的傀儡组织)的负责人。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军阀张作霖的东北军中服役。他协助日军搞“大检举”、“大扫荡”，后又协助国民党在热河进行统治。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被以汉奸罪通缉。1951 年被捕，1954 年经兴隆县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此手稿是他被逮捕后在收容所以及在判刑入狱后所写下的供词。另据介绍，郝席菴已于 1960 年获释，后住在遵化县马兰峪镇。这或许是他经过政治教育表现不错的结果吧。

郝席菴写的供词，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弄清日军在兴隆县实施"无人区"的情况。据郝席菴的供述，1942 年以前，日军便开始进行小规模的"集家"，主要由当地的伪警察讨伐队来实施。但因此方式未能防止八路军的活动，所以，从 1943 年春到 7 月，日军又全面制造了大规模的"无人区"，即"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家并村——集团部落"。为了制造"无人区"，他们动员了兴隆县的傀儡政府及军队、警察、协和会的各级领导人、各村村长以及日军宪兵队（其中也提到了前文中说的木村的名字）、满洲西南国境边防守备队，即伪满洲国军，并集结了兴隆县的全部日军兵力，加紧制造"无人区"。

1943 年 3 月至 6 月进行"全县各村集家"，此期间内各村必须完成"集家"任务。凡有反抗者和在限期内不完成者，均以反抗日军论处。虽然此时正值春耕时节，但农民们不得不把全部劳动力用于完成"集家"任务，根本没时间种地，由此导致田地撂荒。

农民们无奈，只得忍着悲痛，拆了自己的房屋，每个人都背着家具之类的东西去指定的"集团部落"生活。可是，"集团部落"里没有建房屋，带来的东西只好散落在空地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空地里吃住。1943 年 4 月上旬，被指定集家的各村农民男女老少在武装警察的迫使下去修建部落的围墙和炮楼。同时，还要及时播种、施肥，干田间活计。因此，在这个时期农民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郝席庵手书的供词

到了 7 月，第一期集家任务大致完成了。全县 19 个大村（在一个大村的周围还有几个小村），每个大村周围都建了 10 个到 20 个集团部落，共有 200 多个（应为 207 个——主编校）。

搞集家的同时，日军又把八路军活动的山区一带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在那

里不允许老百姓出入、居住和播种农作物。而在"完全无住禁作地带",甚至连动物也不让生存。不过,也有人坚持不去集团部落,而是在山区坚持斗争。这部分人多数是居住在雾灵山附近及长城线一带的农民。

日军在兴隆县进行大集家的同时,还在长城线以南的冀东各县和兴隆县相邻的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在长城沿线15里的地方,还强制农民挖了"惠民壕"(即封锁沟)。当时日本人吹嘘说:"惠民壕"的工程及长度如同万里长城一般,以后就可用其来消灭八路军。

兴隆县的大集家任务完成后,200多个"集团部落"里都驻守着伪满洲国军、武装警察、地方义勇奉公队。在主要的据点部落还设有关东军、伪满洲国军、警察讨伐队、警察分住所、保卫所、警防所及特务机构。

郝席蕃供词中证实的"集团部落"状况只是一少部分,陈平先生在论文中已详细地概括整理了这些材料。所以,我想如将陈平的论文和上述供词连贯起来看,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县的状况有个全面认识。下面将集中介绍兴隆县的几个案例。

"寡妇村" 在我得到的部分复印件中,还有一份郝席蕃供词中涉及1943年春节时在"人圈"中搞"大检举"屠杀事件的材料。此事件发生在兴隆县蓝旗营村。

蓝旗营村的"集团部落"——"人圈"设置在兴隆县城东南约70公里的地方。1943年春节,日军在兴隆县潵河川50多个"人圈"内搞"大检举",共有2000多人被逮捕。其中仅大帽峪村的居民就有200多人被集中在蓝旗营村的一家大宅院里。日军把他们捆起来,令他们坐在冰冷的地上。四周巡视的汉奸特务如果看见哪个人想站起来,就用棍棒毒打。在这3天的时间里,他们没吃没喝,每个人都受到了严刑拷问。拷问的内容有"八路军在哪儿?部落里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报过信?八路军收集的公粮(作为税金的东西)在哪儿?"如果谁说不知道,就必然要受到火刑、灌凉水等刑罚。特别法庭派来的日本人亲自进行审讯。由此可知,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大检举",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抗日力量。被检举出来的和被杀害的大都是大帽峪人,还有一些是"大检举"之前就被特务盯上的村民。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

大帽峪在蓝旗营村往西约1.5公里的山湾里,是山区中的一个较小的"人圈",仅住着67户人家。汉奸带着实施"大检举"的要员来到这个村子时,那名要员被埋伏在村里的八路军侦察员击毙(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来这个村的为特务高占英、王贵山,高占英在拷打村民曹万章时,被八路军侦察员杨采章击毙,王贵山逃跑——主编校)。其后八路军撤走了,但村民却被前来报复的日本宪兵和警察讨伐队包围,村里的73名男子汉被抓走带到了蓝旗营村。日军对大帽峪人的拷问是最严厉的,处罚也是最残酷的。郝席蕃的供词里这样写道:"日军用黑墨汁在大帽峪

人的鼻子上做了记号,用红墨水在其他部落居民的鼻子上做了记号。做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无人知道。到了旧历正月初八(阳历2月12日)下午,被捕的人每人都得到两碗粥。此后,日本宪兵队进院说把大帽峪的人都予以释放。让凡是鼻尖上带黑墨汁记号的人(打错记号的好像也不少,约有120多人)都站出来。宪兵和讨伐队把他们带到蓝旗营村的"集团部落"外边的一个大坑前,便用数挺机枪进行扫射,当场死难者达120多人。其中除了大帽峪人之外(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在此次集体屠杀中有大帽峪村30多人,在被捕的73人中,另外30多人被押送去了兴隆县城,该村这次死在蓝旗营和外地的共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没有了男人。因此,被称为"寡妇村"——主编校),还有青杏沟的20几个人,马圈子南沟10几个人。院里剩下的人,第二天全被送往县城。这次被杀害的120余人中,只有3人死里逃生。"

大帽峪村的杨茂林就是当年这3个幸存者之一。据他讲,当时是让30几个人排成一队,然后捆在一起下到坑里去的。120多人不是一起杀的,而是分成3组击毙的。或许因杨茂林是最前面的一组,所以他才侥幸逃离虎口。杨说:"审讯时我装哑巴,其他人也帮我说'他不会说话',因此我没有受到刑讯……正月八日早,我们被喊了出来,让我们在雪地上坐着,周围用绳子圈了一个圈。不许我们抬头,抬头的人都挨了棍棒。敌人给其他地方的人每人一碗粥吃了,大帽峪的人每人给了两碗粥。大帽峪的人喊着:'我们要回家!'当时青杏沟的司贵明的父亲也混入大帽峪人之中。除了夜里被送往兴隆的人之外,我们这批剩下的30多人排成了一队,四周敌人押着,把我们从部落里带了出来。我走在最前头出了大门。这时,敌人中有五六个向瞭望台走去。当让我们下坑的时候,我撒腿就跑。几个特务追过来,棍棒两次打在我的头上,又挨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左肩穿过去。但是,我还是拼命地跑着,进了南山,终于逃脱了虎口。"

大帽峪百姓所受的迫害不仅仅限于这些。这场悲剧发生之后,留在"集团部落"的村民又遭到直接开进来的日军和特务的审问。这一次又有8人被害,而且有62人因疾病、饥饿、寒冷而死(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证实:从这次惨案到日本投降,大帽峪村被日伪军摧残致死139人,占总人口的57.7%——主编校),剩下的102人都是老人和孩子、病人和寡妇。兴隆县人已将这些记录编成了资料,并命名为"寡妇村"。它不仅记载着1942年以前的大帽峪、蓝旗营的血泪斑斑的历史,而且记载着兴隆县人民13年多惨遭世上少有之横祸的历史。

如何看待杀害记录资料 我只是乘汽车经过兴隆县的主要大道以及乘火车横穿该县时看到了沿线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实地去访问深山抗日根据地和广大农村。据证实,日军在该县残酷地制造了"无人区",同时还杀害了许多老百姓,恐怕这里被害调查记录是最多的。老实说,我在写以实地调查报告为主的第一章时,难以抑

制因为没能到兴隆县实地考察而留下的惭愧，如果中国将来能开放该县，届时无论如何我也要去那里访问。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看到兴隆县保留的大量资料和调查记录，又在顺利地考察中了解到兴隆县相邻各县的情况，就感到只靠一两个日本人一知半解地调查和旅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被害情况以及不成声的“阿鼻”叫唤（佛教的说法）、怨恨之声的，对此往往产生一种四肢乏力那样的恐惧感和软弱感。在日本读者诸贤中，不是也有许多先生有着与笔者同样的感想吗？而在这可庆的新元元年，也许有人会对笔者这样揭发极端可憎的民族血统的作法加以指责。

这里重申，历史学家是难当的。喜欢把自己的丑恶面目映在穿衣镜里的人为数不多。历史学家就是要把现在日本民族好看的外表里面的丑恶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还是一时的，这里姑且不论）形象化地暴露出来。因为我坚信，只有这样做，才是全面地看待日本的历史。

有些学生问我：“历史学家是人还是神？”我马上回答：“如果二者必居其一，就只能认为是神。”如果不确信是神，就会吵嚷新天皇如何如何，新元号又这个那个的。在这动乱中我去了中国，因此未被卷进去，这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但我不想从表面看日本民族而去解释说明黑暗、辛酸的昭和史，打心里不愿给日本侵略的那一部分历史判罪。并且我也是个常人，尤其想到自己是日本人时，在中国幸存的证人面前就更没有谈笑的心情了。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实，不用分辨，我就是一个谨小慎微且在各种压力面前表现得十分软弱的人。写到这里，就不由地感到自己身心疲惫。实际上，今年元旦我已经去过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抗日根据地——盘山（现在是大城市近郊有名的旅游胜地）。一边游览盘山景色，一边向同行的陈平请教，使我受益匪浅。说起来，实地调查不光是身心疲惫，而且还深深感到，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调查范围很有局限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看了本书多次采用的《侵华日军暴行录》第二辑的内容（实际上是看了第一辑）后，冲动之感便油然而生。因为此书卷末附录上刊登的那份《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惨案统计表》，震撼了我，深感到“此事非同小可”。

表中记载着河北省（包括实施“无人区”的长城线以北旧热河省）的数字，还记载着仅一次就杀死 10 人以上无辜百姓的案例。当然这里边也包括八路军战士在内。例如，敌人每天进行拷问时，都有两三个人被杀害以及女性在半路上被强奸后再杀害的事。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大量被强行抓到东北当劳工而下落不明者。大致统计一下这个表中的数字可知，仅被害人就高达 8.1 万人。不知读者诸君看了这个数字后又有何感想呢？

这里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其中有些数字与本书资料的数字略有不同。例如：鲁家峪的数字里面就包括一些八路军伤病员。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发

展的统计和人口统计上也多少有些欠科学性。

那么,这些数字可信吗?回答是基本正确的。虽然这个数字比起"南京大屠杀"等数字来并不多,但我仍对这个数字持肯定态度,甚至还认为8.1万这个数字太保守了些。因为,除了战后当地政府发表的水泉沟这4.6万具尸体外,我们在当地听到和看到了许多证言及统计资料。此外,还有许多当地农民被日军强制押送到东北做劳工后又下落不明。应该承认,这种统计方法与统计人口的方式有着很大差异,因为统计经济人口时,需要掌握当地人口的每日每时的变化情况。

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一些否定屠杀的日本人极力诋毁中方的统计数字,说"中国的数字缺乏根据,不可靠"等等。其实,这些人甚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即受害者一方的统计数字要比加害者一方更容易、更准确。难道非得让那些死去的无辜者们重新复活,亲口诉说当时的场景后,他们才会相信吗!?因此,虽说水泉沟仅是4.6万,兴隆县仅是11万,但若再加上其他一些无法统计的数字,那么8.1万这个数不就太少了吗?当然,即使这样,那些反对者们仍是不能理解,仍会在那里指责中国统计的数字过分夸大。总之,他们的态度就是不相信中国方面发表的数字。与此相反,我之所以认为8.1万这个数太少,是因为这是中国人详细调查之后累计而成的数字,对此我深信不疑。我认为,兴隆县的11万和水泉沟4万多死难者的人数统计中,确实有重复的数字,但这里并不包括那些强制带走而又下落不明者。中方即对河北省来说,也未必能将这一数字统计得一清二楚。若怀疑兴隆县方面统计的11万这个数字不准确的话,那么我们暂且将其舍去,只把表中统计的8.1万和水泉沟的4.6万加起来,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不计那些下落不明者和10人以下的被害者,当地至少也有12万以上的人确实被日军杀害了。此结论并不过分。

此数字中几乎没有士兵,全都是无辜的百姓,且半数以上是"无人区化"的牺牲者,对此,我深感震惊。但是,对于我来说,感受打击最大的还是那些否定屠杀者行为的人。同时,我又对统计数字左思右想,认为在某种情形下,省略了10人以下屠杀事例也是在所难免之事。其实中国人也不想做出精确的统计,因不属于大屠杀,省略一点也在情理之中。10人也好,11人也好,这样的数字计算起来也很麻烦。但中国是个负责的国家,它既不会任意地玩弄数字,也不会笼统地、不负责任地把下落不明者说成几十万之多。

经常读日本的推理小说,就会发现作品中复仇情节之多,简直令人吃惊。其中大都是什么妻子、丈夫、恋人或儿女等被杀后,她(他)的男人或女人便最终产生了报复念头,随后就接连不断地杀人。对此我也想过,如果我处在那种情况下,说不定也会那样干的。我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问题。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不用说10人、11人被杀,就是两三个人也要悼念他们,誓为他们报仇。然而,在日本这种复仇小说大行其道的国度里,为什么会有人漠视中国人遭受侵犯、烧杀后的悲愤

情感呢？甚至还对饱受迫害的中国人理应提出的案情和数据横加指责呢？说穿了，他们就是想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从而达到推卸责任的目的，这正是我难以理喻之处。总之，请读者们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些数字。同时再请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些数字内确实包含着中国人对亲骨肉、爱人、朋友的怀念以及对杀人凶手的仇恨。否则，空谈什么"世人皆兄弟"啦，什么"日中永远友好"啦之类的大话，岂不成了荒唐的无稽之谈了吗！

邓一民 主编校
王建中 郭维藩 译

何谓"三光作战"

——中国人目睹的日本侵华战争（节选）

（日）姬田光义 著

初访当年"无人区化"的村庄

（1）传给后代的"无人区"及"三光作战"的历史事实

时间：1995年3月下旬。地点：中国北方山区。当我等一行跨过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进入巨大的燕山山脉后，发现山区中的无数条小溪仍结着冰。然而，山间吹来的阵风中，却已多少带来些柔和的春天气息了。只有那到处绽放的桃花，才给这些普普通通的山村增添了一道道春天的风景线。然而，看到当地人为了生产水泥制品，已把光秃秃的石灰岩地表层开凿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时，我突然感觉到，那些耸立着的花岗岩断壁悬崖也似乎意示着它们正在抗拒着人们的接近。

从这里一直向西延伸的燕山山脉，在黄河处被截断后又向黄土高原蜿蜒而去。无论哪里，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那里都会有从山脚下用石头垒起的层层梯田。由此不难想象，这些勤劳而又贫苦的山里人，在世世代代与自然的斗争中，已付出了巨大的劳作和辛勤的血汗。

然而，突然有一天，因日本人的到来，将这些生生不息的与自然斗争的山村，变成了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悲惨之地。日军首先实施"集家并村"计划，即用武力

将那些居住在依山傍水的村民们驱逐出村后，又强行将他们赶进已用土墙围起的“集团部落”中生活。随后，将这一广大区域划定为“无人区”。

当年，燕山山脉一带的抗日战争，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日军制定的这种“无人区化”政策的目的，一是要扼杀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二是要巩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的防卫。同时，为今后整体统治长城南北（亦称关内关外）一带打下基础。

虽说当地土质贫瘠，但它毕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和家园。当山里人失去这一切，又被强行赶进“集团部落”后，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只有病死、饿死或冻死。因此，人们开始反抗了，有的逃跑，有的拿起了武器。在此过程中，日军则展开了残酷的大屠杀，由此上演了无数次的人间悲剧。

中国人认为，正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中国人当然有权利进行自卫抵抗。同时中国人还指出，日本人的侵略及其暴虐行为，具体表现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方则称为“三光作战”，并且指责日本实施的这种“三光”政策是一种有军事和政治目的的灭绝种族式的大屠杀。而在万里长城线南北一带山区中所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则是这种“三光作战”的最典型事例。

另外，中国人还认为在当年抗日战争的各种复杂形势中，日军始终将主要敌对目标锁定在已成为今日大陆统治者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其目的就是要围剿和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华北一带，日军针对八路军采取了“扫荡战”、“歼灭战”以及“驱逐战”。而在此过程中，日军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三光作战”。从今日的角度来分析，所谓“三光作战”，实质上就是日军在广大区域内，长时间的对中国人实施的暴虐及非人道的残杀行为。

那么，“三光作战”或者中国人称的“三光”政策用语究竟始于何时呢？在结束了对“无人区”的调查后，我等一行人又访问了河北省的石家庄地区。在当地调查中我曾预想，日军实施的“三光作战”大概应始于 1940 年以后。因此，我向中方提出了听取当地有关“三光作战”受害者证言的要求。随后，我等一行来到了藁城市的梅花镇，当地的幸存者向我们详细诉说了 1937 年 10 月 10 日，日军在当地实施的屠杀、掠夺及强奸等罪行。由此看来，藁城市一带发生的事件，要比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更要早些，它应该始于“七七事变”后，即日军全面向中国进攻的初期。在我的意识中，把日军在藁城市梅花镇一带所犯下的罪行，统称为“三光作战”似乎欠妥，但中国人并不认同我的这一判断。他们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南京大屠杀”也就不属于“三光作战”的范畴之内了。由此不得不令人深深地感到，在“三光作战”抑或“三光”政策的时间等问题上，日中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正如本文后面所叙述的那样，从当时的历史过程来讲，尽管两国在这方面的用

语方式上未必能够达成一致，但作为日本人，首先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受害者一方是中国人。对此，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如今我们这些日本人，不但不能忘记先辈同胞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且还要更详细认真地去挖掘这方面的相关资料，以便将这些历史事实如实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么，怎样去传给？或者说应当传给后代些什么呢？我想，还是首先把我耳闻目睹的一些历史事实，传给我们的日本同胞吧。

(2)在燕山山脉中的山村里

那年春天，我访问的是万里长城北侧的几个点，即燕山山脉中的小山村。从行政划分来说，它们都分别隶属河北省承德地区的宽城满族自治县和兴隆县管辖。但在日中战争时期，这些地方都属于伪满洲国热河省的领地。

我等一行先从北京乘4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唐山，其后再从唐山换乘汽车北上约130公里，又来到宽城县城。我们乘坐的汽车奔驰在黄土平原上，这一带曾是当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下属的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应为第二十七师团第二十七步兵团。该步兵团于1938年7月15日由原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兵团改编而来，辖第一、二、三步兵联队，团长为永见俊德少将。改编后划归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战斗序列，并从塘沽出发赴南京方面作战。1938年11月29日，又调归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驻扎天津。团长相继由松山□三、铃木启久充任，辖第一、二、三联队和山炮兵、工兵、辎重兵3个联队，另有搜索队、通讯队、兵器勤务队等。1943年6月17日调归关东军战斗序列——主编校)，为讨伐八路军游击队而疲于奔命之地。其后不久，汽车便来到了当年日中两国军队曾激烈交战过的著名喜峰口战役的长城线。驶过喜峰口，便进入了深山峡谷。从这里起则属于当年伪满洲国的领地，同时也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独立守备队)及承德宪兵队司令部的防区。

关于长城南部平原地带的"无人区化"情况，我已在《又一个三光作战》的另一章中单独介绍过了，故本章不再赘述。其实在开始撰写本书时，一直给我做向导的陈平先生也曾计划带我去兴隆、宽城等地采访一下当年的八路军老战士，但因当时那里还是"未正式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故只得作罢。不过，这次经批准后的采访，向导仍然是陈平先生。

若乘车沿此公路一直行驶，便可直达承德市。但我们乘坐的车却在中途驶离了公路，沿着从山谷间流淌的滦河岸边，向碾子峪乡的大屯村驶去。那里是我们采访的第一站，也是此次采访中要会见的第一批幸存者(中国人将大难不死而生还者称为"幸存者"，可见中国人用语之贴切，其文化之博大精深)。此后的一周里，我先后走访了隶属于宽城、兴隆两县辖区内的11个镇、乡、村，当场听取了19位幸存者的证言。这些小山村都地处深山峡谷之中，几乎又都是山间土道，普通面包车等根本无法行驶。因此，我们只好改乘吉普车，摇摇晃晃地在峡谷间迂回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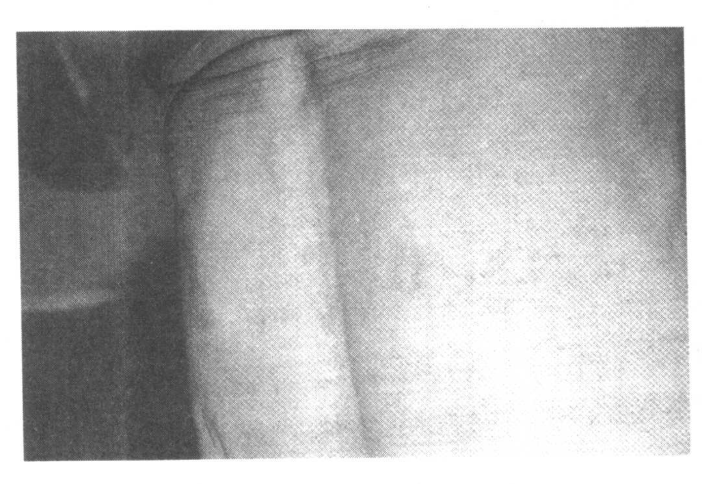
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幸存者侯永会(左)与刘凤兰

幸存者侯永会的证言 那是1941年初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为了搜捕八路军游击队,日军率领伪满洲国军的部队从喜峰口方向突袭而来,先放了三发炮弹后,敌人便从村子的东西两侧包抄过来。从村西口进来的,多是伪满洲国军的中国士兵,他们大都将枪口抬高向空中发射,所以那里的村民死亡人数较少;但村东口进来的都是日军,故死亡者众多。

当时,全村共有四百几十户人家。在此次惨案中,全家被灭绝的有14户,全家仅剩一人的有19户。侯永会当年整13岁,是和父亲一块被敌人抓住的。日军先用刺刀捅了他7刀,他当即昏死了过去。幸好他当时穿着厚棉衣,才幸免于一死。侯永会边说边脱下了衣服,让我观看他肩上和背上留下的刀痕。另据侯永会说,当他苏醒后才发现,其父亲被刺刀穿破喉咙后早已气绝身亡了。当时除了他父子二人之外,家里其他人都到邻村串亲戚去了,所以他们才躲过了这场惨案。

幸存者刘凤兰的证言 当时,刘凤兰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日军闯入村子后,母亲抱起她就往外跑。当刚逃到村外已结冰的河上时,母亲就被后面追上来的日军用刺刀捅死了。由于母亲的身体压在了她的身上,所以她才侥幸地活下来。日军撤走后,姥姥寻找她们娘俩时,才发现外孙女还活着。老人抱起她时看到,她身下的冰层已溶化成了一个坑状,包裹着她的小被子也被鲜血浸透了。在那场惨案中,她父亲也被杀死了,但怎么被杀死的却不得而知。此外,他的爷爷和奶奶也都双双死于日军的残杀之中。这些事都是在刘凤兰长大之后,在姥姥的反复念叨

中才逐步知道的。最后，刘凤兰又喃喃地说道，虽然是姥姥一手将她抚养成人的，但自她懂事起，就经常为失去父母之爱而深感伤心不已。不过，既然现在中日两国已恢复了交往，她也就不愿意提起当年那段伤心的往事了。



侯永会背上的刀痕清晰可见

第二个采访地是孟子岭的王厂沟，那里发生的惨案更令人震惊。我们从宽城县城乘车出发，沿柏油公路行驶了一个小时后，先到达了孟子岭乡，而王厂沟离这里还有 15 公里的山路。我们的吉普车沿着小溪边的山间土路驶过两座山后，才到达了这个深山中的小山村。其间，那狭窄的山间土路坎坷不平。当行驶在断崖上时，其土路宽度似乎仅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过。我在途中还看到，环绕在山间的层层梯田上种满了高粱、谷子和栗子树。

虽说王厂沟地处偏僻，但这里却有将长城南侧与承德之间连接起来的一条山路。因此，早在 1939 年，八路军就往王厂沟派过联络员。翌年，又将该村变成了秘密抗日根据地。

为了讨伐八路军，在 1940 年至 1943 年期间，设在孟子岭据点的日军曾多次进山扫荡过王厂沟。他们不但焚毁了村庄和粮食，而且还放火烧光了周围山上的树林。日军先杀害了村里的男人后，又把妇女们拽到山上去强奸。此外，为了铲除抗日根据地，彻底切断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日军还在 1941 年至 1942 年期间，将王厂沟及周边一带的山区设定为“无人区”。当地的村民都被强行赶进了设在孟子岭的“集团部落”中。凡有悄悄返回王厂沟的村民，则一律遭到了日军的枪杀。而日军在连续讨伐中，也曾在山里与八路军发生过激战。战斗中，有百多名日军被八路军击毙（据亲自参加过此次战斗、时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李中权回忆，此次战斗发生在 1943 年 5 月 16 日。当时关东军第一〇一师团第九联队春田中队 150 余人遭八路军 600 多人伏击，激战两小时，除 10 余名日军逃脱外，余被全歼。

八路军也伤亡50多人,其中包括阵亡的营长薛辉荣——主编校)。为了复仇,日军又对王厂沟的村民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镇压行动。

该村的幸存者们似乎都在尽力地去追忆日军当年的多次讨伐行动,以及那漫长的“无人区化”生活和“集团部落”中的那段早已尘封的历史。有时为了确认一个具体事实,他们还凑到一块儿核对数字。不过,从他们的谈话内容中可以证实,1943年夏季,日军在遭受了八路军的重创后,又对王厂沟一带的村民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全村600口人中,被日军杀害了112人,其中全家灭绝的有45户。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包括那些被强制赶进“集团部落”后死在那里面的人数。

幸存者刘殿功(78岁)的证言 1943年夏天,日军从四面包围了王厂沟村。敌人逮捕了村民后,便开始追问八路军的去向。刘殿功被捕后,先被押到孟子岭的日军据点,接着又把他绑在一个寺庙的柱子上进行拷问。因日军未得到任何口供,他又被押到喜峰口的宪兵队驻地。此后,他又辗转被关进平泉及承德的监狱。最终,他在承德被判了无期徒刑,随后便被强制押往锦州的纺织厂做劳工。

日本刚战败时,他也没被释放。后来监狱里发生暴动,他乘机逃脱了,但很快又被日军抓了回去。不过,后来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也获得了解放。当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刘殿功一心想回故乡,便徒步沿途乞讨,最终总算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小山村。当年和他一起被押往东北做劳工的共有4人,而活着返回故土的仅他一人而已。返回家后他才知道,在那次日军的讨伐中,父亲已遭杀害,妻子被强奸后又被虏,当年9月也死了。据刘殿中回忆,在他所了解的范围内,当年那场大屠杀中村内全家灭绝的就有4户。

幸存者李春达(73岁)、刘成国(62岁)的证言 日军第一次来这里是1941年春,目的是“集家并村”。当时,村里有4位老人不愿意搬走,日军当场就点着了他们的房子,人也烧死了。开始时,日军只是命令全村人拆房子搬走,到后来便将不服从命令者立即处死。

那是1943年夏季,玉米刚吐穗。当时村里的人口已大为减少,而八路军的活动也有所减弱,这时日军又来了。这次他们先烧庄稼和粮食,接着又对没搬走的村民开始了大屠杀。

李春达的祖母、母亲和他的未婚妻被日军拽到山上强奸后杀死了。他本人虽然逃脱了,但身上还是中了4枪。

刘成国的祖父当场被烧死。其父也因参加过八路军,被日军抓住后就押送去了承德,后来又在那里被处死了。当年刘成国9岁,他曾徒步去承德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此后,他和祖母、母亲、兄弟及其伯父一家人都被迫搬进了设在孟子岭的

"集团部落"中生活。在那里,伯父一家人中又有6口人患热病死去。

由二位老人的诉说中可知,在日军的这次行动中,村里被灭绝的有7户。包括那些不愿意去"集团部落"的老人、病人在内,全村惨遭杀害的有四五十人。这些死难者并不是被抓到一块后遭集体屠杀的,而是日军闯入分散在山中的各家各户后将他们处死的。惨案发生后,日军曾在当地留守过一段时间,尸体被放置了七八天,气味十分难闻。后来,死者的亲属和村民们才把这些遗体汇集到一起埋葬了。此后,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山参加了八路军,与日军展开了武装斗争。

幸存者关贞瑞的证言 我们在去王厂沟的途中,曾在一个叫刘杖子的村庄会见了一位名叫关贞瑞的老人。据他讲,当时他刚7岁,全家6口人都住在王厂沟。那是1943年夏季,全家人正在吃饭时日军闯进村来,逃跑之中父亲首先中弹而死,母亲则带着哥哥、他及3岁的弟弟急忙钻入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躲起来。因弟弟害怕直哭,母亲惟恐哭声招来日军,便将弟弟的脸紧紧地摁在自己的乳房上,结果弟弟竟窒息而死。日落时母亲以为日军走了,就爬出洞口去看情况,不料却被守候在洞口的日军给抓走了。后来得知,母亲是被日军强奸后,又用刺刀剖开肚子杀死的。

母亲被抓走后,他和哥哥也被日军从洞里拖了出来。日军用刺刀捅了他哥俩的腹部后,又把二人扔回洞里,随后用石头封了洞口。哥哥当即死去,幸好关贞瑞的刀口较浅,他就自己动手清理堵在洞口的石头,后被前来寻找他们的亲戚救了出来。在这次惨案中,他亲眼目睹了惨遭杀害的母亲和哥哥的遗体。

另外,他的祖父也是被日军害死的。有一年,他祖父在别处给八路军放哨时被日军抓住了。敌人先用刺刀剜掉了他的双眼,随后又将其残忍地杀害了。这样一来,他全家6口人中竟有5口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下,活下来的仅他一人。关贞瑞老人说:"如今一干点儿重活儿,伤口就疼。虽说我是个受害者,但从没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

全村人都是证人 中国人把上述这些屠杀事件习惯上称为"惨案",如果将中国人说的"惨案"一词译成日文的话,则用"事件"二字较为贴切。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对中国人来说带有明显的轻视之意,但作为撰写本书的作者,我认为若将每个杀人情节都说成是"屠杀惨案"的话,那么日本读者也就难于理解了。我还在孟子岭一带听取了另外一些当地较为知名的重大事件,如九狐岭事件等等。当然,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事件我未能采访到。不过,宽城县的采访结束后,我又对兴隆县进行了调查,其中还访问了一些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中未提及过的地方,如蓝旗营、半壁山、鞍子岭、羊羔峪、栅子沟等地的镇及村庄。在那里,我会见了一些幸存者,同时也听说在我之前,曾有一位日本女性也走访过这些地方,并准备为此发表

论文。虽然本书的对象并非仅局限于“无人区”，但其目的还是想让当今的日本读者去了解一下，日军当年在当地干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不过，像上述这种听证调查方式，中国人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那些已选定的证人，以及他们曾在何地做过几次证言之事，都如实地告知给我们这些外国人，这似乎已成为中国的一种惯例了。然而让那些已选定的证人把预先准备好的东西，再复述给听证人的方式也有问题。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则很难再打听出一些更详细的，以及更鲜为人知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在一些疑窦丛生的日本人中就有人不相信这种证言了，而且这还成为了一种趋势。其实这种现象并非是仅对中国人而言的。当年日本人在听取调查战争体验时，不也是同样持这种怀疑的态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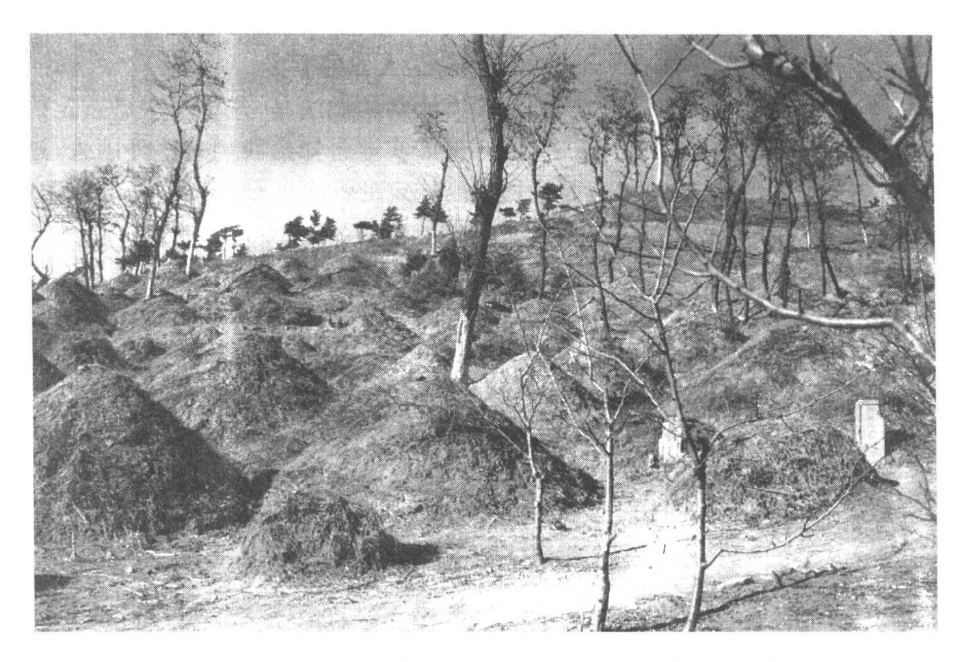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式的这种听证条件并非尽如人意，但亲临实地去了解当地的状况，直接聆听幸存者的证言，也是调查工作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吧。因为要想全面掌握过去的状况及事实，仅从书本或资料中是无法获得的，而且也没有那种亲临实境的感觉。因此我主张，今后日中两国都要继续开展对幸存者的取证调查工作。然而，有些日本人既不脚踏实地地去调查验证一下事实根据，又不相信中国人，甚至还指责中国人的说法是“老生常谈”，对此我也就无言以对了。

虽说作者实地调查的事例不胜枚举，但仅向读者描述证言的详细内容和现场状况，也并非是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整个“三光作战”而言，我所举证的事例仅仅描述了“无人区”的一部分而已，并不代表整个事实的全部真相。

但是，作者之所以要举证上述这些事实，目的只是想提醒日本读者们明白这个道理，即当年活下来的那些中国人，一定会把他们当年的痛苦经历，直接地告诉给其后代（子子孙孙）及亲朋好友们。这已不仅仅是幸存者本人的事了，可以说，它已经融入了多数中国人的骨肉亲情之中。

在某个村子里，我曾故意试探着问一位幸存者：“你现在做的证言，有谁能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呢？又有谁亲身体验过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呢？”对此，老人坦诚地回答说：“那几户被杀光的人，当然不会出来作证了，而且，当年亲身受害者们也都所剩无几了。不过，目睹现场的仍有很多人，要说证人的话，村里哪家哪户没有受害者呀？可以说，全村人都是证人，无论问谁都一样！”听了老人这番话，围拢在我们身边的村民们，包括年轻人在内，都爽心地颔首称是。

尽管如此，我在旅途中仍屡屡苦思冥想：为什么日军抑或说是日本人，当年非要跑到如此偏僻荒凉之地来呢？为什么很多日本人非得死在异国人的强烈敌意和蔑视之中呢？想象一下，当那些气喘吁吁的日本人登上寸草不生的山岩，却突然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时，他们吓得四处乱跑的样子吧；再想象一下，我们的先辈在这里到处杀人放火，甚至于还干下了强奸妇女的这种不耻于人类的卑鄙行为吧。因此，我认为在赞美或把这些先辈们视为英雄之前，出于人类的基本仁爱之情，我本人及



兴隆县城郊外保存的牺牲者墓群，其中有墓碑的是当地村民的坟墓。

我的后代，读者及你们的后代，都不希望再度重演当年的悲剧吧。其实按我的本意，我并不想到如此荒凉之地来听这些沉重、痛苦而又难堪的话题。但我之所以要到这里来，且又要每天倾听这些沉重的话题，其目的只是想把这些珍贵的证言记录下来，传给后代，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并且绝不要重犯当年的错误了（本章中所记录的中国人的话语，皆为同行而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生、亦是我的学生铃木旭君给我翻译的，在此表示感谢）。

为什么及如何实施“三光作战”

(1) 日军开展的“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和剔抉”作战

那么，日军为什么以及如何去实施“三光作战”的呢？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方面所说的“三光”与日军实施的一般暴行有所不同，它指的应是日军自称的“毁灭、彻底扫荡、肃正、剔抉”等方面的作战。然而，即使今日的中国人也并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区分。例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把日军侵华战争中的全部暴行都统称为“三光”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因此，在中国的很多书刊中，有时竟将原“伪满洲国领土”上发生的“平顶山事件”、“集团部落”以及 1937 年末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等华北以外的事件，都记述在了“三光”政策的范畴内。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还将日清战争中的旅顺屠杀事件也归入了“三光”

政策。

仅从中国人的情感来看，“三光”确实代表了侵略和屠杀等含义。其实，我也曾论述过，要说日中战争就必须认为，它基本应起于日清战争时的那段前后长达50年的“对华侵略战争”。在此意义上讲，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的情感和认识了。但是，对于上述这种无限定的用语，本书则是无法采用的。鉴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只限定使用在抗日战争中的“三光”政策上——在此期间内，日军实施的“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及剔抉”作战上，因此，笔者也就首先按照当时的作战开展过程来进行研究了。此外，由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第一、二卷）对“三光作战”方面的记述较为详细，因此我打算在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三光”政策的同时，再根据日方的记述，将两者之间进行对比和补充，这样也许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吧。

按照中国方面的一般性理解——“日军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扫荡’和‘三光’达到了最高潮”，[①]现按年次顺序将当年的前后战况整理如下。

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七七事变）为起端，爆发了日中间的全面战争。当年末，刚组建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早已制定的《日军占领地域治安维持实施要领》，将矛头直指“以共匪为重点的团匪讨伐战，以期争取尽快破坏构成共匪的地带”。1938年末，广州、武汉陷落后，日军大本营又策划了“昭和13年秋季后对华处理方案”，并据此向华北方面军发出了第241号命令，要求该军“必须全面负责并确保现占领区——华北地区的治安稳定，尤其是……在谋求迅速恢复主要区域治安的同时，来确保当地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华北治安战》第1卷）。

而此时的中国方面也认为，日军已把战略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了占领区”，“今后，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敌后方战场将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七十年史》）。由此可知，从这时起日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已在华北地区展开了血战。

据日方资料记载，华北治安战的真正开始执行期间，是从1939年初至1940年春。日军的第一期治安作战是1939年1月至5月，第二期是1939年6月4日至6月25日，第三期则是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根据上年度前三期的“战果”，日本华北方面军又制定了“昭和15(1940)年度的肃正建设方针”，当年度的主要目标是在冀中、晋北等地展开治安作战。不过，1940年度中途的8月至12月期间，因中共的八路军倾其总兵力向日军挑战，从而爆发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当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兵力已达50万，其根据地人口也已近1亿。日军当年度的讨伐目的，一是要削弱共产党军队的扩张势力；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

---

① 《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2号中双雁的文章《日军‘三光’政策的破绽》。

傀儡政权，以便稳定华北一带的局势。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方面的总指挥官彭德怀将军（后任元帅及国防部长）对此次战役评述如下：

"百团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以及那些同情我们的人民，团结了持中立思想的人，使一些原来持动摇思想的人靠近了我们，同时也对投降派们所说的那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与了沉重的打击。另外，百团大战的胜利还彻底粉碎了那种八路军'游而不战'的谣言。"

"百团大战"确实使日军遭受了沉重的军事打击，但日军在接受惨痛教训的同时，也认清了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实力。因而痛感到，必须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展开不懈的攻势，以便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也有人批评彭德怀，说他集中兵力与日军打正规战，彻底暴露了自身实力。百团大战后，不但使日军提高了警惕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

上述说法是否确切暂且不论，但此后日军大规模地彻底讨伐行动，确实给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据"华北方面军军情报告"中称："就剿灭共军而言，各兵团通过连续肃正讨伐及对其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已使共军之战斗力蒙受了巨大打击。"此外，时任战区司令官的多田骏中将在报告中，先夸大了此次治安肃正作战已取得了实效，其后又称："在我军的连续的肃正作战打击下，山西省西北部及晋察冀边区的共军及其根据地已大部被消灭。此前三年其苦心积累的物资也同时被摧毁。在蒙受我军如此巨大军事打击后，共军的战斗力已明显丧失。"（1941 年 4 月，摘自《现代史资料》第 9 卷）

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该报告中的"消灭"一词，对此江口圭一已在其著作中做了详细介绍。他认为百团大战后，华北方面军则开始实施起原定的，包括使用毒气在内的第一期晋中作战（1940 年 9 月）了，而最先发出"彻底扫荡消灭敌根据地"等命令的，似乎应是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江口圭一的这一推测，应来源于前文所提到的那个桑岛节郎，因桑岛在其著的《华北战记》中曾说过："我认为，或许'三光作战'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田中隆吉吧。"江口据此写道："从桑岛的记述中可知，冈村上任之前，多田司令官就已开始实施'三光作战'了。"森田康平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说："由此可知，三光作战的实施，理应是从 1940 年的晋中作战开始的。"（所谓的"治安肃正"源起于伪满洲国，从 1932 年 3 月至 1945 年 8 月共进行三期。在华北，早在 1938 年 12 月 2 日，日军大本营规定华北方面军的一般任务：是确保现占领地华北的安全，特别要确保河北、山东、山西及蒙疆等要地的安全。华北方面军据此制定了 1939 年度治安肃正计划，此为华北治安肃正之始。到 9 月，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把治安肃正发展为"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日占区向八路军根据地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和消灭抗日军民。从"囚笼"政策到"三光"政策是治安肃正的不同阶段，而

"三光"政策则是"囚笼"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主编校)

在此我预先声明,虽说"三光"与"消灭"二词可认为同义语,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方面并不认同日军是从这时起才开始实行"三光"或"三光作战"的。对此,我认为按当年的实际状态来看,"三光作战"理应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后,日军便在这次军事成果的基础上,又乘机对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施起了综合治安强化。但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台前者是傀儡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其治安军,而幕后操纵的则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不过,这次日军在要求傀儡政权提供配合的同时,又向中国人明确提出了经济封锁与地方自救的方针。

(2)"三光作战"的开始

由日军和傀儡政权共同开展的治安肃正强化运动,总共进行了5次。第1次是1941年3月至5月,第2次是1941年7月至9月,第3次是同年11月至12月,第4次是1942年4月至6月,第5次是1942年10月至12月。

中国方面指出,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还同时向冀中、冀东、晋中等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扫荡战"和"驱逐战",由此给中方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我认为,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实际上就是日军的"三光作战"或中方称的"三光"政策的开始(由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编写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指出:从1941年起,日军将华北地区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三种,在"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在"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在"非治安区"[即我根据地的基本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欲彻底毁灭我根据地。另外,"三光"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41年9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上,社论题目为"粉碎日寇秋季扫荡"。文中指出:日军在经济方面"实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口号,对于我根据地的建设事业更极尽捣毁焚毁之能事"。在以后的社论中也曾多次提到"三光"政策。姬田先生的提法与这些提法是相吻合的——主编校),而此后所述的中方一切损失也就都属于"三光"的范畴之内了。如此以来,便可以从日军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的综合成果上,来了解它是如何去压迫中国一方的。

据日方统计,治安强化运动的结果,包括全华北主要城市、交通线、重要资源地在内的全华北面积的10%已变成了日军稳定统治的"治安区"(中共方面称之为"敌占区");另有10%以上的区域是共产党势力统治的根据地,即日军所称的"未治安区"(中共方面称之为"解放区"或"抗日中心区");剩余的80%则是双方混战的区域亦称之为政治真空地带,即日军称做的"准治安区"(中共方面称之为"游击区")。此后,日中两军都围绕着这一区域,反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按照"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要求,日本华北方面军应在1943年时,把"治安区"扩展到全华

北面积的70%,同时还要将“未治区”缩小到10%以下。为了完成这一计划目标,日军全力在华北一带展开毁灭、扫荡、肃正等作战的同时,还要尽力去保护、维持傀儡政权,以及改善与之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

按中方的解释,日军实施的治安强化作战及相应政策,只不过是强化了“三光作战”而已,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其殖民化的统治。恰在此时,冈村宁次大将登场了。

其实,冈村是在1941年7月赴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因此,他理应不是“治安强化运动”和毁灭、扫荡作战的策划及推进者(“治安强化运动”是华北方面军根据八路军“百团大战”作战情况,在1941年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冈村虽不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最早提出者,但他是“治安强化运动”的积极推进者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说他是在华北推行“三光作战”的罪魁祸首也是不为过的——主编校)。恰巧,此时正值中共八路军方面遭受重大损失时期(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1941年7月7日,正是八路军“百团大战”过后不久,而日军的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3至5月]未见大的成效时期,所以,此时遭受“重大损失”的不是八路军,而是日军。冈村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困难局面而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同时,也正如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的:日军在计不得逞时,则索性实行它之所谓抢、烧、杀的“三光”政策。——主编校),且因冈村本人又是一位具有强烈反共意识者,就任后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使中共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再一次蒙受了重大创伤。因此,冈村就成为了中共的最大憎恨对象和头号攻击目标。

此外,冈村不但任期最长,而且就任末期又赶上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遂即他又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日方称总司令官),此职理应使得冈村深感责任重大。但值得关注的是,冈村宁次是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华北方面军的行动必须获得他的批准,即华北方面军“除必要的作战外,当将其部分兵力派往伪满洲国境线附近的热河省内作战时,必须获最高司令官的批准方可”。① 这就是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共同联手,在万里长城线南北一带推进设置“无人区”的法律依据所在。

据中方文献记载,冈村发动的这场“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和其后开展的“第3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翌年(1942年)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结果,给中共边区带来了重大危机。仅1941年的一年间,由千人以上组成的日军扫荡作战就有近百次,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有2次。尤其是向冀中根据地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中,被日军杀害或抓走的中国人就达到了5万。“冀中平原的很多村庄,一时间呈现出了村村有死者,户户穿孝衣,到处硝烟四起的恐怖景象”。

① 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对于这次所称的“冀中三号作战”,日军方面也极力夸大其战果。据一名原华北方面军的参谋回忆:“此次日军对共军的冀中作战,其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改善了华北的政治战略格局,应该说这是华北方面军的努力结晶。本次作战消灭了共军的冀中三军区,此举也使西部山区的冀西四军区受到了极大影响。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当年的共军活动大大减少了。”(《华北治安战》第二卷)为了保护铁路及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日军在展开扫荡之前,已预先修筑起了3900公里的封锁沟和1300座碉堡;为了达到经济封锁的目的,日军还构筑了自诩为“小型万里长城”的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据中方统计,在此期间,日军共出动了18个大队约5万人的兵力,对封锁线内侧反复实行了彻底的扫荡和清剿。

顺便提一下,为了修筑这些封锁沟,日军要求每90公里用70个工作日耗工10万人来完成。虽说这些封锁沟和碉堡都是日军自身用于军事目的的,但工事却都是由数十万中国民工来完成的。由此可知,日军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竟强迫中国民工以劳役形式来修筑这些军事工程。

此外,日军的战果记录中还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查中国人遗弃的尸体9098具,查俘虏5198人(另有嫌疑者20 568人)。那么,此后这些众多的俘虏和嫌疑者又是如何处置的呢?该战果记录中却只字未提。这也是日军战果记录的显著特征之一吧。

关于这一点,江口圭一也在其著作中有所暗示。他写道:“战果记录中的有关‘遗弃尸体’问题尤为引人关注。因为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1943年5月编制的‘肃正讨伐参考’中曾提到:‘仅从遗体数量增加来看,未必意味着敌军的损失数量多寡,因其中往往包括了众多的中国百姓。’”其实这种事简直是不胜枚举,无论是“南京大屠杀”或其他重大惨案中,受害最多的往往是中国百姓。那么,日军又如何去处理那些庞大的俘虏及嫌疑者群体呢?其实日军的做法很简单,凡中国人都列入被杀者之中,若不承认中国人的则另当别论。由此可知,中国人的命运是多么悲惨。

像这种先“军事划框”,然后对“框内”再反复进行军事扫荡,而后又“高度分散配置”——让当地傀儡政权及治安军(中共及中国人称之为汉奸)与之配合共同维持治安的方法,可以说是日军当年的一个独创之举。

另据受攻击的中方记录:除上述“治安强化运动”之外,日军还于1942年4月至11月组织了3—4万人的兵力,对冀东展开了扫荡战(此间,冈村亲自赴唐山督战,并与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的铃木启久少将达成了在万里长城线南北地带设置“无人区”和“集团部落”的协议)。在晋察冀,日军还实行了10次大扫荡和260次小扫荡。此外,日军还分别发动了春夏之交的太行、太岳大扫荡、晋西北的春季大扫荡、大青山地区的秋季大扫荡,以及向山东各地发动的春节大扫荡等等。

据中方记录,尤其是1943年,日军又对晋察冀边区展开了大小不一的扫荡战。

其中扫荡北岳地区 12 次，冀东地区 14 次，冀中地区 40 余次；在晋冀鲁豫边区，日军分别向太行、太岳地区展开了 6 次大扫荡；在晋绥边区，日军实施了 17 次大扫荡；在山东，日军万人以上规模的大扫荡有 4 次，千人以上的扫荡有 46 次。[①] 有关日军对这些作战情况的记录，都已详细刊登在《华北治安战》第二卷中，故此处省略不记。不过，无论查阅中日两国哪方的资料，里面记录的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数字。

在此期间的 1942 年，日军为了攻陷重庆，曾拟定了一份"第五号作战方案"，但由于此时太平洋战争的战局不利，该方案不得不取消。为应付当前局面，在 1942 年 12 月 21 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内阁确定了"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决定要强化汪精卫（汪兆铭）的傀儡政权。与之相呼应，汪政权于 1943 年 1 月发布了对美英宣战的公告。

至此，日本的"以华制华"政策初见成效。国民党军队中有约 25 万人向汪政权投降，将其编入傀儡军（日军称之为治安军）后，又令其开始讨伐共产党的八路军。除了伪军之外，另有一些中国人是以特务、密探、翻译、线人等身份来协助日军的。不仅如此，这些中国人也对百姓施加过暴力。因此，日军的暴行及虐待行为中不能加上这些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因为他们与日军不同，日本战败后，这批中国人经"清算斗争"，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

按道理讲，伪军理应是一支实战部队，但他们的作战实力及作用却令人生疑。像什么"治安军抛下日军自顾逃命了"，或者"治安军与敌军内部串通啦"，以及"他们把武器弹药私下卖给了八路军"之类的情况，其本意也并非打算让傀儡政权有一支能自立自卫的武装力量。故此，伪军与日军同床异梦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3 年至 1944 年期间，日本在太平洋区域的败势已逐步明朗化。为了挽回战局，1944 年日军又展开了当年的"第一号作战"，即打通横跨河南至湖南至广西的大陆讨伐作战。其中河南方向以第十二军为主，而华北方面军也抽出了众多兵力予以补充，但这支新建的部队素质明显低下。为解决兵力不足问题，华北方面军被迫成立了以宪兵队为核心，以治安军为主力的华北特别警备队，以便对重点地区进行警备及扫荡（这份"华北特警"的战斗详报，现仍完整无损地保存在防卫厅图书馆内）。

八路军很快就掌握了日军兵力不足及讨伐实力下降的情报，遂即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击战。至 1944 年末，在晋察冀地区八路军的势力已恢复到了 1942 年"五一大扫荡"之前的规模；到了 1945 年春季，曾被誉为"山地剿共实验区"的太岳地区，也获得了解放。对此，中国方面评价说，整个 1944 年歼灭日军和伪军 28 万人，迫使伪军投降 3 万人，攻占日军据点 5000 所，使 1200 万人获得了解放（《七十年

---

① 参见《七十年史》、《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华北抗日根据地记事》等资料。

史》)。战败前夕,冈村大将晋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尽管他以手中仍拥有100万正规军的实力而强烈呼吁坚决抵抗到底,但实际上,仅靠日军的这点兵力,已根本无法挽回“华北治安战”的败局了。

(3)中国在“三光作战”下的受害状况

在上述这种“三光作战”中,日军除了犯下“烧、杀、抢”的罪行之外,还制造了许多像“毒气事件”、“强制劳工事件”、逼迫大批妇女从军的“慰安妇事件”、四处滥发日本军用纸币的“军票事件”等一系列不法行为。他们当年酿造的这些恶果,我们当今的日本人不得不吞咽下去——因为我们直面的是与当年有关的战争责任及战后赔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述这些问题,各有关文献都分别进行了披露,故本文不再详述(例如最近岩波书店出版了一册吉见明义编的《从军慰安妇》等)。本文所研究的仅仅是日军的“三光作战”给中国带来的整体受害情况。

研究“三光作战”的受害情况,的确是一个庞大且又复杂的课题,至今连中国方面也未能明确提供出它的具体数字来。当然日军更不会将那些残杀无辜百姓、强奸妇女、焚烧民房及粮食、抢夺民间财产的事,顺手一一记录在案。幸好当年受害方的幸存者、目击者以及与之相关的很多中国人都还活在世上。因此,无论人们称它为“三光作战”也好,还是“毁灭作战”也好,这都是无法否认或抹杀的事实了。此外,日本人中也有很多当年的见证人,他们也都能一一地举证出一些具体事例来。虽说这些证言都很珍贵,但终因无综合起来的具体数字,因此很难真实地描绘出当年受害方的整体状况来。而笔者要做的,就是对中方当事人的证言及受害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后,再向读者展现出当年的整体受害状况及具体数字来。

有关“杀光”方面的受害情况 据《河北惨案史料选编》记载,时任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八路军最高指挥官的聂荣臻曾说过:“整个抗战时期,被日军和伪军杀害的无辜同胞达70余万人,被强行抓去做劳工的青壮年达12万人,其中八路军官兵的牺牲者也达数以万计的规模。”关于八路军官兵牺牲者人数问题,日本国内那些对“南京大屠杀”持否定论者们认为,按照惯例战争中死亡的军人,不应列入受害者名单。为避免引起纠纷,本文也不做具体统计。但我已在石家庄烈士陵园的展室中,直接目睹了记录在册的河北省内八路军牺牲者名单,我确认该数字属实并不夸大。彭德怀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曾提到了八路军死伤者的人数,即阵亡者112 245人,负伤者201 381人。另外,其他著作中,也有把晋察冀边区的这一数字统计为“被杀者48万人,强迫抓去当劳工者近30万人”[①]的,而且其中被杀害者与被抓去当劳工者的人数也各自不同,但将其合计后,总数几乎所差无几。

---

① 引自(日)井上清、广岛正合著:《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战争野兽——侵华日军十大战犯》(1994 年 9 月出版)是一部批判冈村宁次大将的著作。其中,该书对晋冀鲁豫的受害情况也做了如下描述:

“冈村宁次对‘非治安区’主要实行的是毁灭性的扫荡作战,即人们所称的‘三光作战’……当年日军把这种作战称为讨伐,其作战部队亦称为讨伐队。而正是这些讨伐队,在‘非治安区’内干下了杀光、烧光、抢光的种种罪行。仅在 1941 年和 1942 年这两年中,日军分别以 75% 和 63% 的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连续实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其中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就有 174 次。”“据晋冀鲁豫边区的不完全统计,抗战 8 年期间,仅太行山地区遭日军杀害的同胞就高达 17 万余人,即全区人口平均每 31 人中就有一人被杀害。另外,遭日军强奸的妇女则高达 36 万人。然而,冈村逃回日本后,不但坚决否认上述事实,而且还不知羞耻地称:‘我最重视的就是爱民方针,不但如此,我还下达过不烧、不淫、不杀的标语训令……’然而,事实胜于一切谎言和雄辩,那些饱受‘三光’之苦的中国人民,难道能忘记这位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屡屡对部下发出的‘鼓舞士气,促进治安肃正’的训令吗?”

此外,井上清、广岛正合著的《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一书中,在提到晋绥边区时说:当地“被日军杀害的有 35 万人,被抓走的有 9 万余人”;在冀热辽边区,“35 万人被杀害,39 万人被抓走”;在山东省,“90 万人被杀害,126 万人被抓走”(据查,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曾多次公布“解放区战争损失”,每次多为“初步统计”或“部分统计”,数字不尽相同。1946 年 7 月,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对外宣布“解放区人民各种损失统计概数表”,其中杀虐致死:晋绥 15 万,晋察冀 48 万,冀热辽 35 万,晋冀鲁豫98 万,山东90 万,苏皖24 万,中原7 万,合计317 万。不包括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 60 万的伤亡总人数。被抓人数:晋绥 9 万,晋察冀 30 万,冀热辽 39 万,晋冀鲁豫 49 万,山东 126 万,苏皖 13 万,中原 10 万,合计 276 万——主编校)。

综合上述数字后可知,仅就华北抗日根据地一处,遭日军杀害的中国人,估计至少也在 247 万人以上。其中被抓走后下落不明者并未统计在内。“据不完全统计”是中国人的习惯用语,但他们在统计这方面的数字上却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除了军队之外,全国各县的党史办和政协都曾以此事为核心,展开过取证和实地调查工作。关于这件事,我已在前面介绍过了。例如,我去过的河北省宽城县就有《宽城县党史资料》,兴隆县也有《十万骸骨的碑记——无人区史料选编》,而遵化县还办起了期刊《遵化史话》。所有这些文献资料都分别记录了当年各地遭受日军迫害的情况。

我在撰写《又一个三光作战》时曾说过:“河北省至少有 12 万以上的中国人被日军残杀,此数字并不夸张。”但应注意的是,河北省只是华北的一部分,而河北省(前记地域中的“冀”字)与“华北抗日根据地”,无论在计算方法或单位概念上都不能同日而语。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尽量避免出现数字相差太大的现象。现状是,加害者——日军方面从未全部公开过屠杀中国人的数字,而笔者手中又丝毫没有

反论的根据。因此,只得按中方的统计方法将其进一步整理,并增补了一些设定条件,其后再将八路军官兵战死者除外,则很快得出了整个华北的被杀害人数为"247万以上"这个数字。

有关"抢光"方面的损失情况 如前所述,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而言,日军实施残酷的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则意味着可将其置于死地。对此,江口的论文中也认为,由"三光"的功能来看,日军作战的的确确是从大肆掠夺开始的。然而,要核实掠夺方面的损失数字,实际上比统计被杀害人数还要难。虽然在抢夺者眼里,他们夺走的一头牛、一匹骡或一把锄头、镰刀之类的东西是不足挂齿之物,但这些物资或许就是农民的全部财产了。如果一一地去进行这种调查,那将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繁重的工作。可以说,最难统计的就是这类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生产物资了。不过,中国方面却也列举出了下列一组数字:

"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掠夺去的粮食为1149亿斤(1斤=500克),耕作用家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头,农具家具22 270万件,衣物22 963万套"。[①] 虽然上述这些都是与普通民众密不可分的生活物资,但日军的着眼点还并非仅限于此。

其实对日军来说,华北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既是伪满洲国的后方基地,也是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屯兵基地,同时还是物资的稳定供应地。因此,在整个战争中,华北承担着不可缺少的"开发攫取重要国防物资资源地"的任务。尤其是战争一旦陷入泥潭化或日本本土供应物资迟缓化时,驻华北的日军就必须承负起"当地自救"的重担。虽然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了"当地自救"的议案,但直到亚太战争爆发时,此议案才获批准。该议案的重点是,大力强化华北方面军在经济封锁共产党势力的同时,再竭尽全力地去开发攫取当地的资源。由此可知,这是日本政府制定的一种政治军事一体化的资源掠夺战,而并非是各部队及士兵们自发性的掠夺行为。

亚太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12月3日,陆军省发布了《大陆命第575号》命令,旋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也向隶属各军发出部署命令。要求今后各军的基本任务是,在构筑封锁线和彻底扼制物资流向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为了培养我军的战斗力,要确保占领区内重要物资的开发,并为物资的获得及输送铺平道路"(《华北治安战》第二卷)。这就是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日军"以战养战"的军事方针。在此基础上,华北方面军又于1942年8月向各军发布了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的新政策,要求各地在设置封锁沟、监视线及严禁向根据地流出物资的同时,再通过实行物资配给制来进一步强化对物资和物流的严格统治。此外,还要求"军、官、民等机关共同努力,在获得敌占区物资的同时,还应主动消灭敌方的生产机构"(《现

---

① 引自(日)井上清、广岛正合著:《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代史资料》第十三卷)。此政策的颁布则表明日军对根据地实施“抢光”的行为已正式合法化了。据当时的《经济封锁月报》记载:仅在冀中作战中,“收集小麦432 235 公斤、高粱 194 541 公斤,另有‘品目不明物’63 000 公斤,合计 820 747 公斤”。掠夺中竟有“品目不明物”,此话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新民会外史》中刊登了一篇饶有兴趣的文章,披露了日军当年的小麦收购政策。据该文报道,1942 年新民会中央总会组织部(新民会是当年一个协助日本人的中国民间团体。该会顾问是日本人,实权也自然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制定了一个“获得敌占区小麦的工作计划纲要”。其方针是:“在小麦收获期间,应主动迅速地把从丙地区(未治安区)掠夺的小麦,转移到乙地区(准治安区)的安全地带。通过这种强制收购措施,来确保治安圈内的粮食供应及民生稳定,同时还应一并破坏共军游击队的兵站和工作据点。”此外,在乙地区“按规定的价格强制收购小麦,作为赔偿可用某些商品支付”,但在丙地区“则一律无偿掠夺之”。

其实这就是一种露骨的强行掠夺政策,而且执行中还要求必须有中国人参加。对此,一位曾实际参加过抢粮工作的日本人作证说:“那的确是一场新民会、合作社与中共之间展开的小麦争夺战。不光是小麦,而且还抢夺了棉花之类的重要战略物资。当年,这种抢夺战在根据地内很盛行。”“此外,日军还对煤炭等必须生活物资实行了配给制,在此基础上又实施了经济封锁的管制作战。与此同时,新政权与中共方面又为把乡村农民拉向自己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新民会外史》)由此可知,当年日军在掠夺资源上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这种资源掠夺被合法化后,日本的国策会社及一些大商社,更是有恃无恐地直接在当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筹措、征集、收购等项工作,从而全面展开了一场“军、官、民为一体”的资源掠夺战。

关于这一点,中国方面举出的例证有:在此期间内,日方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株式会社);满铁设在华北的子会社——华北交通会社开始加强其铁路营运以及铁路、水路、航空方面的联运业务;兴中公司则经营起了矿山、煤炭、盐田、电力等业务;三井及三菱会社在增加矿产品的同时,又增加了强制收购大米、小麦、棉花、皮毛及其制品的业务。此外还强制种植鸦片及走私贸易(热河是鸦片的重要产区,日军占领后,极力扩大罂粟种植面积,竟用飞机撒放宣传多种大烟的传单:热河大烟税已经大减,种大烟每亩 5 元,附捐、杂税一概豁免,快些种大烟呀!种的越多越好。全省适合种植罂粟的土地只有 60 万亩,日本占领时期的 1933—1942 年的 10 年间,指定种植 650 万亩,实际种植 531 万亩,平均每年 53 万亩。收购鸦片 5000 万两[1933—1944],大多被关东军走私贩卖到华北、华东、香港及德国、日本等地,用贩毒之资“以战养战”。1939 年的鸦片收入 3393.2 万元[一说 9098 万元],占伪满洲国财政收入的 5.6%,仅次于关税为第二大收入。另外,日伪当局每年还从热河征收烟税,从 1933 年至 1944 年共征收 2800 万元。私种、多种大烟的还要处以

罚金,1935年征收罚金58.6万元,12年征收罚金千万元以上——主编校),而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重要国防资源。①

此外,强制征集人力、劳力,及所谓强行抓走当地人的行为,或许也应属于“抢光”的范畴之内。对此,彭德怀将军早在1941年末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据敌方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1937年以壮丁名义强行带出关外的有323 689人,1938年为501 686人,1939年为954 882人,1940年为120万人,合计为2 980 257人。这些壮丁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武力强迫掳走的,还有一部分是被骗去的。日军今年的计划是110万人,为了完成这一数字,预计日军又将开始四处抓人了。人是我民族抗战的最宝贵资源,但5年间竟被日军强行掳去400万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

其实这个数字并不夸大,因为一个名叫袴由田喜三郎的日本人,曾在1940年的一次题为“华北劳工问题”的演讲中说过:“在执行伪满洲国产业五年计划上,去年满洲需要华北劳力140万人,结果从华北进入满洲的劳工就达到了130余万人……本年度还需要从华北征集劳工110万人。”(《新民会外史》)总之,数字如此庞大简直令人震惊不已。其中,“被骗去”和“被雇去”的劳工暂且不计,仅华北抗日根据地被强行抓走的中国人,就高达250余万(井上清、广岛正合著《日军当年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日本方面称这些劳工都是“被雇来”的,但中国方面却不苟同。他们明确指出,强行带走民工的行为与经济封锁及掠夺物资应同属于“三光”的范畴之内。“关外”意味着长城之外,也意味着日军把关内的劳动力强行转移到伪满洲国或日本本土及朝鲜去了。由于关内的劳动力被大量转移,从而导致了华北煤炭业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象。②

“烧光”问题 其实此事调查起来也十分困难,因为房屋被焚毁后,人们必定还要以某种形式再重建起来,所以那些被烧毁的证据也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然而在“无人区”内,如今保留着一些当年被破坏、被烧毁的痕迹。即使在平原地区,也有无数证言表明,除了当年的那些所谓“当地自救”所需的物资外,日军确实犯下了烧光村里房屋、粮食、农机具,以及棉被衣物等罪行。但是在谈到具体损失时,井上清、广岛正在其著作中也仅仅提出了一个数字,即“被烧毁和破坏的房间有1952万间”(中文所说的“间”是指房间的数量,并不是指家庭的户数)。

其实按字义讲,若真的是“烧光了”,那么当年日军的暴行证据也就消失了。

① 《七十年史》列举的上述例证,主要源于君岛和彦的研究报告。虽然《华北治安战》第2卷中也详细记载了经济封锁和物资筹措方面的情况,但该书中却根本未出现过“掠夺”二字。

② 参见《十五年战争史》中君岛和彦的文章《东亚新秩序与殖民地、占领地》。

如此以来，今天也就无法再把它们当做证据了。不是有人说过“没有证据就等于无事实根据，证言则不能代表证据”这句话吗？然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我们日本人的理智判断，一定会得出一个理性的答案来。

“无人区”——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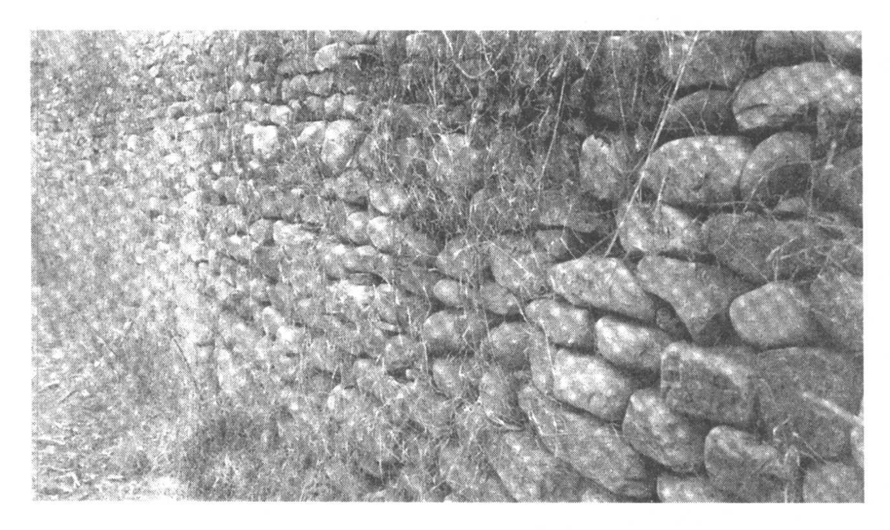
(1)全力实施“无人区化”政策

第一章中所介绍的“无人区”，实际上就是“三光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我曾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说过：“总之，‘无人区化’政策是日军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的一种追求，它也是日军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集大成之作。以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可以认为其最大原因，恰恰就是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而且‘无人区化’政策，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扩展得过于庞大。”

娄平先生是原八路军的一名干部，也是我的共著者陈平先生的上司。他在那本记述兴隆县当年实况的《十万骸骨的碑记》一书中写道：“敌人制造的‘无人区’，基本上是从 1941 年开始至 1943 年完成的……‘无人区’与实施的‘三光’政策有所不同，‘三光’政策只是偏重于破坏，而并没有实际控制力……但‘无人区’却是日伪政权严密控制下的地区。”同时他还强调，“无人区化”政策不同于一般人常说的“三光”，因为它更像是有目的、有意识能力下的一种政策性产物。一般认为“无人区”的设置起始于 1941 年的后半年，其实它的先例早在以前的满洲就已见雏形。据《七十年史》和《伪满洲国史》中记载，最早建立“集团部落”始于 1933 年，地点是延吉、和龙及珲春三县（据[日]伪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的《满洲国史》记载：集团部落创于 1933 年 11 月，乃是吉林省盘石县参事官前岛昇提出的成熟方案……负责该地区的日本军第十师团得知这件事后，参谋便来到县里开始了实地的探讨……后任的荒谷千次参事官经过与临接的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吉林省财务科长盛长次郎等协商，为立即使上述集团部落建设构想付诸实施，遂制定了建设计划，民政部也赞成此方案——主编校）。至 1934 年 12 月 3 日又发布了“建设集团部落公告”，1936 年根据“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加速了此项工作的进程。同年末，建立“集团部落”4000 个，至 1938 年时已达到 12 565 个（据霍燎原等主编的《日伪宪兵与警察》一书中记载：1939 年又新建“集团部落”886 个，共 13 451 个。在设置人圈的过程中，日伪警察宪兵充当了迫害民众的主要祸首与先锋，他们烧毁民房、山寨……制造了不少的“无人区”。仅在桦川县就烧毁村屯 120 余个，烧毁或拆毁民房 2.4 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伤群众 1.3 万余人——主编校）。由于满洲的经验已证明，设置“集团部落”可有效地对付抗日游击队，因此为了扼制万里长城南北山区的八路军活动，华北方面军便与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联手，在这一地带设置起

了"无人区"。众所周知,几十年后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也继承了当年日军的这一经验,在南越建起了"集团部落",企图仍用这种围困当地居民的方法,来彻底斩断南越人民与解放阵线之间的联系。1941年9月,按照驻热河日本宪兵队总部的提案,关东军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这就是当地实行"无人区化"政策的起端,地点则是长城线以北地区。与之相呼应,华北方面军为了推进"无人区化"政策,也于稍后的1942年9月实施起了"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在此之前的1941年7月,冈村大将就任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一职。他上任后,在强调大力推进肃正作战的同时,又发出了"为提高治安能力,今后要大力构筑封锁沟及碉堡,以此来有效地抵御共军"的训令。据时任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回忆:"其实在1941年夏季执行'肃正三年计划'时,就已将封锁沟建设具体化了。即在'准治安区'的境界上设置适宜的封锁沟,并在点上均布一些小碉堡。用这种两者结合的方式,则可有效地阻止共军的侵入。""这种方式对重要交通干线也能起到防护作用。例如,在京汉线两侧各10公里处,分别构筑长500公里的封锁沟,便可有效地将共军根据地隔离开来。按此方案至1942年7月止,共构筑封锁沟11 860公里,同时碉堡阵地也达到了7700个。"①



兴隆县蓝旗营残存的当年"集团部落"基础

在这种残酷的封锁中,日军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反复发动了"毁灭、扫荡、剔抉"式的作战。尽管如此,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并没有因日军的扫荡而销声匿迹。为此,华北方面军则被迫做出了在长城线南侧也设置"无人区"的决定。

① 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1、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当年牺牲者的遗体被埋葬在蓝旗营“集团部落”旁的河滩上。当地幸存者向陈平(背朝前者)和笔者(右侧)指定地点。

据当年担任冀东讨伐任务的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回忆,“冀东一号一期作战”后冈村大将亲自莅临驻唐山的步兵团司令部,在赞赏了此次作战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他还征询了如何进一步剿灭共军残余势力的良策。对此,铃木建议要坚决消灭那些与八路军有牵连的人,同时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除此之外,还应采取措施将当地村民与八路军彻底隔离开来。

冈村对铃木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返回后不久,便通过驻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原田师团长,向铃木转达了华北方面军的最高意向,即将长城线南北2—4公里宽的地域设为无人地带,禁止任何人在此地带内居住或耕作,并严格限制人员通行。铃木获悉后又提出了补充意见,他认为2公里宽的隔离带较窄,应定为4公里宽。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立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交给相关各部门实施。由此,从当年9月开始,仅用20天,便完成了该地带的“无人区化”工作(《第一联队史》)。

当年10月,铃木曾陪同原田师团长从空中视察了“无人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他说:

“飞机从山海关附近的机场起飞后,机首一直指向西方,很快我们便进入了广阔森林和山区的上空,万里长城宛如一只巨大的白色蜈蚣蜿蜒起伏地展现在群山之间……不久,飞机便来到了迁安县的北部上空。此前,这一带曾是广袤的绿色森林,但如今到处可见的是红色和黑色混杂的烧毁或烧焦的痕迹……从遵化县上空俯视下方,可见到森林中有无数处被大火烧毁的斑斑痕迹。许多显然是整个村庄被焚毁后,大火蔓延烧向森林,又引发了更大的山火的迹象……这里原来有许多村庄,但现在只剩下烧光的残迹,一户完整的房屋也看不到……在此期间,日军强占了当地农民的640平方公里土地,迫使十多万无家可归的农民走上了饥寒交迫的

流浪之路。有一万数千户的房屋被烧毁，其中又有200余人仅仅因为向日军投出愤怒的目光而被杀害。”(《长城线上无人区》)。

当时，铃木启久指挥下的第二联队，在完成工事之后的11月6日写的《联队史》中，曾记录了下列一组数字：

“完成封锁沟245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74公里……上述工事共用52天，动用劳工1 957 000人……长城无住地带有76个村庄，1235户，6454人。暂时需拆除的村庄28个，2342户，12 036人。”对于这种包括封锁沟在内的如此大规模的“无人区化”工事，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竟自鸣得意地说：“通过农民的这种无偿劳力奉献的方式……我确信，华北治安圈一定能逐渐扩大起来的。”但令人费解的却是，日军用“这种无偿劳力奉献的方式”，对那些农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993年，九州朝日电视台在报道“无人区”的专题中，曾采访了几位原日军军官。据他们讲：“无人区”发生的事情，都是农民们自愿协助我们干的，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过。看到他们那种大言不惭的坦然样子，不禁令人感到这些人所说的与当年那位参谋长所讲的简直是如出一辙！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防卫厅图书馆里也馆藏着一些日军当年记录有关冀东“无人区”方面的文献和资料。其中有《第一、第二联队史》、《华北回忆录》及《华北特警》等等。

(2)“无人区化”政策下的受害状况

对于“无人区”方面的情况，铃木本人也做了如下回忆：“在修筑封锁沟和炮楼时，所动用的民工已超过了60万，这给当时的农作物收获带来了巨大损失……由于华北方面军命令把长城线一带的八路军根据地都变成‘无人区’，所以当地驻军便动用武力把村民们强行赶走了。这种方式曾引起了村民们的怨恨，八路军也就利用日军的这种作法，趁势宣传起了‘三光’政策。”应该说铃木所讲的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然而，中方调查后认为，“无人区”的实际范围比日军所记述的还要大一些。仅就长城线南北而言，“东起山海关西侧的九门口，西至赤城县的独石口，全长为850公里；北起宁城、围场，南至迁安、遵化等地，宽度为250公里；包括其中的25个县在内，无人区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的面积为8500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有17 000多个，建成的‘人圈’(集团部落)共计2506处，被强行驱赶进‘集团部落’的村民竟高达140万人”(《又一个三光作战》)。也可以认为，上述的统计数字是中方的通用说法吧(也有的书中说，“无人区”的面积为17.5万平方公里)。

中方的上述说法是否有待考证暂且不论。不过，日本战败时刚晋升为中将的铃木，却在战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阶下囚，他在军事法庭受审时的情景也已被胶片记录了下来。面对法官的询问，铃木回答道：“当时是我命令部下去执行‘三光作

战'的……因为只有通过'三光作战'才能确保日军的势力范围。联队长也是按照我的意图才对中国人施加了暴行，我所到之处都命令部下实行'三光政策'。"(《又一个三光作战》)铃木为此受到了有罪判决，法庭指控他应对长城线以南的"无人区"及"无人区化"政策的实施负有全部责任。

庆幸的是，铃木在服刑近十年后被释放回国了。据说因他是给中方留下证言后，才允许返回乡的人，所以，此后他也以平静的生活方式渡过了余生。几年前，我会见了一位据说是当年曾给铃木当过副官的人，他告诉我说，铃木是一位沉默寡言，且又具有古代武士性格的人。

按道理说，冈村大将和原田师团长都应在"无人区"问题上负有责任。但想不到的是，铃木却将上司和属下的责任全部尽量地承担了下来。回国后，他对此既无怨言也不做任何解释，始终保持着沉默。在这点上，冈村与铃木确实有着本质的差别。另外，在比铃木级别更低的下级军官中，原承德宪兵队的木村光明也受到了有罪判决。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应对长城北侧的屠杀负有责任(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因顾及本人的名誉，故而做了留姓隐名的处理。但横山光彦的《望乡》及岛村三郎的《从中国返回的战犯》著作中，在描述审判情景时，已将木村的全名公开了)。另外，在这一问题上，陈平先生曾指出："1942 年 8 月上旬召开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兵团长会议上，冈村宁次总司令官亲自策划部署了设置'无人区'的具体计划。"对此，中方的调查报告中也明确地指出：制造"无人区"的最高责任者就是冈村宁次。

据说，除了长城南北地带之外，日军还在山东省与河北省西部的边境地带设置了"无人区"。对于那里的受害情况，也只能是按照每个事例进行详细调查后，才可得出结论来，而此次着重调查的只是长城线北侧一带。

在兴隆县的调查中，娄平先生说过："在 1943 年至 1945 年的三年中，被日军屠杀或非正常死亡的就有 5 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若将此数统计在内，那么 8 年间全县被杀害者则高达 11 万人。

在其相邻的宽城县，"在'无人区'内遭检举者达 21 750 人，其中被杀害的有 13 400 人。另外，在'人圈'(集团部落)中被冻、饿、病死的又有 8500 人。"(《宽城县党史资料》)据陈平统计，仅在热河省一侧，日军烧毁民房 380 余万间，掠夺粮食 96 亿斤，抢走家畜 24 万头。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我曾介绍了"水泉沟万人坑"的情景，据说，被日军杀害后扔在那里的遗体就有 46 000 具。其中多数中国人是因反抗"无人区化"而被关进了承德监狱。其后，他们或在狱中遭杀害，或被押往水泉沟处死。

以上就是日军在"无人区"实行"三光作战"的部分实况。对于日军的这些暴行，中方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对此笔者已在第一章中做了介绍。我认为在中方选编的文献中，其侧重点大都是记述抵抗作战的内容。其实，在日方的文献中又何尝

不是如此呢？无论是《华北治安战》也好，还是其他的回忆资料也好，以至连本书所撰写的内容中，也都大量记述了双方作战的情节。不仅日本军方，就连日本政府也深知，他们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抵抗。例如，“伪满洲国治安概况”第8号(1944年7月4日)上就登载了许多这样的内参报告：

“4—(4)、关于兴隆县内地方武装民众之状况——去年6月，与我方设置无人区的同时，敌方也做出了相应对策。他们以无人区为中心，将武器分发给了部分民众，巧妙地开展起了武装组织工作……目前，共军已在22个村庄内，设立了民兵武装自卫队，队员人数达76名……有迹象表明，这些民兵自卫队在配合共军作战的同时，将可能发展成一支地方的作战部队。”

“5—(2)、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冀热中共迁滦丰联合县政府设立了‘对敌粮食斗争委员会’。同时，为了解决粮食不足问题，该县政府又制定了新征税法，以此来限制粮食、物资等向辖区外流出。”(外务省资料馆所藏)

虽然日本政府深知中国人进行了抵抗，但它能否理解中国人内心的感情及抵抗精神，这就值得怀疑了。可以说，这种理解上的差距不仅持续到日本的战败，而且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仅如此，它将继续影响着早已对战争失去了责任感的国民。

后记　战争的受害与施害

归根结底，“三光”或“三光作战”这类用语是中国人命名的。它们的含义是指在日中战争(中方称为抗日战争，而对我等历史研究者来说，则可称为对华侵略战争)期间，日军对华北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有计划、有系统的“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剔抉”等作战的总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人一提起日中战争及日本人当年的行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光”及“三光”政策这类用语。不言而喻，如果当年日本人不特意去中国干下这些野蛮行为的话，那么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出这类用语了。日本人之所以照搬使用，是因为他们也认识到了那场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对此，我倒丝毫未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尽管有人指责说，为了追随中国人，日本人竟无意识、无条件地使用起别国的语言了，简直是岂有此理！但我却并不那么去理解，因为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原封不动地照搬使用从中国传来的用语及字句之事，早已是不胜枚举了。与此相反，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词汇立即变成中文固定用语的事例也极为普遍。用语上的争论暂且不提，但日中战争中，日本究竟使中国蒙受了多大损失呢？对此问题，我已在《世界》(1994年2月号)一书中做过了介绍。即中方统计的数字是：中方人员损失为“2100多万人死伤，1000多万人被日军杀害”；中方经济损失为“直接损失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权白皮书》1991年10月版)。另外，1995年5

月,时值苏俄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胜利50周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应邀出席莫斯科举办的庆祝仪式上发表的讲演中说,日中战争期间,中方的受害者为3500万人。但因他未提及此数字的根据,所以笔者仍沿用前述的中国官方数字为依据。

如前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者总数为1000多万人,其中战斗人员牺牲总数为321万人(包括八路军的112 245人在内),两者相减后,剩余的600多万人则属于无辜百姓了。另外,假如把被强行抓走的人员也计算在"死伤者"之中,则东北满洲就有200万人(《伪满洲国史》),而华北又有250万人。仅两地区合计就高达450万人。如此计算的话,牺牲者人数还会更多。

但事实却是,在1992年提交给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议案中,中方又对日中战争期间的损失数字重新做了更正。其中,被日军杀害的"非战斗人员为1000万人","被强行抓走的为300万人","整个战争中,中方的经济损失为1兆美元"。由此可知,在有关"被强行抓走的"的人数问题上,今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

另外,华北地区因"三光"政策而受害的人数就有250万人,这一数字几乎占了被杀害者总数1000万人的四分之一。如此看来,有时甚至觉得在日中战争中,"三光"问题所象征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以及"从军慰安妇"等问题。尽管如此,除了一部分日本人外,像"三光"或"三光作战"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竟没有成为日本人深刻反思的话题,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不仅如此,人们还淡忘了对那场战争的责任感。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尽管"三光作战"下的每一个受害者事例都令人发指,骇人听闻,但所涉及的对象及范围都过于庞大,给人一种无法掌握问题核心的感觉。因此,人们便对这种施害事实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

原因之二,尽管以冈村大将为首的一批人确实是"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剔抉"的作战指挥策划者及当事人,但他们在战后却诡称:既不清楚"三光作战",也没进行过这种战争。况且,战败后又由于未能受到战争责任的追究,故而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嚣张气势。

原因之三,在日本人的心中,很多人既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同胞会犯下那种残酷而又非人道的行为,也不希望这些人因此而受到惩罚。而那些追随冈村仍坚持对屠杀和虐待行为持否定论的人,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才更加提高了他们的反对调门,因而也就逐步淡化了人们对战争责任感的认识,我想原因大致如此吧。

因此我认为,负战争责任的首先应是日本政府。笔者在文章中也曾屡屡提及,正是由于御前会议及日军大本营确定了这一基本方针,当地驻军最高司令部才进

行了“三光作战”指挥和部署，其下级部队才进行了具体实施。这种组织命令系统的结构理应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此外，从铃木启久少将承认对“无人区”犯下的罪行中可知，虽然他个人已承担下了全部责任，但铃木的直接上司原田师团长以及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大将，难道说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吗？我想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法逃脱这一干系的。

然而战争结束后，铃木碰巧被中共方面逮捕。在受到了军事审判后，他坦率地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勇敢地承担了战争责任；与此相反，冈村在被国民党方面逮捕，又被无罪释放后，不但否定了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拒绝承担其战争责任。作为日本人，我们应如何去评价这两者的态度呢？这不仅仅是日本人如何反思过去的历史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日本今后要走哪条路的重要问题。

总之，现实状况是，那些施害的日本人——我们的同胞，有的正在销毁当年的证据，有的则极力去否认受害者的证言。而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日本人来说，却不得不洗耳恭听那些受害者们的倾诉。一旦中方幸存者提出某种证言，日本人必然会连连摇头批评说：“那只不过是中国人夸大其词的惯用手法而已。”只要受害一方没提出新的指正，这些日本人也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了。此外，还有很多当年曾亲临其境的老军人们，也都默默地将事实真相深藏在内心，直至最后死去。我非常理解这些人的沉默心理，但更应该想到的是，受害者一方也是有兄弟、娇妻、恋人及子孙后代的，他们也是辛勤地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啊！“既然中日两国已恢复了交往，那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是我此次走访大屯村时，一位老婆婆向我诉说的话语。如果稍去体会一些她的心情，我们日本人难道不应该坦诚地说出过去曾加害过中国人的事实真相吗？难道就不能在赔礼认罪的同时，发誓再不去干当年那种愚蠢的行为吗？

笔者在前言中曾讲过，人类最悲惨的境地莫过于战争了。虽然人们都希望日常生活中不必刻意去努力也能消灭战争，但这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罢了。应该承认，如果没有集团式的发狂，自然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但暗藏在人们心中的仇恨、偏见、欲望一旦被利用或被煽动起来后，人们的善良及平和心也就变成了盲目的服从，由此也就爆发了战争。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我认为，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日本人决不能忘却过去那段沉痛的历史教训！

邓一民　主编校

王建中　吴　云　　译

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

——兴隆惨案(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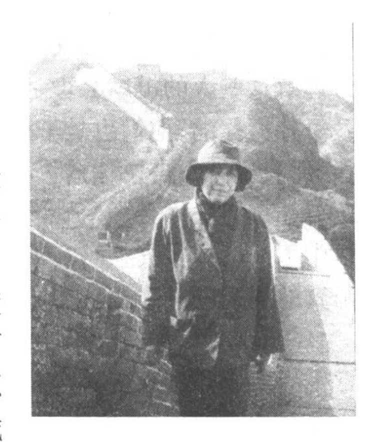
(日)仁木富美子

横河行——“无人区”是如何建造起来的

离开兴隆县城后,汽车一直向东驶去。道路两旁是悬崖峭壁,汽车在弯曲的山道中疾驶。

这条山道也是当年日军战败后,向遵化、唐山逃跑的惟一之路。

潵河发源于八品叶的深山之中,它一直穿过兴隆的中部向东流去,出了龙井关后与黑河汇合,然后一并汇入滦河。獐猖山地处八品叶以东,石庙子以北,它也是横河的发源地。横河在此向北迂回,后在半壁山一带与潵河汇合。五指山在横河的东北部,而车河则流经于五指山与西北的五凤楼之间。柳河从发源地八品叶流向南部的六里坪林场,然后通过兴隆县城向北,绕个大弯后南下。流经八卦岭以北,它与车河同时汇入从承德来的滦河,并注入潘家口水库。



仁木富美子1995年3月22日摄于金山岭长城

所有这些河流都在东北方划了个同心圆,而且河与河之间,都有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来作为它们的天然屏障。

羊羔峪

半壁山镇地处兴隆县的东部,镇里设有公安分局。公路由此南下与唐山地区的遵化相通。

从半壁山沿横河北上,绕过老虎沟水库后,便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山路。右边的河套中,到处都是被夏季洪水从山上冲积下来的鹅卵石,而且水流很浅。这条山路

通往羊羔峪、水泉子、马架沟。这一带也是当年在集家并屯的名义下,最先实行"无人区"的地方。

张福廷(76岁)的口述,采访时间:1995年3月22日

这里的集家并屯实行的最早。1939年11月警察来到这里,说是让天桥峪、羊羔峪及厂沟这三处的百姓,在两天以内,全部迁移到安子岭和双炉台去。第二天的上午,十几名警察又来督促搬家,并拿走了值钱的东西。第三天,正当人们有的收拾东西,有的拿不定主意之时,500多名日满军警讨伐队突然闯了过来,不由分说便放火烧房子。三四个村子共76户住房,连同粮食、衣物等全部被烧毁。骡、马、牛等620头大牲畜、4800只羊以及猪和鸡等家畜都被抢走了。此时正值冬季来临,大家既没吃的也没穿的。没有法子了,有的只好去了集家并屯的地点,也有的投亲靠友或远走他乡。但大多数乡亲都坚决不去敌人指定的地点,纷纷逃到山里,搭个草棚过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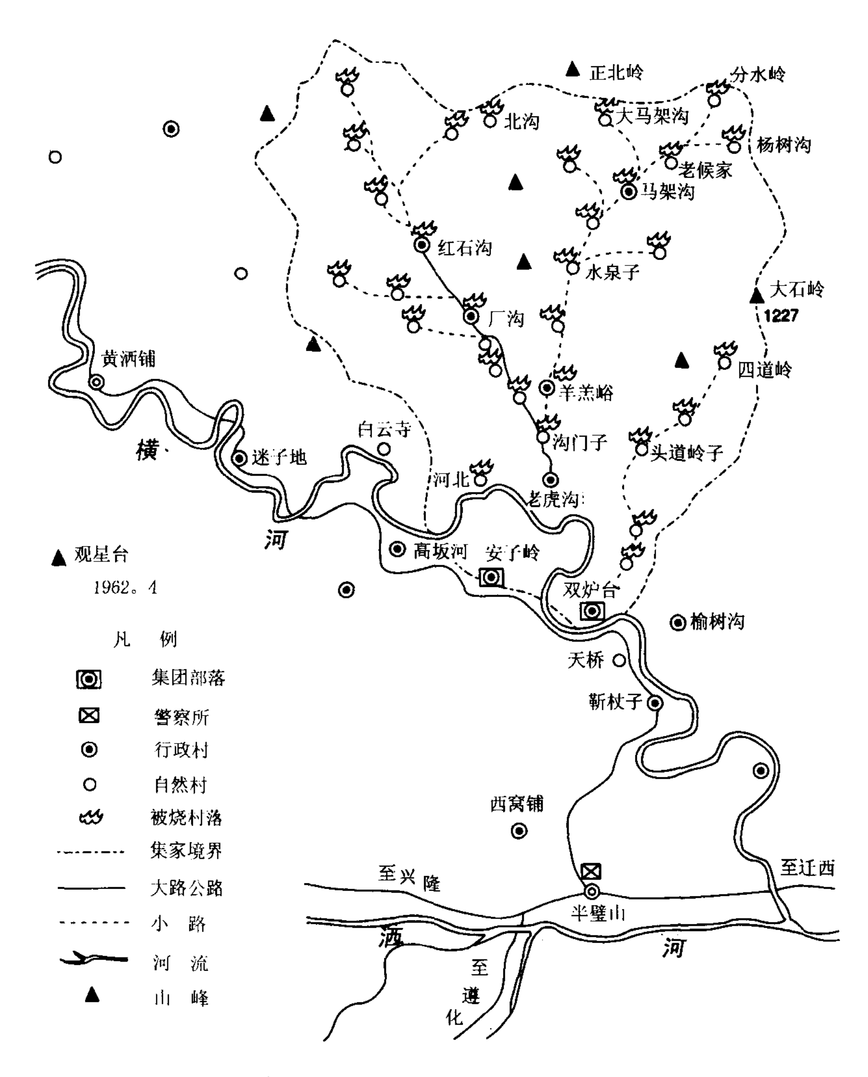
1940年1月,这一带的乡亲们配合游击队袭击了双庙子的警察派出所。到了春节后,去"人圈"居住的人们大部分也都返回了原先的村里。这样一来,第一次集家并屯计划以军警方面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集家并屯是在1940年末,这次要把两个沟28个村的610户,计2700多人全都集中到羊羔峪的"北大地"去,那里只是一块空地,四周连个石头墙都没有。第一次集家并屯时,房子已被烧毁了,人们只好搭个小草棚住着,但这次警察又把小草棚给烧了。敌人事先在羊羔峪设立了派出所,所长是甘野次郎,他手下有20多名警察。此外,敌人还以羊羔峪为中心,架设了随时都能和半壁山进行联系的专用电话线。还在羊羔峪周围的墙壁上刷写了"明朗羊羔峪"等标语,乡亲们对此怒火满腔。

在"人圈"里,人多住房狭窄,生活困苦,卫生条件极差,加上天气又闷热,到1941年春天,这里流行起了瘟疫。症状是发高烧、鼻孔和口中出血,而且身体发红,当时,没有一家能躲过这种病的。只要一家有一人患病,那么全家也就都得上这种病。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发病率最高,凡患上这种病的几乎都死了。两个沟的居民竟死了400多人,有的是全家死绝。有人说这是回归热或再归热病,但究竟是什么病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据说煎犀牛角汤喝可以退烧,但药店里的犀牛角全被日军买光了。为了躲避这种病,日军和警察都撤走了,因此"人圈"又再次解体,乡亲们也都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第三次集家并屯于1941年秋开始,此次行动规模浩大。"人圈"设在距半壁山7里地的靳杖子,羊羔峪等地均划为禁居禁耕地带,也就是所说的"无人区"。"无人区"包括65个自然村,面积为625平方公里。

1943年,村民们在"无人区"内种植了玉米,日军发现后便全部给割掉了。后来村民们又偷偷地种上了,结果又被日军全部毁掉。



1939年11月安子岭·双炉台第一次集家范围

1943年12月，日军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大扫荡，有247名无辜百姓被杀害，有被狼狗咬死的，有被剥光衣服冻死的，有被活生生烧死的。我的哥哥张忍生因病卧炕不起，被日军发现后给杀害了。躲在炭窑里的十几个人都被熏死在里面，只有王世富一人从出烟口逃了出来。1943年的扫荡共进行了27次，最令人心酸的是大搜捕时死者不下1000人。

1941年以前，羊羔峪没有发生过瘟疫，而且以后也没再发生过，只是那年流行过一次。

张福廷在集家并屯时，曾是羊羔峪的村干部。解放后又担任过兴隆县委副书

记。原先听说羊羔峪有三个人了解当时的情况，但到村中采访时发现，三人中一位已死亡，一位不在家，另一位已不能说话。又听说张福廷现住在承德，便赶到承德采访了他。如今，他仍在孜孜不倦地撰写着兴隆的历史。

水泉子

一到水泉子，便看见几名村妇正在泉边洗衣物。泉旁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爱国泉李运昌　1987 年建”。

1942 年 6 月，李运昌等八路军干部聚集到水泉子召开军事会议，部队共 500 多人，要在这里停留 5 天。正当村干部们紧张地为部队筹措粮食之际，这一带发生了干旱，烈日当空，泉水干涸。听说此事后，李司令员亲自挖石舀泥，引出了泉水。此后，该泉称为爱国泉，在此立碑一是感谢村民们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二是证明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下和“无人区”内，抗日游击根据地依然存在。我采访的那户人家，就住在那口泉的坎儿上。

张兰(75 岁)的口述，采访日期：1994 年 11 月 12 日

这一带是“无人区”，日军发现人就开枪。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太残忍了。见什么烧什么，一点儿也不留。房子烧了，人也烧死，有人看见家里起了火，想去取东西，结果被日军扔到火里活活烧死了。一看到日军就得藏起来，他们走后才悄悄返回，光我家就被烧过两回。鸡、狗都被杀了，骡子和马也被抢走了，什么都没剩下。

1944 年冬天，来了三个大队的日伪军，在这一带连续扫荡了半个月。那次炭窑里一下子就被烧死了 14 人，其中还有一个孩子。那年庄稼都被烧光了，大人孩子只好捡烧剩下的吃，连野菜、树皮都吃光了，是八路军给了我们粮食。庄稼烧了，后来我们又种上了。早先，羊羔峪是个 300 多人的村子，被杀的有百来口人，逃到山里的有 70 多人，但去“人圈”的不多。



张　兰

张兰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杀光、烧光、抢光，什么都不剩了……”

他家的房下堆着炭，如今这个村仍以烧炭为副业。

天桥峪

洪水过后沟里不能行车，只好步行。一行人沿着河边穿过抗日烈士纪念碑，去采访住在小天桥沟大砬篷的伊永恒家。所谓砬篷是指山上的崖石像屋檐那样伸出来一点儿，人们可以在底下避雨。

伊永恒(88岁)的口述,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伊永恒

那时,我家的房子已被日军烧毁了,只得住在砬篷。那天我有事去了黑河,全家被杀死6口。其中有我父亲,我媳妇和孩子,嫂子和她的两个孩子,我父亲是被烧死的。山上的庄稼都被烧光了,我们只好又补种了苞米,唉!能少收点儿总比没有强啊,省着点儿吃吧。房子烧了,就用茅草苫上,再烧再苫。你看,当时我们就住在那边。

他指了指对面的岩石,可我没有看清他所说的砬篷在哪儿。

告别伊永恒后,我们便下山。途中碰到一个年轻人,说明来意后,他邀请我去见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伊俊江,过去也曾住过砬蓬。乡下人说路不远,其实路并不近。乘车摇摇晃晃地走了近5公里的山路后,又下车走了一段山间的羊肠小道,这才到了他的家。

伊俊江(66岁)的口述,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伊俊江

记得那是1943年9月11日,日军来了200多人。开始我家住在天桥峪,后来家被烧了就住进了山里的大砬篷。全家共15口人,那年我15岁。那天全家被杀的有14人,其中有父母、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两个哥哥、两个弟弟、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还有一个姨。当时我的脚中了弹,上颚也被子弹打穿。他们以为我死了,就没再理我。后来,趁他们不注意,我就逃了出来。不久,我也被赶进了设在靳杖子的"人圈",一个月后我又逃回到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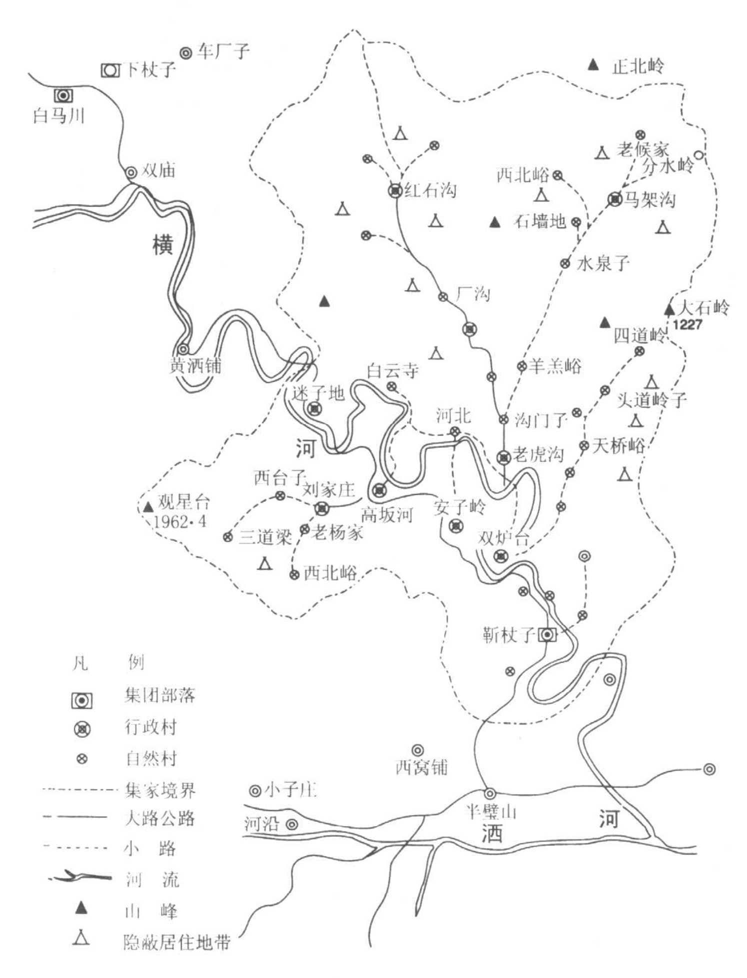
他撩起裤腿儿,让我看了看他脚上的枪伤。

靳杖子

1939年和1940年的那两次集家并屯失败后,日本人不死心,又于1941年秋,将这一带的百姓全都集合到靠近瀔河边上的靳杖子村,成立了一个大"人圈"。靳杖子是通往半壁山镇的重要通道。

王贺林(76岁)和**徐少成**(64岁)的口述:采访时间:1994年11月12日

1942年至1945年曾在"人圈"里住过。"人圈"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不能随便出入。有人跑到河边去了,但被日本人拖回来用大枪狠揍了一顿,人都给打伤了。



1941 年秋靳杖子第二次集家范围

大墙外面是深沟，但没水。墙高 8 米左右，南北有门，东西没门，都有警察把守，早 8 点开门，晚 5 点关门，和监狱差不多，没有一点儿自由。

“人圈”里没粮食，人们只好吃野菜、树皮和野果什么的。也没穿的，一条裤子我穿了三年半。男人光着身子出去，女人只得互相借裤子穿。住的是草窝棚，一下雨就漏。人和猪挤在一起住，哪是人过的日子啊，简直是活受罪！



王贺林

日本人不让种苞米，怕苞米地里藏着八路军。不让种庄稼可怎么活呀？王贺林家靠他哥哥每天打柴卖柴后，换点儿食盐什么的生活。我们靳杖子村原来住着五六十户人家，集家并屯后一下子变成了150户。一户按7~8口算，也有1000多人口呐。每天都死5~6个人，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的。得了病也没药吃，只好等死。



徐少成

日本投降时，村里还剩下五六百人。当外村的都走了以后，本村的只有五六个人了。大搜捕时，仅靳杖子村就被抓走300多人。当时日本人说是发配给，可人们一集合就都被抓走了。其中200人被押往承德、辽宁及东北等地，后来都死在当地了。

1943年大搜捕时，王贺林的父亲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的水泉沟。同时，他的岳父母也被杀害。徐少成的父亲也是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其伯父伯母在山里被日军枪杀。

潵河行——大搜捕

潵河发源于八品叶，西经兴隆县的中部向东流淌，流经庙岭、半壁山、蓝旗营、三道河及龙井关后汇入滦河。当年，日军曾在潵河流域建立了50个“人圈”。

1942年晚秋至1943年期间，日军曾在兴隆县全境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屯行动。2月5日，大批军队、警察和讨伐队在半壁山秘密集结，于7日（旧历正月初三）突然袭击了潵河一带的“人圈”，并从50个“人圈”中逮捕2000多人。

大帽峪惨案

大帽峪是距离蓝旗营以西1.5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当年，日军从这个只有42户的村里抓走了73人，其中69人被杀害。全村有9户灭绝，30户无男人。其后，日军又逮捕8人，在审问中将他们全部杀害。此外，村中病死、饿死及冻死者为62人。至日本投降止，大帽峪村共死亡139人，剩下的女人和孩子为102人，故该村被称为“寡妇村”。

大帽峪是八路军连接五指山及冀东的秘密交通点。村民们抗日决心高涨，全力支持八路军在此通行。

2月7日午后4时许，一小队八路军开进村子，他们打算等日落后穿过公路和潵河，向长城一带挺进。傍晚之时，有两个特务向村子这边走来，恰好被要去换岗

的曹万章碰上了。来人问他:"村子里有八路吗?"村口的八路军便衣发现后,立即向特务开枪,击倒一人,另一人逃跑了。为了避开日军的报复,12 名村干部和民兵立即随部队向北撤退,村民们也都躲藏起来。

当晚七八点钟,在日本宪兵的率领下,孙德英讨伐队共 200 余人立即包围了大帽峪。他们架起高高的柴堆点着火,把村子照得通明。村民以为是房子着火了,便纷纷跑回村子。就在人们各自准备从家里抢搬家当时,不幸全被敌人抓住了,用一根绳把全村人拴成一串儿,押到了蓝旗营。这里还捆绑着几百个人,他们都是从马圈子、南沟、杏树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等十几个"人圈"中抓来的百姓。所有被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院子里。日本人命令不许蹲着,人们只得整整站了一夜。第二天整日既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凡是大帽峪的人,脸上都打上红圈,左腕子绑上布条儿。到了第三天日军开始审问:八路军哪儿去啦?村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粮食在哪儿?敌人把汽油浇到马永兴的父亲身上,然后点着火,但其父还是什么也不说。这时,司俊雨抽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木棍向记录官砸去,不料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在敌人的拷问下,村民们都宁死不屈。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日军仍然一无所得。2 月 12 日(正月初八)的夜里,日军用卡车把 30 名大帽峪村民押往兴隆,剩下的 30 名大帽峪村民全部被赶到一个新挖的大坑前,并让他们排好跪在坑边。敌人用玉米秆捆成火把照明,随后,日本军人拔出军刀,沾了沾事先备好的冷水,就挥刀将 30 人全部砍死。接着,又把 30 名马圈子和南沟的村民也都砍死在这里。但杨茂林却只身逃了出来,成了这场惨案的惟一幸存者。原来,当敌人押着村民去杀人坑时,他走在人群的前头,趁敌人稍不留神就逃了出来,但他的肩上还是中了一枪,那是被追赶的特务用手枪打的。而那些被押往兴隆去的村民们,有的在兴隆或承德被处决了,有的则被押送到营口和辽阳,从此杳无音信。

不久,大帽峪便被划为"无人区",剩下的村民都被赶到其他"人圈"去了。

根据**马永兴**(72 岁)、**张志田**(77 岁)、**杨焕兴**(60 岁)、**杨茂清**(62 岁)的口述和有关史料记载,大帽峪惨案概略如上文所述。

大帽峪现在已有 140 户了。

大惨案后,马永兴的母亲领着孩子去了佟家沟"人圈"。马永兴当时担任村青年委员。

张志田的全家总共死了 6 口人,当时他曾任村长。目前他正患病,一激动就流眼泪。

杨焕兴是杨茂林之子,当听说我想看看他父亲的照片时,就特意回家把照片拿来。杨焕兴的爷爷杨万富也被日军杀害。

杨茂清当时才 9 岁,他父亲也被抓走了,后来惨死在承德。当年母亲曾带着他去给父亲送食物,但被端刺刀的日本兵给撵了回来。

采访日期:1994 年 11 月 12 日

我们乘车前去参观当年的“人圈”和杀人坑现场。秋末的太阳落山快，当一行人到达杀人坑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这里共有三个正方形的土坑，边长都是17米，深2米。如今这里已变成一块低洼地。

因为我很想知道大帽峪惨案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改日再去采访马永兴。11月20日，这次马永兴又给我叙述了大帽峪村被日军烧毁后，女人们领着孩子迁往附近“人圈”的情况。尽管已过去了50多年，但他仍能记住当时村子里的情况，并能一一叫出那些人的名字来。



马永兴

马永兴的口述：

去蓝旗营“人圈”的有：陈永贵的妻子1人。陈永来的母亲、弟弟、妹妹共3人。司俊林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共4人。司俊林当天不在家，是后去的。

去佟家沟“人圈”的有：

马永兴及其母亲、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共6人。马永兴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潘贵成及其母亲、5个弟弟，共7人，潘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闫万德的妻子、二儿子、两个儿媳妇及3个孙子，共7人，其长子已参加了八路军，不在家。

闫景福妻子、父亲、母亲和两个亲戚，共6人，闫景福当天不在，后去的。

杨万忠的妻子、儿子杨茂如的妻子、3个兄弟和1个妹妹，共6人，杨万忠、杨茂如被日军抓走。

闫景顺之妻1人，闫景顺被逮捕。

汪祥之妻及二弟三弟之妻和1个孩子，共4口人，汪家三兄弟均被杀害，两个弟媳死在“人圈”。

司俊山之妻及两个女儿，共3人，司被杀害。

去白旗营“人圈”的有：

周万福之妻、父亲及两个孩子，共4人，周被杀害，80岁的父亲及两个孩子均饿死于“人圈”之中，周妻沦为乞丐。

曹万清之妻及女儿，长子万山之妻及两个孩子，次子万林之妻及1个孩子，共7人，曹万清、万山、万林均被杀害，两个孩子饿死在“人圈”。

曹林之妻、女儿及长子之妻，共3人，曹林和两个儿子被杀害。

去古石“人圈”的有：

韩大之妻、韩二之妻、韩三之妻及3个孩子共7人，韩大、韩三被杀。




杨茂清


杨焕兴


张志田

另外,那些去青杏沟和马圈子"人圈"的人名我就想不起来了。全家灭户的有张宝顺、胡德福、罗某、司俊雨等。司俊雨的妻子带着孩子去了蓝旗营"人圈",但在那里被警察强奸后死亡,孩子也死在"人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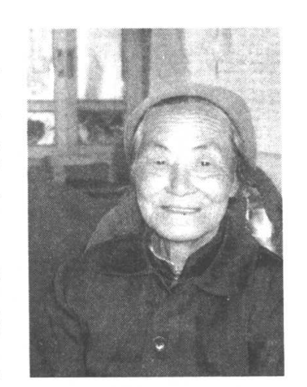
解放后,有40户的村民又返回了大帽峪村,共121人。妇女占80%,孩子占20%。然而从"人圈"出来,现在还活着的仅剩下7人。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20日

这仅存的7人中,有的因病不能动弹,有的已语言不清,有的则住在外地,佟桂华就是当年"人圈"生活的见证之一。她身体看上去还挺硬朗,是儿子把她接到这里来的。

佟桂华(72岁)的口述。时间:1994年11月20日

我是闫树波的母亲,我丈夫叫闫景富。1943年正月初四,我们两口子和公公婆婆以及亲戚闫景才两口子共6个人,一起去了佟家沟的"人圈"。1944年8月27日,那天一下子就死了4口人,是拉赤痢死的。去的时候是6口人,死了4口人,从"人圈"出来时只剩下我们3口人了(生了个孩子)。


佟桂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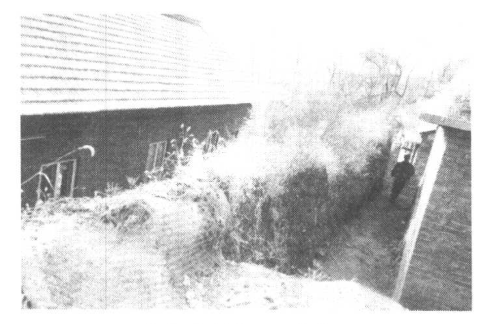
佟家沟"人圈"共有200户人家。因没地种,只好去靳杖子村给别人扛活儿。一天得两斤苞米来支撑全家人活着。住的是婆婆娘家的一个小窝棚,南北3米,东西5米,炕就占去了四分之一,让公公婆婆和亲戚两口子住在屋里,我们夫妇俩只好住在小草棚里。后来,又利用屋子东侧的墙壁,搭了一间两米见方的小屋,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啊!大屋里住的4口全死了,小屋住的我们夫妇俩没死。

马永兴也说过,那年佟家沟"人圈"里患赤痢,共死了60多人,而且死的都是外

来户。马永兴也描述了他家在佟家沟"人圈"时的居住情况。他家迁到佟家沟后，在别人的地里搭了一间小屋，东西4.5米，南北2.6米，然后将此屋分作两半，东侧是闫万德一家6口人居住，西侧是马永兴一家6口人居住。一提到"人圈"，马永兴就气愤地说："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楸木林惨案

从蓝旗营经半壁山稍向西一点有个叫小子庄的村子，而进入瀑河支流向北一点便是楸木林村。楸木林的北沟称为得山，翻过这里可通过"无人区"。楸木林也是八路军游击队经常往来的一个必经之地。



前苇塘村"人圈"遗址



楸木林村"人圈"遗址

我听了白江朝(75岁)和白恩培(80岁)所讲述的一些亲身经历。随后，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的佟先生又向我介绍，白江朝是白瑞林的孙子。他二人讲述的都是听老一辈人讲的。而白恩潮的口述则是亲身经历，作为资料的价值比较高。兴隆县党史办公室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曾编写了《十万骨骸的碑记》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白恩潮的口述，那年他76岁，现在白恩潮已过世。



白江朝



白恩培

白恩潮的口述：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

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二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斧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贵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我军民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 年 2 月 9 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 30 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 18 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地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村子里顿时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那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 44 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着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亮的刺刀；还有 150 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 1000 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儿。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答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狗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捆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施以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个招供的。

敌人红了眼，拿出了“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 3 人，第四个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下之后又松一松，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这样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这阵势，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

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

见证人的叙述是活生生的事实,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的区长王佐民便来楸木林看望村民。这样一来,村民们纷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据白恩培讲,当时被捕的共99人。另外,《兴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一书中,也记载着:楸木林原有80户村民,99人被捕,38人被日军杀害。另据《楸木林民众回忆录》中记载:白恩培的兄长白景舒是从兴隆被释放回来的。据他讲,日军把给八路军送3斤以上粮食的村民都给杀了,3斤以下的就释放了。被释放的共3人,其中就有白瑞林的儿子白贵朝。白贵朝亲眼目睹了其父白瑞林惨遭日寇杀害的场面,而白江朝则是从其父白贵朝那里听说祖父白瑞林惨死经过的。

一般认为,村的户数多少与是否是自然村或是行政村有关。至于被捕者人数上的差异,也是常理之事。当白恩朝等44人被捕后,或许敌人又抓走了一些人。至于谁被抓或谁被害,只要村里活着的人将数字凑到一起就准确了,一个人记忆可能会有偏差。我从佟先生那里了解到,兴隆县党史办公室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统计人数的。因此我认为,被捕者是99人这个数字较为合理。

潮河行——"人圈"的生活

兴隆县城以西有个叫前苇塘的村镇,而潮河则发源于前苇塘以北的深山之中。潮河从这里一路向西,经过小关门长城后,在密云汇成大河。另外,经滦平南下而来的潮河主流,与流经张家口地区赤城县城南下,尔后向东去的白河在密云水库汇合,并再汇集其他支流形成潮白河及新潮白河,最后经天津东部进入渤海湾。中国的河流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从其发源地开始,它总是在想不到的地方与想不到的河流相汇合。

流经兴隆县的潮河边上,有二道河村和三道河村。这里所称的二道或三道,其实是指潮河第二个拐弯和第三个拐弯处的意思。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潵河边上也有个叫做三道河的村子。

五道河

五道河是从南边狗背岭流过来的潮河支流汇合之地。当年这里也设置过"人

圈”,关的都是狗背岭一带山区的村民。

谢金山今年84岁,满族。当年,他从马兰峪迁移到兴隆县。在马兰峪时,因为没有土地生活贫困,便于1920年来到兴隆县北火道村,后又于1932年转到五道河来。他从13岁时起开始喂猪,14岁半放羊,到17岁后便一直给地主做长工,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他是个和蔼善良的老人,常年的人生磨难,使他的性格变得谨小慎微。

郭玉成(75岁)、**谢金山**(84岁)、**周德广**(村民组长)的口述:



郭玉成(左)、周德广

日军是在1942年2月10日开始划定“无人区”的。原先,五道河村共有15户计100多口人。当山里的村民被迁到这里后,就变成了60户计400多人的村子。外来户共45户300多口人。干的都是农活儿,另外还得出劳役,为讨伐队运物资。这里规定是太阳出来就外出干农活儿,太阳落山才回村,一到夜晚村大门就紧闭不开。日本人允许这里耕作农活儿。

所谓“无人区”是统称,其实它包括三种形式:即禁居住禁耕作地带、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和“人圈”。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在禁居住禁耕作地带和“人圈”之间,有3公里左右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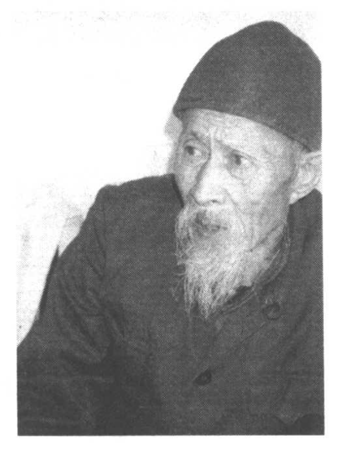
村里所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给日本人,然后再从他们那里领取配给。但因配给通过中间几个环节的层层盘剥,最后分到村民手里的就所剩无几了。

粮食配给是每人每天7两(合350克),老人是3两(合150克),大都是红高粱。不足部分只得采野菜和野果来充饥。由于总吃这些东西,人的身上就浮肿。1943年闹了一次瘟疫,一下子死了30多人,都是吐血后就咽气了。

大搜捕时从本村里抓走七八个人(一一列出人名),全都被送到北票下煤矿去了。外村来的就地杀了7人。另外,饿死了20多人,冻死了七八个人,主要是王绍清的妻子和孩子。

住的是草盖的马架子窝铺,地方不大却住着三代人,也没厕所。

布的配给是按粮食上交量来决定,平均下来5口人之家所配给的布,还不够一个人穿的。冬天没有棉花,人们只好捞河藻晾干后,用它来做棉衣挡寒。每家只有一条裤子,哪家有一身衣服就算顶好的人家了。



谢金山

食盐每月每人3两(合150克),火柴每户(5人)3盒。

当年,郭玉成家是7口人,谢金山家是3口人。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8日

六道河

六道河是六道河乡行政中心。

刘继忠(69岁)、**殷淑珍**(75岁)、**潘明怀**(69岁)的口述:



刘继忠



殷淑珍



潘明怀

这里是1941年前后开始在北山建“人圈”的。那天警察来了,边大声喊着“搬家,快搬家”!边驱赶着人们,接着便从村头放起火来了。

六道河“人圈”是在1942年春天建成的。共30户100多口人。这里驻扎着日军的山下大队,也驻有宪兵队,还有派出所和村公署,也是实行配给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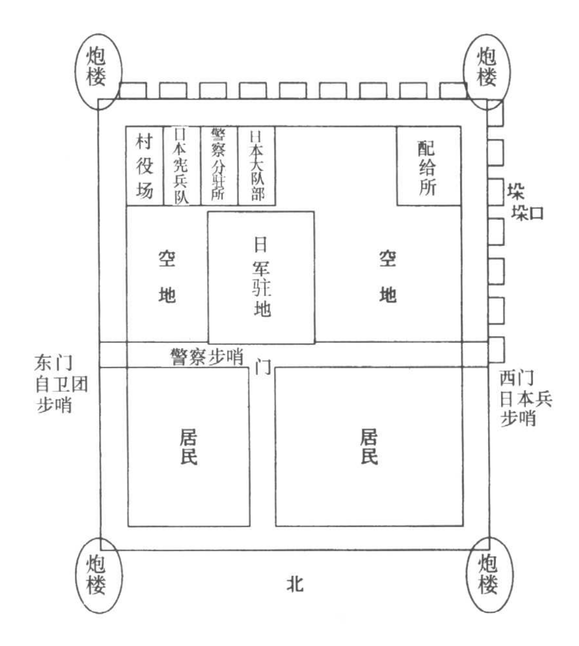
根据刘继忠的口述,佟同志画了张“人圈”图。为了加强城墙的厚度,砌了一些墙垛,低的地方叫垛口。因为里边驻扎着日军,所以城墙的质量很好,四周有炮楼。六道河“人圈”的特点是,各种机构多而居民较少。

居民没住房,都是搭马架子或窝铺来住。火柴是每月一户一盒,没火柴时,只好拿木棍相互摩擦取火。男人一天喝两顿稀粥,女人只喝一顿。

殷家原是专干农活的,可日本人不让种庄稼,并放马出来把她家的苞米地啃光了。她家人去撵马,却遭到日本人的毒打。后来,日本人干脆用刀把苞米地全砍了。这样一来粮食彻底没来源了,只好一天喝一顿稀粥,肚中无食无力干活,平常吃些野菜、野果和树皮来充饥。能配给上高粱就算不错了,哪有什么苞米和小米啊。

配给的布是用大豆壳造的,一穿就破开了,不结实。就这布每人一年也只给这么一

块(约五六十公分长)。没办法儿,男人只好整天光着身子出来进去。没通行证和证明信不得外出,若丢了这些证件,配给也就不给了。



六道河人圈示意图

你问日军杀了多少人呀?仅在“人圈”里,日本山下大队一次就杀了100多口人呐!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百姓,其余的大都是押到兴隆的南土门去枪杀。这种事不稀奇,常有。唉!我们村上就有一个人被杀。

1943年这里闹瘟疫,一下子就死了40多口人,全都是浑身浮肿,鼻口出血而死的。

外来的只有7户,多数是妇女。日军经常侮辱妇女,一看到被抓来的那些怀孕妇女,就凑上前来指着人家肚子戏弄地说:“喂,这里什么的有?”气得当婆婆的净撵他们。到处都有强奸妇女的事呀!日本兵喝醉了后,便到这里来,拉上妇女就走。

后来,日军撤走了,伪军又开了进来。

采访时间:1994年11月18日

二道河

当年,兴隆县最西部的“人圈”就设在二道河村,站到村口就能看到长城。趟过潮河进入小关门长城,就是密云县。如今,这里柏油路很宽敞,它一直通往北京。

李秀起领着我们参观了当年二道河子“人圈”的遗址,据说这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处“人圈”。李秀起是河北省劳动模范,1963年和1964年曾受过表彰。


李秀起(右)、杨长兰夫妇

李秀起(78岁)、**杨长兰**(71岁,李之妻)的口述:

现在只剩下四五十米长的一段墙了。当时墙高3米,宽1米。“人圈”东西250米,南北80米,有南门和北门,都是二层的门楼。四周有炮楼,用于警戒。除警察

之外，村民也必须去站岗。

“人圈”是1942年开始修建，1943年完工后便住进了人。原先，二道河人只是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人圈”建成后，陆续地从小关门、黄门子、偏道沟和庙梁迁来了40户。这样一来，“人圈”里就变成50多户130多口人了。我是从潮河北面的山上被强迫迁到这里的，没房子只得搭个马架子窝铺住着。

二道河“人圈”没有驻军，只有个警察防卫所，里面有所长和几名警察，没日本人。长城上设有警防所，住着20几个人的讨伐队。他们是从1942年起开始设防的，一直驻守到1945年夏季。先后在那里驻防的有刘其昌讨伐队、程斌讨伐队和宋庆讨伐队，其中也有几个日本兵。大部分日军都驻在六道河。



二道河子长城

到了1945年7月，“人圈”里只剩下五六十口人。1943年那场瘟疫就死了50多人，最惨的是一天竟死了7口人。年轻姑娘死后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身子就埋了。那情景太惨啦！……

这里被逮捕的有3人，被杀的有十几人(李边想边说出这些人的名字)，那些被捕的人后来都押送到承德和锦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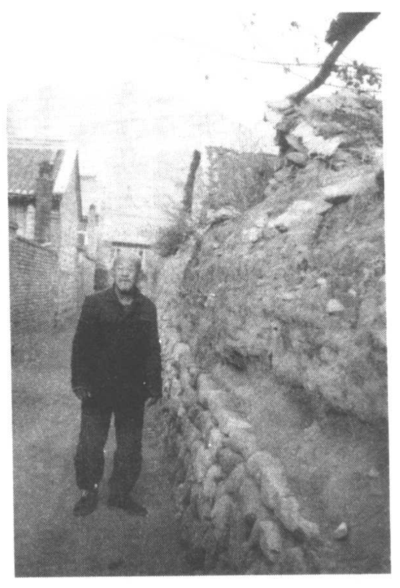
我们全家七八口人只有两条棉被，讨伐队来了说是太奢侈了，便拿走了一条。后来，我弟弟去讨伐队把那条被子要了回来。但不久，讨伐队再来时，用木棒把我弟弟打了一顿，连人带棉被都给弄走了。我们到讨伐队驻地去了几次，他们大门紧闭。第二天，家里人再去找时才发现，他已冻死在那里了。当然，棉被也没要回来。

(回忆往日的悲伤，老人潸然泪下。)

那时没棉被，没衣服，也没吃的，人们只好吃野菜、野果充饥。根本就没有学校，也谈不上孩子受教育的事。1947 年这里才有了小学校，那时是私立学校，是我请来的教书先生。刚解放时，我们这个村一多半以上是妇女。

那儿的住房是个低矮的小草棚，一天，有户人家母亲到外面去了一小会儿，哪知灶中的火冒了出来，一下子把小草棚点着了，炕上躺着个 3 岁的孩子也被活活烧死了。那时，一般都是 3 米见方的草房，里面住着七八个人，也没厕所，卫生条件极差。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起身向主人告辞。此时，杨长兰执意挽留我吃饭，但我谢绝了。惜别时她对我说：“真没想到今天能把过去的事讲给日本人听啊。”



二道河村“人圈”遗址

这一带曾发生瘟疫一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为此，翌年之春，我再次访问了二道河。

采访日期:1994 年 11 月 18 日

李秀起的口述之二：

当时死于瘟疫的有 50 多口人。主要症状是高烧、头疼、全身疼痛、四肢无力和起不来炕。吐血、流鼻血，由于皮下出血，脸部和脖子以及胸部变红。另外，最明显的是浑身浮肿。一至两天或两至三天就死人，所以老百姓都把它叫做瘟疫。

患这种病死的有张海泉的母亲和她二姐，李荣全的父母，李长真夫妇……“人圈”中 50 多口人都是这么死的。

“我丈夫也得了这病，但后来治好了。”杨长兰插话说。

没有药，只好躺在炕上等死。如果把坏血都吐出来的话，还有救。我琢磨这或许是病情较轻，得这种病的人很少有活过来的。

驻守的讨伐队就没人得这种病？“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医生有药啊！”杨长兰在厨房大声地回应着。

二道河村里就只有一口井，在河边附近，井水清澈干净。村民、警察和讨伐队都使用这口井，可为什么仅村民得病呢？是老鼠？那时老鼠成群，到处乱窜。

日军没在二道河驻过，但经常来这里。来的都是山下大队的，其中也有宪兵。杀人的都是日本兵和日本宪兵。不知山下现在是否还活着？

当谈到瘟疫的话题时，李秀起认为其卫生状态恶劣得都难以描述。无论采访哪个“人圈”，每当触及到瘟疫及卫生状况这一话题时，听到的大都是这句话。我

想这是解放后，当地人接受过卫生指导后，才彻底地明白了卫生状况的真正含义。然而，对有关当年流行瘟疫的起因，我却另有所思。

采访日期：1995 年 3 月 1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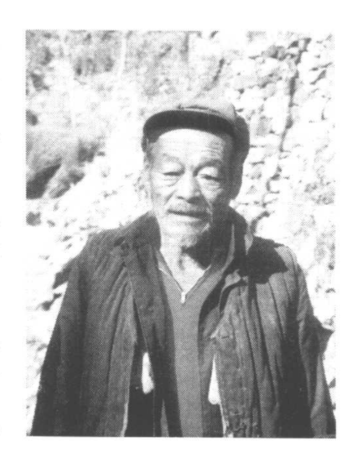
朱家沟——“无人区”的枪声

雾灵山、五指山、狗背岭这三小块抗日根据地，就是插在热河敌占区内的三把尖刀。狗背岭经将军关与平谷县相连。从五道河向南行，便可看到相连的座座险峰屹立，而朱家沟则是进入狗背岭根据地的北部入口。

马君起当年曾担任过民兵班长，当我前去采访时，他正忙着挖土、搬石、砌窑的内墙，据说他要建一个贮量大的苹果窑。他家的房子也是新盖的，看上去挺气派。

马君起（67 岁）的口述：

这里是从 1941 年到 1942 年期间开始实行集家并屯的。那时，敌人让我们都去五道河“人圈”，但全村谁也不动。1943 年正月二十九日，敌人来了后，一把火将全村都烧光了。那可真是彻底的“三光”政策呀！烧光、抢光、杀光，连鸡和孩子都不放过。因此，村里成立了抗日自卫武装。那是 5 月的一天，六道河的警察和日军山下大队的十多个士兵，一起来到花石沟，在那里竖了一块写有“此地为无人地带”的牌子。随后，他们来到朱家沟附近的池塘，就在他们下水洗澡之际，站岗的民兵突然向他们开枪，敌人立即仓皇逃去。逃跑之中，还把自己费力竖起的牌子给撞倒了。



马君起

从 1943 年入秋开始，日军不断地派讨伐队来朱家沟一带清剿和割庄稼。为了自卫，朱家沟的民兵在沟门数十丈的陡壁悬崖上，找到了一个洞穴，决定在那里设瞭望哨，每三人一组执勤。

12 月 19 日，日军山下大队率领 300 余人的警察讨伐队向朱家沟扑来。三个民兵当即在洞内进行阻击。在战斗中，日军死伤 18 人，伪军死伤 20 多人。战斗持续了一昼夜。我方的三个民兵也都负了重伤，李秀峰 4 处受伤，王玉祥 3 处，杨长起 7 处受伤。直至第二天早晨日军摸进山洞后才发现，洞中一个人影也没有。原来，在半夜时，他三人已被别的民兵救走了，马君起就曾参加了这次救护行动。

当时，坚决不去“人圈”的有 150 多人，他们都住在这一带的山上。到日军投降后，活着的仅剩下八九十人了，其中妇女、孩子有 30 多人。死亡六七十人，都是冻死、饿死和病死的。

这一带的山洞都住满了村民，为了遮挡风雨，人们在洞口上竖起石板。为了不

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大人只好强捂住孩子的嘴,有两位母亲就这样活生生地憋死了自己的孩子。史瑞成两岁的孩子是冻死在山上的。当时,人们吃的食物是野菜、草根、苞米、蚕豆和红薯等等。

民兵不仅在朱家沟活动,也去密云县、平谷县及兴隆县一带开展打游击、割电线、破坏公路及埋地雷等活动。

采访日期:1994 年 11 月 18 日

马君起从 15 岁起便开始站岗放哨,17 岁当民兵,1945 年 2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个农民,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为保卫家乡、保卫民族而进行不屈抗争的典型中国农民。

在返回的途中,马君起让我稍等片刻,说罢便返身而去,很快身影就消失不见了。正当我四下寻找时,只见他的头一下子冒出了地面,身子轻轻一纵,就站了起来。他笑眯眯地走过来,像变魔术似的从左右口袋里掏出十几个苹果,捧着递到了我的手中。啊,原来这里也有他的苹果窖呀!

小黄崖川行——"无人区"的生活

小黄崖川一带的村子如今叫上石洞乡,但当年这一带却属于六道河村的一部分。从六道河方向来看,上石洞乡恰好处于朱家沟相反方向的北部山区。小黄崖川的水从小好地开始向西流,而其北侧,以北双洞为起点向西流的则是大黄崖川,这里也是北双洞村的所在地。大小黄崖川的水向西过了长城后,便在营房汇合,一起注入密云水库,再往下游去就变成了潮白河。虽然它们的水源不同,却都发源于兴隆县的深山里,因此也都是潮白河的上游。这里是雾灵山的西麓,当年,雾灵山抗日根据地也是从这里创建起来的。由于夏季洪水泛滥,冲毁了公路,故汽车只得从二道河出发,过小关门长城驶入密云县,然后再从营房逆小黄崖川北上才抵达山神庙。应该说山神庙一带确实还很荒凉。

山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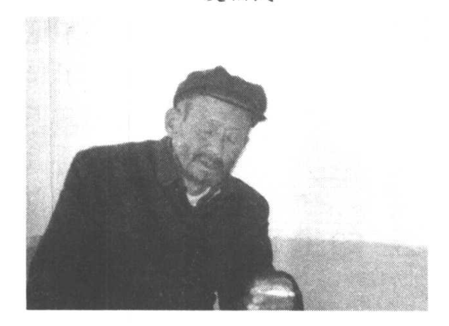
夏福民(76 岁)、**夏顺清**(81 岁)、**夏方清**(69 岁)的口述:

当时这里是"无人区"。1942 年 1 月 16 日,八路军和日军在此地打了一仗。当时,村民死了两个、伤了两个,另有 5 名妇女被敌人抓走了,不久又逃了回来。从那以后,日军又来把房子都烧了。由界牌峪到清水湖和栅子沟,共烧了 22 个村子。它们是后申峪、小后申峪、烟筒沟、杨树沟、栅子沟、苇子坑、东石湖、大石湖、灰窑子、营东峪、营南峪、清水湖、黄土山、石门山、山神庙、椴茂台、界牌峪、米铺、菜场、桃园和窝龙山,当时只剩下这座山神庙没烧,可如今也没庙了。

当时,山神庙村共有 60 户人家。警察到村后,让村民们迁到五道河"人圈"去,



夏福民



夏顺清



夏方清

但谁也不去。妇女和孩子们也都背起装满锅瓢碗筷的筐子,到深山老峪里住进了山洞。因没粮食吃,人们便下山掰些苞米,或把整个南瓜烤熟,切去蒂部,往里撒点盐大家分着吃。当庄稼收获前,日军突然闯来,把苞米地和菜地全毁了,以后又来毁了三四次。即使这样,大家仍坚持不下山。老年人和孩子们都送到长城对面的亲戚家中寄养,那里也是我们中国的地盘啊。1942 年日军共来这里四五次。每次烧过房后,人们又重新搭起草窝棚,而且窝铺一次比一次小。一般的规律是,太阳一出日军便可能进山,所以人们在这之前就躲藏起来,到了夜晚才返回。乡亲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一直到第二年的"大扫荡"。

1943 年正月,日军开始实行连续扫荡。为了寻找食物,夏福民和其叔叔夏齐清两人下山途中,在山洞中被捕。敌人把他二人带到大黄崖川的苗儿洞严加拷问。敌人说他俩是八路,但夏福民摇头否认,说我们是庄稼人。敌人不相信,便将夏齐清的衣服扒光后,吊在树干上像杀鸭子似地用木棒狠狠地打。不一会儿,夏齐清便被活活打死了。夏福民当年 18 岁,他趁敌人不注意时悄悄地溜了,在亲戚家躲了几天后又逃回了山中。

1944 年 5 月 1 日,夏福民参加了八路军,并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顺清在 1942 年至 1943 年期间,曾任村干部。是 1942 年在村里加入共产党的。1938 年,宋时轮部队撤走时,曾留下一批干部创建根据地,为将来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1942 年末,承(德)兴(隆)密(云)第三区抗日政府在小黄崖成立,经第三区区委会书记张敬之的介绍,夏顺清成为党员。

我发现在谈话过程中,夏顺清总是静静地听着他二人的叙述,偶尔才插上一两句。

我(夏方清)也当过民兵。日军来后,不光杀人,连鸡、猪什么的也都抢走了。当民兵那年我 17 岁,组织上派我站岗放哨。站在山上能看清日军的行动,所以人

们都把放哨的叫做“活电杆”。那时我常在六道河山顶上放哨,一看到日军出动了,就立即冲着下一个山头的人高喊:“羊来啦!”下一个山头的人也依次向别的山头传递下去,不一会儿,消息就传到了小黄崖。羊和洋是同音,而洋人指的是外国人——日本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鬼子来了”的意思。再后来,这种“活电杆”又换成了“消息树”的形式。人们只要看见山顶上的树被放倒,就马上隐蔽起来,东西也都“坚壁清野”起来。我说的“坚壁清野”是指一点儿东西也不让敌人抢去或烧毁,全都藏起来,等日后我们回来再拿出来用。

夏方清曾当过儿童团长。当年村里也有过妇救会。如今,这里已成为有200户计772口人的村庄。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9日

栅子沟

离开山神庙后,汽车沿着小黄崖川边的土路,向其上游的栅子沟驶去。途中还路过了清水湖村。据介绍,当年日军把山神庙村和清水湖村同时烧毁了。因村民们坚决不去“人圈”,并始终住在山上,故而村里被杀害的人也很多。1943年一月二十二日(阴历),300多人的讨伐队突然袭击了清水湖村。当敌人发现扑空后,便顺着雪地上的足迹追到了南沟。他们在山顶上架起机枪,向躲藏在沟里的人群扫射。人们接连倒下,连怀抱婴儿的妇女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包括米铺村民的10人在内,南沟牺牲者为22人,其中还有8名儿童。1944年又有十几名村民被害。小小的清水湖共有126口人,先后被杀害的就达46人。

刘云(76岁)口述:

1938年,日军开始实行小规模集家并屯时,把沿小黄崖川的山神庙村、栅子沟村、大好地子村的村民都集中到栅子沟,以便在这里建一个“人圈”,但谁也不愿意去“人圈”。



刘 云

栅子沟正好处于距五道河30里(15公里)、距三道河28里、距大好地子村24里的交界处。所以,这里就成为通往抗日根据地的入口。但是,1942年村子被烧毁后,这里也就变成“无人区”了。当年,日军和讨伐队曾在这里驻守,还杀了20个妇女、两个男的和两个孩子。现在,栅子沟是个自然村,户数是100户,而行政村则应是500户。当年,包括杨树沟、东石湖、灰窑子、营南峪、营西峪、营东峪和苇子坑在内,被敌人杀害最多的是苇子坑的村民。

1943年1月23日,驻守六道河的刘其讨伐队,驻守三道河的宋庆讨伐队以及驻守北双洞的石振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栅子沟的南大门——苇子坑,一次就杀了

60人。整个苇子坑村不过70多人,全家灭户的就有5户。1943年冬天,敌人把躲在栅子沟南山中的20多名老人、妇女和孩子抓下山来,然后从人群中拉出村干部的父亲佟文荣、干部家属夏全清和老师崔善亭,把他们绑在大树上毒打,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儿子在哪儿?三人闭口不语,恼羞成怒的敌人点燃了放在他们脚下的柴堆。佟老人的胸口挨了7刺刀后,被敌人投到火堆里烧死了。尽管夏老人在烈火中已不省人事,但还是被敌人抛到巨石上摔死了。而崔老师则是在被带到三道梁那里用刀刺死的。妇女和孩子们被敌人押到山上的破庙里,趁敌人不注意时,她们全都逃了出来。1944年敌人在杨树沟又杀了十几人。当时,朱玉山的母亲有病不能走动,只好把她放在一个挖好的坑里,哪知还是让敌人拖出来给杀害了,同时耳朵也被削去了。

1943年时,这片山上曾住过100多人。那时游击队带领民兵,曾给“人圈”的百姓送过粮食。要说“无人区”的生活那可真算是“野食穴居”、“背篓家庭”呀!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9日

山中的窝铺一半地上,一半地下,低矮狭窄,地面的落叶厚6尺(2米),人们能在这里居住,并吃着用石板烧熟的饭。当听到这些描述后,我不禁感慨万分——在那样残酷条件下的“无人区”内,他们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生存能力!

横河上游行——瘟疫状况

大水泉

离开兴隆县城向北,过了土城头再折向东行驶,便来到了獐猖山北边的大水泉乡。当地有一股从庆丰一带流淌出来的潺潺泉水,在这里与獐猖山南部而来的横河相汇。

乡政府前面有一个自由市场,乡下人来这里出售农产品,城里人在这里摆上卖服装的摊点,商品充足,人声鼎沸。

这是我的第三次兴隆之行。此次的采访重点,是要了解当地人所说的瘟疫究竟是什么样的传染病。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称:因鼠疫所致,大水泉死亡人数为400多人。[①] 而兴隆县编写的《十万骸骨的碑记》则记载为:1943年,因伤寒等瘟疫流行,全县死亡者达6000余人。[②] 为此,我想实地调查一下它的真正病因。

李合(89岁)、**管瑞枝**(68岁)、**孟庆宽**(70岁)三人的口述:

日军是从1940年开始“扫荡”这里的,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村里死了很多人。

---

① 陈平:《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② 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



右起：李合、管瑞枝、孟庆宽

我家（管瑞枝）有3口人被杀害，死的是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

我（李合）家共8口人，死了两人，伤了两人。被日军杀害的是我母亲和我的大哥。我大哥叫李永，是在白马川被敌人杀死的。敌人还取走了大哥的心脏，煮熟后当了他们的下酒菜。二哥李贵的身上溅上了别人的血后倒下不动，没被敌人发现，才免于一死。

大水泉“人圈”是1943年2月建成的，里面住着300户2000多口人。到日本投降时，圈内人口是700多人，死于瘟疫的有600多人，被日军杀死的有700多人。那时，西北沟门就有个死人堆。这里一直驻守的是满州国军。

日军投降时是八路军来接收这里的，大家都跑离“人圈”返回各自的家里。

瘟疫最厉害的是1943年4～5月，每天都死2～3人。一直持续到9月前后。仅孟庆宽一家就死了15口人呐。

这种病的症状是头昏、意识不清、呕吐、泻肚、不能进食、发疹。有的患病后当日就死了，也有的过2～3日，或5～6日死的，再长一点儿的也过不去10天。凡是死去的人，身上都出红斑点，中医说这叫“羊毛疔”。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究竟是什么病？我也弄不明白，便决定一个月后再采访一次。我想，人们所说的瘟疫，大概是把几种病都混在一起了吧。这回我不问病名，只打听病状。



王玉兰

现将第二次采访**管瑞枝、孟庆宽、王玉兰**（77岁）的口述整理如下：

A. 所谓“羊毛疔”的病症是呕吐、高烧、全身疼痛、无力、食欲不振，身上出红点，患病后1～2天死亡。据当地中医诊断，原因是卫生条件恶劣，受心理性压迫所致。其治疗方法为用银针刺胃，用吸球，或是用火罐拔淤血。轻者可治愈，重者根本无效。

B. 高烧、呕吐、泻肚、脓血便（当地人称为红白痢疾）。

C. 发烧、出疹、脸部、脖子、眼睛均呈红色。此症儿童居多，也有少数大人起痘疮。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1日

厂沟

曹德安(66 岁)、**曹德恒**(58 岁,支部书记)的口述:



曹德安



曹德恒

1943 年集家并屯后,到了第二年的 3 ~ 6 月,这里闹起了瘟疫。症状是红白痢疾引起发烧,浑身无力。那时生活条件极差,凡是得上这种病的人几乎都死了。从发病到死也就两三天吧,总共死了 200 多口人(记载是 265 人)。[①] 这个村集家后是 200 户,1000 多人。每家都挤住着 4 ~ 5 户。曹德安的父亲和曹亮、曹德林都是患红白痢疾死的,这一家就死了 3 口。另外,曹德恒的爷爷和大伯则死于瘟疫。除红白痢疾外,这里还发生过疟疾,打摆子,一阵一阵发高烧。

日军从双庙和白马川调兵到半壁山,然后便开始向"无人区"进攻。

仅在厂沟,三年间就有 23 人被杀害,其中有的是被拉到石庙村后枪杀的。讨伐队驻在鹰手营子,那儿离厂沟约 50 里,每隔 4 ~ 5 天就过来几个讨伐队的人。那是 1944 年的秋天,由于这里没盐吃,有 4 个人搭伙到遵化买盐去了,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就被讨伐队抓着给枪毙了。唉! 只要进了"无人区",被抓着就得死。

采访日期:1995 年 3 月 12 日

双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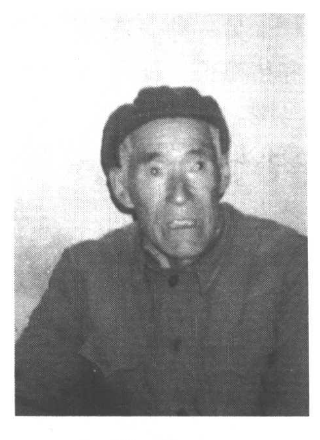
燕青(74 岁)的口述:

这里之所以叫双庙村,是因为村里有两座庙。1942 年时,曾有 100 多人的日军驻在这里,其中有 3 ~ 4 个宪兵。

---

① 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 124 页。

日军撤走后，1943年时，村里又开来了伪满洲国军。在双庙驻了两个连，在万人求驻了一个连，大水泉驻了一个连。仅那一年里，双庙村就住着200多人的伪满洲国军。到了1944年，邢昌盛的讨伐队又来了，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军驻守之前，讨伐队也经常来。不过这里没有打过仗。



燕　青

双庙村的"人圈"是1943年春天建立的，共200多户1000多人住里边。村民和驻军吃的都是河水。

1943年开始流行瘟疫，1944年瘟疫闹得最凶，前后共死了200多口人。没听说日满军得这种病，兴许他们有医生也有药品吧。

当地的大夫把它叫做伤寒病。一般是2～3天就死。我的儿子和我哥哥都是由于拉肚，不到7天就都死了，而我的女儿当天就死了。人一得上伤寒病，就头晕，意识不清，恶心，不能进食，浑身无力。后来连猪也得上这种病了，猪身上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坑。当地的大夫说这叫家畜伤寒（有关伤寒和疟疾的症状，请参阅笔者的附记调查）。

那年，由于白马川警察派出所的警长刘贵财被游击队枪毙了，因此，大批日军和警察包围了白马川村，当场把从南岭抓来的20多名村民杀死，并在场院上摆设刘贵财的祭坛。随后又抓走了三四百人。集家并屯后，被日军杀害的都是外村人，没有双庙村的。日本投降时"人圈"里只剩下七八百人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4月份，当我再次到双庙村采访燕青老人时，才得知他因病已住进了兴隆县医院，采访之事只好作罢。正巧遇上有位老人在道边给马蹄子换掌，便向他打听了此事，又到河对岸的村子里找了几位村民采访，其结果如下。

王振生（82岁）的口述：

部落里人多拥挤，卫生条件也差，所以流行了传染病。这里也没厕所，人们随处方便，整日臭味熏天。每天都有死人拉出去，前后大约死了50多人吧。讨伐队也住在部落（"人圈"）里，但不知他们的人数是多少。不过我记得日本投降那天，他们也都跟着逃了。

王占红（83岁）、**高久荣**（74岁，王妻）的口述：

因为房子被警察烧了，只好搬到双庙来，当时花200元买了一间小屋。日本投降后，我们马上过河回到自己的家里。

传染病的症状是什么也不想吃，净呕吐，全身疼，昏迷，身上出红点子。拉的是淘米水似的稀便，不发烧也不便血。当时得这种病的人不少，也有很多人发病当天就死了。

另一种病是发烧，身上出红点子，手不敢挠，一挠就流黄水，然后皮就烂了。人和猪都得这种病，猪身上也有很多小坑坑，而且也死了很多。记得那时还死了一匹马呢。“人圈”里基本上没有牛马之类的大牲口，因为都被日军拉走了。1944 年瘟疫传染得最厉害，记得是大搜捕后才开始传染起瘟疫的。



王振生



王占红(左) 高久荣夫妻

杨合(74 岁)的口述：

小集家(并屯)时，“人圈”在河东。大集家时，人们都集中到了双庙村。

1944 年时瘟疫传染得最厉害，主要是泻肚、出花，当时猪也出花。一天平均死 2 ~ 3 人，大概死了七八十人吧。当时村里驻着日军，但没有杀过本村的人。

采访日期：1995 年 3 月 12 日



杨 合

白马川

白庆余(85 岁)、**王贵稳**(78 岁)的口述：



白庆余



王贵稳

集家后，白马川成了有80户、400多口人的部落。这里是进山的入口，所以驻有警察，但他们不在部落里，而是驻在如今的学校附近，一共有四五十名警察，其中还有两个日本人。

那年，部落里流行瘟疫，不少村民都病了，但警察里却没有一人得病。症状是呕吐，拉白色的稀便，病死的人很多。

那时，许多山里的村民和本村的村民，都因“通八路”的罪名被警察毙了。记得在半壁山曾住着一个叫中川的日军军官，但不知他是什么级别。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3日

有关白马川惨案的经过，我已在双庙村采访时了解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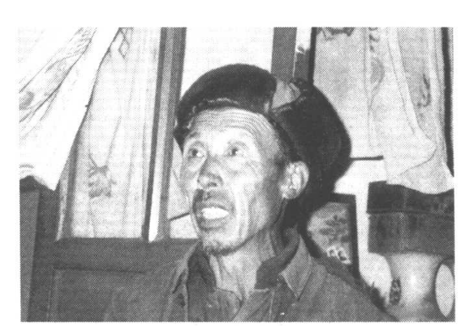
万人求

周彦存(72岁)、**吕瑞清**(77岁，吕风池之子)、**孟宽仁**(68岁)、**周彦柱**(71岁)的口述：

万人求如今叫河北庄。一百多年前，有个姓孟的在这里发了一笔财。此后，人们便到这里来求财。所以，万人求这个地名也就叫响了(抗战中，当地又称为万人仇，即仇恨日军的意思)。当年，村内共有20户140人，但日军集家并屯后，一下子变成了110户1000多人的村子。



周彦存



孟宽仁



吕瑞清



周彦柱

1943 年时，村里得病的人不多。但到了 1944 年，由于流行瘟疫，很快就死了 300 多口人。有的是全家灭户，也有的是一家死了 2～3 口人。死亡率高达 30%，等于全村每 3 人死 1 人。死得连放牧的人都没有了，尸体堆了一片，臭味难闻。这种病传染的速度很快，孟宽仁当年就得过这种病，那时大概是十五六岁。病的症状是泻肚，便里有脓血，发烧，不能进食，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病。也有的人经中医扎针治好了，但究竟是什么病，谁也不清楚。也有的人满身都起小红点子，一般是两个一对，粒也不太大，也有的认为是出天花。从 1944 年 4 月至 7 月，瘟疫逐渐厉害起来，有的一家竟死了 3～5 口人。然而，在兴隆县城里就没人得这种病。

当时部落里有两口井，而且日军和警察也都住在部落的中间地带。

大水泉村驻扎的是伪满洲国军第五联队的一个中队，双庙村驻着伪满洲国军第二、四联队的两个中队，万人求村驻的是伪满洲国军第六联队的一个中队。到了 1943 年，讨伐队前来替换伪满洲国军队。但从未听说讨伐队的人传染上瘟疫，因为他们有大夫也有药品。



万人求村"人圈"遗址

1942 年末，敌人抓走了 9 人，除了一人逃回来外，其余的 8 人都被杀害了。从本村被带走后再也没回来的有 60 多人。在外面被杀害的有 8 人，另有 6 人被抓去运完弹药后，又让敌人给杀了，饿死在外面的还有 9 人。

那时,当地曾有这样一首民谣:"'人圈'大得真惊人,出入只有一个门;半夜警察来敲门,发现生人杀满门。"一到夜里,警察常来查点人数,通常是一间屋子里住着3户人家,若原有10人,清查时变成11人,那么多出的一人就被当做八路,连带全屋的人都得被杀头。另外,外出不带村长开的介绍信也要被杀头。

本村的李明远当时曾是村里的办事员,他负责给八路军送粮食、鞋和袜子。现在村里周支书的母亲曾担任过八路军的妇救会主任。吕瑞清那时住在兴隆,集家时不在这里。

万人求是两面村,既给日伪军办事,也给八路军办事,所以村长也是个两面人。周彦存的父亲当村长时,就给伪军和八路军都筹过粮食。有一次,吕风迟带领村民给八路军送去了11包粮食,返回途中被伪军发现了。吕风迟就让其余的人先回去,只身一人跟敌人去了。后来多亏他儿子吕瑞清八方打点,敌人才释放了吕风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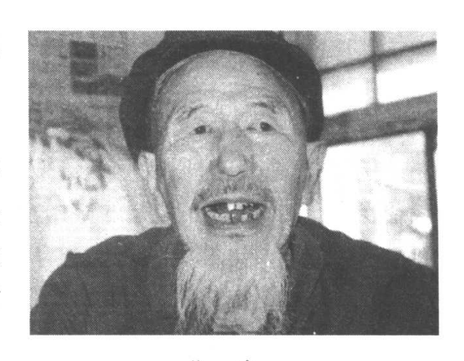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刘杖子

熊斌(83岁)的口述:

(熊斌是万人求的人,万人求和刘杖子属同一行政区。)

1938年八路军路过村里时曾到过我家,这样从1939年起,我就秘密给八路军做联络员。主要是传递情报,当时传递过鸡毛信和长短火柴杆(一种暗号)。1938年曾当过万人求的村长,1939年当过村办事员,1940年又当村长,1941年又改为办事员,后来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熊 斌

这里从1943年开始集家并屯,在万人求修建了4个炮楼,"人圈"大门有站岗的把守,出入必须有许可证。

仅1944年上半年,万人求村就死了200多人,多数是从外村被集家到这里的人。经常是一户死2~3口。开始时,人们还举行吹喇叭的葬礼,但后来死的人多了,而且每天都死人,所以葬礼也就取消了,到后来连掩埋的地方都没有。要不是遇着解放,恐怕连大人带孩子还不全村都死绝喽!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得的是什么病。

1943年冬天,日军和讨伐队在东水泉杀了70人。1944年12月27日和29日,又在成功北沟杀害了30多人,同时在西沟的姜家又杀了6人。当时,我在山上打游击,当我们赶到后,一切都晚了。我们是摸着黑进的屋,踩了满脚血。那时,成功

北沟村的民兵只有5支长枪,连子弹都没有,所以无力抵抗。

民兵杨景民曾听人讲过地雷的事,但未见地雷是什么样。但他还是领了些炸药,在自己家里试制地雷。把拉火索接在手榴弹上就成了地雷,往石头里填上炸药就制成了石雷,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当年,我们这里曾有称为"四虎"的人,虎山李青,虎义是我,还有虎命和虎春,当然这些都是代号。

1943年冬季,这里曾住着40多户村民,第二年减少到29户,日本投降时只剩下四五户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日军杀害了,也有的迁进了部落("人圈")。一进去能得到部落长的保护,也免得在外面遭到任意杀害。这一带都归吕风迟管辖,他也就此保护了很多村民。离这不远处有个鸡冠砬石洞,里面能容纳三四十人,我们一家在洞里一直生活到日本投降那天。

1944年,日军搞了个对投共家属大搜捕行动。我哥嫂被敌人抓住后都送到北票去了,当年嫂子廿多岁正有身孕。在北票,让男的去当劳工,女人则强逼着再嫁人。后来,我哥逃了回来,5岁的侄女被敌人抓走后下落不明,我母亲和我弟妹也不知去向。我的大女儿只好随我奶奶去了"人圈"。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小女儿逃到了山里。到了1946年全家人才陆续团圆,但我嫂子至今未归。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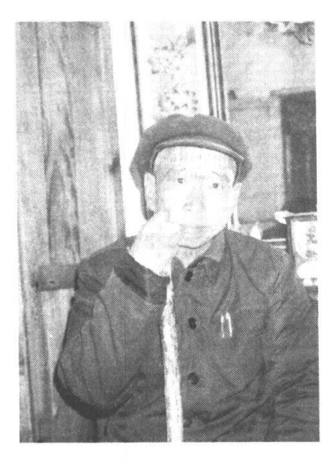
黑河行——"无人区"与"人圈"

万人求是孟副县长的家乡,双庙则是其夫人的故里。我们一行人乘车先来到孟副县长之弟夫妻二人开的旅馆白马川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穿过万人求和刘杖子村,向深山里的成功村进发。巍巍群山,深沟险壑,突然汽车向左一拐驶离公路,又向对面的山谷疾驶,远处那隐隐约约的小山庄便是成功村。从前,这一带曾是青龙县,以后又划归兴隆。成功村是通向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西大门,恰巧又处于五凤楼山的南侧。这里又是黑河的源头,它由这里流向五指山的北部,然后折转向西,从五指山的东侧出现后再南下而去。

成功村

刘玉德(73岁)、**傅长功**(61岁)、**陈宗喜**(68岁)、**贾有英**(60岁)的口述:

1942年八月十二日(阴历),敌人进村后就开始放火,第二天把刘玉德的房子也点着了。当时,因为大家都躲到山沟里去了,所以死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村里死的人就多起来了。那年的春节前,即腊月二十九日,日军率领500多人的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成功村。在西沟抓住了33名村民后,令这些人脱去衣服,光着身子往雪山顶上爬。到山顶后敌人开始下毒手,挑心脏,挖眼睛,割生殖器,最后将33人全部杀害。


陈宗喜

当时，贾有英的爷爷被两只狼狗咬伤后倒在地上，敌人上前用刺刀把他扎死了。贾有英当时也在西沟，但他逃得快才幸免一死。事后他返回寻找亲人时，发现了爷爷、奶奶和大伯的尸体。张景山被赶到悬崖边上，正当敌人举刀要砍他时，他一纵身跳下了悬崖，敌人开枪但没击中他，这才得以逃脱。李存隆的妻子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敌人用刺刀挑死了她和怀中抱着的两岁孩子，又用刺刀划开她的肚子，挑出腹中的胎儿，挥舞着扔到了山谷里。

不久，很多村民被赶进了万人求的“人圈”，进去后能活着回来的人很少。

这里有党支部，也成立了民兵组织。刘玉德是1943年入党的，并担任武装部部长。虽然民兵组织不能有效地保卫村民，但它能扰乱敌人并坚守在山区。他们制造石雷、硫酸雷，埋在敌人常去的地方主动打击敌人。民兵傅春和李常在下山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发现，战斗中不幸牺牲。第二天，老八区的区委书记张克来到这里，亲自为两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抗战时民兵伤亡很大，仅成功村的民兵就牺牲了90名。


刘玉德

民兵不光是守着家门口，还四处出击。1945年炸毁车河梁讨伐队的碉堡就是这些民兵干的，战斗中还使用了13斤重的地雷。那时，民兵们还将收集好的粮食送给“人圈”中的百姓。所以，1943年之前这里的形势并不那么严重。到了1944年困难之时，十几名民兵夜晚去万人求部落找到了吕风迟，并从吕那里给山上的人们带回了四五斗粮食。日军只要看到有成熟的庄稼，就让部落的人去割回来，去割的人有意将一些庄稼放倒后就走开，当日军押着割粮队离去后，我们便能得到一些粮食。此外，山上最苦的还是长期缺少食盐。


贾有英

那时，我们的报社设在柳树南沟，负责人叫白光，社里总共有四五个人。都是人工印刷，发行范围只限于兴隆县境内，还专门设了一个投递员。

日军投降后，从“人圈”出来的约有100多人。

这个村原先叫做梁东柳树洼，改为成功村只不过是


傅长功

给它起个化名。它的意义是成功——天明——解放。表示了人们战胜黑暗去争取光明的一种愿望。当时，人们取化名或给村子起代号，都是不让敌人掌握具体人和地点的一种手段。

采访日期：1995 年 3 月 13 日

就在我们谈话时，女人们也在忙着给我们预备饭菜，大概是听说有个日本人正在村支书家采访吧，村里大人小孩都前来看望。其中既有当年保卫抗日根据地的老人们，也有他们的后代，但人们流露出的却是兴奋、和蔼的目光。

原要到天明村和解放村去采访的，但预定接受采访的人在更远的深山中，由于时间紧迫，只得放弃了。汽车继续前进，在路过天明村时，我在途中看见路边竖立着一块石碑，便下车前去参观。只见它正面刻着“别藏胜地”，建于 1988 年 5 月，署名李运昌。背面则是佟先生撰写的当地抗日根据地的介绍。碑上写的不是“别忘”而是“别藏”。不难看出，佟先生似乎对“别藏”二字的含意更感兴趣。又走了 3 个半小时后，我从车窗的北面看到了五指山的雄姿，当再往东放眼眺望之时，汽车已经沿着结冰的黑河到了蘑菇峪。这里以前曾属于青龙县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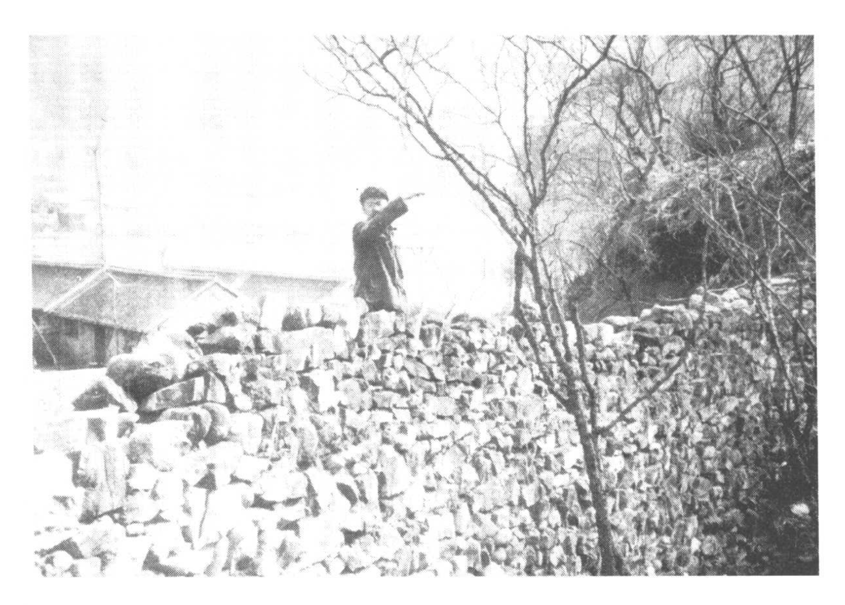
蘑菇峪

赵明友（64 岁）、**赵晨金**（72 岁）、**陈青田**（64 岁）的口述：

这里的“人圈”是 1943 年修建的，从成功村往下所有村子的人都要进入这个“人圈”。这一带共有 3 个“人圈”，河北面的叫蘑菇峪“人圈”，它南北窄，东西均有 1000 米长，呈长方形。里边关的都是外村的人，约有 600 多户。河对面的上游还有赵家圈（30 户），下游则有陈家圈（20 户）。大集家并屯后，赵家圈和陈家圈都增到 100 户，而蘑菇峪也变成拥有 800 户、4000 人的大圈。伪满洲国军的一个中队、黑岩讨伐队及姜大队都集中驻扎在陈家圈南边的小高坡上，后坡上还有两个碉堡。警察则驻在宽甸。这里不驻日军，但他们经常到这边来。


左起：佟靖功、赵晨金、陈青田、赵明友

闹瘟疫时，蘑菇峪“人圈”中的病人最多，赵家圈和陈家圈的



蘑菇峪村“人圈”遗址

病人较少。症状都是头痛、发烧、昏迷、拉脓血、稀便。最厉害的是1944年7~8月份，每天都要死几十个人，最多的一天竟抬出51具尸体，有的是全家灭户。到日本投降时，活着出“人圈”的没多少人了，连瘟疫和被杀的算到一块儿，死的人不下两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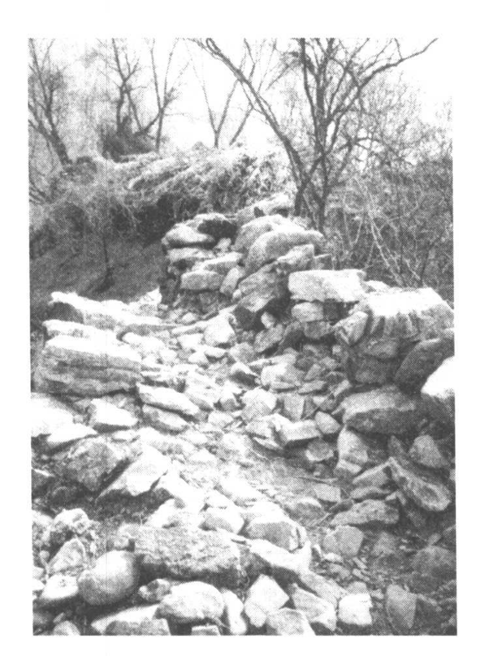


蘑菇峪村杀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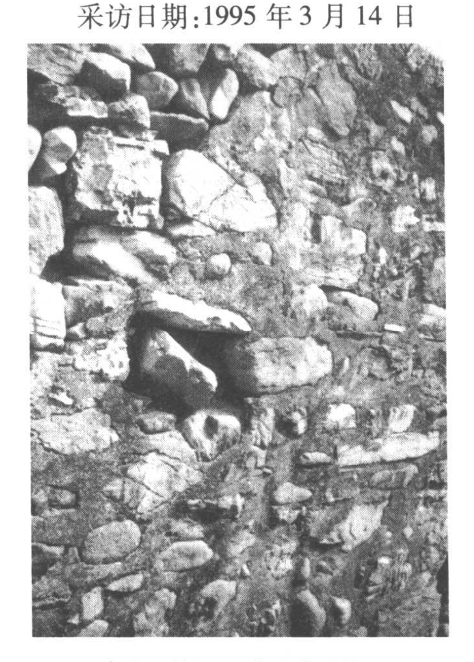
蘑菇峪"人圈"的东边有三个杀人坑,每个坑都有几十具尸体。日本人杀人时,先鸣锣召集部落里的人站在杀人坑的四周,强迫人们观看杀人经过。1944 年秋天,黑岩讨伐队一次就在这里杀了 12 个从黄花村和解放村抓来的村民。他们边用凉水洗刀边砍人,连桶里的水都变红了。黑岩是讨伐队的核心人物,身穿黄褐色的军服,挎着东洋刀,肩章上有黄色的三道杠,老百姓都怕他。田中是股长,人们管黑岩叫班长。方圆 70 里之内被抓住的人都在这里砍死。另外,日军每次扫荡抓住的人也都拉到这里处死。1944 年的一天,日军从宽城的清河抓了姓张的一家人,也是带到这里后将全家都杀了。可怜那三个女孩子都被扒光衣服后,死在杀人坑里。姓张的妻子则被强迫配给了伪军。也有一些被抓的村民给送到东北去了,但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

黑岩常用的有三句话:"通八路"、"八格牙鲁(混蛋)"和"双宾的给"。他们问我:这"双宾"是什么意思?我比划了个来回打耳光的手势给他们看。老人们见后点头,不错,是这么回事儿。

采访日期:1995 年 3 月 14 日



蘑菇峪村"人圈"内侧的马道



蘑菇峪村"人圈"围墙的枪眼

至今村里的人也很少到杀人坑那边去,如今那里只要轻轻地一挖,还会露出人骨来。据说修整土地时,曾用了一部分杀人坑的土,从中收集起来的人骨就装了一大马车。

村里人所说的过河,并非是乘船或走桥,而是踩着河水中排列的石头走过去。过河后,我们来到陈家圈的遗址。如今,这里已看不到当年的"人圈"了,留下的只

是一条马道。在一个较高的坡上,还残留着一段低矮的围墙,在其内侧有一条被人们踩出来的小路,当地人称之为马道。围墙上还残留着枪眼。此外,在另一个高坡上,也有一段当年伪满洲国军驻所的残壁,从那里可俯视下边的村子。

梓木林

徐恩和(75 岁)、**徐庆为**(69 岁)的口述:

1943 年这里建起了“人圈”,当时只有 20 多户人家。不久,日军就把住在梓木林南北两山的人们都集中到这里。所以,这里一下子就变成了有 400 多户、2000 多人的大部落。听住在东沟的刘昌生讲,到日本投降时,部落里只剩下 780 人了。集家并屯的第一年,即 1944 年,这里开始闹瘟疫,每天平均死 35 人。最厉害时,一天就死了五六十人。症状是畏寒、打冷战、发高烧、无食欲、昏迷,当地人叫做疟疾。另外,也有的是发烧、呕吐、拉脓血稀便,甚至有的是早晨发病,到当天晚上就死了。另有一些人是发烧,大腿及肘部、肋下出红斑点或大一点的黑斑点。得这种病的孩子比大人多,死亡率也高。



左起:徐庆为、徐恩和

那时宽甸的警察常到这里来抓鸡牵羊,其中有个叫原田的日本人。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都到过这里,我们还见过黑岩,长着四方脸,短粗的个头,样子怪吓人的,他即使是砍人的时候也面带笑容。黑岩来后,还欺骗梓木林的人让给他当特务。

采访日期:1995 年 3 月 14 日

宽甸

梁福厚(71 岁)、**梁福禄**(73 岁)的口述:

宽甸和蘑菇峪都是 1943 年开始集家并屯的。部落里有四五百户、2000 多口人。当时这里归青龙县管辖,驻守着两个大队的敌人。

由于这里人口少,所以瘟疫不如蘑菇峪那么厉害,前后共死了 70 多人,大都是红白痢疾或出大小疹子死的。



右起:梁福厚　梁福禄

“人圈”里又修了院墙,挖了壕沟,还

盖了一所小院，时而里面住着日军和警察，大约有两个大队吧。一个叫今井的日本人是这里的指挥官。另外，派出所还有三四十个警察，所长是日本人叫桥住。警备队和讨伐队都驻扎在河的下游。

另外，在喜峰口还驻扎着警察署、长城守备队和日本宪兵队。

除了本村的谢文辉等二人被杀之外，这里没有再杀什么人。因为凡是从山里抓来的人都被送到喜峰口去了。我们二人都当过办事员，只和区长陈新民取得过联系，也给他们送过粮食、食盐、鞋、袜子之类的东西。其他哪些八路军干部来过这里，我俩就不清楚了，或许是秘密来的吧。

集家并屯之前，从这里移民到东北去的有梁国正一家、李春朋一家，总共是七八户，现在他们都回来了。那时他们是自发去的，并不是由于大搜捕后被送走的。

采访日期：1995 年 3 月 14 日

黑河上游是“无人区”。日军集家并屯时，将成功村的人都集中到了万人求“人圈”。黑河下游一带的村民则被集中到了蘑菇峪“人圈”，再下游的村民又分别被集中到梓木林或宽甸。从采访中得知，尽管同为“人圈”，但“人圈”的规格与生活与是否驻扎日军有着很大区别。

离开蘑菇峪后，不巧公路上有崖石塌落阻碍了通行。汽车只得在河滩上和河道上行驶，一直开到宽甸的南部。这种坎坷不平的地方，只有吉普车才能行驶。我们先从关门岭经长城到了迁西县境内，然后从龙井关再次进入兴隆县境内。沿着潵河一路向西，这才返回了兴隆县城。翌日，又乘车向东，经半壁山、蓝旗营去潵河东部采访。

潵河东行——毒气与强奸

三道河

张久才（78 岁）、**张妻**（72 岁）、**张振海**（76 岁）、**张贺生**（77 岁）、**张玉明**（72 岁）的口述：

日本宪兵初次来这里大概是 1939 年末或 1940 年初，“人圈”是 1943 年建成的。那时，日军长城守备队驻扎在东庄，一个中队约一百人左右，队长叫渡边。东庄是指它在三道河的东侧，因此人们又称他们是三道河守备队。敌人在东庄修建了兵营，四外还挖了壕沟。后来伪满洲国



张玉明

军的一个中队又进了庄，他们撵走了东庄的村民，自己住了进去。讨伐队常来巡逻，但不住在这里。庄里设派出所，有四五个警察，所长叫杨文宏。特务班是满洲军的人，他们都穿着便服，住在庄外。

村民们都被撵到西庄去住。开始，这里只有200多户人家。大集家时，一下子增到了500多户、3000多口人。原先的1户必须住进3户，一个炕上要挤着16个人睡，一口锅几家轮换着使用。



张久才夫妻

这里也闹过传染病。症状是头昏眼花、呕吐、拉脓血稀便。有的三四天就死了，也有的挺到十多天才断气，一般是两三天就抬出一具死尸。得这病的人，身上起红斑点，一挠就破，最后结上疮疤。无论大人孩子都得这种病，可厉害呢。

那时，男人住在山里，女人和孩子住进“人圈”。到解放的时候，本村的人只剩下一半了。就是200多户、1500人左右。日本投降后，回山的有700多人。这期间，病死的是700多人，被杀死的有100多人，1942～1944年的大搜捕中每次都要抓30多个人去承德，在那儿被枪杀，只有2人生还。全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有的人在山上被捕后，当场就给毙了。



张振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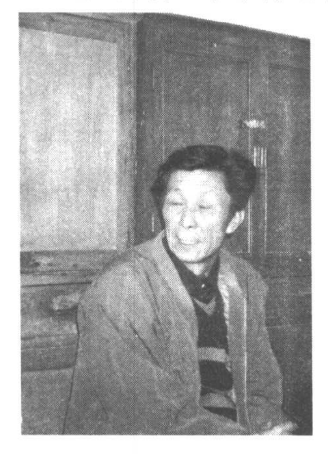
张贺生

庄稼一成熟，日军就押着几百名村民去收割粮食。大家想到躲在山上的人还饿着，便不割，只是轻轻地摁倒。日军发现后又命令村民去收割，还痛打村民，连村长也挨过揍。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5日

偏岭子

张作昌(72岁)、**张作安**(60岁,村委会主任)的口述:



张作安

当年,偏岭子村有150户、800多口人。日军驻扎在三道河东庄,不驻这里。渡边队长的守备队常路过这里到喜峰口去,村里也没有伪满洲国军和警察。不过他们经常从三道河过来巡察。

1943年八月十六日(旧历),有4个轿夫抬着日本人从这里路过,董福善和两个地下党员揣着手榴弹,打算干掉日本人。不料,手榴弹扔偏了,没炸着日本人,却把两名轿夫给炸死了。

第二天日本人来了,说村里人通八路,抓了30人带到龙井关去了,张作昌也在其中。

日军把这30人全都赶进一个小屋里,然后又密封住门窗。接着,便从外插入两根管子往屋里放毒气。人们吸了毒气后,便纷纷倒下,人压人地罗成一堆。中毒后,人的肚子发胀,从嘴里往外冒气泡儿。四小时后,日本兵进屋把人们拖了出来,四个人抢着用宽皮带打一个,边打边喊着“通八路”,随后又往人的嘴和鼻孔里灌辣椒水。张作昌被打后,敌人又提着他的头准备往40公分厚的碾子上撞。这时来了一个会讲日本话的人,他命令日本兵松手,别再打了,然后将张作昌释放了。回到家里,张作昌一连躺了几个月没起炕。



张作昌

日军大搜捕时,从村里抓走了10个人,其中有赵见亮和赵见喜。1945年日本投降后,只有他二人从承德监狱活着出来,而那8个人早已被日军杀害了。

每到星期日,日军就到村里来找女人,村里被强奸的妇女达几十人。他们的目的就是强奸妇女,所以大白天就过来,达到目的后就立即撤回。

北沟的张振民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不料被警察署长杨文宏看上了,非要纳张的女儿为妾,但遭到姑娘的拒绝。在大搜捕时(1943年正月十六日),杨文宏趁机杀了张振民,又强奸了张的女儿。

张殿良曾当过八路军的办事员。那天,他家里突然闯进三个日本兵,张口就要女人,要东西,张为了保护女人跟敌人打了起来,但被打得皮开肉绽后逃到了龙井关。最后还是给逮住了,被押到承德给枪杀了。而亲戚家的女儿也未逃出三个日本兵的魔掌。

周喜的妻子遭日军强暴后，又被带回兵营去给日军服务。

张俊亮的妻子，将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放到驴驮子的筐里，怀抱着吃奶的婴儿，赶着驴往山里跑。不料走到南山时被敌人抓住。日本兵用刺刀挑着刚出生9天的婴儿，挥舞着扔进了山谷，另两个孩子也被敌人扔到山崖下摔死了。随后，张妻也惨遭敌人的毒手死去。

因那时我（张作昌）刚被敌人放回来，头部受伤整天在炕上躺着，所以不大清楚发生传染病的事。但后来也听说过有些人得瘟疫死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5日

二堂子

李学梦（69岁）的口述：

1943年大搜捕时，敌人从灰窑峪、高台子和沟口抓走了70人。听别人说带到承德后，70人全被日军杀了，其中也有我父亲李如刚。但解放后，有两人从东北虎林回来了，其中一个是我哥哥。



李学梦

张俊亮当时是八路军的办事员。那天他刚好给八路军送鞋去了。日本人进村后，在他家里搜出了一小袋子的毛笔，这是准备换粮食用的。日本人不由分说强行拿走了。到了1944年4月12日那天，日军又到张俊亮家进行搜查，并将他妻子和三个孩子抓到尖山村公所前进行审讯。随后将她们带到五道岭那里处决了。张俊亮回来后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后来，张俊亮又和我结了婚，我原来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这里流行过瘟疫，一般是发高烧烧死的，每天都要死几口人。我也得过这种病，畏寒、打冷战，天天发烧。那时也没有药吃，我就光喝凉水，不知为什么病反倒好了。后来听说那是发疟疾。

你问的那些日军的名字，我记不清了。

王玉臣（72岁）、**张志成**（76岁）的口述：

集家后，这里变成了有300多户、1000多人的村子。1943年正月初四，日军从这里一次就抓走了70人。在村边上杀了两人，在蓝旗营又杀了3人。后来听说，带到兴隆、承德后又杀了一些，剩下的都送到东北去了。

这里驻扎过一支伪满洲国的队伍，还有一个叫闫旅长的人。

日军想强奸鸠子峪的一名妇女，就派人把她抓了来，强奸后，渡边又将那妇女杀掉。听说渡边杀人时面带笑容。在洪山口，渡边手下的日本兵还把王玉臣的表


王玉臣


张志成

弟给杀了。渡边住在三道河。

日军在这一带强奸过很多妇女。

讨伐队的人不大来这个村。

集家时，一间房子里住着十几个人。有土地的人家，除了住房外还另有一间牲口棚，而那些外村的移民只好和牲口住在一起。那时村里一半的人是山里来的移民。听他们说，日军一进山，人们就拼命往外逃，连猪也跟着一起跑。

采访日期：1995 年 3 月 15 日

灰窑峪和高台子恰好处于偏岭子与二堂子之间，它们都是澈河支流沿边的村庄。当年，三道河警察署的署长杨文宏进村后对大家说，三道河的渡边队长要来这里讲演，村里应做好准备。村里准备好酒、香烟和食物，为了表示欢迎之意，全村的男人都集合起来。然而，当三道河的渡边中队和龙井关的本上中队（队长本上少尉）以及日本宪兵队和三道河警察开进村后，趁机将全村的男人都抓了起来。被抓的有灰窑峪村 30 人，高台子村 40 人。

沟河行——村中敌特

由兴隆县城往西南去，乘车约一个半小时后便到达了茅山。沟河发源于茅山，它出了黄崖关，绕过西边的平谷后，南下汇入蓟运河。此外，从兴隆的澈河南部群山中还流淌出几支细小的河流，它们分别穿过马兰关、鲇鱼关、冷嘴头、罗文峪及洪山口等地的长城进入了唐山地区。几经转折后，它们都汇入了蓟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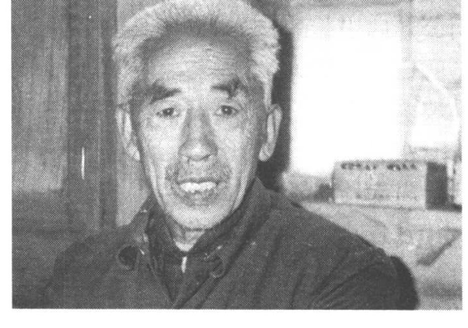
茅山镇

张富（70 岁）、**温秀贵**（72 岁）、**张青山**（68 岁）的口述：

茅山的集家并屯曾分两次进行。1941 年正月是小集家，只把山上的人给抓了下来。1943 年是大集家，日军把周围定为“无人区”，一出“人圈”格杀勿论。1942 年 3 月 8 日（阴历正月廿三），日军实行了大搜捕，一下子在茅山东坡抓了 36 个人。有 28 人被带走，其中 1 人逃回来了，另 27 人未归。温秀贵当时也被敌人抓了进去。温家共有 3 人被抓走，罪名是给八路军送过信，送过鞋和粮食。到了晚上，敌

人给秀贵的爷爷和堂兄的脑门上都点了圆圈，但没给秀贵点上。凡是没点上圆圈的，当天夜里就释放了，温秀贵那年才 16 岁。而被点了圆圈的 28 人则都押往承德。当卡车行驶到青松岭时，其中一个人趁敌人不备，跳车逃走了。张众被捕后逃了回来，他曾被日军捆在梯子上，用火燎烤，烧得全身都肿了起来，至今仍疤痕累累。仅半年之内，温家就先后死了 6 口人，其中有爷爷、奶奶、伯母及其女儿、堂兄和二哥。后来，二嫂和堂姐也都离家而去。秀贵的父亲温彦之曾是八路军的地下办事员，在此之前已被敌人捕去杀害了。


温秀贵


张青山

张青山曾担任过老营盘小学的校长。上次大搜捕时，他母亲看见日本宪兵的身影后，忙招呼张青山和另一个人一起逃走了。而刘文桐、刘文宏、刘文太、刘文江、刘文秀等人都被日军抓住。被捕的人中有两个叫王春的，被绑在柱子上用火烧得奄奄一息时，被家属救了出来。刘家的父亲也同样惨遭毒手。

这次大搜捕的全部经过是这样的：日本宪兵队 30 多人，加上附近据点的伪军和警察 300 多人，从茅山、果园、东谷、老营盘 4 个村里抓了 300 多名村民。经审讯后，当晚释放了 250 多人。第二天清晨，又把昨天拷打得只剩下一口气的十几个人全扔进道边的河沟里，王春就是其中一个。其余的 61 人，分乘两台卡车先被运往兴隆。在那里，一少部分人被拉到南土门处决了，剩下的都押送到承德和锦州。虽然以后再没发生过类似这样的大搜捕，但是经常发生每次抓走十余人的事。


张　富

茅山的警察署设在果园的河东，日军驻扎在河西。日军有个叫山下队的，百十来人驻扎在现在的中管附近。最初的队长叫山下，后来换成五百井，一直驻守到日本投降。这里没有讨伐队。

大集家后，茅山变成了有 105 户、500 多人的部落。老营盘也变成了有 130 户、500 多人的部落。光修部落就花了一年的时间。部落四角有炮楼，有东、西门，西门关着只开东门，有警察把守。部落里设警察署，有十几名警察，其中还有 3 个日本人，他们叫小林、武田和山本。

1943 年闹瘟疫时，仅茅山就死了 70 多人，老营盘也死了三四十人。症状都是高烧、昏迷、不进食、呕吐、泻肚。

有一次，山下队抓了北边村的一个 18 岁姑娘，日军扒去了她的衣服，让她光着身子，在院子里整整站了一天，最后才把她放了。日军经常抓走男人留下女人。他们公开向甲长要女人，而甲长则把哪家有姑娘的名单秘密地通知给日军。然后，日军就按名单抓人。这些女孩子被抓到老营盘的日军兵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也许是被杀了？或许是被关在什么地方？它已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茅山藏匿着七八名特务，他们经常跟甲长、日军保持着联系。甲长也怕暴露是自己把村里的姑娘出卖给日军，靠这些特务来通风报信。

刘日是村公所的办事员，曾参加过地下党的秘密会议。他就是茅山东坡大搜捕行动中抓走 28 人的告密人。每次开会后，刘日都记下与会者的名单，然后交给日本宪兵队。因此，敌人在大搜捕时轻而易举地抓去了名单上的那 28 人。刘日原籍在东北，此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被查出来。他被捕后自己坦白交代的。外调人员也来这里调查过他的问题。

茅山附近有个金矿，当年 110 多名矿警备队员起义打死了警尉大越定雄，并砸了茅山警察署，缴获大量武器后投奔了八路军。此事发生在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在实施惨无人道统治的地区，为了维护人类尊严，人们亦进行了武装抵抗。

车河行——县境之地与无穷无尽的阴谋，细菌、毒气、气球炸弹

从地图上看兴隆县，它就像是被虫子咬过的一片树叶，其中鹰手营子和寿王坟是两块飞地，但如今却都归承德市所属。这里有煤矿、铜矿、石灰岩和石棉等企业，而这些以前曾一度归兴隆县所属。新近并入兴隆县的，有从青龙划拨出来的蘑菇岭乡和从承德县划拨出来的大杖子乡。这两处都地处兴隆县的偏僻地区，确实给兴隆县的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然而，兴隆县的东北部有柳河，以此划定县境也是自然规律吧。不过，我对鹰手营子和寿王坟两地被划出去感到有些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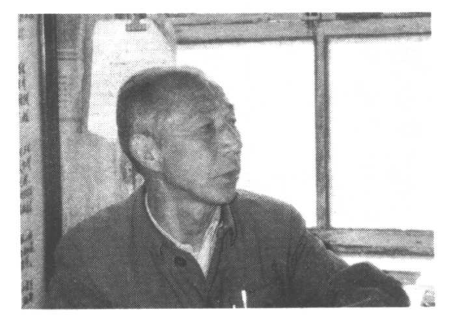
离开兴隆县城，汽车向东北疾驶，公路两边不时地出现煤矿和石灰窑。经过连续山间绕行，我们来到了五凤楼山北部，据说从五凤楼山中流出来的涓涓细水，从这里向东最后汇合到车河口。而经北侧绕了一大圈过来的柳河，也要先经过前面

的柳河口，再进入潘家口水库。真没想到车河和柳河在这里竟相距不远。

大杖子

宋兆怀(65岁)、**孟继瑞**(73岁)、**张福庭**(73岁)的口述：

这里是从1942年4月开始集家并屯的。最初修建了四个部落，到了1943年时，又把它们改建成两个大部落，四周的围墙都是一丈多高。开始，村里只有100多户人家，集家后，外村的搬进来，就变成了300多户、1500多人的大部落。集家后人们的生活真是缺吃少穿啊，一家只有一条被子。谁要敢在“无人区”内种庄稼，就按通八路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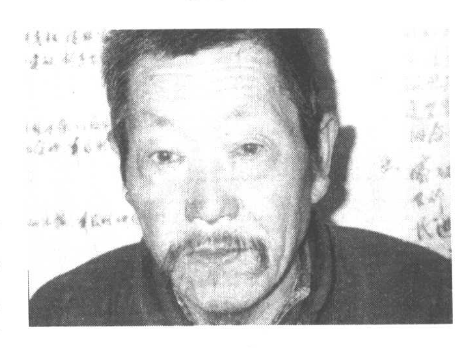
宋兆怀

瘟疫闹得挺厉害，高烧、昏迷、上吐下泻，一得上病两三天就死了。平均每天死二三人，全村共死了300多口人。只要一人得这病，全家都被传染上，当地人称它是“窝子病”。另外，也有不少是发高烧、呕吐、泻肚死的，但没有出花的。这都是集家后的那年夏季发生的事。



孟继瑞

大杖子村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共60多人。宪兵队驻扎在柳河口和车河口，柳河口还有一个守备大队。大队长叫黑田，还有一个叫黑岩的股长，那家伙可凶啦！高杖子、车河堡也驻着日军的安原和安波部队，人数挺多。



张福庭

1944年，日军在南沟杀了12个人。我们这个部落里也杀了不少人。被抓住后送往承德的有100多人，也有的被送到营口等地做劳工去了。刚开始建“人圈”时，日本人说村上的人修围墙太慢了，就抓了一批人到广场上听日军训话，随后就把这批人杀了。到第三天，日本人又说，八路军烧了他们的军车，又抓走了一批村民。仅建“人圈”时被杀的就达到60多人。另外，日军扫荡大印子峪时，先在村里杀死了29人，剩下的被带到大杖子人圈。走到大门口时，日军又当场杀了12个人。这些都是黑河山里住的百姓。

日军统治时期,这个村病死的有300多人,被杀死的有100多人,强制带走的有100多人。

日军飞机很少来这里。但1943年来过一次,还向我们住的部落里扫射了几下子。另外,还听说1945年时,日军飞机往柳河口南山投放了炸弹和毒气弹。

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事的确不少,但中国人有个习惯,人们不爱说这种事。经过再三询问后,他们终于说出了这么件事。

那年,雷家的姑娘21岁,不料被日军的一个队长看上了。第二天,那个队长带人闯进了雷家,把那姑娘强奸了。随后,又强令姑娘一丝不挂地站在院子里,那个日军队长审视了一会儿,便开枪把姑娘打死了。在一旁的日军小队长便说了一声"邦-塞-!",大概那个队长的名字叫邦塞吧?

边上的人问翻译"邦塞"的日文汉字怎么写?我又让他们把那个日军小队长说的话重复了一下。顿时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当日军站在南京城头上,高举太阳旗,高喊"万岁"的声音吗?!可真是个败类,我感到震惊和羞耻。在此场合下,也无法向他们解释这句话的含意。只好说,这是一句日本话,但绝不是日本人的名字!

部落里遭受日军蹂躏的妇女不下100多人,而强奸后被杀害的也有十几人。村里人和受害者家属不愿意提及这件事,包括这些妇女们都在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当时规定,男人一到18岁就去征兵检查,可我们村的年轻人一个都没合格的,却都被送到东北做劳工去了。1942年去了88人,后来返回85人,在那里死了3人。据说是修铁路。1943年又去了几十人,可至今一个也没回来。

采访日期:1995年3月23日

柳河口

张金祥(62岁)、**王贵岐**(66岁)、**张文邦**(82岁)、**勾玉环**(69岁)、**张权**(61岁)的口述:

我们这里曾驻扎过日军的安波部队,那是个约有100多人的中队。宪兵并不是单独行动的,而是和部队共同行动。宪兵共有十几个人,为首的叫黑岩,是热河省警务科警防科长。安波部队调走后,又来了广冈部队,并在柳河口建了宿舍。住了一段后又走了,听说他们是参加太平洋战争去了。接着,伪满洲国军又开了过来。这里也来过讨伐队。

1939年12月27日,日军飞机是从村东飞来的,飞得挺低,快要擦着房顶了,接着扔了炸弹,炸毁了一些房子。

1942年开始建"人圈",建到第三个时,黑岩来了,说这些都不行,必须统统拆掉。接着又重新建了两个"大圈"。1943年大集家时,人们都集中到这里面。原来本村是100户,集家后从外村移来130户,两下一加就变成了有230多户、共1000



左起：佟靖功、王贵岐、张权、勾玉环、张文邦、张金祥

多口人的大部落。

日军没往柳河口扔毒气弹，听说扔到了喀卡山（音译）对面的“无人区”里，当地的老百姓吸了后就死了。

每当日军出去“扫荡”，都让村民去给他们扛弹药及军用物资。

“人圈”的外围有两米深的壕沟，圈的中央有一所高墙大院，里边住着日军。高墙的外围有两米深的壕沟。高墙内部有日军站岗，外面有伪军放哨。在衣食住等方面，内外差别很大，日本人和中国人分别使用各自的井水，而且高墙内部严禁中国人进入。那时，张金祥岁数还不大，日军看他是个小孩子也不盘问就放他进去，有时还给他点米饭吃。有一次，他进去后看到日本人正在院内的大树下杀人，一共 17 个，都是从山上抓来的农民。只见日本人抡起战刀，边砍边大声地喊着“嗨—依”。虽然此事已过了 50 多年，但当时那场面，那声音，至今使他不能忘怀。日军先后在这里杀了二三十人，而被杀者全都是从“无人区”抓来的农民。但敌人不杀部落里的百姓。

部落里也闹过瘟疫，1943 年死人最多。

到 1945 年 8 月，部落里只剩下 368 人，因我（王贵歧）当时任配给员，人数记得挺清楚。日军一投降，有一百多人立刻返回山里去了。算起来，原先部落里有 1000 多人，1943 年和 1944 年的两年间，共死了 600 多口人，症状都是高烧、昏迷后死的。村里的张文邦曾抬过朋友的尸体，哪知回家后头就痛得厉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发了一身大汗后才慢慢见好。到了 1945 年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雨后，瘟疫才没了。

采访日期：1995 年 3 月 23 日

村里人说,喀卡山上曾埋着日军的毒气弹,那里还插着红旗,部落里死人的原因,大概是毒气弹泄露引起的。

另据张文邦讲,小集家前的1941年,有三个从承德来的日本兵曾在他家住了两天,日本兵是押运三个扛货物的劳工过来的。运到这里后,日本兵将三个男劳工打发走,又重新从柳河口雇了三个村民,把货物运到喀卡山里,埋好后插上旗子,然后又把这三个村民打发走了。自此,当地人传开了,说那里埋着日军的毒气弹。如今那里还竖着一根木桩,地下究竟埋的是什么,村里人谁也不清楚。

为此,我又回访了这个村,仍邀请上次参加座谈的村民,认真地回忆一下有关毒气弹的事情。上次来时他们有些兴奋,讲述得十分快,这次与上次不同,十分冷静,我便请村民们又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张金祥、张文邦、王贵岐、勾玉环、张权的口述之二:

瘟疫是从1943年五月(阴历)突然开始流行的。王贵岐的二哥是五月十八日发病,3天后,即二十一日死亡。从五月开始的整整一个月内,瘟疫在村里流行得很凶猛,直到五月末下了场大雨后,病情才有所控制。这期间,全村共死了五六百人,大家几乎都传染了这种病。年轻力壮的后来慢慢恢复了,但老人、孩子及体弱的就都死去了。

病状是发烧、头昏、全身疼痛、出红斑点。于是我画了丘疹的图问王贵岐是不是丘疹。他说不是,画了蔷薇疹的图给我看。患病后一般是二三天或三四天后死亡。村里的张兆风夫妇俩,在一周之内都死了。有的一家死四五口人,也有的全家灭户。那时,这里几乎都成了死"人圈"了。张文邦给人家抬死尸,也得了这种病。当时感觉头痛、全身无力,一下子昏了过去。发了一身透汗后,两天才恢复正常。

当时,村民们都怀疑闹瘟疫和日军在喀卡山上埋的东西有关系,但谁也不清楚那里埋的是什么。

王贵岐的哥哥王金良从外地回村后说,这种传染病大概是毒气弹引起的,日本人埋的也许是毒气弹吧。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什么是细菌弹,所以就都说成毒气弹了。王金良1947年参加共产党,1949年随军南下。如今住在湖南。有关细菌武器的事,大家是在朝鲜战争以后才知道的。

张文邦又把当年日本兵运货物及住在他家的情节回忆了一遍。

那天,三个日本兵带着三个农民,要把两个箱子和一块石头埋到喀卡山去。一只箱子的形状近似于立方体(50×30×30),另一个比它小一些,呈长方体。石头是四方形,也是从承德运来的。因为进屋时,文邦还帮着他们抬东西,所以记住了东西的大小。每个重量约有15乃至20公斤,但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进屋后,日军就让那三个民工回去,后来文邦发现又有另外三个村民把东西抬走了。运到山上后,由日本兵来处理。因为不敢靠近,怎么处理也就不清楚了。不过,从村里可以见到埋东西的地方竖着一杆红色的旗子。事后,日本兵是和三个村民一起

下山的，并把这3人打发回家了。以后听说，那面旗子是航空线标志。至今也没人去那个山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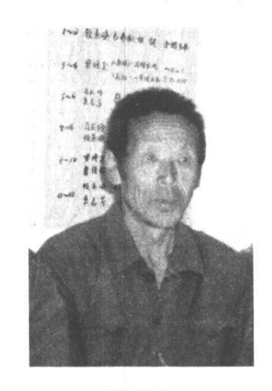
日军没往柳河口扔过臭弹（毒气弹），但这里曾有过臭雾现象，像雾那样，臭得很。臭雾一来，人就头痛、恶心呕吐，接着就得病。但一下雨，臭味就消失了。解放后也有过这种现象，但臭味没有。这和前面说的瘟疫不同。

日军飞机不常来这里。以前来时是从东向西飞过的，“人圈”建好后，飞机来时是从东向南飞过的。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2日

高杖子

赵文启（71岁）、**刘虎山**（60岁）、**杨成林**（72岁）、**张学成**（73岁）的口述：



刘虎山



赵文启



杨成林



张学成

我们是1943年迁入“人圈”的。以前这里只是个有30户、150人的村子，集家后，一下子变成了有1000多户，七八千人的大部落。到高杖子来的，都是从黑河、柳河、西山、水沟等地迁来的移民。日军把那片划为“无人区”，房子也都烧光了，凡磨磨蹭蹭不愿来的村民，都就地枪杀了。大家都说日本鬼子黑岩最凶狠。

当年，杨成林给日本人做过饭。日军的队长叫安原。在高杖子设有日军指挥部，在此地训练新兵。日军撤去后，伪满洲国军队和讨伐队都来过这里。多数被杀的罪名都是通八路，而且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村民。本村的人没有被日军杀害的。

死者中有一半人是得瘟疫死的，也有饿死的。1943年每天都死人。1944年，高杖子死了42人，大都是吃野菜中毒死亡。也有得红白痢疾的，其中白痢疾死得最快。不少人得了疟疾，也有得水肿病的。

有一回，日本飞机还跑到这里撒了不少传单，都是日本字谁也不认识。“人圈”的围墙高一丈二，壕沟深两米，但无水。“人圈”里面还有一处高墙大院，里面住着日军，四周有炮楼（他们给我画出各自在“人圈”住过的地方，而且他们的住所都在“人圈”的北侧）。

车河堡

车河堡公路逆车河支流而上，穿过了黑河的成功村、天明村和解放村。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公路。当年，这一带是"无人区"，被抓被杀害的人很多，而且瘟疫的种类也多种多样。为此，我在这里做了两次采访，花费了一些时间，对一些细节进行了确认。

第一次采访了 7 个人，第二次除马殿举外，又添了 6 名从西洼村来的村民。综合整理两次座谈记录如下。

衣秀坤（62 岁）、**张建广**（69 岁）、**刘廷满**（79 岁）、**马殿新**（72 岁）、**马殿举**（82 岁）、**唐木来**（70 岁）、**杨宝林**（82 岁）的口述：

第一次：1995 年 3 月 23 日记录。

衣秀坤、**张建广**、**刘廷满**、**马殿新**、**唐木来**、**杨宝林**、**张凤才**（71 岁）、**杨宝玉**（72 岁）、**李东顺**（76 岁）、**李东良**（72 岁）、**衣秀修**（83 岁）、**刘长春**（81 岁）的口述：

第二次：1995 年 4 月 22 日记录。



马殿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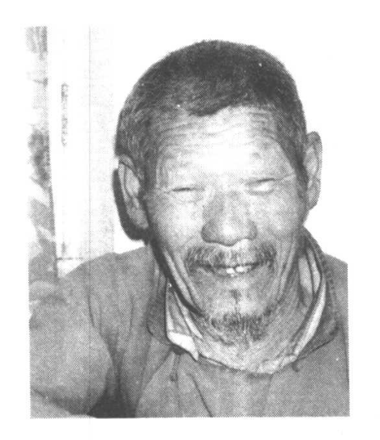
衣秀坤



唐木来



张建广



杨宝林



刘廷满



马殿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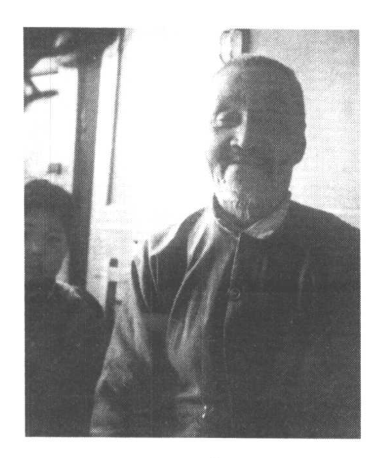
张风才



衣秀修



杨宝玉




刘长春


李东顺(右)、李东良兄弟

以前,我们这个村有 100 多户人家。1943 年建立“人圈”后,变成了有 600 多户、3000 多人的部落。驻军有日军、宪兵 200 人,伪满洲国军 200 人。日军撤走后,讨伐队又来了。他们全都住在部落里。警察署设在柳河口。

西洼村是个有 300 多户、1200 多人的部落,病死了 600 多人。车河堡病死的有 200 多人。日军没杀过部落内的人,抓住杀掉的都是“无人区”内的百姓,死了有 200 多人。

所患瘟疫的症状,大体整理如下:

1. 高烧、呕吐、红白痢疾。

2. 呕吐、白痢疾。此病死亡较快,二三天即死去。红白痢疾和白痢疾、死亡者各占一半。

3. 畏寒、发烧、全身疼痛、浮肿、昏迷、出红斑疹,一二日死亡,此病最厉害。

4. 畏寒、打冷战,周期性发烧,体壮的可以慢慢恢复过来,体弱的患病后死去,也称疟疾。

5. 从鼻、口中出血,厌食,一般 3—4 天,或 4—5 天后死亡。不一定都发烧。

6. 浮肿、皮肤溃烂。

在西洼村,最多时一天竟死了 21 人,给二斗高粱米都没人愿抬尸体。

从 1943 年至 1944 年开始流行,但 1944 年最严重。

7. 雀盲眼。张凤才当年 27 岁,曾得过这种病。那时,人们吃的是日本人配给的食盐,走路时,不知为什么,眼睛一下子就看不见东西了,紧接着就昏迷过去。原来,配给的食盐中掺入了一些小黑粒的东西,不仔细看就发现不了。那种小黑粒闻着无味,吃起来有点涩。

李东顺和李东长说,西洼的人也得过这种病。这时参加座谈的人们都说,这一带的人也都得过。大白天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一下子摔倒在路上,也有人从山崖

上摔死了。人们都称它是雀盲眼。大多数人过几天就恢复正常，但杨宝林的左眼至今还什么也看不见。日本投降后，人们不再吃配给的食盐后，村里的这种病也就消失了。

8. 催泪棒。接着，张凤才又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他曾在伪满洲国军队的食堂里当伙夫。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些像粉笔粗细的小棒棒，就顺手抽出一支往北沟的马殿贵肩上一蹭，哪知马殿贵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马一边哭喊着疼啊，一边挥手打张凤才。站在旁边的士兵让他马上把蘸湿的毛巾捂在自己的脸上。开饭时，士兵们听了这件事后都哈哈大笑起来。当年，伪满洲国军和日军的服装一样。

9. 气球炸弹。

马殿新：放羊时，见过一个像气球那样的东西落了下来。午前 11 点左右，我走在羊群的前面，所以没发现。估摸两个时辰后，我赶羊群下山时就看见了那些气球。当时我没看到飞机来过，只看见气球慢慢地落下来，正落的时候，就听到“噗”的一声它就破开了，立刻冒出烟来，我闻到一股子味儿，感到有股气，泪水流了出来。回家后饭也不想吃，一下子就迷糊过去了。

张建广：没看见天上有飞机，只看见有气球。

刘廷满：那飞机早走啦，当时也没看见扔过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有个像降落伞的东西慢慢悠悠地飘落下来，刚一落地立刻就裂开了，四下散出了烟雾，人一闻到后马上昏倒。第二天，那片草地都枯黄了，谁要吃那片地里的野菜，准保得病。

杨宝林：那味儿挺难闻的，后来人们都管它叫毒菌。我回家后也昏倒了，连续睡了七八天什么也吃不下去。

李东顺：我听说后就急忙往家跑，进门一看，全家人都躺着呢，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唐木来：我发现山上有个破气球，就捡回家来。大小有 5 米左右，但不知道是啥材料做的。那时候也没有塑料布，反正不是咱中国的东西。全家翻看之后眼睛就都有毛病，以后发病了。

那气球形状就跟北京天安门前的差不多。马殿新说完后，大家都点头说差不多。凡是看到气球的人，都说是在山上看见的，而在家里的人都说没看见。另外，距离不一样，人们所说的尺寸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比划着说是直径 50 公分，有的认为是一米。此外，人们看到的颜色也多种多样，有茶色的，灰白的，绿的和蓝的等等。

那些直接看到气球并闻到气味的人，有的眼睛出了毛病或昏迷过去，但经过一周时间又都恢复正常，但也有人躺了很长时间才病愈。气球来后，经过一周或 10 天左右，村里便开始发病，因高烧、昏迷死亡者很多。一般为五六天便死去。虽然还不能证明村里的病症与气球有关联，但当地人却都把它叫做毒球。同时人们也清楚地记得，气球的出现是在 1943 年夏季。

刘长春坚决不去"人圈",他独自一人在山里生活,并在杨树沟给八路军干过事。1943年七月二十八日(阴历),当他回到柳树沟的家中后,被讨伐队逮捕,27岁的妻子也被日军杀害。当年他才29岁,被敌人押往承德监狱,5天后获释。返回家中发现,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被敌人杀害了。当时,黑岩就在车河堡,另外还有一个叫佐藤的日本人也在那里。

据刘廷满回忆,他曾亲眼目睹过佐藤在黑河的偏桥沟时,曾将一个被捕者的心脏挖出来,用水冲洗后拌着砂糖生吃了,而且吃的时候两眼发红。我在各地都听说过日本人吃人心脏的事,并曾对此事半信半疑。不过,这次我终于听到了见证人所述的事实了。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2日

来到车河,我才一下子明白这里的全貌,原来横河、澈河、黑河和车河都环绕在辽阔的五指山周围。通过了解柳河,我又知道了在车河堡以北,还有一条通往承德的路线。在这里我还看到了五指山根据地的一端,它从车河堡向东,一直延伸到宽城县内。

二次回访车河后,便乘车由柳河口沿滦河向承德进发。虽说是路途不远,但也行驶了两个半小时。之所以走这条路,是想以相反的方向来证实一下,当年日军押着抬箱子的民工,从承德到柳河口的张文邦家,是否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因为张文邦曾说过,他认为当时日本人是从承德乘火车到下板城后,再让三个民工抬着箱子,来到柳河口的。我觉得应该可以乘卡车去的,但问了以后才知道,当年那里只有一条无法通汽车的窄山道,即便是现在从柳河去下板城,仍然要在悬崖陡壁的山间穿行。

下板城以北是上板城,以南是鹰手营子。1943年2月1日,下板城曾发生过"二一惨案"。当年,奉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的命令,第一组——承德日本宪兵分队600余人去鹰手营子逮捕了451人;第二组——田野大队200余人去下板城逮捕了280人;第三组——日满警察200余人在警防股长黑岩的指挥下去上板城逮捕了250人。三个行动组共逮捕年龄从18至60岁的男子981人。被移送承德监狱的有376人,其中28人立即押往承德水泉沟刑场处决,余下的都被押送到东北当劳工。除此之外,剩下的那些人经审讯后,分别在上板城和下板城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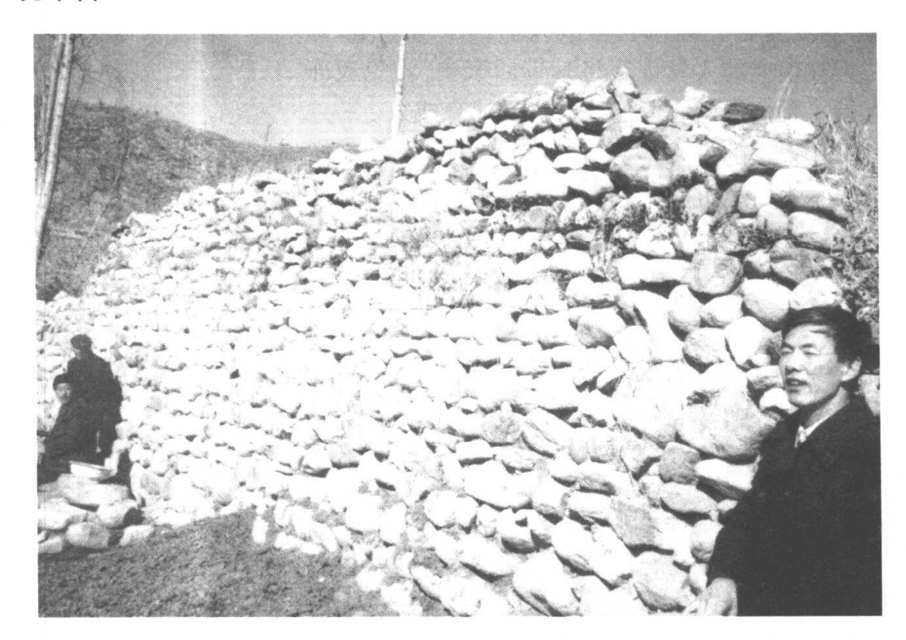
宽城、滦平、赤城行

宽城县

驶过长城的铁门关进入宽城县内,就感觉到这里的山脉较为平缓。这和承德县、滦平县的山区状况大体相近,但与兴隆的山简直不一样;兴隆高山峻岭较多。

喜峰口现在还淹没在潘家口水库的湖底。听人介绍，当夏季乘游船在潘家口水库游览时，能在水底看到喜峰口长城。在宽城县，县长特意为我预定了参观潘家口水库的游船，以便饱览湖底长城的景色。为了不打乱预定计划，我打算以后再去，于是便抓紧时间采访了原来的宽城的“人圈”和“无人区”。

亮甲台



亮甲台村“人圈”遗址

张王氏(81岁)的口述：

亮甲台既是现在宽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满先生的家乡，也是当年关东军八〇四部队中两个中队的驻地。1943年集家时，这个有150户的村子，一下子增加到几千人。1944年温疫流行最猖獗。据王满先生的母亲张王氏介绍，当年亮甲台曾流行过赤痢和天花，大搜捕中被抓被杀以及被送到东北去的人很多。部落里也饿死了许多人。亮甲台“人圈”规模不小，南北4公里，东西2.5公里。如今保留着一大段“人圈”的围墙。南边不远便是都山，而都山则是八路军在青龙的抗日根据地。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7日



王满与其母亲张王氏

大屯村

刘凤兰(57 岁)的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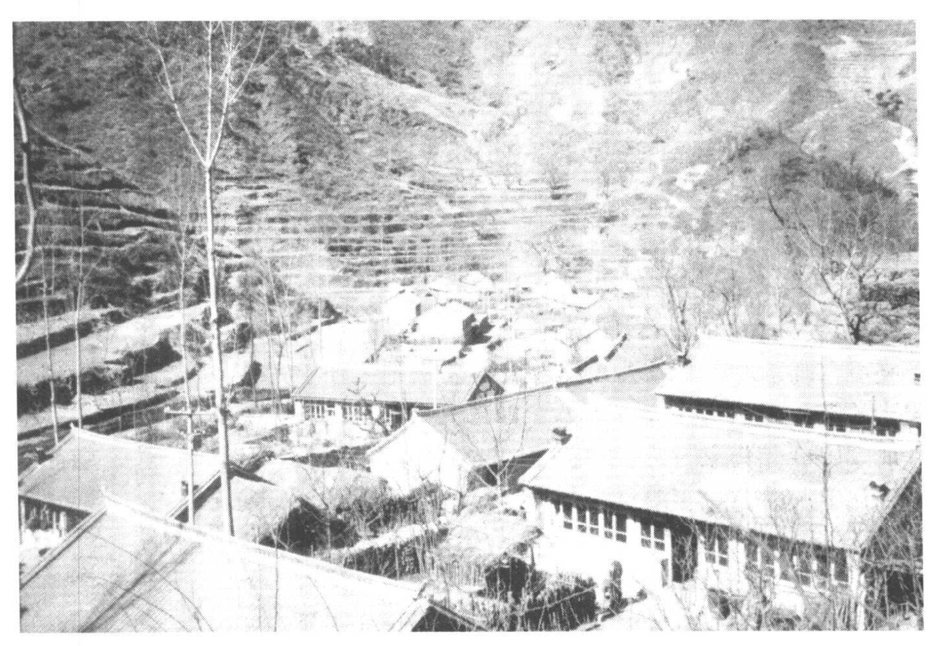
1941 年 2 月 11 日,日满军警突然包围了大屯村,在这个仅有 140 户共 460 人的村里,竟有 184 人惨遭杀害。刘凤兰的爷爷、奶奶、叔叔均被枪杀,母亲背着年仅一岁零两个月的她随父亲一块逃走时,其父母不幸中弹,双双身亡。刘凤兰被敌人扔到了雪地里,好在第二天被南屯的人发现后将其带回家中,才免遭冻死的厄运。是这家好心人的祖母将她哺育成人。



刘凤兰

日军在青龙的许多地方都实施过这种“三光”惨案。当天乘车经过的地方有艾峪口、峪耳崖和九虎岭。此外,据说潘家口水库一带及暖河塘、清河塘和东边的塌山,当年也遭到了血腥屠杀。[①]

王厂沟



现在的王厂沟,此处原为八路军司令部旧址。

---

① 参见《宽城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河北日军暴行录》(1),1985 年。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 年。

刘成国、刘成义(59 岁)的口述:

王厂沟村在孟子岭西北部的一条深山沟里,它也是当年八路军的根据地。刘成国、刘成义向我讲述了当年村民对敌斗争的一些情节。1941 年末,这一带被划为“无人区”,日军烧房毁田后,将人们集中到孟子岭。1942 年,八路军进入王厂沟,和没有逃跑的农民一同展开了对敌斗争。妇女主任刘素珍带领村中的妇女们,只用一周的时间,就为八路军做好了 110 套棉衣。没有扣子,只好用铁片代替。刘成义全家共 13 口人,有 8 口人被敌人杀害。他的祖父被烧死,父亲又惨死在承德。棒锤崖下惨死的竟达 840 人。日军投降时,王厂沟村只剩下不到 100 人。在孟子岭,被屠杀者竟达数千人之多。驻在孟子岭的日军一〇一师团九联队春田中队共有 150 人,从 1943 年初起,他们每周一次专门扫荡王厂沟。1943 年 5 月 11 日,该部在王厂沟被八路军全部歼灭。[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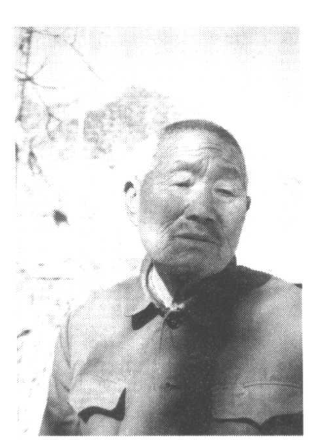


刘成国(右)、刘成义

刘殿功的口述:

刘殿功老人今年 78 岁,他特意在半路上迎接我们。据老人讲,1943 年集家时他在孟子岭被捕,从喜峰口押到承德后被判无期徒刑。随后与其他 20 人一起被伪军押送到锦州监狱,在监狱的缝纫厂干了一年多的苦工。1945 年 7 月 13 日,锦州监狱发生暴动,大家都逃了出来,而回到宽城县的只有他一人。

我还去看了八路军司令部和报社的遗址,据说原来都是些小草房。翻过西山潘家口水库对面就是五指山,王厂沟则是五指山根据地的一部分。



刘殿功

滦平县巴克什营

巴克什营地处古北口长城以北,现有人口 1.7 万多人。

葛长春(76 岁)的口述:

从 14 岁到 16 岁,我在藤田商店给日本人当小伙计。当时学会了一点日本话。16 岁时,又到鹿岛组干事。当时,鹿岛组担负着从承德至古北口的铁路铺装工程。

---

①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英雄王厂沟》,1998 年。


葛长春

后来又去大同煤矿看仓库,工资是14日元。20岁时当地征兵检查,我便返回家中,干起了警察工作,工资是21日元。不久,又去兴隆县参加了讨伐队,给日军队长当勤务兵。由于我会日本话,便干些扫地、打水、买东西、帮着做饭等杂事。在兴隆县城里,我见过讨伐队抓人的情景。一次去三岔口时,我听到日本人正在队长的屋里商量着逮捕村干部的计划,当天夜里我就悄悄地跑出来去通知他们。那时,警察讨伐队的队长是中国人,副队长是日本人,但副队长的权力大。另外,在古北口还设有国境警察署。

采访日期:1995年3月22日

当年,滦平县的境界是沿着长城一直延续到南部的黄花城——现今的怀柔县内,但如今西面的三分之一已不属滦平所辖了。

当年集家并屯时,滦平与兴隆的状况不大相同。日军从1941年开始,在当地实施重点试验区,并将典型部落命名为"安乐村",县长为此大力宣传推广这一经验。到1942年时,集家部落几乎普及全县,到1943年普及工作全部完成。全县"人圈"总数为543个,全县总人口245 411人中,进入"人圈"的就达128 240人。讨伐队在"无人区"内制造了天桥沟(死32人)和快活峪(死31人)的惨案。[①] 原想采访一下快活峪村的死者遗属,但因当地不通汽车,只好作罢。

改变路线后,从巴克什营向东去参观雄伟的金山岭长城,此间公路平坦舒适,已修复的这段长城可与八达岭相媲美。

赤城县

赤城县是当年西南国境线的西端,我们乘车来到了西线最顶端的独石口。从今年5月起,张家口才对外开放,而去年这时外国人还不许进入这里。去赤城县必须获得特殊批准,因此,办妥手续从张家口出发时已经是上午9点半了。我因无论如何放不下庞家堡,顺道就去那儿弯了一下。

庞家堡

这里有红铁矿山。1938年,日军用武力占领了庞家堡,并由兴中公司委托给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成立了"石景山制铁矿业所",1941年起开始营业。有烟筒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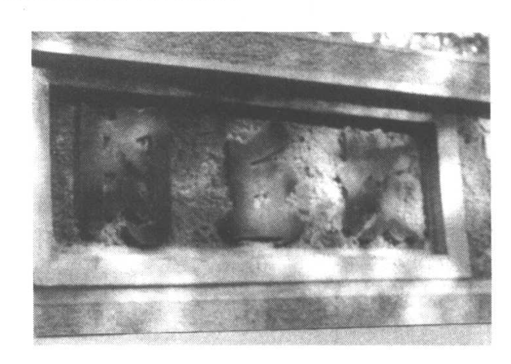
① 参见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河北日军暴行录》(1),1985年,第334、339页。并参见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第144、148页。

庞家堡两处矿山，炼铁厂设在宣化。

庞家堡山上有一处很久没有人光顾的阶级教育纪念馆。当馆内工作人员打开已生锈的门锁后，展现在眼前的是用泥塑组成的模型。它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矿山工人的悲惨生活。肉丘坟下堆满了骸骨，采掘现场人骨散落。




庞家堡阶级教育纪念馆的展品



庞家堡的“肉丘坟”

当年，那些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被骗、被抓来的劳工们，来到这里之前已死去了很多人。在运输过程中，人多拥挤，高温且又无吃无喝，连续几日致使劳工大批死亡。即使到了矿山，由于饭食不足及酷吏的迫害，又有大批劳工相继死去。但日本人视中国劳工为消耗品，无论死多少劳力都能及时得到补充。更有甚者患霍乱的人竟被活扔到万人坑里，日本人的信条是只要不能干活，便统统地处理掉。人们告诉我，翻过这座山对面还有一个万人坑，那是 1943 年以前埋人的地方，共有 8200 多具遗骸。从 1941 年 12 月开业，整整一年间竟死了这么多中国劳工。据 1945 年上半年统计，庞家堡矿死亡者达 8000 余人。1944 年建立了“肉丘坟”，火车站附近还有“千人地”，仅庞家堡至今仍保存着 3 个万人坑。此外，1943 年起连续发生了劳工逃跑事件，被抓回的劳工都在“沙子地”遭到枪决，那里也是遗骨成堆。在日本统治期间，非正常死亡者高达 19 765 人，占当地劳工总数的 7.5%。①

如今，庞家堡矿山归龙烟铁矿所属，成为工人们引以为自豪的城市。

独石口

穿过龙关镇和赤城镇后，山区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便稀少起来，因此我们的汽车也开始加速行驶。重峦叠嶂，山回峰转。正当我担心前面是不是还有路时，突然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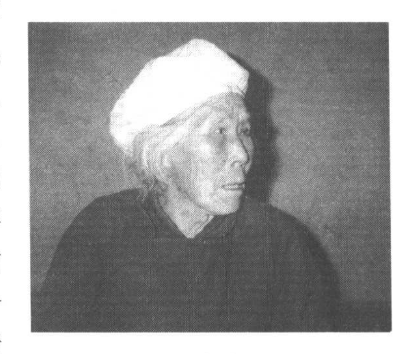
① 参见龙烟铁矿工人斗争史编写组编：《龙烟烽火——龙烟铁矿斗争史》，1983 年。《河北日军暴行录》(2)，第 126 页。有关龙烟铁矿的情况，在《日中战争资料》(4)《占领地区之管理》文中，收集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集的抄译材料。“3.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矿业的侵略活动”一文中再参照“龙烟铁矿与石景山铁厂”。此外，在《满铁调查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里，还载有吴牛农著、堀亮三翻译的《中国之铁、煤炭及石油》的材料。



独石口乡政府

前出现了河流、牧马和羊群，视野渐渐地展开，却不见人家，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色。为在日落前赶到目的地，汽车穿过白河一直往北飞驶。到达独石口乡政府时，恰好是下午5点。我想看一看日落前长城的景色，当地人告诉我，如果再往前走一段就能看清楚，远处山上那断断续续的红色便是长城。确实是红色的城墙，我边看边点头。如果乘车再走5分钟的话，一定会看得更清楚。那长城已几处坍塌，断断续续地只剩下了一些遗址。秋天的太阳落山快，天很快就暗了下来，虽然我没能拍摄下这里的照片，但亲身置于当年西南国境线的西端，同时看见了苍茫暮色中的长城，也感到心满意足了。

独石口村确实不大，27岁的乡长领我们去寻找当年的知情人。乘车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后，便下车徒步走过一片黑漆漆的庄稼地，总算找到一户人家，但屋里却没有电灯。在黑暗的屋里，借助着电筒的光亮我们了解到，这家人姓杨，共有三人。除了76岁和72岁的老夫妇外，另一个像是他们的儿子。看到眼前的景象，就知道这是个贫困之家。据老妇人讲，日军是1937年到这里来的。他们在村子四周建了围墙，每当村民出入时，都必须向站岗的日军鞠躬。而那两个男人好像不太擅长言辞，我感到再问下去也打听不出什么了，便向他们道了歉，告辞返回。



独石口杨家老太太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7日

我不知道那些身负沉重的行囊，连续几天穿过荒漠的原野，来到此地的日本兵是怎样想的。他们历经艰辛占领了这只有无辜百姓的山村，借口当地人鞠躬方式欠妥而肆意抽打别人的耳光？然而，这些士兵后来也都成了异乡之鬼。

汽车经过5个小时的飞奔，终于在深夜1时回到了张家口。第二天在宣化钢厂党委会的办公室里，他们让我看到了龙烟铁矿的资料和《赤城县志》，[①]同时也了解到了赤城县"无人区"的概况。当年，日军从白河堡至独石口，整个北线的长城内侧，包括向东流的黑河沿岸，都建立了"人圈"。当时这一带属于丰宁县，如今归张家口管辖。

据《赤城县志》记载，当年黑河沿线共建立了66个"人圈"。有关"人圈"中的

---

① 《赤城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悲惨生活,书中也扼要地举出了几个具体的例证。这一点,已在我的兴隆之行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要了解赤城黑河沿线的"人圈"状况。然而,要在这宽广的地域中采访,就必须住进村里。尽管我也提出了再度访问的要求,但未获批准。

《赤城县志》中记有碾子沟、碾子湾这样的村名,宽城县里也有个叫碾子峪的地方,似乎这种地名到处可见。其实,碾子就是加工粮食的一种工具。这样一来,我也无法亲身确认,1985 年在卢沟桥纪念馆中见到的照片中的碾子沟"人圈",究竟在什么地方。据陈平先生的回信说,他曾把照片寄到赤城去核实过,那边的人告诉他,大概是赤诚的碾子沟,的确无法准确辨认。总之,就是让老百姓用石块垒起石墙、石门,然后把他们自己关在里面。在众多的"人圈"中,它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而已。

从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一直到山海关以北的九门口,日军在这 575 公里的长城内外①设置了"无人区",将百姓赶入"人圈",肆意地实行起"三光"政策。

大搜捕

兴隆县的大搜捕活动始于 1940 年,起初还只是以个别村、地区为单位地进行。但到了 1942 年以后,日军一反常态,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全面大搜捕。重点是八路军、私通八路者。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私通八路罪"而遭被捕的农民。1942—1944 年进行的大搜捕都在春节(旧历年)进行的,因为远离家乡者要赶回来过年,所以日军就挑选了中国农民非常重视的节日期间进行突袭。

1942 年 1 月下旬,亦即旧历的腊月二十五日,全县统一行动,袭击了河流沿岸的各个村庄,在数日之内逮捕了 2000 人,杀害了其中的 400 余人。其余未被杀害的,都被发配到东北当劳工,其中很少有人活着回来。瀓河流域受害尤甚。郝席菴曾参加了此次军事行动,他记述如下:②三道河一带、龙井关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和渡边队、三道河分驻所所长杨文宏带领推进;蓝旗营、青杏沟、榆树沟一带以日本宪兵和渡边队为中心,联合刘文警察讨伐队推进;半壁山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塚冈队、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特务主任松山义雄共同推进;庙岭、大洼、宝地、大小水泉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和石庙子的孙德讨伐队推进。

以上这些情况,在前面已介绍过,和瀓河、横河流域各村的老人们所说的情况

---

① 据昭和 15 年 3 月由陆地测量部制版的《华北北部河北省地图》测定,是 1150 华里,即 575 公里。陈平先生管这一带叫"千里无人区",关东军民"绵延长城 500 公里无人区"。

② 见同上(1954 年 8 月 13 日),(1)—119—2,113 5,2. 第 33 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第 712—718 页。

完全一致。

茅山、老营盘的惨案,也是在3月9日(旧历正月二十四日)发生的(参照79)。

承宪第89号文件,是承德宪兵队长安藤次郎写的报告(1942年9月16日)。[1]该报告中说1月22日在兴隆县东南部地区逮捕了423人。此外,兴隆的宪兵队和县警务科,又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了150人。其中的150人于1月31日和2月11日分两次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所。其余的273人,据说罪状轻,有显著转变,且本居住地区在政治方面尚未遭渗透,经过训诫和宣抚班的教育后已于1月19日和2月10日释放。但实际上这些人有的被杀,有的被送东北充当了劳工。为什么要特意把1月22日的逮捕行动写成报告呢?因为只有那天的行动比较特殊,宪兵队是根据特工人员掌握的名单逐一逮捕这些人的。与往常一样,该报告中对于遣送东北一事只字不提。此外,像对于黑岩杀了人之事,报告中也写成了在战场上就地击毙。

见草沟是"无人区",表中最后一项,指的是成功村东面的天明村。该村当时属承德县,归柳河口对面的车河口村管辖。讨伐队是从车河口及车河堡出来后,分别深入到五指山根据地的。

第二次大搜捕从1943年初开始,亦即从旧历腊月二十八起至正月初五。这次在全县共逮捕约5000人,杀害数百人,其余的押送去了东北。这些人自此杳无音信。

兴隆县东南部和承德县见草沟地区被逮捕者统计表

(1942年1月22日)

地　点	被捕人员	转　送	释　放
兴隆县半壁山村地区	131	34	97
兴隆县双庙村地区	218	82	136
兴隆蓝旗营地区	54	28	26
承德县车河口村见草沟地区	20	6	14
合　计	423	150	273

大帽峪、楸木林的惨案也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小黄崖的栅子沟、清水湖惨案也是如此。当时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还提前到达兴隆县公署严阵以待。

第三次大搜捕是在1944年2月(旧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进行的。这次搜捕与前两次略有不同。宪兵、日军、县警务科、警察署、警察讨伐队、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等重要机关的负责人于事先开了绝密会议,计划在各地区配备武力,开展大规模搜捕。这次行动应该说是按照上一年秋新到任的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

---

① 见1942年9月16日承宪第89号,(3)—884,载于同上书第688页。

的意图展开的。瀑河一带的居民，被指控全体私通八路，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是见人就抓，尤以靳杖子村为甚。据王贺林、徐少成说：这次搜捕人数达 300 多人。另据兴隆县公安局调查（1954 年 8 月 6 日），三次搜捕共逮捕 12 000 多人，其中被枪杀、斩杀、入狱和送东北矿山者有 11 400 人之多。①

第四次大搜捕是在当年 6 月进行的，也就是所谓“投匪家属大搜捕”。那次在兴隆街召开了包括日本宪兵、日军下道部队长、兴隆县长于文英、警务科长于沛珊、县协和会事务局长佐佐木小春、各警察讨伐队长、19 个村村长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谈了各项的准备工作事宜，并要求对八路军有关亲属进行深入彻底的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县逮捕男女老幼不下 500 余人，并把这些人装进卡车运至兴隆街。但是这次没有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参加。宪兵、警务科司法股、特务和兴隆县法院的人进行野蛮的地审讯、拷问，并且侮辱青年妇女。两周后，又将这些人全都送到东北。中途虽有逃跑者，但却未敢回村。后据说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后，在这些被捕的人们当中，有沿途乞讨回归故里，其中死亡很多。

此后，日军的这种小规模搜捕行动持续不断，而且在此期内还不断地穿插着各种大规模的“扫荡”和“讨伐”行动。1941 年 1 月，日军调集了 1 万多兵力，对五指山、横河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长期“扫荡”。此外还集中 5000 兵力将大小黄崖川的抗日根据地及代号为“中田村”的羊羔峪彻底围困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内，日军不但制造了成功村的屠杀惨案，而且还在抗日根据地中实施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据 1954 年 7 月 23 日承德县公安局的调查统计，此次“大扫荡”中，根据地的军民牺牲者为 3000 人，此外冻、饿致死者另有千余人。② 扫荡中被抓获的年轻妇女也成为了日军士兵的战利品。③

至 1943 年夏季，大规模的集家并屯行动基本完成。当年的 4 月至 7 月期间内，日军的集家行动达到了顶峰。全县的村村落落到处都是日本兵，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些被焚烧的村庄白天到处浓烟滚滚、夜晚满山遍野火光熊熊，令人目不忍睹。当年全县 40 万亩的可耕地中有 16 万亩被划为“禁耕作地带”，而“无人区”竟占了全县土地的 40% 以上。全县有 2000 多个村庄被焚毁，222 个“人圈”④里竟关了百姓 11 825 人。据佟靖功先生说：“按照 1962 年兴隆县党史办的资料统计，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全县只有 199 个“人圈”。但此后我们又对原热河省公署日方绘制的地图进行了校对，这才发现‘人圈’总数实为 222 个。”

---

① 见兴隆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兴隆罪行的调查（1954 年 8 月 6 日），(1)—119—2,23,6，第 20 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 4 集《东北“大讨伐”》第 709 页。

② 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 126 页。

③ 见承德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承德县罪行的调查（1954 年 7 月 23 日）(1)—119—2,1149,6，第 13 号。

④ 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 119 页。

毒气与气球炸弹

龙井关

迁西县偏岭子村的农民就曾被日军押到龙井关据点后，遭到严刑拷打和毒气试验的。如今迁西县已划归唐山市管辖，但当年的龙井关一带却是八路军及日军进出长城的必经之地。当时，长城是一条军事分界线。北面由关东军占领，南面则是华北派遣军的辖区。虽说华北派遣军从未越过长城线北上，但关东军却经常从承德、兴隆方面集结兵力、越过长城向南突袭。它的主要清剿目标是密云、蓟县、平谷（今北京市）、遵化、丰润、迁安（今唐山市）等地。除此之外，日军在龙井关使用毒气的方法也与车河流域的秘密投放不尽相同。它与唐山、宽城的做法极其相似，都是派出步兵小队携带毒气弹前去搞试验的。

如今笔者手中有一份关东军第八〇四部队中根小队大岛光的亲笔供词，①内容是宽城县亮甲台的毒气试验经过。据大岛讲，大致是在 1943 年的 7 月至 8 月期间，他们在亮甲台突遭八路军的夜袭时，曾在村口向外发谢了 3 枚催泪弹，才将敌人击退。数日后，为了进一步测试毒气弹的威力，奉中队长之命，他们小队又向村外地头上正在休息的 20 名村民发射了 2 枚催泪弹。此后他们看到，其中有七八个人捂着嘴，蒙着眼，边咳嗽边流泪地逃走了。

其实龙井关和亮甲台的日军都使用过毒气弹。因士兵们都对这种武器感到新奇，所以大家也都想亲手试一试。所不同的是，这里是伪满洲国，他们不能像在河北省那样公开使用毒气弹罢了。

河北省的毒气战与“三光作战”

与此同时，关东军在河北省使用毒气的频率却高得惊人。为了对应百团大战，日军下达了冀号作战令。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也于 1941 年 5 月向河北省派出了独立守备队的 4 个大队人马前去增援，其中每个大队都配备了毒气和防毒面具。

以下是小川政夫在 1954 年 8 月 22 日的供词，他当年曾在独立守备步兵第七大队服役。现摘录其所在部队当时携带毒气装备的内容如下：②

“红色毒气筒——各中队配备 5 个

绿色毒气筒——各中队配备 100 个

绿色毒气棒——各中队大致配备 100 个

---

① 见大岛光亲笔供词（1954 年 9 月 13 日）。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474 页。

② 引自小川政夫检举重富广一的材料（1954 年 8 月 22 日），(1)—119—2,873,1，第 25 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455 页。

小型毒气发射弹——各中队配备 100 枚

防毒面具——各中队配备 50 个

此外，各大队的兵器委员还另携带各种型号的毒气筒 200 个。”

关于毒气使用情况

在“冀号作战”期间，关东军派出的部队和二十七师团的各部都服从中将师团长富永泰次（实为富永政信）的指挥。在他的命令下，各部队都审讯过中国人，同时在与八路军的战斗中还多次使用过毒气。

另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还收录了几位当事人讲述日军当年在蓟县、玉田县、遵化县及丰润县的一些村庄实施扫荡和使用毒气战的经过。这里仅介绍一下该书中收录的铃木启久的供词。①

铃木启久 1955 年 5 月 6 日的供词：

“1942 年，师团得到了情报，说八路军数千人正在丰润县北部山区的王官营一带集结，由此我军开始了‘丰润大讨伐’。按照第二十七师团长原田熊吉的命令，我负责指挥第一、第三联队参加此次作战。讨伐中，我向部下发出了‘务必全歼王官营附近的八路军，并将其根据地彻底捣毁’的命令。

“第一联队在王官营附近包围了八路军 100 多人，战斗中击毙对方 60 人。王官营的战斗结束后，我又得到了情报说‘八路军正在鲁家峪一带构筑秘密工事’。随即，我命令第一联队马上赶赴那里进行彻底扫荡，并命令该联队长向我报告扫荡结果。其后我又亲自赶赴鲁家峪进行了视察。但抵达时，这里的扫荡战已基本结束，看到的只是我军正继续对藏在一两个山洞里的八路军展开攻击的场面。视察了缴获的战利品后，我又向田浦联队长下达了彻底捣毁八路军根据地的命令。按照我的命令，第一联队在鲁家峪烧毁民房 800 户，攻击山洞时部队还使用了毒气，致使约 100 名八路军干部死亡。另外还残杀了在鲁家峪一带避难的村民 235 人。在此次扫荡中，有 100 多名妇女遭强奸，其中有的孕妇还被剖开了腹部。对于捕获的约 50 名八路军俘虏和嫌疑人，我又下令将他们押往玉田县城，并在那里尽快结案。部下在押解途中又杀害了其中的 5 名俘虏。”

铃木所称的“彻底扫荡”，其结果却令人触目惊心。幸存者张俊金在抚顺法庭上，就铃木部队在鲁家峪使用毒气残杀村民的罪行做了如下证言：②

“1942 年阴历三月初二（4 月 16 日）午后，铃木部队包围了我们鲁家峪。日本鬼子从山洞里把李善、王井同、陈玉坤、徐德胜、于长万、孔建明等七位老人拉出来

① 见铃木启久口供（1955 年 5 月 6 日），（1）—119—2，1，1，第 4 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461 页。

② 引自张俊金关于铃木启久部队在遵化县鲁家峪村施放毒气的证词（1956 年 6 月 9 日），（1）—119—1，574，第 27—29 页。《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462—463 页。


鲁家峪的幸存者 张俊金

后就用刀砍死了。然后又把这些尸体扔到李有学家的梨窑里点火焚尸;70 多岁的刘清池老人被日本鬼子绑在了大谷门口南面的树上,敌人先用棍棒狠打,随后又点燃干柴将他活活烧死;60 多岁的李风林是被敌人用石头砸死的;50 多岁的李树坤被刺刀捅死;张井元则是中弹身亡;躲藏在单阴背山一个山洞里的刘俭、卫殿英、刘保和等人是被毒气熏死的;李有中家后山的山洞里,也有 16 个农民被毒死。李长志一家 10 口人中竟有 6 人被毒气熏死在这个山洞里。而李长志的父亲则是被敌人用棍棒打、线香烧,折腾了四五个小时后,最终烧得全身冒油而死。

"这次大扫荡,日本鬼子在鲁家峪连续驻扎了 16 天。被烧死、熏死、打死的村民竟达 200 多人。其中丰润县六区薛家屯的铁连发一家 7 口是到我们村来避难的,但他的两个儿媳妇、一个孙女及一个孙子都在这里被毒气熏死了。他的一位 18 岁的姑娘中毒后先被日寇轮奸,最后又遭到了枪杀。另外,铃木部队还烧毁了民房 1900 余间。"(立柱与立柱中的空间称为间,当地农民的家大体是 3 间)

去年秋天,我到鲁家峪采访了 69 岁的张俊金。据他讲,他在山洞里被毒气熏倒后,与其他人一起被日军关进了张景森的东屋里。此后,这 70 多人又被分成两批押到一个薯窖前,在这里,日军将这些人一一杀害后又扔进了窖里。当时,张俊金逃跑未遂,被抓回后令他跪在窖前准备砍首。一个日本兵嫌他的衣领太高,就伸手把他的衣领往下翻了翻。这时他乘机咬住了那个日本兵的手指,另一个日本兵见状,抬脚就把他踢下了薯窖,顺手又向他开了两枪。幸好不是致命伤、直到半夜他才被乡亲们救了上来。

姬田光义的《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已详细记录了鲁家峪惨案的整个经过,至今张俊金的后背上仍留着一块很深的伤疤。

据说在 1940 年前后,八路军就已经在鲁家峪设立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卫生院、电台及报社等机构。当时的鲁家峪也是冀东中部的抗日指挥中心。

推进毒气战的日本机关

栗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合著《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 18·毒气战相关资料》[1]的说明中,曾披露了日军在毒气研究、制造、使用、训练等方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二部、第三部以及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负责毒气的研究

---

① 《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8)《有关毒气战资料》。

与开发;广岛县大久野岛(毒气之岛)上的东京陆军第二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负责大量生产毒气瓦斯;而福冈县企救郡的曾根兵器制造所则负责将毒气填充到容器中。1933年创立的陆军习志野学校设有化学战应用专业,约1万多名各级现役军官曾在这里接受过训练。此外,该学校还深入到各部队为士兵们讲授化学战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得各部队在今后的中国各个战场上,都能独立地开展起了形形色色的毒气战。1939年8月,关东军化学部(满洲五一六部队)在齐齐哈尔的郊外成立。该部除了完成大规模毒气试验、训练等项目外,还配合七三一部队共同开展起了毒气方面的活体试验。”

在战后的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西俊英曾作证:在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七三一部队首次实施了细菌战。该部队在哈尔哈河里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以及赤痢菌。[①] 执行此任务的是以碇少佐为首的20名敢死队,行动前他们还联名写下了血书。此外,七三一部队还在诺门罕战斗中使用了毒气。

深泽美芳当年负责毒气运输工作。1954年4月21日,他在军事法庭上作证说:[②]

“7月份,按照川根部队长的命令,我和一等兵伊泽返回海拉尔的平站兵工厂,领出4枚甲号毒气弹(每枚500公斤)后,秘密送到了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部队长又命我将一名苏军军官和一名苏军士兵运往海拉尔第一医院。但途中那位苏军军官死亡。到达医院后,经医生尸检才得知他是因中毒而死的。随后连同汽车在内,院方还给我们做了全面消毒。”

另据报道,关东军化学部成立后,还于8月份将泵式液态氰酸毒气弹(50枚,每枚装液态氰酸20公斤)从忠海运到了齐齐哈尔。[③]

另外,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斋藤美雄在抚顺军事法庭的供词中,也谈到了习志野学校和关东军化学部联合搞毒气活体实验的情况:

“1940年4月,我从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学校来到了毒气试验场。同时,我还命令部下押解来了供试验用的30名中国人。[④]”(斋藤未交待试验地点及毒气种类)

飞松五男的供词中说:

“1940年5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在新民县辽河左岸堤防附近,对奉天甲种后备干部们进行了毒气应用培训。当时,队长南部吉让命令关东军化学部的轻型坦

---

① 见《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对被告西的询问,第353页。

② 引自深泽美好口供(1954年4月22日),(1)—119—2,230,2,第2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③ 见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家庭1987年版,第103页。

④ 引自斋藤美雄口供(1954年12月11日),(1)—119—2,20,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

克牵引着喷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区域内喷洒了持久性毒气。毒气漫延后导致100头羊死亡,并使这块土地一年内不能耕用。[①]"

渡边国义[②]原是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炊事班长。不过在1944年后的毒气训练中,他也曾担任过助手。可能是保密级别所致、渡边未能参加1940年秋举行的那场"氰酸弹"的空投试验。[③] 然而因跟随部队多年,他还是供述了关东军化学部搞毒气活体试验的一些情况: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特种汽车队第一联队材料厂的新兵们,在海拉尔机场以北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的毒气。喷洒面积200平方米,使用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一周的毒剂100公斤。喷洒后导致路边的农民6人死亡,50人手脚溃烂。

1940年7月,关东军化学部特种汽车队第一联队材料厂的新兵,在富拉尔基(现齐齐哈尔市区以西)以东的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喷洒面积2000平方米,使用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一周的毒剂100公斤。导致路过的农民5人死亡,25人手脚溃烂。

1941年1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富拉尔基的实弹训练中,导致地头上的农民80人中毒。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扎兰屯(地处哈尔滨与海拉尔之间,属呼伦贝尔盟管辖)西南60公里之处,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毒气效力测试。施放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后,导致农民3人死亡,70人手脚溃烂。

194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扎兰屯东南60公里的山地进行毒气效力测试。施放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后,导致当地农民4人死亡,30人受伤。

1943年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扎兰屯东南80公里处的山地上进行了毒气弹发射训练。共发射大型红筒(喷嚏型)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红色迫击炮弹30枚。

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碾子山(今属内蒙管辖)东3公里的山地中,施放了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导致农民3人死亡,50人致残。

1943年9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扎兰屯进行了糜烂型毒气及喷嚏型毒气弹的发射训练,导致当地农民3人死亡,40人致残。

---

① 引自飞松五男笔供(1954年9月6日),(1)—119—2,67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

② 指渡边国义笔供(1954年8月8日),(1)—119—2,69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446页。

③ 见厚生省引扬援护局史料室《我国化学武器技术史》,原陆军中将小柳津政雄著:《化学战研究史》。

1944 年 8 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材料厂在富拉尔基东 4 公里的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 100 公斤杀伤力 1000 人,持续时间为一周的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 100 公斤。喷洒面积为 2000 平方米,导致路过的农民 4 人死亡,20 人致残。

1945 年 6 月上旬,关东化学部训练队在富拉尔基的实弹演习中,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发射了喷嚏型毒气弹 30 个,导致农民 10 人致残。"

另外,三尾丰在谈到关东军化学部时也说:

"其实五一六部队(关东军化学部代号)就是一个毒气研究机构,但对外则称为"服装制作组"。它们搞毒气的分工是,五一六负责研究开发,七三一部队负责验证,五二六部队负责实地训练。只听说过富拉尔基有个五二六训练队,其他的则一概不知。"

武田英子在《地图上消失的大久野岛毒气厂》(自费出版)一书中,也对五一六部队做了简单的概述——"在齐齐哈尔郊外的荒野上,驻扎着一支由技术军官及军医官组成的约 100 人的小部队"。

1984 年 7 月 7 日的《赤旗》报上刊登了有关五一六部队的证言;7 月 16 日,该报又刊登了大阪市的富口先生谈有关五二六部队的文章。据富口讲,其实,五二六部队是迫击炮大队中的一个分队,也是直属五一六部队的一支实战部队,它下设 4 个中队。其中第一、第二中队的任务是专门实施毒气战。富口是 1945 年 3 月作为汽车兵被分配到第一中队的,训练场地就在富拉尔基。他记得,兵营四周都是铁丝网,里面有毒气实验室,训练场及器材仓库等建筑。对他们这些新兵而言,每天穿着防护服搞训练,简直就像炼狱一般。但究竟试验什么?他们则不得而知。

由此可知,渡边国义说的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或许就是五二六部队,况且该部的活动范围也是在富拉尔基及扎兰屯一带,而且其部队规模也大致在 300 人左右。虽然他仅知道五二六部队的一些毛鳞片爪之事,但如果属实的话,仍不失为是一份极其珍贵的证言。

毒气兵的训练与配备

在表述毒气兵的训练与配备问题上,后口笃文的供词简直可以说是既简明又扼要。[①]

后口笃文 1954 年 9 月 13 日的亲笔供词:

"1. 我接受毒气训练的时间与场所

甲、1941 年,在广岛第五师团一一联队后备队第六中队开办的第一期新兵训练期间受训三日。时任步兵射手,二等兵。

乙、1941 年 9 月,在湖北省江陵县沙市的第 39 师团 231 联队开办的后备军官

---

① 见后口笃文笔供(1954 年 9 月 13 日),(1)—119—2,671,1,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90—392 页。

集中训练期间,受训六日,时任第二内务班一等兵。

丙、1942 年 3 月,在江苏省南景后备军官训练队受训三日,时任第三内务班上等兵。

2. 毒气训练概要

甲、毒气种类:我只记得有红、绿、青、茶褐色及黄色 5 种。毒气筒规格为大、中、小三种型号,此外还有毒气手榴弹及毒气炮弹等。

乙、毒气性能:红色为喷嚏型(时间短暂)、绿色为催泪型(时间短暂)、青色为窒息型(时间短暂)、茶褐色为糜烂型(时间持久)、黄色为芥子气体型(时间持久)。〔注:实际上,黄色 1 号为芥子气体型、黄色 2 号为糜烂型、茶色的为氰酸液体型〕。

丙、毒气的效力与使用目的:短暂型毒气弹内装气体。其杀伤效果是刺激人的呼吸道和眼睛,使之失去行动自由后,来达到杀伤的目的。尤其是短距离作战及拂晓发起攻击时,可利用风速弥漫毒气,以此来大量杀戮敌方。

持久型毒气弹内装液体。其杀伤效果是毒液侵蚀人的全身皮肤,使之糜烂并最终使人丧命。因此类型毒气弹杀伤力面积大,可区域性地彻底消灭抗日爱国力量和当地百姓,故而是一种最为残忍且又非人道行为的化学武器。日军经常在拂晓时分使用这种毒气弹。

丁、毒气的使用方法:①近距离——卸下毒气筒底部后盖、点燃内部的发火装置后投掷出去;②中距离——发射红筒装有弹簧装置。将该发射筒倾斜 45°角固定在地面上,发射的毒气弹可命中一二十公里远的密集目标。③远距离——可利用毒气发射器或火炮。

〔注:火炮为迫击炮、山炮、野炮〕

戊、毒气配备:各中队配备大型红筒一个,中型红筒,圆筒 20 个,小型红筒、绿筒约 150 个。行动时,小队配备中型红筒 2 个,小型红筒、绿筒 10 个,发射红筒 20 个。另外,联队里还配备持久型毒气弹,而大队里则配备毒气发射器、毒气炮弹及毒气手榴弹。

己、防毒装备:部队都配备九五式防毒面具、及九九式全套防护服。"

村上勇二的供词中记录了有关师团毒气兵的编制问题,他说:"按照 1937 年及 1941 年颁布的第 5 号动员编制令,各师团都配备了负责指挥毒气作战的军官、下士官及毒气兵,其总数为 534 人。第五十九师团也大致相仿。[①]"村上先后担任过第五十九师团的作战主任、情报主任及教育主任之职。他认为,毒气兵是师团中的最重要编制之一。

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从日中战争开始就将毒气兵列入了部队编制,而且还秘密地向各部队提供化学武器。

---

① 引自村上勇二笔供(1954 年 6 月 25 日),(1)—119—2,2,3,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88 页。

《侵略》一书中有一篇阿贺惠撰写的文章,题为"甲号弹——毒气弹的使用"。作者在文章中说:"化学武器之类的资料是军事秘密,故尔都收藏在部队文件箱的最底层。但作为武器实物,各部队的驻地哪怕是条件再差,也都单独设有一个存放毒气和防毒面具的仓库。另外部队行动时,即使是小股部队作战,也都携带着毒气和防毒面具。这对当时无任何防毒装备的八路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另据落合英明著的《日本的恐怖毒气战》(番町书房)中介绍,当年曾在大久野岛毒气厂工作过的知情人告诉他,"红筒里装的是红一、黄一、黄二等型的混合毒气,是一种早期生产的杀伤性武器"。

此外,昭和十六年第7册的陆满密大日记中还记录了关东军请求提供特别弹药的报告:

(A)副官呈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

根据1月21日关兵弹甲第3号及5月3日关兵弹甲第29号的申请报告,现将拟定申请提供的特殊弹药开列如下(见附件一、二、三),特此呈报。

(B)副官呈陆军兵器本部次长的报告

关东军申请昭和十六年度干部培训专用弹药的报告已达。另附所需弹药种类及数量(见附件一、二、三)。特此呈报。

又及:根据临时军费令之规定,该费用应从预算内支出。

上述两份报告都盖有陆满密第401号及昭和1916年5月22日的印章。

附件一中,在开列各种弹药的末尾处还特意注明提供榴散弹和红弹。

附件二的末尾则请求提供黄弹。其规格及数量如下:

(附件二)

规格	型号	数量
九五式野炮	黄弹药筒	180个
九一式10榴弹炮	黄弹药筒	160个
九四式山炮	黄弹药筒	180个
四年式15榴弹炮	黄弹药筒	20个
九六式16榴弹炮	黄弹药筒	60个
九二式10加农炮	黄弹药筒	40个
丙型黄弹		2000公斤

附件二中的所谓"黄弹药筒"指的就是持续糜烂型毒气,当时陆军省本部已批准它在战场上使用。

报告(B)中的副官是指陆军省高级副官川原直一;报告(A)则是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呈给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有关请求提供特种弹药的申请报告。

虽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施放毒气的案件目前正逐步浮出水面,但我认为,它离

解开全部真相之谜仍相差甚远。譬如《细菌战与毒气战》之二记述了"日军四处施放毒气残害众多中国百姓"内容,但恰恰就是这部分到目前还未译成日文。该著作中的"放毒大事记"举证了日军毒气作战的744个案例,现笔者将其整理成表附后。另外,吉见义明在《失去法律时效的战争责任》(绿风社出版)的一书中也认为:"日军实施的毒气战现已明朗化"。但他书中举证的日军在武汉作战中使用毒气达375次以上的这个数字,就没有统计在"放毒大事记"之中。日方所搜集的资料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那些日本战犯们的供词。尽管这些资料极其珍贵,但它仍具很大的局限性;而中方的统计又都来自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报告,当然它也未必一览无余、滴水不漏。其中的不足之处,恰恰就在于这里面缺少来自国民党战线上的统计数字。我想,填补这一空白的任务恐怕要由日本的历史学者来完成了。虽然本书也记录了744次这个数字,但我认为,实际数字则远远不止于此。由此可知,如今已统计出来的这744次毒气惨案就足以令人震惊不已,而那些尚未揭露出来罪行又有多少呢?

另外,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记录的"检察机关认定证据"中,附有一份"关于日军在中国实施毒战的说明文件"[①]。其中记载着:据中国军方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期间,日军在中国境内使用毒气1312次,死伤者36 968人。

日军施放毒气次数统计

年度	次数	
	放毒大事记统计	远东军事审判检察机关记录
1934	1	
1935	1	
1936	1	
1937	17	9
1938	138	105
1939	123	455
1940	136	259
1941	84	231
1942	92	76
1943	87	137
1944	56	38
1945	12	22
合计	744	1312

① 见《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9)《有关毒气战资料》,资料15。

毒气试验地——伪满洲国

除本书提到的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实地演习之外,“放毒大事记”一文中记录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毒气的案例不多,它所涉及的内容也只是新京第二独立守备队使用糜烂型毒气方面的培训、[①]野战重炮第二联队的实战演习、[②]三棵树护警队对拘留的中国人进行催泪瓦斯测试,[③]以及牡丹江陆军医院院长兵藤周吉在外科手术间给一名拘押的中国人做摩烂型毒气试验[④]而已。由此可知,日军当年只是把中国东北、即伪满洲国作为毒气的试验地,而真正实施毒气战则放在了长城的另一侧,即关内。

因此,尽管关东军在兴隆一带大肆残杀百姓,但因兴隆位于长城以北,且又是日本鼓吹“五族协合”的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内侧,所以它在这里一般很少公开使用毒气作战。而偏岭子村老人们提到的龙井关施放毒气,拷打村民的惨案,理应是驻守在长城南侧,即河北一带的日军所为。与其说一一审讯这30名村民,还不如统统毒死来的痛快,而这正是毒气战的特点。

据说1941年5月,第九独立守备队第13大大队在承德离宫内举办了一次毒气防卫训练演习,演习中使用的毒气弹是红筒和绿筒。[⑤] 那么此次演习的目的何在?它要防卫的敌人又是谁呢?我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

车河流域

关东军用尽各种手段对车河流域的百姓进行了残酷迫害,其中包括屠杀、强奸、细菌试验、毒气试验及毒气球爆炸验等等。究其原因,车河流域乃是进入八路军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北入口。当年这一带曾归属承德县,且又为热河省公署直辖。因此,承德的军、警、宪及讨伐队每次进山扫荡都要路过这里,而柳河口又是他们进入车河流域的必经之地。

卡茶山之谜

日军特意从承德经柳河口运来的不明之物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又要连同运来的石块一起埋在卡茶山上呢?这始终是当地人的一个不解之谜。

---

① 见阿部清二笔供(1954年9月20日),(1)—119—2,626,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② 见宫下胜弥笔供(1954年8月10日),(1)—119—2,29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3页。

③ 见冲野一行口供(1954年9月16日),(1)—19—2,697,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4页。

④ 见片桐济三郎口供(1954年8月17日),(1)—119—2,206,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页。

⑤ 见高桥正三笔供,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02页。

当地的村民们都深信，不明毒物就是从日军在卡茶山掩埋物体之处散发后，才使得人们患病的。但我认为事情可能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当地人患病是在日军掩埋不明之物一年后才发生的。况且日军想要搞试验，则根本不必如此费力地埋些什么毒气之类的东西，只要投放些培养后的虱子就极容易使当地爆发一场流行性斑疹伤寒。因此我认为，无法确定卡茶山上埋的就是毒气。

臭雾之谜

我认为柳河口上空的臭雾或许是日军飞机喷洒的毒气被五凤楼山上的流雾带过来的。据当地村民讲，日军的飞机每天都在黑河上游和成功村一带的上空转悠。因为面对着藏在深山密林中的八路军，所以日军也只能采用飞机低空喷洒毒气的方法来消灭他们。若真是空中喷洒毒气的话，那么随风飘到柳河口一带也就不足为奇了。假如喷洒的又是持续性毒气，则这种气味的滞留时间还会更长一些，所以人们闻到毒气后，自然就会感到头痛恶心。此外，我还听当地人讲过：“事先也未听说日军要搞什么试验呀？”的话。由此可以认为，投放毒气之事并不是当地驻军干的。因为日军也同样驻扎在村里，如果不事先有所准备，他们也同样会受到毒气的伤害。

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在给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也提到了日军投放毒气的方法。他说，喷射毒气后，30 分钟之内天空呈灰色雾状。用炮弹发射毒气后，无风时毒雾弥漫范围可达 300 平方米，顺风时可飘至 7～8 里地[①]之远。由此可知，若用飞机喷洒毒气的话，其覆盖范围肯定会更大。

与柳河口相比，车河堡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因车河在这里分流后又进入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所以车河堡一带遭日军逮捕杀害的村民极多，而且各种中毒死亡者也不计其数。

“雀盲眼”之谜

据当地村民讲，当年配给的食盐中有黑色的小颗粒。人食用后，双目失明且又意识不清，此现象在本村和邻村都发生过。这黑色的小颗粒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此事还有待进一步向专家们请教。

气球炸弹之谜

据当地村民们讲，他们把落到山上的那些大小不一的气球割开后，里面立即喷出一股气体，人一闻就出现眼睛流泪、头痛、呕吐及头昏等症状。此后，当有人将气

---

① 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聂荣臻致中央军委电（1938 年 11 月 3 日），(1)—715，第 48 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487 页。

球捡回去用作铺盖时却发现，其材料既不是塑料，也不是纸和布。因当地人还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所以就把它说成是用“日本纸”（和纸）制造的，而且人们还说，当时并没发现粘贴气球用的糨糊痕迹。不仅如此，据说气球溅落的草地都枯黄了，人接触后也出现了体内水肿及皮肤溃烂等症状。因此使我想起，七三一部队林口防疫给水支部长癡原秀夫的供词中就有一项涉及到了气球炸弹之事。①

癡原供词中的第五项：“经纬度炸弹”（气球炸弹）

“林口防疫给水支部的细谷少佐曾对我讲过，从昭和18年（1943年）起，内藤中佐便与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工程师们共同实施起了‘经纬度炸弹’的研究计划。

据细谷分析，它可能是在气球上安装了引爆装置后，再将炸弹吊在气球上的一种武器吧。一旦气球飞临所需到达的经纬度时，引爆装置会自动点燃炸弹引信，使炸弹落下爆炸（也可以将炸弹换成细菌弹）。

我认为这种气球炸弹的试验，多半是在筑波山或东京附近某个气象观测所的山上进行的。因为只有那里地势高才便于气球上升。此外，我还记得在《每日新闻》或其他什么报纸上也看到过这类报道，说是美国洛克西的山火就是因气球炸弹落下而引发的。

另外，由于制作气球的材料是丝纸，因而导致当时生丝市场上的价格一度飞涨。”

除此之外，在常石敬一编译的《目标石井部队》中，还收录了编号为资料45、68的两份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洛克西气球爆炸案”的调查报告，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改造后的气球炸弹有可能在特定地域中落下”。

据武田英子的《地图上消失的大野久岛兵工厂》中记载：“早在1933年，日本就有了开发气球炸弹的设想，当时吴东军还特意试制了一个小型样品。但直到1942年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才开始对此进行全面研究。至1944年初，才将图纸最终交给陆军兵器总部兵器需品料去负责制造。正式生产气球炸弹时，兵器需品料还从全国各地的丝纸业者及明胶业者手中收购了大量的原材料”。②

另据报道，当年军方还动员女学生们参加了糊制丝纸的劳动。③

据说从1944年11月至翌年4月期间，从日本的茨城县大津、福岛县的勿来、千叶县的一宫先后放飞了直径10米的气球炸弹9300只，它们借助于偏西风慢慢地向美国方向飘去。但据美方当年7月20日的统计，这些投放的气球炸弹中，真正飘到美国本土上的只有285只。可能是考虑到昼夜温差大及远距离投放等因素，此次投放的气球上并未携带细菌弹，仅携带了自动引爆装置和炸弹（燃烧弹

① 见榊原秀雄供词，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160—161页。

② 引自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人野岛毒气工厂》第146页。

③ 见林英大：《女人们的气球炸弹》，亚纪书房1985年版。

2~4 枚,杀伤性炸弹 15 公斤)。

车河堡一带落下的气球形状大小不一,但直径都不大。很多村民都说没看见飞机投放气球的事,那么气球又是从哪里飘来的呢?但有一个人分析说,大概是飞机走后人们才发现气球的,所以我也认为气球很有可能是从飞机上空投的。很难想象当时从承德离宫放飞的气球上会装有一种能自动控制它降落到超过 1000 米高的群山中的装置。

那些从飞机上投放的气球确实携带着毒气炸弹,或许其中也携带有细菌武器。但车河堡一带出现的口鼻出血及皮肤溃烂等症状绝不是病毒引发的流行性出血热,而是糜烂型毒气所产生的症状。

1938 年 8 月 23 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在赤湖两岸的激战中,日军于 22 日拂晓使用了大量的剧毒武器,造成众多中国士兵口鼻出血"。[①] 此外,1939 年 11 月 20 日顾祝同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也说:"日军向我浩山北阵地进攻时,使用了大量毒气,导致众多士兵口鼻出血牺牲。经军区检查后证明,日军使用的是窒息性毒气弹"。[②] 上述事件都发生在江西省。另据当年曾在迫击炮队服役的北村伊助作证说,1938 年 10 月下旬的武汉作战中,奉中队长深谷大尉的命令,我们向敌人阵地发射了 30 枚窒息型毒气弹。[③]

1941 年 6 月 29 日,国民党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经检验判明,日军使用的是糜烂型芥子气和窒息型(碳酰氯)与喷嚏型混合剂的毒气弹"。[④]

虽然我不清楚车河堡的受害村民究竟是什么病症,但从症状来看,当地村民一定是受到了混合型毒气的感染,因为混合型毒气造成的后果大体与当地受害者的症状基本相似。

日文传单之谜

据高杖子的村民说,日本飞机飞抵这里时曾撒下了日文传单。当时村里没有日军驻扎,而且来的也不是中国飞机,很显然日本飞机并不是冲着日军来的。那么向不懂日文的中国百姓空撒传单,其目的又何在呢?我认为这又是一种新的细菌

---

① 引自 1938 年 8 月 23 日《新华日报》文章《日军在赤湖放毒,我两营官兵中毒》,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568 页。

② 引自上饶顾祝同致何应钦电(1939 年 11 月 20 日),(2)—787—2760,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584 页。

③ 见北村伊助笔供(1954 年 7 月 20 日),(1)—119—3527,1,第 5 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588 页。

④ 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致何应钦电(1941 年 6 月 29 日),(2)—773—872,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500 页。

试验。

据从承德陆军医院去七三一部队工作的上田弥太郎在1954年9月3日的供词中讲：

"在此期间内，我充当小林信的助手也参加了细菌传单的研制工作。做法是用混入细菌的墨汁来书写传单，以此来测试细菌在自然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和细菌的生存数量。在三个月里，我这个助手干的就是制造细菌传单的工作，目的就是使之成为细菌战的一环。[①]

我认为，向高杖子村撒细菌传单也是日军的一种山地试验吧。那么村民们吃了田里的蔬菜后肯定会得病的。但污染蔬菜的又是何种细菌呢？这将是个永远的不解之谜了。

细菌弹之谜

我在承德市采访了赵锡廷先生。赵在年轻时曾担任黑河、车河一带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财粮助理。据他讲，日本飞机来时曾投下了装有苍蝇和蚊子的瓦罐。所谓"瓦罐"就是一种用泥土烧制的容器。

前文中提到的张希阁先生，如今是承德市的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医务工作者。1949年建昌突发了鼠疫，患病者达2800多人。他为此从哈尔滨调到了赤峰。据张先生讲，此后他也听过1945年3~4月期间，日军飞机在五指山一带投放了细菌弹，若干年后当地还有流行病发生的事。接到报告后，政府便组织人力前去调查，发现当地人患的病服药后就痊愈了，可能不是细菌弹所导致的病因吧。听当地人说，日军飞机投下的瓦罐摔碎后飞出了苍蝇和蚊子。但实地调查时也没发现瓦罐碎片之类的东西，而且也没听说当年的在山里的八路军和百姓为此患病的事。从当时的调查来看，村民们都是听别人传说的，没人见过瓦罐落下的现场。不过张先生也说，这件事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才行。

然而据赵锡廷讲，他当年确实看到过这种瓦罐。赵说，瓦罐若采用硅藻土烧制的话，它就具有慢慢分解能力。何况日军飞机投掷的地点又是深山老林之中，且又经过了4~5年之久，当然很难再找到瓦罐碎片的痕迹。这也说明，石井部队当年在研制瓦罐材料上确实是费尽了心机。

在采访张希阁先生时，他也谈到了七三一部队。据张讲，他所在的哈尔滨陆军医院学校离七三一部队很近，但双方却从不往来。该部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全然不知。只知道学校的铃木三太郎教授与防疫给水部进行过单独联系。1945年8月27日，日军自行破坏了七三一部队的驻地，"咣、咣"的巨大响声不断地从那

① 引自上田弥太郎笔供(1954年9月3日)，(1)—119—2,851，第6号，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220页。


原承德专署副专员赵锡廷

里传来。张先生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

以上是我在兴隆采访到的"特运处理"、活体解剖、细菌试验、毒气试验以及气球炸弹等方面的真实记录。不可否认，日军的上述种种罪行都与七三一部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所谓的"细菌战与毒气战"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指挥官的一声号令之下，全线展开了排山倒海似的战争场面。其实它只是战争中的一部分，是由那些打着试验为名暗藏于各部队中的一个兵种来完成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影子部队"在浙赣战场上投放了鼠疫病菌，在山东作战中撒放了霍乱病菌，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毒气试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人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法官：你在叙述满洲实施的生化武器试验中使用了"材料来源方便"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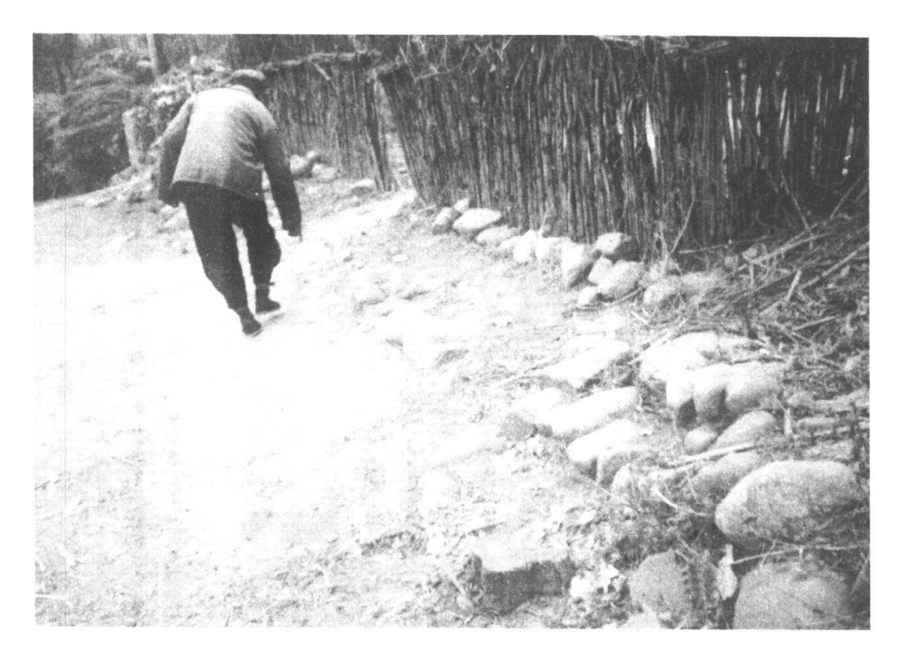
被告川岛清：这里所说的方便，就是指满洲的试验犯人非常充足。

末章　反思兴隆悲剧


日伪时期兴隆县南土门杀人场

长城线南北

兴隆县原属于河北省管辖,此后1933年的热河作战中,关东军用武力强行将该县划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并按照日本人的意愿将长城划定为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1937年后,日本又以长城为界,将北侧划为关东军的占领区,南侧划为华北派遣军的管辖区,由此,长城南北两侧的无人区状况也不尽相同。此外,中国人将长城南侧又俗称为关内。



马兰峪村“人圈”遗址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集中115个团(团=日军的联队)约40万兵力,在华北的主要铁路沿线对日军展开了全面作战,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作战期间,八路军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的日本警备队,同时还使井陉煤矿陷于瘫痪,此举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1942年夏季,华北派遣军在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同时,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彻底的毁灭性作战。而冀东作战(1942年4—6月、8—9月、9—10月)则是该计划的重要一环,指挥此次作战的是华北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启久少将。

完成对鲁家峪的扫荡后,铃木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会晤中又向冈村征求意见说,他已提出了一个为期20天、制造一条4公里宽的“无人区计划”,并说此计划将于8月开始实施。计划实施后,铃木还同原田师团长一起乘飞机视察了无人区地带。当从空中发现被烧焦的土地上还有缕缕上升的炊烟时,便一一

标记在地图上，然后再命令联队长对此进一步清剿。据铃木交代：“联队长每天都按图索骥，严格执行着清剿计划。凡残留的民房一律烧毁，凡反抗者一律杀掉，此外还将那些被捕的农民押送到伪满洲国去做苦役”（摘自中归联编《侵略》中的“无人区地带”一文）。

另外在“无人区”外围，日军还强迫百姓挖掘了封锁沟（宽 6 米、深 4 米），修筑了封锁墙（宽 1 米、高 2 米的石墙）。

河北省内没有“人圈”，日军在此实施的是彻底的“三光”政策。但马兰峪的“人圈”则属例外，这是因为从马兰峪越过长城便可进入兴隆县，且当地又有满洲皇帝溥仪的先辈陵墓，所以关东军就将马兰峪划为了伪满洲国版图之内。当地老人徐宝志(81 岁)带我们参观了当年“人圈”的遗迹。



徐宝志

潘家峪惨案

本多胜一的《日军在中国》一书中，以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披露了 1941 年 1 月 25 日，日军烧毁整个村庄、屠杀村民 1237 人的潘家峪惨案经过。当时，村民们被赶进一座地主大院后，日军便开始用机枪进行疯狂地扫射……如今村里仍保存着这座被烧毁的建筑。我发现断壁残垣的瓦砾中，一丛丛枯草随风摇曳。另外村里还保留着一处夹道式的建筑。据村民介绍，当时有 200 多个孩子逃到了这里，但他们还是没有躲过日军的追杀……

惨案发生后赶来的八路军拍下了当时的场景，看到照片中那些被烧焦了的孩子们的尸体，真是令人惨不忍睹！

如今不远处的山坡上已修建了一座立有纪念碑的墓地，同时村里还建有阶级教育纪念馆。据介绍，惨案发生后幸存下来的 36 名伤者和当时不在村里的共有 276 人，是他们又承担起了再建村子的任务。此后有 22 人参加了八路军，同时村里还自发成立了复仇团，大人们都是复团的民兵，他们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潘瑞俭

66 岁的潘瑞俭一边带我参观那座地主大院的

遗址，一边介绍起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我12岁，日军扫射前我已躲进了猪圈里的小窝篷。开枪后日军先用苞米叶点着了整个大院，最后又进院查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当一个年轻的日本兵与我的目光相遇时，我想这下全完了。岂知他大声地向长官报告说：‘全死啦！’如今我之所以能活了下来，还多亏了那位年轻的日本兵啊！”他认为日本兵里也有好人。至今，潘瑞俭仍无法忘却双方目光相遇的那一紧张瞬间。

潘家戴庄惨案

滦南县的潘家戴庄有个掩埋1028具死难者尸体的千人坑，它是1942年12月5日日军实施“三光”政策的罪证之一。

82岁的幸存者周树恩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他30岁。12月5日拂晓，约250人的日军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庄。日军将村民赶进地主的大院后，便追问起了八路军的去向。只要有人说不知道，便立即遭到一顿木棒的毒打。问了一圈无结果时，日军当场就杀了3个村民。随后又从人群里拉出16个年轻人，让他们在广场上挖了一个掩埋日军两匹战马的大坑。先在坑底垫上3条棉被，将战马安放后又在上面盖了3条棉被，接着便令人用土掩埋。此后又让这16个人在别处挖了一条长30米、宽2米、深2米的壕沟。挖好后就把村民们赶进沟里活埋了。那16个人干完活后，日本兵喊着“你们也下去”！说着便用刺刀逼着这些人跳下了沟，也给活埋了。随后，日军又将干草扔到沟里放火烧，边烧边来回查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





周树恩与他全身被烧的伤痕

据周树恩讲，他被推进沟后，看到两个日本兵走过来冲着他喊：“这家伙还活着呐！”说着就将点燃的干草和一把铁锹狠狠地扔了过来，他用手挡了一下才没被铁锹砍中。据周讲，他之所能活下来，皆因埋他的地方都是冻土，火烧后冻土溶化，只埋了他的下半身。但后来他的头部又被什么东西击中，便昏死了过去。当他再次苏醒后发现，日军又在前面挖了一个4米见方的大坑，他们把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

妇女们都推到坑里活埋后，再用火烧。孩子们也被日军接二连三地摔到碾子上，脑浆迸裂，连内藏都飞了出来。此外，他还亲眼看到那些被活埋的妇女中就有自己的妻子。

日军撤走后他开始自救。当时下半身及鞋子、裤子都被深深地埋在土里，他就使劲儿地活动身体，最后好不容易才将下半身拔了出来。他连走带爬地行了6.5公里，总算是进了妻子的娘家门。所幸的是，不满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被祖母带走了，这才躲过了当天的一难。不幸的是，儿子无奶水喂养最后也死掉了，而周树恩的手抬不起来，皮肉也发生了溃烂现象，只好整日躺在炕上。直到1943年春，他才能拄着棍慢慢地行走。

当地的八路军司令员李运昌闻讯后，立即派人给他们村送来钱、粮食及衣物，同时还派人帮助村民们种上了地。但李司令员给他们村送来了16匹马大家没敢接受，怕的是又被日军抢走。当年潘家戴庄的人口约1700人，惨案之后至1953年，仍差10人未恢复到原来的人口数。周树恩说完还让我观看了他上身被火烧后留下的伤疤。据他讲当年的幸存者中，现在还活着的仅剩下他一人了。

1956年的沈阳军事法庭上，周树恩对潘家戴庄的惨案做了证言。他指证是铃木启久派出的第一联队的骑兵队制造了血腥屠杀的潘家戴庄惨案。

以上就是日军在长城南侧，即河北一带开展无人区的肃正状况。它的特点是猝不及防，突然袭击，一天内就结束局部的清剿扫荡任务。而所到之处的房屋、人及家畜一个也不留。

长城之北为伪满洲国。日本人在这里对外标榜的是“五族协合、王道乐土”。因此，尽管关东军也采用“三光”政策来制造无人区，但公开屠杀“国民”的政策将受到严格的限制。为此，日本人制造的“民匪分离”式的集团部落（集家并屯）便应运而生。现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伪满洲国内集团部落建设状况列表如下：①

伪满洲国集团部落建设状况

	1935年前	1936年	1937年	合　计	1938年计划
吉林省	760	892	663	2315	78
龙江省	13	910	187	1110	46
黑河省	—	—	7	7	38
三江省	—	60	115	175	215

① 《集体部落之建设状况》，(3)—87—10，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第173页。根据编者的注释，此表是满洲总裁室弘报课《满洲特殊自治制度》的弘报资料，第55号，是1938年10月制成的。合计栏数字有错误，修正的数字放在( )内。

续表

	1935 年前	1936 年	1937 年	合　计	1938 年计划
牡丹江省	—	—	404	404	1018
滨江省	246	971	2167	3384	299
间岛省	70	29	39	138	24
通化省	—	—	103	103	76
安东省	49	134	44	227 (614)	15
奉天省	39	364	211	610	199
锦州省	—	—	23	23	28
热河省	—	—	—	—	38
兴安西省	7	279	511	797	216
兴安南省	345	556	344	1245	165
兴安东省	—	—	—	—	—
兴安北省	—	—	104	104	76
合计	1524 (1529)	4195	4916 (4922)	10 635 (10 636)	2964 (2531)

为配合集团部落的建设,关东国加大了讨伐清剿力度。目标则直指抗日联军。为此,日军还特意发出了悬赏 1 万元缉拿杨靖宇 12 名抗日将领的通缉令。1940 年 2 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山中被通化省的警察部队包围,战斗中英勇牺牲;[①]该联军第三路军总司令赵尚志也于 1942 年 2 月遭特务暗杀身亡。[②]另外,关东军在平定三江省、通化省的同时,又于 1942 年开始集中肃正热河省内的治安。为此,关东军又将通化清剿中的得力者大量派往热河,以协助当地的肃正工作。

从上表中可知,伪满洲国内集团部落建设数量最少的就是热河省。然而热河省内的集团部落却都集中在兴隆县一带。

兴隆县的惨案

无论是对兴隆县还是热河全境,当时的西南防卫司令部都未花费赏金去缉拿

① 野崎茂作口供(1954 年 8 月 14 日),(1)—119—2,41,1,第 4 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 4 集《东北“大讨伐”》第 549 页。

② 田井久二郎笔供(1956 年 6 月 28 日),(1)—119—2,30,1,第 7 号,载于同上书第 464 页。

"匪首",难道说当地就没有八路军吗? 原来从 1938 年起,八路军的宋、邓部队撤出热河后,仅在兴隆一带留下了三支分队,而每支分队的人数也仅为 20—30 人左右。

然而到了 1940 年 7 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将 1939 年成立的冀热察挺进军第 13 支队划归冀东军分区指挥,并同时任命了以该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委李楚离、副司令员包森、参谋长曾克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1] 当时的冀东军分区下设有第 12 团和第 13 团。潘家峪惨案发生后,李运昌的部队在长城南侧向日军展开了攻击。至 1941 年 5 月,该部已由原来的 2800 人扩大到 4169 人。此外民兵游击队也增至 3200 人。

铃木启久少将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团与李运昌指挥的第 13 军分区主力部队是冀东战场上的宿敌。为此双方不断地在遵化、丰润及迁安等地展开激战。1942 年 4 月,为了给承德的日军造成压力,李运昌率领主力部队一举攻克了亮甲台,并在当地建立了十余个抗日根据地;当年 5 月,铃木启久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团向西边的蓟县、兴隆方向进发,以寻求与李运昌的部队进行决战。趁此之机,日军加强了喜峰口一带的防御力量,并在当地建立起了几个日军据点。其实,当时双方的战场就是河北一带。

然而此时的李运昌却率部经王厂沟进入了五指山根据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休整部队,发动群众,准备再度进入河北作战。而李运昌率部在水泉子村为百姓打井抗旱的事迹,就是在此期间内发生的。1943 年,李运昌又率部在承德东北的光头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为此,西南防卫司令部也把光头山一带划成了无人区。

从 1938 年起,八路军就已经在兴隆县的大小黄崖(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一带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同样,日军也自然地将这一带划为了无人区。据"1943 年下半年冀热边区状况报告"[2]中记载:这一带根据地中,有居民 2000 户约 13 000 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不愿意进入"人圈"的百姓,亦称"跑山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民兵。那么此时此地的正规八路军兵力究竟有多少呢? 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兴隆县无人区中的抗日根据地》、[3]《热河史稿》以及《中共抗日部队发展略史》之中都没有任何记载,因为当时的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毫无规律可言。

尽管西南防卫司令部的任务是阻止八路军从五台山东进至伪满洲国境内。但日军并不清楚八路军究竟在何处,因而它也就失去了讨伐作战的真正目标。有时虽然也发现了一点儿八路军的蛛丝马迹,但那也不过是稍纵即逝,根本无法与之展开正面决战。因此西南防卫司令部的独立守备队,也只能将决战目标放在了河北一带的战场上。而在兴隆县内,由于当地百姓积极地为八路军提供粮食、军鞋等补

① 张廷贵、袁伟、陈浩良:《中国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8 页。

② 见姜宇:《1943 年下半年冀热辽情况报告》,载于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编:《冀热辽简报》第 15 期。

③ 指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编:《兴隆县"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1985 年。

给物资,所以日军便以"私通八路"为名,大量抓捕当地百姓,并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的扫荡。

我认为兴隆的悲剧就在于:一、因日军找不到八路军的踪迹,便倾其当地的2万兵力来全面镇压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二、因兴隆的日军无法像河北平原那样用骑兵去突袭村庄后,再就地实施"三光"政策,所以他们便采用各种更加卑劣的手段来残酷镇压山区中的百姓。

当地日军最惯用的手段就是检举和讨伐,即把从无人区里抓到的农民带到"人圈"后,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斩首或对其施以各种酷刑。日军的杀人及酷刑可谓名目繁多、残忍至极。其中有:1. 断食空腹(饿死);2. 倒栽莲花(将人头朝下活埋);3. 军犬扑咬;4. 滚绣球(令赤身裸体的活人蜷缩着进入布满钉子的笼中,然后再滚动笼子);5. 电击人体(电休克);6. 枪刺沙袋(将活人放入袋子中,供新兵训练刺杀);7. 虾公见龙王(将活人头脚捆到一块扔进池塘或河里);8. 开膛取心(将活人的心脏取出食用);9. 钢针绣骨(把钢针钉入人的手指尖或头顶部,钢针长度为20—30公分);10. 辣水涨肚(从鼻孔灌入辣椒水后,再用军靴踩蹭受刑人已膨胀的腹部)。此外还有"熏烧活人"等等,不胜枚举。①

我在采访中还听到过日军吃人心脏的事,但对此总是将信将疑。恰好在我查阅资料时,终于发现了一份日军吃人器官的供词。供述人是林竹次,曾在奉天省警察厅特务科任职。据他讲,某日,守备队长宫尾在兴京县公署的后山逮捕了15名中国人,随后便以"通匪"的罪名将他们全部处死。当时,林竹次和在场的阿部三郎警长一起剖开了其中的五具尸体后取出了胆囊。

检察官问;取人的胆囊做什么用?

林竹次答:日本人相信胆囊能治肺病,所以大家都想搞到手。因此和阿部警长商量后,我们就干了。②

这就是林竹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检察官交待的供词。尽管我还没有找到吃活人心脏的证据,但仅凭上述的供词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把日军称做日本鬼子了。

那些不处死刑的人,有的被强制送到东北去做苦役;另一些不顺眼的则按"特运处理"方式被押解到七三一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人被送到承德去充当活体解剖实验的材料。至于强奸妇女之事则更是家常便饭,不胜枚举。

对于那些已被赶进"人圈"的农民们,日军又以"细菌试验"等秘密手段,让他们患上传染病后大量地死去。其死因则可以说成是中国人不卫生所致。此外,每天农民们进出"人圈"都要受到军警的监视,而且每人都必须随身携带按有本人指

---

① 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3页。

② 见林竹次口供(1954年6月9日),(1)—119—2,704,1,第3号,载于《伪满宪警统治》第490页。

纹的居住证以备检查。由此一来,非本地居民根本无法生活,他们的下场只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

日军对兴隆县百姓的残酷虐待行为,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的战败,才算最后结束。

以前兴隆县不属于热河省管辖,只是后来日军划定国境线时,才将其强制纳入到伪满洲国的版图之中。由此我认为,兴隆悲剧的起因或许就是那条西南国境线吧。虽然其他县里也有国境线,但与之不同的是,兴隆县的周围有41座1000米以上的高山,况且这里又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偏远之地。如此良好的地理环境,正是日军进行各种军事、政治等试验的理想场所。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敢随心所欲地在兴隆进行各种试验,其中就包括细菌、毒气、气球炸弹等生化武器。总之,凡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敢公开的试验项目,全都拿到兴隆来了。

铃木元之的证言中也引述了其堂兄林铁雄讲过的一句话——"其实,西南国境线一带本来就是日军频繁进行细菌战及其他项目的理想试验基地。"①

由此可知,兴隆的悲剧还表明,在日中全面战争期间,凡是兴隆所试验的结果都被日军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其他战场上了。

人性破坏

西南防卫司令部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把丧失人性始终贯穿在新兵的训练之中,以此来组成一支支魔鬼部队。据《我们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中记载:

"铁拳制裁训练"并非上策,所以教官们便不断地用殴打、脚踢、掌嘴等方式来对新兵进行"自尊心制裁"。教官们故意用皮制拖鞋的底部去抽打他们,给他们的脸上留下鞋印,目的就是让新兵脸上的那种自尊和自信表情永远消失。

"新兵们都有父母。当他们降临到世间后,父母们也都倾心培养教育他们具有人性和人爱之心。但魔鬼训练营就宛如一架巨大的搅拌机,一切人性和人爱之心都统统地在这里被搅得粉碎。剩下的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躯体。当他们用刺刀杀死了绑在柱子上或者是装入口袋里的活人后,新兵们的训练科目便就此结束"。②

新兵们自然不会甘心忍受这种最底层的压迫生活。一年训练后,这些已丧失了人性的士兵们便会通过压抑转移法,去面对所有的人。这就是日军保持军人心理平衡的一种魔鬼训练方式。

承德市档案局的王克君局长让我查阅了该局保存的一些日伪时期的历史资料。他说:"重要资料都送到北京的中央档案馆去了。这里现存的主要是人员花名

---

① 引自铃木元之告发安达诚太郎的资料(1953年9月26日),(1)—119—2,235,2,第21号,载于《人体试验》第250页。

② 引自(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第166页。

册之类的东西,所以可能对你用处不大。"我查阅后确认,这是一些有关热河及兴隆日军的人员配置和宪兵名册的基本资料。此外资料中还夹杂着几份用日语写成的命令文件。其中清晰可辨的是,上面特意注明:"誓死不许动摇"等字迹。这反过来则证明,当年伪满洲国军中就曾发生过动摇之事。此时此刻我才理解了,当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打出的悲壮救国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真正含义。

对于这100余册的合订本,我也只能是走马观花地翻阅一下而已。不过,我发现后面大部分是特务名册。由此可知,日军当年已在热河省建立了庞大的特务体系。这些以出卖情报为生的中国败类在各级各界乃至各村都有。为了表示忠诚,这些人不惜向日军出卖自己的同胞,甚至有人还提供出了妇女的名单。但日本投降后,这些特务汉奸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不义之战

可以说,我在调查兴隆惨案的过程中就已明确感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确实是一场非正义之战。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所表现的也只有是颓废、残忍及丧失人性。那么有谁愿意将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恋人及朋友送上这种非正义战争之路呢? 又有谁愿意去屠杀那些异国他乡的无辜百姓呢? 此外,那些为不义之战而死去的人果真就获得名誉了吗? 他们死得其所吗? 正因为他们死得毫无价值,所以活着的人们才想方设法地去弄清当年那场战争的真相。当然也有人会认为,死者至少是为国家献身的。然而,如果人们知道当年那场战争,完全是因为国家与军队的疯狂行为而引发的不义之战的话,那么人们必定会大声疾呼:"还我父亲! 还我丈夫! ……"

那么他们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其实靖国神社就是一个蒙骗白白送死者的场所。如果那里的亡灵有知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咬牙切齿地对此进行诅咒。我想,那些死无价值的亡灵们惟一能发出的警告就是:"抚慰我们灵魂的最好方法,首先是承认我们的死毫无价值,同时切勿再让年青一代为无益的国家权力去充当炮灰吧!"我认为,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躯体,理应得到这种呼吁和平的发言权。尤其是在战后50周年的这个夏季,日本人更有义务去倾听亡者的这一忠告。

兴隆县的老人们一见到我就说:"你是相隔50年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日本人。"我向他们表示道歉,并说是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使你们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对此,他们则回答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过,我这个日本人的道歉却令他们感到欣慰,同时他们也敞开了心扉,向我诉说起了当年的痛苦经历。

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幸存者。至今,他们仍能屈指数出那些死难者的名字。而他们自己却是靠相互抚平伤口生活下来的。他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些日本鬼子的名字、面孔及声音的。对这些幸存者而言,那种痛苦的经历已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中,并将终生难忘。而如今我们能做到的,则是调查和验证那些历史事实,让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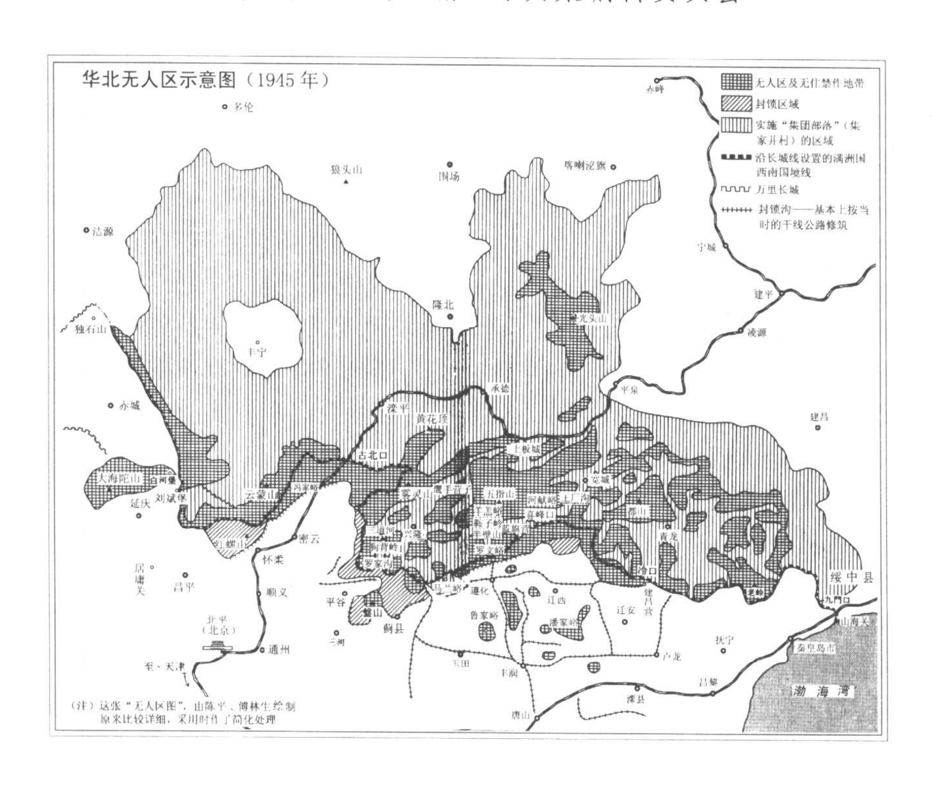
多的人铭刻在心。与当年那些持枪荷弹,未经允许便肆意闯入别人家园的日本人相比,如今的日本人则是为建立新的友谊而来。为此我衷心地希望,这份兴隆惨案的调查报告或许能为今后的日中友好尽上一份绵薄之力吧。

无论是兴隆县的老人还是年轻人,他们的目光都是那样纯朴清澈。尽管目前他们仍很贫困,但人们却都昂首挺胸地生活着。这就是当年抗日根据地的那种不屈不挠精神,而它将永远生生不息地相传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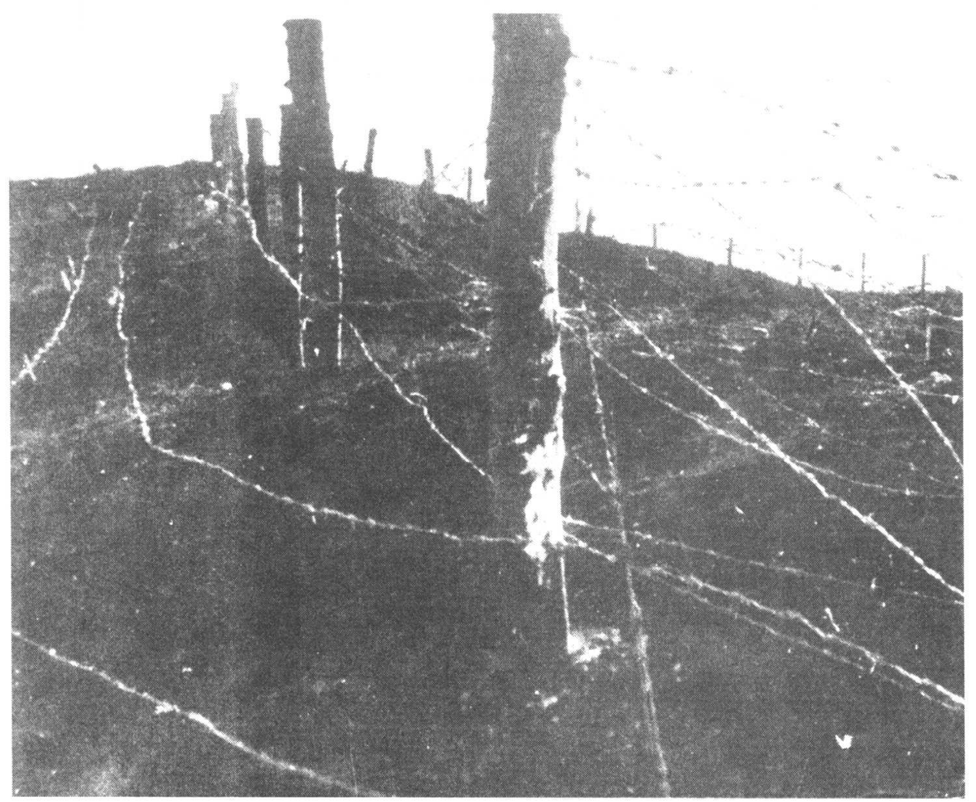
邓一民　主编校
石德璋　校译
王建中　吴云　译

日本军侵略中国实录(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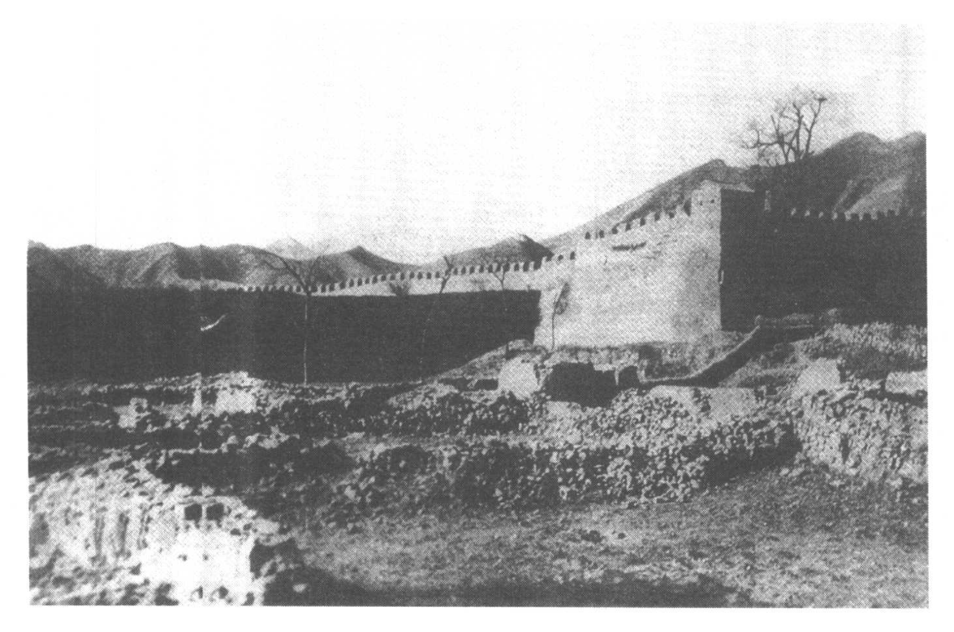
(日)“中国和平之旅”写真集编辑委员会







严密警戒与监视:上图为碉堡,下图为铁丝网。



这是日军在热河制造的"无人区"。将农民全部迁出,周围围起高高的围墙。

"无人区" 当年在沿万里长城,即"伪满洲国国境线"一带,有许多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这些抗日游击队不但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而且有的农民还自带武器参加了抗日队伍。日军为了切断当地老百姓与抗日游击队的接触,以防这里成为抗日后方阵地,于是就强制农民集中到"集团部落"里,即中国人称的"人圈"。村民搬走后的地方就划定为"无人区"。

这个"无人区"东起山海关西至独石口,东西长约 1000 公里,面积有 5 万平方公里。

一、"三光作战"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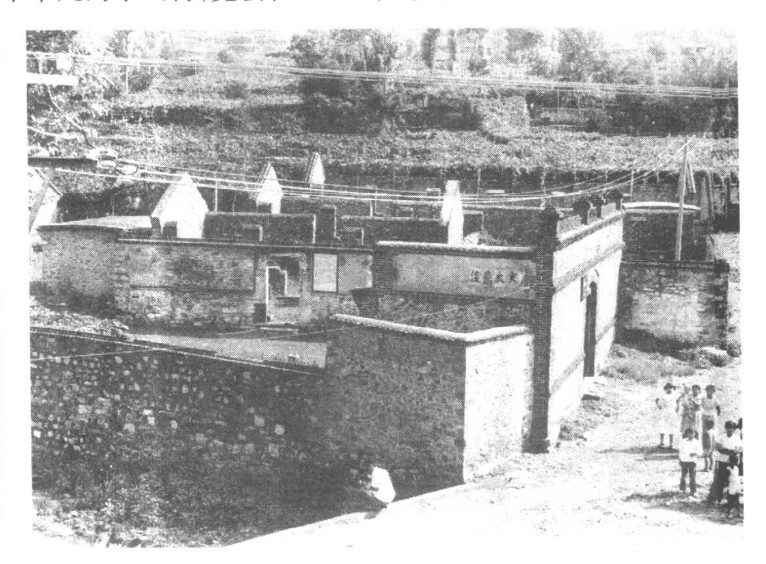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

8 月 9 日我们考察团行程的第三天,上午 7 点半,大家分乘两辆大巴士离开北京的驻地,向唐山市进发了。虽说是在清早,却感到闷热。天空上笼罩着晨雾,能见度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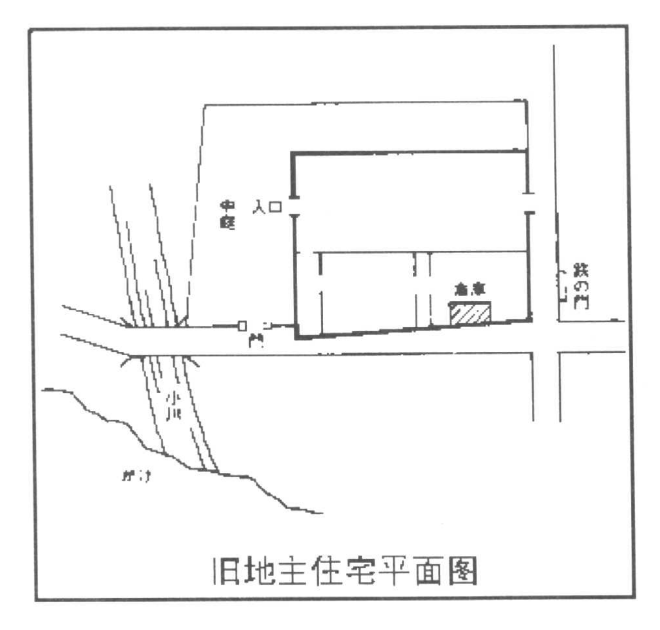
巴士开出不久,导游孙盛东先生以严肃认真的口吻说:"各位朋友注意啦!有一件事情拜托大家,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是不准外国人进入的地区,这次是经特批才准许我们去的。请大家把相机关好,绝对不要拍照。"这时我们才看到前面不远处,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辆公安局的前导车。顿时,拿着相机想拍照中国风景的团员们感到有些失望和紧张。

公路两旁是连绵不断的玉米地，道路崎岖不平，巴士在环绕群山间的公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潘家峪村。

在农家的小院里，葡萄架上结满了果实，好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谁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小山村，竟会在 1941 年遭到日军"三光作战"的摧残。



这是对村民进行大屠杀时地主住宅的遗址（这不是战争当时的原样，战后已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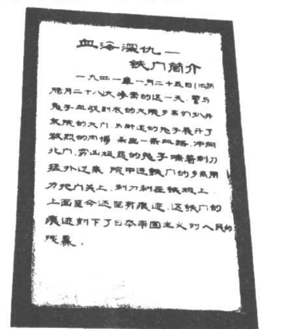
发生大屠杀时地主居宅的进口

张凤云先生的证言(1927 年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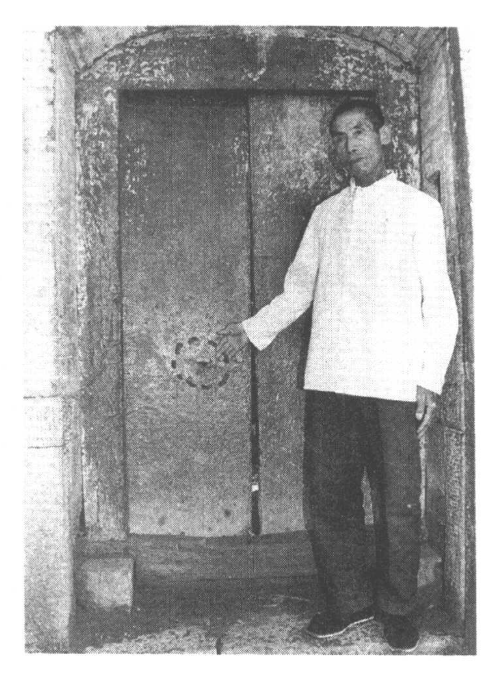
血海深仇(鉄門概要)

1941年 1 月25日(旧暦12月28日)、大惨事があったその日、大院にいた村人たちは、徹底的に鬼子(注:日本兵)と戦うことを固く誓ってから、東院の大門を開き、街頭にいた鬼子と激戦を展開したのである。それから、街路は血に染められた。

銃剣を胸に抱え、正気を失った鬼子が北門に向かって突撃してきた時、村人たちが必死に門を閉じたその瞬間、銃剣が鉄門に突き刺さったのである。その痕跡は、日本帝国主義が中国人民に対して行った残虐さの証として、今も生々しく鉄門に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血海深仇——
铁门简介



日本兵追杀村民时用刺刀刺在门扇上的遗痕——用手指的人就是张凤云

迎接考察团的是幸存者张凤云先生,现年 64 岁。当年他家共有 11 口人,被日军杀害的有 7 口,其中包括他的祖父母、兄、弟、妹妹等。现在他和妻子及四儿子一起过日子。

据张先生介绍,1941 年 1 月 24 日深夜,日军突然包围了潘家峪村,天还未亮时,就把村民们赶到村旁的一处池塘里集中起来。因为是冬天,池水已经结了很厚的冰,人再多也掉不下去。这时,日军便向村民审问起了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因审问无结果,日军一怒之下,从人群中拽出几个人立即就枪杀了他们。

此后,日军又将村民驱赶到位于村中央的地主大院里,先把已准备好的干草、松枝等易燃品倒上汽油点燃。随后,站在院墙上的日本兵一齐向院内射击,大部分村民无处可逃当场牺牲。只有少部分村民从大院里冲出去,和日军展开了搏斗,最后也都被日军枪杀或刺死,院里院外村民的血流成了河。

天刚亮,日军再次开始扫荡村庄,这次敌人抓了约 30 名老人和孩子,带到离地主家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用刺刀挑死后,把全部尸体扔下山坡。当天,牺牲的村民人数竟高达 1230 人!

因张先生当时只有 13 岁,正好倒在被杀的村民身体下面才幸免于难。其他幸



向访华团介绍大屠杀情况的张凤云先生



29 人借助逃生的粮仓

存者中，有的是从被手榴弹炸开墙的豁口中逃生的；另有 29 人则是躲在未被点燃的粮食仓里，才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包括他们在内，此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共有百人左右。当时这座地主家院落已被烧得残垣断壁，面目全非。而现在的房屋和院落是后来重建的。惨案已经过去 50 年了，在此期间，也曾有几个日本团体到这里考察过，因张先生是幸存者之一，且又口齿清晰，故每次都由他担任讲解。他说：

“死者中还包括30名儿童和35名怀孕的妇女，在村内全家被害的有33户。就在日军撤离的当晚，八路军便赶到了这里。请看，纪念馆里挂着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下来的。”随后张先生又接着说：“我们坚决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但对来自遥远的日本朋友能前来考察则表示衷心的感谢。”



远远地围着在看访华团的当地人

这些日本教师听了张先生热情而又意味深长的解说，顿时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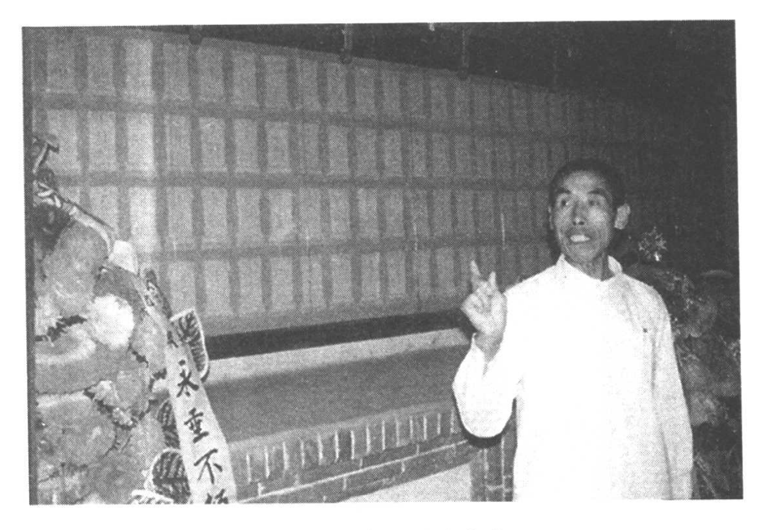
张先生现场解说之后，又领我们参观了设在村口处的祭祀牺牲者的祠堂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那里的所见所闻，再次证实了张先生刚才讲解的内容。

纸制牌位

祠堂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都在“潘家峪革命纪念馆”的同一处宅院里。步入正门二三十米的地方是祠堂，进入室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小字的纸制的“牌位”。“这里记录的都是被害者及其家属的名字，”张先生介绍说。这是一座进深5米、宽20米左右的长方形庙宇，正前面的墙壁上镶着玻璃框，里面贴着牌位。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女儿云头5岁，女儿石头7岁，女儿百头10岁，儿秀弟16岁，儿秀志20岁，潘印元50岁，妻刘氏51岁等人的名字。从年龄上推测可知，这是从双亲到5个孩子共计7口人全部被害的一家。据介绍，全村中像这种全家遭灭绝的共有33户。当团员们沿着墙壁转着观看牌位上的那些死难者的名字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唉！太残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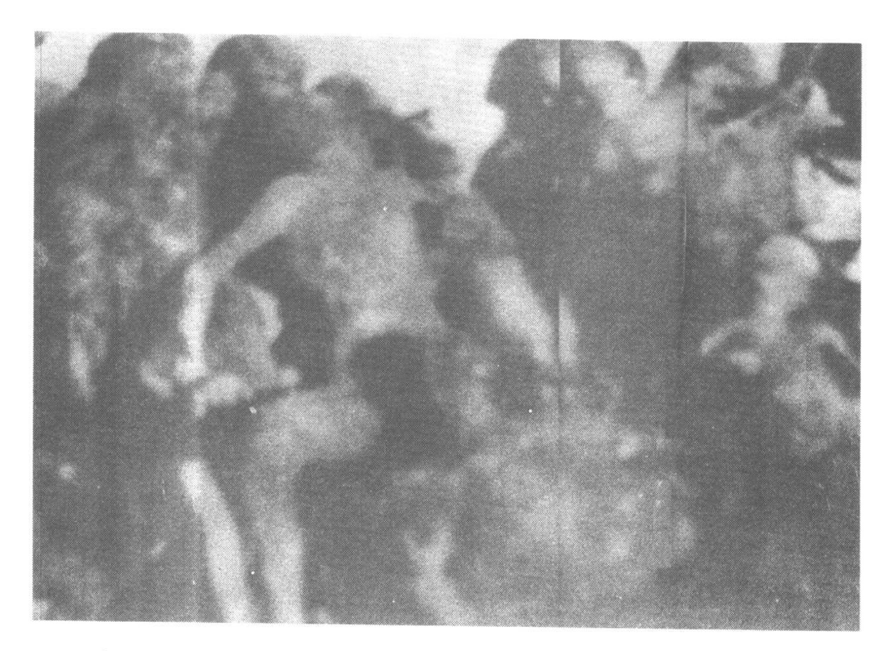
供着牺牲者的祠堂



在祠堂内解说的张先生

照片作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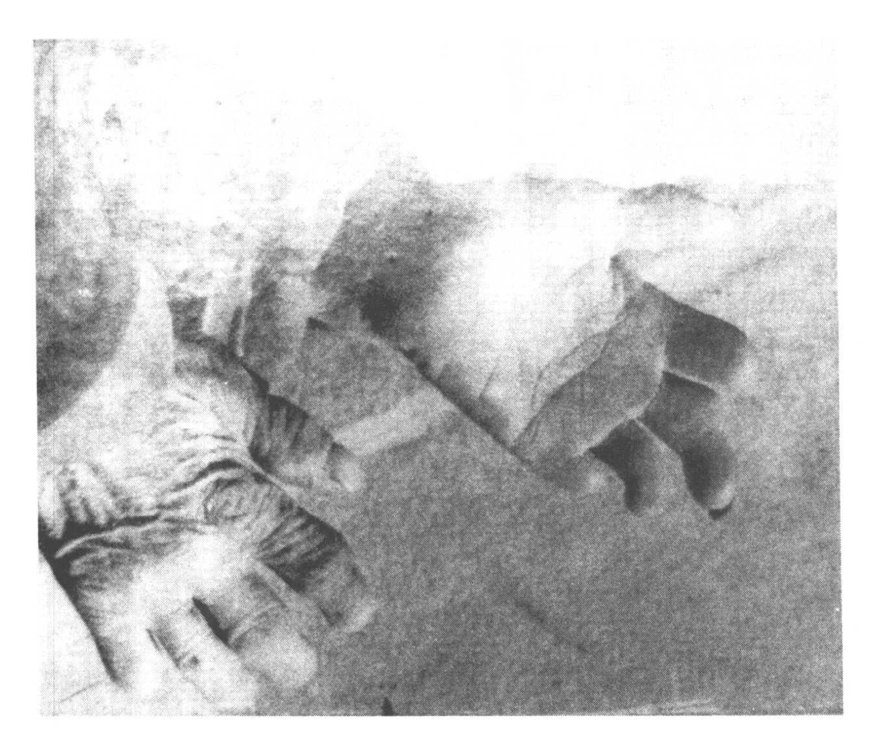
大家献花、默哀后又走进了旁边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在这里大家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刚才幸存者张先生所诉说的内容,都通过照片又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成摞的烧焦了的牺牲者的尸体(阶级教育展览馆里陈列,拍照的不清楚。)



烧焦了的尸体(阶级教育展览馆)



在大屠杀现场逃生的村民及其被烧断的手指



这是被砍了头的牺牲者

正如张先生所介绍过的那样,照片中的地点确实就是那座当年的地主宅院。陈列的照片分别记录着被烧毁的房子,烧焦的尸体摞成了堆,一位经过救助奇迹般生还的幸存者伸出他那已失去指头的双手,以及残留着大块伤疤的头像等等。其中还有一张记录的是,几位村民正在尸体堆中辨认自己的亲人,而一位少年却站在那里茫然若失……看到这些惨不忍睹的场面,大家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些都是惨案发生后,急忙赶来的八路军摄影班拍下的镜头。

馆内的简介列出了此次惨案的下列一组数据:

时间:1941 年 1 月 24 日。

户数:(屠杀前)241 户。

人口:(屠杀前)1537 人。

被杀害人数:1230 人(占总人口的 80%)。

全家灭绝户:33 户(占总户数的 13.7%)。

(据唐山市党史部门调查,此次惨案制造者为驻丰润县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指挥的日伪军千余人,除集体杀害 1230 人以外,还烧毁房屋 1100 多间,抢走全村的粮食和衣物——主编校。)

从 1937 年发生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便趁势占领了冀东一带,其后又多次对潘家峪进行扫荡,但每次都遇到反击而败北。因此,大屠杀就在那里发生了。



在大屠杀现场,把亲骨肉的遗体指给孩子们看。

位于唐山市的北部,有一条山沟,其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低矮山脉,走到沟的尽头有个小山村,这就是潘家峪。日军为了长期占领这个地方,在山顶上筑起两座炮楼。据导游夏晓南先生(东大留学生,和平之旅的随行翻译)介绍,至今山顶上仍保留着炮楼的残迹。

那么,日军为何非要血洗潘家峪呢?归根到底就是侵华日军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又军民不分、敌我不清的中国大陆深感举足无措,宛如陷入了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便采取"三光"政策来达到其战争的目的。虽说这也彻底暴露了其侵略战争的弱点,但中国人民也毕竟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团员们冒着酷暑进行了连续访察,

为了访问下一站，大家又乘车踏上了去潘家戴庄的旅途。

河北省滦南县潘家戴庄

考察团从潘家峪返回唐山市的驻地，用过午餐并稍事休息后，又奔赴距离唐山约50公里的潘家戴庄。这里是战后日本人首次到过的地方。公路两旁是排列整齐且又延续不断的白杨树，两边的玉米地一望无际，而且很多苞米也已抽穗。



向纪念馆敬献花圈的永井团长（左）和林副团长（右）

大巴士离开了铺设平整的公路后又进入了乡间小道，很快就驶进了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的农舍都是砖瓦房，而且排列有序，完全是典型的中国农村景象。

两辆巴士停在由白杨树围起来的纪念公园旁边，蝉在白杨树上鸣叫，声音清新而流畅，震动耳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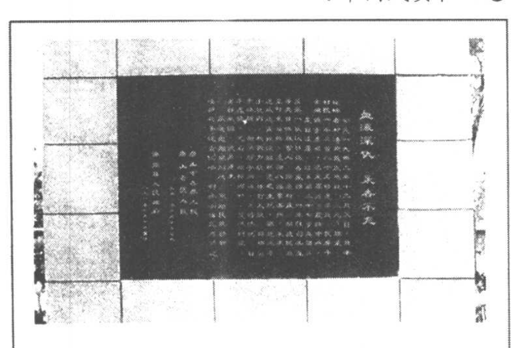
村长周德知、幸存者周树恩先生（79岁）和李庆有先生等有关人士已在这里迎接考察团。看到考察团进村后，村民们便络绎不绝地围拢了过来，从老到幼约有数百人之多。

1942年数百名日本兵包围了这个村庄，将村民集中起来杀害，埋在一个大坑里，被杀害的村民有1280人。1956年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有这方面的详细审判记录。

公园面积有3500平方米，长50米，宽70米左右。中央建有死难者纪念塔，塔后有一个长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750人左右的受害者。右侧有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有350名受害者。左侧是一处遗骨墓，埋着战后挖掘出来的受害者遗骨。



访华团成员在纪念碑前默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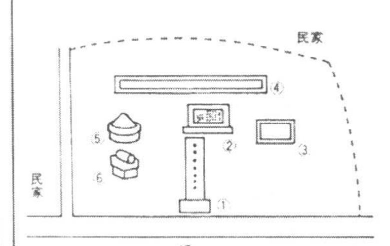


血海深仇　永世不忘

1942年12月5日、日本侵略者は潘家戴庄に対し三光政策を行い、村民1280人が惨殺され、民家1000軒余が焼かれた。

その日の未明、日本軍の第27歩兵第一連隊の数百人が村を包囲し、村民を、村の東にある広場に追い集めた。それから、日本軍は穴を掘ってから、次々と村民を銃剣で突き刺したり、妊婦の腹を切り開いたり、生きた人の頭をたたき割って殺しては、その穴に投げ捨てた。人間とは思えないような残虐行為を繰り返したのである。そして、金目になるような物を奪ってから、火をつけ村を焼き尽くした。（*1956年の瀋陽における日本軍戦犯を裁いた裁判記録では、事件が起きた日時は「1942年10月28日」となっている。食い違いの理由は不詳）

潘家戴庄の見取図



①記念碑「血海深仇、永世不忘」と書かれている
②当時の概要説明
③530人が生き埋めにされた溝（大きさは長さ6m、幅3m、深さ2m）
④750人が生き埋めにされた溝（大きさは長さ30m、幅2～3m、深さ2m）
⑤戦後、掘り起こされた遺骨の一部が埋められた墓
⑥赤ちゃんや子どもを打ちつけて殺した石の農具

周树恩先生的证言(1911 年生人)



向访华团介绍情况的周树恩先生

考察团首先向纪念塔敬献了花圈并致哀。当年 31 岁的周树恩先生,在被日军打得奄奄一息后,却又奇迹般的生还了。他说,现在脊背上仍残留着疤痕。现将其证言归纳如下:

那是 1942 年的 12 月 5 日,天还没亮,也就是四五点钟左右,日军从距离 15 公里和 30 公里以外的两处驻地包围过来,目的就是搜捕八路军。但此时的八路军早已撤退了。

日军问村民:“八路军上哪去了?”村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日军便对村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又是枪杀,又是活埋。等到把男人杀光后,又把妇女们用绳索捆起来和小孩子一起活埋了。光是从母亲怀抱里夺走活活摔死的就有 30 个孩子。

一个日本鬼子问我:“八路军去哪里啦?”我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用棍棒打,连追带打掉到大沟里,我便失去了知觉。日本鬼子走后我才发现后背被打烂了,伤愈后结成大片疤痕。周先生说着就脱下上衣,让大家看了伤疤。从右边的肩胛骨到侧腹,瘢痕累累。因为周先生说话的语气看上去很平淡,团员们的心境也就像听故事似的,但一看到这位老人身上的大片伤疤时,大家立刻惊呆了。有几位女教师虽极力控制着感情,但还是两眼通红。团员们觉得在战争时期恐怕无法得到像样的治疗吧!夏晓南翻译说:“他右胳膊向上举不起来。”趁周先生一动不动地向人们展示伤痕时,团员们纷纷按下了手中照相机的快门。此后,不知谁说了一句

“好啦,就到这里吧”,大家方才作罢。

现将李庆有和周树恩的证言中的一组数据统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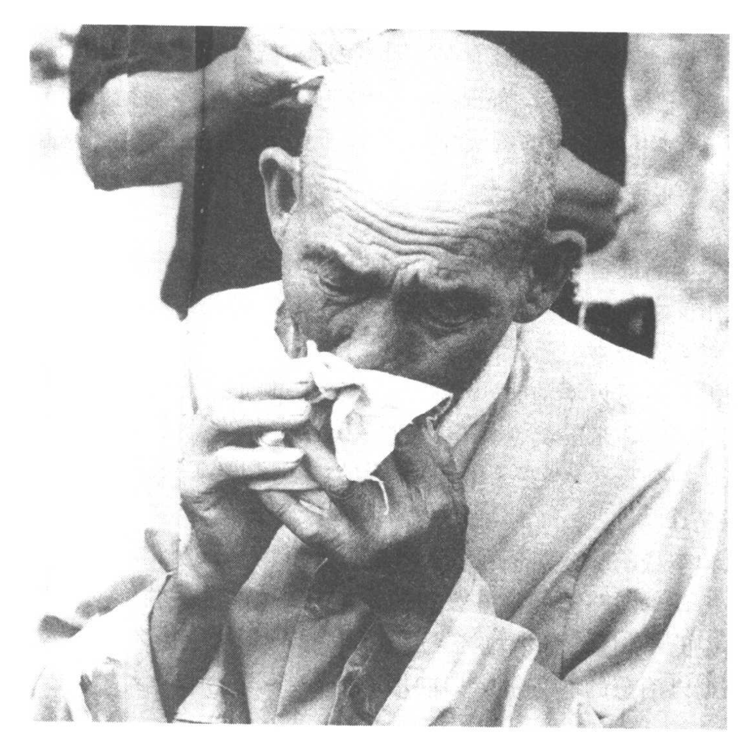
时间:1942 年 12 月 5 日(审判战犯记录上是“12 月 28 日”)。



周先生脱掉上衣让大家看他身上的疤痕



为迎接访华团参观考察而聚集起来的村民



想起当年悲惨情况而伤心的周先生

人口:(当时)1765人。

户数:(当时)375户。

牺牲者:1280人(占人口总数的75%)。

幸存者:503人(包括受伤者)。

全家被害:27户。

寡妇人家:25户。

(据唐山市党史部门调查,此惨案发生在12月5日,当时有30名婴儿被摔死,60名孕妇被剖腹,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烧毁房屋1030间。死难者占总人口数应为72.5%。制造此次惨案的日军为第二十七步兵团骑兵队长铃木信——主编校。)

来犯的日本兵200人至300人。

现在村里约有1600人,尚未恢复到当年的人数。

随后周树恩又讲了他家被害的情况:当时他全家共12口人,其中父亲、弟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被杀害了6口……这时,团员中有人问:“请把这6口人详细说说。”稍待片刻后,周先生说:“实际上我的妻子也……”“那么现在家里的女人是……”又有人叮问。周先生一时语塞。夏翻译说:“听说他的前妻也是那次被害

的，现在的老伴是后妻，两个人在亲戚的帮忙下生活着。"

周树恩1956年在东北沈阳市审判日本战犯时曾出庭做过证人，为追究铃木启久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团团长）的战争责任做了证言（摄影编辑委员会在回国后作了调查，验证当时审判记录的胶卷中收录有周先生脊背上伤疤的照相底片和证言的记录）。

李庆有先生的证言（1916年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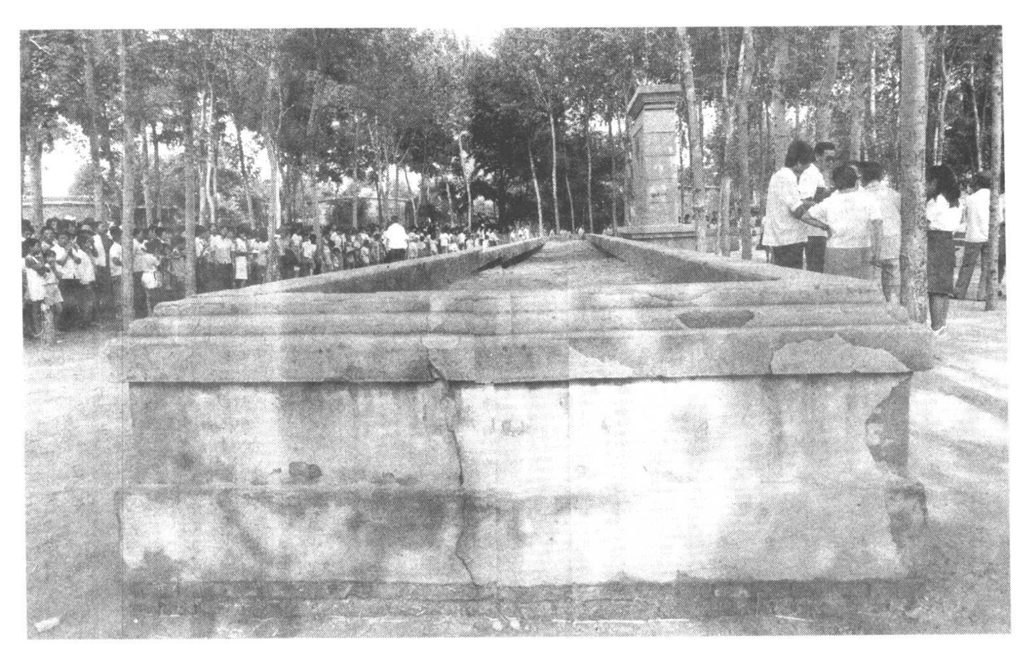
周树恩作证之后，接着李庆有又做了证言。李庆有当时全家6口人，父亲、母亲、妹妹、弟弟4人被害。所谈内容大致如下。

我被枪击打后意识不清，意识清醒后便乘隙逃脱了。当时，日军挖了个长30米、宽2至3米、深2米的坑，将750人埋在里面，有的是活埋的，有的是被杀害后埋的。此外在一个长6米、宽3米、深2米的坑里又埋掉530人。最后又把挖坑的20多人也杀害了。

周树恩和李庆有做完证言后，边带我们参观陵墓，边解释说："为了信守和平，我们一直是把日本侵略军和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这也是我们对到中国来访问的日本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最后我们问："对我们日本人有什么想法？""心灵上的创伤是一生也难以治愈的。"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在千人坑前做解说的李先生（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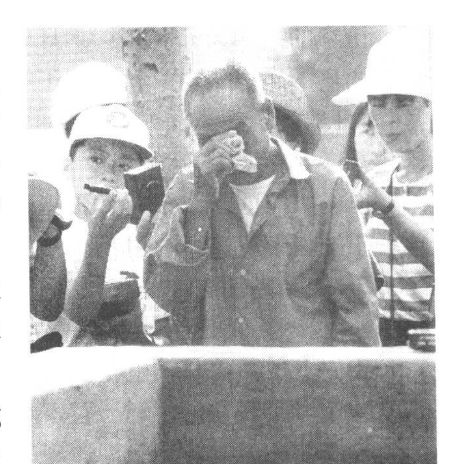


埋掉750人的千人坑

我们在当地仅呆了两个小时左右。期间有数百位村民来到公墓周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察团的举动,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都面带善意。但是,这里边恐怕就有许多人的亲骨肉是在当年被杀害的吧！此时团员们的心情异常复杂。

团员们视察终了,乘车离去的时候,在“再见”的声浪中,当地村民张张脸上微笑着,挥手送走了我们。

“反过来说,如果被加害者是日本人,那么,我们对加害国的人能表现得如此友好吗?”考察团带着这一想法离开了村子。



在妹妹被埋在千人坑前
流泪的李先生。



战后挖出遗骨的埋葬墓

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

访华的第四天,即8月10日早8时许,我们分乘两辆大巴士离开了已在这里投宿两夜的唐山宾馆。整个上午参观了唐山地震纪念馆,那里展现的是1976年7月28日地震瞬间遭受毁灭的唐山市的当时场景。午后,一行人奔赴唐山市北面的遵化县。

巴士长时间地在公路上奔驰,路两边是排列整齐的白杨树和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手扶拖拉机、农用四轮拖拉机、自行车交错而过。公路两旁卖西瓜、蔬菜、服装,以及卖猪肉的个体商店鳞次栉比,到处充满了商业活力。这种景象在中国农村几乎比比皆是,并不新鲜。

我们考察团的两辆巴士灵巧地避开车流急速向前奔跑着,估计在公路上超车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吧。且不说城市里,就是在农村、山区的小路上,也很少见到司机们慢慢地行驶。每当遇到超车情景时,团员们都不时发出惊叫声,而司机则若无其事地握住方向盘,继续急速行进。"要是慢行可到不了目的地哟!"司机如是说。这也许就是中国大陆驾驶员们的理论吧!庆幸的是,我们就是在这种高速行驶中,平安地来到了万里长城脚下的城镇——遵化县。到达遵化县的时间已是午后6点,正值夕阳西下时分。

一行人住宿在遵化饭店。当晚,中华全国总工会当地的分会设宴欢迎我们。之后又听取了来自离县城40公里以外鲁家峪张俊金先生(67岁)的证言,此外历史学者陆占山先生还给我们介绍了当时鲁家峪周边一带的军事部署状况。这时已

到晚上9点钟，张先生又介绍了一些当年日军如何把藏在山洞里的村民带到村里，有的给推进井里，有的被杀头，共计有527人被杀害的情况。张先生本人也被推进井内，虽然背部中弹，但此后却奇迹般生还了。

历史学者陆占山先生的证言

鲁家峪位于丰润县、遵化县和玉田县的交界处。从1940年起这里就是八路军三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此外还设有八路军的兵工厂和报社。

鲁家峪是由若干个自然村组成的，周围有大小18座山谷，地形复杂。山上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山洞，有的洞竟能容纳200人左右。从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以“强化治安”为名，反复五次在此屠杀和放火烧山，其中两次规模庞大，把村子前后烧了三遍，屠杀村民527人。

1942年3月，日军发现了村民逃亡藏身的大山洞，便企图用炸药爆破，但因岩石坚固无法完成。其后日军又采用了往洞内投放毒气的办法，使得洞内村民牺牲者众多。尽管如此，日军却始终未敢进入洞内。此后人们就把这个山洞叫做“烈士洞”。另外，其他山洞里也有不少死难者。

后来了解到告密者叫马成全，此人已在1955年受到了法律制裁。

毒气弹呈手电筒形状，可以使人窒息死亡。当年审判战犯时，它已被作为证物提交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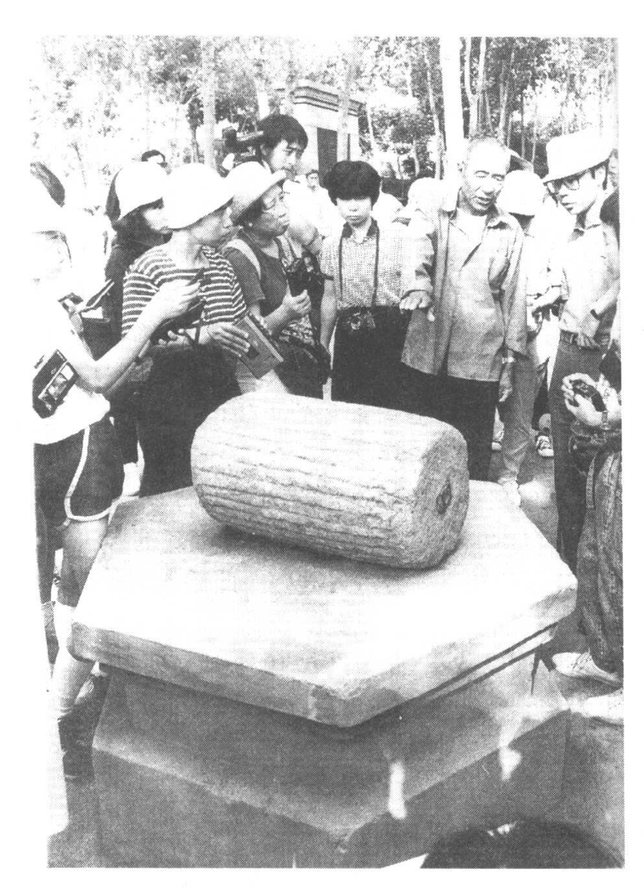
张俊金先生的证言(1924年出生)

那是1942年旧历三月三日，头几天就收到敌情报告，说“日军要来了”，我和其他村民一起往山洞里跑去。头一年也就是1941年的旧历正月十九日，因为已有220人被害，所以这次有3000多村民都纷纷逃往村外和山洞里去了。

逃往山洞的这些人，被日军发现后又抓回村子里。其中李有章已被打得像血人一般，他躲进屋里又被敌人打了一气。于是他拿起菜刀向一个殴打他的日本兵砍去，接着就逃跑了，岂知刚跑出不远就被枪杀了。此事是后来听说的，时间可能是上午10点左右。

到了午后，日军把包括我在内的六十三四人关进一个屋子里。这时来了一个姓金的翻译，他说有个姓李的把日本兵砍了，他是土八路，你们作为赎罪，到离这里20公里的地方种地去吧。说着就带走了24个人，其中有七八岁的孩子，还有老人。在离关我们的房屋约2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10米深的水井，那些人就在那里被杀后，被投入水井里。第二天张永存来说：“昨天，24个人全被杀害了。”

剩下我们这些人，又被敌人用绳子绑着带到离村子二三公里的地方，让我们围成圆圈坐下来。日本兵一边用刀指点着，一边“这个、那个”的一连叫出10个人来。在离这里约百米远处有一口深8米、直径70厘米的藏薯井。张永存的儿子(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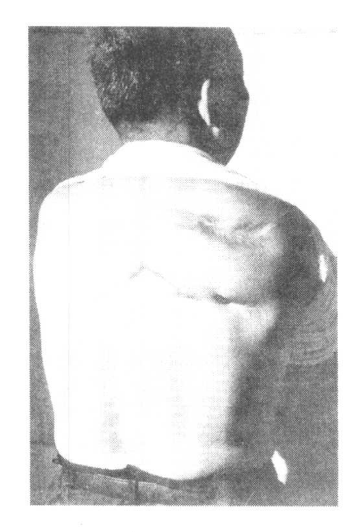


摔死婴儿和儿童的石头农具(石碾)

岁)被第一个割断绳子拽出来,敌人先蒙上他的眼睛,又把刀拔出向装满水的水桶里蘸了蘸,然后,一刀就将他的头砍掉了。接着轮到我了,眼睛也被蒙上,但蒙的布又脱落下来,此时我觉得大事不妙!就抽身逃跑了。可是马上又被抓了回来,这次被绑得结结实实。两个日本兵怕我的血溅到他们身上,就把我的脖领子往里塞了一下,我就势咬住他的手,死死地不撒嘴。这时另一日本兵抓住我的肩膀猛往井里推,我头朝下掉进井里,结果把舌头咬了,他们就在井上开枪打我,我脊背上挨了两枪。之后,又有9个被砍头的人掉下来,都摞在我身上。我就忍着疼痛咬住自己的手指不出声。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听到上边有声音,我就拼着命地喊:"救救我吧!"这时,大约有十来个村民把我拽了上来,此后才知道,活着的仅我一人。当时我家有父亲、母亲、弟弟4口人,母亲也被推到别处的井里,后来被救活,但她身上也留下大块的伤疤。

对张先生来说,事情已经过去50年了,但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却使他终生难忘。整整两个小时的诉说中,他无法控制悲愤的心情,不断举起双手挥舞着,最后干脆

又脱去衬衫让大家看脊背上的两处伤疤。其形状简直就像用铁锹挖了两条沟似的，又宽又深。



让看背部疤痕的张俊金先生



在法庭上做证言的鲁家峪张俊金先生

团员们聚精会神地探着身子听张先生的诉说，有照相的，有记录的，也有录音的，大家都在认真地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谈话结束时已是夜晚 11 点了。

二、一座有“万人坑”的城市

河北省承德市

我们考察团来华的第五天，即 11 日早上 7 点半用过早餐后，大家又分乘两辆大巴士离开遵化，向下一个访问地承德市进发了，全程需要 5 个多小时。车子穿过长城，沿着曲曲弯弯的公路，飞快地向前行驶。团员们在日本从未看过这样雄伟壮观的景色，车内不时地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声。过了长城大家感到炎热和疲劳，开始昏昏欲睡，好像进入了梦乡。

水泉沟“万人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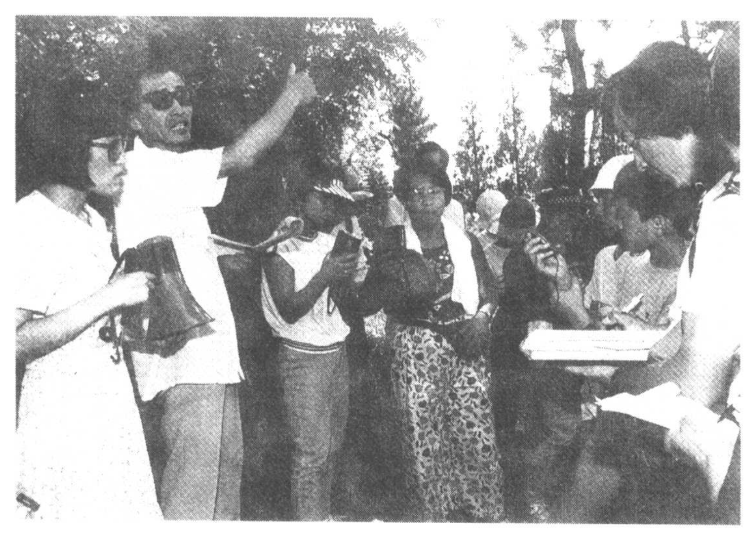
到达承德市已是午后 1 点半，这里曾是伪满洲国热河省省会，以清代的离宫而闻名于世，文化遗产众多，现在市内人口约有 18 万。战争时期，这里设有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和监狱，还设有宪兵队总部。“满洲事变”两年后的 1933 年 3 月，承德被关东军占领。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时，关东军统治该地已达 12 个年头。日军将各地抓来的中国人投入监狱，有的在拷问中死去，有的被处死刑。据说牺牲者人

数有三四万人，准确数字尚不清楚。在距离监狱 1.5 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山，那里就是日军埋葬中国人遗体的水泉沟“万人坑”。

天气炎热，考察团用完午饭并稍事休息后，于午后 3 点离开驻地宾馆。大巴在大街上疾驶，约 30 分钟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拿着录音机、照相机相继拍下了考察团一行下车的情景。许多围观的中国人却露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的表情。

离开公路登上一道急坡，沿着通往山上的小道，又行走了 200 米后，来到一处广场，这就是水泉沟“万人坑”。广场中间矗立着一座纪念碑。此次向导彭明生先生(54 岁)给我们做讲解。彭先生是当地的历史学者，曾著书论述过“万人坑”事件。关于此事现简介说明如下。

1933 年 3 月 4 日，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侵占了河北省(当时是热河省)承德市。在此之前的中华民国时代承德就已有了监狱。日军侵占后不断地将中国人投入这座监狱。收容 800 人后感牢房不足，又扩充了可容纳 2000 人的牢房 150 间。关东军为加强地方统治，建立了上百条的刑律，凡对日军统治稍有不满的中国人，都以“反满抗日犯”、“思想犯”、“政治犯”、“经济犯”等各种罪名抓进来，并判处各种徒刑。



在水泉沟“万人坑”做讲解的历史学者彭明生先生

审判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凡判处死刑的人就地处决后，拉到水泉沟去掩埋。被害者的遗体由服刑人员搬运，在途中要路过一座桥，叫断虹。当年凡被判死刑的人去刑场时，过这座桥就没命了，故当地老百姓就把这座桥改叫“断魂桥”了。刚开始埋人时，是从山下往上埋，因 12 年中死尸多得无处可埋，最后只好把遗体往山上一扔了事。因此，现在从远处往山上一看，到处都散落着莹莹白骨。此外，还有不少被捕者被带到东北(伪满洲)去强制劳动。

监狱常用的用刑方式是绞刑(也可说是绞首刑),也有使用电刑的。但也有的是直接带到水泉沟用枪杀或用刀砍杀的,然后其尸体和在监狱内处死的埋在一起。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承德市政府曾动员市民用5天时间收集到7000多颗头颅骨,并在山坡上挖了三个房子大小的坑,将头颅骨等掩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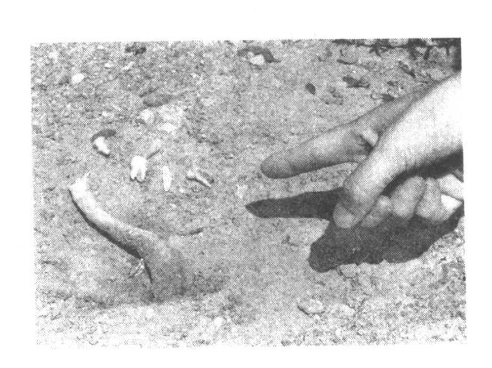
战后审判时,宪兵队的植松兵长曾作证说:“日军连无罪的农民都砍死过。”“一次从日本带来了一把新战刀,为了试一试该刀的刃口,便抓来两位农民,让他们蹲下,挥刀就把两人的头给砍了。然后又在被砍死农民的衣服上把刀擦了擦,说了声‘好刃口’便扬长而去。”如此这般,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把中国人当人看!



在当地不断出现的遗骨



把草丛里的遗骨记录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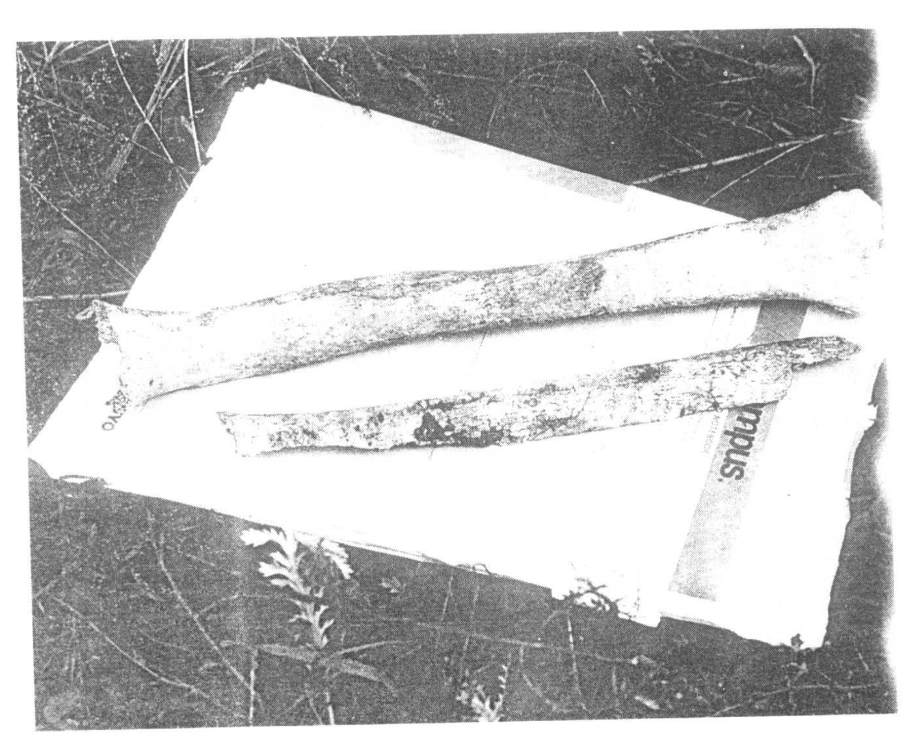


在土里发现的牙齿等遗骨

在纪念碑前默哀的访华团



受刑者所在的伪满洲国承德监狱(现在为河北省第五监狱)



从土里挖出的遗骨



战后的“万人坑”挖出牺牲者头骨堆积成山(历史学者彭明生提供)



从土里不断挖掘出来的牙齿和遗骨

日本还提出“日满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五族共和”、“伪满洲国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口号加以控制。彭先生的介绍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考察团在彭先生的劝说下，都坐了下来，彭氏自己站在那里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日军的占领政策以及在武力、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问题。

虽然大家都在认真地听彭先生的讲解，但心底里不免有一丝疑问：“真是这样的吗？”

讲解完了，在大家请求到山上转一转时，考察团的永井俊策团长在身边的草丛里捡起一块长20厘米左右的骨头，其形状类似于动物的骨头。

“是动物骨头吧？”

“这是不是人骨呢？”人声嘈杂起来。

彭先生看见后肯定地说：“是人骨头。应该是人的胳膊或是腿骨。”

在山上溜达的团员们相互交头接耳，在茂密的草丛里仔细看时，到处都有散落的白骨。稍微一挖就露出骨头来，接着挖又露出了很多。其中有人的颧骨，还有牙齿，简直令人触目惊心。其后，团员们又把这些骨头收集起来拍了照。

众人问：“如何处理这些骨头？”彭先生回答：“就请放在原地吧。”团员们再回到草丛时便悄悄地合起了双手，用日本式的哀悼方式道：“请安息吧。”然而，这些无辜的百姓像蚂蚁似的被弄死，他们能安息吗？

"这些遗骨都是些什么人呢？是家庭里撑门立户的男性？还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呢?"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在怅然无语中，团员们在烈士碑前沉默良久，最后才走下山来。

后　　记

1991年9月下旬，该写真集总编堀江在给身处宫崎市的大贺打电话时说："大贺君，我打算出版一本写真集，届时请多帮忙，如何?"此外，堀江还跟同为教师的木村谈过此事。"难道就不能把中国政府提供给我们的照片资料制成写真资料集吗?"在此后的旅行中，我们一直探讨着这个问题。

真的要出版这个集子时，不但需要资金，而且还要撰写文章。不过，这些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考虑的只是自己手里掌握着日军当年侵华时所犯罪行的证据，而我们也确实有责任将这一历史真相公布于世。"干吧!"虽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就这样将此事敲定了。

其后，我们又把该计划分别告诉给了熟知日中历史的永井（和平之旅团长）、担任和平之旅宣传工作的西尾和井元，以及该组织在广岛县福山市的10人小组组长西本。大家又重新商量后，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编委会。

编委会的分工如下：堀江和木村负责全面工作，并撰写"序言"部分的稿件；永井、西尾及井元负责第一部中61张照片的编辑、翻译及选稿；在报社工作的大贺负责第二部中的"第二次和平之旅"的编辑和选稿工作；福山市的西本则担任书中的年历制表任务。而第二部中所使用的照片，则在"和平之旅"的第二次行动中，由大贺和井元来拍摄完成。

"怎样处理写真集的结构呢?"反复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了如下原则："照片就是事实，它显示的就是当年侵略的历史实况。如何分析和判断他们，则任由读者去做。"

第一部中有很多令人惨不忍睹的照片，在如何处理上编委会发生了争论。有的建议"干脆放大登出"，也有人主张"把照片再缩小点"。建议放大一点的理由是："我国政府非但不认真处理战后遗留问题，反而还打算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通过这些照片，让它反思一下过去日本在亚洲各国的所作所为吧。"而主张缩小的一方则认为："篇幅有限，缩小一下图片，可相应增加一些其他内容。"因双方争执不下，意见不能统一。最后，总编也只是强调了一下编写真集的宗旨，并未对双方的主张加以干涉。

第三部中之所以刊登了一些当年的新闻报道，是因为当时的舆论宣传已成为侵略战争的吹鼓手。他们助纣为虐，散布谎言，其目的就是想让大多数国民相信："日本走向了战争，也走向了胜利。"

在编辑这部写真集之际,恰逢我国的政治迎来了一个新的大转换期,国会正围绕着是否向联合国维和组织(PKO)及其维和司令部(PKF)派遣自卫队问题,展开着激烈的辩论。而以原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为首的"日本在国际社会所起作用的特别调查会",也于2月20日在国会的答辩中,提出了应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自卫队的主张。在此情况下,曾主张永远放弃战争的日本和平宪法,便逐步被所谓的"专守防卫"所扭曲,以至最终达到准许向海外派兵的目的。

倘若如此,不就等于说允许日本自卫队拿着日本造的武器,打着"国际贡献"的旗号,又可以再次去他国杀人了吗?战后,始终回避战争责任的我国政府,无论怎样高喊"为国际和平做出贡献"的口号,也从未获得过亚洲各国国民的欢迎。不仅如此,人们仍一如既往地对它保持着高度警惕。如今在全国各大报社中,也有通过社论来支持小泽议案的。这就是当年那种制造舆论、鼓吹战争的再现。既然已公开出现了允许军事行动的主张,那也就意味着日本的政治已开始走向了危机。

1991年确实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和平之旅"第二次组团访问了中国,并得到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上溯60年前,日军制造的"柳条湖事件",正式引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在20年前,日中两国在恢复邦交关系的同时,又在建交公报上共同发出了为和平而努力的誓言。既然如此,还是让我们重温一下日本国宪法的前言和宪法第九条之规定,以及日本国民向全世界宣传的和平誓言吧:

……日本国民愿意恒久和平,自觉加深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决心以相信爱好和平的诸国民的公正与信义,来保持我国的安全与生存……

〔第九条〕(1)日本国民坦诚地希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日本永久放弃国家发动战争、武力威胁及行使武力的权利。

(2)为达到前项之目的,国家不拥有陆海空及其他兵力,不承认国家宣布的交战权。

在本写真集出版之际,谨向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具岛兼三郎先生、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先生、福冈大学教授西有厚先生、在福冈县国际交流课担任翻译的青木丽子先生、鲛岛礼子先生、九州大学助理教授翟林瑜先生、出版社的西川义夫先生以及给我们提供资料的每日新闻社、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穗访社、青木书店及历史学家陈平先生表示衷心的谢意。

1992年6月记

"中国和平之旅"写真集编辑委员会成员

井元雅枝(小学校教谕·福冈市)
大贺和男(每日新闻社记者·宫崎市)
木村博史(小学校教谕·福冈县大野城市)
永井俊策(中学教谕·福冈县春日市)
西尾　达(中学教谕·福冈市)
西本　章(团体职员·广岛县福山市)
堀江雄一(小学校教谕·福冈县春日市)
监修
西　有厚(福冈大学教授)

(根据日本"中国和平之旅"写真集编辑委员会编:《日本军侵略中国实录》アイネック学术出版社1992年7月1日版翻译。)

邓一民　　　主编校
王建中　石德璋　翻译



人间地狱

『无人区』

重提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是因为有人要「忘记」它

从1939年至1945年间，日军在河北省一带的长城线上，制造了长约1000公里、方圆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在这里，日军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有30万中国百姓死于屠刀之下，1.7万座村庄、380万间房屋被烧为废墟，长城内外树茂花香的大好河山化作一片焦土……

策划人：龙　虎　曲建文
策划人信箱
E—mail：nanhu1961@sina.com
E—mail：suhun@2911.net

责任编辑：刘文清
版式设计：董　妍
封面设计·田晗工作室 (010) 87712237

ISBN 7-80211-124-2
9 787802 111240

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 7-80211-124-2/K·76
定价：36.50元

http://www.cctpbook.com